

林东海 著

古代文學家傳

中外名人传记
青苹果电子图书系列

古代文学家传

林东海 主编

目 录

前言	林东海 (1)
屈 原传	
《史记》卷八四	陈俊山译 (1)
司马相如传	
《史记》卷一一七	陈俊山译 (12)
曹 植传	
《三国志》卷一九	林东海译 (60)
阮 籍传	
《晋书》卷四九	倪木兴译 (88)
潘 岳传	
《晋书》卷五五	倪木兴译 (97)
陶 潜传	
《宋书》卷九三	林东海译 (115)
谢 朓传	
《南齐书》卷七四	倪木兴译 (127)
庾 信传	
《周书》卷四一	林东海译 (134)

谢灵运传

《南史》卷一九 倪木兴译 (159)

高 适传

《旧唐书》卷一一一 刘林译 (169)

韩 愈传

《旧唐书》卷一六〇 刘林译 (178)

刘禹锡传

《旧唐书》卷一六〇 刘林译 (199)

柳宗元传

《旧唐书》卷一六〇 刘林译 (208)

杨 炯传

《旧唐书》卷一九〇 刘林译 (212)

陈子昂传

《旧唐书》卷一九〇 刘林译 (221)

孟浩然传

《旧唐书》卷一九〇 刘林译 (238)

贺知章传

《旧唐书》卷一九〇 刘林译 (241)

杜 甫传

《旧唐书》卷一九〇 刘林译 (247)

王 维传

《旧唐书》卷一九〇 刘林译 (254)

李商隐传

《旧唐书》卷一九〇 刘林译 (259)

温庭筠传

- 《旧唐书》卷一九〇…………… 刘林译 (263)
- 司空图传
- 《旧唐书》卷一九〇…………… 刘林译 (266)
- 白居易传
- 《新唐书》卷一一九…………… 刘林译 (273)
- 元 结传
- 《新唐书》卷一四三…………… 刘林译 (285)
- 杜 牧传
- 《新唐书》卷一六六…………… 刘林译 (296)
- 王 绩传
- 《新唐书》卷一九六…………… 刘林译 (306)
- 王 勃传
- 《新唐书》卷二〇一…………… 刘林译 (311)
- 李 白传
- 《新唐书》卷二〇二…………… 刘林译 (317)
- 李 煜传
- 《新五代史》卷六二…………… 刘林译 (323)
- 王禹偁传
- 《宋史》卷二九三…………… 姚汉荣译 (328)
- 晏 殊传
- 《宋史》卷三一—…………… 姚汉荣译 (346)
- 范仲淹传
- 《宋史》卷三一四…………… 郭正忠译 (353)
- 欧阳修传
- 《宋史》卷三一九…………… 姚汉荣译 (378)

曾 巩传

《宋史》卷三一九 姚汉荣译 (397)

王安石传

《宋史》卷三二七 江小涛译 (404)

苏 轼传

《宋史》卷三三八 姚汉荣译 (428)

范成大传

《宋史》卷三八六 刘炳福译 (472)

陆 游传

《宋史》卷三九五 刘炳福译 (479)

辛弃疾传

《宋史》卷四〇一 刘炳福译 (485)

杨万里传

《宋史》卷四三三 姚汉荣译 (497)

柳 开传

《宋史》卷四四〇 姚汉英译 (515)

苏舜钦传

《宋史》卷四四二 姚汉荣译 (527)

梅尧臣传

《宋史》卷四四三 姚汉荣译 (549)

贺 铸传

《宋史》卷四四三 姚汉荣译 (552)

黄庭坚传

《宋史》卷四四四 姚汉荣译 (556)

秦 观传

- 《宋史》卷四四四 姚汉荣译 (561)
- 林 逋传
- 《宋史》卷四五七 姚汉荣译 (564)
- 元好问传
- 《金史》卷一二六 姚汉荣译 (567)
- 张养浩传
- 《元史》卷一七五 姚汉荣译 (570)
- 陈子龙传
- 《明史》卷二七七 邱文龙译 (578)
- 杨维桢传
- 《明史》卷二八五 邱文龙译 (583)
- 高 启传
- 《明史》卷二八五 邱文龙译 (587)
- 李梦阳传
- 《明史》卷二八六 邱文龙译 (589)
- 茅 坤传
- 《明史》卷二八七 邱文龙译 (595)
- 李攀龙传
- 《明史》卷二八七 邱文龙译 (598)
- 王世贞传
- 《明史》卷二八七 邱文龙译 (602)
- 归有光传
- 《明史》卷二八七 邱文龙译 (608)
- 徐 渭传
- 《明史》卷二八八 魏连科译 (611)

袁宏道传

《明史》卷二八八 邱文龙译 (615)

钟 惺传

《明史》卷二八八 邱文龙译 (618)

王士禛传

《清史稿》卷二六六 邱文龙译 (620)

钱谦益传

《清史稿》卷四八四 邱文龙译 (627)

吴伟业传

《清史稿》卷四八四 邱文龙译 (630)

施闰章传

《清史稿》卷四八四 邱文龙译 (632)

朱彝尊传

《清史稿》卷四八四 邱文龙译 (636)

纳兰性德传

《清史稿》卷四八四 邱文龙译 (639)

查慎行传

《清史稿》卷四八四 邱文龙译 (642)

厉 鹗传

《清史稿》卷四八五 邱文龙译 (645)

袁 枚传

《清史稿》卷四八五 邱文龙译 (648)

姚 鼐传

《清史稿》卷四八五 邱文龙译 (651)

龚自珍传

- 《清史稿》卷四八六…………… 邱文龙译 (654)
- 林 纾传
- 《清史稿》卷四八六…………… 邱文龙译 (656)
- 严 复传
- 《清史稿》卷四八六…………… 邱文龙译 (660)

前言

“文学”这一概念，在我国先秦两汉时期，包括历史、哲学、文艺等人文科学，自魏晋南北朝以后，其外延和内涵，始转向于以语言反映社会生活、表现思想感情的语言艺术，至近现代，才完成由杂文学观念向纯文学观念的转变。今之所谓“文学家”，自然是指语言艺术的专门家，从事于文学创作、研究、翻译和编辑专业工作的行家皆是。由于概念的演变和发展，我们在选编这本古代文学家传时，既不能从古代观念出发，也不能完全从今天的观念出发，只能从文学发展的历史实际出发，来确定标准，进行选编。既不考虑历史家、哲学家，也不考虑研究家、编辑家，所选基本上均属文学创作家。可以说，这只是一本古代作家正史今译传记。

文学既能反映社会生活，又能抒发思想感情，既可干预时政，又可陶冶性情，因而有所谓“言志”说和“缘情”说。这两种观点，从古至今，往往对立起来，不同的历史时期，往往强调不同的方面。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政治权力是至高无上的，一切为政治服务，文人也成了政治的工具。所以当文学同政治结合密切，便被视为“经国大业”，反之则被视为“雕虫小技”。文人的社会地位也就时升时降。随着纯文学观念的发展，抒情化倾向的加重，“缘情”说理论的流行，文学

家的社会地位也就日趋下降。倘若文学家在宦海中沉沦，即便在创作中取得很高成就，在当世的地位也必然是低下的，甚至潦倒一生。因此之故，在各代统治者组织编纂的“正史”中，文学家传记所占篇幅愈往后也就愈短。汉代至六朝，文人有的直接为后帝或皇室服务，地位较高，史传篇幅也较长；自唐以后至明清，文人地位下降，史传篇幅便很短，而且所记多有关政治活动资料，文学活动很少涉及。有些在今天看来是很重要的作家，特别是戏剧、小说的重要作家，其作品虽然广为流传，然而因为受到政治高于一切和诗文正宗观念的影响，因而他们在正史中甚至未能争得一席之地。鉴于这种历史事实，我们无法以今天的文学史观所确定的作家地位高低来选拔，所选作家也无法从正史传记篇幅的大小来衡量其份量的轻重。不过，我们还是尽可能选录比较重要比较有影响的文学家，既考虑当今的标准，也考虑到历史的局限，遵循先贤遗训：允执其中。一位作家在不同正史中重复出现者，则根据材料的详略和可靠程度，酌情加以选择。正史和野史不能等同，出于正史的作家传记材料，并不都是真实可靠的，应当说，也有不少材料是不实之辞，缺乏真实性。去伪存真，考订史实，不是今译的任务，所以悉仍其旧，让读者自己鉴别。

由文言译成白话，并不只是言语文辞的通俗化问题。由文转白，要做到“信、达、雅”，殊非易事。文言的含义，有时难以用白话充分地加以表达，只能译出其大概意思；文言之分段和标点，与白话文之分段，也略有区别，故译文与原文的分段和标点并不强求一致。由于不同时代有不同的社会

制度和生活方式，这就给今译带来更多的难题，有的难题甚至是无法解决的。例如职官问题就不是很好处理的。我们很难将如今的官衔及其职能拿来对应地表示历代的官职，所以职官一般不加今译，而仍其旧；又如时间和地名，也不一定能全部准确无误地加以注明，只能酌情予以解决，时间一般在年号之后的括号中注出公元年数，月日一般不加查核；地名一般在括号中注今属省县（市），具体地理位置难以确指，而且一般只注与传主关系密切者，没有也不必全部注释清楚。

本书今译工作由以下几位同志分工承担：先秦两汉由陈俊山今译，魏晋南北朝由倪木兴今译（其中《谢朓传》、《庾信传》由林文琛协助），隋唐五代由刘林今译，两宋金元由姚汉荣今译（其中《陆游传》、《辛弃疾传》、《范成大传》由刘炳福协助），明清两代由邱文龙今译。刘文武同志担任责编。本书之编成问世，有赖诸君通力合作，谨致谢。

林东海

1992年9月15日于清风馆

屈原传

——《史记》卷八四

【说明】屈原（约前 339—约前 278），我国最早的大诗人。名平，字原；《离骚》中又自云名正则，字灵均。战国时期楚国人，曾辅佐楚怀王，任左徒，三闾大夫，后遭谗去职。顷襄王时，被长期流放湘江流域。秦兵攻克楚国都城后，他痛感政治理想破灭，无力挽救楚国的危亡，遂投汨罗江而死。

屈原学识渊博，他吸收民间文学的营养，创造出“骚体”这一新的诗歌形式，对后世产生很大影响。他的作品溶化神话传说，语言优美，想象丰富，富有积极浪漫主义气息。《离骚》、《九章》等篇陈述他的政治主张，揭露楚国政治的黑暗，融汇了诗人的理想、遭遇、痛苦和热情。《天问》对一系列自然现象、社会历史等方面的传统观念提出了怀疑和质问。此外还有《九歌》等作品传世。

本世纪中，屈原曾被推举为世界文化名人而受到广泛纪念。

屈原，名平，和楚国是同姓。担任楚怀王的左徒。屈原博学强记，明了国家安定、动乱的原因和治理方法，善于应

对言词，尤其是外交辞令。所以他入朝就和国王谋划国家大事，用以发布号令；出朝就接待宾客，应对四方诸侯。楚怀王十分信任他。

上官大夫和屈原在朝廷是同班列之臣，为同屈原争夺皇帝的宠爱，因而心里非常妒忌屈原的贤能。楚怀王让屈原制订法令，屈原起草尚未定稿。上官大夫见到了，就要夺去自己写，屈原不给他，他就到楚怀王面前说屈原的坏话：“大王让屈平起草法令，众人没有不知道的，每一法令发布出来，屈平就夸耀是自己的功劳，认为‘不是我，没有人能写得出来的’。”楚怀王听了很生气，从此疏远了屈原。

屈原怨恨楚怀王听臣进言不明是非，被假话坏话遮住了眼睛，任凭奸邪陷害公正，容不得端方正直之士，所以忧愁幽思，写了一篇很长的辞章《离骚》。所谓“离骚”，也就是离忧的意思。天，是人的起源；父母，是人的根本。人到了走投无路的时候，就会溯源返本，所以人到劳苦疲惫之极，未尝不呼喊“天哪！”人到疾病疼痛难忍，也未尝不呼喊“爹呀！娘呀！”屈原走的是正道，又照直行事，竭尽忠诚和智慧，服侍他的君主。然而坏人从中挑拨离间，失去了皇帝的信任，可谓走投无路了。真诚的人受到怀疑，忠贞的人受到诽谤，没有怨恨吗？屈原写作的《离骚》，大概由于怨恨产生的，就像人到走投无路时呼天叫娘一样自然。《诗经》中的《国风》一类诗，它的风格特色犹如喜爱美色而不过分一样，《小雅》一类诗，它的风格特色犹如怨恨国家失政而不造反一样。而《离骚》这样的作品，可谓两种特色兼而有之。屈原在《离骚》中上称誉等古帝，下道齐桓公等霸主，中述汤、武等贤

王，用来指责当时的社会政治。所表明道德之广大崇高，安定和动乱之条理贯通，无不彻底表现出来。文体简约，辞义深微，志向高洁，行为清廉，用的文体形式虽小，而所表现的内容却很大，所举事例虽浅近，而所表现的意义却很深远。因为作者志向高洁，所以举的事物都很芬芳美好。作者行为清廉，所以宁死也不能容忍自己被疏远。洗涤于污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于尘埃之外，没有受到世俗的沾染污垢，光亮的样子就像纯净的黑泥没有一点杂质。如果比喻这种高洁的志向，那么即使说它与日月争光也是可以的。

屈原遭到贬斥后，秦国要征伐齐国，而齐国和楚国联合起来相互支援，秦惠王对此很忧虑，于是命令张仪假装背离秦国，以丰厚的钱币和卑下的礼节服事楚国。张仪说：“秦国非常憎恨齐国，可是齐国和楚国联合起来相互支援，如果楚国真的能和齐国绝交，那么秦国愿意将秦国的商、於之地六百里献给楚国。”楚怀王贪婪钱物而相信了张仪的话，于是和齐国绝交，派使者到秦国接受献地。张仪随即变卦，骗他说：“我与楚怀王相约时说的是六里，没听说过有六百里。”楚国使者很气愤地离去了，回去就报告给楚怀王。楚怀王发怒，大举兴兵讨伐秦国。秦国发兵迎击，在丹、淅两地大破楚兵，斩首八万，虏去楚国将军屈丐，夺取了楚国的汉中之地。楚怀王于是调动国中全部兵力深入攻击秦国，战于蓝田。魏国听到这个消息，于是突然袭击楚国的邓城。楚兵十分恐惧，从秦国境内退兵。而齐国终是生楚国的气，不去救援楚国。楚国落入非常困窘的境地。

第二年，秦国把夺取的汉中之地割让给楚国，与楚国讲

和。楚怀王说：“不想得到汉中之地，而愿意得到张仪才甘心。”张仪听到了，对秦惠王说：“用一个张仪而相当于汉中之地，我请求前往楚国。”张仪到了楚国，又用丰厚的钱币贿赂楚国的当权之臣靳尚，在楚怀王宠臣郑袖面前编造了花言巧语。楚怀王竟然听从了郑袖，再次放走了张仪。这时屈原已经被疏远，不复在位，出使于齐国，又返回，规劝楚怀王说：“为什么不杀张仪呢？”楚怀王很后悔，但再追张仪却赶不上了。

此后，诸侯共同攻击楚国，大破楚兵，杀了他们的将军唐昧。

当时秦昭王与楚国联姻，要和楚怀王相会。楚怀王要启程，屈原说：“秦国就像虎狼，不可信，不如不去。”楚怀王的小儿子子兰劝说楚怀王前去，说：“怎么能拒绝秦国和我们的和好呢？”楚怀王终于去了。走到武关，秦国的伏兵截住了楚怀王的随从人员，只留住他一人，要求割让土地。楚怀王十分气愤，没有听从。他逃跑到赵国，赵国不接纳。他又到秦国，竟然死在秦国而送回楚国安葬。

楚怀王的长子顷襄王立为楚国国王，用他的弟弟子兰为楚国最高军政长官令尹。楚国人很怪罪子兰，因为他曾劝楚怀王到秦国而未得生还。

屈原早已憎恨子兰，但是他即使被流放，仍然眼望楚国，心系怀王，不忘回来，是希望国君的觉悟，风俗的改变。他思念国君、振兴祖国的深情反覆不息，在《离骚》一篇之中，多次表达这种思想感情。然而终于无可奈何，所以不能回到楚国，最后见怀王终不觉悟。国君不论愚蠢、智慧、贤明、糊涂，莫不愿意求得忠臣用来为自己出力，提拔贤才用来辅助

自己，然而亡国破家接连发生，圣明的君主、安定的国家世世代代不能出现，正是由于所谓“忠臣”并不忠，所谓“贤才”并不贤。楚怀王因为不知道忠臣的职分，所以在国内被郑袖所惑，在国外被张仪所欺，疏远屈原而信任上官大夫、令尹子兰。军队受挫，国土被割，失掉了六郡，自身客死于秦国，为天下人嘲笑。这是不知人善任的灾祸呀！《易经》上说：“井淘干净了，仍无人食用，是令人伤心，这井的水是可以提上来食用的。国王如若英明，全国都会享受幸福。”楚怀王糊涂，哪里能给全国以幸福呢？

令尹子兰听到屈原的议论后，大为恼火，使上官大夫在顷襄王面前说屈原的短处。顷襄王也很生气，因而将屈原再次放逐。

屈原到了大江之滨，在湖泽之畔，头披长发，一边行走一边吟唱，脸色憔悴，形体枯槁。渔翁看见了，问他说：“你不是职掌王族三姓的三闾大夫吗？是什么缘故落到这种地步？”屈原说：“整个世界都是混浊的，而只有我才是清白的；众人都是沉醉的，而中我才是清醒的，因此才被放逐。”渔翁说：“圣人，不拘泥于某种事物，而是与世道推移。整个世界混浊，你为什么随波逐流？众人都沉醉，你为什么不连酒带糟都吃下去呢？何必怀抱着美玉般的稀世之才，而人为地自己让国君放逐呢？”屈原说：“我听说过，刚洗过头的人，戴帽之前必定先弹弹帽上的灰尘；刚洗过澡的人，穿衣之前必定先抖抖衣上的灰尘。人谁能以自己的高洁操行，接受昏暗污浊的世道呢？我宁可投进永不停歇的流水而葬身于大江鱼腹之中，又岂能以明亮洁白之躯蒙上世俗的尘滓呢？”于是

写作《怀沙》这篇辞赋。其词说：

阳气腾腾的初夏呀，草木长得多么茂盛。使我伤怀而永远哀痛啊，如今又匆匆独自南行。转眼四顾一片阴森，没有一点声息，死一般的寂静。胸有闷气呀迂曲不止，身遭忧患而长期困窘。抚念衷情而检查志向啊，已受很大的冤屈，仍要压抑自己。尽管小人削方为圆哪，然而永恒的法则决不可任意废弃。改变自己本来的道路，为道德高尚的人所鄙夷。标明规矩要坚持原则，以前的风范决不能改易。内心厚道而品质庄重，这种美德为有地位的哲人所赞扬。能工巧匠如不运用斧凿，谁能看到他那准确的度量？若把黑色的彩绣放在暗处，患有青光眼病的人则妄言花纹不鲜亮。古代眼明的离娄，用眼一瞥就看到秋毫之末，而瞎眼人还以为他也是老盲。把白的当作黑的呀，将上倒过来作为下。美丽的凤凰被关进竹笼里，丑陋的鸭群却乱飞乱抓。美玉和顽石掺合混杂呀，不加区别，一起用升斗来衡量。尤其是那些结党营私的小人，鄙陋而顽固，他们岂知道我的才德优长！我的任务太重，如车满载哟，陷于泥泞而不能通过。怀抱的和手握的都是美玉哟，却找不到一个能看一看我这美玉的明哲。村里的群狗乱叫呀，叫的是它觉到的奇怪。诽谤英雄，猜疑豪杰，本是小人的一贯心态。文质彬彬，内心通达，群小们哪里知道我所具有的异采？良材好料聚积很多，却没有人知道我有如此丰富的储备。用仁义将我穿戴起来吧，使美德修养得又厚又丰。圣明的舜帝重华不再遇到了，谁知道我的才德有馀，气度从容？圣君

贤臣古来就不能同世并生，哪里得知其中的缘故？商汤、夏禹距今久远，久远得如同旷绝，简直不可追慕。停止怨恨，排除愤懑吧，抑制浮躁心情，以便自勉自强。虽遭忧患，坚贞不移，但愿我的意志成为后来者的榜样。因为赶路而错过了宿地，日色昏昏，时将傍晚。自舒忧怀，自宽哀心吧，死而后已，才算个极限。

尾声：

浩浩荡荡的沅江湘江，各自滚滚地奔流啊！道路漫漫，林木幽幽，前程渺渺无尽头啊！抒不尽的长悲，叹不尽的感慨。世间无人理解我，人心不可说。坚守自己的真情和美德，而独独无人予以作证。古代相马人伯乐早已死去，今日的千里马由谁品评？人生禀受天命啊，个个早被安排定。安定情绪，弘扬志气，我还有什么畏惧？层层伤怀，层层悲哀，长声叹息，没有休止。世间混浊，无人理解我，人心不可说。我知道死亡不可回避，愿意离开人世不自爱惜。明白地告诉道德高尚的人，我将做出榜样让后人学习。

于是，屈原怀抱石头，自沉汨罗江而死。

（陈俊山 译）

【原文】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为楚怀王左徒。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入则与王图义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待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

上官大夫与之同列，争宠而心害其能。怀王使屈原造为宪令，屈平属草稿未定。上官大夫见而欲夺之，屈平不与，因

谗之曰：“王使屈平为令，众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以为‘非我莫能为’也。”王怒而疏屈平。

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离骚》者，犹离忧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穷则反本，故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也；疾痛惨怛，未尝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上称帝喾，下道齐桓，中述汤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广崇，治乱之条贯，靡不毕见。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议远。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汙泥之中，蝉蜕於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

屈平既绌，其后秦欲伐齐，齐与楚从亲，惠王患之，乃令张仪详去秦，厚币委质事楚，曰：“秦甚憎齐，齐与楚从亲，楚诚能绝齐，秦愿献商、於之地六百里。”楚怀王贪而信张仪，遂绝齐，使使如秦受地。张仪诈之曰：“仪与王约六里，不闻六百里。”楚使怒去，归告怀王。怀王怒，大兴师伐秦。秦发兵击之，大破楚师於丹、淅，斩首八万，虏楚将屈丐，遂取楚之汉中地。怀王乃悉发国中兵以深入击秦，战於蓝田。魏闻之，袭楚至邓。楚兵惧，自秦归。而齐竟怒不救楚，楚大困。

明年，秦割汉中地与楚以和。楚王曰：“不愿得地，愿得

张仪而甘心焉。”张仪闻，乃曰：“以一仪而当汉中地，臣请往如楚。”如楚，又因厚币用事者臣靳尚，而设诡辩於怀王之宠臣郑袖。怀王竟听郑袖，复释去张仪。是时屈平既疏，不复在位，使於齐，顾反，束怀王曰：“何不杀张仪？”怀王悔，追张仪不及。

其后诸侯共击楚，大破之，杀其将唐汙。

时秦昭王与楚婚，欲与怀王会。怀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国，不可信，不如毋行。”怀王稚子子兰劝王行：“奈何绝秦欢！”怀王卒行。入武关，秦伏兵绝其后，因留怀王，以求割地。怀王怒，不听。亡走赵，赵不内。复之秦，竟死于秦而归葬。

长子顷襄王立，以其弟子兰为令尹。楚人既咎子兰以劝怀王入秦而不反也。

屈平既嫉之，虽放流，睠顾楚国，系心怀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兴国而欲反复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然终无可奈何，故不可以反，卒以此见怀王之终不悟也。人君无愚智贤不肖，莫不欲求忠以自为，举贤以自佐，然亡国破家相随属，而圣君治国累世而不见者，其所谓忠者不忠，而所谓贤者不贤也。怀王以不知忠臣之分，故内惑于郑袖，外欺于张仪，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兰。兵挫地削，亡其立郡，身客死于秦，为天下笑。此不知人之祸也。易曰：“井泄不食，为我心恻，可以汲。王明，并受其福。”王之不明，岂不福哉！

令尹子兰闻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顷襄王，顷襄王怒而迁之。

屈原至於江滨，被发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渔父见而问之曰：“子非三闾大夫与？何故而之此？”屈原曰：“举世混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是以见放。”渔父曰：“夫圣人者，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举世混浊，何不随其流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铺其糟而啜其醪？何故怀瑾握瑜而自令见放为？”屈原曰：“吾闻之，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人又谁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宁赴常流而葬乎江鱼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温蠖乎！”

乃作怀沙之赋。其辞曰：

陶陶孟夏兮，草木莽莽。伤怀永哀兮，汨徂南土，眴兮窈窕，孔静幽墨。冤结纆轸兮，离愍之长鞠；抚情效志兮，俯咄以自抑。

刑以为圜兮，常度未替；易初本由兮，君子所鄙。章画职墨兮，前度未改；内直质重兮，大人所盛。巧匠不斫兮，孰察其揆正？玄文幽处兮，矇谓之不章；离娄微睇兮，瞽以为无明。变白而为墨兮，倒上以为下。凤皇在帆兮，鸡雉翔舞。同糅玉石兮，一概而相量。夫党人之鄙妒兮，羌不知吾所臧。

任重载盛兮，陷滞而不济；怀瑾握瑜兮，穷不得余所示。邑犬群吠兮，吠所怪也；诽骏疑桀兮，固庸忒也。文质疏内兮，众不知吾之异采；材朴委积兮，莫知余之所有。重仁袭义兮，谨厚以为丰；重华不可悟兮，孰知余之从容！古固有不并兮，岂知其故也？汤禹久远兮，邈不可慕也。惩违改忿兮，抑心而自强；离溯而不迁兮，愿

志之有象。进路北次兮，日昧昧其将暮；含优虞哀兮，限之以大故。

乱曰：“浩浩沅、湘兮，分流汨兮。修路幽拂兮，道远忽兮。曾唵恒悲兮，永叹慨兮。世既莫吾知兮，人心不可谓兮。怀情抱质兮，独无匹兮。伯乐既歿兮，驥将焉程兮？人生稟命兮，各有所错兮。定心广志，餘何畏懼兮？曾伤爰哀，永叹喟兮。世混不吾知，心不可谓兮。知死不可让兮，愿勿爰兮。明以告君子兮，吾将以为类兮。

於是怀石遂自沉汨罗以死。

司马相如传

——《史记》卷一一七

【说明】司马相如（前 179～前 118），西汉辞赋家。字长卿，蜀郡成都（今属四川）人。少好击剑读书，汉景帝时曾为武骑常侍，免官后，曾与枚乘等人同游于梁。后作《子虚赋》、《上林赋》，受到汉武帝赏识，召为郎，又曾出使西南，终孝文园令。

司马相如的文学成就主要在辞赋上，他作赋注意资料的广博、辞采的富丽，内容大多描写帝王苑囿之盛，田猎之乐，极尽铺张之能事，富于文采。他的创作丰富了汉赋的题材和描写方法，使汉赋成为一代鸿文。

《隋书·经籍志》载《司马相如集》一卷，已散佚，明人张溥辑有《司马文园集》。

司马相如，蜀郡成都（今四川成都）人，字长卿。少年时爱好读书，学习击剑，所以他的父母很爱他，起个名字叫犬子。相如已经上学，因为羡慕战国时代赵国贤相蔺相如，于是改了名字叫相如。因为有家资，入朝为郎官，侍从护卫汉景帝，官衔是武骑常侍，但这个职务不是他所爱好的。正遇

到汉景帝不喜欢辞赋之类的文学作品，当时梁王来朝见景帝，随从梁王的是些游说之士，如齐人邹阳、淮阴人枚乘、吴人庄忌夫子等，相如见了他们很喜欢，于是借口生病，免去郎官职务，以客人的身份游历梁国。梁王让司马相如和众儒生同房住宿，相如才能够和众儒生、游说之士同住数年，于是写了《子虚赋》。

遇到梁王逝世，司马相如才回到家里，而家里贫穷，无法自谋产业。相如素来和临邛县令王吉友好，王吉说：“长卿长久为作官而出游，不能遂心如意，就来访我吧！”于是，相如就到了临邛县，住在城郭下的亭子里。临邛令王吉假装恭敬，天天去会见司马相如。相如开始还见他，后来就借口生病，让跟从的人向王吉致谢，王吉愈发谨慎严肃。临邛县里很多富人，而卓王孙家里有僮仆八百人，程郑也有数百人。二人于是相告说：“县令有贵宾，应为之备宴邀请。”两家合起来请相如。县令王吉已经来到了，见卓氏的宾客多得数以百计。到正午，主人拜请司马相如，相如以病谢拒，不能赴宴。县令王吉不敢先吃，亲自去迎接相如。相如不得已，勉强前往，客人们一座为之倾倒仰慕。众人喝得酒兴正浓之际，县令王吉向前献上琴来，说：“我听说长卿好琴，愿送您自己娱乐。”相如推辞感谢了一番，就为客人们弹了一两曲。当时卓王孙有女叫文君，刚刚死了丈夫，爱好音乐，所以相如假装和县令王吉相互推重，而其实用琴声寄托着心思去挑逗文君。司马相如到临邛县，有车骑相从，从容大方，悠闲自在，风度甚美；待到在卓王孙家饮酒弹琴，卓文君暗地从窗户间偷看了他，心里特别喜悦而爱上了，大概爱慕之情不能阻挡了。

饮宴已罢，相如就派人再赠文君的仆从，让他向文君沟通殷勤之意。卓文君夜间逃走，奔向相如，相如就和文君急驰车骑，同归成都。家里没有资财，空有四壁。卓王孙大怒，说：“女儿跑到那个不成材的人家里，我不忍心杀她，但是不给她一文钱。”有人劝说卓王孙，卓王孙不听。文君久久不乐，说：“长卿和我只管到临邛去，跟我的弟弟借钱就够我们生活的了，何必自己艰苦到这样？”相如和文君都到了临邛，把车马全部变卖了，买了一个酒馆卖酒，而让文君站在炉前出售。相如自己穿着形如牛鼻子的大围裙，与雇工一起做杂活儿，在市中洗涤器皿。卓王孙闻听后为女儿女婿而羞耻，闭门不出。兄弟叔伯轮番劝说卓王孙：“有一男两女，所少的不是钱财。现在文君已失身于司马长卿，长卿因为厌倦了为作官而出游，即使生活贫穷，但他这个人材足够依靠的，而且又是县令的客人，怎么这样辱没他？”卓王孙不得已，分给卓文君僮仆一百人，钱百万，以及她出嫁时的衣被财物等。卓文君和司马相如又回到成都，购买田宅，成为富人。

过了很久，蜀郡人杨得意做监管猎狗的官职，侍奉汉武帝。汉武帝读了《子虚赋》而褒奖它，说：“我唯独不能和作者其人同一时代啊！”杨得意说：“我的同乡人司马相如自说写了这《子虚赋》。”汉武帝大惊，于是把司马相如召来询问。相如说：“有这事。然而这写的是诸侯小国之事，不足阅览。请让我写一篇天子游猎的赋，写成后再进献上去。”汉武帝允许了，令尚书给司马相如提供写赋的笔和木片。相如用“子虚”这个词，代表虚构之言，作为对楚国的赞美；用“乌有先生”这个词，代表无有此事，作为对齐国的辩难；“无是

公”，即无此人，表明天子之义。所以空借这三人为辞，以推论天子诸侯的园林田猎之盛。最后尾声归于节俭，用以暗示规劝之意。司马相如将《子虚赋》重新写好，献给天子，天子读后大悦。《子虚赋》是这样写的：

楚国派子虚出使齐国，齐王全部调动境内的士人，备好众多的车马，与使者出城打猎。打猎结束后，子虚过分夸耀于乌有先生，而无是公也在场。大家坐定，乌有先生问道：“今天打猎快乐吗？”子虚答道：“快乐。”乌有先生问：“猎获的东西多吗？”子虚答：“少。”乌有先生说：“既然如此，还有什么快乐的？”子虚说：“我感到可乐的是齐王要向我夸耀他的车马之众，而我用楚国的云梦泽的事回答他。”乌有先生说：“可以让我听听吗？”

子虚说：“可以。齐王驾车千辆，选出万骑，到海滨打猎。排列士卒，布满洼地，捕兽的各种网架满山岗，罩住了兔子，撵着小鹿，射中了大麋鹿，拖住了麟脚。纵横奔驰在海边的盐滩，宰割兽肉的鲜血染红了车轮。纷纷射中，猎获很多，自夸功劳。齐王回头对我说：‘楚国也有平原大泽游猎之地富于乐趣像这样的吗？楚王打猎的情况与我比起来怎么样啊，我下车回答说：‘臣是楚国的粗人，幸而在皇帝身边值班护卫十有余年，常常跟从皇帝出游，游于后园，看到尽头，然而仍未能处处看遍，又哪能说外边的大泽呢？’齐王说：‘虽然如此，也用你听到的见到的事，简略地说一说吧！’

“我答道：‘是是。我听说过，楚国有大片的泽地七个，我曾见过其中之一，未见过其余的。我所见到的，大

概是最小的罢了，名字叫做云梦泽。这云梦泽，方圆有九百里，其中还有山脉。山势盘旋迂回，曲折险恶，高耸峻拔；峰岩高高低低，遮蔽日月，半隐半现，圆形亏缺；交错杂乱，直逼青云；倾斜而下的山坡，下边江河。其中有矿土，如丹青、赭石、白垩、雌黄、白石英、锡土、碧玉、金沙、银砂等，各种颜色炫耀，光采斑斓如龙鳞。其中有玉石，如赤玉、石珠、琳琅玉、琨珉玉、玳瑁石、黑砺石、瑛石、武夫石等。东边有香草花圃，如蕙草、杜蘅、秋兰、白芷、杜若、乌蓬、穹穷、昌蒲、江蓠、麋芜、甘蔗、猗荷等。南边有平原大泽，地势高高低低，升升降降，倾斜的，仆倒的，凹下的，平坦的，以长江成边缘，以巫山为极限。其中干燥的高地上，生长着马蓝、蕲草、苞草、马蔺、赖蒿、莎草、青蘋草等。其中潮湿的洼地里，生长着藏草、菰草、荻草、苇草、东蒿草、菰米、莲藕、菰芦、菴蒿、轩芋等，各样的草生长在一起，不胜描绘。西边有涌泉清池，激水推移；外发芙蓉菱花，内隐巨石白沙。其中有神龟、怪鳄、玳瑁、大鳖。北边有森林巨树，如榧树、长枏、豫章、桂树、椒聊、木兰、山梨、赤杨、酸楂、羊枣、板栗、橘树、柚树等，树木繁多，花果芬芳。其上有大的猿猴、小的猕猴，凤凰、孔雀、蠪蛇、飞狐。其下有白虎、黑豹、巨大的螭、野狸似的貆、胡犬似的豸、大象、犀牛、豪猪似的怪兽穷奇、豺狼般的狴犴。

“‘于是，就使古代勇士专诸之徒，和这些怪兽徒手格斗。这时，楚王才命驾凶猛的神马驯驳作为驷马，乘

上雕刻美玉的华盖轿车，车上垂下的神鱼的花皮装饰的旒旌，拖着点缀着明月之珠的旗子，树立着古代剑师干将制造的雄戟，左边是以乌号之木做的雕弓，右边是古代神射手夏羿所佩箭囊里的劲箭，仙人陵阳子陪乘，月神的御手纤阿驾车；按下鞭子，放下缰绳，车马尚未奔驰，就和眼前的狡猾猛兽打起来了，车轮轧着青马似的邛邛，马脚踢着和邛邛相似的距虚，野马超车前跑，小野马碰到车轴头，再跨上千里马而射乱跑的斑马；多么急速啊！这要取决于每个人的眼力，胸腋通达，已不是心里管得了啦！捕获的野兽之多，就如下雨般地从天上落下来，掩盖了草，遮蔽了地。于是，楚王才放下鞭子徘徊，优哉游哉，游览山北之森林，观看壮士之暴怒，瞥见猛兽之恐惧，巡视到被赶得疲惫不堪的困兽就拦截捕捉，看尽了经过杀掠后的众物的变态。

“‘于是，郑国的美女，楚王的娇妇，披着细花采绘的布，拖着白练似的白绢，掺杂着纤细的绫罗，头上垂着云雾般轻飘的绉纱；衣裙上千折万扣，纤徐委曲，绉纹郁桡，有似溪谷；长袖举起，纷纷裊裊，飘动桂衣上的长带，垂下衣上的燕尾之饰；扶着楚王的车子，柔媚婉顺，举步张衣，悉悉作声，下边裙裳抚摸到兰花蕙草，上边的发饰轻拂到羽饰华盖，交错着翡翠的繁华装饰，缭绕着衣上佩带的玉串；飘飘忽忽，恍若神仙。

“‘于是，他们才和人们一起猎于香草花圃，蹒跚趋，缓缓而行，上金黄色的沙堤，掩掩翡翠的佩饰，弯弓射猎光采鲜明的锦鸡，系上丝绳的短箭射出去了，系

在短箭上的细丝绳斜上而行，弋射白天鹅，连中野鹅，把双黑枕黄鹂射下来，又射上了黑鹤。倦怠了，以后再射，暂到清池中游玩；浮动画有彩色鸕鸟的船，举起船桨，架起翡翠帷帐，立好羽毛装饰的伞盖，撒网捕玳瑁，垂钩钓紫贝；船人唱船歌，声震流水咽，水族惊骇，洪波鼎沸，涌泉喷起，奔腾聚合，礪石滚动相击，碌碌磕磕，如同雷霆之声，响彻数百里之外。

“‘将要结束打猎，敲响六面鼓，点起烽火堆，车定行，骑就队，走起来，轰轰烈烈，熙熙攘攘。于是，楚王登云阳之台，淡泊得好像无为而自持，似乎享用五味调和的美食，不如终日驰骋而不下车，切割肉块而食，车轮被泥水浸染，反而自以为快乐。臣暗中看来，齐国大概还比不上。’于是，齐王默然不语，无法回答我的话了。”

乌有先生说：“这是什么话呢？太过份了！足下不远千里，来比较齐国，齐王全部调动境内的士人，准备众多的车马，出城打猎，是为了努力猎获，以娱乐左右之人，怎么能称之为夸耀呢？问楚国的有无，是希望听到大国的风俗功业，以及先生之余论。现在足下不赞扬楚王的厚德，而盛赞云梦泽以为崇高，侈谈享乐而显示奢靡，我私下以为足下不足取呀！一定若有所说，这本来就不是楚国的美好。有这回事而说它，是张扬国君的丑恶；没这回事而说它，是妨害足下的信誉。张扬国君的丑恶而又伤害个人的仁义，二者没有一件是可以的，而先生却这样实行，必定将被齐国所轻视，又被楚国所连累。况且，齐国东有大海之渚，南有琅邪之险，成山筑

台而观，之罘山为射猫之地，浮桴于勃海之湾，优游于孟诸之藪，右与古国肃慎为邻，右以热水汤谷为界，秋猎于青丘，彷徨于海外。若吞云梦者八九百里，吞入胸中也不觉得有芥蒂之微隔。像这样的倜傥之才，瑰伟之魄，异方殊类，珍鸟怪兽，万端荟萃，充满其间，不可胜记，夏禹说不出名字，商契不能计数。然而在诸侯之位，不敢言游戏之乐，园林之大；先生又为客，这是因为齐王推辞而不回答，为什么说齐王无法回答呢？”

无是公哑然失笑说：“楚国是失落了，而齐国也没有所得。使诸侯纳贡，不是为了财帛，而是用来述职的；封疆画界，不是为了防御，而用来禁绝淫放的。现在齐国列为东边的蕃国，而外私肃慎，损害国家，超过界限，越海而猎，这些事对于道义是不可以的。而且，二君之论，不是为彰明君臣之义而端正诸侯之礼，而是徒然从事争夸游猎之乐，园林之大，要以奢侈相互争胜，以荒淫相互比高，这是不可以扬名播誉的，而适足以贬君和自损罢了。再说，齐国和楚国的这类事又何足道哉！你没有看到最大的壮丽吗？你难道没听说过天子的上林苑吗？

“它左边是苍梧郡，右边是最西边的獫狁国，丹水在它的更南边，紫渊经直在它的北边；以灞水、沔水为始终，有泾河、渭河从中出入；酆水、鄠水、滹水、潏水，舒缓迂回，周旋其内。浩浩荡荡啊八川分流，相背离而显异态。东西南北，驰骛往来，出于椒丘的峰阙，行于洲淤的浅滩，直穿桂林之中，经过大荒之野。滚滚浑流，顺着山角而下，奔赴隘陕之口。撞到穹窿的大石，被曲

莎草，揭车草、杜蘅草、兰草、槁本草、射干草、茈萆、
鄙荷、葳橙、若荪草、鲜枝草、黄砾草、菰草、三棱草、
青蘋草，布满洪泽，蔓延大地，附丽广大，应风倒下，吐
芳扬烈，斐然浓郁，众香发越，弥漫布泻，馥郁盛大无
比。

“于是乎周游流览，睁大眼睛也看不明，茫茫恍惚，
视之无端，察之无边。日出东沼，入于西陂。其南隆冬
生长，踊水跃波；兽是牯牛、旄牛、獬豸、犛牛、水牛、
麀鹿、麋鹿、赤首、鬣额、怪兽穷奇、大象、犀牛。其
北盛夏冻地，涉水揭河；兽是麒麟、角馱牛、觥馱马、骆
驼、蛩蛩马、骅骝马、骥马、馱馱马、驴、骡。

“于是乎离宫别馆，满山跨谷，高廊四面下垂，重轩
曲阁，华美的榱桷，以璧柱为装饰，辇道相互连属，走
廊四周通行，陛道长途，中可休歇。平山筑堂，垒台增
成，岩穴洞房，暗通台上，低头看阴暗无所见，仰头攀
檐而扪到天，奔星移在闺门，弯虹架在轩阑。青虬曲溜
爬行于东厢，象车蜿蜒回转于西堂清静之处，仙人灵圉
休息在闲静的台观，仙人偃佺之辈在阳光下偃卧于南房
飞檐，醴泉涌于清室，通川穿过中庭。盘石垒崖，高岩
斜倾，嵯峨险峻，刻削峥嵘，玫瑰玉、碧玉、琳玉、珊
瑚丛生、珉玉广大，纹理如鳞，赤玉斑驳，杂插其间，下
垂琬琰之玉，和氏之璧出现。

“于是乎金橘夏熟，黄柑橙柚，枇杷、枣、柿、山梨、
沙果、厚朴、羊枣、杨梅、樱桃、葡萄，隐夫野李、山
樱桃、搭椽李、荔枝、摆满了后宫，罗列在北园。延丘

陵，下平原，扬翠叶，摇紫茎，开红花，秀朱荣，光辉鲜明，照耀钜野。沙棠树、栎树、楮树、桦树、枫树、檉树、栌树、留落树、椰子树、槟榔树、棕榈树、檀树、木兰树、豫章树、女贞树、高千仞、大连抢、美好的枝条直溜顺畅，实叶繁茂，积聚而立，成丛而倚，连卷重叠、交错盘曲、倾欹相抵、垂条扶疏，落花飞洒、纷纭萧森，旖旎从风，浏利喟吸，大概像金石之声，管竽之音。参差不齐，回旋后宫，杂沓累聚，披山缘谷，顺坡下低，视之无端，究之无穷。

“于是黑色的雄猴、白色的雌猴、长尾猴、大猴、飞鼠、马蟥、蝉、蠓、蜉蝣猴、蜥胡猴、白狐子、螃蟹、栖息在其间；长啸哀鸣，翩翻相过，屈伸于枝柯，偃蹇于树梢。于是越断桥，腾异榛，敏捷地抓住悬垂的枝条，飞跃空间，寥落飞散，烂熳远迁。

“像此辈，有数千处，嬉戏游玩，往来其间，宫里宿，馆中歇，庖厨不迁，后宫不移，百官具备。

“于是乎过秋涉冬，天子比猎。乘坐雕金镂玉的象车，驾六只玉龙，拖着虹蜺为饰的旌，垂着云气为饰的旗，前边是皮车，后边是道车、游车；太仆孙叔牵缰，大将卫公陪乘，扈从横行，出于四大营垒之中。在天子仪仗队中击鼓，放纵打猎的人，以江河为捕猎禽兽的包围圈，以泰山为观猎的瞭望楼，车骑雷动，震天动地，先后分散，离散分追，队伍行进，缘丘陵，顺沼泽，如同云布雨施。

“生擒貔豹，搏击豺狼，手拿熊黑，足踢野羊，盖住虞鸟，绊住白虎，穿斑衣，跨野马。登上三重山之高险，

下至沙石之浅坻，经高赴险，越壑涉水。椎杀神禽，玩弄好直之兽解豸，格斗瑕蛤兽，铤刺猛氏兽，套取神马，射击大猪。箭不随便伤害，只射中颈和脑；弓不虚发，野兽应声而倒。于是乎乘车放下鞭子慢慢徘徊，游荡往来，斜看队伍之进退，阅览将帅之变态。然后逐渐加鞭，倏忽远去，离散小禽，踢踏狡兽，车轴触白鹿，迅捷捉蛟兔，车越闪电，遗下光耀，追赶怪物，出了宇宙，拉弯良弓，放满羽箭，射游动的猫头鹰，搏神兽，选择肥兽再发箭，要射中兽的致命之处，弓弦和箭矢分开了，射死的兽就倒下了。

“然后扬鞭而上，凌驾惊风，经历狂飙，乘着空虚，与神仙在一起，撵着黑鹤，扰乱了金鸡，迫近孔雀，赶上了锦鸡，拂着鸥鸟，掠到凤凰，截住鸳鸯，掩住焦明珍禽。

“道尽途完，回车而还。招摇而徜徉，降集于北极，顺着直指归路，忽然返回故乡。踏石关，历岗峦，过鸛鹄，望露寒，下棠梨，息宜春，西驰宣曲，洗船牛首，登上龙台，掩映细柳，观士大夫之勤略，分打猎者所获的猎物。空车所碾轧的，坐骑所蹂躏的，人民所践踏的，与其穷极倦怠，惊怕鸷伏，不被刀创而死的，纵横交错，填坑满谷，掩平地，盖大泽。

“于是乎游戏懈怠，置酒于天高之台上，设乐于深邃之屋宇；撞千石之大钟，立万石之钩钜，建翠华之旗帜，树灵兽之皮鼓。演出古帝陶唐氏的舞蹈，听古代葛天氏的歌声，千人唱，万人和，山陵为之震动，川谷为之激

荡。宋音蔡讴，《巴俞》之舞，淮南鼓乐，《于遮》之曲，辽歌滇歌，群举进奏，钟鼓迭起，铿锵叮咛，穿心骇耳。荆、吴、郑、卫等地民歌之声，《韶》、《濩》、《武》、《象》等上古之乐，淫逸委婉之音，鄢、郢两地的歌舞纷呈，《激楚》和《结风》，滑稽演员，俳优侏儒，狄鼻之伎，是用来娱乐耳目心意的，华丽柔媚，烂熳于前，细腻润泽，美色于后。

“像青琴、密妃等这些古代神女，超风绝俗，妖冶娴美，倩妆雕饰，轻丽绰约，柔弱艳婉，妩媚轻盈；拖着一茧丝织成的广袖，细瞅那长衣的精美像刻画的一般，踣跼婆娑，与世殊服；芬芳浸深，香气浓郁；皓齿灿烂，宜笑明显；长眉细弯，流盼视远；脉脉传情，两心相通。

“于是酒中乐酣之时，天子茫然而思，怅然若失。说：‘唉唷，这太奢侈了！我因览章听奏略有馀闲，无事度日，顺天之道而杀伐征讨，常常在此休息，恐怕后世奢华，竟一直下去而不回头，这决不是用来为继承创业的人树立传统啊！’于是就解散酒宴，停止游猎，而命令主管部门的负责人说：‘地可以开垦，全部为农田，以养百姓；毁墙填沟，使山泽之民能够到达。让渔猎之人充满山坡洼地而不要禁止，使宫殿台观空闲起来而不让人居住。打开仓库赈济贫穷，添补不足，抚恤无妇老夫、无夫老妇，使幼失父母的孤儿、独生子女存活下来。发布恩德的号令，减轻刑罚，改革制度，变易服色，更换一年第一天开始的时间，以计年月和时令，为天下的开头。’

“于是选择吉日，沐浴更衣，敬告神明，表示警戒。

穿上朝会的礼服，乘上礼制规定的标准车驾，建立翠羽装饰的华美旗帜，振响车驾上玉饰鸾铃，游览于《诗》、《书》、《礼》、《乐》、《易》、《春秋》等六经的书苑，纵横驰骋于仁义之途，观看《春秋》之林，以古《乐》中《驹虞》、《貍首》篇章所写为射礼，以系丝绳的箭射黑鹤，建立盾和斧之类的兵器，载云旗，捕捉《大雅》、《小雅》所写之人才，以《诗经》的《伐檀》所写为悲，以《乐胥》所写为乐，按《礼经》的规定修饰仪表，在《尚书》之中翱翔，讲述《易经》之道，放逐怪兽，登明堂，坐清庙以朝见诸侯，听任群臣禀报朝政得失，四海之内，无不受到恩惠。在这个时候，天下之人都非常喜悦了，向着风而听命令，随着流而受教化，很感叹地振兴古道而迁移近义，刑罚虚设而不再使用，德高于三皇，功盖过五帝。如果是这样，打猎才是可喜的。

“如果终日在外面驰骋，劳神苦形，疲惫了车马的功用，消耗了士卒的精力，浪费了国库的钱财，而对国家对百姓没有恩泽，必定在于一个人的快乐，不顾百姓之苦，忘掉国家大政，仅贪图一些野鸡小兔的猎获，那么，仁而爱民的帝王是不从的。由此看来，前边所说的齐国楚国游猎的事，岂不是可悲哀的吗？其地方圆不过千里，而苑林却占了九百，这是草木得不到开垦，而百姓无从得食啊！以诸侯之小，而取乐于帝王的浪费，我担心百姓遭到他的过失之苦。”

于是，子虚和乌有先生二人愀然变色，怅然若失，迟疑不决地避开座位说：“我们本来就很粗陋，不知道忌讳，今日

才受到教育，很慕敬地听到你的教训了。”

司马相如的赋写完后献上去，天子把他作为护从自己的郎官。无是公所说天子上林苑的广大，山谷水泉万物，及子虚所说楚国云梦的所有事物甚多，奢侈浪费言过其实，并且不是仁义道理所提倡的，所以删取其中重要的部分，把它纳入正道加以评论。

相如当了几年郎官，遇上唐蒙出使西南，谋划如何沟通夜郎、僰中，当时唐蒙调动巴蜀吏卒一千人，郡政府又为之调动水陆运输之人一万多，动用军队和刑法，诛杀他们的首领，巴蜀民众十分惊恐。汉武帝知道了这事，于是派遣司马相如前去谴责唐蒙。相如赶到巴蜀后，就写了一篇檄文，告诉巴蜀民众，说明唐蒙的所作所为，并不是皇上的本意。那檄文说：

告巴蜀太守得知：西南边族，擅自为政，天子不加征讨，日子已经很久了，他们时常侵犯边境，有劳这里的士大夫们。现在皇上新就帝位，抚慰天下，安定中国。然后兴师出兵，北征匈奴，匈奴王单于畏服，拱手受职，屈膝请和。康居、西域，辗转而至，请求朝见，叩头贡献。皇上又调兵东征，引起闽、越相互杀伐，皇上安抚了番禺的南越，南越感激，派太子入朝受封。南夷的君主，西僰的首长，常效贡职，不也怠惰，伸长脖颈，抬起脚跟，殷切盼望着，仿佛众口一起向上，争道归顺汉朝的大义，愿意称臣，但是因为道路遥远，山川阻深，不能自己达到。那不顺从的已经消灭，而做善事的却未得到赏赐，所以皇上派遣中郎将前往使之为宾从，调巴蜀

士民各五百人，用来奉持钱帛礼物，并护卫天子的使臣防患于未然，并没有兵革之事，战斗之患。现在听说他竟调兵动刑，惊惧年轻子弟，让年老的长者担忧，郡里又为他转运粮草，这些都不是皇上的本意。当差的人或逃亡或自杀，也不是作为人臣应有的气节。

再说，驻守在边区的人，听到燃起烽火的消息，都张弓搭箭而奔驰，扛起兵器而急跑，流汗淋淋，唯恐居后，碰上雪亮的刀刃，冒着乱飞的箭矢，义无反顾，计不犹豫，人怀怒心，如报私仇。他们难道喜欢死、厌恶生吗？难道不是编进国家户口簿上的人民吗？而和巴蜀不是同一个国君吗？他们是计深虑远，急国家之难，而乐于尽人臣的职责啊！所以有持兵符、握兵权的将帅之军功封赏，也有得半珪、朝天子的诸侯之政绩勋爵，官位为通侯，居列在甲第，最终遗留下显赫名号于后世，把封地传给子孙，办事很忠诚，在位就很安逸，名声延续无穷。功业著书而不磨灭。因此，贤人君子，肝脑涂中原之地，血肉润泽野草而不推辞啊！现在以奉送钱帛的差事到南夷之地，就自相残杀，或者逃亡以至于被杀，身死无名，如果给他一个死后谥名，那就是“至愚”，最最愚蠢的人，耻辱连累父母，为天下人所嘲笑。人的度量相距，岂不很远吗？然而，这不是当差人个人的罪过，也是父兄没有预先教育，青年们带领不谨慎；寡廉鲜耻，风俗不纯厚的缘故。他们遭到刑罚杀戮，不也是应该的吗？

皇帝忧虑使臣主管者就是那样，而悲伤不贤的愚民以至如此，所以派遣忠诚可靠的使臣明告百姓关于调拨

士卒的事，于是诉说他们因为不忠而死亡的罪行，责备掌管教化的乡官不教诲青少年们孝顺父母、友爱兄弟的过失。当前正当农忙之时，很难麻烦百姓，把他们召集起来，使臣已亲自到近县巡视，但恐怕远处住在溪谷山泽的人民不能普遍听到，所以写了这篇檄文，檄文送到，要赶快下达少数民族居住的县道，使他们都知道皇上的本意，千万不要疏忽。

司马相如还朝作了报告。这时唐蒙已经打通了夜郎，又通西南夷之道，调动巴、蜀、广汉等地的士卒，施工的人数万人。开辟修治二年，道路没修成，士卒有许多死亡，耗费要以万来计算。蜀、汉两地管事的人，都说这样干不适宜。这时邛、笮两地的君长，听到南夷和汉朝沟通，得赏颇多，大多愿意向汉朝称臣，请求赐给官职服事，就像南夷的样子。天子汉武帝问相如，相如说：“邛、笮冉、牂等地接近蜀郡，道路也容易沟通，秦始皇时曾经通为郡县之治，到汉兴才停止。今天应该恢复通道，设置郡县，越过南夷。”汉武帝以为然，就拜相如为中郎将，持节出使。副使王然于、壶充国、吕越人赶着四辆马车，到了驿站馆舍，以巴蜀吏的钱物贿赂西夷。蜀郡太守以下的所有官吏到郊外迎接，县令背着弓箭在前小跑，蜀郡人以为是得宠。于是卓王孙、临邛县诸公，都由门下给相如献牛酒相交欢愉。卓王孙喟然而叹，自以为能使女儿嫁给相如太晚了，因而将家里钱财又加多分给女儿，和男儿等同。司马相如便谋划安定了西夷、邛、笮冉、牂、斯榆等地的君长，都请求作为汉朝臣子。除去了边关，而关内之地愈益扩大，西至沫水、若水，南至沔柯为边塞，打通零关

道，架孙水桥，以通邛都。还报汉武帝，汉武帝大悦。

司马相如出使时，蜀郡有德望的老年人大都说通西南夷没有什么用处，即使朝中大臣也以为如此。相如要劝阻，但皇帝业已命相如办理此事，所以不敢再说什么，于是写成文章，凭借蜀父老为托辞，而自己去诘难他，用来暗示汉武帝，并且借宣其使旨，令百姓知皇上之意。他写的难蜀中父老一文是这样说的：

汉朝建国以来已有七十八年，六代皇帝功德深厚，威武纵横，恩泽广大，众生受惠，洋溢于海外。因此才命令使臣西征，顺势而取，王化所盖，无不仆倒。于是，冉、駉两族相从而朝，平定笮地，保存邛邦，收取斯榆，攻克苞满，到此停止前进，车马回还，东向将报，到了成都。

年老大夫、绅士先生，有二十七人，很郑重其事地到我处探访。客套话说完，就进一步说：“大概听说皇上对于那些边族，意思仅仅是牵制他们，不和他们断绝关系而已。令疲惫三郡的吏民，打通夜郎的道路，三年在此，而功不成。士卒劳倦，万民不能自给，现在又接着去通西夷，百姓力尽，恐怕不能完工，这也是朝廷使臣的累赘，我们心下为阁下担心。再说，邛、笮、西僰与中国并存，历年很长久了，不可记忆。仁爱的人不用仁德来招，强霸的人不以武力来并，我们如此想难道不可以吗？今分割平民以附边族，破坏所依靠的而做无用的事，我们粗陋，弄不明白其中道理。”

使臣说：“怎么这样说呢？如果像你们所说的，那么，

这蜀郡之民不要改变服色，巴郡之民不改变风俗了吗？我不愿听你们的主张。然而这事体很大，本来不是出使视察的人所能构成的。我行程紧急，不可能让你们尽闻其详，请让我为大夫们粗陈大略。

“大概世上必有不寻常之人，然后有不寻常之事；有不寻常之事，然后才有不寻常之功。所谓不寻常，本来就是与一般人不同的。所以说不寻常的人和事，当一开始，普通百姓们就很怕；待到他成功了，天下就安然太平了。

“古时候洪水冒出来，泛滥四溢，人民升降迁徙，道路崎岖，颠沛不安。夏后氏很怜悯他们，于是就堵塞洪水，疏导江河，漉沉赡燹，东归大海，天下永安。当这种勤劳之时，难道只有人民进行吗？夏禹也亲身劳动啊！心里多于谋虑而身体力行，身上磨出了老茧，黑黑的没有白肉，皮肤上磨得也不生细汗毛。所以伟美的功业永远显扬，名声称赞于现世。

“再说，贤明的君主登上帝位，岂可仅仅细碎局促，拘泥于条文，牵制于旧俗，因循诗诵，沿习书传，取悦于当世吗？必定是高论宏议，开创大业，垂范后世，成为万代的传统。所以急于追求的是兼容并包，常想的是皇帝如何参与天地之间。而且，《诗经》里不是说过吗？即：‘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循着内地到海滨，无不是皇帝的臣民。’因此，天地四方之内，八方之外，渐渐洋溢，凡有生命的东西，有不被恩泽浸润的，贤明君主以之为耻辱。现在封疆领地之内，冠带作官之人，都受到嘉奖

幸福，没有缺漏的。而外族异俗的帮国、遥远旷绝的地区，舟车不通，人迹罕到，政治教化尚未实施，中国的流俗风尚尚且微弱。国内的人在边境上常常有不讲礼仪而侵犯人家的行为，外族的人横行霸道，也有放逐杀害自己首领的事件。君臣颠倒，尊卑失序，父兄无罪，幼孤为奴，捆绑哭号，内部自怨，说：‘听说中原有最仁爱的人，仁德洋溢，恩泽普及，事物没有不得其所的，今日为什么独独把我等自己漏下呢？’抬起脚跟来盼望，思念羡慕，好像大旱枯禾之盼望下雨一样。粗暴的莽汉也为他们垂泪，何况是圣上皇帝，又怎么能罢休？所以向北出兵征讨强胡，向南遣使责问劲越。四面传开皇帝的恩德，西夷、南夷二方的君主，鳞次群集，仰慕潮流，愿意接受捆绑哭号者以亿万计算。所以就以沫水、若水为关，以沔柯为边塞，疏通零山，以孙原为桥梁。开创道德之途，树立仁义的传统。将大恩广施，远远地安抚，长长地驾馭，使疏远者不闭塞，使阻隔深远，黑暗暧昧的地区，得到光明的照耀，以便在此偃息战争，在彼停止诛伐。远近一体，中外安福，不是很快乐的吗？那么，拯救人民于沉溺，奉持天子之美德，反衰世之没落，继周朝之绝业，这就是皇上的当务之急。百姓即使很劳苦，又怎么可以停下来呢？

“况且，帝王之事本来就没有不始于忧勤，而终于安乐的。既然如此，那么接受皇帝使命，就应该在这个时候。将来还要增加泰山的封号，梁父山的服事，震响车驾上的鸾铃，称扬礼乐颂歌，使汉朝上合于五帝之中，下

升于三王之上。看的人未看清意旨，听的人未听到真音，犹如神鸟鷩明翱翔于寥廓的天空，而用网捉鸟的人还在草泽里细瞅哩。可悲啊！

于是诸位大夫绅士们，茫然失去原来怀中的主意，也忘了他们是来向司马相如进言的，只是一面慨叹，一面称赞地说：“诚然啊，大汉的仁德，这是我们这些粗人愿意听到的啊！百姓虽然懈怠，请让我们亲自带头吧！”他们怅惘失意，而且失态，歪歪斜斜，拖拖沓沓地辞别退出去了。

此后有人向朝廷上书，说司马相如为使臣时接受过人家的赠金，因而失去中郎将的官职。过了一年多，又被汉武帝召为郎官。

司马相如说话结巴，但善于著书。他常有糖尿病。和卓文君结婚后，富有财产。他作了官后，未尝肯参与公卿国家的事，借口生病在家闲居，不羡慕官爵。他经常跟从汉武帝到秦时的长扬宫苑去打猎，这时皇帝正爱好自己搏击熊和野猪，追赶野兽，相如上书劝阻。其辞说：

臣听说过，事物有同类的而不同能力的，所以力大的人称赞大力士马获，敏捷的人言说快手庆忌，勇猛的人就希望成为勇士孟贲、夏育。臣很愚笨，自以为人真有这样的，而兽也应该如此。现在皇上喜好越险阻，射猛兽，突然遇上才能超众的兽，惊骇不存之地，触犯副车之尘，輿辇来不及回辕，人们来不及发箭，虽然有乌获、逢蒙的本事，但力不能够用，这时连枯木朽株也都会为之所害了。这就像胡、越之人从车轴下突起，羌、夷之人从车箱底伸手相接，岂不危险吗？即使万全无患，然

而本来就不是皇上适宜靠近的。

再说，即使清除了街道而后行走，选中了大路而后奔驰，尚且时时有车马倾覆的突变，何况涉及蓬蒿乱草之野，驰骋于丘坟坎坷之地，前有奖励猎兽之乐，而内无提防突变之心，它成为灾祸也就不难了！那么，皇上轻视天子万乘之重，不以为平安，而在万一有危险的途中以为娱乐，臣以为皇上这样做是不可取的。

大概聪明的人，他的远见在于事情尚未萌发之前，智慧的人避免危险，在于还没成形的时候，灾祸本来大多藏在隐蔽微小之处，而暴露在人们所忽视的地方。所以俗语说：“家里积累千金，不在堂前屋檐下落坐。”这话虽小，可以比喻大事。臣愿皇上留意，予以明察。

汉武帝认为这个谏书很好。从长扬宫苑还朝，经过宜春宫，相如又向汉武帝献赋，是哀伤秦二世行为过失的。这篇赋写道：

攀登倾斜坠落的长坡啊，并入嵯峨的层层宫殿。滨临曲江崎岖岸头啊，辽望参差不齐的南山。险峻的深山多么空旷啊，贯遍的山谷豁然深陷。急流哗哗长去啊，注入沼泽四溢。看那众树何其茂盛啊，再览竹林之丛丛。向东驰过土山哩，向北涉过石濑。放下鞭子优游哩，依次凭吊秦二世。立身不谨慎，亡国失权势。相信坏话不觉悟，祖宗祀庙都灭绝。呜呼哀哉！操守行为都不好，坟墓芜秽也不修，灵魂无处可归，不能享受供品。邈远旷绝魂魄不齐全，年代越久远就越看不清。精神无门面到处飞扬，涉历九天而永远消失。呜呼哀哉！

司马相如被正式任命为看管汉文帝陵园的长官——孝文

园令。汉武帝已经叹赏《子虚赋》所写的事，相如见皇上喜好神仙之道，于是说：“《上林赋》所写的事不足以叹赏，还有更奢靡的。臣我曾写过《大人赋》，未成，请让我写好后献上来。”司马相如认为列仙相传住在山泽之间，形体容颜都很清瘦，这不是皇上所需要的神仙之意，于是就另加构思，写成了《大人赋》。这篇赋是这样说的：

世上有地位高贵的人，住在中州。宅院覆盖万里，曾不足以少许保留。悲叹世俗的迫促，轻装离去而远游。垂着绛幡的白色虹霓，载着云气而上浮。立起格泽星的长竿作为旗竿，在竿端头聚系着光芒作为彩色的旄牛尾。又垂下旬始星光作为旗下的旒苏，缀着慧星光为燕尾之饰。摆动柔弱之姿以为天娇，又轻柔以招摇。揽欃枪之星作为旌旗，披倒断虹作为旗竿的藏韬。红渺渺而昏冥，旋风涌而云浮。驾神龙象车的举止曲折逶迤，陪乘的赤螭青虬行走摇摆婉蜒。低昂天娇，倨傲纵恣，曲折凸陷，扭动连卷。昂着摇动，伸颈低昂，抬头愣怔痴呆，放任自流，仰首急驰，遇到高山峻岩。忽进忽退，摇目吐舌，只得绕行，缠缠绕绕，磕磕绊绊，如梁架相撑。纷绕缭乱，奔突叫嚣，终于踏上了正路，飞扬而起，踊跃而走，奔腾而狂进。疾飞呼吸，流火如闪电而过，焕然雾除，豁然云消。

斜跨东极而登上北极，与神仙真人相访求。曲折深远向右转，横渡飞泉向正东。把仙人灵圉全部征召来入选，在北斗勺头第一星瑶光之前部署众神。使上古五帝为队伍的前导，叫天极星之一太乙跟从仙人陵阳子。左

边是雨神玄冥，右边是造化之神含雷，前是陆离神，后是滂滂神。命仙人征伯侨、羡门高来服役，让黄帝太医岐伯主持方药。炎帝的佐臣祝融，震惊得一脚独立而驾车，清氛气而后才进行。屯集了车子有万辆，错杂五彩云为伞盖，并立起华丽的旌旗。使青帝的佐臣句芒带头引路，我要往南游玩。

经唐尧于崇山，过虞舜于九疑山。乱纷纷而并错，杂沓沓以驱驰。骚扰冲撞相烦乱，磅礴轧洒以淋漓。罗列聚丛成茂密，漫流四溢成分散。经入雷室，雷声轰隆隆响，洞出鬼谷，谷岩坎坷坎坷碰。遍览维系上天的八条绳子，再看看东西南北四荒，分渡九江，又越五河。周旋于炎火而浮弱水，航绝浮渚而涉流沙。在总极之地休息，漂浮在水上嬉戏，使灵娲弹瑟，使河伯冯夷跳舞。时光阴暗将要混浊，把天神使者召来，诛杀主管刮风的风伯，处罚承担洒雨的雨师。西望昆仑山模糊而恍惚，陞直驰向三危山。推开天门闾阖而进入上帝之宫，载着天宫玉女和她们同归。舒展闾阖之风闾风而摇曳，亢然高飞如神鸟升腾再止。低回于阴山纡曲地翱翔，我今日才目睹西王母皤然白发。载着妇人首饰玉胜而住在洞穴，幸而有三只脚的乌鸦为她作信使。必定长生如此而不死，虽过万世亦不足以可喜。

回车去来啊，在不周山道走尽，到北极的幽都去会聚。呼吸夜露餐朝霞，咀嚼灵芝尝琼花。渐渐仰起而向高处飞纵，纷然如洪涌而向上疾飞。贯穿闪电之下的太阳，涉过布云的云师所带的滂沱雨气。驾驶着游车、道

车而长长滑降，在馀雾里乱驰并向远方而去。迫于区中之狭隘，放缓鞭节出了北边。留下众骑于此极玄阙之山，使前驱超越了上天的北门寒门。下边深邃险恶而无地，上边寥廓空旷而无天。看得眼花眩晕而无所见，听得迷离惆怅而无所闻。乘着空虚而向上，超过无人而独存。

司马相如献上《大人之颂》，天子汉武帝大悦，飘飘然有凌云之气，好像有漫游天地之间的感觉。

司马相如因病免职，家居茂陵。汉武帝说：“司马相如病得很厉害，可前去把他写的书全部拿来；不然，以后会失掉的。”派大夫所忠前往，而司马相如已死，家里无书。问他的妻卓文君，回答说：“长卿本来就没有书。时时著书，人又取去，就空了。长卿未死时，写了一卷书，说，如有使者来求书，就把它献出来。没有别的书。”他遗留下的木简之书，说的是封禅事，即天子祭祀天地的典礼之事。书献给了大夫所忠。所忠又将此书献上，汉武帝十分惊异。司马相如所写的封禅书这样说：

上古开始，自天穹生民，历选列君，以至于秦。循省近世之遗迹，听察远古之风声。乱没萎顿，堙灭而不著称的，不可胜数。能继续昭、夏，名号高的，略可说的有七十二个国君。无顺善而不昌盛，谁逆失而能存在？

轩辕之前，邈远啊，旷绝啊，其中的详细情况不可得而闻。五帝、三王之事，《六经》上刊载之传，只见可观的。《尚书》说：“元首圣明啊，大臣贤良啊！”凭此而谈，国君没有比唐尧更昌盛的，大臣没有比后稷更贤良的。后稷创业于陶唐，公刘发迹于西戎，文王改制，至

周至盛，崇高的德行形成，而后下落衰微，千载无恶声，岂不善始善终啊。然而没有异端，这是因为在开始之前就很小心，在遗教之后又很谨慎。所以道路平易，容易遵循；恩泽广大，容易富足；法度著明，容易遵守；传统理顺，容易继承。因此，帝王之业兴隆于襁褓之时的周成王，崇高冠盖于周文王、周武王两个后继者。论其元始，终于长久，其特别突出卓绝的事迹，于今日未有可考的。然而尚可踏上梁父山，登上泰山，建立显赫的称号，广布尊贵的名声。大汉朝的功德，如喷涌的源泉，呼呼漫流，磅礴四海，云布雾散，上达九重之天，下流八极之地。有生命的东西，受到恩泽的霑濡浸润，协和之气横流，武功之节飘逝，近狭之处游其源，广远之边浮其沫，首恶湮没了，暧昧昭晰了，众虫和乐，回头向内。然后将珍异的兽类骆虞圈入园囿，巡察四方的怪兽麋鹿，选择一茎六穗的嘉禾之米送进庖厨，将双角一体的异兽作成祭祀的牺牲供品。获周鼎之珍，收神龟岐水，于大泽招来黄帝骑过的龙马。鬼神迎接仙人灵圉，把他当作贵宾住在安闲的馆舍。奇物诡譎，俶傥穷变。钦敬啊！吉祥的气象都来到此地，还以为自己很轻微，不敢说皇帝封泰山、禅梁父的事。大概周武王渡河，跳鱼儿落在航船上，俯身而取，以火燎之，多么微小的东西啊，竟把它当作吉祥物，用它以登大山封禅，不是很惭愧吗？周朝未可封禅而封禅，是那样的进取，汉朝可封禅而不封禅，是这样的谦让，而进让之道，是何等的差失啊。

于是大司马建议说：“皇上以仁爱抚育众生命，义征

不顺，诸侯乐于朝贡，各个边族执礼，仁德可与以往相媲美，功业和从前并无两样，贤明伟烈，遍及太平盛世，吉祥气象和事物多变，不断出现，相期而应，相连而至，不只一物，轻易显露。料想泰山、梁父山已设坛场盼望皇上临幸，大概是立号以警荣，上帝降恩储福，将以荐祭而成，皇上只是谦让不发。缺了上帝、泰山、梁父三神的欢乐，少了王道应有的礼仪，群臣惭愧哪！有的说天道质朴暧昧，以吉祥气象和事物向人间示意，皇上应该珍视，本来就不该辞让的；如果像这样辞让，那么泰山之上就不会有什么表记，梁父山的坛场无所相近了。而且以德各君或者并世而荣耀，都有济世之功却自委屈，不想封禅，那还有什么可以称道于后世，却又说七十二君呢？修养功德才被上天赐给吉祥事物，奉持着这吉祥事物而行事，不会冒进越礼。所以圣明的帝王不衰，用大礼祭祀地神，很真诚地拜告天神，在中岳铭刻功业，以彰明天子至尊，舒展盛德，发扬名号荣耀，施行厚福，以恩泽浸润黎民。此事辉煌啊！天下的壮观，做皇帝的大业，不可贬哪！愿皇上成全它。而后杂以官绅先生的略术，记功著业，使其获得日月光芒的照耀，以展才华，措置事业，犹兼正列其义，校正其文，作《春秋》记史为一经，沿袭旧的“六艺”，成为“七艺”，张扬于后代无穷无尽，使万世得以激起清流，扬起微波，飞起美声，腾茂实。前代的圣明帝王之所以永保大名而常称首，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应该命令属于太史之下的掌故之官，全部奏明其义，请皇帝阅览。

于是天子盛情洋溢，激动得改变了脸色，说：“太愉快啦，我就试试吧！”于是反复思虑，将公卿的建议汇总起来，询问封禅之事，歌颂大泽的博大，广播吉祥物的富饶。因而作颂说：

自从上天覆盖大地以来，天上的云分布起来就像水中的油那样浸润扩散。甜美的露水，及时的雨下来了，大地可以逍遥。滋润渗透，什么生物不能发育；美谷六穗，我们收获的粮食哪里存放啊！

不但雨淋它，又要滋润它；不但濡湿它，还要普及广布它。世界万物兴旺茂盛，感恩怀念。名山显示出封禅之位，盼望国君的到来。国君啊，国君啊，为什么还不进行封禅呢？

文彩斑斓的珍兽，乐于我君把它围在园林里；白底黑花，仪态可喜；和和睦睦，钦敬肃穆，是君子的风度。大概先闻其声，今观其来。其途无踪，天降吉祥。此事也曾在舜时有过，那时所谓百兽率舞就是天瑞征象。

欢跳的麒麟，在古代五帝祭祀天地的地方游嬉。初冬十月，国君主持效外祭祀。行驶国君的轿车，给上帝以享福礼。夏、商、周三代之前，不曾有过这样的盛典。

蜿蜒屈伸的黄龙，兴起美德而升腾；彩色炫耀，灿烂辉煌。面对正南显现出来，使黎民百姓觉悟。书传所载，说的就是汉朝受天命所乘时运。

这是有现象的，不必谆谆教导。凭靠现象寄托天意，就是说明封禅之事。

披文观看，天人之际业已交通，上下之间相互应答。

圣明帝王的恩德，恭敬谨慎，小心翼翼。所以说“兴盛时必须考虑到衰微，安定时必须想到危险”。因此，成汤、周武王极其尊严，不失肃敬；舜在执政大典之时，还相到他死后的事，就是说的这个意思。

司马相如死后五年，汉武帝才祭祀后土之神。八年，于是先后到中岳、泰山、梁父山等处祭祀。

相如其他著作，如《遗平陵侯书》、《与五公子相难》、《草木书》等没有采用，采用的是在公卿中特别显著的作品。

（陈俊山 译）

【原文】

司马相如者，蜀郡成都人也，字长卿。少时好读书，学击剑，故其亲名之曰犬子。相如既学，慕蔭相如之为人，更名相如。以赀为郎，事孝景帝，为武骑常侍，非其好也。会景帝不好辞赋，是时梁孝王来朝，从游说之士齐人邹阳、淮阴枚乘、吴庄忌夫子之徒，相如见而说之，因病免，客游梁。梁孝王令与诸生同舍，相如得与诸生游士居数岁，乃著《子虚之赋》。

会梁孝王卒，相如归，而家贫，无以自业。素与临邛令王吉相善，吉曰：“长卿久宦游不遂，而来过我。”于是相如往，舍都亭。临邛令缪为恭敬，日往朝相如。直如初尚见之，后称病，使从者谢吉，吉愈益谨肃。临邛中多富人，而卓王孙家僮八百人，程郑亦数百人。二人乃相谓曰：“令有贵客，为具召之。”并召令。令既至，卓氏客以百数。至日中，谒司马长卿，长卿谢病不能往，临邛令不敢尝食，自往迎相如。相如不得已，强往，一坐尽倾。酒酣，临邛令前奏琴曰：“窃闻

长卿好之，愿以自娱。”相如辞谢，为鼓一再行。是时卓王孙有女文君新寡，好音，故相如缪与令相重，而以琴心挑之。相如之临邛，从车骑，雍容闲雅甚都；及饮卓氏，弄琴，文君窃从户窥之，心悦而好之，恐不得当也。既罢，相如乃使人重赐文君侍者通殷勤。文君夜亡奔相如，相如乃与驰归成都。家居徒四壁立。卓王孙大怒曰：“女至不材，我不忍杀，不分一钱也。”人或谓王孙，王孙终不听。文君久之不乐，曰：“长卿第俱如临邛，从昆弟假贷犹足为生，何至自苦如此！”相如与俱之临邛，尽卖其车骑，买一酒舍酤酒，而令文君当炉。相如身自著犊鼻褌，与保庸杂作，涤器于市中。卓王孙闻而耻之，为杜门不出。昆弟诸公更谓王孙曰：“有一男两女，所不足者非财也。今文君已失身于司马长卿，长卿故倦游，虽贫，其人材足依也，且又令客，独奈何相辱如此！”卓王孙不得已，分予文君僮百人，钱百万，及其嫁时衣被财物。文君乃与相如归成都，买田宅，为富人。

居久之，蜀人杨得意为狗监，侍上。上读《子虚赋》而善之，曰：“朕独不得与此人同时哉！”得意曰：“臣邑人司马相如自言为此赋。”上惊，乃召问相如。相如曰：“有是。然此乃诸侯之事，未足观也。请为天子游猎赋，赋成奏之。”上许，令尚书给笔札。相如以“子虚”，虚言也，为楚称；“乌有先生”者，乌有此事也，为齐难；“无是公”者，无事人也，明天子之义。故空藉此三人为辞，以推天子诸侯之苑囿。其卒章归之于节俭，因以风谏。奏之天子，天子大说。其辞曰：

楚使子虚使於齐，齐王悉发境内之士，备车骑之众，与使者出田。田罢，子虚过诧乌有先生，而无是公在焉。

坐定，乌有先生问曰：“今日田乐乎？”子虚曰：“乐。”“获多乎？”曰：“少。”“然则何乐？”曰：“仆乐齐王之欲夸仆以车骑之众，而仆对以云梦之事也。”曰：“可得闻乎？”

子虚曰：“可。王驾车千乘，选徒万骑，田於海滨。列卒满泽，罟罔弥山，揜兔獐鹿，射麋脚麟。骛於盐浦，割鲜染轮。射中获多，矜而自功。顾谓仆曰：‘楚亦有平原广泽游猎之地饶乐若此者乎？楚王之猎何与寡人？’仆下车对曰：‘臣楚国之鄙人也，幸得宿卫十有余年，时从出游，游于后园，览于有无，然犹未能遍睹也，又恶足以言其外泽者乎！’齐王曰：‘虽然，略以子之所闻见而言之。’

“仆对曰：‘唯唯。臣闻楚有七泽，尝见其一，未睹其余也。臣之所见，盖特其小小者耳，名曰云梦。云梦者，方九百里，其中有山焉。其山则盘纡峩郁，隆崇葍萃，岑岩参差，日月蔽亏；交错纠纷，上干青云；罢池陂陀，下属江河。其土则丹青赭垩，雌黄白垩，锡碧金银，众色炫耀，照烂龙鳞。其石则赤玉玫瑰，琳琅琕瑀，璚玞玄厉，瑱石武夫。其东则有蕙圃衡兰，芷若射干，穹穷昌蒲，江离麋芜，诸蔗獐且。其南则有平原广泽，升降陬靡，案衍坛曼，缘以大江，限以巫山。其高燥则生蘼苞荔，薛莎青蘋。其卑湿则生藏蓂兼葭，东蔷雕胡，莲藕菰芦，菴蒿轩芋，众物居之，不可胜图。其西则有涌泉清池，激水推移；外发芙蓉菱华，内隐钜石白沙。其中则有神龟蛟鼉，瑇瑁鼈鼉。其北则有阴林巨树，檉枿

豫章，桂椒木兰，蘼离朱杨，橐櫨栲栗，橘柚芬芳。其上则有赤猿蠪蛸，轹雏孔鸾，胜远射干。其下则有白虎玄豹，蜿蜒麋豸，兕象野犀，穷奇獫狁。

“‘于是乃使专诸之伦，手格此兽。楚王乃驾驯驳之驷，乘雕玉之舆，摩鱼须之桡旃，曳明月之珠旗，建干将之雄戟，左乌噪之雕弓，右夏服之劲箭；阳子骖乘，纤阿为御；案节未舒，即陵狡兽，踣邛邛，蹙距虚，軼野马而轹驹騄，乘遗风而射游騊；儵眇淩淩，雷动慄至，星流霆击，弓不虚发，中必决眇，洞胸达腋，绝乎心系，获若雨兽，揜草蔽地。于是楚王乃弭节裴回，翱翔客与，览乎阴林，观壮士之暴怒，与猛兽之恐惧，徼飬受诎，殫睹众物之变态。

“‘于是郑女曼姬，被阿锡，揄纁缟，杂纤罗，垂雾谷；襞积褰绌，纤徐委曲，郁桡溪谷；粉粉裊裊，扬袍卬削，蜚纤垂髻；扶与猗靡，噏呷萃蔡，下摩兰蕙，上拂羽盖，错翡翠之威蕤，缪绕玉绥；缥乎忽忽，若神仙之仿佛。

“‘于是乃相与獠於蕙圃，罳珊勃徇，上金堤，揜翡翠，射鵀鹳，微矰出，纤缴施，弋白鹄，连驾鹄，双鹄下，玄鹤加。怠而后发，游于清池；浮文鹢，扬桂枻，张翠帷，建羽盖，罔璚瑁，钓紫贝；攄金鼓，吹鸣籥，榜人歌，声流喝，水虫骇，波鸿沸，涌泉起，奔扬会，礚石相击，硠硠礚礚，若雷霆之声，闻乎数百里之外。

“‘将息獠者，击灵鼓，起烽燧，车案行，骑就队，繚乎淫淫，班乎裔裔。于是楚王乃登阳云之台，泊乎无

为，澹乎自持，勺药之和具而后御之。不若大王终日驰骋而不下舆，脔割轮淬，自以为娱。世窃观之，齐殆不如。’于是王默然无以应仆也。”

乌有先生曰：“是何言之过也！足下不远千里，来况齐国，王悉发境内之士，而备车骑之众，以出田，乃欲勩力致获，以娱左右也，何名为夸哉！问楚地之有无者，愿闻大国之风烈，先生之余论也。今足下不称楚王之德厚，而盛推云梦以为高，奢言淫乐而显侈靡，窃为足下不取也。必若所言，固非楚国之美也。有而言之，是章君之恶；无而言之，是害足下之信。章君之恶而伤私义，二者无一可，而先生行之，必且轻于齐而累于楚矣。且齐东踰巨海，南有琅邪，观乎成山，射乎之罟，浮勃澥，游孟诸，邪与肃慎为邻，右以汤谷为界，秋田乎青丘，傍徨乎海外，吞若云梦者八九，其于胸中曾不蒂芥。若乃俶傥瑰伟，异方殊类，珍怪鸟兽，万端鳞萃，充仞其中者，不可胜记，禹不能名，契不能计。然后诸侯之位，不敢言游戏之乐，苑囿之大；先生又见客，是以王辞而不复，何为无用应哉！”

无是公听然而笑曰：“楚则失矣，齐亦未为得也。夫使诸侯纳贡者，非为财币，所以述职也；封疆画界者，非为守御，所以禁淫也。今齐列为东藩，而外私肃慎，捐国逾限，越海而田，其于义故未可也。且二君之论，不务明君臣之义而正诸侯之礼，徒事争游猎之乐，苑囿之大，欲以奢侈相胜，荒淫相越，此不可以扬名发誉，而适足以貶君自损也。且夫齐楚之事又焉足道邪！君未睹

夫巨丽也，独不闻天子之上林乎？

“左苍梧，右西极，丹水更其南，紫渊径其北；终始霸浚，出入泾渭；邦鄙潦漓，纡余委蛇，经营乎其内。荡荡兮八川分流，相背而异态。东西南北，驰骛往来，出乎椒丘之阙，行乎洲淤之浦，径乎桂林之中，过乎泱莽之野。汨乎浑流，顺阿而下，赴隘陕之口。触穹石，激堆埼，沸乎暴怒，汹涌滂溃，洇洇湍汨，湍测泌洳，横流逆折，转腾激洌，澎湃沆漑，穹隆云挠，蜿瀾胶戾，逾波趋浥，莅莅下瀨，批郤冲壅，奔扬滞沛，临坻注壑，瀼瀼贯坠，湛湛隐隐，砰磅訇磕，潏潏淈淈，潏潏鼎沸，驰波跳沫，汨湏漂疾，悠远长怀，寂寥无声，肆乎永归。然后灏漾潢漾，安翔徐徊，翫乎，漓漓东注大湖，衍溢陂池。于是乎蛟龙赤螭，魍魎蜥离，蝮螭鰐魈，捷鳍擢尾，振鳞奋翼，潜处于深岩；鱼鳖灌声，万物众夥，明月珠子，玃珠江靡，蜀石黄璆，水玉磊砢，磷磷烂烂，采色滢盦，丛积乎其中。鸿鹄鹳鸕，鵙鵙鸚鵒蛟蜻鰷目，烦骛鹳鵙，鵙鵙鸚鵒，群浮乎其上。汎淫泛滥，随风澹淡，与波摇荡，掩薄草渚，唼喋菁藻，咀嚼菱藕。

“于是乎崇山峩峩，崔巍嵯峨，深林钜木，崭岩参嵯，九峩、截薛，南山峨峨，岩陲，崛崎，振溪通谷，蹇产沟渎，谿呀豁阬，自陵别岛，崑崙崑崙，丘虚崛崑，隐辚郁岨，登降施靡，陂池獐豸，沅溶淫鬻，散涣夷陆，亭皋千里，靡不被筑，掩以绿蕙，被以江离，糝以蘼芜，杂以流夷。专结缕，欝戾莎，揭车衡兰，橐本射干，茝姜蘘荷，葳橙若荔，鲜枝黄砾，蒋茅青蘋，布濩閼泽，延

曼太原，丽靡广衍，应风披靡，吐芳扬烈，郁郁斐斐，众香发越，肸蚩布写，晻晻苾勃。

“于是乎周览泛观，睊盼轧沔，芒芒恍忽视之无端，察之无崖。目出东沼，入于西陂。戎南则隆冬生长，踊水跃波；兽则獮施獫，沈牛麇麇，赤首圆题。穷奇象犀。其北则盛夏含冻裂地，涉冰揭河；兽则麒麟角规，駉橐駝驰，蛩蛩骅骝，驶骀驴騊。

“于是乎离宫别馆，弥山跨谷、高廊四注，重坐曲阁，华棖璧瑯，辇道繚属，步搆周流，长途中宿。夷峩筑堂，累台增成，岩突洞房，俯杳眇百无见，仰攀橑而扞天，奔星更於闺闼，宛虹拖於楯轩。青虬螭蟠於东箱，象舆婉蟠於西清，灵囿燕於间观，之伦暴於南荣，醴泉涌於清室，通川过乎中庭。槃石振崖，嵌岩倚倾，嵯峨磈磈，刻削峥嵘，玫瑰碧琳，珊瑚丛生，珉玉帝唐，瑱端文鳞，赤瑕驳荦，杂沓其间，垂绥琬琰，和氏出焉。

“于是乎卢桔夏熟，黄甘橙棖，枇杷燃柿，棃奈厚朴，栲枣杨梅，櫻桃蒲陶，隐夫郁棣，檟杓荔枝，罗乎后宫，列乎北园。飴丘陵，下平原，扬翠叶，机紫茎，发红华，秀朱荣，煌煌扈扈，照曜钜野。沙棠栌楮，华汜檉栌，留落胥余，仁频并闾，欂檀木兰，豫章女贞，长千仞，大连抱，夸条直畅，实叶葳茂，攒立丛倚，连卷累嵬，崔错发骖，阬衡闾阬，垂条扶主，落英幡飏，纷容萧瑟，旖旎从风，浏莅卉吸，盖象金石之声，管籥之音。柴池茈廞，旋环后宫，杂还累辑，被山缘谷，循阪下隍，视之无端，究之无穷。

“于是玄猿素雌，雌獾飞鹞，蛭蝟曜蜩，蜥胡黠蛭，栖息乎其间；长啸哀鸣，翩幡互经，夭矫枝格，偃蹇杪颠。于是乎踰绝梁，腾殊榛，捷垂条，踔稀间，牢落陆离，烂曼远迁。

“若此辈者，数千百处。嬉游往来，宫宿馆舍，庖厨不徙，后宫不移，百官备具。

“于是乎背秋涉冬，天子校猎。乘镂象，六玉虬，拖蜺旌，靡云旗，前皮轩，后道游；孙叔奉鬻，卫公骖乘，扈从横行，出乎四校之中。鼓严簿，纵獠者，江河为陆，泰山为橹，车骑雷起，隐天动地，先后陆离，离散别追，淫淫裔裔，缘陵流泽，云布雨施。

“生貔豹，搏豺狼，手熊羆，足野羊，蒙鹖苏，绔白虎，被豳文，跨野马。陵三峩之危，下磧历之坻；徑陵赴险，越壑厉水。推蜚廉，弄解豸，格瑕蚺，铤猛氏，胥骀衰，射封豕。箭不苟害，解脰陷脑；弓不虚发，应声而倒。于是乎乘輿弥节裴回，翱翔往来，部曲之进退，览将率之变态。然后浸潭促节，倏琤无去，流高轻禽，蹴履狡兽，轶白鹿，捷狡兔，轶赤电，遗光耀，追怪物，出宇宙，弯繁弱，满白羽，射游臬，栝蜚虻，择肉后发，先中命处，弦矢分，艺殪仆。

“然后扬节而上浮，陵惊风，历骇飈，乘虚无，与神俱，骖玄鹤，乱昆鸡，遒孔鸾，促骏鸫，拂鹭鸟，捎凤凰，捷驾雏，掩焦明。

“道尽途殚，迴车而还。招摇乎襄羊，降集乎北紘，率乎直指，阊乎仅乡。麾石（关），历封峦，过雉鹄，望

露寒，下棠梨，息宜春，西驰宣曲，濯鹁牛首，登龙台，掩细柳，观士大夫之勤略，钧獠者之所得获。徒车之所辚轹，乘骑之所蹂若，人民之所蹈躪，与其穷极倦飫，惊惮慴伏，不被创刃而死者，佗佗藉藉，真阡满谷，揜平弥泽。

“于是乎游戏懈怠，置酒乎昊天之上，张乐乎轆轳之宇；撞千石之钟，立万石之钜；建翠华之旗，树灵鼉之鼓。奏陶唐氏之舞，听葛天氏之歌，千人唱，万人和，山陵为之震动，川谷为之荡波。巴俞宋蔡，淮南于遮，文成颠歌，族举递奏金鼓迭起，铿锵铎馨，洞心骇耳。荆吴郑卫之声，《韶》《濩》《武》《象》之乐，阴淫案衍之音，鄙郢缤纷，《激楚》结风，俳优侏儒，狄鞮之介，所以娱耳目而乐心意者，丽靡烂漫于前，靡曼美色于后。

“若夫青琴宓妃之徒，绝殊离俗，姣冶娴都，靓庄刻饬，便嬛绰约，柔桡嬛嬛，妩媚姘嫋，挫独茧繭之褕褕；眇阎易以戌削，嫵姚微徂，与世殊服；芬香沤郁，酷烈淑郁；皓齿粲烂，宜笑哂；长眉连娟，微睇𦇧藐；色授魂与，心愉于侧。

“于是酒中乐酣，天子芒然而思，似若有亡。曰：‘嗟呼，比泰奢侈！朕以览听余闲，无事弃日，顺天道以杀伐，时休息于此，恐后世靡丽，遂往而不反，非所以为继嗣创业垂统也。’于是乃解酒罢猎，而命有司曰：‘地可以垦辟，悉为农郊，以瞻萌隶；隄牆填堦，使山泽之民得至焉。实陂池而勿禁，虚宫观而勿仞。发仓廩以振贫穷，补不足，恤鰥寡，存孤独。出德号，省刑罚，改

制度，易服色，更正朔，与天下为始。’

“于是历吉日以齐戒，袭朝衣，乘法驾，建铎旗，鸣玉鸾，游乎《六艺》之囿；胡，骛乎仁义之涂，览观《春秋》之林，射《貍首》，兼《驹虞》，戈玄鹤，建干戚，载云罕，揜群《雅》，悲《伐檀》，乐乐胥，修容乎《礼》园，翱翔乎《书》圃，述《易》道，放怪兽，登明堂，坐清庙，恣群臣，奏得失，四海之内，靡不受获。于斯之时，天下大说，向风而听，随流而化，喟然兴道而迁义，刑错而不用，德隆乎三皇，功羨于五帝。若此，故猎乃可喜也。

“若夫终日暴露驰骋，劳神苦形，罢车马之用，抗士卒之精，费府库之财，而无德厚之恩，务在独乐，不顾众庶，忘国家之政，而贪雉兔之获，则仁义者不由也。从此观之，齐楚之事，岂不哀哉！地方不过千里，而囿居九百，是草木不得垦辟，而民无所食也。夫以诸侯之细，而乐万乘之所侈，仆恐百姓之被其尤也。”

于是二子愀然改容，超若自失，逡巡避席曰：“鄙人固陋，不知忌讳，乃今日见教，谨闻命矣。”

赋奏，天子以为郎。无是公言天子上林广大，山谷水泉万物，及子虚言楚云梦声有甚众，侈靡过其实，且非义理所尚，故删取其要，归正道而论之。

相如为郎数岁，会唐蒙使通夜郎西犍中，发巴蜀吏卒千人，郡又多为发转漕万余人，用兴法诛其渠帅，巴蜀民大惊恐。上闻之，乃使相如责唐蒙，因喻告巴蜀民以非上意。檄曰：

告巴蜀太守：蛮夷自擅不讨之日久矣，时侵犯边境，劳士大夫。陛下即位，存抚天下，辑安中国。然后兴师出兵，北征匈奴，单于怖骇，交臂受事，诎膝请和。康居西域，重译请朝，稽首来享。移师东指，闽越相诛。右吊番禺，太子入朝。南夷之君，西楚之长，常效贡职，不敢怠堕，延颈举踵，喁喁然皆争归义，欲为臣妾，道里辽远，山川阻深，不能自致。夫石顺者已诛，而为善者未赏，故遣中郎将为往宾之，发巴蜀士民各五百人，以奉币帛，卫使者不然，靡有兵革之事，战斗之患。今闻其乃发军兴制，惊惧子弟，尤患长老，郡又擅为转粟运输，皆非陛下之意也。当行者或亡逃自贼杀，亦非人臣之节也。

夫边郡之士，闻烽举燧燔，皆摄弓而驰，荷兵而走，流汗相属，唯恐居后，触白刃，冒流矢，义不反顾，计不旋踵，人怀怒心，如报私仇。彼岂乐死恶生，非编列之民，而与巴蜀异主哉？计深虑远，急国家之难，而乐尽人臣之道也。故有剖符之封，析珪而爵，位为通侯，居列东第，终则遗显号于所世，传土地于子孙，行事甚忠敬，居位甚安佚，名声施于无穷，功烈著而不灭。是以贤人君子，肝脑涂中原，膏液润野草而不辞也。今奉币役至南夷，即自贼杀，或亡逃抵诛，身死无名，谥为至愚，耻及父母，为天下笑。人之度量相越，岂不远哉！然此非独行者之罪也，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谨也；寡廉鲜耻，而俗不长厚也。其被刑戮，不亦宜乎！

陛下患使者有司之若彼，悼不肖愚民之如此，故遣

信使晓喻百姓以发卒之事，因数之以不忠死亡之罪，让三老孝弟以不教诲之过。方今田时，重烦百姓，已亲见近县，恐远所溪谷山泽之民不扁闻，檄到，亟下县道，使咸知陛下之意，唯毋忽也。

相如还报，唐蒙已略通夜郎，因通西南夷道，发巴、蜀、广汉卒，作者数万人。治道二岁，道不成，士卒多物故，费以巨万计。蜀民及汉用事者多言其不便。是时邛笮之君长闻南夷与汉通，得赏赐多，多欲愿为内臣妾，请吏，比南夷。天子问相如，相如曰：“邛、笮、犍、牂者近蜀，道亦易通，秦时尝通为郡县，至汉兴而罢。今诚复通，为置郡县，愈于南夷。”天子以为然，乃拜相如为中郎将，建节往使。副使王然于、壶充国、吕越人驰四乘之传，因巴蜀吏币物以赂西夷。至蜀，蜀太守以下郊迎，县令负弩矢先驱，蜀人以为宠。于是卓王孙、临邛诸公皆因门下献牛酒以交驩。卓王孙喟然而叹，自以得使女尚司马长卿晚，而厚分与其女财，与男等同。司马长卿便定略西夷，邛、笮、犍、牂斯榆之君皆请为内臣。除边关，关益斥，西至沫、若水，南至沔柯为徼，通零关道，桥孙水以通邛都。还报天子，天子大说。

相如使时，蜀长老多言通西南夷不为用，唯大臣亦以为然。相如欲谏，业已建立，不敢乃著书，籍以蜀父老为辞，而已诘难之，以风天子，且因宣其使指，令百姓知天子之意。其辞曰：

汉兴七十有八载，德茂存乎六世，威武纷纭，湛恩汪涉，群生澍濡，洋溢乎方外。于是乃命使西征，随流

而攘，风之所被，罔不披靡。因朝丹从骝，定筭存邛，略斯榆，举苞满，结轶还辕，东乡将报，至于蜀都。

耆老大夫荐绅先生之徒二十有七人，俨然造焉。辞毕，因进曰：“盖闻天子之于夷狄也，其义羁縻勿绝而已。今罢三郡之士，通夜郎之途，三年于兹，而功不竟，士卒劳倦，万民不赡，今又接以西夷，百姓力屈，恐不能卒业，此亦使者之累也，窃为左右患之。且夫邛、笮、西僂之与中国并也，历年兹多，不可记已。仁者不以德来，疆者不以力并，意者其殆不可乎！今割齐民以附夷狄，弊所恃以事无用，鄙人固陋，不识所谓。”

使者曰：“乌谓此邪？必若所云，则是蜀不变服而巴不化俗也。余尚恶闻若说。然斯事体大，固非观者之觐也。余之行急，其详不可得闻已，请为大夫粗陈其略。”

“盖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非常者，固常人之所异也。故曰非常之原，黎民惧焉；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

“昔者鸿水淳出，泛滥衍溢，民人登降移徙，阨阨而不安。夏后氏戚之，乃堙鸿水，决江疏河，漉沈赡燹，东归之於海，而天下永宁。当斯之勤，岂惟民哉。心烦於虑而身亲其劳，躬胝无胝，肤不生毛。故休烈显乎无穷，声称浹乎于兹。”

“且夫贤君之践位也。岂特委琐握跼，拘文牵俗，循诵习传，当世取说云尔哉！必将崇论闳议，创业垂统，为万世规。故驰骛乎兼容并包，而勤思乎参天贰地。且《诗》不云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

王臣。’是以六合之内，八方之外，浸浥衍溢，怀生之物有不浸润于泽者，贤君耻之。今封疆之内，冠带之伦，咸获嘉祉，靡有阙遗矣。而夷狄殊俗之国，辽绝异党之地，舟輿不通，人迹罕至，政教未加，流风犹微。内之则犯义侵礼于边境，久之则邪行横作，放弑其上。君臣易位，尊卑失序，父兄不辜，幼孤为奴，係累号泣，内向而怨，曰‘盖闻中国有至仁焉，德洋而思普，物靡不得其所，今独曷为遗已’。举踵思慕，若枯旱之望雨。盍夫为之垂涕，况乎上圣，又恶能已？故北出师以讨疆胡，南驰使以诮劲越。四面风德，二方之君鳞集仰流，愿得受号者以亿计。故乃关沫、若，徼沔柯，镂零山，梁孙原。创道德之途，垂仁义之统。将博恩广施，远抚长驾，使疏逖不闭，阻深昧得耀乎光明，以偃甲兵於北，而息诛伐於彼。遐迩一体，中外提福，不亦康乎？夫拯民於沈溺，奉至尊之休德，反衰世之陵迟，继周氏之绝业，斯乃天子之急务也。百姓虽劳，双恶可以已哉？

“且夫王事固未有不始於忧勤，而终於佚乐者也。然则受命之符，合在於此矣。方将增泰山之封，加梁父之事，鸣和鸾，扬乐颂，上威五，下登三。观者未睹指，听者未闻音，犹鷩明已翔乎寥廓，而罗者犹视乎薮泽。悲夫！”

于是诸大夫芒然丧其所怀来而失厥所以进，喟然并称曰：“允哉汉德，此鄙人之所愿闻也。百姓虽怠，请以身先之。”敞罔靡徙，因迁延而辞避。

其后人有上书言相如使时受金，失官。居岁余；复

召为郎。

相如口吃而善著书。常有消渴病。与卓氏婚，饶於财。其进仕宦，未尝肯与公卿国家之事，称病闲居，不慕官爵，常从上至长杨猎，是时天子方好自击熊彘，驰逐野兽，相如上疏谏之。其辞曰：

臣闻物有同类而殊能者，故力称鸟获，捷言庆忌，勇期贲、育。臣之愚，窃以为人诚有之，兽亦宜然。今陛下好陵阻险，射猛兽，卒然遇軼材之兽，骇不存之地，犯属车之尘，輿不乃还辕，人不暇施巧，虽有乌获、逢蒙之伎，力不得用，枯木朽株尽为害矣。是胡越起於穀下，而羌夷接轸也，岂不殆哉！虽万全无患，然本非天子之所宜近也。

且夫清道而后行，中路而后驰，犹时有街衢之变，而况涉乎蓬蒿，驰乎丘坟，前有利兽之乐而内无存变之意，其为祸也不亦难矣！夫轻万乘之重不以为安而乐，出於万有一危之途以为娱，臣窃为陛下不取也。

盖明者远见於未萌而智者避危於无形，祸固多藏於隐微而发於人之所忽者也。故鄙谚曰：“家累千金，坐不垂堂”。此言虽小，可以喻大。臣愿陛下留意幸察。

上善之。还过宜春宫，相如奏赋以哀二世行失也。其辞曰：

登陂陀之长阪兮，坱入曾宫之嵯峨。临曲江之隈州兮，望南山之参差。岩岩深山之涇涇兮，通谷谿兮谿徊。汨泮喻习以永逝兮，注平皋之广衍。观众树之塙蓂兮，览竹林之榛榛。东驰土山兮，北揭石瀨。弥节容与兮，历

吊二世。持身不谨兮，亡国失埶。信谗不寤兮，宗庙灭绝。呜呼哀哉！操行之不得兮，坟墓芜秽而不修兮，魂无归而不食。夔邈绝而不齐兮，弥久远而愈休。精罔阊而飞声兮，拾九天而永逝。呜呼哀哉！

相如拜为孝文园令。天子既美子虚之事，相如见上好仙道，因曰：“上林之事未足美也，尚有靡者。臣尝为《大人赋》，未就，请具而奏之。”相如以为列仙之传居山泽头，形容甚臞，此非帝王之仙意也，乃遂就《大人赋》。其辞曰：

世有大人兮，在开中州。宅弥万里兮，曾不足以少留。悲世俗之迫隘兮，揭轻举而远。垂绛幡之素蜺兮，载云气而上浮。建格泽之长竿兮，总光耀之采旒。垂旬始以为惨兮，拙彗星而为髻。掉指桥以偃蹇兮，又旖旎以招摇。揽欂櫨以为旌兮，靡屈虹而为绸。红杳渺以眩湑兮，焱风涌而云浮。驾应龙象舆之螭略逶丽兮，骖赤螭青虬之螭螭蜿蜒。低卬天矫据以骄骜兮，诘折隆穷螭以连卷。沛艾赳螭以凝兮，放散畔岸骧以孱颜。踳踳裼辎容以委丽兮，绸缪偃蹇怵隳以梁倚。纠蓼叫冕蹋以般路兮，蔑蒙踊跃腾而狂趋。莅飒卉翕燁至电过兮，焕然雾除，霍然云消。

邪绝少阳而登太阴兮，与真人乎相求。互折窈窕以右转兮，横厉飞泉以正东。采徵灵圉而选之兮，部乘众神于瑶光。使五帝先导兮，反太一而从陵阳。左玄冥而右含雷兮，前陆离而后漓湟。厮征伯侨而役羡门兮，属岐伯使尚方。祝融惊而蹕御兮，清雰气而后行。屯余车

其万乘兮，綵云盖而树华旗。使句芒其将行兮，吾欲往乎南嬉。

历唐尧於崇山兮，过虞舜於九疑。纷湛湛其差错兮。杂还葛胶以方驰。骚扰其相纷拏兮，滂湃决轧丽以林离。鑽罗列聚丛以茏茸兮，衍曼流烂坛以陆离。径入雷室之砢磷郁律兮，洞出鬼谷之崛垒嵬礧。遍览八紘而观四荒兮，渡九江而越五河。经营炎火而浮弱水兮，杭绝浮渚而涉流沙。奄息总极泛滥水嬉兮，使灵娲鼓瑟而舞冯夷。时若菱将混浊兮，召屏翳诛风伯而刑雨师。西望昆仑之轧沕洸忽兮，直径驰乎三危。排阊阖而入帝宫兮，载玉女而与之归。舒阊风而摇集兮，亢鸟腾而一止。低回阴山翔以纡曲兮，吾乃今目睹西王母矐然白首。载胜而穴处兮，亦幸有三足鸟为之使。必长生若此而不死兮，虽济万世不足以喜。

回车謁来兮，绝道不周，会食幽都。呼吸沆瀣兮餐朝霞，噍咀芝英兮叽琼华。媮侵淖而高纵兮，纷鸿涌而上厉。贯列缺之倒景兮，涉丰隆之滂沛。驰游道而修降兮，骛遗雾百远逝。迫区中之隘狭兮，舒节出乎北垠。遗屯骑於玄阙兮，轶先驱於寒门。下崢嶸而无地兮，上寥廓而无天。视眠而无见兮，听悄悄而无闻。乘虚无而上假兮，超无友而独存。

相如既奏《大人之颂》，天子大悦，飘飘有凌云之气，似游天地之闲意。

相如既病免，家居茂陵。天子曰：“司马相如病甚，可往从悉取戎书；若不然，后失之矣。”使所忠往，而相

如已死，家无书。问其妻，对曰：“长卿固未尝有书也。时时著书，人又取去，即空居。长卿未死时，为一卷书，曰有使者来求书，奏之。无他书。”其遗札书言封禅事，奏所忠。忠奏其书，天子异之。其书曰：

伊上古之初肇，自昊穹兮生民，历撰列辟，民迄于秦。率迓者踵武，逖听者风声。纷葳蕤，堙灭而不称者，不可胜数也。续《昭》《夏》，崇号谥，略可道者七十有二君。罔若淑而不昌，畴逆失而能存？

轩辕之前，遐哉邈乎，其详不可得闻也。五三《六经》载籍之传，维见可观也。《书》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因斯以谈，君莫盛义唐尧，臣莫贤於后稷。后稷创业开唐，公刘发迹于西戎，文王改制，爰周郅隆；大行越成，而后陵夷衰微，千载无声，岂不善始善终哉。然无异端，慎所由於前，谨遗教於后耳。故轨迹夷易，易遵也；湛恩濛涌，易丰也；宪度著明，易则也；垂统理顺，易继也。是以业隆於继祿而崇冠于二后。揆厥所元，终都攸卒，未有殊尤绝迹可考于今者也。然犹躡梁父，登泰山，建显号，施尊名。大汉之德，逢涌原泉，沕漭漫衍，旁魄四塞，云专雾散，上畅九垓，下泝八埏。怀生之类霑濡浸润，协气横流，武节飘逝，迤陕游原，迴阔泳沫，首恶湮没，闾昧昭皙，昆虫凯泽。回首面内。然后圉驹虞之珍群，徼麋鹿之怪兽，导一茎六穗於庖，牺双觝共抵之兽，获周馥珍收龟于歧，招翠黄乘龙於沼。鬼神接灵圉，宾於闲馆。奇物譎诡，俶傥穷变。钦哉，符瑞臻兹，犹以为薄，不敢道封禅。盖周跃鱼陨杭，休之

以燎，微夫斯之为符也，以登介丘，不亦慝乎！进让之道，其何爽与？

于是大司马进曰：“陛下仁育群生，义征不悛，诸夏乐贡，百蛮执贄，德侔往初。功无与二，休烈浹洽，符瑞众变，期应绍至，不特创见。意者泰山、梁父设坛场望幸，盖号以况荣，上帝垂恩储让，将以荐成，陛下谦而弗发也。挈三神之骥，缺王道之仪，群臣慝焉。或谓且天为质闇，珍符固不可辞；若然辞之，是泰山靡记而梁父靡几也。亦各并时而荣，咸济世而屈，说者尚何称於后，而云七十二君？夫修德以锡符，奉符以行事，不为进越。故王弗替，而修礼地祇，谒款天神，勒功中岳，以彰至尊，舒盛德，发号荣，受厚福，以浸黎民也。皇皇哉斯事！天下之壮观，王者之丕业，不可贬也。愿陛下全之。而后因杂荐绅先生之略术，使获耀日月之末光绝炎，以展采错不，犹兼正烈其义，校饬厥文，作《春秋》一艺，将袭旧六为七，摭之无穷，俾万世得激清流，扬微波，蜚英声，腾茂实。前圣之所以永保鸿名而常为称首者用此，宜命掌故悉奏其义而览焉。”

于是天子沛然改容，曰：“愉乎，朕其诚哉！”乃迁思回虑，总公卿之议，询封禅之事，诗大泽之博，广符瑞之富。乃作颂曰：

自我天覆，云之油油。甘露时雨，厥壤可游。滋液渗漉，何生不育；嘉谷六穗，我穡曷蓄。

非唯雨之，又润泽之；非唯濡之，泛专濩之。万物熙熙，怀而慕思。名山显位，望君之来。君乎君乎，候

不迈哉！

般般之兽，乐我君囿；白质黑章，其仪可（喜）；眈眈睦睦，君子之能。盖闻其声，今观其来。厥涂靡踪，无瑞之徵。兹亦於舜，虞氏以兴。

濯濯之麟，游彼灵畴。孟冬十月，君俎郊祀。驰我君舆，帝以享祉。三代之前，盖未尝有。

宛宛黄龙，兴德而升；采色炫耀，燿炳辉煌。正阳显见，觉寤黎蒸。於传载之。云受命所乘。

厥之有章，不必谆谆。依类托寓，谕以封峦。

披艺观之，天人之际已交，上下相发允答。圣王之德，兢兢翼翼也。故曰“兴必虑衰，安必思危”。是以汤武至尊严，不失肃祗；舜在假典，顾省厥遗；此之谓也。

司马相如既卒五岁，天子始祭后土。八年而遂行礼中狱，封于太山，至梁父禅肃然。

相如他所著，若《遗平陵侯书》、《与五公子相难》、《草木书》篇不采，采其尤著公卿者云。

曹植传

——《三国志》卷一九

【说明】曹植（192～232），三国时魏诗人。字子建，谯（今安徽亳县）人。曹操第三子，因最后受封陈郡，卒谥思，后人又称他“陈王”或“陈思王”。因富于才学，早年受曹操宠爱，一度欲立为太子，后曹丕、曹叡为帝，曹植备受猜忌，抑郁而终。

诗歌是曹植文学活动的主要领域，前期诗歌或写贵公子的优游生活，或写“生乎乱，长乎军”的时代感受，后期诗歌多抒发压制下的愤懑和哀怨。他的诗得益于乐府诗的营养，在五言诗歌艺术的发展上做出重大贡献。善用比兴手法，语言凝炼精工，音韵和谐，钟嵘评价说：“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诗品》）曹植被视为五言诗的一代宗匠。

曹植兼工辞赋和散文，《洛神赋》等堪称传世佳作。原有集已散佚，今存南宋本《曹子建集》十卷。

陈思王曹植，字子建，年纪才十余岁就能诵读《诗经》、《论语》及辞赋几十万言，擅长写文章。魏太祖曹操曾在看过

他的文章后，问他：“你这篇文章是请人代笔的吗？”曹植跪下回答说：“出口成文，下笔成章，可以当面考试，为什么要请人代笔呢？”当时，邺城（故城在今河北临漳北）铜爵台刚刚建成，魏太祖就领着儿子们到台上，让他们各自写赋赞颂。曹植提笔撰写，片刻则成，写得极好，魏太祖十分惊异。曹植性情坦率随和，不讲究威严、礼仪。车马服饰，不追求华艳、富丽。每次进见父王便被诘难考问，他总是应声而答，因此，特别受魏太祖宠爱。建安十六年（211），被封为平原侯。建安十九年（214），改封为临淄侯。魏太祖讨伐孙权时，派他留守邺城，告诫他说：“我过去做顿丘令时，年纪二十三岁，回想那时的所作所为，至今没有什么可后悔的。现在，你也二十三岁了，不可不勤勉自励呀！”曹植既因才气被刮目相看，又有丁仪、丁廙、杨修等人作为羽翼。魏太祖生性多疑虑，频繁改变太子的人选。曹植行事任性，自己不能谨言慎行，饮酒又不节制。魏文帝则善用手段，能克制感情，自我掩饰，宫廷的嫔妃、魏太祖左右的官员又一起说他的好话，所以他被确定为继承人。

建安二十二年（217），曹植增加食邑五千户，和以前的加起来共一万户。他曾经擅自驾车行驰在帝王行走的道上，打开司马门奔驰而出。魏太祖大怒，把掌管王室车马的公车令处死。因为这件事，曹操重视了对各位王侯的法令条规。而对曹植的宠爱越来越差了。魏太祖既担心他身后王位交接时会有变故，又因为杨修很有才华计谋，又是袁绍的外甥，因此，找个罪名杀了杨修。曹植为此内心更为不安。建安二十四年（219），曹仁被关羽所围困，魏太祖命曹植为南中郎将、

行征虏将军，要派他援救曹仁，派人叫他前去亲受命令，曹植却喝得酩酊大醉，以致不能前往受命，魏太祖因此后悔，并罢免了曹植的官职。

魏文帝继承王位后，诛杀了丁仪、丁廙及他们家的全部男子。曹植和各位王侯一起被集中到京城。黄初二年（221），监国谒者灌均迎合旨意，上书启奏，说曹植“醉于酒而违逆傲慢，并且威胁使者”，管事的大臣要求皇帝治他的罪，魏文帝因为太后的干预，只贬他为安乡侯。同年又改封为鄴城侯，三年后，立他为鄴城王，食邑二千五百户。

黄初四年（233），改封为雍丘王，那年，到京城朝见皇帝，上疏说：

臣自从带罪归返分封之地后，刻骨铭心，追思罪过，中午才吃饭，半夜才睡眠，委实感到国家法制不可再犯，圣上恩典难以再依赖，私下感到《相鼠篇》里说的‘人如果不懂礼仪，为什么不快死’的深义。孤身只影，内心感到羞愧！如果因自己的罪过而轻生，会违背古代圣贤朝过夕改的告诫；如果忍着羞耻而苟全生命，就会犯了诗人所说的‘有何面目’的讥讽。只因仰仗陛下的天地间人们所效法的大德，如恩谊深厚的父母，如吹遍大地的春风，如润泽万物的时雨。不另眼看待荆棘等无用之物的，是祥云的恩惠；对七个孩子平等抚养的，是布谷鸟的仁爱；赦免过错让人立功的，是明君的做法；怜恤愚儿爱惜智儿的，是慈父的恩情。这就是愚臣往复思念陛下恩泽而不忍轻生自弃的原因。

以前接到陛下的诏书，愚臣则离开朝廷，感到心灰

意冷，自以为到老都没有再朝见陛下的希望了。没想到陛下有辱垂召，颁发诏书，至到达之日，便心驰朝廷了。孤寂地住在邸第，久未奉诏来朝，热烈向往，日夜瞻望，内心辗转不安。谨拜献这表章和诗歌两篇。歌辞中说：“壮美啊，显赫的父王，当时唯独魏武皇帝接受上苍之命，安定四方州郡。朱旗飘拂之处，九州扰攘尽消。道德归化如滂沱的雨水，流布四方，蛮荒之邦也来朝拜。挥师胜过商汤、周武，禅让与唐尧、虞舜齐步，圣性感灵气之厚而生吾皇陛下，陛下前世聪敏，武则威烈，文则和畅，接受了汉室的禅让，成为万邦君王。万邦既已归顺，悉心遵循旧的章则。分封兄弟，以捍卫国家。先帝命我为临熹侯，管理这青州之地，地到海滨，如周国、鲁国，车马服饰，熠熠生辉，旌旗徽帜，次第井然。贤能济济，辅佐朝政。小臣该死，依仗恩宠而骄傲自满，触动了体制，扰乱了国法。作为国家的藩篱、屏障，却毁废了先世的典章，对帝皇的使者傲慢不逊，触犯了朝廷的威仪。国家自有典章刑制，削减了我的食邑的户数，贬低了我的爵位。要致于坐狱，与元凶同类。圣明的天子，兄弟情深，不忍对我施刑，将我暴尸朝市。对我的违法，哀怜我这小人，改封邑于黄河之滨的兖州。没有得力的助手，有君王而无朝臣，全因我的荒唐过失，还有谁肯来辅佐我呢？我孤身一人，悽然子立，置身于冀州，嗟叹我这小人竟遭此祸殃。显赫圣明的天子，广施恩泽，不遗一物，仍对我授予冠冕，给我系上朱绂。朱绂光采耀眼，让我荣耀华贵，授予我官府、玉玺，继而封王晋爵。

仰承王侯金玺，俯受圣上方策，陛下恩典如此厚重，真令我诚惶诚恐。感叹我这小人，受凶顽羁绊，愧对先父的坟地，愧对兄长的朝廷。自当不敢再对兄长不敬，确实是依靠着恩宠。由于圣上的威灵，才改封我为雍丘王，这足以令我没齿不忘了。天地无极，人寿难测，常恐颠沛不测，至死未能赎罪。愿意冒着飞箭走石，出征东吴，或许能建立微末之功，以赎过去之罪。冒着生命的危险接受使命，方足以免去罪孽。甘愿奔赴江汉、湘水，奋战于三吴、百越。苍天启迪我的诚心，使我得以奉召赴京，等待拜见圣上容颜，此心如饥似渴。内心的仰慕追悔，真是悲切难言啊！与天齐高的陛下，一定愿意听取卑下的诉说；辉煌无比的吾皇，一定会光照小臣的！疏中又说：

敬承圣上贤明的诏书，应召与诸王到皇都朝觐，及早备好车驾，饲饱马匹，润滑车轴。命令侍从官员，备好朝京行装。早晨从鸾台出发，晚上歇息于兰渚。广阔的原野，众多的人群，行经公田，看到庄稼丰收，无限欣喜。为了赶路，看到树下绿荫重重，不敢歇息；虽带了食物，饿了也顾不上吃；望见城市，不敢穿过；面对城邑，不敢逗留。随从策马，一路奔走。驾车的四匹黑马，整整齐齐，昂首直奔。飘风扶起车辕，轻云托起车盖。涉水淌过涧边，沿着山坳而行，顺着黄河岸边，又来到黄坂。西渡伊阙太谷，有时下山有时上行，不顾车马路途的疲倦，几经晓行夜宿。想到即将朝拜圣皇，不敢有片刻的安宁；专心驱驰，定日速行。前有举着火把

的车子，后有扛着旌旗的车辆。车轮不停地转动，车铃不停地鸣响，抵达帝京，住在邸第。圣上诏书尚未赐下，微臣无从朝觐。仰着高瞻皇门，俯伏朝廷之下，永怀追慕之心，忧虑如醉如痴。

魏文帝赞许他的辞义割切，宽和地以诏书答复，嘉勉他。

黄初六年（225），魏文帝东征，班师时路过雍丘（故城在今河南杞县），驾幸曹植宫中，给他增加了五百户食邑。魏明帝太和元年（227）转封浚仪（今河南开封），太和二年（228），又回到雍丘。曹植常常自感忧愤，觉得有才华而无处施展，于是上疏自荐，疏中说：

臣听说过，士大夫生于世，在家侍奉父亲，出仕侍奉君主，侍奉父亲只求使父亲荣耀；侍奉君王贵在使国家振兴。因此，慈祥的父亲不能眷爱无益的儿子，仁爱的君王不能养无用的臣子。考核其德行而授予官职，这才是可成就伟大功业的国君，估量自己的才能而接受爵位，才是尽力效命的大臣。所以，国君没有凭空授予官职的，大臣没有凭空得官晋爵的。凭空授官被称为错误的选拔，凭空得官被称为白食其禄。这就是《诗经》中《素餐》的写作缘由。过去，虢仲、虢叔不推辞两个国君的任命，是因为他的德行深厚；周公旦、召公奭不退让燕国、鲁国的封地，是因为他们的功勋巨大。现在微臣承蒙国家深厚的恩典，至今已历经三世。正当陛下治理国家举世太平的时候，我沐浴圣上雨露，深受恩惠教化，可称极为幸运。我占有东藩王位，爵位在上乘之列，身披轻暖的衣服，口里吃的，连美味佳肴也厌倦，举目看

尽美人，侧耳听倦了丝竹之音，这正是因为爵位高、食禄厚才拥有的呀！回想古代那些授予爵位俸禄的人，与这有所不同，他们都以功劳救济国家，辅佐君主，恩惠百姓。如今，微臣无德行可以述说，无功劳可以记载，如果这样终生，则无益于国家朝廷，就将应了诗人写的《彼己》中的嘲讽了。因此，对上有愧于天子冕服，俯身有愧于朱色绶带。

如今，天下统一，九州安定。但向西看，有违抗朝廷的蜀国，东边又有不称臣的吴国，这使边境不能解除武装，谋士不能高枕无忧，实在必须使宇内统一，以达到天下太平。所以，夏启消灭有扈氏，使夏朝功业显赫，周成王战败蔡商、徐奄，使周朝的德威显著。如今，陛下以圣贤明德统治天下，将要完成魏武帝、魏文帝的功业，继承周成王、康王的盛世，选贤授能，用方叔、召虎这样的大臣镇守四方边境，作为国家的武臣，可以说是妥当的。但是，高飞的鸟还未被轻箭所中，深水里的鱼还未悬挂在钩饵上，恐怕是钓鱼射箭的技术还不尽精深。过去耿弇不等光武帝到达，就猛攻张步，说是不让贼子留于君父面前，所以，车右因车轮响而饮剑，雍门狄自杀于齐国国境。像这样两位义士，难道是厌生乐死吗？实在是对敌人傲慢君王、欺凌君主表示忿怒啊！君主的宠臣，应当铲除灾难，振兴民利；臣子侍奉君王，必须殉身平乱，以功绩报答君主。过去贾谊年少时，请求皇上授予属国官衔，让他去擒杀单于；终军少年就出使南越，要用长缨缚住越王，捆送汉廷。这两位大臣，难

道是为了向君主夸口、向世间炫耀吗？只因壮志受到压抑，想表明其才能、力量，为贤明的君主贡献才能。过去，汉武帝为霍去病建府邸，霍去病说：“匈奴未灭，臣无心建家！”因此，忧国忘家，损躯救难，是忠臣的志向。如今，臣居住在京畿以外，并非不宽裕，但寝不安席，食不甘味，是因为常常忧虑到蜀、吴两方还未征服。

微臣看到先武皇帝的武臣老将，年老辞世的消息常常传出。虽然，现在世上并不缺乏贤能的人，老将旧兵，还在操练作战阵法。我私下不自量力，志在为陛下效命，希望立下毛发小功，以报答所受的恩典。陛下如能下个非同寻常的诏书，让我发挥锥刀一样的小作用，使我在西属大将军麾下当一名校尉，或在东属大司马军中负责管单船的责任，臣下必定踏危履险、驰舟策马、推锋出刃、身先士卒，即使不能擒孙权，斩孔明，也要擒其大将，灭其兵众，定以短暂的胜利，来消除终生的惭愧，使自己名声出现在史笔之下，业绩陈述于国史之中。即使身体分裂于蜀国境内，首级悬挂于吴国城门，也是虽死犹生。如果微臣小才不能得以一试，终生默默无闻，白白使身躯荣耀、肥胖，活着无益于国家大事，死了也无损于命运。白白辜负王侯爵位、占有优厚的利禄，像飞禽一样栖息，如鸟一样浅见，直到白头老死，这只是圈牢里饲养的畜牲，绝不是臣子的志向啊！传闻东吴前线疏于防备，军队遭到小挫折，我停食弃餐，挥袖提襟，按剑东望，心早已飞往吴会（今江苏东部、浙江西部）了。

臣过去随从先武皇帝出征，南抵赤岸，东至渤海，西

望玉门关，北出卢龙塞，微臣见到当时用兵的势头，可谓神妙。因此用兵不可能预言，必须面对强敌随时应变。微臣立志效命于昌明之时，立功于圣主之世，每每览阅史书，看到古代忠臣义士，舍去短暂的生命，来殉国家的危难，身躯虽遭屠戮割袭，但功勋铭刻于鼎钟之上，英名永垂于史书之中，我无不扪心长叹啊！微臣听说贤明的君主使用臣子，不因其有罪而弃之不用，所以，使用了败北的将军，秦国、鲁国以此战胜敌方取得了成功；赦免了被拔掉帽缨和盗食骏马的臣子，楚王、秦王因此难中得救。微臣自深感先帝早逝，威王辞世，臣是何人，哪堪独自长活于世上！常恐先于朝露而去，尸填沟壑，坟土未干，身与名已一起泯灭。微臣听说，骏马长鸣是因为伯乐明白它的性能；卢狗哀叫，是因为韩国知道它的才能。因此，要效法齐、楚的道路，来显示能承担驰骋千里重任的本领；请以狡兔的敏捷，来验证它善于攫食的能力。现在微臣志在建立狗、马的微功，但私下揣度，终究没有伯乐、韩国的举荐，因此内心压抑，自感痛苦啊！

踮起脚尖观棋的人，听音乐听得拍起手来的人，说不定也有知音，懂行的呢！过去，毛遂只是赵国的陪客，他还借囊中的锥子可以脱颖而出的比喻，来提醒主人让他去立功，何况巍然于世的大魏国是贤士众多的王朝，难道会没有慷慨殉身国难的大臣吗？自卖自夸，对士大夫、女子而言都是可耻的行为。迎合时势，追求官位，是道家的大禁忌，而臣之所以敢于向陛下陈情表意，确实是

因为与国家虽然形体分开，却气息相同，忧患与共的呀！希望以尘雾般的微薄来使山海有所补益，以萤火、蜡烛的微光来使日月增辉。因此，才敢于不顾自己的丑陋，来向陛下献上忠心。太和三年（229）改封东阿（在今山东）。太和五年（231）再度上疏请求慰问亲戚，以表达他的心意，疏中说：

臣听说过，天之所以称之为“高”，是因为它无所不盖；地之所以称之为“广”，是因为它无所不负载；日月之所以称之为明，是因为它无所不照耀；江海之所以称之为大，是因为它无所不容纳。因此，孔子说：“尧作为君主真是伟大，只有天伟大，也只有尧能效法它。”天穹的德行对于地上的万物，可称为宏大广阔。尧的政教准则是先亲后疏，由近及远，《尚书·尧典》说他“大德昭显，光照万物，与九族亲善，而九族和睦，又光照百官。”到了周朝的文王也尊崇敬化，《诗经·思齐篇》写道：“周公以法制对待嫡妻，以致他的兄弟也用此治理家庭、国家。”这就是诗人所咏颂的“雍雍”、“穆穆”。过去，周公感慨管叔、蔡叔和他不一致，广泛分封宗亲，以便作为屏障来捍卫王室。《左传》中说：“周朝的同宗之盟，取不周的姓给予后代。”实在是骨肉之情虽疏远但不离散，同宗相亲之义真诚深厚。没有那种讲道义而待慢君王、讲仁政却遗弃宗亲的人。

陛下秉承唐尧光辉的品德，实行文王恭慎的仁义，仁惠施遍后宫，恩典光照九族，列侯百官轮番休息，依次入值，朝廷上公务畅行，在家里人情畅达，亲人和睦之

路坦荡，喜庆吊伤之情展现，实在可称为以己体人，广施恩惠。至于微臣，与人情世道断绝联系，盛明之世却被禁锢，私下暗自悲伤。臣不敢奢望交结朋友，从事往来，畅叙人伦。近来，更是婚嫁不知，兄弟隔绝，吉凶讯息不通，庆吊的礼节废弃，不念亲情比对路人还严重，相互隔阂，超过胡越、蛮夷。如今，微臣因法制的束缚，永无朝见陛下的希望，以致心向皇天，情系宫廷，只有神明才知道了，但老天真是这样做，能说它什么呢？退思诸位王侯，都有兄弟相亲的心情，愿陛下宽容颁下诏书，使各诸侯庆吊可以互相致意，四个气节可以互相见面，以款叙骨肉欢聚之情，成全兄弟和悦的深厚情谊。如对妃妾之家，赠予胭脂甘浆，每年给了还要再给。对贵族宗亲一样仁义，对文武百官同等施惠。这样，古人所赞叹的圣王之为，风雅所咏颂的兄弟情闲，便再度出现在当今圣明之世了。

臣反省自己，至今未发挥锥刀一样的作用。看到陛下对我的提拔、授职，如果臣是异姓，臣私下揣摩，这种提拔绝不比朝廷士大夫差。如果准予辞去王爵之位，戴上武冠，解开朱色绶带，佩上青色绶带，驸马都尉或奉东都尉任授一职，在京城安家，为陛下执鞭戴笔，出宫追随华盖，入宫侍奉在东旁，回答陛下的垂问，在左右拾遗补缺，这乃是臣衷心向往的最大心愿，在梦中时时出现。首先常羡慕古代《诗经·鹿鸣》中的君臣欢宴，其次常吟咏《常棣》篇中对不肯宴乐同姓的告诫，再次常思索《伐木》篇中与朋友饮宴的意义，最后常怀着《蓼

莪》篇中对父母恩德无限的哀吊。每逢四个节气理当相会，我却独在一处，左右只有仆人下隶，所对的只有妻子、子女。高谈阔论没有可以听的人，阐述道理没有可以充分施展的地方，无不听到音乐而扪心，面对酒杯而叹息。臣总认为犬、马的忠诚不能打动主人，就如人的诚心不能感动上苍一样。孟姜女哭夫使城墙崩塌，邹衍遭囚使夏日飘霜，臣起初相信，但以臣的心相比，这只是荒诞的话了。就如葵菜叶倾向太阳，太阳虽然不以光辉回照，但它向往之心实在真诚。臣把自己比作葵菜，而降下天地一般的施惠，垂下三重光芒的，便是陛下了。

臣听辛文子说过：“不论招福或是致祸，都不率先为之。”今天这种隔阂的情况，兄弟都感到忧虑，而臣独先言及，突在是不愿意让这圣明之世还有不蒙受陛下施惠的东西。如果有不蒙受施惠的东西，必然怀有深切怨恨之情，所以《柏舟》篇有“母啊天啊，不谅人啊”的抱怨，《谷风》有“将要得到安乐，你反而丢弃我”的哀叹。因此，伊尹以其君不效法尧舜为耻辱，孟子说：“不用舜侍奉尧的做法去侍奉君主，就是不敬重君主。”臣愚蠢蒙昧、固然不是虞舜、伊尹之辈，但想要让陛下崇尚德光普照、时世和睦的美德，宣扬光明昭彰的品德，这是臣谨敬的诚意。臣独自想到的确是怀有竦身伫立、献言陛下的忠心。敢于再次陈述，希望陛下或许肯垂耳下听。

魏明帝下诏书答复道：“道德教化所施，有昌盛也有败劣，并非都是以善开始而以恶告终的，事情的发展就是这样。因此，忠义仁厚施及草木，便出现了《行苇》这诗篇；恩德施

惠衰竭单薄，不亲善九族，就有《角弓》的诗章加以讽刺。如今，使得诸侯兄弟感情伦理简慢解怠，妻妾后宫，脂粉稀少，简单，朕限使不能督促而使之和睦，但陈思王引用古事比喻道理的意思全都明白了。谁说精诚不足以打动人心、沟通感情呢？分清贵贱，推崇亲人相亲，礼遇贤才良士，遵循长幼之序，是国家纲常法纪，本来就没有限制诸侯互通讯息的诏书，只是矫枉过正，下面的官吏恐受指责，才出现这种情况罢了。已下令有关官员，按照陈思王所诉说的那样去做了。”

曹植再次上疏陈述用人的道理，疏中说：

臣听说，天地间气候适宜，万物才能生长；君臣同心同德，政事才能成功。五帝时代的人并非都十分聪慧，夏、商、周末年的人并非都十分愚蠢，其实就在于是否知人善任。时世既然只有举贤授能之名，而没有获得使用贤能之实，势必各自引进他的同类来当官。谚语说：“相门有相，将门有将。”作为宰相的人才，一定是政治举措十分显著的；作为将领的人才，一定是军事功绩十分显赫的。政德显著，就可以挽救国家、朝廷，达到富足和悦，稷、契、夔、龙就是这样的人；武功显赫，就能用来征服不肯归顺的人，威振四邻，南仲、方叔就是这样的人。过去，伊尹作为一个随嫁的奴仆，是最卑贱的；吕尚处于屠宰、钓鱼地位，是最为鄙陋的。到了他们为商汤、周文王所选用，实在是志同道合，他们深远的谋略神通广大，哪里是凭天子所近幸的人的举荐或天子近臣的干预而当官的人呢？《尚书》上说：“有非凡的君主，必定能任用非凡的大臣，任用非凡的大臣，必定

能建立非凡的功业。”商汤、周文王两位就是这样的国君。如果裹足不前，墨守常规旧法，哪里值得上向陛下进言呢？因此，寒暑不协和，日、月、星光不顺畅，官职空缺无人，政事不整饬，是太尉、司徒、司空三公的责任；边疆战场骚乱不定，四邻侵扰，兵败丧师，战事不息，这是边关将领的忧虑。哪里可以空负国家的恩宠而不称其职的呢？因此，任职越高的人，责任越重；官位越高的人，责任越大。《尚书》说：“不能有旷废职守、才不称其任的空官。”《诗经》有“在其职要忧虑其政”，就是这个意思。

陛下体现了善美神圣的天然真质，登上了帝位，继承了帝业，希望能听到“君主圣明啊，大臣贤良啊，诸事安康啊”的歌咏，能听到偃武修文的赞美。但几年以来，水灾、旱灾从不间断，人民衣食困乏，军队一味征伐，年年增派，加上东部有覆没败北的军队，西部有战死的将军，这样，致使蚌蛤浮游于淮水、泗水之中，黄鼠狼喧哗于山林、树木之间。臣每当想到这些，无不停餐弃食，对酒扼腕啊！过去，汉文帝去代国（今山西离石、灵石、昔阳及河北蔚县、阳原、怀安等地）担心朝廷里会有变故，宋昌说：“京城里有朱虚侯刘章、东牟侯刘兴居这样的至亲，外地有齐王刘肥、楚王刘交，淮南王刘长、琅琊王刘泽，这些都是牢固如盘石的宗亲，请君王不必多虑。”臣愿陛下远则看到虢仲、虢叔对周文王的辅佐，次则考虑召公奭、毕公高对周成王的辅助，再则想到宋昌说的盘石坚固的道理。过去，骏马对于吴国

山坡，可说是困顿的，到了伯乐看中它，孙邨驾驭它，驰骋千里，形体一点也不劳顿。伯乐善于驾驭马匹，明君善于使用大臣；伯乐驰骋千里明君实现太平，实在都是举贤授能的明显效果。如果朝廷官员贤良，处理国家纷繁政务，武将带兵，四方的兵灾都可以制止，陛下可以从容住在京城，有什么事要起动銮驾、亲征边境呢？

臣听说，羊披上虎皮，见到青草仍十分高兴，见到豺狼就颤抖不已，忘了它披着虎皮了。如今，任用的边将不好，就像是这样。所以常言道：“就怕做事的人不明智，明智的人没机会去做。”过去，乐毅逃到赵国，心不忘燕国；廉颇在楚国，心里想着当赵国的将军。臣生于动乱时代，成长于军旅之中，又一再承蒙魏武皇帝的教导，看到统兵用兵的要领，不必取自孙子、吴起兵书却与它默契，私自在心中揣度，总是希望一旦奉旨朝觐，推开金马门，走上玉石阶，站在有职务的大臣之列，赐予短暂的时间，使臣有机会一抒心怀，排除心中的积郁，死而无憾啊！

及至鸿胪发下致士家子弟的公文，知道时限紧迫。又听说天子出行的车马已经备好，兵车疾行，陛下又要御驾亲征，花费心神了。臣确实忧虑不安，无暇安居。但愿能策马执鞭，在驾前为陛下挡住尘土露水，施行风后用兵奇术，掌握孙子、吴起兵书的要领，追忆羡慕卜商，愿像他那样在君王左右为前驱去拼命，以至殉命于车轮之下，这样做虽然没有大的用处，但希望有小小的补益。但是陛下位高处远，此情未能上达，只有独自徒然望着

青云抚心思虑，仰望高天长声叹息而已。屈平说：“国家有良马却不知道驾乘，何故惶惶然另行追求？”过去管叔、蔡叔遭流放被杀死，周公、召公作为辅佐，叔鱼受到酷刑，叔向辅助朝廷。监国大夫的罪过，臣自当领受，周、召二公的辅佐，可望求得。荣华的宗亲、显贵的家族，诸侯王之中必定有响应这种举荐的。所以《左传》说：“不是周公的亲族，不能做周公的事。”只请陛下对此稍加留意。

近代，汉朝广泛设立诸侯国，大的接连几十座城市，小的只能供养祭祀而已，不如周朝树立诸侯国，分设五等品制。像扶苏劝谏秦始皇分封诸侯，淳于越责难周青臣而主张分封，可说都是知道时世变化的。能令天下倾听注视的，是当权的人，因此，其谋略能使君主改变主意，威严能使下属畏惧。如果大豪族执政，不重视亲戚，权势所在必倚重疏远的异姓，权势丧失必定轻视亲戚。窃取齐国政权的是田氏家族而非吕姓宗亲；分裂晋国的是赵、魏而非姬姓，只请陛下明察。如果是吉则专擅其位，凶则遭其荼毒的，总是异姓的大臣。要使国家安定，祈求家族富贵，存在就共享荣耀，遭难就同受其祸的，是宗亲同族的大臣。如今反而是宗亲同族疏远而异姓大臣亲近，臣对此心下十分疑惑。

臣听说孟子讲过：‘君子困窘时就会善其身，发迹时就兼利天下。’如今，臣与陛下踩冰层，步炭火，登高山，涉深涧，冷暖干湿，休戚与共，哪能离得开陛下呢？承受不了烦闷之苦，所以拜献此表，陈抒感情。如有不合

意的地方，乞请暂且把它收藏在书馆里，不要立即焚毁抛弃，臣死之后，有些事也许值思念。如有点滴稍合陛下圣意的，乞求示知朝廷，让博通古事的士人，来举察臣表中不合情理的地方。如果这样，那么，臣的心愿就满足了。

明魏帝以嘉许的诏书答复。

那年冬天，魏明帝诏令诸位王侯于太和六年（232）正月朝会京城。这年二月，以陈国四县封曹植为陈王，食邑三千五百户。曹植每每要求明帝能另外召见，单独交谈，讨论时政，希望能幸运地得到试用，但终究不能如愿。回封地以后，惆怅绝望。当时的典章制度，对分封诸侯国已是十分严峻，官佐属吏都是市侩小子鄙下的人物，兵丁佣人都是伤残病老的，最多不超过二百人。曹植又因为过去的过失，事事都被削减一半，十一年当中三次被改换封地，总是郁郁寡欢，因此就发病逝世，终年四十一岁，他遗嘱予以薄葬。由儿子曹志作为一家之主，立他为继承人。初时，曹植登上鱼山，面对东阿，油然产生安寝于此的愿望，于是在这里建立墓地。儿子曹志继位，改封济北王。景初年间，魏明帝下诏书道：“陈思王过去虽然有过失，但已经约束自己，行为谨慎，可以弥补以前的缺陷，而且从年少到终老，不停地著述，实在难能可贵。他所收集的黄初年间弹劾曹植罪状的各种奏章，公卿们已经下达到尚书、秘书、中书三府，以及大鸿胪等部门，全部予以废除。编撰、抄录了曹植前后所著的赋、颂、诗、铭文、杂论共百余篇，收复本藏于宫廷内外。”曹志连连增加食

邑，同以前的食邑加在一起，共有九百九十户。

（林东海 译）

【原文】

陈思王植字子建。年十岁馀，诵读诗、论及辞赋数十万言，善属文。太祖尝视其文，谓植曰：“汝倩人邪？”植跪曰：“言出为论，下笔成章，顾当面试，奈何倩人？”时邳铜爵台新成，太祖悉将诸子登台，使各为赋。植援笔立成，可观，太祖甚异之。性简易，不治威仪。舆马服饰，不尚华丽。每进见难问，应声而对，特见宠爱。建安十六年，封平原侯。十九年，徙封临邛侯。太祖征孙权，使植留守邳，戒之曰：“吾昔为顿邱令，年二十三。思此时所行，无悔於今。今汝年亦二十三矣，可不勉与！”植即以才见异，而丁仪、丁廙、杨修等为之羽翼。太祖狐疑，几为太子者数矣。而植任性而行，不自雕励，饮酒不节。文帝御之以术，矫情自饰，宫人左右，并为之说，故遂定为嗣。二十二年，增植邑五千，并前万户。植尝乘车行驰道中，开司马门出。太祖大怒，公车令坐死。由是重诸侯科禁，而植宠日衰。太祖既虑终始之变，以杨修颇有才策，而又袁氏之甥也，於是以罪诛修。植益内不自安。二十四年，曹仁为关羽所围。太祖以植为南中郎将，行征虏将军，欲遣救仁，呼有所敕戒。植醉不能受命，於是悔而罢之。

文帝即王位，诛丁仪、丁廙并其男口。植与诸侯并就国。黄初二年，监国谒者灌均希指，奏“植醉酒悖慢，劫胁使者”。有司请治罪，帝以太后故，贬爵安乡侯。其年改封鄴城侯。三年，立为鄴城王，邑二千五百户。

四年，徙封雍丘王。其年，朝京都。上疏曰：

臣自抱衅归藩，刻肌刻骨，追思罪戾，昼分而食，夜分而寝。诚以天网不可重离，圣恩难可再恃。窃感相鼠之篇，无礼遄死之义，形影相吊，五情愧赧。以罪弃生，则违古贤“夕改”之劝，忍活苟全，则犯诗人“胡颜”之讥。伏惟陛下德象天地，恩隆父母，施畅春风，泽如时雨。是以不别荆棘者，庆云之惠也；七子均养者，尸鸠之仁也；舍罪责功者，明君之举也；矜愚爱能者，慈父之恩也：是以愚臣徘徊於恩泽而不能自弃者也。

前奉诏书，臣等绝朝，心离志绝，自分黄考无复执珪之望。不图圣诏猥垂齿召，至止之日，驰心辇毂。僻处西馆，未奉阙廷，踊跃之怀，瞻望反仄。谨拜表献诗二篇，其辞曰：“於穆显考，时惟武皇，受命于天，宁济四方。朱旗所拂，九土披攘，玄化滂流，荒服来王。超商越周，与唐比踪。笃生我皇，奕世再聪，武则肃烈，文则时雍，受禅炎汉，临君万邦。万邦即化，率由旧则；广命懿亲，以藩王国。帝曰尔侯，君兹青土，奄有海滨，方周于鲁，车服有辉，旗章有叙，济济隽义，我弼我辅。伊予小子，恃宠骄盈，举挂时网，动乱国经。作藩作屏，先轨是坠，傲我皇使，犯我朝仪。国有典刑，我削我绌，将寘于理，元凶是率。明明天子，时笃同类，不忍我刑，暴之朝肆，违彼执宪，哀予小子。改封充邑，于河之滨，股肱弗置，有君无臣，荒淫之阙，谁弼予身？茕茕仆夫，于彼冀方，嗟予小子，乃罹斯殃。赫赫天子，恩不遗物，冠我玄冕，要我朱紱。朱紱光大，使我荣华，剖符授玉，王爵是加。仰齿金玺，俯执圣策，皇恩过隆，祇承怵惕。咨

我小子，顽凶是婴，逝惭陵墓，存愧阙廷。匪敢傲德，实恩是恃，威灵改加，足以没齿。昊天罔极，性命不图，常惧颠沛，抱罪黄垆。愿蒙矢石，建旗东岳，庶立豪牦，微功自赎。危躯授命，知足免戾，甘赴江、湘，奋戈吴、越。天启其衷，得会京畿，迟奉圣颜，如渴如饥。心之云慕，怆矣其悲，天高听卑，皇肯照微！”又曰：“肃承明诏，应会皇都，星陈凤驾，秣马脂车。命彼掌徒，肃我征旅，朝发鸾台，夕宿兰渚。芒芒原隰，祁祁士女，经彼公田，乐我稷黍。爰有螟木，重阴匪息；虽有糗粮，饥不遑食。望城不过，面邑匪游，仆夫警策，平路是由。玄駟蔼蔼，扬鑣漂沫；流风翼衡，轻云承盖。涉涧之滨，缘山之隈，遵彼河浒，黄阪是阶。西济关谷，或降或升；骅骝倦路，再寝再兴。将朝圣皇，匪敢晏宁；弭节长骛，指日遄征。前驱举燧，后乘抗旌；轮不辍运，鸾无废声。爰暨帝室，税此西墉；嘉诏未赐，朝觐莫从，仰瞻城阙，俯惟阙廷；长怀永慕，忧心始醒。”

帝嘉其辞义，优诏答勉之。

六年，帝东征，还过雍丘，幸植宫，增户五百。太和元年，徙封浚仪。二年复还雍丘。植常自愤怨，抱利器而无所施，上疏求自试曰：

臣闻士之生世，入则事父，出则事君；事父尚於荣亲，事君贵於兴国。故慈父不能爱无益之子，仁君不能畜无用之臣。夫论德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量能而受爵者，毕命之臣也。故君无虚授，臣无虚受；虚授谓之谬举，虚受谓之尸禄，诗之“素餐所由作也。昔二虢不

辞两国之任，其德厚也，旦，埏不让燕，鲁之封，其功大也。今臣蒙国重恩，三世于今矣。正值陛下升平之际，沐浴圣泽，潜润德教，可谓厚幸矣。而窃位东藩，爵在上列，身被轻暖，口厌百味，目极华靡，耳倦丝竹者，爵重禄厚之所致也。退念古之授爵禄者，有异於此，皆以功勤济国，辅主惠民。今臣无德可述，无功可纪，若此终年无益国朝，将挂风人“彼己”之讥。是以上惭玄冕，俯愧朱绂。

方今天下一统，九州晏如，而顾西有违命之蜀，东有不臣之吴，使边境未得脱甲，谋士未得高枕者，诚欲混同宇内以致太和也。故启灭有扈而夏功昭，成克商、奄而周德著。今陛下以圣明统世，将欲卒文、武之功，继成、康之隆，简贤授能，以方叔、召虎之臣镇御四境，为国爪牙者，可谓当矣。然而高鸟未挂於轻缴，渊鱼未县於钩饵者，恐钓射之术或未尽也。昔耿弇不俟光武，亟击张步，言不以贼遗於君父。故车右伏剑於鸣毂，雍门刎首於齐境，若此二士，岂恶生而尚死哉？诚忿其慢主而陵君也。夫君之宠臣，欲以除患兴利；臣之事君，必以杀身靖乱，以功报主也。昔贾谊弱冠，求试属国，请系单于之颈而制其命；终军以妙年使越，欲得长纓纓其王，羈致北阙。此二臣，岂好为夸主而耀世哉？志成郁结，欲逞其才力，输能於明君也。昔汉武为霍去病治第，辞曰：“匈奴未灭，臣无以家为！”固夫忧国忘家，捐躯济难，忠臣之志也。今臣居外，非不厚也，而寝不安席，食不遑味者，伏以二方未克为念。

伏见先武皇帝武臣宿将，年耆即世者有闻矣。虽贤不乏世，宿将旧卒，犹习战阵、窃不自量，志在效命，庶立毛发之功，以报所受之恩。若使陛下出不世之诏，效臣锥刀之用，使得西属大将军，当一校之队，若东属大司马，统偏舟之任，必乘危蹈险，骋舟奋骊，突刃触锋，为士卒先。虽未能禽权馘亮，庶将虏其雄率，歼其丑类，必效须臾之捷，以灭终身之愧，使名挂史笔，事列朝策。虽身分蜀境，首县吴阙，犹生之年也。如微才弗试，没世无闻，徒荣其躯而丰其体，生无益於事，死无损於数，虚荷上位而忝重禄，禽息鸟视，终於白首，此徒圈牢之养物，非臣之所志也。流闻东军失备，师徒小衄，辍食弃餐，奋袂攘衽，抚剑东顾，而心已驰於吴会矣。

臣昔从先武皇帝南极赤岸，东临沧海，西望玉门，北出玄塞，伏见所以行军用兵之势，可谓神妙矣。故兵者不可豫言，临难而制变者也。志欲自效於明时，立功於圣世。每览史籍，观古忠臣义士，出一朝之命，以徇国家之难，身虽屠裂，而功铭著於鼎钟，名称垂於竹帛，未尝不拊心而叹息也。臣闻明主使臣，不废有罪。故奔北败军之将用，秦、鲁以成其功；绝纓盗马之臣赦，楚、赵以济其难。臣窃感先帝早崩，威王弃世，臣独何人，以堪长久！常恐先朝露，填沟壑，坟土未乾，而身名并灭。臣闻骐驎长鸣，则伯乐照其能；卢狗悲号，则韩国知其才。是以效之齐、楚之路，以逞千里之任；试之狡兔之捷，以验搏噬之用。今臣志狗马之微功，窃自惟度，终无伯乐、韩国之举，是以於邑而窃自痛者也。

夫临博而企竦，闻乐而窃抃者，或有赏音而识道也。昔毛遂，赵之陪隶，犹假锥囊之喻，以寤主立功，何况巍巍大魏多士之朝，而无慷慨死难之臣乎！夫自炫自媒者，士女之丑行也。干时求进者，道家之明忌也。而臣敢陈闻於陛下者，诚与国分形同气，忧患共之者也。冀以尘雾之微补益山海，荧烛末光增辉日月，是以敢冒其丑而献其忠。

三年，徙封东阿。五年，复上疏求存问亲戚，因致其意曰：

臣闻天称其高者，以无不覆；地称其广者，以无不载；日月称其明者，以无不照；江海称其大者，以无不容。故孔子曰：“大哉尧之为君！惟天为大，惟尧则之。”夫天德之於万物，可谓弘广矣。盖尧之为教，先亲后疏，自近及远。其传曰：“克明峻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及周之文王亦崇厥化，其诗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是以雍雍穆穆，风人咏之。昔周公吊管、蔡之不咸，广封懿亲以藩屏王室，传曰：“周之宗盟，异姓为后。”诚骨肉之恩爽而不离，亲亲之义实在敦固，未有义而后其君，仁而遗其亲者也。

伏惟陛下资帝唐钦明之德，体文王翼翼之仁，惠洽椒房，恩昭九族，群后百寮，番休递上，执政不废於公朝，下情得展於私室，亲理之路通，庆吊之情展，诚可谓恕己治人，推惠施恩者矣。至於臣者，人道绝绪，禁锢明时，臣窃自伤也。不敢过望交气类，修人事，叙人伦。近且婚媾不通，兄弟乖绝，吉凶之问塞，庆吊之礼

废，恩纪之违，甚於路人，隔阂之异，殊於胡越。今臣以一切之制，永无朝覲之望，至于注心皇极，结情紫闼，神明知之矣。然天实为之，谓之何哉！退惟诸王常有戚戚具尔之心，愿陛下沛然垂诏，使诸国庆问、四节得展，以叙骨肉之欢恩，全怡怡之笃义。妃妾之家，膏沐之遗，岁得再通，齐义於贵宗，等惠於百司，如此，则古人之所叹，风雅之所咏，复存於圣世矣。

臣伏自惟省，无锥刀之用。及观陛下之所拔授，若以臣为异姓，窃自料度，不后於朝士矣。若得辞远游，戴武弁，解朱组，佩青绂，驸马、奉车，趣得一号，安宅京室，执鞭珥笔，出从华盖，入侍辇毂，承答圣问，拾遗左右，乃臣丹诚之至愿，不离於梦想者也。远慕鹿鸣君臣之宴，中咏常棣匪他之诚，下思伐木友生之义，终怀蓼莪罔极之哀；每四节之会，块然独处，左右惟仆隶，所对惟妻子，高谈无所与陈，发义无所兴展，未尝不闻乐而拊心，临觴而叹息也。臣伏以为犬马之诚不能动人，譬人之诚不能动天。崩城、陨霜，臣初信之，以臣心况，徒虚语耳。若葵藿之倾叶，太阳虽不为之回光，然向之者诚也。窃自比於葵藿，若降天地之施，垂三光之明者，实在陛下。

臣闻文子曰：“不为福始，不为祸先。”今之否隔，友于同忧，而臣独倡言者，窃不愿於圣世使有不蒙施之物。有不蒙施之物，必有惨毒之怀，故《柏舟》有“天只”之怨，《谷风》有“弃予”之叹。故伊尹耻其君不为尧舜，孟子曰：“不以舜之所以事尧事其君者，不敬其君者也。”

臣之愚蔽，固非虞、伊，至於欲使陛下崇光被时雍之美，宣缉熙章明之德者，是臣悽悽之诚，窃所独守，实怀鹤立企伫之心。敢复陈闻者，冀陛下倘发天聪而垂神听也。

诏报曰：“盖教化所由，各有隆弊，非皆善始而恶终也，事使之然。故夫忠厚仁及草木，则《行苇》之诗作；恩泽衰薄，不亲九族，则角弓之章刺。今令诸国兄弟，情理简怠，妃妾之家，膏沐疏略，朕纵不能敦而睦之，王援古喻义备悉矣，何言精诚不足以感通哉？夫明贵贱，崇亲亲，礼贤良，顺少长，国之纲纪，本无禁固诸国通问之诏也，矫枉过正，下吏惧谴，以至於此耳。已敕有司，如王所诉。”

植复上疏陈审举之义，曰：

臣闻天地协气而万物生，君臣合德而庶政成；五帝之世非皆智，三季之末非皆愚，用与不用，知与不知也。即时有举贤之名，而无得贤之实，必各援其类而进矣。谚曰：“相门有相，将门有将。”夫相者，文德昭者也；将者，武功烈者也。文德昭，则可以匡国朝，致雍熙，稷、契、夔、龙是也；武功烈，则所以征不庭，威四夷，南仲、方叔是矣。昔伊尹之为媵臣，至贱也，吕尚之处屠钓，至陋也，及其见举於武汤、周文，诚道合志同，玄谟神通，岂复假近习之荐，因左右之介哉。书曰：“有不世之君，必能用不世之臣；用不世之臣，必能立不世之功。”殷周二王是矣。若夫龊龊近步，遵常守故，安足为陛下言哉？故阴阳不和，三光不畅，官旷无人，庶政不整者，三司之责也。疆场骚动，方隅内侵，没军丧众，干戈不息者，边将之忧也。岂可虚荷国宠而不称其任哉？故

任益隆者负益重，位益高者责益深，书称“无旷庶官”，诗有“职思其忧”，此其义也。

陛下体天真之淑圣，登神机以继统，冀闻康哉之歌，偃武行文之美。而数年以来，水旱不时，民困衣食，师徒之发，岁岁增调，加东有覆败之军，西有殒没之将，至使蚌蛤浮翔於淮、泗，鱗鼬谨讐於林木。臣每念之，未尝不辍食而挥餐，临觴而扼腕矣。昔汉之发代，疑朝有变，宋昌曰：“内有朱虚、东牟之亲，外有齐、楚、淮南、琅邪，此则磐石之宗，愿王勿疑。”臣伏惟陛下远览姬文二虢之援，中虑周成召、毕之辅，下存宋昌磐石之固。昔骐驎之於吴阪，可谓困矣，及其伯乐相之，孙邨御之，形体不劳而坐取千里。盖伯乐善御马，明君善御臣；伯乐驰千里，明君致太平；诚任贤使能之明效也。若朝司惟良，万机内理，武将行师，方难克弭。陛下可得雍容都城，何事劳动銮驾，暴露於边境哉？

臣闻羊质虎皮，见草则悦，见豺则战，忘其皮之虎也。今置将不良，有似於此。故语曰：“患为之者不知，知之者不得为也。”昔乐毅奔赵，心不忘燕；廉颇在楚，思为赵将。臣生乎乱，长乎军，又数承教于武皇帝，伏见行师用兵之要，不必取孙、吴而暗与之合。窃揆之於心，常愿得一奉朝覲，排金门，蹈玉陛，列有职之臣，赐须臾之问，使臣得一散所怀，摅舒蕴积，死不恨矣。

被鸿胪所下发土息书，期会甚急。又闻豹尾已建，戎轩鹜驾，陛下将复劳玉躬，扰挂神思。臣诚竦息，不遑宁处。愿得策马执鞭，首当尘露，撮风后之奇，接孙、吴

之要，追慕卜商起予左右，效命先驱，毕命轮轂，虽无大益，冀有小补。然天高听远，情不上通，徒独望青云而拊心，仰高天而叹息耳。屈平曰：“国有骥而不知乘，焉皇皇而更索！”昔管、蔡放诛，周，召依弼；叔鱼陷刑，叔向匡国。三监之衅，臣自当之；二南之辅，求必不远。华宗贵族，藩王之中，必有应斯举者。故传曰：“无周公之亲，不得行周公之事。”唯陛下少留意焉。

近者汉氏广建藩王，丰则连城数十，约则飧食祖祭而已，未若姬周之树国，五等之品制也。若扶苏之谏始皇，淳于越之难周青臣，可谓知时变矣，夫能使天下倾耳注目者当权者是矣，故谋能移主，威能慑下，豪右执政，不在亲戚；权之所在，虽疏必重，势之所去，虽亲必轻，盖取齐者田族，非吕宗也。分晋者赵、魏，非姬姓也。惟陛下察之。苟吉专其位，凶离其患者，异姓之臣也。欲国之安，祈家之贵，存共其荣，没同其祸者，公族之臣也。今反公族疏而异姓亲，臣窃惑焉。

臣闻孟子曰：“君子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今臣与陛下践冰履炭，登山浮涧，寒温燥湿，高下共之，岂得离陛下哉？不胜愤懣，拜表陈情。若有不合，乞且藏之书府，不便灭弃，臣死之后，事或可思。若有豪厘少挂圣意者，乞出之朝堂，使夫博古之士，纠臣表之不合义者。如是，则臣愿足矣。

帝辄优文答报。

其年冬，诏诸王朝六年正月。其二月，以陈四县封植为陈王，邑三千五百户。植每欲求别见独谈，论及时政，幸冀

试用，终不能得。既还，怅然绝望。时法制，待藩国既自峻迫，寮属皆贾竖下才，兵人给其残老，大数不过二百人。又植以前过，事事复减半，十一年中而三徙都，常汲汲无欢，遂发疾薨，时年四十一。遗令薄葬。以小子志，保家之主也，欲立之。初，植登鱼山，临东阿，喟然有终焉之心，遂营为墓。子志嗣，徙封济北王。景初中诏曰：“陈思王昔虽有过失，既克己慎行，以补前阙，且自少至终，篇籍不离於手，诚难能也。其收黄初中诸奏植罪状，公卿已下议尚书、中书、秘书三府、大鸿胪者皆削除之。撰录植前后所著赋颂诗铭杂论凡百馀篇，副藏内外。”志累增邑，并前九百九十户。

阮籍传

——《晋书》卷四九

【说明】阮籍（210～263），三国时魏文学家、思想家。字嗣宗，陈留尉氏（今属河南）人。“建安七子”之一阮瑀之子，与嵇康、向秀等七人齐名，并称“竹林七贤”。曾为散骑常侍、步兵校尉。

阮籍崇奉老庄，精通玄学，曾作《通老论》、《达庄论》等文。其诗长于五言代表作《咏怀诗》八十二首，表现嗟生忧时，苦闷徬徨的心情，风格浑朴，多用比兴，对后世影响极大。又工文，有《大人先生传》等名篇传世。后人辑有《阮嗣宗集》。

阮籍，字嗣宗，陈留（今河南开封东南）尉氏（今河南中部）人。父亲阮瑀，做过魏朝丞相曹操的僚属，在当时社会上颇有名气。阮籍的相貌奇伟出众，志气宏达豪放，有着独特的傲岸性格，他凭个性行事而不受拘束，心里感到高兴或恼怒时，从来不在脸色上表露出来。有时闭门读书，几个月也不出家门；有时登山玩水，好几天都忘记了回家。他博览群书，尤其喜爱《庄子》、《老子》。好饮酒，能长啸又善于

弹琴。当他得意的时候，总感到飘飘悠悠而忘记了自己形体的存在。当时多数人说他癫狂，只有他堂兄阮文业常常赞叹佩服他，认为阮籍胜过自己，由于阮文业的赞扬，大家才都称颂阮籍的奇特。

阮籍曾经跟随他叔父到东郡（今河南濮阳西南），兖州（今属山东）刺史王昶请求与阮籍与他会面，阮籍却整天不开口说一句话，王昶感到阮籍这个人令人难以揣摩。太尉蒋济听说阮籍才智出众而征召他，阮籍前往亭长府内给蒋济写一份奏章，说：“卑下俯伏上言，贤明的太尉，您以纯净的涵养美德，处于辅助国君的高级地位，使英雄豪杰翘首，让后士贤人跼脚。正当成立官署选拔官吏之日，人人都想自己能充任您的僚属，您的征召文书刚刚下达，我这个卑下走卒竟名列前茅。过去，子夏住在西河（今黄河与北洛河之间）为请子夏到魏国做官，魏国国君文侯亲自抱扫帚为他清道；邹子住在黍谷（今河北密云西南），为请邹衍到燕国当导师，燕国国君昭王自己陪站在邹子车子的右厢。这些人衣带粗陋，深居简出，孤清独立，王公大人之师对他们礼贤下士，是因为他们身上存在着美德韬略，现在，阮籍并没有邹衍、子夏的美德韬略，有的是浅薄粗陋，卑下有辱于您的选拔，实在难以担当。我刚要到高朗朝阳的田野去耕耘种作，以缴纳国家的钱粮税收。况且我身患疾病，足力不强，不能为您奔走效劳。任命我为官属的召令，是我所不能承受的。乞求您收回对我的错误的恩赐，以便使这次明正的举荐选拔更闪耀光辉。”征召初时，蒋济唯恐阮籍不来，接到了阮籍的奏章，真是高兴，便派差役去迎接阮籍，但阮籍却已经离去，蒋济非

常气恼。因此，乡亲都来劝告阮籍，阮籍接受官职。后来，阮籍又托病返乡。及后，阮籍又做了尚书郎。不久，又托病辞职。到了曹爽辅助朝政时，阮籍又被召为参军。阮籍还是以病推辞，而隐居于乡间。过了一年多，曹爽被杀，当时人们都钦佩阮籍有远见。宣帝司马懿作太傅时，阮籍被任命为从事中郎，到了司马懿驾崩后，阮籍又做了景帝司马师大将军的从事中郎。被封为高贵乡公的曹髦做皇帝时，阮籍被封为关内侯，后调任为散骑常侍。

阮籍本来就有匡时救世的志向。但他处于魏晋交替之时，当时天下多事，凡知名之士很少有好结果的，阮籍因而不干预世事，便时常开怀畅饮。文帝司马昭起初要为他儿子武帝司马炎请求阮籍联姻，而阮籍大醉六十日，使司马昭没有开口的机会而只好作罢。钟会数次问阮籍关于时事问题，企图根据阮籍是赞成还是反对来加给阮籍的罪名，但阮籍都饮得酩酊大醉，从而避免了遭受陷害。到了文帝司马昭辅助朝政时，阮籍曾经从容地对文帝说：“我平时曾经游览过东平（今属山东），喜欢那里的风俗习惯和地理环境。”文帝非常高兴，马上任命阮籍为东平相。阮籍骑着驴子到了东平郡，拆毁了东平相府舍衙门的围墙和影壁，使内外可以相望，并且精简了法令，过了十天，他便回乡了。文帝司马昭又举荐阮籍为大将军的从事中郎。管事的官吏谈到有一个做儿子的杀死了母亲的事，阮籍说：“哎！杀死父亲还可以，竟到了杀死母亲！”在座的人都怪他失言。文帝司马昭说：“杀死父亲是天下的极端罪恶，怎么认为可以呢？”阮籍说：“禽兽知道母亲而不知道父亲。人杀了父亲，类似禽兽，杀死母亲，就连

禽兽都不如了。”于是，大家都心悦诚服。

阮籍听说步兵兵营的厨师善于酿酒，并存有三百斛酒，他便请求去当步兵校尉。他把事务弃置不管，虽然辞去从事中郎，但还经常游乐于大将军的府内，每有朝堂宴会他也必定参加。文帝司马昭一再谦让帝王赐给他的九种器物，朝廷大臣劝司马昭进晋公位，接受赐予的九件器物，并指使阮籍为他们写劝进文。阮籍喝得大醉，忘记了写劝进文，大臣临到大将军府内时，才派使者去取劝进文，使者见到阮籍正靠着几案醉醺醺的，告诉阮籍来意后，阮籍便在几案上划字，让使者誊抄，文章竟没有一处改动过。文辞很清丽豪壮，为当时人们所赞赏。

阮籍虽然不受礼教的拘束，但是言语玄妙、悠远，说话不轻易褒贬人家。他非常孝顺，母亲逝世时，他正和人家下围棋，对方要求停止，阮籍却留下来与对方决战，赌个输赢。继之便喝了两斗酒，放声大哭，还吐了好几升血。母亲将要下葬时，他又吃了一块蒸猪腿，喝了二斗酒，然后靠近棺木与母亲遗体告别，这时连说话的气力也没有了。他再次放声大哭，因此又吐了好几升血，他因悲哀而消瘦，显得瘦骨嶙峋，以致几乎要死去。裴楷前往吊唁，阮籍披散着头发，伸开两脚，手按膝坐着，喝醉了直愣愣地看人，裴楷吊完唁便离去了。有的人问裴楷：“凡是吊唁，主人都得先哀哭，客人才因礼俗而哭拜。阮籍既然不哭，你为什么要哭呢？”裴楷说：“阮籍既然是超乎礼俗之外的人，当然不崇尚礼教法典；我是世俗中的人，所以自己要顺着礼仪之事。”当时的人都赞叹他们俩都做得很得体。阮籍又会用黑眼珠或眼白看人，看到拘

泥于礼俗的人，他用白眼对待。嵇喜前来吊唁时，阮籍翻白眼怒视，嵇喜很不高兴地走了。嵇喜的弟弟嵇康听说，便带酒挟琴来访，阮籍十分高兴，才露出黑眼珠来。因此，尊崇礼法的人都憎恨阮籍如同仇敌，可是文帝司马昭却每每保护阮籍。

阮籍的嫂子曾经回娘家省亲，阮籍和他嫂子见面并与她告别，有的人就讥笑阮籍，阮籍却说：“礼法难道 是为我制定的吧？”邻居有一个颇具姿色的青年妇女，坐在酒垆旁边卖酒。阮籍曾经去买酒喝，喝醉了便躺在那个青年妇女旁边。阮籍自己不避嫌，那个青年妇女的丈夫审视阮籍，也没有怀疑。一户军人的家里有一个既有才学又有姿色的女子，还没出嫁就死了。阮籍并不认识这个女子的父兄，却径自去哭灵，尽了哀悼才返回。阮籍外表坦荡而内心纯净，一向如此。阮籍时常随意驾车独行，他不顺着道路走，直到车子到了尽头无法走了，才痛哭而归。阮籍还曾经登临广武山，观览楚汉对峙时的战场，他感慨地说：“那时，没有真正的英雄，才使刘邦那小子成了名！”阮籍又登临武牢山，观望洛阳都城而发出感叹，于是写了《豪杰诗》。景元四年（263）冬天，阮籍死了，终年五十四岁。

阮籍善于写文章，下笔一点也不经心，他写了《咏怀诗》八十多首，为世间所珍重。作《达庄论》，叙述顺应自然，不求有所作为的可贵。他的文章多半没有存录。

阮籍曾经在苏门山遇见隐士孙登，他和孙登商讨古代开天辟地之理和修身养性练气之术，孙登一概不应答，于是阮籍长啸一声离开了。走到半山腰，听到一种好像凤凰鸣叫的

声音回响于山谷之中，原来是孙登长啸声。阮籍回来后就写了《大人先生传》，文章简要地写道：“世上的人所说的君子，一心只奉行礼法，一心以礼制约束自己；手里拿着圭璧，脚顺着绳墨走路；行为要成为当今的榜样，言语要成为后世的准则。青年时要称誉于乡里，成长后要闻名于都城。向上谋图充当朝廷大臣，往下企望不失去州府的最高官衔。难道没有见过成群的虱子聚集于裤子里吗？它们逃钻于深缝里，躲藏于破绵絮中，还自以为那是吉利的住宅。爬行得不敢离开缝隙，走动不敢离开裤裆，还自以为那里遵循行为准则哩！但是当热带的气浪灼热如火地袭来时，都市全被烤焦，成群的虱子只能处于裤子里头而出不了。正人君子居于世间，与虱子藏匿于裤子里又有什么不同呢？”这也就是阮籍的胸襟志趣。

阮籍的儿子阮浑，字长成，有他父亲的作风。青少年时喜欢放荡旷达，不拘小节。阮籍却说：“你堂兄仲容已经加入我们这一帮子了，你不能再这样了。”太康年间，阮浑当上了太子庶子。

【原文】

（倪木兴 译）

阮籍字嗣宗，陈留尉氏人也。父瑀，魏丞相掾，知名於世。籍容貌瑰杰，志气宏放，傲然独得，任性不羁，而喜怒不形於色。或闭户视书，累月不出，或登临山水，经日忘归。博览群籍，尤好庄老。嗜酒能啸，善弹琴。当其得意，忽忘形骸。时人多谓之痴，惟族兄文业每叹服之，以为胜己，由是咸共称异。

籍尝随叔父至东郡，兖州刺史王昶请与相见，终日不开

一言，自以不能测。太尉蒋济闻其有隼才而辟之，籍请都亭奏记曰：“伏惟明公以含一之德，据上台之位，英豪翹首，俊贤抗足。开府之日，人人自以为掾属；辟书始下，而下走为首。昔子夏在於西河之上，而文侯拥彥；邹子处於黍谷之阴，而昭王陪乘。夫布衣韦带之士，孤居特立，王公大人所以礼下之者，为道存也。今籍无邹卜之道，而有其陋，猥见采择，无以称当。方将耕於东皋之阳，输黍稷之馀税。负薪疲病，足力不强，补吏之召，非所克堪。乞回谬恩，以光请举。”初，济恐籍不至，得记欣然。遣卒迎之，而籍已去，济大怒，於是乡亲共喻之，乃就吏。后谢病归。复为尚书郎，少时，又以病免。及曹爽辅政，召为参军。籍因以疾辞，屏於田里。岁馀而爽诛，时人服其远见。宣帝为太傅，命籍为从事中郎。及帝崩，复为景帝大司马从事中郎。高贵乡公即位，封关内侯，从散骑常侍。

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文帝初欲为武帝求婚於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钟会数以时事问之，欲因其可否而致之罪，皆以酣醉获免。及文帝辅政，籍尝从容言於帝曰：“籍平生曾游东平，乐其风土。”帝大悦，即拜东平相。籍乘驴到郡，坏府舍屏鄣，使内外相望，法令清简，旬日而还。帝引为大将军从事中郎。有司言有子杀母者，籍曰：“嘻！杀父乃可，至杀母乎！”坐者怪其失言。帝曰：“杀父，天下之极恶，而以为可乎？”籍曰：“禽兽知母而不知父，杀父，禽兽之类也。杀母，禽兽之不若。”众乃悦服。

籍闻步兵厨营人善酿，有贮酒三百斛，乃求为步兵校尉。

遗落世事，虽去佐职，恒游府内，朝宴必与焉。会帝让九锡，公卿将劝进，使籍为其辞。籍沈醉忘作，临诣府，使取之，见籍方据案醉眠。使者以告，籍便书案，使写之，无所改窜。辞甚清壮，为时所重。

籍虽不拘礼教，然发言玄远，口不臧否人物。性至孝，母终，正与人围棋，对者求止，籍留与决赌。既而饮酒二斗，举声一号，吐血数升。及将葬，食一蒸肫，饮二斗酒，然后临诀，直言穷矣，举声一号，因又吐血数升。毁瘠骨立，殆致灭性。裴楷往吊之，籍散发箕踞，醉而直视，楷吊嘤毕便去。或问楷：“凡吊者，主哭，客乃为礼。籍既不哭，君何为哭？”楷曰：阮籍既方外之士，故不崇礼典。我俗中之士，故以轨仪自居。”时人叹为两得。籍又能为青白眼，见礼俗之士，以白眼对之。及嵇喜来吊，籍作白眼，喜不悵而退。喜弟康闻之，乃赍酒挟琴造焉，籍大悦，乃见青眼。由是礼法之士疾之若仇，而帝每保护之。

籍嫂尝归宁，籍相见与别。或讥之，籍曰：“礼岂为我设邪！”邻家少妇有美色，当垆沽酒。籍尝诣饮，醉，便卧其侧。籍既不自嫌，其夫察之，亦不疑也。兵家女有才色，未嫁而死。籍不识其父兄，径往哭之，尽哀而还。其外坦荡而内淳至，皆此类也。时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恸哭而反。尝登广武，观楚汉战场，叹曰：“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登武牢山，望京邑而叹，於是赋《豪杰诗》。景元四年冬卒，时年五十四。

籍能属文，初不留思。作《咏怀诗》八十馀篇，为世所重。著《达庄论》，叙无为之贵。文多不录。

籍曾於苏门山遇孙登，与商略终古及栖神导气之术，登皆不应，籍因长啸而退。至半岭，闻有声若鸾凤之音，响乎岩谷，乃登之啸也。遂归著《大人先生传》，其略曰：“世人所谓君子，惟法是修，惟礼是克。手执圭璧，足履绳墨。行欲为目前检，言欲为无穷则。少称乡党，长闻邻国。上欲图三公，下不失九州牧。独不见群虱之处裨中，逃乎深缝，匿乎坏絮，自以为吉宅也。行不敢离缝际，动不敢出裨裆，自以为绳墨也。然炎丘火流，焦邑灭都，群虱处於裨中而不能出也。君子之处域内，何异夫虱之处裨中乎！”此亦籍之胸怀志趣也。

子浑，字长成，有父风。少慕通达，不饰小节。籍谓曰：“仲容已豫吾此流，汝不得复尔！”太康中，为太子庶子。

潘岳传

——《晋书》卷五五

【说明】潘岳（247—300），西晋文学家，字安仁，荥阳中牟（今属河南）人。曾任河阳令、著作郎、给事黄门侍郎等职。方事权贵，后为赵王司马伦和孙秀所杀。

潘岳与陆机齐名，长于诗赋，善缀辞令，造语工整，体现了太康文学讲究形式美的倾向。《悼亡诗》三首是其代表作。诗赋之外，他还“善为哀诔之文”，今存祭文、铭、诔等二十余篇，辞婉情切，哀痛感人。明人张溥辑有《潘黄门集》。

潘岳，字安仁，荥阳中牟（今属河南）人。祖父潘瑾，任过安平（今山东益都）太守。父亲潘芄，曾任琅邪（今山东临沂）内史。潘岳年少就以才华聪颖闻名，乡里称他为奇童，说是与终军、贾谊一样的人才。早年就被征召到司空太尉府，选用为秀才。

泰始年间（265—274），晋武帝亲自耕种农田，以奉祀宗庙，潘岳作赋赞美此事，写道：

晋朝泰始四年（268）正月，皇帝亲自带领诸位皇后、妃子坐在千亩田畴的郊野上，这是大祀。于是，便命掌

管田高职责的官员清理千里地面，掌管达国道路的野庐氏扫清道路，掌管典守封疆官员设立社坛行宫，管理房舍，建立阻挡行人的障碍。青色的台坛，如山岳耸立；绿色的帷幕，似黑云密布。构筑社坛，建立了牢固的基础，宽广的石阶辟开了四方的道路。丰美的原野有着肥沃的土地，富饶的土地坦荡犹如砥石。清澈的洛河、浑浊的沟渠，引来了流水，激起了浪花。远方的道路如绳一般笔直，近处的道路也像弓箭一样。青绿的犍牛驾着青色的车輶，天青的车辕连着黑色的耒耜。恭谨严肃地候驾于民房左右，等待着万乘之尊亲自到来。文武百官先行抵达，位次的先后以职务大小分列，自上而下都是朝廷大臣。穿着青色的套服，繁华盛美，迎接天子游车，车马辚辚鸣响。微风吹拂着轻飘的车幔，红色的车轮扬起细微的尘埃。手捧玉璋严肃地排列在石阶上，望见皇帝的车驾深感肃穆惶恐，如浓重的露水被太阳晒干一样敬畏，似天上的星星拱卫北极星一样肃穆。

接着，前导富丽堂皇，从车如鱼鳞一般密布。天门如洞敞开，笔直的道路上四马之乘并行，常伯陪着车乘，太仆乎执马辔。后宫嫔妃献上穉稷种子，司农大臣手持播种栽植的工具，挈壶氏掌握着祭山祭水的礼节，宫中之长负责门卫和清道的责任。天子乘坐玉辇，遮盖在华盖下面，“冲牙”佩玉触碰，铮铮有声，轻纱细绢飘拂，悉索作响。“金根”车驾明亮耀眼，千里龙驹摇首奔腾，青绢白纱东西飘荡。金黄的光华当空辉耀，彩色的飘带华丽绵簇，五路的銮铃高声鸣响，九种旗帜扬起垂旒。雪

亮的长戟如花蕊密集，云罕车似昏暗的云气，箫声、管声杂交错，大鼓、小鼓震耳欲聋，钟磬高耸飞架，宏亮的钟声震彻域外。声响宏大，车马众多，尘雾漫天，因为皇帝驾临亲身耕田奉祀宗庙，蝉绸皇冠光芒闪烁，碧玉色泽浓绿欲滴，好象夜光之璧出于荆山璞石，如同繁茂之松依倚高山之巅。

接着，我皇走下灵坛，手抚御用耜具，举足走进场圃，长纆绳执在手中。君王推了三次便放下，最后全由农民耕完。贵人与平民以地位高低依次耕田，有的推五次，有的推九次。此时，住处不分都城、小邑，人不论华夏、外族，成人、小孩纷纷聚集，士人、妇女相杂而至。穿着粗衣，挽起后裾，重发束髻，接踵擦肩，拉衣连袖，黄色的尘埃四处扬起，太阳的光芒受到遮蔽。人们喜形于色，开口赞颂无不鼓掌舞蹈于大路上，讴歌吟颂这圣明之世。情绪欣喜，勉力劳作，一心想着尽力耕植。无人督促，常自勤劳，不征税收自加勉励。皇上率先躬耕，百姓喜受驱遣，岂需严刑峻法加以约束？

有乡邑老农上前赞颂道：“收成增减听凭天时，道理自有常规，上以下作为基础，人以日食为天，摆正细末的人也能端正根本，善待未来的人也能谨慎对待过去。九州事务不承担，士农工商业务不专一，民间有菜色饥民，朝廷没有厚禄者愿意代耕，没有防备天灾的储存，空望年年可以自足，夏、商、周的衰弱，全是这种情况。如今，圣上早晨行大明之道，夜间警惕担心，丰裕时考虑到匮乏，安逸时防止贫乏，实在值得钦敬呀！只有五谷

最使他忧虑。展开春秋夏弘大的农务，使仓廩五谷充盈流溢。实在是唐尧、成汤的用心，防备应急的重要手段。”至于祖庙祭祀之事，祝祷择日，祭器中的黍稷，便是这栽植的果实，祭祀缩酒，也来自这庄稼。黍稷馨香四溢，美酒嘉粟。正合时序和谐，年成丰登，是神仙降予的吉利。古人说：“圣人的品德，没在超过孝的了！”孝是自然的本性，人由此成为善的东西。过去，贤明的君王以孝来治理天下，对这加以继承的，太少了！及至我皇天晋朝，确实发扬光大这条道义，作为法式为万国所信服，对于祖上极尽敬爱之心。所以，皇上躬亲稼穡以供奉祭祀的谷物，是以它来巩固基础的。有了基础又行孝道，盛美的品德、宏伟的基业便到极致了！这是第一件事。基业、孝道这两桩美事全具备了，不也传之遥远吗？不也十分重大吗？冒昧作颂歌道：

“快乐啊，千里郊野，摘取那花卉。伟大的君王到来了，到田里农耕。耜具三推，万国恭敬。耕耨公田，又施及我的私田。我的祭祀食器装满，我的祭祀食器整饬，我的仓廩如山一样高，我的谷堆高如砥石。对此念念不忘，歌咏孝义。人的能力广泛地得到爱护，司祝之官有笃实、公正的评定。天地之神为之感动，安乐未有尽期。一人有善德，万民仰赖它。”

潘岳的才华、声名盖世，为众人所忌妒，因此，游息达十年。他出任河阳（今河南孟县境）县令。恃其才气，郁闷不得志。当时，尚书仆射山涛、领吏部王济、裴楷等人都得到皇帝的赏识。潘岳内心非议他们，于是写了歌谣题于尚书

阁：“尚书阁东头，有一只大牛，王济作鞵套上牛颈，裴楷作鞵套在后头，和峤劳碌不得休。”

后来，潘岳转为怀县（今河南武陟西南）令。当时，客舍因经商弃农，淫乱亡命之徒，多以此为依托，败坏扰乱了法纪制度，皇上下诏取消。十里路设立一座官办客舍，让贫穷人家的老人和小孩看守着，又派小官掌握主持，按照普通客舍那样收费。潘岳上书议论道：

谨此考查：旅舍，其由来很久了。旅行的人靠它停留、歇息。主人微薄地收取住宿费，物件交换，贩运买卖，各自获得它所应得的。官方不加役使赋税，顺应人力而成其利，恩惠施予百姓而官方不费一点钱财。书上说：“许由拒绝了尧的任命，住在客舍里。”《外传》说：“晋国的阳处父经过宁城，住在客舍里。”魏武帝也认为设客舍是适宜的，他的诗写道：“设立客舍，用来使商人通行。”但是，自从唐尧到今天，未曾有过不要客舍的法制。唯独商鞅责难它，这本来就不是在圣明之世应说的话。如今，天上朝拜，全国纳贡，八方富庶，公私充盈。京畿附近人物集聚，客舍也稠密，冬天有温暖的房舍，夏天有凉爽的树荫，饲牛马的草料成堆，器具用品供给需要，疲乏的牛一定要投宿，乘凉就近而来。大车启程，马鞍移置，都可以得到休憩。

而且许多抢劫盗窃都发生在远僻之处，平息于人多的地方。十里萧条冷僻，歹徒就要心怀不轨；道路相连，馆舍相接，寇就要心情恐惧。况且听到呼声就有人援救，已经逃走的也有人追逐，不救助的要问罪，不追逐的要

被杀。禁绝暴行，追捕逃犯，常有这些都是客舍的好利，而是官办客舍所缺乏的。而且，行路人要多赶路，要求余烧饮，都在傍晚或早晨，盛夏白天炎热，还要在星夜赶路，既规定要早早关门，便赶不到官方客舍了。有的要避免晚上关闭，便奔走于道路的旁侧，这种地方疏于管理，这又产生招致盗窃的根源。如果以客舍多方败坏法规教化为由，派官吏守候着贫瘠的官办客舍，难道还有什么人来往吗？那河桥、孟津地方，解送契据，缴纳钱财，有高官监督、检察，查点收入，核审送出，众人在两岸检查，或许还担心会遗失它呢！因此，以俸禄、好处悬赏，许诺予以功劳、报酬。如今，卑鄙的小官，衰弱的人独自占有官办客舍的收入，掌管、开、关的权力，凭借不加审核的权利，这种道路上的蛀虫，孳生了以奸邪手段得利的现象。遵循历代旧有的习俗，使行人住行都感到高兴，让客舍有人洒水扫地，以待候旅行者选择住下，这难道不是众人所恭仰企望的吗？

潘岳请求官署上呈，朝廷顺从了他的意见。

潘岳兼管两县，勤于政务劳绩。调动补任尚书度支郎，又改任庭尉评，后因公事免职。杨骏辅佐朝政，提拔官吏，引荐潘岳为太傅主簿。杨骏被诛，他也被取消名籍。当初，谯县人公孙宏少年时孤苦贫穷，客居河阳种田为生，善于弹琴，很能写文章。潘岳任河阳县令时，爱惜他的才能技艺，待他很宽厚。到杨骏被诛之时，公孙宏任楚王司马玮的长史，专管宰杀政事。当时，杨骏门下的人都受连累获罪，同官署任主簿的朱振已经被杀戮。潘岳那天夜里告假在城外，公孙宏

告诉楚王司马玮，说潘岳是暂代理的官吏，因此免于死。不久，被选任长安令，写了《西征赋》，描述了沿途所经之地的人物古迹、山形水势，文采清丽，旨趣深远，所用的辞语大多不见记载。征召补任博士，未拜职，因母亲生病随即离开，免除了官职。随后任著作郎，又转为散骑侍郎，还升迁为给事黄门侍郎。

潘岳性情轻浮暴躁，趋附世利。他和石崇等人谄媚地侍奉贾谧，每每等候他出门，两人就望着车马扬起的尘埃顶礼谄拜。贾谧草拟的关于愍怀的文章就是潘岳写的。贾谧的“二十四友”，潘岳是第一位。贾谧关于《晋书》的起笔年限的议疏，也是潘岳的手笔。潘岳的母亲几次讥诮他说：“你应当知道满足，你还要侥幸冒险不停吗？”但潘岳终究不能改变。

既然在仕途宦海中不能显达，潘岳便作《闲居赋》，说道：

潘岳读《汲黯传》读到司马安四次升迁，直到九卿地位，优秀的史官写到它经“巧宦”为题目，我未尝不感慨地放下书而叹息。叹道：哎！诚然有“巧宦”的道理，但“拙”本来也是有的，回想起来，常认为士人的一生，如果不是没有轨迹而能精通于玄妙之门的至圣之人，就必须建立功勋，成就大业，为当代效劳立功。因此，奉献忠贞，履行信义，以便增进德行；修饰辞句，树立真诚，以便保持功业。我少年时就在乡里窃有声誉，有愧于司空、太尉的举荐，他就是我所尊奉的主人太宰鲁武公这个人。太尉举荐秀才，命我为郎。到了侍奉世祖武皇帝时，我任河阳、怀县县令、尚书郎、廷尉评。今当天子居丧之际，我任太傅主簿。太傅杨骏被杀，我也

被除了名籍，成为平民。不久，又复任官职，授予长安县令，升迁为博士，还未拜授官职，母亲生病，随即离开，官职被免。自少年到五十岁这知天命的年纪，八次转变官职才进升一级官阶，有两次免去官职，一次取消名籍，一次未拜授官职，三次迁居才算了结。虽然仕途通达或阻塞都遇到，但这也是“拙”的应验。过去，博古通今之人和长舆论及我，坚持说：“像你这样固拙守穷的人要比显达用世的人更多才多艺”，其所说的“多才多艺”我哪里敢当？所说的“拙”，就实在有可验证的。如今，贤德的人在任，众官下逢时候，“拙”人可以对荣耀之事断绝念头了。老母亲健在，有衰弱老迈的疾病，怎么能够违背子女孝养，侍奉父母的职责，而去忙碌不安地从事才短识浅的职务呢？因此，接受了知止知足的名分，产生了视名利为浮云的念头。在家筑室种树，逍遥自在，池塘沼地就够我捕鱼垂钓，舂谷取利可以代替耕作。浇园卖菜，满足朝夕的膳食，养羊卖乳，准备好冬夏的费用。只有行大孝、与兄弟友善，这也是笨拙的人在处理政务啊！于是，创作《闲居赋》，用来歌唱此事表达感情。歌辞是：

遨游在三坟五典八索九丘的书圃里，追随在先贤圣哲的崇高的大路上。虽然对我说来有些脸皮厚，但还是在心内感到有愧于君子宁蘧。天下施行仁政，我却不去做官，天下不行仁政，我也不愚拙。我是多么巧智不足、笨拙有余啊！因此，隐退而闲居在洛水岸边。身份等同于节行超逸的人，名字连结着下等士人。背负京城，迎

着伊水，前有郊野，后是都市。浮桥青黑，作凌波之路径，灵台高耸，巍然峙立。窥探日月五星的秘密奥藏，探究人间事情的终了起始。住宅西侧有兵车战乘、禁军营地、黑色帷幕、绿色旌旗。“谿子”、“巨黍”的良弓，同机连弩；炮车抛石，如雷声震骇；急疾的飞箭，像虻虫纷飞，这一切在前开路，以显耀我皇的威武。住宅东边有天子宣明政教的大堂，水绕璧环一般的学府，清幽肃穆，敞亮宽大。环抱的竹木萦绕掩映，圆环的泉水如海流回旋。以敬重父亲来追补孝义，崇尚帝业以配于天帝，效法这种神圣的敬奉，以显得光明顺畅；设立三老五更之位奉养老人，以此来尊崇老人。到了冬去春来，阴气衰歇，阳气广布，天有祭祀之事，积薪烧柴，以祭祀祖宗来伸张礼义。铺展天上的神乐，备好千辆兵车、万匹战马，服饰悉索有声，全是黑色，箫管啾啾一起吹响。光明灿烂，盛大无比，这是礼仪法度的大观，王者制度的宏丽，国学与太学并列，两处殿宇如一，右边聘请国学教育贵胄子弟，左边太学招纳贤良隐逸之才。众多的学生子弟，庄重美好的儒家学说，有的已升堂，有的则入室，都深得其道。教育没有固定的老师，有道则可以为师。因此，英俊之士弃官来学，著名国君藏起玉玺也来学，德化教化如风一样吹遍，受业学习的如草一样披靡。这就是居于仁者之乡可以为善的缘故，也是孟子之母三次迁居的原因。

于是选定我的住处，建起房子，开凿池塘。可爱的杨树映着小池，芳香的枳树筑成篱笆。游鱼出没，荷花

开放，竹木茂盛，美果参差。张公大谷中的夏梨，梁侯乌椑上的柿子，周文王的弱枝枣树，房陵县仙人朱仲窃过的李子，无不种植。含桃、荆桃、山桃显示了樱桃、胡桃的不同，白李、赤李闪耀着红、白两种不同颜色，石榴、葡萄累累的珍贵果实，垂挂蔓绕在它的旁边。梅子、杏子、郁李、棣树之类，有着繁茂、荣盛、华藻、美丽的装饰，花蕊果实相映璀璨，言辞不能全部表达。蔬菜则有葱、韭、蒜、芋，青竹笋、紫色姜。菹菜、芥菜甘甜。蓼草、菱菜芬芳。鄙荷依着阴翳而生，藿花按时向着太阳转，绿葵含着露珠，白薤负着霜花。

接着，寒秋暑退，和春寒去，微雨新晴，天地清净明朗。太夫人便坐着“版舆”之车，登上轻轩，远览王都，就近绕着家园，以行走来调养身体，以劳作来取代药效，日常膳食有所增加，旧病有所痊愈。于是，摆上长长的酒宴，孙子、儿子排列就座，柳树垂下绿荫，车辆轨道连接，旱地上摘来紫色的果子，水里钓起红色的鲤鱼，有时欢宴于林中，有时祭祀在汜水。兄弟头发斑白，儿童幼稚，举起酒杯祝福万寿无疆，无不见其衰老而忧惧，见其长寿而欣喜，寿酒高举，慈颜和悦，快乐地饮着罚杯之酒，丝竹乐器并排罗列，足叩地而起舞，扬起声而高唱，人生求安乐，哪知其他事。隐退只求自己多加反省，信任使用如此菲薄，而且气具低劣。奉行周任的格言，敢于在任职时施展才力。孤陋之身几乎都保不住了，还读什么明智。向往老子的“众妙之门”，断绝仕宦的思虑，优哉游哉而守拙终身。

当初，潘朏任琅玕内史，孙秀作为小吏侍候潘岳，这人诡诈自负，潘岳厌恶他的为人，多次鞭挞侮辱他，孙秀长期怀恨。到赵王司马伦辅佐朝政时，孙秀任中书令。潘岳在宫禁里问孙秀说：“孙令还记得过去相处的事吗？”孙秀回答说：“心里藏着这件事，哪一天能忘掉它。”潘岳由此自己知道将不免于难。不久孙秀诬告潘岳以及石崇、欧阳建图谋尊奉淮南王司马允、齐王司马冏反叛作乱，诛杀了他们，夷灭了三族。潘岳要送去斩首时，与他母亲告别道：“我辜负了阿母的教诲！”当初，被收监时，他和石崇都互不知道对方被抓，石崇已经先送到要弃市的地方，潘岳后来才到。石崇对他说：“安仁，您也如此呀？”潘岳答道：“可以说是‘白首同所归’。”潘岳写过赠石崇的《金谷诗》道：“投分寄石友，白首同所归。”竟成了他的讖语。潘岳的母亲以及兄侍御史潘释、弟燕县令潘豹、司徒掾潘据、潘据的弟弟潘诜，兄弟的儿子，自己生的女儿，无论年长年幼一起被杀害。只有潘释的儿子伯武逃难免于一死。而潘豹的女儿与她母亲相抱哭叫，拆不开她们，下诏赦免了。

潘岳风姿仪态俊美，诗文辞采极为华丽，特别善于写作哀悼的文章。年轻时，常带着弹弓乘车出洛阳大道游玩，遇上他的妇女都手挽着手地围着他，往他车上扔果子，结果满载而归。同时代的人张载长的很丑，每次出门，小孩就用瓦片石块投掷他，疲乏狼狈而归。潘岳有侄子潘尼。

（倪木兴 译）

【原文】

潘岳字安仁，荥阳中牟人也。祖瑾，安平太守。父朏，琅

邪内史。岳少以才颖见称，乡邑号为奇童，谓终，贾之侔也。早辟司空太尉府举秀才。

泰始中，武帝躬耕藉田，岳作赋以美其事，曰：

伊晋之四年正月丁未，皇帝亲率群后藉于千亩之甸，礼也。于是乃使甸师请畿，野庐扫路，封人壝宫，掌舍设柩，青坛郁其岳立兮，翠幕黝以云布。结崇基之灵阼兮，启四途之广阼。沃野膏腴，豪壤平砥。清洛浊渠，引流激水。遐阡绳直，迤陌如矢。葱蒨服于缥轭兮，绀轸缀於黛耜。俨储驾於廛左兮，俟万乘之躬履。百僚先置，位以职分，自上下下，具惟命臣。袭春服之萋萋兮，接游车之辚辚。微风生於轻幌兮，纤埃起乎朱轮。森奉璋以阶列兮，望皇轩而肃震。若湛露之晞朝阳兮。象星之拱北辰也。

于是前驱鱼鹿，属车鳞萃，闾阖洞启，参涂方驷，常伯陪乘，太仆执轡。后妃献穉稷之种，司农撰播殖之器，挈壶掌升降之节，宫正设门闾之跽。天子乃御玉辇，荫华盖，冲牙铮铨，绡纨粹縠。金根照耀。以炯晃兮，龙骥腾骧而沛艾。表朱玄於离坎兮，飞青缟於震兑。中黄晔以发辉兮，方缤纷其繁会。五路鸣鸾，九旗扬旆，琼钗入云罕晻蔼。箫管嘲啾以啾嘈兮，鼓鞀砢砢以砢砢，荀虓嶷以轩翥兮，洪钟越乎区外。震震填填尘雾连天，以幸乎藉田。蝉冕翥以灼灼兮，碧色肃其千千。似夜光之剖荆璞兮若茂松之依山颠也。

于是我皇乃降灵坛，抚御耦，游场染履供糜在手。三推而舍，庶人终亩。贵贱以班，或五或九。于斯时也，居

靡都鄙，人无华裔，长幼杂遝以交集，士女颁赋而咸戾。被褐振裾，垂髻总髻，蹢躅侧肩，揜裳连袂。黄尘为之四合兮，阳光为之潜翳。动容发音而观者，莫不抃舞乎康衢，讴吟乎圣世，情欣乐乎昏作兮，虑尽力乎树艺。靡谁督而常勤兮，莫之课而自厉。躬先劳而悦使兮，岂严刑而猛制哉！

有邑老田父，或进而称曰：“盖损益随时，理有常然。高以下为基，人以食为天。正其末者端其本，善其后者慎其先。夫九土之宜弗任。四业之务不一，野有菜蔬之色，朝乏代耕之秩。无储蓄以虞灾，徒望岁以自必，三代之衰，皆此物也。今职上昧旦丕显，夕惕若慄，图匮於丰，防俭於逸，钦哉钦哉，惟谷之恤。展三时之弘务，致仓廩於盈溢，固尧汤之用心，而存救之要术也。”若乃庙祧有事，祝宗谏曰，烝簋普淖，则此之自实，缩鬯萧茅，又於是乎出。黍稷馨香，旨酒嘉栗。宜其时和年登，而神降之吉也。古人有言曰：“圣人之德，无以加於孝乎！”夫孝者，天之性，人之所由灵也。昔者明王以孝治天下，其或继之者，眇哉希矣！逮我皇晋，实光斯道，仪刑孚于万国，爱敬尽於祖考。故躬稼以供粢盛，所以致孝也，勤穡以足百姓，所以固本也，能本而孝，盛德大业至矣哉！此一役也，二美显焉，不亦远乎，不亦重乎！敢作颂曰：

‘思乐甸畿，薄采其芳。大君戾止，言藉其农。其农三推，万国以祗。耨我公田，遂及我私。我烝斯盛，我簋斯齐。我仓如陵，我庾如坻。念兹在兹，永言孝思。人

力普存，祝史正辞。神祇攸歆，逸豫无期。一人有庆，兆民赖之。’

岳才名冠世，为众所疾，遂栖迟十年。出为河阳令，负其才而郁郁不得志。时尚书仆射山涛、领吏部王济、裴楷待并为帝所亲遇，岳内非之，乃题阁道为谣曰：“各峤刺促不得休。”

转怀令。时以逆旅逐末废农，奸淫亡命，多所依凑，败乱法度，敕当除之。十里一官橧，使老小贫户守之。又差吏掌主，依客舍收钱。岳议曰：

谨案：逆旅，久矣其所由来也。行者赖以顿止，居者薄收其直，交易贸迁，各得其所。官无役赋，因人成利，惠加百姓而公无末费。语曰：“许由辞帝尧之命，而舍於逆旅。”《外传》曰：“晋阳处父过甯，舍於逆旅。”魏武皇帝亦以为宜，其诗曰：“逆旅整设，以通商贾。”然则自尧到今，未有不得客舍之法。唯商鞅尤之，固非圣世之所言也。方今四海会同，九服纳贡，八方翼翼，公私满路。近畿辐辏，客舍亦稠。冬有温庐，夏有凉荫，刍秣成行，器用取给。疲中必投，乘凉近进，发橧写鞍，皆有所憩。

又诸劫盗皆起于回绝，止乎人众。十里萧条，则奸轨生心；连陌接馆，则寇情震慑。且闻声有救，已发有追，不救有罪，不追有戮，禁暴捕亡，恒有司存。凡此皆客舍之益，而官橧之所乏也。又行者贪路，告余炊爨皆以昏晨。盛夏昼热，又兼星夜，既限早闭，不及橧门。或避晚关，进逐路隅，祇是慢藏诲盗之原。苟以客舍多

败法教，官守棘桡独复何人？彼河桥孟津，解券输钱，高第督祭，数入校出，品郎两岸相检，犹惧或失之。故悬以禄利，许以功报。今贱吏疲人，独专桡税，管开闭之权，藉不校之势，此道路之蠹，奸利所殖也。率历代之旧俗，获猜行留之欢心，使客舍洒扫，以待征旅择家而息，岂非众庶颺颺之望。

请曹列上，朝廷从之。

岳频宰二邑，勤於政绩。调补尚书度支郎，迁廷尉评，以公事免。杨骏辅政，高选吏佐，引岳为太傅主簿。骏诛，除名。初，谯人公孙宏少孤贫，客田於河阳，善鼓琴，颇能属文。岳之为河阳令，爱其才艺，待之甚厚。至是，宏为楚王玮长史，专杀生之政。时骏罔纪皆当从坐，同署主簿朱振已就戮。岳其夕取急在外，宏言之玮，谓之假吏，故得免。未几，选为长安令，作《西征赋》，述所经人物山水，文清旨诣，辞多不录。徵补博士，未召，以母疾辄去官免。寻为著作郎，转散骑侍郎，迁给事黄门侍郎。

岳性轻躁，趋世利，与石崇等谄事贾谧，每候其出，与崇辄望尘而拜。构愍怀之文，岳之辞也。谧二十四友，岳为其首。谧《晋书》限断，亦岳之辞也，其母数诮之曰：“尔当知足，而乾没不已乎？”而岳终不能改。

既仕宦不达，乃作《闲居赋》曰：

岳读《汲黯传》至司马安四至九卿，而良史书之，题以巧宦之目，未曾不慨然废书而叹也。曰：嗟乎！巧诚有之，拙亦宜然。顾常以为士之生也，非至圣无轨微妙玄通者，则必立功立事，效当年之用。是以资忠履信以

进德，修辞立诚以居业。仆少窃乡曲之誉，忝司空太尉之命，所奉之主，即太宰鲁武公其人也。举秀才为郎。逮事世祖武皇帝，为河阳，怀令，尚书郎，廷尉评。今天子谅闇之际，领太傅主簿。府主诛，除名为民。俄而复官，除长安令。迁博士，未召拜，亲疾，辄去官免。自弱冠涉于知命之年，八徙官而一进皆，再免，一除名，一不拜职，迁者三而已矣。虽通塞有遇，抑亦拙之效也。昔通人和长舆之论余也，固曰：“拙于用多”。称多者，吾岂敢，言拙，则信而有徵。方今俊义在官，百工惟时，拙者可以绝意乎宠荣之事矣。太夫人在堂，有羸老之疾，尚何能违膝下色养，而屑屑从斗筲之役？於是览止足之分，庶浮云之志，筑室种树，逍遥自得。池沼足以渔钓，春税足以代耕。灌园鬻蔬，供朝夕之膳，牧羊酤酪，俟伏腊之费。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此亦拙者之为政也。乃作《闲居赋》以歌事遂情焉。其辞曰：

遨愤素之长圃，步先哲之高衢。虽吾颜之云厚，犹内愧於甯蘧。有道余不仕，无道吾不遇，何巧智之不足，而拙艰之有馀也！於是退而闲居，于洛之浚。身齐逸民，名缀下土。背京泝伊，面郊后市。浮梁黜以过度，灵台杰其高峙。窥天文之祕奥，睹人事之终始。其西则有元戎禁营，玄幕绿徽，谿子巨黍，异綦同归，石骏雷骇，激矢虻飞，以先启行，耀我皇威。其东则有明堂辟雍，清穆敞闲，环林紫映，圆海回泉，聿追孝以严父，宗文考以配天，祇圣敬以明顺，养更老以崇年。若乃背冬涉春，阴谢阳施，天子有事于柴燎，以郊祖而展义，张钧天之

广乐，供千乘之万骑，服枳枳以齐玄，管啾啾而并吹，煌煌乎，隐隐乎，兹礼容之壮观，而王制之巨丽也。两学齐列，双宇如一，右延国胄，左纳良逸。祁祁生徒，济济儒术，或升之堂，或入之室。教无常师，道在则是。故髦士投绂，名王怀玺训若风行，应犹草靡。此里仁所以为美，孟母所以三徙也。

爰定我居，筑室穿池，长杨映沼。芳枳树檿，游鳞涣灏，菡萏敷披，竹木蓊藹，灵果参差。张公大谷之梨，梁侯乌桕之柿，周文弱枝之枣，房陵朱仲之李，靡不毕植。三桃表櫻胡之别，二柰耀丹白之色，石榴蒲桃之珍，磊落蔓延乎其侧。梅杏郁棣之属，繁荣藻丽之饰，华宝照烂，言所不能极也。菜则葱韭蒜芋，青荀紫姜，萹芥甘旨，蓼菱芬芳，蓂荷依阴，时藿向阳，绿葵含露，白薤负霜。

於是凜秋暑退，熙春寒往，微雨新晴，六合清朗。太夫人乃御版輿，升轻轩，远览王畿。近周家园。体以行和，药以劳宣，常膳载加，旧疴有痊。於是席长筵，列孙子，柳垂荫。车结轨，陞摘紫房，水挂赭鲤，或宴于林，或楔于汜。昆弟斑白，儿童稚齿，称万寿以献觞，咸一惧而一喜。寿觞举，慈颜和，浮杯乐饮，丝竹骈罗，顿足起舞，抗音高歌，人生安乐，孰知其他。退求己而自省，信用薄而才劣。奉周任之格言，敢陈力而就列。几陋身之不保，而奚拟乎明哲，仰众妙而绝思，终优游以养拙。

初，苾为琅邪内史，孙秀为小史给岳，而狡黠自喜。岳

恶其为人，数挞辱之，秀常衔忿。及赵王伦辅政，秀为中书令。岳於省内谓秀曰：“孙令犹忆畴昔周旋不？”答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岳於是自知不免。俄而秀遂诬岳及石崇，欧阳建谋奉淮南王允，齐王冏为乱，诛之，夷三族。岳将诣市，与母别曰：“负阿母！”初被收，俱不相知，石崇已送在市，岳俊至，崇谓之曰：“安仁，卿亦复尔邪！”岳曰：“可谓白首同所归。”岳《金谷诗》云：“投分寄石友，白首同所归。”乃成其讖。岳母及兄侍御史释、弟燕令豹、司徒掾据、据弟诜，兄弟之子，已出之女。无长幼一时被害。唯释子伯武逃难得免。而豹女与其母相抱号呼不可解，会诏原之。

岳美姿仪，辞藻绝丽，尤善为哀诔之文。少时常挟弹出洛阳道，妇人遇之者，皆连手萦绕，投之以果，遂满车而归。时张载甚丑，每行，小儿以瓦石掷之，委顿而反。岳从子尼。

陶潜传

——《宋书》卷九三

【说明】陶潜（365～427），晋宋时期诗人、辞赋家、散文家。一名渊明，字元亮，私谥靖节，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人。曾任江州祭酒，后去职归隐，晚年完全过着躬耕的隐逸生活。

陶潜的作品，现存有诗歌一百二十多首，散文六篇，辞赋两篇。成就最高的是其描写自然景色和农村生活的“田园诗”，这些诗作反映了他高远的志趣和守志不阿的品格，隐寓着他对污浊现实的憎恶和对农村淳朴生活的热爱。他还有些诗作歌咏了历史上和神话传说中的英雄，颇多慷慨悲凉之音。他的诗风格平淡自然，语言简洁含蓄，浑厚而富有意境，在我国诗歌史上独具特色。陶潜的赋和文篇数不多，影响极大，《归去来兮辞》、《五柳先生传》、《桃花源记》等都是传世名篇。

陶渊明的诗文在当时未受重视，唐以后受到广泛的推重。他的人品气节、诗歌艺术都成为后人学习的楷模。梁萧统辑其作品，编为《陶渊明集》八卷。

陶潜，字渊明，有的说渊明字元亮，浔阳柴桑（今江西

九江西南)人。曾祖父陶侃,任晋朝大司马。

陶潜少年时就有很高的志趣,曾撰写《五柳先生传》,以“五柳先生”比拟自己,说:

先生不知道是什么地方人,也不知道他的姓名,在他住宅的旁边有五株柳树,因此就把“五柳”作为他的号。他沉静寡言,不羡慕功名利禄。喜欢读书,但不过分穿凿字句,每当心中有所领悟,便高兴得忘记了吃饭。他性情嗜好酒,然而由于家境贫困,不能经常有酒喝。亲戚朋友知道他的这种情况,有的就备酒招呼他,他去饮酒,总要把酒喝光,希望能够喝到醉。喝醉了就回家,从不舍不得走。他的住屋四壁空荡,不能遮风蔽日;他穿的粗毛短衣,破烂缝补;他的竹篮瓜瓢常常空着,如此清苦,却安然自在。他曾经撰写文章自寻乐趣,文章很能表达自己的志趣。他忘却世俗的得失,而愿意终生过着这种生活。

陶潜自己是这样叙述的,当时的人说这是实际的记录。

陶潜的双亲年老,家境又贫穷,起初他任江州(今江西九江)祭酒,因不能忍受官职的拘束,不久,自己便辞职回乡。州府又召他作主簿,他不接受。他亲自耕耘种作,以自供自给,他的身体瘦弱疲病。后来在镇军将军刘裕幕府中任镇军参军,又在建威将军刘敬宣的幕下任建威参军,他向亲朋好友说:“我姑且以出任官职来作为归隐田园的本钱,行吗?”当官的听到这句话,便任命陶潜为彭泽(今江西湖口东部)令。公家的田地全都指使差役种粘稻,他的妻子坚持请求种粳稻,于是,他就用五十亩地来种粘稻,用五十亩来种

粳稻。郡守派了督邮到彭泽，县官告诉陶潜应该整饰衣冠，束紧衣带去拜见督邮，陶潜愤慨地说：“我不能为了五斗米而向乡间小人弯腰。”当天，陶潜就解下官印，辞掉了县令的官职。陶潜写了《归去来》赋，赋中写道：

回去啊！田园将要荒芜了，为什么还不回去？既然自己的心志被形体所驱使而做了官，又为什么要惆怅而独自悲愁呢？认识到过去已经不可挽回，知道未来尚可以弥补。确实迷失了道途，好在还不远，领悟到今天的正确、昨天的错误。回归时，水路中，船摇晃着是那样轻快飘扬，风轻飘飘地吹拂着衣裳；陆路上，向行人询问前面的路程，可恨的是星光微弱，辩认不清。

看见了简陋的家屋，高兴得奔跑过去。家僮仆人高兴地出来迎接，幼子等候在家门口。屋前的小路已经荒芜，但松树、菊花还在哩！拉着幼子进入屋内，酒器里盛满了酒，拿来了酒壶酒杯，自斟自酌。悠闲地观望着庭院里的树木，脸上露出了愉快的神情。靠着南边的窗子，寄托着傲世的情怀，深知狭小的屋室仅能容纳足膝，却也适宜于安身。每日在园子里散步倒也自成乐趣，屋子虽然设了门，门却经常关着。拄着手杖优游竭息，时常抬起头远处眺望，云朵无意地飘出山头，鸟儿飞倦了也知道归巢。日光暗淡，太阳将要落山，我抚摩着松树，独自流连徘徊。

回去啊！愿与世间息绝交游。世俗与我相违背，再驾车出游还能有何要求？喜欢与亲戚谈心，乐于弹琴读书以消除心中的忧愁。农夫们告诉我春天到了，将要在

田地上耕作。有的驾着篷车，有的划着小船，顺着山路蜿蜒曲折地进入幽深的山谷，沿着崎岖不平的山路，经过了小山岗。树木欣欣向荣，泉水缓缓流动。羡慕万物适时地生长，感叹我的生命可将要结束。

算了吧，托身于天地间还能有多久？为什么不随心意决定自己的行止？为什么要心神不定而想到哪儿去了呢？富贵不是我的愿望，仙境也不可能期待。有时乘着美好的时光独自去游赏，有时放下拐杖去除草培土。登上东面的田边高地放声长啸，面对清澈的流水吟诗。姑且顺应自然的变化而终归死去，乐天知命，还有什么疑虑？

义熙末年，征召陶潜为著作佐郎，陶潜不接受。江州刺史王弘要与陶潜认识，但未能达到目的。陶潜曾经到过庐山，王弘让陶潜的朋友庞通之带着酒具在半路上的栗里邀请陶潜。陶潜患有脚病，便差派一个差役和二个小孩抬着竹轿去请陶潜。陶潜来到后，便高兴地一块喝酒。不多时，王弘来了，陶潜也没与他过意不去。在此以前，颜延之任刘柳后军功曹，在浔阳与陶潜款叙情怀。后来颜延之任始安郡守时，经过浔阳，天天去造访陶潜，每次前往，必然痛饮一直到醉，临离开时，留下二万钱给陶潜，陶潜全都存入酒店，逐渐去取酒来喝。曾经在九月九日重阳节时没有酒，他走出门在屋子旁边的菊花丛中坐了很久，正逢王弘送酒来到，他马上就地喝了起来，到喝醉了才进家门。陶潜不懂音乐，却存有一张素琴，琴没有弦，每当他酒喝够了，总是抚弄着素琴，以此来寄托自己的心志。不分贵贱，只要来造访他的，凡是有酒，

他总要摆出来，如果陶潜先喝醉，他便会对客人说：“我喝醉了，要睡了，你可以走了。”陶潜就是如此地纯真，直率。郡守去探望陶潜，正逢陶潜的酒酿好，便拿下头上的葛布巾来过滤酒，滤完酒，又将葛布巾戴在头上。

陶潜幼年官微，他不修身，并考虑放弃或接受某种官职，自以为曾祖父陶侃是东晋皇帝的辅政大臣，而感到羞耻的是生为后代的他，却身份低微，屈居人下。从曾祖以后，帝王的基业虽然逐渐兴隆，陶潜却不肯再做官了。他所撰写的文章，都写上写作的年、月，义熙以前，则写晋朝年号；自永初以后，只写明甲子而已。给他儿子的信中，谈了自己的志趣，并且拿它作为对儿子的教导和告诫。信中说：

天地赋予人以生命，人有生也必有死，自古以来的圣人贤士，有谁能够独免呢？孔子的学生子夏说过：“生死由命运决定，富贵则在于天意。”子夏也是与孔子四个得意门生一样的人，他亲身受过孔子的亲口教诲，他发表这种议论，难道不是因为命运的好坏而不可妄意追求、寿命的长短永远无法从分外求得的缘故吗？我的年纪已经过了五十岁了，还为穷苦所困扰，因为家境贫穷破败，只好到处飘泊。我的本性刚直、才质倔强，因而与世人多所不和，自己估计这样做下去，必定留来自世俗的祸患。勉强辞官归隐，辞别世俗，却使你们幼小时便遭受饥寒之苦。常常被东汉孺仲的贤妻的话所感动，自己盖着破棉絮，对儿子又有什么可惭愧的呢？这是一件事。只恨邻居没有羊仲、求仲那样的高士，而家中又没有像老莱子的妻子那样的贤妻，抱着这样的苦心，确实独自

感到怅然失意。

少年时喜欢读书，偶然也爱闲适恬神，打开书卷阅读，心有所得时，便高兴得忘记了吃饭。看见树林枝叶交错成阴，听见鸟婉转鸣叫，便又高兴得很。我曾说过，五、六月在北边窗下闲卧时，恰逢凉风突然吹来，便自称是伏羲时代以前的人了。意志浅薄，学识寡陋，岁月瞬息流逝，远远地回顾过去，一切是那么的渺茫！

自从患疟疾以来，身体就逐渐衰弱了。亲戚、老朋友不遗弃我，经常拿来药物相救助，不过，恐怕自己的寿命已经有限了。可恨的是你们还幼小，家境贫困，没有仆人，劈柴打水等劳动，什么时候可以免啊！只在嘴里叨念着，怎能用言语表达呢？你们虽然不是同一个母亲生的，但你们应该想到四海之内都是兄弟的这种情谊。鲍叔和管仲在分钱财时，管仲多分，鲍叔并不猜疑；归生和伍举各事其主，路上相遇仍能坐在荆条上款叙以往的友情。鲍叔能帮助管仲转失败为成功；伍举因在国丧时，在郑国维护了公子纠的地位而立了功。他们这些人尚且如此，更何况同一个父亲生的人呢？颖川的韩元长是汉末的名士，身处辅助国君的执政大臣地位，八十岁时才辞世，兄弟却住在一起，一直到年老。济北的汜稚春是西晋时节操品行高洁的人，他七代人拥有共同的财产，家里所有的人都没有埋怨的神色。《诗经》中写道：“在高山上能高瞻远瞩，在大路上能通行无阻。”你们要谨慎啊！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

陶潜又写了《命子诗》留给他的儿子，诗中写道：

我的祖先是多么悠远，可以追溯到陶唐氏帝尧。久远时，尧的儿子丹朱作了舜的虞宾，此后，历代留下了功德的光辉。陶唐氏的后裔御龙曾任职夏朝、豕韦又辅佐商朝。周朝司徒陶叔，端庄盛美，他的宗族因他而昌盛。纷乱的战国时代以及寂寞无闻的周朝衰落时期，陶氏人才有的隐居林间，有的则隐居于山中。周末群雄战乱，犹如奔窜的虬龙蟠绕云上，飞驰的鲸鱼惊起了浪涛，由于上天成全而建立了汉朝，愍侯陶舍也就得到了眷顾。显赫的愍侯，运气当是依附帝王以建功立业。手执宝剑清晨起舞，他的战功是那样的显著。面对山河立下誓言，开辟疆土拓展地域。汉景帝时的丞相陶青是那样的勤勉，他精诚地追随帝王辅佐朝政。长河浩瀚渺茫，大树郁郁苍苍。众多的支流疏导长河，繁多的枝条罗盖大树。君子有时沉默独处，有时发愤入世，命运本来就有高贵，也有低贱。直到东晋，祖辈功业显赫于长沙（今湖南），威武的长沙公曾祖上封地，独揽荆、湘、江等州军事大权。功成后便辞官返乡，面临荣耀而心不迷乱，谁说此种心志，中近民可以有的呢？我的祖父武昌太守陶茂很严肃，始终谨慎小心。他正直执法，是荆、江二州刺史属官的模范，他的恩惠，使全郡人民和悦。父亲是多么仁慈啊！他淡泊虚疏，托身于仕途，对官职的得失，喜怒都不形于色。慨叹我自己孤陋寡闻，远望前辈，自己都不及他们。感到惭愧的是头发已经花白，而只能背负日光单身孤立，应受五种惩罚的罪过，莫过于没有后代。真正值得我思念的是听到你呱呱落地的哭泣声。在吉日良时为

你占卜，给你起名叫俨，取字为求思，你要朝夕保持温和恭敬，我所盼望的就在于此。我还想到孔丘的孙子孔鲤，希望你能跟上他成为肖孙。长疮的人夜半生子，便拿来火光察看，生怕儿子像自己。君子有自己的志趣，为什么要等待我呢？既然看着他出生，确实希望他能令人满意。人们也说，这种感情是真切的。岁月流逝，你将逐渐长大。福不会无缘无故地来到，祸害也容易降临。早起晚睡，时刻盼望你能成才，如果你不才，也就算了。陶潜在元嘉四年（427）逝世，当年他六十三岁。

（林东海 译）

【原文】

陶潜字渊明，或云渊明字元亮，寻阳柴桑人也。曾祖侃，晋大司马。

潜少有高趣，尝著《五柳先生传》以自况，曰：

先生不知何许人，不详姓字，宅边有五柳树，因以为号焉。闲静少言，不慕荣利。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欣然忘食。性嗜酒，而家贫不能恒得。亲旧知其如此，或置酒招之。造饮辄尽，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箪瓢屡空，晏如也。当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忘怀得失，以此自终。

其自序如此，时人谓之实录。

亲老家贫，起为州祭酒，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州召主簿，不就。躬耕自资，遂抱羸疾，复为镇军、建威参军，谓亲朋曰：“聊欲弦歌，以为三迕之资，可乎？执事者闻之，

以为彭泽令。公田悉令吏种秫稻，妻子固请种秬乃使二顷五十亩种秫，五十亩种秬。郡遣督邮至，县吏白应束带见之，潜叹曰：“我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即日解印绶去职。赋《归去来》，其词曰：

归去来兮，园田荒芜，胡不归。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涂其未还，觉今是而昨非。舟遥遥以轻飏，风飘飘而吹衣。问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希微。

乃瞻衡宇，载欣载奔。僮仆欢迎，稚子候问。三径就荒，松菊独存。携幼入室，有酒盈樽。引壶觴而自酌，盼庭柯以怡颜。倚南窗而寄傲，审容膝之易安。园日涉而成趣，门虽设而常关。策扶老以流憩，时矫首而遐观。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景翳翳其将入，抚孤松以盘桓。

归去来兮，请息交而绝游。世与我以相遗，复驾言兮焉求。说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消夏。农人告余以上春，将有事于西畴。或命巾车，或棹扁舟。既窈窕以穹壑，亦崎岖而经丘。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善万物之得时，感吾生之行休。

已矣乎。寓形宇内复几时，奚不委心任去留，胡为遑遑欲何之。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怀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

义熙末，徵著作佐郎，不就。江州刺史王弘欲识之，不能致也。潜尝往庐山，弘令潜故人庞通之赍酒具于半道栗里

要之，潜有脚疾，使一门生二儿舆蓝舆，既至，欣然便共饮酌，俄顷弘至，亦无忤也。先是，颜延之为刘柳后军功曹，在寻阳，与潜情款。后为始安郡，经过，日日造潜，每住必酣饮致醉。临去，留二万钱与潜，潜悉送酒家，稍就取酒，尝九月九日无酒，出宅边菊丛中坐久，值弘送酒至，即便就酌，醉而后归。潜不解音声，而畜素琴一张，无弦，每有酒适，辄抚弄以寄其意。贵贱造之者，有酒辄设，潜若先醉，便语客：“我醉欲眠，卿可去。”其真率如此。郡将候潜，值其酒熟，取头下葛巾漉酒，毕，还复著之。

潜弱年薄宦，不洁去就之迹，自以曾祖晋世宰毕，耻复屈身后代，自高祖王业渐隆，不复肯仕。所著文章，皆题其年月，义熙以前，则书晋氏年号，自永初以来唯云甲子而已。与子书以言其志，并为训戒曰：

天地赋命，有往必终，自古贤圣，谁能独免。子夏言曰：“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四友之人，亲受音旨，发斯谈者，岂非穷达不可妄求，寿夭永无外请故邪。吾年过五十，而穷苦荼毒，以家贫弊，东西游走。性刚才拙，与物多忤，自量为已，必贻俗患，俛俛辞世，使汝幼而饥寒耳。常感孺仲贤妻之言，败絮自拥，何惭儿子。此既一事矣。但恨邻靡二仲，室无莱妇，抱兹苦心，良独罔罔。

少年来好书，偶爱闲静，开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见树木交阴，时鸟变声，亦复欢尔有喜。尝言五六月北窗下卧，遇凉风暂至，自谓是羲皇上人。意浅识陋，日月遂往，缅求在昔，眇然如何。

疾患以来，渐就衰损，亲旧不遗，每以药石见救，自恐大分将有限也。恨汝辈稚小，家贫无役，柴水之劳，何时可免，念之在心，若何可言，然虽不同生，当思四海皆弟兄之义。鲍叔、敬仲，分财无猜，归生、伍举，班荆道旧，遂能以败为成，因丧立功，他人尚尔，况共父之人哉，八十而终，兄弟同居，至于没齿，济北汜稚春，晋时操行人也，七世同财，家人无怨色。诗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汝其慎哉！吾复何言。

又为命子诗以贻之曰：

悠悠我祖，爰自陶唐。邈为虞宝，历世垂光。御龙勤夏，豕韦翼商。穆穆司徒，厥族以昌。纷纷战国，漠漠衰周。凤隐于林，幽人在丘。逸虬挠云，奔鲸骇流。天集有汉，眷予愍侯。于赫愍侯，运当攀龙。抚剑凤迈，显芘武功。参誓山河，启土开封。亹亹丞相，允迪前踪。浑浑长源，蔚蔚洪柯。群川载导，众修载罗。时有默语，运固隆汗。在我中晋，业融长沙。桓桓长沙，伊勋伊德。天子畴我，专征南国。功遂辞归，临宠不惑。孰谓斯心，而可近得。肃矣我祖，慎终如始。直方二台，惠和千里。于皇仁考，淡焉虚止。寄迹夙运，冥兹愠喜。嗟余寡陋，瞻望靡及。顾惭华鬓，负景只立。三千之罪，无后其急。我诚念载，呱闻尔泣。卜云嘉日，占尔良时。名尔曰俨，字尔求思。温恭朝夕，念兹在兹。尚想孔伋，庶其企而。厉夜生子，遽而求火。凡百有心，奚待于我。既见其生，宝实欲其可。人亦有言，斯情无假。日居月诸，渐免于孩。福不虚至，祸亦易来。夙兴夜寐，愿尔斯才。尔之不才，

亦已焉哉。

潜元嘉四年卒，时年六十三。

谢朓传

——《南齐书》卷四七

【说明】谢朓（464—499），南朝齐诗人。字玄晖，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人。南朝世家豪门子弟，年少即有文名，曾任宣城太守等职，世称“谢宣城”。在统治阶级的内部斗争中受诬陷而被杀。

谢朓是永明诗人的代表，在当时享有盛誉。他发展了谢灵运以来产生的山水诗，彻底摆脱了玄风的影响。他的诗风格清俊，警句时出，对唐代诗人产生了较大影响。此外，他的赋写景抒情，声律协调，体现了南朝辞赋向骈赋过渡的特点，也颇值得称道。有《谢宣城集》。

谢朓，字玄晖，陈郡阳夏人。祖父谢述曾任吴兴太守。父亲谢纬任过散骑侍郎。

谢朓少年时代就十分好学，享有美名，文章写得清雅流丽。初入仕时，任豫章王太尉行参军，后入随王东中郎府，又转为王俭卫军东阁祭酒、太子舍人以及随王镇西功曹，再转为太子文学。

随王萧子隆镇守荆州，爱好辞赋，多次与幕僚文友聚会，

谢朓凭着出色的文学才华，特别受到随王的赏识、宠爱，对面唱和，流连忘返，从早到晚，吟哦不停。长史王秀之借口谢朓年轻，与人合谋相率行动，秘密奏知皇帝。齐世祖下诏命说：“侍读虞云自可以经常应付侍奉，谢朓可以返回京都。”谢朓在途中写诗寄赠西府同僚，诗中说：“时常担心鹰隼来袭击，秋菊在严霜中萎谢。寄语给设置罗网的人，向着空旷的天空，我已经高高地飞翔。”他改任新安王中军记室。谢朓写信辞别萧子隆说：“我听说，池塘死水想流向大海反而干涸，低劣的马乘希望马匹驯顺，却又中途疲惫，为什么呢？面对沼池凋敝，忧愁惆怅；面对东西岔道，郁闷哀鸣。况且我空自坚守奉行仁义，回归的志向已无从实现，渺茫如坠落的雨点，凋残如秋天的瓜蒂。我实属平庸之辈，品低才疏，是天地的光明美善，是山川的接受容纳，才赞扬我一人，推崇我的小善行。放下场圃里的农具，菟园里侍奉笔墨。东渡三江，西游七泽，要约主帅，安逸闲谈。每日摇曳着长袖，追随前面的车乘，命驾而行。荣耀地置身于王府，得到恩典，倍受赏识。头发沐浴着旭日，您的恩德无边无际，扪心图报，早将誓言铭刻肌骨。没想到，沧海未渡，反作江海水族之臣空自游荡；渤海正值春天，群鸟的羽翼却已衰落。杂草丛生的房屋凄清冷落，陈旧的筓门寂寞空旷，轻舟遭遇逆流，孤独地吊影自怜，只见空中白云，不见龙门何处。离开恩德之主愈久，思念之情愈深。只待江景清沏可辨，等候归来的大船抵达春江绿洲。红色的府邸一旦启开，我要把浅陋的心献给品德、成就高贵的人。只要头簪足履犹存，床席不改，即使身填沟壑也还希望妻子、儿女能思念我回来。挥泪告辞，悲

不自胜。”

不久，以中军记室兼任尚书殿中郎，郁林王隆昌初年（494），命令谢朓接待北朝来使，谢朓以口齿不伶俐为由，想避开不承担，但未获许可。高宗辅政期间，任命谢朓为骠骑谘议，统领记室令史，掌管诸侯王府邸的章表文书，又掌管中书省中的帝王命令、任命或赠封的文书，授予秘书丞，但没有拜受，仍传为中书郎。后出任宣城（今属安徽）太守，又因选拔而任中书郎。

齐明帝建武四年（497），出任晋安王镇北谘议、南东海太守，处理管南徐州事务。他告发了王敬则造反的阴谋，皇帝十分赞赏，升他为尚书吏部郎。谢朓还来不及推让官职，中书省已起了疑心，便询问祭酒沈约，沈约说：“宋元嘉年间，范晔推让吏部官职，朱修之推让黄门官职，蔡兴宗推让中书官职，皇帝下诏书一起答复三分推让呈文，委婉地陈述事情。近代任小官不推让，就已成为通常的习惯，这恐怕有违背推让的本意。王蓝田、刘安西都任重要职务，起初并不推让，如今，岂能羡慕他而不推让呢？孙兴公、孔○一起推让记室令史，如今怎能三者都推让呢？谢吏部现在是越级升迁，推让另有意思，哪里是关系官阶的大小？谦让的美德，本来出于人的性情。如果任大的官职就推让，这就与送至皇帝殿庭的表章没有什么不同了。惯例是这样，可说自当不必多疑了。”谢朓又启奏推让，皇上下诏赞赏，但不应允。

谢朓善写草书、隶书，又擅长五言诗，沈约常说：“二百年来没见过这样的诗歌。”敬皇后迁移陵墓，谢朓撰写哀悼祭文，整个齐朝没比得上它的。

东昏侯失去政德，江祐要立江夏王宝玄，心里迷乱，到最后又改变了主意，和他弟弟江祀秘密对谢朓说：“江夏王年少轻佻，不堪承担国家重任，不能立为国君。始安王年纪较大，适合入朝继承王位，他一定不违众望。我们并非以此享富贵，只是希望求得国家安定而已。”萧遥光又派亲信刘洸秘密向谢朓示意，要把他引为心腹。谢朓因自己受恩于高宗，不听刘洸的话，不肯答应。不久，萧遥光命谢朓兼任卫尉事，谢朓怕被荐举，便将江祐等人的谋算告知左兴盛，左兴盛不敢作声。江祐听到这事，告诉了萧遥光，萧遥光非常愤怒，便说要诏见谢朓，自己回车托付廷尉，与徐孝嗣、江祐、暄等人联名启奏皇帝，请求诛杀谢朓，奏折中说：“谢朓生性阴险轻薄，远近昭著，王敬则过去谋图反叛，他也稍有诚意效法，自从擢升官职已超出同辈，但他的欲望贪得无厌，如同沟壑难以填满一样。他着力于触惹事端，近来又煽动内外，处处传播妖言，狂妄地贬低皇上，私下议论宫中之事，间离诽谤亲人贤能，轻率地非议朝廷官员，丑恶的言论和不正当的谋算，不胜详说。心目中没有君主，这已经很明显，宜当共同唾弃、及早诛杀他。臣等相议认为，应到北面里巷捕捉逆贼，以严肃刑典。”皇帝下诏道：“你等王公所启奏的事属实，谢朓天性轻薄险恶，众人的议论久已明显，他只凭那些雕虫小技，已为官绅所耻笑。过去在渚宫时，就煽动蕃王之间的矛盾，日夜怂恿谄媚，对上观言察色，对下密谋筹划。及至返回京城，反而更加暴露，江、汉地区平静，没有风波，以为是他自己的功劳。现在的议论尽是这些，大臣缙绅无不为之侧目怒视。去年夏天王敬则造反的事，他颇有一点诚意，奖

赏擢升不正当，跨越了官阶顺序，竟没听到感激、喜悦话，而戒惧之心却更为明显。又借助制造流言蜚语，妄图迷惑众臣，诋毁贬低朝政，猜疑间离亲友贤能。花言巧语，口快舌利，比过去的心志更加丑恶，他细小的罪孽如同涓涓细流汇成了河。作事防备，计谋长远。理当用少正之刑，伸张除害的正义，可将他收交廷尉审讯，以严肃明正国家的刑典。”又派御史中丞范岫启奏收审谢朓，谢朓被投入监狱而死，时年三十六岁。谢朓告发王敬则，敬则的女儿是谢朓的妻子，常常怀里藏刀要找谢朓报仇。谢朓不敢与她相见。到他当了吏部郎时，沈昭略对谢朓说：“你这个人才品和门第都好，真正不负这个职务，只恨今天要对你嫡妻施行法制了。”谢朓临到失败时，才叹息道：“我无意杀王公，王公却因我而死。”（倪木兴译）

【原文】

谢朓字玄晖，陈郡阳夏人也。祖述，吴兴太守。父纬，散骑侍郎。

朓少好学，有美名，文章清丽。解褐豫章王太尉行参军，度随王柬中郎府，转王俭卫军东阁祭酒，太子舍人、随王镇西功曹，转文学。

子隆在荆州，好辞赋，数集僚友，朓以文才，尤被赏爱，流连晤对，不舍日夕。长史王秀之以朓年少相动，密以启闻。世祖敕曰：“侍读虞云自宜恒应侍接。朓可还都。”朓道中为诗寄西府曰：“常恐鹰隼击，秋菊委严霜。寄言尉罗者，寥廓已高翔。”迁新安王中军记室。朓笺辞子隆曰：“朓闻潢汙之水，思朝宗而每竭；驽蹇之乘，希沃若而中疲。何则？拜坏摇落，对之惆怅；岐路东西，或以鸣悵。况乃服义徒拥，归

志莫从，邈若坠雨，飘似秋带，汙实庸流，行能无算，属天地休明，山川受纳，褒采一介，搜扬小善，舍耒阳圃，奉笔菟园。东乱三江，西浮七泽，契阔戎旃，从容燕语。长裾日曳，后乘载脂，荣立府廷，思加颜色。沐发晞阳，未测涯涘，抚臆论报，早誓肌骨。不悟沧溟未运，波臣自荡；渤澥方春，旅翮先谢。清切藩房，寂寥旧华。轻舟反诉，吊影独留，白云在天，龙门不见。去德滋永，恩德滋深。唯待青江可望，候归艎于春渚；朱邸方开，效蓬心于秋实。如其簪履或存，衽席无改，虽复身填沟壑，犹望妻子知归。揽涕告辞，悲来横集。”

寻以本官兼尚书殿中郎。隆昌初，敕朏接北使，朏自以口讷，启让不当，不见许。高宗辅政，以朏为骠骑谘议，领记室，掌霸府文笔。又掌中书诏诰，除秘书丞，未拜，仍转中书郎。出为宣城太守，以选复为中书郎。

建武四年，出为晋安镇北谘议、南东海太守，行南徐州事。启王敬则反谋，上甚善嘉赏之。迁尚书吏部郎。朏上表三让，中书疑朏未及让，以问祭酒沈约。约曰：“宋元嘉中，范晔让吏部，朱修之让黄门，蔡兴宗让中书，并三表诏答，具事宛然。近世小官不让，遂成恒俗，恐此有乖让意。王蓝田、刘安西并贵重，初自不让，今岂或慕此不让邪？孙兴公、孔○并让记室，今岂可三署皆让邪？谢吏部分授超阶，让别有意，岂关官之大小？拗让之美，本出人情。若大官必让，便与诣阙章表不异。例既如此，谓都自非疑。”拗又启让，上优答不许。

朏善草隶，长五言诗，沈约常云“二百年来无此诗也。”

敬皇后迁祔山陵，眇撰哀策文，齐世莫有及者。欲立江夏王宝玄，未更回惑，与弟祀密谓祐曰：“江夏年少轻脱，不堪负荷神器，不可复行废立。始安年长入纂，不乖物望。非以此要富贵，政是求安国家耳。”遥光又遣亲人刘泐致意于眇，俗以为肺腑。眇自以受恩高宗，非祐所言，不肯答。少日，遥光以眇兼知卫尉事，眇惧见引，即以祐等谋告左兴盛，兴盛不敢发言。祐闻，以告遥光，遥光大怒，乃称敕召眇，仍回车廷尉，与徐孝嗣、祐、暄等连名启诛眇曰：“谢眇资性险薄，大彰远近。王敬则往构凶逆，微有诚效，自尔升擢，超越伦伍。而沟壑无厌，著于触事。比遂扇动内外，处处奸说，妄贬乘舆，窃论宫禁，间谤亲贤，轻议朝宰，丑言异计，非可具闻。无君之心既著，共弃之诛宜及。臣等参议，宜下北里，肃正刑书。”诏：“公等启事如此，眇资性轻险，久彰物议。直以雕虫薄伎，见齿衣冠。昔在渚宫，构扇蕃邸，日夜纵谗，仰窥府画。及还京师，反自宣露，江、汉无波，以为己功。素论于兹而尽，缙绅所以侧目。去夏之事，颇有微诚，赏擢曲加，逾迈伦序，感悦未闻，陵竞弥著。遂复矫构风尘，妄惑朱紫，诋贬朝政，疑闲无贤。巧言利口，见丑前志，涓流眇孽，作戒远图。宜有少正之刑，以申去害之义。便如收付廷尉，肃明国典。”又使御史中丞范岫奏收眇，下狱死。时年三十六。

眇初告王敬则，敬则女为眇妻，常怀刀欲报眇，眇不敢相见。乃为吏部郎，沈昭略谓眇曰：“卿人地之美，无眇此职。但恨今日刑于寡妻。”眇临败叹曰：“我不杀王公，王公由我而死。”

庾信传

——《周书》卷四一

【说明】庾信（513—581），南北朝文学家。字子山，南阳新野（今属河南）人。与其父庾肩吾出入梁朝宫廷，深受宠幸。他们同徐摛、徐陵父子都是“宫体诗”的倡导者。梁元帝时，庾信出使西魏，被扣留长安。梁亡后，在西魏、北周为官，官到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

庾信在梁朝时的诗作，绮艳轻靡，讲究形式和技巧，内容较为贫乏，未能跳出宫廷文学的圈子。暮年的作品，思想和内容上有了明显变化，多写身世之叹、乡关之恩，风格也随之而变，艺术造诣远远超过前期作品。庾信在辞赋、骈文方面的成就也很高，他讲究对仗和用典，《哀江南赋》是其代表作。后人辑有《庾子山集》。

庾信，字子山，南阳新野（今河南新野）人。祖父庾易是南朝齐代的隐士。父亲庾肩吾，任过南朝梁朝散骑常侍、中书令。

庾信少年时代就长得英俊出众，聪明绝伦。他博览群书，特别精通《春秋左氏传》；身高八尺，腰带长十围，容貌举止

恭顺，有超过凡人之处。起初，他任湘东（今湖南衡阳）国常侍，后转任安南府参军。当时，庾肩吾任梁太子中庶子，主持管记的工作，东海（今江苏东海沐阳连水以东、淮水以北地区）人徐摛任左卫率，徐摛的儿子徐陵和庾信一齐任抄撰学士。父子在太子的宫室里，出入于皇宫禁地，深受恩宠礼遇的荣耀，无人可以相比。他们都极具才华，文采显得绮丽华艳，因此世称为“徐庾体”。当时，后辈们都竞相模仿学习，他们每有一篇文章问世，便在京城广为传诵。后来，庾信升任为尚书度支郎中、通直正员郎，又出任郢州别驾。接着又兼任通直散骑常侍，出使东魏。他的诗文和应酬的言辞广泛地为邺下（今河北临漳县境）人士所赞许。从东魏回梁朝后，他又出任东宫学士、建康令。

侯景反叛作乱时，梁朝简文帝命令庾信率领宫中文武官员一千多人扎营于朱雀航（在今江苏南京镇淮桥东）。及至侯景兵到，他因敌军众多而先行撤退。台城（今南京玄武湖边）沦陷后，庾信逃到江陵（今属湖北）。梁元帝继承王位，授予他御史中丞之职。元帝登基时，转授右卫将军，并封他为武康县侯，又加授散骑常侍，奉命出使西魏。适值西魏大军进攻南朝，他便留在长安（今陕西西安）。江陵陷落后，他在西魏任使持节、抚军将军、右金紫光禄大夫、大都督。继之，又被引荐为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

孝闵帝即位后，封庾信为临清县子，赐给五百户的封地；授予司水下大夫。他还离京任弘农郡太守。又升迁为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司宪中大夫，提升爵位为义城县侯。不久，任洛州（今河南洛阳）刺史。庾信精通以往的典章制度，

为政简约沉静，下属官吏和百姓很安定。当时，陈朝和北周和好交往，羁留在对方国家的人士都被允许返回故国。陈朝便请王褒、庾信等十几个人回去。高祖只放走王克、殷不害等人。庾信和王褒俩都被留下而不遣返。接着，庾信被征召为司宗中大夫。

周世宗、高祖都很爱好文学，庾信特别蒙受恩宠礼遇。乃至赵王、滕王几位王侯，对他更是多所应酬，款待备至，犹如百姓间的平等交往。众多王公的碑铭文志，多半拜托他撰写。只有诗人王褒和他不相上下，其余的文人就没有比得上他的了。

庾信虽然官位显达，名望显赫，但仍然经常怀有思乡的深情。于是，创作了《哀江南赋》表达自己的这种情绪。赋是这样写的：

戊辰年（548）十月，窃国大盗侯景反叛篡国，京城金陵沦陷，国家土崩瓦解。我于是逃窜于荒山野谷。朝廷与百姓都陷于泥潭炭火之中。从江陵奉命出使西魏，羁留北方，不得南归。复兴梁朝的希望在于甲戌之年（554）便彻底破灭了。国家灭亡，我在长安亭舍遥哭了三天，在异国别馆被囚禁了三年。天理本如岁星运行一样周而复始，但梁朝销亡却不再复兴。我如同傅燮，只以悲叹身世而无处可以求生；又像袁安，每每思念先朝，自然而然地涕流满面。从前，桓谭有志于事业，杜预一生好运，两人都有著述，都在书中作序叙平生志向。潘岳的诗篇，最早叙述家族的风尚；陆机的辞赋，大多陈说祖先的功德。我从中年开始，便遭到丧国的变乱，遥远地离开故

国，流落他邦，直到如今已届晚年。吟咏着《燕歌》远别家国，悲伤得无法忍受。遇到了故国遗老，哭泣又有什么用处？本来想隐居避害，却忽然奉命出使而失节于西魏，本以谦让自守，便又不能如伯夷、叔齐以身殉义。飘泊在路旁的亭舍，寄身于异邦的篱下。唱唱怀乡的悲歌，不是取乐的办法；喝喝乏味的薄酒，没起忘忧的效果。如今，追写这篇辞赋，姑且用来记述一朝兴亡之事，其中虽不乏个人危难悲苦的辞句，但还是以国家的悲哀为重。

年老岁残，乡关路远，这混乱多变的世道成了什么世界？冯异将军一旦离去，那大树自然凋零；荆轲壮士一去不返，寒风更加凄凉。蔺相如手持和氏璧斜视庭柱，为换回赵国十五城直面秦王的欺凌，终于完璧归赵；毛遂登上石阶，逼使楚王订立盟约，而我出使魏国，手捧珠盘，却未能使梁朝和西魏结盟。钟仪是楚国的君子，被俘而成了头戴南方楚帽的囚徒；季孙为国的使臣，被晋人拘留在西河的使馆里。申包胥为救楚国向秦王叩头，把头叩破；蔡威公因亡国哭干了眼泪，泪尽泣血。钓台的移柳，不是飘泊玉门关的游子所能望得见的；华亭的鹤鸣，岂是遭河桥之难的人所能听得着？

孙策用以三分天下的士卒，起初只有五百；项羽起兵所带的江东子弟，也只有八千之众。他们就这样割据山河，主宰天下。哪有过百万义军一时丢盔弃甲，一败涂地，以致敌军滥杀百姓如同割草伐木？长江、淮河起不了普通河岸阻挡敌兵的作用，军营壁垒还不如一道篱

笆的牢固坚实。征税敛赋的各州官吏乘乱纠集起来，缔结盟约；出身卑微的人趁机窃取了国柄。莫非金陵的天子气数历经三百年理当完结了？由此可知，秦虽打败六国，吞并了天下，仍不能避免于轺道（今陕西西安东北）投降之灾，西晋虽统一了国家，也挽救不了国君于平阳（今山西临汾）丧身之祸。呜呼！大山崩塌，萧梁已走上灭亡的命运，改朝换代，必然会有典午（晋朝）前朝的哀伤。上天的意旨，朝代的更迭，足以使人感到凄凉悲怆，伤心不已。更何况行船到了航道的尽头，天河不是乘木筏可以上去的；暴风阻拦了仙境之路，蓬莱没有可以到达之日。不得志的人要作赋表达心头哀曲，困顿的人要咏唱所做之事。陆机听到我的吟咏会拍手取笑，这是我心甘情愿的；张衡看到这篇辞赋定要加以鄙辱，这本来就是理所当然的事。

我出身于周朝掌庾大夫的世家，因世代功勋而成为官族。辅佐汉室治理国家，凭学识而居官受职。禀承嵩山、华山玉石的灵气，浸润着黄河、河水的波澜。迁居新野，背倚洛阳古都重新处世。城邑面临晏水，倒也优雅、安静。及至永嘉（307—313）年间，国事艰难多舛，国家失去主心骨，百姓苟延在断壁残垣之间，虎豹豺狼横行于道路之上。适逢中原五大姓南迁，三星聚会在东南，晋元帝迁都金陵，重建国家。我的八世祖也徙居江陵。他受封为遂昌侯而得到赐予的田产，侍奉天子而得到赐封的土地。铲除茅草，住上了宋玉旧宅，穿路寻径，定居于江陵。

又适逢水、木运数相交接，山崩水竭，国家衰亡。但庾家属守忠直道义，家人多半保持了气节。以淳其深挚训示子孙，以鲜明的仁义忠烈侍奉君王。在新野，有为活着的人所立的祠庙，在河南，有古字撰写的碑碣。况且家祖是在大夫之才，隐士遁于深山的贤能。居处置于空旷的幽谷中，门前小巷滚动着轮子裹着落草的车子，前来接他出山。他像古人一样倚着大树高谈阔论，下笔洋洋洒洒。家父则承受祖上的美德，秉承臣子的忠贞。文才辞采超过藏书馆的文士，成为士人典范的美名盛传于漳水之滨。叹徒有世道，凤鸟不至，恨生不逢时，麒麟见害。奸贼忤逆，暗中加害，终不能使这仁义之人悦服。

如太子晋游伊、洛时的年龄，我也在十五岁时高中射策甲科。起先，在建礼门任尚书郎，满含芒名，接着，在太子门为东宫学士，羽翼正矫健。游说于皇太子的讲舍，雄辩于帝胄的座席。既如以蠡测天高，池塘水色清纯，洲渚正宜垂钓。在帅帐中以兵戎韬略侍奉君王，在宫廷里听文人的琴弦奏出雅乐歌曲。于是，走出困境，为官作宦，继而又进崇文观为春宫兵马兼任文武大臣。前呼后拥立于战事上执掌重兵，兵出兰池宫已拜授司马。与湘东王谈论军机，在北魏王面前显露了玉石的纯清。

当时，朝廷和民间都欢欣娱乐，高台深池撞钟鸣鼓。里巷冠盖如云，门庭尽是邹鲁大儒。在海陵兴建了连绵的花苑，在江边筑起了横塘大堤。国家的东门有神人鞭子抽打过的石横桥，南端有金铜铸成的巨柱。蜀、江、江陵辟园遍植万株橘树，渭川人家有千亩竹林堪称千户侯。

西方礼赠浮玉，南方进贡珍贵的“没羽”宝箭。吴国的曲子，越国的歌吟，荆州的美女，楚国的舞蹈。世人的欢乐有如草木遇上阳春，蛟龙适逢风雨。五十年中间，江南一带安平无事。有如王歙那样和亲的王侯，如班超那样安定远邦的使臣。没有马武这样的人物提起兴兵之事，没有冯唐这样的人物谈论将帅韬略。哪里知道山岳暗然失色，江湖沸扬汹涌。渔阳有造反的北镇戍兵，离石有拥兵自重的都尉。

天子梁武帝正在删改诗书，制定礼乐。开设重云殿讲坛，建立士林学馆。奢谈大劫焚烧灰烬飘飞的原因，阔论恒星在夜空中消逝的缘故。守地没有鲁齿山（今河南宝丰东南）可以凭借，城防没有猛兽之角可以倚恃。刁斗躺臣在荥阳（今属河南兵库里），龙驹被拘律在平乐馆时。掌政的朱异视兵戎土戈如同儿戏。王公大臣以清谈作为定国安邦之方。乘坐用胶粘合的船只，用腐烂的绳索驾驭奔驰的壮马。于是，小民陷于水火之中，君子成了猿猴水鹤。坏了的簞子不能阻止盐池的咸，阿胶不能改变黄河的浑混。于是，鲂鱼有病，其尾变赤，城郊四野，营垒无数。江鸥在殿堂上亲昵，野雉在宫廷中鸣叫，湛卢宝剑离开了故国，艨艟名船沉落在水中。看见有披发的人在伊水祭奠，知道升平不足百年又有了兵灾！

那奸逆侯景气焰嚣张，反叛之心由来已久。其罪行，大则蚕食诸国，凶如鲸、鲛；小则残灭己类，恶如梟、獍。任它牛羊一般的蛮力，肆虐它啃食水草的野性。这不是四季的和气所能调剂，也非北斗魁四星所能校正。乘天

下尊奉释教无为而作乱，还有野心企图控制四方。天子却还请他痛饮精醇美酒，又赏给虎豹之皮。如同在大夏国（在今阿富汗北部一带）见到了胡杨树，在条支（在今底格里斯、幼发拉底两河之间）见到了鸟蛋。奸逆的豺狼牙齿密而厉，毒蛇之气暗中吹出。竟轻狂地举起九鼎，还侧耳窥视京都，妄图篡国称事。

开始，临川王萧宏之子（萧正德）引贼兵进入帝城，奸臣成了披甲戴盔的统兵之将。他先被奸逆侯景立为天子执政，马上又被降为侍中。于是，他密修书信、图求授兵，但又为贼兵截得，天机泄漏。奸逆侯景是凯觐廷尉之职的逃亡之囚，盘踞淮南造反的败兵我，如从狄泉（在今河南洛阳）飞起的苍鸟，如从横江（在今安徽和县东南）挣脱的困兽。于是，地上石鼓鸣叫，震撼山岳，天上太白行空，星宿移动。朝廷群龙吟鸣，东陵（在今湖北广济东北及黄梅境内）麒麟相斗。贼兵凶残狡诈，横行滥杀，侵袭天子住处。如将匈奴的狼烟侯望之地移入京畿版图，把北庭的卢山搬至中原大地。贼兵青袍犹如绿草，白马好像系练。天子梁武帝正月不能上朝，奸逆筑长围置酒宴乐。宫前两座高台横遭刀兵攻击，宏伟的宫殿大门饱受箭矢射击。晕圈包围着太阳，苍鹰击拍着殿堂。天子竟然遭致了被囚夏台（在今河南禹县南）的灾祸，也终于看到了被囚尧城的变故。为官有责却没有勤王的人，空有盾斧却不能平定贼兵。王琳无陶侃的机遇，只好自沉米船，羊鸦仁无顾荣的善战，不能挥摇羽扇破敌。将军败退，台城被围，通路断绝。烽火随着星

辰下落而熄灭，诏书随着纸鸢被射而飞落。于是，韩国割据，赵国分裂，成鼓倒卧，牙旗折断。战马失群嘶鸣，败兵轮辙混乱。猛士倚城自守，谋臣瞠目结舌。昆阳（今河南叶县）的战斗如同大象奔逃山林，常山（在今山西浑源县）的战阵好象长蛇逃回洞穴。据有五郡的王子们相向悲泣，拥有三州强兵的儿子也只好与父王遥遥诀别。

护军将军慷慨勤王，忠贞不屈，战死阵前。他祖孙三代都为将领，却在此战中灭绝。济阳（在今河南兰孝）的忠勇壮士身为末将，他们兄弟三人开城出战而死，同唱了一曲忠义之歌。天子蒙受耻辱，臣子忠贞而死。身体虽亡，英名永存。贼兵感其忠勇，归还遗体，三军怆然悲泣。都官尚书羊侃足智多谋，善于筹策，多方守城御敌。抵御了贼兵云梯攻城，又以地道挖陷了敌人临城而筑的土山。直如有坚壁固守的齐国将军，但他不幸病卒，失去了可以防护燕昌城的燕国军队。随之，台城沦陷，大势已去，这就是人所说的国家灭亡了！柳仲礼精神振奋，怒勇冲天，统帅前军，身先士卒与奸逆交战。头盔掉在郗城门，青塘败北，兵士陷入了马窟，他身负创伤，中气每每受抑，屡遭刮骨疼痛。以后他又降贼，以致功业短暂夭亡，身名两失。有时，贼兵如鸷鸟披上隼翼，狐狸假借虎威，滥杀无忌，刀刃箭矢满沾血渍，脂膏涂地，横尸原野。我兵转弱，贼兵变强。义军绕宇孤城，士气低落，听到鹤叫而心惊胆寒，听到贼兵胡笳声响而伤心落泪。如太史慈在神亭（在今江苏丹阳）拒敌

失掉手戟而被执，似孙策渡过横江击敌中箭弃马而还。如秦军崩溃于钜鹿（今河北平乡）的沙丘台，如赵军覆灭于长平。就这样，桂林（在今江苏南京北面）苑囿荒鞠倾覆，长洲（今江苏吴县西南）麋鹿漫游，渍渍然江河沸腾，茫茫然宇宙混浊。天地横遭分离阻隔，神与人都犯恨惨毒残酷。之后，诸王如晋国与郑国不能互相依存，鲁国与卫国互不和睦。其竞相杀戮震动了主边事的天官星，其争城夺地如同地轴回旋。梁武帝受饥困，如赵武灵王寻食雏鸟而难饱，又如楚成王求食熊掌，岂能得到？饿死后，被奸逆以轻车简葬于城门外。梁简文帝被杀，如齐王被抽筋，悬挂在庙屋上。人鬼同谋灭亡曹国。我因此逃奔江陵，乞求援救。

于是，我诈称传御旨而蒙混出关隘，假称使臣身份应付盘查。遭受了伍子胥过鄂坂时的讥讽嫌疑和关卡的征税。乘着疲惫的白马艰难跋涉，又改策青骡而辗转前行。扁舟像风中落叶一样漂荡，驾长风逆江而上。那贼兵张牙舞爪，沿江乘胜奔袭，摆开青龙大阵，驾驶飞燕楼船。义师则如合肥之战中的张辽一样勇猛陷阵，如率水军从巴丘下东南的王浚一样势不可挡。贼兵逆风烧火而自焚，又受箭伤而回船败退。还不如中箭落水的黄盖，却如溺死水中的杜侯。我收帐于黄鹤矶（在今湖北武汉蛇山），藏船在鹦鹉洲（在今湖北武汉江中）。路已行至湘水和汉水境界，却仍抬头遥望吴地分野的斗星和牵牛星。我如项羽陷于阴陵沼泽（在今安徽定远西北），走投无路，在樊山钓台（在今湖北北武昌西北）上痛抒忧闷。

远望赤岸涕泪沾衣。舟停乌江（在今安徽和县东北四十里）无心过渡。沿江望去，雷池（在今安徽望江南）成了筑栅的水浦，鹊陵成了焚后的军营。旅途中杳无人影，难以投宿，飞禽无树可以筑巢。我以为幸而荆州、衡阳有明君良才，江陵、汉水足以倚靠。从淮海扬州起程，溯江而上，走了三千余里。像韩信一样路过漂衣的小洲向漂母乞食，像伍员藏身芦苇，由渔夫渡江出逃。身临湖泊，十死一生。嗟叹还未报答皇恩，明白深忧还正当开始。本来够上不励行邦国之道，也无意任官食禄。梁元帝却让我错误地掌握右卫将军之职，不适当地充任御史中丞。

我类似生长于龙门（在今陕西韩城），与父亲诀别于黄河、洛水之间的司马迁，尊奉父亲立身扬名的遗训和著论传世的嘱托。过去，许多世代都无愧于公卿大名。如今，传到自己却开始衰落。思先父，风雨中泣颂曾子《梁山》之曲，只悲叹父母如衔索的枯鱼，都难久留于世。避猜忌，我绕进曲折不平的小路，躲藏于野草丛生的空门里。如屈原戴上汀洲的香草，如诸葛恪穿芦苇做的单衣而待死。

此时，梁元帝驰檄讨贼，义军锐不可挡，如西楚霸王剑抵城门。众兵激战于书库，校尉争斗于殿堂。苍鹰船，赤誉舟，铁船舷，牙帆柱，声威赫赫。义军歃血结成白马之盟，典龙负舟速下江东破贼。兵船迎海潮飞驰，江萍助王师成行。兵马军车进驻石头城（在今江苏南京），戈船水军乘潮涌入淮水、泗水。义军挺进，如诸侯

有郑伯为前驱，盟主晋国的荀莹在傍晚抵达。攻入敌巢，如以火熏穴，贼酋如魑魅，四散窜逃。奸逆侯景被斩，如长狄被埋于驹门，蚩尤被斩于中冀。其腹被作为灯火点燃。其头被作为饮酒器具。至此，白虹贯于军营，流星坠入大地。过去虎踞龙盘，黄旗紫气的金陵帝都，任凭狐兔筑窟结穴，随着风尘而王气销尽。

向西观瞻博望苑，向北进入玄辅园。有吟赏风月的台榭，波平如镜的池塘，苍劲参天的古树。可在玉女窗扉下放下弓弩，在凤凰楼柱上系马逗留。仁寿殿前空自悬挂着铜镜，茂陵里的经书也白白放置。至于简文帝，功德主行，堪称不配，确乎明智贤能，谨敬谅直，藻辞深于言表，道行高于精通《老子经》的河上公。却不能如太子晋遇浮丘公而上嵩山，也不能像他那样先把后事告知师旷。只能像魏武临死那样，将爱子托付于人。哪知道他死后又有谁能探望他的西陵坟地？当时并非没有北阙的内应之兵，只是还有兵器精良的贼兵防守。司徒王僧辩表里都是济世经纶，如晋国的狐偃一心一意地勤王。敢于横执刻镂之戈向霸主挑战，手持金鞭斥责奸逆。平定吴地的功绩比杜元凯还壮伟。王室对他的依赖，比温太真还深重。开始，以保全气节而取地为名全节，最终，以死于枉人山的比干之名而著称。他功成被杀，如南阳宰文重，悔之不及，如上蔡游猎的李斯，知之已晚！曾镇守北方的邵陵王空负威名，兵败不前。其为人骄躁、暴虐，如秦始皇箭射水神，鞭击山灵。因此，神灵不佑，蛰熊啮伤座骑，浮蛟翻倒兵船。梁武帝终如高阳氏，虽有

八子效命，终因史弟猜忌，国破家亡，不能有百年基业。

中兴之主梁元帝平定了侯景的叛乱，洗雪了父兄百姓的冤耻。由湘东王砂接帝业，在江陵登基，如汉文帝被迎于代邸、帝尧在唐郊受禅。但却不能如光武帝任司隶时那样改变旧制，也不能恢复以往的正始之音。多猜忌而骄矜随意，嫉贤才而自以为是。国家大事因此完结，诸侯人心浮动。接着。与北齐绝交，遭西魏入侵之患。何况如西楚霸王离开关中想回楚地一样，他居江陵而不思返建邺；也不想如太伯以周礼开拓吴国那样，重返吴地。复用任约等侯景旧党去败自己的骨肉兄弟，如驱使绿林的散兵游勇去抗击在骊山（在今陕西临潼东南）造反的叛军。驻军于澧水，阅兵于巴渝。有事求问邪恶的鬼怪，乞灵于用迷信方法消灾除邪的巫术。杀武陵王于荆门（在今湖北宜都西北），如郑庄公追杀亲弟王廩延；使邵陵王死于夏首（在今湖北沙市东南），如咸季以弟害兄。无视骨肉之亲理当相受，残忍地以弯弓取代和乐。令人愤慨的是，当权者既无谋无略，又不能如天下所盼望的回旧都建邺。不能将立国之难深思熟虑，又自以为精通于文武二端。定都江陵，如登上阳城想逃避风险，倚卧砥柱想求得安宁。为人言谈多所猜忌，残忍更呈淫威。坐观时变，本性无情，不顾兄弟的急难。所拥有的狭小地方如同脸上的黑疤，所据有的城池也只有弹丸一般大小。内外积怨甚深，兄弟之谊，国家之盟又都瓦解。冤禽精卫怎能填海，北山愚公哪能移山。何况灾象白天出现，妖气夜里降临，赤乌夹日而飞三日，青云围轸七重。

元帝气数将尽，如同吴国灭亡的日子已经临近，兵入郢州的时间也已经到来。

如周和郑互相怨恨，秦和楚结下冤仇那样，梁元帝杀兄害弟，与梁王结怨隙，使西魏有机可乘。如南风不劲，楚师无功，西邻责问，嫁女不宜那样，梁朝必败了。继而，西魏入侵，云梯横冲乱舞在城头，冀马如云屯集，大小兵车咸陈，擂鼓响彻四方。如诸葛亮兵围陈仓使用连弩之箭，如韩信袭击安邑而横陈战船佯攻临晋。虽楚地有许多湖泊可以陷贼，三户人家就以亡秦，便如乐伯射麋只中其一，梁朝无力御敌。未能如光武帝摧九虎之军，雷震四海。此时，我已告别落叶纷纷的洞庭湖，离开了涔阳尽处的浦口，身在长安。烈火焚旗，其师必败，贞风吹送，君王受擒。于是，魏军烧栅，梁元帝焚烧书画，龙文宝剑折于石柱。

魏兵入侵下江，攻陷长林。可惜只白想着养肥可供上阵的战马，见不到可摆火牛阵的军队。见国家将倾覆，士大夫纷纷出走，如章曼支驾轂而逃，宫之奇率族出走，如光武帝骑马涉水渡河，太子丹学鸡鸣，天未亮逃出潼关。忠臣以身殉国，君子饮恨吞声。梁朝既败，魏兵肆意屠戮，章华、云梦诸地成了楚人祭亡、遭掳的所在。文武大臣不死则囚，如莫敖自缢于荒谷，群帅被办于冶父（在今湖北江陵东南），群儒被害于坑井。如鹰隼追逐鸟鸦，冤气使夏日凝霜，怨恨使秋泉沸腾，杞妇哭夫，使城墙崩塌，湘妃血泪，染得竹纹斑斑。

江陵百姓被掳往西魏，历尽跋涉之苦。水土不服，山

高路远，如泾水施毒，井径险峻。十里一长亭，五里一短亭，道路迢遥。饿了寻找冬天蛰藏的燕子充饥，天黑追随荧火的微光行路。路过秦中黑水河，关中青泥城。那时，骨肉分离，冰消瓦解，风飞电散。既沦为奴，不分贵贱贤愚，混合一起，千里流亡，如淄水、澠水水味不同却相混合。白雪纷扬如寒沙，冰柱横凝似玉岩，遇到被俘的人，如适被征往洛阳的陆机，远离家乡的王粲。无不听到陇水声而掩面哭泣，无不望见关山无边而哀叹。何况夫君在西城交河（在今新疆吐鲁番西北雅尔和屯），妻子在河南清波（在今河南新蔡县西南）。岩上望夫更是遥不可及，山上望子愈增愁苦。贵妇人受尽凌辱，宫中妃子在追思邯郸生活，清河公主被卖为奴。栩阳亭侯写下了抒发离愁别恨的辞赋，临江王吟哦排遣愁思的诗歌。尚还有像我这样的人，飘泊在武威（今属甘肃），寄居于金微（今新疆北部、蒙古境内的阿尔泰山），回归无望。班超活着表达尸骨还乡的愿望。如李陵笔下的双凫永远北飞，苏武空放了寄书的大雁。

以往西魏克江陵，成为陈朝受禅金陵之祸的发端。虽然是借助外力之力，实际上是内部潜在的祸害。平定侯景之乱的梁元帝遭受杀戮，这位启中兴之业的人无人祭祀。其长子、幼子同时被其侄子梁王萧察所杀。乌鹊飞而荆山玉璧碎，大蛇生而随侯大珠死。臣民死伤无数。鬼火乱舞于平林（在今湖北京山东北）。梁朝的灭亡是因为从建邺迁都江陵，荆楚梁元帝的覆灭是因为西魏的入侵。梁朝不灭，西魏怎能昌盛，陈武帝哪能篡位？陈武帝这

个有妫氏的后代，借助姜氏齐国而繁衍，篡夺梁朝的王位，受禅为帝。天地间最好的德行是使百姓安生，圣人最器重的是帝王的宝座。出现陈霸先这样的不肖子孙，江东大地全为他所占据。可惜萧梁一家的天下，被东南的叛逆所葬送。襄阳形胜之地为西魏所占有，梁朝的天下怎不灭亡！

那往复的天道，预示着民间的生生不息。我的八世祖烈烈有为，举家迁居江陵，到我历经七代，又碰到时局变幻而北迁长安。扶老携幼，寄居关中又经多年，生死艰辛，苍天也难以言喻。何况家世败落，家业将尽，尚有巍巍灵光，惟己独存。一年将尽，岁将复始。忧心如焚，年老更甚。走在长乐宫这神武城门，望着宣平里高贵府邸，渭水流贯天门，骊山蜿蜒在地市。幕府大将军对客人款待备至，丞相平津侯礼贤待士，得与贵戚交游，如在金氏、张氏府上观赏钟鼎古器，在许氏、史氏家中听奏弦歌。有谁知道，在灞陵（故址在今陕西西安东）夜猎的还是梁朝旧时的右卫将军，咸阳（在今陕西西安）百姓中盼望故乡的决非只有昔时梁朝的皇家贵胄！

大象初年，庾信因病离职，后病逝。隋文帝深切悼念他，赠予原来的官职，追认为荆州、淮州刺史。他的儿子庾立为继嗣。

【原文】

（林东海 译）

庾信字子山，南阳新野人也。祖易，齐徵士。父肩吾，梁散骑常侍、中书令。

信幼而俊迈，聪敏绝伦。博览群书，尤善《春秋左氏

传》，身長八尺，腰带十围，容止颀然，有过人者。起家湘东国常侍，转安南府参军。时肩吾为梁太子中庶子，掌管记。东海徐摛为左卫率。摛子陵及信，立为抄撰学士。父子在东宫，出入禁闥，恩礼莫与比隆。既有盛才，文并绮艳，故世号为徐、庾体焉。当时后进，竞相模范。每有一文，京都莫不传诵。累迁尚书度支郎中、通直正员郎。出为郢州别驾。寻兼通直散骑常侍，聘于东魏。文章辞令，盛为邺下所称。还为东宫学士，领建康令。

侯景作乱，梁简文帝命信率宫中文武千余人，营于朱雀航。及景至，信以众先退。台城陷后，信奔于江陵。梁元帝承制，除御史中丞。及即位，转右卫将军，封武康县侯，加散骑常侍，来聘于我。属大军南讨，遂留长安。江陵平，拜使持节、抚军将军、右金紫光禄大夫、大都督，寻进车骑将军、仪同三司。

孝闵帝践阼，封临清县子，邑五百户，除司水下大夫。出为弘农郡守，迁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司宪中大夫，进爵义城县侯。俄拜洛州刺史。信多识旧章，为政简静，吏民安之。时陈氏与朝廷通好，有北流寓之士，各许还其旧国，陈氏乃请王褒及信等十数人。高祖唯放王克、殷不害等，信及褒并留而不遣。寻徵为司宗中大夫。

世宗、高祖并雅好文学，信特蒙恩礼。至于赵、滕诸王，周旋款至，有若布衣之交。群公碑志，多相请托。唯王褒颇与信相埒，自余文人，莫有逮者。

信虽住望通显，常有乡关之思。及作《哀江南赋》以致意云。其辞曰：

粵以戊辰之年，建亥之月，大盜移國，金陵瓦解。余乃竄身荒谷，公私涂炭。華陽奔命，有去無歸，中興道消，窮于甲戌。三日哭于都亭，三年囚于別館。天道周星，物極不反。傅燮之但悲身世，無所求生；袁安之每念王室，自然流涕。昔桓君山之志事，杜元凱之生平，并有著書，咸能自序。潘岳之文彩，始述家風；陸機之詞賦，多陳世德。信年始二毛，即逢喪亂，藐是流離，至于暮齒。《燕歌》遠別，悲不自勝，楚老相逢，泣將何及。畏南山之雨，忽踐秦庭；讓東海之，遂餐周粟。下亭漂泊，皋橋羈旅，楚歌非取樂之方，魯酒無忘憂之用。追為此賦，聊以記言，不無危苦之辭，唯以悲哀為主。

日暮途遠，人間何世。將軍一去，大樹飄零；壯士不遠，寒風蕭瑟。荊璧睨柱，受連城而見欺；載書橫階，捧珠盤而不定。鍾儀君子，入就南冠之囚；季孫行人，留守西河之館。申包胥之頓地，碎之以首；蔡威公之淚盡，加之以血。釣台移柳，非玉關之可望；華亭唳鶴，豈河橋之可聞。

孫策以天下為三分，眾裁一旅；項羽用江東之子弟，人唯八千。遂乃分裂山河，宰割天下。豈有百萬義師，一朝卷甲，芟夷斬伐，如草木焉。江、淮無涯岸之阻，亭壁無藩籬之固。頭會箕歛者，合縱締交；鋤耨棘矜者，因利乘便。將非江表王氣，應終三百年乎？是知并吞六合，不免軹道之災；混一車書，無救平陽之禍。嗚呼！山岳崩頽，既履危亡之運；春秋迭代，必有去故之悲。天意人事，可以淒愴傷心者矣。況復舟楫路窮，星漢非乘槎

可上；风飏道阻，蓬莱无可到之期。穷者欲达其言，劳者须歌其事。陆士衡闻而抚掌，是所甘心；张平子见而陋之，固其宜矣。

我之掌庾承周，以世功而为族；经邦佐汉，用论道而当官。稟嵩、华之玉石，润河、洛之波澜。居负洛而重世，邑临河而晏安。逮永嘉之艰虞，始中原之乏主。民枕倚于墙壁，路交横于豺虎。值五马之南奔，适三星之东聚。彼凌江而建国，此播迁于吾祖。分南阳而赐田，袭东岳而胙土。诛茅宋玉之宅，穿径临江之府。水木交运，山川崩竭。家有直道，人多全节。训子见于纯深，事君彰于义烈。新野有生祠之庙，河南有胡书之碣。况乃少微真人，天山逸民。阶庭空谷，门巷蒲轮。移谈讲树，就简书筠。降生世德，载诞贞臣。文词高于甲观，模楷盛于漳滨。嗟有道而无凤，叹非时而有麟。既奸回之𪔐匿，终不悦于仁人。

王子洛滨之岁，兰城射策之年，始含香于建礼，仍矫翼于崇贤。游洊雷之讲肆，齿明离之胄筵。既倾蠡而酌海，遂侧管以窥天。方塘水白，钓渚池圆。侍戎韬于武帐，听雅曲于文弦。乃解悬而通籍，遂崇文而会武。居笠毂而掌兵，出兰池而典午。论兵于江汉之君，拭圭于西河之主。

于时朝野欢娱，池台钟鼓。里为冠盖，门成邹鲁。连茂苑于海陵，跨横塘于江浦。东门则鞭石成桥，南极则铸铜为柱。树则园植万株，竹则家封千户。西颢浮玉，南琛没羽。吴歊越吟，荆艳楚舞。草木之藉春阳，鱼龙之

得风雨。五十年中，江表无事。王歙为和亲之侯，班超为定远之使。马武无预于兵甲，冯唐不论于将帅。岂知山岳暗然，江湖潜沸。渔阳有闾左戍卒，离石有将兵都尉。

天子方删诗书，定礼乐。设重云之讲，开士林之学。谈劫烬之灰飞，辨常星之夜落。地平鱼齿，城危兽角。卧刁斗如于荥阳，绊龙媒于平乐。宰衡以干戈为儿戏，缙绅以清谈为庙略。乘渍水而胶船，馭奔驹以朽索。小人则将及水火，君子则方成猿鹤。弊箠不能救盐池之咸，阿胶不能止黄河之浊。既而鲂鱼赭尾，四郊多垒。殿狎江鸥，宫鸣野雉。湛卢去国，舛皇失水。见被发于伊川，知其时为戎矣。

彼奸逆之炽盛，久游魂而放命。大则有鲸有鲵，小则为梟为獍。负其牛羊之力，凶其水草之性。非玉烛之能调，岂璇玑之可正。值天下之无为，尚有欲于羁縻。饮其琉璃之酒，赏其虎豹之皮。见胡桐于大夏，识鸟卵于条支。豺牙密厉，虺毒潜吹。轻九鼎而欲问，闻三川而遂窥。

始则王子召戎，奸臣介冑。既官政而离逖，遂师言而泄漏。望廷尉之逋囚，反淮南之穷寇，飞狄泉之苍鸟，起横江之困兽。地则石鼓鸣山，天则金精动宿。北阙龙吟，东陵麟斗，尔乃桀黠构扇，凭陵畿甸。拥狼望于黄图，填卢山于赤县。青袍如草，白马如练。天子履端废朝，单于长围高宴。两观当戟，千门受箭。白虹贯日，苍鹰击殿。竟遭夏台之祸，遂视尧城之变。官守无奔问之

人，干戚非平戎之战。陶侃则空装米船，顾荣则虚摇羽扇。将军死绥，路绝重围。烽随星落，书逐鸢飞。遂乃韩分赵裂，鼓卧旗折。失群班马，迷轮乱辙。猛士婴城，谋臣卷舌。昆阳之战象走林，常山之阵蛇奔穴。五郡则兄弟相悲，三州则父子离别。

护军慷慨，忠能死节。三世为将，终于此灭。济阳忠壮，身参末将。兄弟三人，义声俱唱。主辱臣死，名存身丧。狄人归元，三军凄怆。尚书多算，守备是长。云梯可拒，地道能防。有齐将之闭壁，无燕师之卧墙。大事去矣，人之云亡。申子奋发，勇气咆勃。实总元戎，身先士卒。胄落鱼门，兵填马窟。屡犯通中，频遭刮骨。功业夭枉，身名埋没。或以隼翼鸱披，虎威狐假。沾渍锋镝，脂膏原野。兵弱虏强，城孤气寡。闻鹤唳而虚惊，听胡笳而泪下。据神亭而亡戟，临横江而弃马。崩于钜鹿之沙，碎于长平之瓦。于是桂林颠覆，长洲麋鹿。溃溃沸腾，茫茫惨黩。天地离阻，人神怨酷。晋郑靡依，鲁卫不睦。竞动天关，争回地轴。探雀穀而未饱，待熊蹯而讫熟。乃有车侧郭门，筋悬庙屋。鬼同曹社之谋，人有秦庭之哭。

余乃假刻玺于关塞，称使者之酬对。逢鄂坂之讥嫌，值岍门之征税。乘白马而不前，策青骊而转碍。吹落叶之扁舟，飘长帆于上游。彼锯牙而勾爪，又巡江而习流。排青龙之战舰，斗飞燕之船楼。张辽临于赤壁，王浚下于巴丘。乍风惊而射火，或箭重而回舟。未辨声于黄盖，已先沈于杜侯，落帆黄鹤之浦，藏船鹦鹉之洲。路已分

于湘汉，星犹看于斗牛。若乃阴陵失路，钓台斜趣。望赤岸而沾衣，舣乌江而不度。雷池栅浦，鹊陵焚戍。旅舍无烟，巢禽失树。谓荆、衡之杞梓，庶江、汉之可恃。淮海维扬，三千余里。过漂渚而寄食，托芦中而度水。屈于七泽，滨于十死。嗟天保之未定，见殷忧之方始。本不达于危行，又无情于禄仕。谬掌卫于中军，滥尸丞于御史。

信生世等于龙门，辞亲同于河洛。奉立身之遗训，受成书之顾托。昔三世而无惭，今七叶而始落。泣风雨于《梁山》，惟枯鱼之衔索。入欹斜之小径，掩蓬蒿之荒扉。就汀洲之杜若，待芦苇之单衣。

于时西楚霸王，剑乃繁阳。麇兵金匱，校战玉堂。苍鹰赤雀，铁舳牙樯。沈白马而誓众，负黄龙而渡湘。海潮迎舰，江萍送王。戎车屯于石城，戈船掩于淮、泗。诸侯则郑伯前驱，盟主则荀莹暮至。剖巢熏穴，奔魑走魅。埋长狄于驹门，斩蚩尤于中冀。然腹为灯，饮头为器。直虹贯垒，长星属地。昔之虎据龙盘，加以黄旗紫气，莫不随狐兔而窟穴，与风尘而殄瘁。

西瞻博望，北临玄圃。月榭风台，池平树古。倚弓于玉女窗扉，系马于凤凰楼柱。仁寿之镜徒悬，茂陵之书空聚。若夫立德立言，谟明夤亮。声超于系表，道高于河上。既不遇于浮丘，遂无言于师旷。指爱子而托人，知西陵而谁望。非无北阙之兵，犹有云台之仗。司徒之表里经纶，狐偃之惟王实勤。横雕戈而对霸主，执金鼓而问贼臣。平吴之功，壮于杜元凯；王室是赖，深于温

太真。始则地名全节，终以山称枉人。南阳校书，去之已远。上蔡逐猎，知之何晚。镇北之负誉矜前，风飏慄然。水神遭箭，山灵见鞭。是以蜚熊伤马，浮蛟没船。才子并命，俱非百年。

中宗之夷凶静乱，大雪冤耻。去代邸而承基，迁唐郊而纂祀。反旧章于司隶，归馀风于正始。沉猜则方逞其俗，藏疾则自矜于己。天下之事没焉，诸侯之心摇矣。既而齐交北绝，秦患西起。况背关而怀楚，异端委而开吴。驱绿林之散卒，拒骊山之叛徒。营军梁滢，搜乘巴渝。问诸淫昏之鬼，求诸厌劾之巫。荆门遭廩延之戮，夏首滥逵泉之诛。蔑因亲于教爱，忍和乐于弯弧。慨无谋于肉食，非所望于《论都》。未深思于五难，先自擅于二端。登阳城而避险，卧底柱而求安。既言多于忌刻，实志勇于刑残。但坐观于时变，本无情于急难。地为黑子，城犹弹丸。其怨则黠，其盟则寒。岂冤禽之能塞海，非愚叟之可移山。况以沴气朝浮，妖精夜殒。赤鸟则三朝夹日，苍云则七重围轸。亡吴之岁既穷，入郢之年斯尽。

周含郑怒，楚结秦冤。有南风之不竞，值西邻之责言。俄而梯冲乱舞，冀马云屯。栈秦车于畅毂，沓汉鼓于雷门。下陈仓而连弩，度临晋而横船。虽复楚有七泽，人称三户。箭不雨于六麋，雷无惊于九虎。辞洞庭兮落木，去涔阳兮极浦。炽火兮焚旗，贞风兮害蛊。乃使玉轴扬灰，龙文斫柱。下江馀城，长林故营。徒思箝马之秣，未见烧牛之兵。章曼支以毂走，宫之奇以族行。河无冰而马度，关未晓而鸡鸣。忠臣解骨，君子吞声，章

华望祭之所，云梦伪游之地。荒谷缢于莫敖，冶父囚乎群帅。劓阱折拉，鹰鹯批攒。冤霜夏零，愤泉秋沸。城崩札妇之哭，竹染湘妃之泪。

水毒秦泾，山高赵陁。十里五里，长亭短亭。饥随蛰燕，暗逐流萤。秦中水黑，关上泥青。于时瓦解冰泮，风飞电散。浑然千里，淄、渑一乱。雪暗如沙，冰横似岸。逢赴洛之陆机，见离家之王粲。莫不闻陇水而掩泣，向关山而长叹。况复君在交河，妾在清波。石望夫而逾远，山望子而逾多。才人之忆代郡，公主之去清河。栩阳亭有离别之赋，临江王有愁思之歌。别有飘摇武威，羁序死而思归。李陵之双凫永去，苏武之一雁空飞。

昔江陵之中否，乃金陵之祸始。虽借人之外力，实萧墙之内起。拔乱之主忽焉，中兴之宗不祀。伯兮叔兮，同见戮于犹子。荆山鹊飞而玉碎，随岸蛇生而珠死。鬼火乱于平林，殇魂惊于新市。梁故丰徙，楚实秦亡。不有所废，其何以昌。有妣之后，遂育于姜。输我神器，居为让王。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用无赖之子孙，举江东而全弃。惜天下之一家，遭东南之反气。以鹑首而赐秦，天何为而此醉！

且夫天道回旋，民生预焉。余烈祖于西晋，始流播于东川。洎余身而七叶，又遭时而北迁。提挈老幼，关河累年。死生契阔，不可问天。况复零落将尽，灵光巍然。日穷于纪，岁将复始。逼切危虑，端忧暮齿。践长乐之神皋，望宣平之贵里。渭水贯于天门，骊山回于地市。幕府大将军之爱客，丞相平津侯之待士。见钟鼎于

金、张，闻弦歌于许、史。岂知灞陵夜猎，犹是故时将军；咸阳布衣，非独思归王子。

大象初，以疾去职，卒。隋文帝深悼之，赠本官，加荆淮二州刺史。子立嗣。

谢灵运传

——《南史》卷一九

【说明】谢灵运（385～433），晋宋间诗人。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人，世居会稽（今浙江绍兴）。十八岁世袭祖父谢玄康乐公的爵位，世称谢康乐。刘宋代晋后，先后出任永嘉太守及临川内史等职。他为人豪奢放纵，不理政务，纵情山水，游娱宴集。元嘉十年因谋反获罪被杀。

谢灵运是第一个大量创作山水诗并且在艺术上卓有成就的作家。他善用富艳精工的语言记叙游赏经历，描摹山水胜景，从题材上扭转了东晋以来的玄言诗风，对南朝和唐代诗歌的发展产生了一定影响。但从全篇来看，并未脱尽玄言佛理的旧习，缺乏社会内容。遗有《谢康乐集》。

谢灵运，是安西将军谢奕的曾孙、谢方明的侄儿。他的祖父谢玄是东晋东骑将军，父亲谢琰，生下来就不聪敏，官职是秘书郎，早年就去逝。谢灵运年幼就聪慧过人，谢玄十分惊异，对亲友、知己说：“我只生琰儿，琰儿为什么不及我？”

谢灵运年少就好学，他博览群书，文章写得优美，与颜延之并称为江东第一。文章在纵横俊拔方面，他强过颜延之，

而在深刻细密方面则不如颜延之。堂叔谢混特别赏识、宠爱他。谢灵运承袭康乐公的封爵，又按国公的惯例授予员外散骑侍郎，他没有接受。后任琅邪王大司马行参军。谢灵运性情豪爽放纵，车马服饰鲜艳华丽，衣物大多改变旧的样子，社会上都尊崇他，都称他为“谢康乐”。又升迁为秘书丞，因事获罪被免职。

宋武帝在长安时，谢灵运任世子中军谘议、黄门侍郎，奉旨出使到彭城慰劳宋武帝，写了《撰征赋》。后来，任相国从事中郎、世子左卫率，因杀门生获罪免官。宋受天命取代晋朝后，降公爵为侯爵，又任太子左卫率。

谢灵运行为多半违背礼仪、法制。朝廷仅以文学人才对待他，不授予相应的有实权的职务。他自认为其才能适宜参与当权要政，既不被赏识，心里常常感到悲愤惋惜。庐陵王义真年少时爱好文艺典籍，与谢灵运情趣非常相投，宋少帝即位，实权落在大臣手里，谢灵运连结煽动不同政见者，非议诋毁当权者，司徒徐羨之等人忌讳他，派他出任永嘉太守。永嘉郡有名山秀水，是谢灵运一向所爱好的。外放任官既已不得志，他便肆意遨游山水，走遍了永嘉各县，一走就是十天半月。郡里的人事诉讼，他不再关心。所到之处则写诗吟咏，以抒发他的感情。

在永嘉一年，他就称病辞职。族弟谢晦、谢曜、谢弘微等一起给予写信劝阻，他都不听。谢灵运的父亲、祖父都葬在始安县，而且那里有故宅别墅，于是他就移住会稽，修理经营旧的家业。这里依山傍江，极尽幽居之美。谢灵运与隐士王弘之、孔淳之等人纵情尽兴为乐，有在这里度过一生的

想法。每写成一首诗传到都城，贵族平民无不竞相传抄，马上就在士族百姓间传遍，名声震动都城。写了《山居赋》，并且自加注释，以详载山居之事。

宋文帝诛杀了徐羨之等人，下诏征他为秘书监，两次征召他都不去，派光禄大夫范泰写信加以褒奖，他才出任。命他整顿秘阁书籍的遗缺，又命他撰写《晋书》，他粗疏地确立条目，书到底没有写成。不久，迁任侍中，所受的赏赐和待遇很丰厚。谢灵运诗歌、书法都十分独到卓绝，每次写完，亲自动手抄写，宋文帝称谢灵运的诗歌和书法为“二宝”。他自以为是名流，理当参与时政，但直至这时，还仅以文士被任用，每每侍奉于上等的宴乐，清谈吟赏而已。王昙首、王华、殷景仁等人名声地位素来没有超过他，都被任用，他心里不平，便多次称病不去上朝值勤，他凿池筑垣，种竹栽果，而一切差役、赋税等公务，都没有期限。出城游玩，有时一走就是一百六七十里远，历经十日不回归。既没有上表奏知，也不请假。宋文帝不想有伤大臣的面子，暗示他自己辞官。谢灵运上表称病，皇帝批准给假回乡。临行时，上书建议征伐河北。他游乐饮宴相聚，夜以继日。又被御史中丞傅隆上奏免去官职，那一年，正是宋元帝元嘉五年（428）。

谢灵运返回始宁（在今浙江上虞）后，与族弟谢惠连、东海人何长瑜、颍川人荀雍、泰山人羊璿之以写作欣赏文章聚会，一起游山玩水，当时的人称他们为“四友”。谢惠连年幼就有奇才，不被父亲谢方明所理解，谢灵运离永嘉返回始宁时，谢方明为会稽太守，谢灵运造访谢方明，碰见惠连，大加赏识。谢灵运生来就不推崇别人，他只器重谢惠连，与谢

惠连成为刎颈之交。当时，何长瑜教谢惠连读书，也住在郡内，谢灵运又认为何长瑜才学卓绝，无以伦比，便对谢方明说：“阿连才气性灵如此卓绝，而您把他当作普通的儿子那样看待，长瑜是当今的仲宣，而您给他吃下等门客的饭食，您既不能以礼对待贤才，最好还是把长瑜交给我吧！”便用车子把何长瑜载走。荀雍，字道雍，官至员外散骑郎；羊璿之，字曜璿，任临川内史，被司空竟陵王刘诞所知遇，后因刘诞失败获罪被杀。何长瑜的才气不如惠连，荀雍、羊璿之也都不如。临川王刘义庆招集文人学士，何长瑜从任国侍郎到任平西记室参军，曾经在江陵寄信给族人何勔，用押韵的语句介绍刘义庆州府里的官佐说：“陆展染黑白发，想要讨好小妾。青丝不能长久，白发如星又出。”这样的语句有五、六组。轻佻的少年人给予传播，民间人士还配上题目，都加上戏谑和粗劣的语句，这篇文章便流行开来。刘义庆大怒，奉告宋文帝，出任广州所统辖的曾城令。等到刘义庆死去，朝廷士人都到府第致哀，何勔对彭淑说：“何长瑜现在可以回来了。”袁淑说：“国家刚失去皇族精英，不宜先考虑流放的人。”庐陵王刘绍镇守浔阳，任何长瑜为南中郎行参军，掌管书记之职。走到板桥，遇上暴风被淹死。

谢灵运因祖父的资财，产业十分丰厚，有众多的仆人役僮，受过旧恩的故旧、门生有几百人。他开山浚湖，课役没有停止，顺山沿岭，建造幽静险峻的景致，几十重的层峦叠嶂全都这样建置。登山常穿木屐，上山就抽去前齿，下山则抽去后齿。曾从始宁南山砍木开路直达临海，跟从的有几百人。临海太守王琇十分惊恐，以为是山贼，最终知道是谢灵

运，才安下心来。又约请王琇进一步开路，王琇不肯。谢灵运赠给王琇的诗说道：“帮郡之主为地势险峻所难，羁旅之客以山行为易。”在会稽也有很多跟随的人，震惊了县城。太守孟○笃信佛教，被谢灵运所轻视，他曾对孟○说：“掌握佛理应该有慧业，您老人家升天当在灵运之前，成佛必在灵运之后。”孟○对此深怀仇恨。又与王弘之等人到千秋亭饮酒，袒裸身体，大声呼叫，孟○深感受不了，送信去相劝，谢灵运大怒说：“我自己大声呼斗，关你这人痴人屁事！”

会稽城东有个回踵湖，谢灵运请求决湖水以为田地，宋文帝命令州郡准予这样做。这个湖离城不远，水中有物产，百姓都惋惜。孟○坚决不肯给予。谢灵运得不到回踵湖，又请求把始宁县的休崕湖开决为田，孟○又固执己见。谢灵运说，孟○不是顾全利益的人，只担心决湖会多危害人命，便用言论伤害他，与孟○便有了怨恨。孟○以谢灵运横行恣意为由，上表告他有反叛之意，拥兵自卫，公开上奏皇帝。谢灵运驰马到京都，上表亲自陈述事情的本末。宋文帝知道他被诬陷，不加他的罪。不想让他再回去，便命他为临川内史。

谢灵运在临川游玩放荡，不亚于在永嘉，被有司所追究，司徒派遣随州从事郑望生拘捕他。谢灵运举兵抗命，便有反叛的意向。他作诗道：“韩国灭亡子房奋发，秦称帝鲁连羞耻。我本是江湖人，自有忠义感动君子。”朝廷派兵追捕讨伐，将他擒拿，押送廷尉，廷尉依法处以斩刑。宋文帝爱惜他的才华，只想免官而已，但彭城王义康坚持要杀，认为不应宽恕，文帝下诏书道：“谢玄功勋略高于管仲，应荫及他的后代，降死罪为流放广州。”

随后，秦郡府将宋齐受命出使到涂口，行至桃墟村时，看见有七个人在路旁凑在一起说话，疑心是不正当的人，回来报告了郡县，郡县派兵随宋齐，乘其不备逮捕了这些人。其中一人叫赵钦，招供说：“同村人薛道双过去与谢灵运共事过，道双由同村人成国告诉我说：‘谢灵运因事犯罪流放广州，给钱叫我购买弓箭刀楯等物，薛道双邀约纠合乡里的好汉在三江口拦劫。如果成功的话，功劳一样。于是便纠合同党，要劫回谢灵运，没有达到目的，到返回时，饥饿无食，只好沿路抢劫。’”有司上奏捉拿谢灵运下狱。宋文帝下诏令在广州斩首。临死前，谢灵运作诗道：“龚胜无余生，李业有终尽，嵇公理既迫，霍生命亦殒。”诗中所称的龚胜、李业，犹如前面诗中所说的子房、鲁连的意思。当时正是元嘉十年（433），谢灵运四十九岁。他所著的文章流传于世。

孟○，字彦重，平昌郡安丘县（今山东潍坊境内）人，卫将军孟昶的弟弟。孟昶、孟○两人都有美妙的风姿，当时的人称他俩为双珠。孟昶是尊贵的名流，孟○不接受征召。孟昶死后，孟○官历侍中、仆射、太子詹事、散骑常侍、左光禄大夫。他曾跟从徐羨之，因事谈及关中、河洛中的事，孟○感叹刘穆之死后便没了继承者，王弘也在座，很抱不平，说道：“过去魏朝极端重视张晞，说是不可一日没有他，后来张晞死了，这又与兴废有什么关系呢？”孟○很不高兴，众宾客笑着向他解释。后来，他死于会稽太守任上。

谢灵运的儿子谢凤，因谢灵运获罪而流放岭南，早年就死去。

（倪木兴 译）

【原文】

谢灵运，安西将军弈之曾孙而方明从子也。祖玄，晋车骑将军。父瑛，生而不慧，位秘书郎，早亡。灵运幼便颖悟，玄甚异之。谓亲知曰：“我乃生瑛，瑛儿何为不及我。”

灵运少好学，博览群书，文章之美，与颜延之为江左第一。纵横俊发过于延之，深密则不如也。从叔混特知爱之。袭封康乐公，以国公例除员外散骑侍郎，不就。为琅邪王大司马行参军。性豪侈，车服鲜丽，衣物多改旧形制，世共宗之，咸称谢康乐也。累迁秘书丞，坐事免。

宋武帝在长安，灵运为世子中军谘议、黄门侍郎，奉使慰劳武帝于彭城，依《撰征赋》。后为相国从事中郎，世子左卫率，坐辄杀门生免官。宋受命，降公爵为侯，又为太子左卫率。

灵运多愆礼度，朝廷唯以文义处之，不以应实相许。自谓才能宜参权要，既不见知，常怀愤惋。庐陵王义真少好文籍，与灵运情款异常。少帝即位，权在大臣，灵运构扇异同，非毁执政，司徒徐羨之等患之，出为永嘉太守。郡有山水，灵运素所爱好。出守既不得志，遂肆意游遨，偏历诸县，动愈旬朔。理人听讼，不复关怀，所至辄为诗咏以致其意。

在郡一周，称疾去职，从弟晦、曜、弘微等并与书止之，不从。灵运父祖并葬始宁县，并有故宅及墅，遂移籍会稽，修营旧业。傍山带江，尽幽居之美。与隐士王弘之、孔淳之等放荡为娱，有终焉之志。每有一首诗至都下，贵贱莫不竞写，宿昔问士庶皆偏，各动都下。依山居赋，并自注以言其事。

文帝诛徐羨之等，征为秘书监，再召不起。使光禄大夫

范泰与书敦奖，乃出。使整秘阁书遗阙，又令撰晋书，粗立条流，书竟不就。寻迁侍中，赏遇甚厚。灵运诗书皆兼独绝，每文竟，手自写之，文帝称为二宝。既自以名辈，应参时政，至是唯以文义见接，每侍上宴，谈赏而已。王昙首、王华、殷景仁等名位素不逾之，并见任遇，意既不平，多称疾不朝直。穿池植援，种竹树果，驱课公役，无复期度。出郭游行，或一百六七十里，经旬不归。既无表闻，又不请急。上不欲伤大臣，讽旨令自解。灵运表陈疾，赐假东归。将行，上书劾伐河北。而游娱宴集，以夜续昼。复为御史中丞傅隆奏免官，是岁，元嘉五年也。

灵运既东，与族弟惠连、东海何长瑜、颍川荀雍、泰山羊璿之以文章赏会，共为山泽之游，时人谓之四友。惠连幼有奇才，不为父方明所知。灵运去永嘉还始宁，时方明为会稽，灵运造方明，遇惠连，大相知赏。灵运性无所推，唯重惠连，与为刎颈交。时何长瑜教惠连读书，亦在郡内，灵运又以为绝伦。谓方明曰：“阿连才悟如此，而尊非常儿遇之；长瑜当今仲宣，而饴以下客之食。尊既不能礼贤，宜以长瑜还灵运。”载之而去。荀雍道雍，官至员外散骑郎。璿之字曜璠，为临川内史，被司空竟陵王诞所遇，诞败坐诛。长瑜才亚惠连，雍、璿之不及也。临川王义庆招集文王，长瑜自国侍郎至平西记室参军。尝于江陵寄书与宗人何勣，以韵语序义庆州府僚佐云：“陆展染白发欲以媚侧室，青青不解之，星星行复出。”如此者五六句。而轻薄少年遂演之，凡人士并为题目，皆加剧言若句，其文流行。义庆大怒，白文帝，除广州所统曾城令。及义庆薨，朝士并诣第叙哀，何勣谓袁淑曰：

“长瑜便可还也。”淑曰：“国新丧宗英，未宜以流人为念。”庐陵王绍镇寻阳，以长瑜为南中郎行参军，掌书记之任，行至板桥，遇暴风溺死。

灵运因祖父之资，生业甚厚，奴僮既众，义故门生数百，凿山浚湖，功役无已。寻山陟岭，必造幽峻，严嶂数十重，莫不备尽。登蹻常着木屐，上山则去其前齿，下山去其后齿。当自始宁南山伐木开径，直至临海，从者数百。临海太守王琇惊骇，谓为山贼，未知灵运乃安。又要琇更进，琇不肯。灵运赠琇诗曰：“邦君难地险，旅客易山行。”在会稽亦多从众，惊动县邑。太守孟○事佛精恳，而为灵运所轻，当谓○曰：“得道应须慧业，大人生天当在灵运前，成佛必在灵运后。”○深恨此言。又与王弘之诸人出千秋亭饮酒，裸身大呼，○深不堪，遣信相闻。灵运大怒曰：“身自大呼，何关痴人事。”

会稽东郭有回踵湖，灵运求决以为田，文帝令州郡履行。此湖去郭近，水物所出，百姓惜之，○坚执不与。灵运既不得回踵，又求始宁休崕湖为田，○又固执。灵运谓○非存利人，政虑决湖多害生命，言论伤之。与○遂隙。因灵运横恣，表其异志，发兵自防，露板上言。灵运驰诣阙上表，自陈本末。文帝知其见诬，不罪也。不欲复使东归，以为临川内史。

在郡游放，不异永嘉。为有司所纠。司徒遣使随州从事郑望生收灵运。灵运与兵叛逸，遂有逆志。为诗曰：“韩亡子房奋，奏帝鲁连耻，本自江海人，忠义感君子。”追讨禽之，送廷尉，廷尉论正斩刑。上爱其才，欲免官而已。彭城王义康坚执，谓不宜恕。诏以谢玄勋参征管，宜宥及后嗣，降死徙广州。

后秦郡府将宁齐受使至涂口，行达桃墟村，见有七人下路聚语，疑非常人，还告郡县，遣兵随齐掩讨禽之。其一人姓赵名钦，云“同村薛道双先与灵运共事，道双因村成国报钦云：‘灵运犯事徙广州，给钱令买弓箭刀盾等物，使道双要合乡里健儿于三江口篡之。若得志如意后，功劳是同。遂合部尝要谢不得，及还饥谨，缘路为劫。’”有司奏收之，文帝诏于广州弃市。临死作诗曰：“龚胜无余生，李业有终尽，稽公理既迫，霍生命亦殒。”所称龚胜、李业，犹前诗子房、鲁连之意也。时元嘉十年，年四十九。所著文章传于世。

孟○字彦重，平昌安丘人，卫将军昶弟也。昶、○并美风姿，时人谓之双珠。昶贵盛，○不就辟。昶死后，○历侍中、仆射、太子詹事、散骑常侍、左光禄大夫。尝就徐羨之因叙关、洛中事，○叹刘穆之终后便无继者，王弘亦在，甚不平，曰：“昔魏朝酷重张晞，谓不可一日无之。及晞死，何关与废？”○不悦，众宾笑而释之。后卒于会稽太守。

灵运子凤，坐灵运徙岭南，早卒。

高适传

——《旧唐书》卷一一一

【说明】高适（702—765），字达夫，渤海蓨（今河北景县）人。人贫寒，好交游，有游侠之风。后客游河西，为哥舒翰书记。安史之乱后，曾任淮南、剑南节度使等职，官至左散骑常侍，封渤海县侯，世称“高常侍”。

高适诗题材广泛，以边塞诗成就最高，代表作《燕歌行》等篇歌颂了战士们奋勇报国、建功立业的豪情，表现了从军生活的艰苦，对当时的腐败与黑暗也有所揭露。高适与岑参并为盛唐边塞诗的代表诗人，世称“高岑”。此外他还创作一些反映民生疾苦及抒发理想抱负的诗作。他的诗感情真挚，意气俊爽，笔力浑厚，古体长于近体，尤擅七古。有《高常侍集》。

高适，渤海蓨（今河北景县）人。他父亲高从文，官终韶州（今广东韶关）长史。高适少年时代失意无聊，没有正经的活计，家境贫寒，客游于梁（今河南开封）、宋（今河南商丘），以乞求来维持生活。

天宝（公元742—756年）年间，海内各地凡是干谒求进

的人都很注重文词。高适年纪已超过五十岁，才开始留心于诗歌；几年内，他的诗歌体格渐渐发生变化，以气质取胜，自己也以此自豪。他每吟成一篇，便为诗歌爱好者所传诵和赞美。宋州刺史张九皋深以为高适是一位奇才，举荐他以有道科。当时右丞相李林甫擅权专政，不重视文雅之士，只按一般的举子对待他。他脱去平民衣服开始当官，做的是汴州封丘县尉，这个官不是他所乐于做的，于是辞去职位，客游于河西地区。河西节度使哥舒翰见到他，知他有异才，便让他当左骁卫兵曹，在哥舒翰幕府中掌书记，曾跟随哥舒翰入朝，哥舒翰在皇帝面前把高适夸奖一通。

安禄山叛乱，朝廷召哥舒翰讨伐叛贼，高适被升为左拾遗，转监察御史，仍旧辅佐哥舒翰镇守潼关。及至哥舒翰打了败仗，高适从骆谷向西逃走，奔赴皇上所在的地方，到了河池郡（今陕西凤县），拜见唐玄宗，因而陈说潼关一战失败的情况：“仆射哥舒翰感激皇上大恩，能持忠义之节，这一点臣是很了解的，然而他患病沉重，神智和体力也都已经枯竭。监军李大宜和将士相约举香火，在神前盟誓，结为死党。他们让倡妓弹箜篌和琵琶，互相娱乐，又赌博纵酒，不理军务。吐谷浑兵士和关中、陇西的武士，盛夏五六月，在烈日下晒，仓米做的饭吃不饱，让他们英勇出战，哪里能做得到的呢？所以有见到敌人就逃散奔亡的，有身临战阵而倒戈的，以致潼关这个万金之地，一日工夫就丢失了。南阳（今属河南）方面的军队，鲁灵、何履光、赵国珍各皆持节静观，监军数人也各行其是，像这个样子，哪有能战而必胜的道理呢？臣同杨国忠争说利害，总不被采纳。陛下因此落得跋涉巴山、剑

阁的艰险道路，西入蜀中，避开叛军，这也说不上耻辱。”唐玄宗嘉奖他，不久便升为侍御史。车驾到了成都，八月，玄宗下诏说：“侍御史高适，忠贞立节，身正品高，胸怀经国济世的谋略，腹有雅丽富赡的文才。他善于谋长远之计，又合于国之大体；正直敢言，义形于色，实在是一位难得的忠臣。合当回转纠远的职务，而使他任讽谏的官职。任命他为谏议大夫，赐绯鱼袋。”高适正气凛然，敢于直言，权贵佞臣，都很害怕。

至德二年（757），永王李璘起兵向江东进发，想占领扬州（今属江苏）。起初，上皇李隆基以诸王分镇各道。高适极力进谏，认为此议不可行。及至永王反叛，肃宗听说高适曾经劝阻诸王分镇事，于是召他来谋平叛事。高适便陈述江东的利与弊，并判断永王起兵必败。肃宗感到他的对答不平常，于是以高适兼御史大夫、扬州大都督府长史、淮南节度使。下诏命高适和江东节度来瑱已率本部兵一起平定江淮的叛乱，会师于安州（今湖北安陆）。大军即将东渡，而永王已兵败如山倒，于是抬叛将季广琛投降于历阴（今安徽和县）。平叛战争结束，李辅国很忌恨高适的正直敢言，在皇上面前说他的坏话，于是降职授予太子少詹事职务。

没多久，蜀中兵乱，高适被出为蜀州刺史，转为彭州刺史。剑南地区自从玄宗回长安京都后，在梓州（治所在今四川三台）和益州（治所在今四川成都）二州各设置一节度，百姓负担太重，劳顿疲惫，高适于是出西山三城设置戍卫，并上疏论曰：

剑南地区虽然名曰东川西川，分为两处，其实一道。

自邛关、黎、雅各州，与南蛮交界；茂州以西，经羌中至平戎几城，与吐蕃交界。靠近边境的各小郡，各有卫戍兵丁，都由剑南供给军费。其运粮赴戍，以全蜀之力，加以山南道相助，尚且无法胜任。而今梓、遂、果、阆等八州，另划为东川节度，岁月计费，西川不可干予取绘；而嘉州、陵州最近为獠夷所攻陷，今虽然已经小定，但战争的疮痍尚未平复。又近年来，西川耕织都废，而衣食取给，都从成都贸易得来，那么当地人不能从事耕织之役是很明显的。今天可以征收税赋的地方，只有成都、彭州、蜀州、汉州而已。又以这残破的四州，去承担其他十州的重役，要维持很久，不是十分艰难的吗？再就是那些谈利的人，钻营万端，都从百姓那里敲榨索取；应付征劳役赋税的人，从早到晚，案牒簿册积压很多。官吏相因相承，害怕得罪上司，遭到谴责，有的责怪邻乡，有的以杖打威胁百姓。督办催促不止，逃亡的人也就愈多，想要做到没有流民，照理是做不到的。近日关中米价很贵，而高贵人家，也颇有些到城外谋生的，所以山南道和剑南道，道路相望，往来不绝，在村坊或者市店，和蜀人杂居，他们升斗所储的米，都是向蜀人求取的。况且田地的疆界是有边有际的，而税赋徭役却是无穷无尽的。替蜀人打算打算，不是很艰难的吗！

今日使蜀人为之疲惫不堪的与吐蕃城堡，不过只平戎以西数城而已。这些边城远在穷山之上，临于险绝之境，运粮的道路狭小到要束马而行，守卫的兵士在无人之乡披甲以待。这样做，对于戎狄来说，并不利于戎狄

之民；对于国家来说，也不能扩大国家之地。为什么要以这充满险阻的弹丸之地，去困扰全蜀的太平之民呢？因此边事恐怕不是今日紧急之务。国家如果以为已经戍守的土地不可废弃，已经镇边的士兵不可召回，那么似乎应当辞掉停止对东川的负担，与东川合力对付这种局面，尚且恐怕狼狈不堪，难以维持，哪里可以只仰仗于成都、彭州、汉州、蜀州这四个州呢？不是没考虑到有违圣朝荡涤关东扫清逆乱的旨意，但倘若蜀人也发生扰乱，岂不是又给陛下带来忧患吗？从前公孙弘请罢西南夷、临海之事，专力平定朔方，贾捐之请弄珠崖之事，以求得中原的安宁。正直的话是为政之本，不是一朝一夕短促的时间可以做到的。愚臣希望罢掉东川节度，以统一剑南，西山这不急之城，稍稍加以削减，那么事情就不至于穷顿，也可免处于倒悬的危境。陛下如果以为微臣所陈说的能有益于万一，下诏让宰相到朝廷商议，让秉公忠直的大臣来定其损益，与剑南节度一同处置。

高适奏疏献上皇帝，没被采纳。后来梓州（今四川三台）副使段子璋造反，发兵进攻东川节度使李旼，高适率兵跟从西川节使崔光远攻打段子璋，把他杀掉。西川牙将花惊定，自恃骁勇，杀段子璋后，却在东蜀大肆掠夺。皇帝大怒，说崔光远不能安定军心，就罢掉他的官，以高适代替崔光远，为成都尹、剑南西川节度使。代宗即帝位后，吐蕃攻陷陇右，渐渐逼近京城长安郊外。高适就在蜀中练兵，军临吐蕃南境，以牵制其进逼京郊的兵力，但师出无功，而松州、维州等地反被吐蕃所攻陷。代宗便以黄门侍郎严武取代高适的职务，让

高适返回朝廷，任刑部侍郎，转散骑常侍，加银青光禄大夫，进封渤海县侯，食邑七百户。永泰元年（公元765年）正月死，追赠礼部尚书之职，谥号曰“忠”。

高适喜欢谈王霸之道的大方略，以追求功名为务，又讲究节义。他生于当时，恰逢国家多难，常以国亡安危为己任，然而其所言谈，过于其实际本领，所以为大臣所轻视。历任地方州牧郡守，为政从宽从简，官吏和人民都感到方便。有文集二十卷。他的《与贺兰进明书》，命令他急救梁、宋两地之危，以救援诸军；《与许叔冀书》，情意殷勤，以续旧谊，让他消解其他积怨，共同援助梁、宋；《未过淮先与将校书》，让各将校与永王李璘决绝，自求生路，保持清白。这些文章，君子以为都能明其义而知其变。自唐以来，诗人在政治上发迹高升的，只有高适而已。

（刘林 译）

【原文】

高适者，渤海蓨人也。父从文，位终韶州长史。适少蓢落，不事生业，家贫，客于梁、宋，以求丐取给。天宝中，海内事干进者注意文词。适年过五十，始留意诗什，数年之间，体格渐变，以气质自高，每吟一篇，已为好事者称诵。宋州刺史张九皋深奇之，荐举有道科。时右相李林甫擅权，薄于文雅，唯以举子待之。解褐汴州封丘尉，非其好也，乃去位，客游河右。河西节度哥舒翰见而异之，表为左骁卫兵曹，充翰府掌书记，从翰入朝，盛称之于上前。

禄山之乱，征翰讨贼，拜适左拾遗，转监察御史，乃佐翰守潼关。及翰兵败，适自骆谷西驰，奔赴行在，及河池郡，谒见玄宗。因陈潼关败亡之势曰：“仆射哥舒翰忠义感激，臣

颇知之，然疾病况顿，智力将竭。监军李大宜与将士约为香火，使倡妇弹箜篌琵琶以相娱乐，樗蒲饮酒，不恤军务。蕃浑及秦、陇武士，盛夏五六月于赤日之中，食仓米饭且犹不足，欲其勇战，安可得乎？故有望敌散亡，临阵翻动，万全之地，一朝而失。南阳之军，鲁炆、何履光、赵国珍各皆持节，监军等数人更相用事，宁有是，战而能必胜哉？臣与杨国忠争，终不见纳。陛下因此履巴山、剑阁之险，西幸蜀中，避其蚤毒，未足为耻也”。玄宗嘉之，寻迁侍御史。至成都，八月，制曰：“侍御史高适，立节贞峻，植躬高朗，感激怀经济之略，纷纶赡文雅之才。长策远图，可云大体；谏言义色，实谓忠臣。宜回纠遯之任，俾超讽谕之职。可谏议大夫，赐绯鱼袋。”适负气敢言，权幸惮之。

二年，永王璘超兵于江东，欲据扬州。初，上皇以诸王分镇，适切谏不可。及是永王叛，肃宗闻其论谏有素，召而谋之。适因陈江东利害，永王必败。上奇其对，以适兼御史大夫、扬州大都督府长史，淮南节度使。诏与江东节度来瑱率本部兵平江淮之乱，会于安州。师将渡而永王败，乃招季广琛于历阳。兵罢，李辅国恶适敢言，短于上前，乃左授太子少詹事。

未几，蜀中乱，出为蜀州刺史，迁彭州。剑南自玄宗还京后，于梓、益二州各置一节度，百姓劳敝，适因出西山三城置戍，论之曰：

剑南虽名东西两川，其实一道。自邛关、黎、雅、界于南蛮也；茂州而西，经羌中至乎戎数城，界于吐蕃也。临边小郡，各举军戎，并取给于剑南。其运粮戍，以全

蜀之力，兼山南佐之，而犹不举。今梓、遂、果、阆等八州分为东川节度，岁月之计，西川不可得而参也。而嘉、陵比为夷獠所陷，今虽小定，疮痍未平。又一年已来，耕织都废，而衣食之业，皆贸易于成都，则其人不可得而役明矣。今可税赋者，成都、彭、蜀、汉州。又以四州残敝，当他十州之重役，其于终久，不亦至艰？又言利者穿凿万端，皆取之百姓；应差科者，自朝至暮，案牘千重。官吏相承，惧于罪谴，或责之于邻保，或威之以杖罚。督促不已，逋逃益滋，欲无流亡，理不可得。比日关中米贵，而衣冠士庶，颇亦出城，山南、剑南，道路相望，村坊市肆，与蜀人杂居，其升合斗储，皆求于蜀人矣。且田土疆界，盖亦有涯；赋税差科，乃无涯矣。为蜀人之计，不亦难哉！

今所界吐蕃城堡而疲于蜀人，不过平戎以西数城矣。邈在穷山之巔，垂于险绝之末，运粮于束马之路，坐甲于无人之乡。以戎狄言之，不足以利戎狄；以国家言之，不足以广土宇。奈何以险阻弹丸之地，而困于全蜀太平之人哉？况非今日之急务也。国家若将已戍之地不可废，已镇之兵不可收，当宜却停东川，并力从事，犹恐狼狈，安可仰于成都、彭、汉、蜀四州哉！虑乖圣朝洗荡关东扫清逆乱之意也。倘蜀人复扰，岂不貽陛下之忧？昔公孙弘愿罢西南夷、临海，专事朔方，贾捐之请弃珠崖以宁中土，说言政本，匪一朝一夕。臣愚望罢东川节度，以一剑南，西山不急之城，稍以减削，则事无穷顿，庶免倒悬。陛下若以微臣所陈有裨万一，下宰相廷议，降公

忠大臣定其损益，与剑南节度终始处置。

疏奏不纳。

后梓州副使段子璋反，以兵攻东川节度使李旼，适率州兵从西川节度使崔光远攻子璋，斩之。西川牙将花惊定者，恃勇，既诛子璋，大掠东蜀。天子怒光远不能戢军，乃罢之，以适代光远为成都尹、剑南西川节度使。代宗即位，吐蕃陷陇右，渐逼京畿。适练兵于蜀，临吐蕃南境以牵制之，师出无功，而松、维等州寻为蕃兵所陷。代宗以黄门侍郎严武代还，用为刑部侍郎，转散骑常侍，加银青光禄大夫，进封渤海县侯，食邑七百户。永泰元年正月卒，赠礼部尚书，谥曰忠。

适喜言王霸大略，务功名，尚节义。逢时多难，以安危为己任，然言过其术，为大臣所轻。累为藩牧，政存宽简，吏民便之。有文集二十卷。其《与贺兰进明书》，令疾救梁、宋，以亲诸军；《与许叔冀书》，绸缪继好，使释他憾，同援梁宋；《未过淮先与将校书》，使绝永王，各求自白。君子以为义而知变。而有唐已来，诗人之达者，唯适而已。

韩愈传

——《旧唐书》卷一六〇

【说明】韩愈（768～824），唐代文学家，哲学家。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孟县）人，祖籍昌黎，世称“韩昌黎”。少孤，由嫂抚养，贞元年间中进士，历任监察御史，国子博士，刑部侍郎等职，因直言进谏，多次被贬。官终吏部侍郎，卒谥文，世称“韩吏部”、“韩文公”。

韩愈在政治、文学方面都有所建树，主要成就是文学。他力反六朝以来的骈偶文风，主张“文以载道”，提倡散体，与柳宗元同为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其散文气势雄健，纵横开合，奇偶交错，巧譬善喻，继承了先秦、两汉散文的优秀传统，又加以新变和发展，被列为“唐宋八大家”之首。韩愈的诗也有很高成就，力求新奇，以文入诗，有纵恣雄奇的艺术特色，但也有累赘堆砌、流于险怪的缺点。他的诗对宋诗的发展有极大影响。

韩愈政治上反对藩镇割据，思想上崇儒排佛。所作《原道》、《原性》诸篇，强调尧舜至孔孟一脉相承的道统，维护儒家的传统思想。

韩愈的作品流传广泛，有《昌黎先生集》。

韩愈，字退之，昌黎（今属河北）人。父亲韩仲卿，没有名望地位。韩愈才三岁，便成为孤儿，寄养在堂兄家中。韩愈自知是孤儿，所以从小就刻苦学习儒家经典，不待奖励，便自觉学习。大历（766—779）、贞元（785—805）之间，为文多数崇尚古学，仿效杨雄、董仲舒的著作，而独孤及和梁肃学得最深奥，文人们多推崇他们。韩愈跟他们这一帮人交游，积极钻研，想自己振作奋斗，对当代有所影响。及至参加进士考试，在公卿中间投文干谒，原宰相郑余庆积极为他宣传表扬，从此名振于当世。

不久，韩愈考上进士第，宰相董晋出为大梁（今河南开封）长官，招韩愈为巡官。解大梁巡官后，徐州（今属江苏）张建封又请他为宾佐。韩愈说话真率，无所畏惧，也无所回避，品行正直，不巧于世务。后调入京，授四门博士，转监察御史。唐德宗晚年，政出多门，宰相也不专于政务机要，宫廷贱买民物的“宫市”之祸害十分严重，谏官提出意见，皇上都不听。韩愈曾写了数千言的奏章严厉批评，皇上也不听，并大怒，贬韩愈为山阳（今河南修武）县令，不久移为江陵府（今属湖北）掾曹。元和（806—820）初年，召为国子博士，升都官员外郎。其时华州（今陕西华县）刺史闫济美因为公事停华阴（今属陕西）令柳涧县务，让杜甫代理掾曹之职。任职数月，闫济美罢华州刺史之职，出住公家馆舍，柳涧便乘机劝百姓拦路索取前年军役的劳务费。后任刺史赵昌检查此案，得知柳涧之罪状，上报朝廷，贬为房州（今湖北行山）司马。韩愈因公务出差，路过华州，得知柳涧的事，认为是刺史结党相包庇，上疏治柳涧，被朝廷搁置一边。命监

察御史李宗琦下去覆核，得知柳涧贪脏罪状，再贬他为封溪（今越南北境）县尉。朝廷认为韩愈上疏论柳涧是“妄论”，所以复任国子博士。

韩愈自负才高，而屡遭排斥，于是作《进学解》以自况，文曰：

国子监先生早晨入太学，召集众儒生在学馆下面站立着，教导他们说：“学业要精，在于勤奋；学业之荒废，在于玩乐。行为之成在于思考；行为之坏在于轻率。当今之世，圣主贤臣相逢，治国之法律政令普遍建立，除去凶险邪恶之人，提拔重视优秀人才。具有小的好处一般都加以录取，以一技之长著称的人无不被任用。对于人才，要搜罗选拔，要训练造就。其有幸者而被录选，谁说太多而不加以表彰呢？众儒生只担忧学业不能精进，而不担心主管的官吏之不能明察；行为只担忧不端正，而不担心主管官吏之不能公平。”

国子监先生话没说完，有在儒生行列中窃笑的，说：“先生欺骗我呀！学生我奉事先生，至今已有些年了。先生您嘴里不停地朗诵“六经”之文，手里不停地批翻百家之书。记事之类的书，必定提取某纲要；辑言之类的书，必定探求其玄妙。贪多务得，无论小的大的都不舍弃。晚上点上油灯，接续日光，日夜刻苦读书，常终年勤勉不懈地用功。先生之对于学业，真可以说够勤的了。抵制排斥不合儒道的异端邪说，排挤责斥佛教和道教，填补空缺，发扬儒家学说的深奥玄理。寻求将要断绝的茫茫然的儒家道统，独自从各方面搜求并远继孔孟事业；阻

拦百川之横流，使之东流入海，扭转处于压倒优势的汹涌狂澜。先生之对于儒学，真可以说很有劳绩的了。沉醉于古人的妙文之中，品味其精华，撰写文章，著书立说，家里堆满了书。上可以说取法于虞舜夏禹的典籍之风格浑厚深广，周之文诰、殷王盘庚之布告之曲折拗口，《春秋》经文文理之周密严谨，《春秋左氏传》传文文辞之铺张夸大，《周易》阐说事理之奇妙而有法则，《诗经》内容之正大和文辞之华美，下至《庄子》、《离骚》，太史公司马迁所录之《史记》，杨雄、司马相如二人所作的赋之异曲同工。先生之作文，其可以说文旨宏大而文辞恣肆。少时开始学习，勇而敢作敢为；长大通达道理，左右皆适宜。先生之修身为人，真可以说是成熟完美了。然而你却于公不被人家所信任，于私不为朋友所帮助，进退两难，到处碰壁，一有举动便获罪。当了短暂的监察御史，很快就被贬斥到南方少数民族地区。三次当国子博士，所任闲职，表现不出治绩。命运有意与之为仇，不知要倒霉到什么时候。冬天温暖，而儿女还叫冷，年景丰收，而妻室还啼饥。头发掉了，牙齿脱落，直到老死，又有什么补益？不知道考虑这些情况，反倒教训起别人来了！”

国子监先生说：“喂，您到前面来。大的木头作屋梁，小的木头作椽子，斗拱短柱，枢臼门橛门闩楔木，都适当地利用各种木材，用以盖成房子，这是工匠们的工巧。玉屑、朱砂、天麻、龙芝，车前草、马屁菌、破烂的鼓皮，都一并收藏起来，等彼派用场，这是医师的良术。光

明正大公平合理地选拔人才，巧的拙的掺合着予以录用，深思稳重的含有内美，超群出众的表现杰出，比较其优劣，按其材器加以适当安排，这是宰相治国的妙法。从前孟轲喜好辩论，孔子的学说因而更加彰明，车轮之迹遍天下，以奔波而终于老死。苟况恪守孔子的正道，儒家宏论才得到发扬，逃避谗毁，跑到楚国，为兰陵令，后被废官，死于兰陵。这两位儒家继承人，说出来的言论就是经典，他们的行动成了行为的准则，超越同辈，以儒学之优进入圣人之门，然而他们在世俗中的遭遇如何呢？今天国子监先生虽然学习勤奋，但却未能遵循儒家的道统；言论虽然颇多，但却不能归结到儒家的中庸之道；文章虽然新奇，但却无益于实用；品行虽然有修养，但却未能显扬于众人之中。尚且月月花费薪金，年年耗损禄米，儿子不知耕种，老婆不会织布，骑着马还有仆从跟随，安稳地坐着吃饭，小心谨慎地跟随世俗之道，偷看古人著作并加以剽窃抄袭。然而圣明的君主并不加以责罚，宰相也不予以罢职，这哪里不是他的幸运呢！一有举动就被毁谤，而狂名却也随之显扬。安置在闲散的职位上，当然是分内应得的。至于计较财物的有或无，论其地位的高或低，忘记自己分量是否符合标准，却指摘前人的缺点，这就是质问工匠不用小木桩代替柱子，责怪医师用菖蒲之药去延年益寿，要他进用泻药猪苓。”

掌权的大官读了韩愈这篇文章而怜惜他，认为他具有治史之才，改任他为比部郎中之职、史馆修撰之任。超过一年，又转为考功郎中，知制法，拜中书舍人。

不久，有不喜欢韩愈的，收集他过去的材料，说他以前贬为江陵（今属湖北）掾曹时，荆南节度使裴均给他很优厚的待遇。裴均的儿子裴锷凡庸鄙俗，最近裴锷回来探望父亲，韩愈作序文饯送裴锷，仍称其字。这事议论纷纷，闹到朝臣当中，因为这件事，韩愈被改官太子右庶子。元和十二年（817）八月，宰相裴度为淮西宣慰处置使，兼彰义军节度使，请韩愈为行军司马，仍旧赐金鱼袋和紫衣。淮西、蔡州之乱平定以后，韩愈于十二月随裴度回朝，因有功授官刑部侍郎，下诏让他撰写《平淮西碑》，碑文多叙写裴度的事迹。其时先入蔡州擒捉吴元济的，李愬的功劳应推第一，所以李愬对韩愈所撰碑文深感不满。李愬的妻子出入宫中，四处诉说碑文失实，于是朝廷下诏磨去韩愈所撰碑文。唐宪宗命翰林学士段文昌重新撰写碑文并刻于石碑上。

凤翔（今属陕西）法门寺有护国真身塔，塔内有释迦文佛手指骨一节，按佛书所传之法，三十年开示一次，开示则岁得丰收人氏平安康泰。元和十四年（819）正月，皇上令宦官杜英奇率领宫人三十人，手拿香花，到临皋驿迎接佛骨。迎佛骨的队伍迎来的佛骨，自光顺门迎入皇宫，留在宫中三日，才送到各寺院。王公贵族，乃至士人百姓，奔走迎送，竞相施舍，唯恐落后。百姓有废掉产业的，有烧灼头颅和臂膀的，都想求供养佛骨。韩愈平素不喜欢事佛，上疏进谏说：

臣以为所谓佛，是夷狄的一法而已。自后汉时才传入中国，在上古从未有过。从前黄帝在位一百年，岁数一百一十岁；少昊帝在位八十年，岁数一百岁；颡顼在位七十九年，岁数九十八岁；帝誉在位七十年，岁数一

百零五岁；帝尧在位九十八年，岁数一百一十八岁；舜帝和夏禹岁数都上百岁。那时天下太平，百姓安乐，而且长寿，然而那时中国还没有所谓佛呢。后来商汤岁数也有百岁，汤的孙子大戊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年，历史书籍不说他们的寿命，大概也都不在百岁之内。周文王九十七岁，武王九十三岁，穆王在位一百年。那时佛法也未传至中国，并不是因为奉事佛节才有这样的长寿啊。

汉明帝时才有佛法，明帝在位才十八年。后来不是动乱就是亡国，相继而至，国祚并不长久。南朝宋代、齐代、梁代、陈代、元魏以下，奉事佛法渐渐谨诚，然而国运愈是短促。唯有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后三次舍身施佛，祭祀宗庙，不用三牲，白天每天只吃一顿，只吃蔬菜和水果；后来竟然为数叛侯景所逼迫，饿死在台城，国家不久也就灭亡了。事佛以求福，却反而得祸。从这些史实看来，所谓佛，实在不能相信，也就可以明白了。

大唐高祖皇帝刚受隋朝之禅让，就商议废除佛法。当时群臣见识短浅，不能深深追溯古圣先王之道，推究阐发圣明之德，以补救佛法之弊端，废佛之事遂搁置一边。臣对此曾感遗憾呀！皇帝陛下，您神圣英武，几千百年来无与伦比。陛下即位初时，就不许剃度人为僧人尼姑和道士，又不允许另立寺院道观。臣当时以为高祖的宏愿，必定实行于陛下手中。今日纵然尚未能立即实行，岂可以恣意奉佛使之变得更加盛行啊。

今听说陛下命令众僧人迎佛骨于凤翔，登楼观看，将佛骨抬入宫廷，还传令各寺院递相迎接供养佛骨。臣虽然非常愚蠢，也知道陛下不至为佛所迷惑，作出这样推崇奉事佛法以求得福运祥瑞的傻事来。只是因为丰收年景人民安乐，顺着民心，为京都的士人百姓设些怪异的观赏和玩耍游戏的名堂而已。哪有如此 圣明而肯相信这等荒诞之事呢？但是百姓们很愚蠢又顽固，容易受迷惑却难以晓以道理，如果看到陛下这样的举动，将会以为陛下真心相信佛法。都说天子大圣，尚且一心敬佛信佛，百姓既微且贱，对佛哪能爱惜身躯和性命。所以灼灸头顶焚烧手指，或百或十，成群结队，解衣服散钱财，从早到晚，互相仿效，惟恐落在他人之后，老人和小孩也到处奔走，都丢弃各自的活计。如果不立即加以禁止，再经历几座寺院，必定有砍断臂膀切割身躯去供养佛骨的。伤风败俗，传笑四方，这不是小事情啊。

佛本来是夷狄之人，和中国语言并不相通，衣服也不一样。佛口不说先王的法言，身不穿先王的法服，也不知君君臣臣之义和父父子子之情。假如佛身尚存，奉其国君之命，来到京师朝见陛下，陛下容纳并加以接待，也不过在宣政殿接见一次，设迎宾礼一次，赐衣服一件，护卫并送他出于国境，不会让他来迷惑众百姓的。何况其身死去已经很久了，枯朽的骨头，是凶事秽物的剩馀，岂宜于引入宫廷之中啊！孔子说：“敬鬼神而远之。”古代诸侯，到卫国行吊丧之礼，尚且要让巫祝先用桃枝编的茆帚，扫除不祥，然后再进去行吊。今天无故取这腐

朽污秽之物，亲自登楼观看，巫祝不先行，桃枝苕帚也不用，群臣不说那是不对的，御史也不举报这样做的过失，臣实在感到耻辱。乞请将这佛骨丢到水里或用火烧掉，永远绝掉它的根本，断掉天下人的迷信，消除后代的疑惑。使天下之民，知道大圣人的所作所为超出于平常人不是万万所能计算的，那岂不是一大盛举！那岂不快哉！佛如果真的有灵，能致祸作祟，所有灾殃大祸，宜加在臣身上。上天监察作证，臣不怨恨也不翻悔。

奏疏交上去，宪宗非常愤怒。隔一天，宪宗拿出韩愈的奏疏让宰相看，打算加以极刑。裴度、崔群卫奏说：“韩愈上疏忤逆皇上尊听，确实宜加罪，然而不是内心怀有忠恳之情，不回避被责斥或贬逐，哪能做到这个样子？尚乞稍赐宽容，以便招后来之进谏者。”宪宗说：“韩愈说我奉佛太过分，我还可以宽容他。至于说东汉奉佛以后，帝王都招致夭死，这话多么乖逆刺激啊？韩愈作为臣子，竟敢如此狂妄，所以不能赦免。”于是民情惊恐惋叹，乃至国戚权贵也以为对韩愈的判罪太重，借故劝说宪宗，于是贬韩愈为潮州（今属广东）刺史。

韩愈到了潮阳，上表说：

臣今年正月十四日，蒙恩授潮州刺史之职，即日启程，奔驰驿路。经过跋涉，来到岭南，计水陵之程，约有万里。臣所管辖的潮州，在广府最东边，距广府虽说二千里，然而一个来回，动即超过一个月。经过海口，下恶水，急流涛波壮阔猛烈，难以计算日期和路程，飓风和鳄鱼，有不测之祸患。州南近处边界，南海之水连接

蓝天，毒雾瘴气，日夜发作。臣从小多病，年纪才五十，头发已花白，牙齿也开始脱落，理应不能活得长久。加以所犯之罪极重，所处之地又极远极险恶，忧惊愧怕，不日死亡。孤独一身，朝中无亲无党，谪居这蛮夷之地，和鬼怪为群。假如不是陛下哀怜顾念，有谁为臣说句好话。

臣稟性愚蠢丑陋，人事关系多不通达，只酷爱学问和文章，不曾一日废弃停辍，实是为同时一辈人所称许。臣对于当世之文，也没有超人之处，至于论述陛下的功德，和《诗经》、《尚书》相呼应，写作诗歌，荐送于郊庙，纪封泰山，镂刻白玉牒，铺陈张扬齐天的大美德，表扬激励空前的大功绩，编入《诗经》、《尚书》这类典籍而无愧色，措置于天地之间而无亏损。即使古人再生，臣也不肯谦让。大唐受天命而拥有天下，四海之内，莫不是臣民与侍妾，东南西北，其疆域各有万里之遥。自从天宝以后，政治稍为松散，文臣不能优化，武官也难以约束。孽臣奸佞。表面顺从而内怀叛逆，父亲死了，儿子袭承其职权，或以祖传之于孙，类似古代诸侯，自擅其权，自辖其地，不入朝，不进贡，已经六七十年。四位圣君传位，以至于陛下，亲自临朝听政决断，干戈所指，无不听从。宜当制定乐章，以昭告神明，东行巡视封于泰山，向皇天奏功，使长久万年，顺从我大唐功业。当此之际，是所谓千载难逢的大好机会，而臣戴罪之人，自拘宁于海岛，唉声叹气，日日接近死亡，而不曾献上薄劣的技艺于官隶之间，用尽精力，费尽心思，以赎取以前的罪过。内心怀痛，忧思极天，死不瞑目。瞻望京

中皇宫，神魂已随着飞去。希望陛下，如同天地父母，哀而怜我。

宪宗对宰相说：“昨天我收到韩愈潮州上的表，因而想起他谏迎佛骨的事，确实是很爱我的，我哪里不知？但是韩愈作为人臣，不应当说皇帝奉佛才短命。我所以讨厌他的轻率。”皇上想再起用韩愈，所以先说及韩愈，看看宰相对这事有什么看法。而皇甫镈讨厌韩愈的狂直，恐怕宪宗再起用韩愈，就带头说：“韩愈实在太疏放狂妄，可以移近京畿一郡任职。”于是授予袁州（今江西宜春）刺史。

初时，韩愈到潮阳，开始办公，问及官吏百姓的疾苦，都说：“郡西潭水里有鳄鱼，下蛋孵化出来的，约有几丈长，吃老百姓的牲畜，快被吃完了，所以百姓贫穷。”住了几天，韩愈去视察一番，让判官秦济烤一猪一羊，投到潭水里，为文咒鳄鱼说：

前代薄德的君主，放弃楚、越之地，那样，鳄鱼游泳生存于这里是可以的。但如今天子神明圣贤，四海之外，也安抚而拥有。何说扬州（潮州古属扬州）之境，刺史和县令所治理的范围，缴纳赋税贡品以供皇帝祭祀宗庙鬼神，鳄鱼岂可以和刺史混居这里呢？刺史受皇上之命，镇守此地，而鳄鱼悍然不安居于溪潭，而吃百姓所养熊、鹿、獐、猪等牲畜，以肥其身，以产卵繁殖，和刺史争长称雄。刺史虽然笨而且弱，但哪里肯向鳄鱼低头而甘拜下风呢？今潮州大海在它的南边，鲸鱼鹏鸟这样的大物，虾和螃蟹这样的小物，无不能容纳，鳄鱼早

上离开这里，晚上就到大海中去了。今天和鳄鱼约定，三日至七日，如顽固不愿迁徙，等待害物，那么刺史就选强壮又有技艺的勇士，拿着强弓毒箭，和鳄鱼决一胜负。

咒鳄鱼的那天晚上，有狂风惊雷从潭中发出来。几天工夫，潭水尽干枯，鳄鱼都迁徙到离群西六十里的旧潭里，自此潮州之民再没有鳄鱼的祸患了。

袁州的风俗，男的女的如果卖身作奴隶，超过预约期限无钱赎身的，就归于出钱的人家。韩愈来了，设法赎回被籍没的男女，还给他们的父母。仍旧废去其俗之法，不许卖身作奴隶。

元和十五年（820），韩愈被召为国子祭酒，转为兵部侍郎。正遇镇州（今河北正定）杀了田弘正，立王廷凑，命令韩愈到镇州宣布解说。韩愈到了镇州，召集军民，晓以顺逆的道理，说话言辞和情感都很真切，王廷凑敬畏而且重视他。又改任吏部侍郎，转为京兆尹，兼御史大夫。韩愈因为不参谒台臣，被御史中丞李绅所弹劾。韩愈不服气，说有敕令准予御史大夫不必参谒台臣。李绅和韩愈为人性情都怪僻，名刺送来送去，纷纷然没完没了，于是让李绅出为浙西观察使，韩愈也罢去京兆尹之职，为兵部侍郎。及至李绅临行赴镇，向唐穆宗当面辞行，哭泣着叙说情况的经过，穆宗可怜他，于是追下诏令，以李绅为兵部侍郎，韩愈仍旧任吏部侍郎。

长庆四年（824）十二月，韩愈死，享年五十七岁，赠礼部尚书，谥号曰“文”。

韩愈性弘大通达，和人交往，不管是显荣还是倒霉，交情都不改变。少年时和洛阳人孟郊、东郡人张籍友好。这二

位朋友声名地位还没显露时，韩愈不避寒冷酷热，在公卿中间活动，竭力加以举荐。而张籍终于科举及第，当官显贵。后来虽然荣贵一时，但每当公余空闲之时，就相聚饮宴谈天，论文赋诗，和以前一个样。而看待那些权贵豪门，却如同走仆奴隶，睁着眼睛也不看一下。同时颇能诱导勉励后进之士，收入馆中的有十六七人，即使早饭吃不上，也怡然自得，从不介意。他一生大抵以振兴名教发扬仁义为己任。共嫁内外亲戚和朋友中的孤女只十人。

韩愈常认为自魏、晋以来，作文的人多拘泥于对仗，而在文经、诰的要旨，司马迁、扬雄文章的气格，却不复加以继承和发扬了。所以韩愈所写的文章，务求反对近体，抒意立言，都自成一家。后学士人，都师其文，取为法则。当时写文章的人很多，没有人能超过他，所以世称“韩文”。然而他有时恃才自傲，肆意而行，也有背离孔子、孟子之旨的地方。譬如南方人妄传柳宗元为罗池神，而韩愈写碑文却加以证实；李贺父亲名晋，不应能加进士考试，而韩愈却为李贺写《讳辨》，要他参加进士考试；又作《毛颖传》，讥刺戏谑也不近人情；这些都是文章中很谬误的。时人说韩愈有史笔，及至撰写《顺宗实录》，繁简失当，叙事也不善于取舍，颇为当时所非议。唐穆宗、文宗曾下诏让吏臣加以添改，那时韩愈的女婿李汉、蒋係正处于显荣的地位，诸公颇为难。而韦处厚竟另外撰写《顺宗实录》三卷。韩愈有文集四十卷，李汉为之作序。

（刘林 译）

【原文】

韩愈字退之，昌黎人。父仲卿，无名位。愈生三岁而孤，

养于从父兄。愈自以孤子，幼刻苦学儒，不俟奖励。大历，贞元之间，文字多尚古学，效杨雄、董仲舒之述作，而独孤及、梁肃最称渊奥，儒林推重。愈从其徒游，锐意钻研，欲自振于一代。洎举进士，投文于公卿间，故相郑余庆颇为之延誉，由是知名于时。

寻登进士第。宰相董晋出镇大梁，辟为巡官。府除，徐州张建封又请为其宾佐。愈发言真率，无所畏避，操行坚正，拙于世务。调授四门博士，转监察御史。德宗晚年，政出多门，宰相不专机务，宫市之弊，谏官论之不听。愈尝上章数千言极论之，不听，怒贬为连州阳山令，量移江陵府掾曹。元和初，召为国子博士，迁都官员外郎。时华州刺史阎济美以公事停华阴令柳涧县务，俾摄掾曹。居数月，济美罢郡，出居公馆，涧遂讽百姓遮道索前年军顿役直。后刺史赵昌按得涧罪以闻，贬房州司马。愈因使过华，知其事，以为刺史相党，上疏理涧，留中不下。诏监察御史李宗爽按验，得涧赃状，再贬涧封溪尉。以愈妄论，复为国子博士。愈自以才高，累被摈黜，作《进学解》以自喻曰：

国子先生晨入太学，召诸生立馆下，诲之曰：“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方今圣贤相逢，治具毕张，拔去凶邪，登崇俊良。占小善者率以录，名一艺者无不庸。爬罗剔抉，刮垢磨光。盖有幸而获选，孰云多而不扬？诸生业患不能精，无患有司之不明；行患不能成，无患有司之不公。”

言未既，有笑于列者曰：“先生欺予哉！弟子事先生，于兹有年矣。先生口不绝吟于六艺之文，手不停披于百

家之编。记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钩其玄。贪多务得，细大不捐。烧膏油以继晷，常矻矻以穷年。先生之业，可谓勤矣。觝排异端，攘斥佛、老，补苴罅漏，张皇幽眇。寻坠绪之茫茫，独旁搜而远绍；障百川而东之，回狂澜于既倒。先生之于儒，可谓有劳矣。沉浸浓郁，含英咀华，作为文章，其书满家。上规姚、姒，浑浑无涯。《周诰》、《殷盘》，佶屈聱牙。《春秋》谨严，《左氏》浮夸。《易》奇而法，《诗》正而葩。下迨《庄》、《骚》，太史所录，子云、相如，同工异曲。先生之于文，可谓闳其中而肆其外矣。少始知学，勇于敢为；长通于方，左右具宜。先生之于为人，可谓成矣。然而公不见信于人，私不见助于友，跋前踖后，动辄得咎。暂为御史，遂窜南夷。三为博士，冗不见治。命与仇谋，取败几时。冬暖而儿号寒，年丰而妻啼饥。头童齿豁，竟死何裨？不知虑此，而反教人为！”

先生曰：“吁，子来前。夫大木为栋，细木为桷，榑桷侏儒，椳闳扂楔，各得其宜，施以成室者，匠氏之工也。玉札丹砂，赤箭青芝、牛溲马勃、败鼓之皮，俱收并蓄，待用无遗者，医师之良也。登明选公，杂进巧拙，纡余为妍，卓犖为杰，校短量长，唯器是适者，宰相之方也。昔者，孟轲好辩，孔道以明，辙环天下，卒老于行。荀卿守正，大论是弘，逃谗于楚，废死兰陵。是二儒者，吐辞为经，举足为法，绝类离伦，优入圣域，其遇于世何如也？今先生学虽勤，不由其统；言虽多，不要其中；文虽奇，不济于用；行虽修，不显于众。犹且

月费俸钱，岁靡廩粟，子不知耕，妇不知织，乘马从徒，安坐而食，踵常涂之促促，窥陈编以盗窃。然而圣主不加诛，宰臣不见斥，此非其幸哉！动而得谤，名亦随之。投闲置散，乃分之宜。若夫商财贿之有无，计班资之崇庳，忘己量之所称，指前人之瑕疵，是所谓诤匠氏之不以杙为楹，而訾医师以昌阳引年，欲进其豨苓也。”

执政览其文而怜之，以其有史才，改比部郎中，史馆修撰。逾岁，转考功郎中、知制诰，拜中书舍人。

俄有不悦愈者，摭其旧事，言愈前左降为江陵掾曹，荆南节度使裴均馆之颇厚，均子锷凡鄙，近者锷还省父，愈为序饯锷，仍呼其字。此论喧于朝列，坐是改太子右庶子。元和十二年八月，宰臣裴度为淮西宣慰处置使，兼彰义军节度使，请愈为行军司马，仍赐金紫。淮、蔡平，十二月随度还朝，以功授刑部侍郎，仍诏愈撰《平淮西碑》，其辞多叙裴度事。时先入蔡州擒吴元济，李愬功第一，愬不平之。愬妻出入禁中，因诉碑辞不实，诏令磨愈文。宪宗命翰林学士段文昌重撰文勒石。

凤翔法门寺有护国真身塔，塔内有释迦文佛指骨一节，其书本传法，三十年一开，开则岁丰入泰。十四年正月，上令中使杜英奇押宫人三十人，持香花，赴临皋驿迎佛骨。自光顺门入大内，留禁中三日，乃送诸寺。王公士庶，奔走舍施，唯恐在后。百姓有废业破产。烧顶灼臂而求供养者。愈素不喜佛，上疏谏曰。

伏以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后汉时始流入中国，上古未尝有也。昔黄帝在位百年，年百一十岁；少昊在位

八十年，年百岁；颡顓在位七十九年，年九十八岁；帝啻在位七十年，年百五岁；帝尧在位九十八年，年百一十八岁；帝舜及禹年皆百岁。此时天下太平，百姓安乐寿考，然而中国未有佛也。其后殷汤亦年百岁，汤孙太戊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年，书史不言其寿，推其年数，盖亦俱不减百岁。周文王年九十七岁，武王年九十三岁，穆王在位百年。此时佛法亦未至中国，非因事佛而致此也。

汉明帝时始有佛法，明帝在位才十八年耳。其后乱亡相继，运祚不长，宋、齐、梁、陈、元魏已下，事佛渐谨，年代尤促。唯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后三度舍身施佛，宗庙之祭，不用牲牢，昼日一食，止于菜果；其后竟为侯景所逼，饿死台城，国亦寻灭，事佛求福，乃更得祸。由此观之，佛不足信，亦可知矣。

高祖始受隋禅，则议除之。当时群臣识见不远，不能深究先王之道、古今之宜，推阐圣明，以救斯弊，其事遂止。臣常恨焉！伏惟皇帝陛下，神圣英武，数千百年以来未有伦比。即位之初，即不许度人为僧尼、道士，又不许别立寺观。臣当时以为高祖之志，必行于陛下之手。今纵未能即行，岂可恣之转令盛也！

今闻陛下令群僧迎佛骨于凤翔，御楼以观，舁入大内，令诸寺递迎供养。臣虽至愚，必知陛下不感于佛，作此崇奉以祈福祥也。直以年丰人乐，徇人之心，为京都士庶设诡异之观、戏玩之具耳。安有圣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然百姓愚冥，易惑难晓，苟见陛下如此，将谓

真心信佛。皆云天子大圣，犹一心敬信，百姓微贱，于佛岂合惜身命。所以灼顶燔指，百十为群，解衣散钱，自朝至暮，转相仿效，唯恐后时，老幼奔波，弃其生业。若不即加禁遏，更历诸寺，必有断臂鬻身以为供养者。伤风败俗，传笑四方，非细事也。

佛本夷狄立人，与中国言语不通，衣服殊制。口不道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情。假如其身尚在，奉其国命，来朝京师，陛下容而接之，不过宣政一见，礼宾一设，赐衣一袭，卫而出之于境，不令惑于众也。况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秽之余，岂宜以入宫禁！孔子曰：“敬鬼神而远之。”古之诸侯，行吊于国，尚书巫先以桃茢，祓除不祥，然后进吊。今无故取朽秽之物，亲临观之，巫祝不先，桃茢不用，群臣不言其非，御史不举其失，臣实耻之。乞以此骨付之水火，永绝根本，断天下之疑，绝后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圣人之所作为出于寻常万万也，岂不盛哉！岂不快哉！佛如有灵，能作祸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鉴临，臣不怨悔。

疏奏，宪宗怒甚。间一日，出疏以示宰臣，将加极法。裴度、崔群奏曰：“韩愈上忤尊听，诚宜得罪，然而非内怀忠恳，不避黜责，岂能至此？伏启稍赐宽容，以来谏者。”上曰：“愈言我奉佛太过，我犹为容之。至谓东汉奉佛之后，帝王咸致夭促，何言之乖刺也？愈为人臣，敢尔狂妄，固不可赦。”于是人情惊惋，乃至国戚诸贵亦以罪愈太重，因事言之，乃贬为潮州刺史。

愈于潮阳，上表曰：

臣今年正月十四日，蒙恩授潮州刺史，即日驰驿就路。经涉岭海，水陆万里。臣所领州，在广府极东，去广府虽云二千里，然来往动皆逾月。过海口，下恶水，涛泷壮猛，难计期程，飓风鳄鱼，患祸不测。州南近界，涨海连天，毒雾瘴氛，日夕发作。臣少多病，年才五十，发白齿落，理不久长。加以罪犯至重，所处又极远恶，忧惶渐悸，死亡无日。单立一身，朝无亲党，居蛮夷之地，与魑魅同群。苟非陛下哀而念之，谁肯为臣言者。

臣受性愚陋，人事多所不通，唯酷好学问文章，未尝一日暂废，实为时辈推许。臣于当时之文，亦未有过人者，至于论述陛下功德，与《诗》《书》相表里，作为歌诗，荐之郊庙，纪太山之封，镂白玉之牒，铺张对天之宏休，扬厉无前之伟迹，编于《诗》、《书》之策而无愧，措于天地之间而无亏，虽使古人复生，臣未肯多让。伏以大唐受命有天下，四海之内，莫不臣妾，南北东西，地各万里。自天宝之后，政治少懈，文致未优，武克不纲。孽臣奸隶，外顺内悖，父死子代，以祖以孙，如古诸侯，自擅其地，不朝不贡，六七十年。四圣传序，以至陛下，躬亲听断，干戈所麾，无不从顺。宜定乐章，以告神明，东巡泰山，奏功皇天，使永永万年，服我成烈。当此之际，所谓千载一时不可逢之嘉会，而臣负罪婴寡，自拘海岛，戚戚嗟嗟，日与死迫，曾不得奏薄伎于从官之内、隶御之间，穷思毕精，以赎前过。怀痛穷天，死不闭目！瞻望宸极，魂神飞去。伏惟陛下，天地父母，哀

而怜之。

宪宗谓宰臣曰：“昨得韩愈到潮州表，因思其所谏佛骨事，大是爱我，我岂不知？然愈为人臣，不当言人主事佛乃年促也。我以是恶其容易。”上欲复用愈，故先语及，观宰臣之奏对。而皇甫镈恶愈狷直，恐其复用，率先对曰：“愈终太狂疏，且可量移一郡。”乃授袁州刺史。

初，愈至潮阳，既视事，询吏民疾苦，皆曰：“郡西湫水有鳄鱼，卵而化，长数丈，食民畜产将尽，以是民贫。”居数日，愈往视之，令判官秦济炮一豚一羊，投之湫水，祝之曰：

前代德薄之君，弃楚、越之地，则鳄鱼涵泳于此可也。今天子神圣，四海之外，抚而有之。况扬州之境，刺史县令之所治，出贡赋以共天地宗庙之祀，谿鱼岂可与刺史杂处此土哉？刺史受天子命，令守此土，而鳄鱼悍然不安谿潭，食民畜熊鹿獐豕，以肥其身，以繁其卵，与刺史争为长。刺史虽弩弱，安肯为鳄鱼低首而下哉？今潮州大海在其南，鲸鹏之大，虾蟹之细，无不容，鳄鱼朝发而夕至。今与鳄鱼约，三日乃至七日，如顽而不徙，须为物害，则刺史选材伎壮夫，操劲弓毒矢，与鳄鱼从事矣！

呪之夕，有暴风雷起于湫中。数日，湫水尽涸，徙于旧湫西六十里。自是潮人无鳄患。

袁州之俗，男女隶于人者，逾约则没入出钱之家。愈至，设法赎其所没男女，归其父母。仍削其俗法，不许隶人。

十五年，征为国子祭酒，转兵部侍郎。会镇州杀田弘正，立王廷凑，令愈往镇州宣谕。愈既至，集军民，谕以逆顺，辞

情切至，廷奏畏重之。改吏部侍郎。转京兆尹，兼御史大夫。以不台参，为御史中丞李绅所劾。愈不伏，言准敕仍不台参。绅、愈性皆褊僻，移刺往来，纷然不止，仍出绅为浙西观察使，愈亦罢尹，为兵部侍郎。及绅面辞赴镇，泣涕陈叙，穆宗怜之，乃追制以绅为兵部侍郎，愈复为吏部侍郎。

长庆四年十二月卒，时年五十七，赠礼部尚书，谥曰文。

愈性弘通，与人交，荣悴不易。少时与洛阳人孟郊、东郡人张籍友善。二人名位未振，愈不避寒暑，称荐于公卿间，而籍终成科第，荣于禄仕。后虽通贵，每退公之隙，则相与谈广燕，论文赋诗，如平昔者焉。而观诸权门豪士，如仆隶焉，瞪然不顾。而颇能诱厉后进，馆之者十六七，虽晨炊不给，怡然不介意。大抵以兴起名教弘奖仁义为事。凡嫁内外及友朋孤女仅十人。

常以为自魏、晋已还，为文者多拘偶对，而经诰之指归，迁，雄之品格，不复振起矣。故愈所为文，务反近体，抒意立言，自成一家新语。后学之士，取为师法。当时作者甚众，无以过之，故世称“韩文”焉。然时有恃才肆意，亦有齷孔、孟之旨。若南人妄以柳宗元为罗池神，而愈撰碑以实之；李贺父名晋，不应进士，而愈为贺作讳辨，令举进士；又为《毛颖传》，讥戏不近人情；此文章之甚纰缪者。时谓愈有史笔，及撰《顺宗实录》，繁简不当，叙事拙于取舍，颇为当代所非。穆宗、文宗尝诏史臣添改，时愈壻李汉；蒋係在显位，诸公难之。而韦处厚竟别撰《顺宗实录》三卷。有文集四十卷。李汉为之序。

子昶，亦登进士第。

刘禹锡传

——《旧唐书》卷一六〇

【说明】刘禹锡（772—842），唐代文学家、哲学家。字梦得，洛阳（今属河南）人，祖籍中山（今河北定县）。贞元进士，登博学宏词科。授监察御史，参加王叔文集团，反对宦官和藩镇割据。失败后贬为郎州司马、迁连州刺史。后宫至太子宾客，加检校礼部尚书，世称“刘宾客。”

刘禹锡诗与柳宗元、白居易齐名，时称“刘柳”、“刘白”。其诗造语流丽，取境优美、凝练含蓄，善用比兴手法寄托政治内容。所作《竹枝词》等颇具民歌风格，流传甚广。参加韩柳倡导的古文运动，大力写作古文。其论文涉及哲学、政治、医学、书法等许多方面。《天论》三篇，论述了天的物质性，反映出朴素唯物主义思想。有《刘梦得文集》。

刘禹锡，字梦得，彭城（今江苏徐州）人。祖父刘云，父亲刘淑，历官州县令佐吏，于时以儒学著称。

刘禹锡贞元九年（793）中进士第，又登宏辞科。他精于写古文，又善作五言诗，今体文章也表现多才而华丽。在淮南节度使杜佑幕中干事，掌管记室，尤受礼遇。跟随杜佑入

朝，为监察御史。他和吏部郎中韦执谊相友好。

贞元（785—805）末年，王叔文在东宫任职，晚辈求进取的，多依附他。刘禹锡尤其为王叔文所了解和奖掖，把他看作宰相之才。唐顺宗登帝位，病了很久，不能胜任政事，宫禁中的文诰，都是由王叔文发出的。王叔文引刘禹锡和柳宗元入宫中，和他们商议大事，他们所说的，无不听从。刘禹锡转官屯田员外郎，判度支盐铁案，兼崇陵（唐德宗墓）使判官。颇自恃威权，伤害朝士。柳宗元平时不喜欢武元衡，那时武元衡任御史中丞，把他降为右庶子。侍御史窦群上奏说刘禹锡挟邪乱政，不适宜留在朝中，窦群当日就被罢官。韩皋凭供他是贵门出身，不依附王叔文之党，被出为湖南观察使。刘禹锡任性以喜怒欺凌于人，京师人士不敢提他的名，道路以目，敢怒而不敢言，当时号称“二王刘柳”。

王叔文革新失败，刘禹锡受累被贬为连州（今四川筠连）刺史，在途中，又贬为朗州（今湖南常德）司马。朗州地处西南夷之境，风俗鄙陋，举目异样，没有可以对话的。刘禹锡在朗州十年，平时只是写文章吟诗歌，借以陶冶情性。蛮夷风俗喜好巫术，每逢神祀设祭，击鼓跳舞，一定要唱些俚俗的歌词。刘禹锡在这中间干事，有时参与这类活动，于是按骚人写歌词那样，为巫歌写新词，教巫祝传唱。所以武陵谿洞之间的夷歌，大多是刘禹锡的歌词。

初时，刘禹锡、柳宗元等八人，触犯众怒，宪宗也发怒，所以再贬朗州。在朝廷的制令中有“逢恩不赦”的话。然而掌朝政的大臣爱惜他们的才华，想洗掉身上的政治痕累，渐渐地再起用他们。正逢程异又掌转运大权，下诏命以韩臬和

刘禹锡等人为远郡刺史。当武元衡任中书，谏官十多人上书议论此事，说这些人不可再用，因而作罢。

刘禹锡多年在湘江澧水之间，郁郁寡欢，因读了《张九龄文集》，乃叙写其意说：“世称曲江张九龄当宰相，建议放逐罪臣不宜放于好地方，多半徒居五谿不毛之地，今读他的文章，自内庭任职出守始安（在今贵州境），有叹息瘴疠之气的意思；自罢相出任荆州（今湖北江陵）有感叹被拘禁的意思。托讽于禽鸟，寄辞于草木，郁郁然和骚人同一风韵。哎呀，身被放逐于边远之地，一旦失意便难以忍受，何况华人士族，而被处于丑陋之地，然后还能感到快意！议论的人认为张九龄是良臣，识破胡维安禄山有反骨之相，以与庸材凡器同列为羞耻，私下上奏，迁上谏诤，就是古时的贤哲之人也比不上，辅佐君王之忠勤，没人比得上，然而却终于成为饿鬼。岂不是猜忌之心失于怨道，暗罚最大，虽有二美也不能赎罪啊？不是那样，袁公哪能一句话明断楚之冤狱而招福四世呢？以此相比较，神明哪能欺瞒呢？”

元和十年（815），刘禹锡从武陵被召回京师，宰相又想把他安排在朝内官署任职。那时刘禹锡作《游玄都观咏着花君子》诗，诗语中含有讥刺之意，令掌政的朝臣不高兴，又被出为播州（今贵州遵义）刺史。诏书颁发下去，御史中丞裴度上奏说：“刘禹锡有老母，年纪已经八十多岁。今播州在西南极远之地，是猿猴所居的地方，人迹很少到达。刘禹锡确实有罪，但他的老母实在不能去播州，那么只能和儿子作死别，臣深恐这有伤于陛下孝治之风。希望屈折一下法律，稍移于近处。”宪宗说：“作为人子，每件事都要特别谨慎，应

常考虑到会不会给双亲带来忧患。今日刘禹锡所应得的罪，理应更重于其他人，你哪里能以孝来议论从宽处理呢？”裴度无语以对。过了很久，皇帝改变面色说：“我所说的，是指责作为人子的事，然而总不想伤他老母的心。”于是改授刘禹锡连州（今广东连县）刺史。他离开京师又经历十多年，接连做了几郡的刺史。

大和二年（828），刘禹锡被从和州（今安徽和县）刺史召入朝，官拜主客郎中。刘禹锡对以前的事衔恨不已，又作《游玄都观诗序》说：“我于贞元二十一年（805）任尚书屯田员外郎，那时这个道观还没有花木，这一年我出任连州刺史，不久又贬为朗州司马。在朗州居住十年，被召入京师，那时人人都说有道士手种红桃，栽满道观，开花时烁烁如同早霞，遂有前诗，以记一时之事。不多时，又外出任州郡刺史，至如今又经历十四年，才得以入朝任主客郎中。重游这座道观，已经荡然一树无存，桃花净尽，只有兔葵和燕麦在春风中摇动，因此再题二十八字，以待后游君子。”他的前一首诗，有这样的句子：“玄都观里有千树桃花，都是刘郎我离京去后才栽种的。”后一首则有这样的句子：“种桃的道士今天不知都到哪里去了，前次来游的刘郎我又到这玄都观里来。”人们赞赏他的才气，却鄙薄他的品行。刘禹锡最为愤怒的是武元衡和李逢吉，而裴度则比较理解他。大和（827—835）中，裴度在中书省，想让刘禹锡任知制诰之职，掌权的朝臣又听说他写了那篇诗序，更加不高兴，因而转为礼部郎中、集贤院学士。裴度罢掉知政事之职，刘禹锡请求分司东都洛阳。他始终因为自恃其才，处世偏激，所以不能长期在朝中任职。

（大和五年）六月，授苏州刺史，赐金鱼袋紫衣。任职期满入朝，又授汝州（今河南临汝）刺史，升为太子宾客，分司东都。

刘禹锡晚年和太子少傅白居易相友善，诗歌文笔，当时没有在他们之前的，冠绝一时。白居易常和刘禹锡往来唱和，因而收集他的诗，并写了序言，说：“彭城刘禹锡，是诗中之豪者。他的笔锋森森然，很少有敌手。我不自量力，往往触犯其锋。和应者必是同声，相争必是敌手。一往一来，想罢不能。因此每写一篇，先看草稿，看完就发兴，兴发就写成文章。一二年来，每日都找笔墨纸砚，互相赠答，不觉愈来愈多。大和三年（829）春以前，纸墨所存吟稿。共计一百三十八首。其他因醉酒乘兴而作的，或者率然而成口号的，都不在此数之内。于是叫小侄龟儿编录在一起，辑成两轴。仍旧抄写两本，一轴给龟儿，一轴给刘禹锡的小男孩伧郎，要他们好好收藏，附在两家的文集。我近与元稹唱和也颇多，有的传播在人们的口头之中。我曾和元稹开玩笑说：‘我和你二十年来作为文友诗敌，是幸，也是不幸。吟咏性情，扬声显名，其适可以忘形，其乐可以忘老，这是幸；然而江南的士人女子议论才子的，多称“元、白”，因为你的原因，使我不能在吴、越之间独冠一时，这是所谓不幸。今年纪已老，又遇到刘禹锡，不是更加不幸吗？’禹锡禹锡，其文章之妙，首推其诗。其神妙之处，我哪敢同他比较？譬如禹锡的‘雪里高山头白得很早，海中仙果结实就迟了’、‘沉没的船其侧有千帆驶过，病老的树其前有万木争春’之类的句子，真可谓神妙啊。禹锡的诗所在之处，都应有神灵来保护，岂能止于

两家的子弟加以秘藏而已！”刘禹锡被名流所推许达到这样的地步。刘禹锡曾写《西塞怀古》、《金陵五题》等诗，江南的文士称为佳作，虽然他的名位不显达，但公卿大僚多争相和他交往。

开成（836—840）初年，刘禹锡又任太子宾客，分司东都，不久又授同州（今陕西大荔）刺史。任期已满，又入朝任检校礼部尚书、太子宾客分司。会昌二年（842）七月死，享年七十一，追赠户部尚书。

刘禹锡儿子刘承雍，登进士第，也有文才词藻。

（刘林 译）

【原文】

刘禹锡字梦得，彭城人。祖云，父淑，仁历州县令佐，世以儒学称。禹锡贞元九年擢进士第，又登宏词科。禹锡精于古文，善五言诗，今体文章复多才丽。从事淮南节度使杜佑幕，典记室，尤加礼异。从佑入朝，为监察御史。与吏部郎中韦执谊相善。

贞元末，王叔文于东宫用事，后辈务进，多附丽之，禹锡尤为叔文知奖，以宰相器待之。顺宗即位，久疾不任政事，禁中文诰，皆出于叔文，引禹锡及柳宗元入禁中，与之图议，言无不从。转屯田员外郎、判度支盐铁案，兼崇陵使判官。颇怙威权，中伤端事。宗元素不悦武元衡，时武元衡为御史中丞，乃左授右庶子。侍御史窦群奏禹锡挟邪乱政，不宜在朝，群即日罢官。韩皋凭籍贵门，不附叔文党，出为湖南观察使。既任喜怒凌人，京师人士不敢指名，道路以目，时号二王、刘、柳。

叔文败，坐贬连州刺史，在道，贬朗州司马。地居西南夷，土风僻陋，举目殊俗，无可与言者。禹锡在朗州十年，唯以文章吟咏，陶冶情性。蛮俗好巫，每淫祠鼓舞，必歌俚辞。禹锡或从事于其间，乃依骚人之作，为新辞以教巫祝。故武陵谿洞间夷歌，率多禹锡之辞也。

初禹锡、宗元等八人犯众怒，宪宗亦怒，故再贬。制有“逢恩不原”之令。然执政惜其才，欲洗涤痕累，渐序用之。会程异复掌转运，有诏以韩皋及禹锡等为远郡刺史。属武元衡在中书，谏官十余人论列，言不可复用而止。

禹锡积岁在湘、沅间，郁悒不怡，因读《张九龄文集》，乃叙其意曰：“世称曲江为相，建言放臣不宜于善地，多徙五谿不毛之乡。今读其文章，自内职牧始安，有瘴疠之叹，自退相守荆州，有拘囚之思。托讽禽鸟，寄辞草树，郁然与骚人同风。嗟夫，身出于遐陋，一失意而不能堪，矧华人士族，而必致丑地，然后快意哉！议者以曲江为良臣，识胡维有反相，羞与凡器同列，密启廷诤，虽古哲人不及，而燕翼无似，终为馁魂。岂忮心失恕，阴谪最大，虽二美莫赎耶？不然，何袁公一言明楚狱而锺祉四叶。以是相较，神可诬乎？”

元和十年，自武陵召还，宰相复欲置之郎署。时禹锡作《游玄都观咏看花君子诗》，语涉讥刺，执政不悦，复出为播州刺史。诏下，御史中丞裴度奏曰：“刘禹锡有母，年八十余。今播州西南极远，猿狖所居，人迹罕至。禹锡诚合得罪，然其老母必去不得，则与此子为死别，臣恐伤陛下孝理之风。伏请屈法，稍移近处。”宪宗曰：“夫为人子，每事尤须谨慎，常恐贻亲之忧。今禹锡所坐，更合重于他人，卿岂可以此论之？”

度无以对。良久，帝改容而言曰：“朕所言，是责人子之事，然终不欲伤其所亲之心。”乃改授连州刺史。去京师又十余年，连刺数郡。

大和二年，自和州刺史征还，拜主客郎中。禹锡衔前事未已，复作《游玄都观诗序》曰：“予贞元二十一年为尚书屯田员外郎，时此观中未有花木，是岁出牧连州，寻贬朗州司马。居十年，召还京师，人人皆言有道士手植红桃满观，如烁晨霞，遂有诗以志一时之事。旋又出牧，于今十有四年，得为主客郎中。重游兹观，荡然无复一树，唯兔葵燕麦，动摇于春风，因再题二十八字，以俟后游。”其前篇有“玄都观里桃千树，总是刘郎去后栽”之句，后篇有“种桃道士今何在，前度刘郎又到来”之句，人嘉其才而薄其行。禹锡甚怒武元衡、李逢吉，而裴度稍知之。大和中，度在中书，欲令知制诰，执政又闻《诗序》，滋不悦，累转礼部郎中、集贤院学士。度罢知政事，禹锡求分司东都。终以恃才褊心，不得久处朝列。六月，授苏州刺史，就赐金紫。秩满入朝，授汝州刺史，迁太子宾客，分司东都。

禹锡晚年与少傅白居易友善，诗笔文章，时无在其右者。常与禹锡唱和往来，因集其诗而序之曰：“彭城刘梦得，诗豪者也。其锋森然，少敢当者。予不量力，往往犯之。夫合应者声同，交争者力敌。一往一复，欲罢不能。由是每制一篇，先于视草，视竟则兴作，兴作则文成。一二年来，日寻笔砚，同和赠答，不觉滋多。大和三年春以前，纸墨所存者，凡一百三十八首。其余乘兴仗醉，率然口号者不在此数。因命小侄龟儿编录，勒成两轴。仍写二本，一付龟儿，一授梦得小

男仝郎，各令收藏，附两家文集。予顷与元微之唱和颇多，或在人口。尝戏微之云：‘仆与足下二十年来为文友诗敌，幸也，亦不幸也。吟咏情性，播扬名声，其适遗形，其乐忘老，幸也。然江南士女语才子者，多云元、白，以子之故，使仆不得独步于吴、越间，此亦不幸也。今垂老复遇梦得，非重不幸耶？’梦得梦得，文之神妙，莫先于诗。若妙与神，则吾岂敢？如梦得‘雪里高山头白早，海中仙果子生迟’，‘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之句之类，真谓神妙矣。在在处处，应有灵物护持，岂止两家子弟秘藏而已！”其为名流许与如此。梦得尝为《西塞怀古》、《金陵五题》等诗，江南文士称为佳作，虽名位不达，公卿大僚多与之交。

开成初，复为太子宾客分司，俄授同州刺史。秩满，检校礼部尚书、太子宾客分司。会昌二年七月卒，时年七十一，赠户部尚书。

柳宗元传

——《旧唐书》卷一六〇

【说明】柳宗元（773—819），唐代文学家、哲学家。字子厚，河东（今山西永济）人，世称柳河东。因官终柳州刺史，又称柳柳州。曾参加永贞元年王叔文等领导的革新运动，失败后长期被贬永州、柳州蛮荒之地，死于柳州任上。

柳宗元与韩愈共同倡导了古文运动，同被列入“唐宋八大家”，并称“韩柳”。他重视文章的内容，强调“道”与“文”的主次关系，大力提倡古文。他创作了大量论说文、传记文、山水游记、寓言，有着丰富的现实内容和精湛的艺术技巧。又工诗，风格多样，造语精妙。部分诗作思想内容与陶渊明相近，后人将他与王维、孟浩然、韦应物等山水诗人并称“王、孟、韦、柳”。

柳宗元还是位杰出的思想家，他创作了《天说》、《天对》、《断刑论》、《非国语》等重要论著，认为“元气”是物质的客观存在，不存在更高的主宰，具有朴素的唯物论成分。柳宗元自幼好佛，有儒、释、道“三教调和”的主张。有《河东先生集》。

柳宗元，字子厚，河东（今山西永济）人。后魏侍中济阴公之系孙。曾伯祖柳琦，在高宗朝任宰相。父亲柳镇，官太常博士，终侍御史。

柳宗元少年时代，聪明机警，超群出众，尤其精通西汉文章和《诗经》、《离骚》。构思落笔为文，可与古人相比并。精心制裁，缜密联缀，璀璨如同编纂珍珠和贝壳。当时文林同辈都推崇他。参加科举考试中进士第，又应考中宏辞科，授给校书郎、蓝田（今司陕西）县尉之职。贞元十九年（803），柳宗元任监察御史。

唐顺宗即帝位，王叔文、韦执谊掌权用事，尤其看重并任用柳宗元，将他和监察吕温秘密引入宫禁之中，和他们商议大事。柳宗元又转为尚书礼部员外郎。王叔文想让他当大官，恰遇任职不久，王叔文就失败了，他便和七名同辈都被贬谪了。柳宗元被贬为邵州（今湖南宝庆）刺史，赴任途中，再贬为永州（今湖南零陵）司马。柳宗元既遭贬逐，涉足南蛮瘴疠之地，处身崎岖阻塞之境，内怀骚人抑郁之情，所以抒情叙事，一动就写文章。作骚体文章十多篇，阅览的人无不为之感到凄恻哀惋。

元和十年（815），柳宗元按旧例被移为柳州（今属广西）刺史。那时朗州司马刘禹锡任播州（今贵州遵义）刺史，诏书下达，柳宗元同所亲近的人说：“刘禹锡有老母，年事已高，今到蛮方远郡为刺史，在西南绝域之地，来回上万里，哪能让他和老母一起去。如果母亲不去，母子异方，便成为永别。我和禹锡是志同道合的朋友，哪能忍心看他母子这样为难呢？”遂即起草奏章，请求将柳州授给刘禹锡，自己赴播州

上任。正遇裴度也奏请照顾刘禹锡母子，所以刘禹锡终于改授连州（今广东连县）刺史。

柳州风俗，用男或女为质去借钱，如果过期没还钱，人质便为钱主所没收。柳宗元到了柳州，便革掉这种土法。那些已经被钱主没收的男女，柳宗元自出私钱赎回，并归还给他们的父母。长江至岭南之间，凡是想考进士的，不远千里，都来跟随柳宗元，拜他为师。凡是经柳宗元指点过的，必成为名士。柳宗元著述之多，文名震动当代，时人号称“柳州”。有文集四十卷。元和十四年（819）十月五日死，享年四十七。那时他的儿子周六和周日，才三四岁。观察使裴行立为柳宗元办理丧事，并护送他的妻室和儿子返回京师，当时的人赞扬他很有义气。

（刘林 译）

【原文】

柳宗元，字子厚，河东人。后魏侍中济阴公之系孙。曾伯祖琦，高宗朝宰相。父镇，太常博士，终侍御史。宗元少聪警绝众，尤精《西汉诗骚》。下笔构思，与古为侔。精裁密致，璨若珠贝。当时流辈咸推之。登进士第，应举宏辞，授校书郎、蓝田尉。贞元十九年，为监察御史。

顺宗即位，王叔文、韦执谊用事，尤奇待宗元。与监察吕温密引禁中，与之图事。转尚书礼部员外郎。叔文欲大用之，会居位不久，叔文败，与同辈七人俱贬。宗元为邵州刺史，在道，再贬永州司马。既罹窜逐，涉履蛮瘴，崎岖堙厄，蕴骚人之郁悼，写情叙事，动必以文。为骚文十数篇，览之者为之凄恻。

元和十年，例移为柳州刺史。时朗州司马刘禹锡得播州

刺史，制书下，宗元谓所亲曰：“禹锡有母年高，今为郡蛮方，西南绝域，往复万里，如何与母偕行。如母子异方，便为永诀。吾与禹锡为执友，胡忍见其若是？”即草章奏，请以柳州授禹锡，自往播州。会裴度亦奏其事，禹锡终易连州。

柳州土俗，以男女质钱，过期则没入钱主，宗元革其乡法。其已没者，仍出私钱赎之，归其父母。江岭间为进士者，不远数千里皆随宗元师法；凡经其门，必为名士。著述之盛，名动于时，时号“柳州”云。有文集四十卷。元和十四年十月五日卒，时年四十七。子周六、周七，才三四岁。观察使裴行立为营护其丧及妻子还于京师，时人义之。

杨炯传

——《旧唐书》一九〇

【说明】杨炯（650～692），初唐诗人。华阴（今属陕西）人。十一岁时举神童，恃才傲物，为人所忌。武后时为婺州盈川令，卒于官，世称杨盈川。

杨炯与王勃、卢照邻、骆宾王并称“初唐四杰”，以文词闻名于世。现存诗三十三首，以边塞征战诗最为著名，表现了为国立功的战斗精神，风格豪放。其余诗作缺乏独创性。其《王穀集序》一文批判了当时诗坛上浮靡的诗风，反映了“四杰”有意识地改革当时文风的要求。有《杨盈川集》。

杨炯，华阴（今属陕西）人。伯祖父杨虔威，唐武德（618～625）中，官做到右卫将军。杨炯自幼聪明敏捷，博学多闻，很会作诗文。被推举为“神童”，后来官至校书郎，为崇文馆学士。

仪凤（676～678）中，太常博士苏知几上表，建议公卿以下官员的衣帽服饰，别立节制修饰的规矩。高宗批示有关部门详加评议。杨炯献议说：

上右之时，太昊伏羲氏，仰观天象，俯察地法，创

造文字，因而有所谓文籍。接着有黄帝轩辕氏，长大后敦厚敏锐，成人时耳聪目明，穿着宽大的衣裳，无为而天下大治。其后金木水火土五德几经变迁，而君主也不是限于一姓，治理国家，建邦设都，文质彬彬，相继复兴，正朔历法，再三改易。说起改易正朔，有夏后氏之“建寅”，殷商之“建丑”，周人之“建子”。至于以积日而成月，以积月而成四时，以积四时而成年，这是三王递相沿袭的办法。说起改易服色来，夏后氏崇尚黑色，殷商崇尚白色，周人崇尚赤色。至于山、龙、华虫、宗彝、藻、火、粉米、黼、黻，这都是百代以来所知道的。

谨按，《虞书》说：“我想观察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龙、华虫相会，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绣黼。”由此说来，这些礼俗历代相传已经很久了。日月星辰，其光明照于下土；山岳，可以布散云雨，就像圣明的君王向下民沾溉恩泽；龙呢，变化不定，象征圣明的君王应时设教，以化万民；华虫，就是雉鸡，它身披五彩，象征圣明的君王体兼文明；宗彝，就是武雉，能以刚猛制服他物，象征圣明的君王威武雄强，平定叛乱；藻呢，生于水面，逐水上下，象征圣明的君王随着潮流，顺时应变；火呢，可用以烧陶冶炼烹煮食物，象征圣明的君王至德日新又日新；粉米，是人们赖以生存的食物，象征圣明的君王是万民万物之所依赖的；黼能刀割而断，象征圣明的君王临事果决善断；黻呢，两个相背向，象征君臣是非可否之相济。

及至有周氏，才以日月星辰为旌旗的装饰物；又进

龙于山，进火于宗彝，于是乎制袞衣的礼服，制冠冕为礼帽，供帝王穿戴，以祭礼先王袞衣上绘画龙、山、华虫、火、宗彝、藻、粉米、黼、黻的所谓“九章”，是取法阳数的，以龙为首章。所谓袞，就是卷，龙之德，极神异，善于应变，或潜藏，或现形，表示圣明的君王具有深知卓识，卷舒自如，犹如神化。又制七旒袞冕，用以祭祀先公。所谓鹭，就是雉鸡，这种鸟有耿介忠直之志，表明王公有贤才，能守耿介的节操。又制定毳衣冠冕，用以祭祀四望。所谓四望，就是四方岳渎之神。武雉为山林所生刚猛之物，用以明其象。制定袞服冠冕，用以祭祀社稷。所谓社稷，就是土谷之神。粉米是由土谷生长而成的，用以象征社稷之功。又制定玄冕，用以祭祀众多的小祀。百神其形不同，难以一一模拟，只能取黻之相背向，以表明异名。周公是多才的辅臣，所以能于社会安定之时制定礼仪，于作战立功之后制作音乐。孔宣因将成为圣人，所以行夏之时，服周之冕。先王的礼仪洁服，就是从这里出来的；天下所能做到的事，至此也就算完毕了。

现在苏知几上表请制定大明冕十三种花纹图案，骑马坐轿时穿戴。谨按，日、月、星辰，已画于旌旗上了，龙、武雉、山、火呢，又没有超越古制；而云、麒麟、凤凰，有“四灵”之称，玄龟有所谓负图的应验，云有“纪官”之号，水有盛德之祥，这些因另外表明美好征兆，都没有超越比喻象征之形象。那么，皇王之受天命，天地之记符图，仰而观之，则合璧连珠，俯而察之，则黄

银紫玉。竭尽南宫的粉壁，不足以尽写其形状；用完东观的铅黄，也不能全纪其名实。自然不可以全部描绘陈列于洁事礼服之上呀。云呢，是龙的气息；水呢，是藻之所寄生。既有龙、藻，云、水也就不必分别列为图案的名目了。提出增设云、水图纹，实在是无稽之谈。

又鸾衣而冕用八种图案，定为三公所服。鸾呢，是太平的瑞兆，不是三公之德的象征啊。老鹰呢，是一种猛禽，正可以辨别详审谨慎刑罪之职。熊罴呢，是一种猛兽，也正可以借以表旌武将的武功。又据“藻”为水草，没有象征的意义，引张衡的赋说：“在天花板上倒画着茄蒂，披着层层叠叠的红花。”请改为莲花，以取其文采之意。其实，所谓“茄”，就是“荷”，也就是莲花啊。如果用莲花取代藻，变古制以顺合时，既不懂得草木之名，又不明自古人文章之意，这更是无稽之谈。

又毳衣而冕用六种图案，三品官穿戴。按，毳冕在古制中，是王者祭祀四望山川时所穿戴的。现在三品官可与王者同用“毳冕”，而三公却不可与王者同用“衮衣”之名，岂但颠倒衣裳，而且自相矛盾，这又是无稽之谈。

又黻冕用四种图案，五品官穿戴。稽考古制，实无其名；检验今制，也不是在图案中列在头里的。这同样是无稽之谈。

如果礼制要遵从习俗，那么帝王之命称为“制”，令称为“诏”。这是秦始皇的老规矩，今天还可以适用。至于依时代的变迁取其义，那么皇帝出行称为“警”，入行

称为“跽”，这却是汉朝的旧礼仪，也可以运用于当代。又何必变更周公所定的轨则，改换孔子所定的法度呢！由于杨炯的献议，太常博士苏知几的建议就被搁置在一边。

杨炯很快就升任詹事司直的职务，掌管东宫太子的事务。武则天当皇帝的初期，因为伯叔祖父的弟弟杨神让犯叛逆罪，杨炯被贬谪到梓州（今四川三台）任司法参军。任期正满，经选拔，授予盈川（今四川筠连）县令。如意元年（692）七月十五日，皇宫中出盂兰盆，盛百味五果，分送各座佛寺，则天皇帝亲自登洛阳南门楼，和朝中百官一起观看。杨炯献上《盂兰盆赋》，文词十分优雅华丽。

杨炯当官，执政很残酷，老百姓和下层官吏，稍不合己意，就鞭打或者杀掉。他所居住的府第房舍，建了许多进士亭台，都用各种名目书写匾额，取其美名，甚为远近所取笑。没多久，死于任上，中宗继帝位后，以其旧官职，追赠“著作郎”之衔。他有文集三十卷。

杨炯和王勃、卢照邻、骆宾王都以文章齐名，海内称为王、杨、卢、骆，又号为“四杰”。杨炯听到这说法，对人说：“我排在卢照邻之前，感到有愧；而排在王勃之后，却很感耻辱。”当时评论他们的人，也认为杨炯说的有道理。后来崔融、李峤、张说都很重视四杰的文章。崔融说：“王勃的文章宏远飘逸，有脱离尘俗的形迹，自非寻常流辈所可企及的；杨炯和卢照邻可以向他看齐，杨炯说的话是可信的。”张说指出：“杨炯的文思，犹如瀑布泻水，取之不尽，既胜于卢照邻，又不比王勃差。说‘耻居王后’，确实是这样的；说‘愧在卢

前’，是自谦之词啊。”

（刘林 译）

【原文】

杨炯，华阴人。伯祖虔威，武德中官至右卫将军。炯幼聪敏博学，善属文。神童举，拜校书郎，为崇文馆学士。仪凤中，太常博士苏知几上表，以公卿已下冕服，请别立节文。敕下有司详议，炯献议曰：

古者太昊庖羲氏，仰以观象，俯以察法，造书契而文籍生。次有黄帝轩辕氏，长而敦敏，成而聪明，垂衣裳而天下理。其后数迁五德，君非一姓，体国经野，建邦设都，文质所以再而复，正朔所以三而改。夫改正朔者，谓夏后氏之建寅，殷人建丑，周人建子。至于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此三王相袭之道也。夫易服色者，谓夏后氏尚黑，殷人尚白，周人尚赤。至于山、龙、华虫、宗彝、藻、火、粉米、黼、黻，此又百代可知道。

谨按《虞书》曰：“予欲观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龙、华虫作会，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由此言之，则其所从来者尚矣。日月星辰者，明光照下土也。山者，布散云雨，象圣王大泽沾下也。龙者，变化无方，象圣王应时布教也，华虫者，雉也，身被五彩，象圣王体兼文明也。宗彝者，武雉也，以刚猛制物，象圣王神武定乱也。藻者，逐水上下，象圣王随代而应也。火者，陶冶烹饪，象圣王至德日新也。粉米者，人恃以生，象圣王为物之所赖也。黼能断割，象圣王临事能决也。黻者，两己相背，象君臣可否相济也。

迨有周氏，乃以日月星辰为旌旗之饰，又登龙于山，登火于宗彝，于是乎制衮冕以祀先王也。九章者，法阳数也，以龙为首章。衮者，卷也，龙德神异，应变潜见，表圣王深识远智，卷舒神化也。又制鹭冕以祭先公也。鹭者，雉也，有耿介之志，表公有贤才，能守耿介之节也。又制毳冕以祭四望也。四望者，岳渎之神也。武雉者，山林所生，明其象也。制絺冕以祭社稷也。社稷者，土谷之神也。粉米由之而成，象其功也。又制玄冕以祭群小祀也。百神异形，难可遍拟，但取黻之相背，昭异名也。夫以周公之多才也，故治定制礼，功成作乐。夫以孔宣之将圣也，故行夏之时，服周之冕。先王之法服，乃此之自出矣；天下之能事，又于是乎毕矣。

今知几表状请制大明冕十三章，乘舆服之者。谨按，日月星辰者，已施于旌旗矣。龙武山火者，又不踰于古矣。而云麟凤有四灵之名，玄龟有负图之应，云有纪官之号，水有盛德之祥，此盖别表休征，终是无踰比象。然则皇王受命，天地兴符，仰观则璧合珠连，俯察则银黄玉紫。殫南宫之粉壁，不足写其形状；罄东观之铅黄，未可纪其名实。固不可毕陈于法服也。云者，龙之气也。水者，藻之自生也。又不假别为章目，此盖不经之甚也。

又鸾冕八章，三公服之者。鸾者，太平之瑞也，非三公之德也。鹰鹵者，鸷鸟也，适可以辨祥刑之职也。熊黑者，猛兽也，适可以旌武臣之力也。又称藻为水草，无所法象，引张衡赋“带倒茄于藻井，披红葩之狎猎”，请为莲华，取其文彩者。夫茄者，莲也。若以莲代藻，变

古从今，既不知草木之名，亦未达文章之意，此又不经之甚也。

又毳冕六章，三品服之者。按此王者祀四望服之名也。今三品乃得同王之毳冕，而三公不得同王之衮名，岂唯颠倒衣裳，抑亦自相矛盾，此又不经之甚也。

又黻冕四章，五品服之者。考之于古，则无其名，验之于今，则非章首，此又不经之甚也。

若夫礼唯从俗，则命为制，令为诏，乃秦皇之故事，犹可以适于今矣。若夫义取随时，则出称警，入称蹕，乃汉国之旧仪，犹可以行于代矣。亦何取变周公之轨物，改宣尼之法度者哉！

由是竟寢知几所请。

炯俄迁詹事司直。则天初，坐从祖弟神让犯逆，左转梓州司法参军。秩满，选授盈川令。如意元年七月望日，宫中出盂兰盆，分送佛寺，则天御洛南门，与百观视之。炯献《盂兰盆赋》，词甚雅丽。炯至官，为政残酷，人吏动不如意，辄撻杀之。又所居府舍，多进士亭台，皆书榜额，为之美名，大为远近所笑。无何卒官。中宗即位，以旧僚追赠著作郎。文集三十卷。

炯与王勃、卢照邻、骆宾王以文词齐名，海内称为“王杨卢骆”，亦号为“四杰”。炯闻之，谓人曰：“吾愧在卢前，耻居王后。”当时议者，亦以为然。其后崔融、李峤、张说俱重四杰之文。崔融曰：“王勃文章宏逸，有绝尘之迹，固非常流所及。炯与照邻可以企之，盈川之言信矣。”说曰：“杨盈

川文思如悬河注水，酌之不竭，既优于卢，亦不减王。‘耻居王后’，信然；‘愧在卢前’，谦也。”

陈子昂传

——《旧唐书》卷一九〇

【说明】陈子昂（659-700），盛唐文学家。字伯玉，梓州射洪（今属四川）人。少任侠，武后时上书论政，先后任麟台正字、右拾遗等职，曾随军抗击契丹。后辞官回乡，受县令段简诬陷，下狱死。

陈子昂的文学创作和主张在唐代很有影响，是唐朝诗文革新的先驱。他论诗标举汉魏风骨，强调兴寄，反对柔靡文风。所作《感遇》等诗，指斥时弊，风骨高昂清峻。在文章的创作上强调散体，反对浮艳。他的文章质朴疏朗，受到唐代古文家的称赞。有《陈伯玉集》。

陈子昂，梓州射洪（今属四川）人。他家世代都是富豪，只有陈子昂能立志苦读书籍，并且特别善于作文。早期作《感遇诗》三十首，京兆司功王适读了他的这组诗，惊奇地说：“这个人将来必定成为天下文章的宗师！”由于王适的激赏，陈子昂因而名声大振。他参加科举考试，中了进士。当时高宗死在洛阳，灵柩要运回长安（今陕西西安），陈子昂给朝廷上书，大讲东都洛阳的地理形势，说可以在那里建造皇帝的陵

墓，安置高宗灵柩；关中因旱灾而歉收，并不丰足，灵柩西运不太合适。上书说：

梓州射洪县寄在草野之愚臣陈子昂，恭敬地叩头冒死上书于朝廷。臣听说圣明的君王并不厌恶切直的言辞，以接纳忠臣的进谏，壮烈之士不怕死亡杀戮，而极力规劝。所以有不同寻常的计策的，一定要等待不同寻常的时机；得到不同寻常的时机，也一定要等待不同寻常的君主。然后不避危难，端正严肃地仗义执言，就是赴汤蹈火也在所不顾，乃至株连九族也在所不悔。哪里是只想欺瞒世俗之人而夸耀自己，或者是厌恶生而乐于死呢！实在是认为杀身，其害应当说是小的，而保国，其利应当说是大的，所以必认真地审定大计议案，才感到痛快。况且得到不同寻常的时机，遇到不同寻常的君主，说的建议，倘若被采纳，即使处死，又有什么可怕的呢，死了也一定不朽于今世的。

臣俯伏思考，一去不返的皇帝丢下天下，舍弃群臣，万国都为之震惊，百姓为之悲伤欲绝。今陛下以敏慧聪明，继承宗庙社稷，天下人的属望，犹如群鱼之口向于水面，十分向慕陛下，莫不希望受到皇上圣德恩惠，以保其余生。致太平的圣明君主，将再现于今日之世了。况且皇太后又能以文母的贤淑之质，和轩宫星一样明亮，军事国事之大计，都降诏书加以裁决，唐尧虞舜之时的承平气象，于今又隆盛了。

臣俯伏见陛下诏书，知道高宗梓棺将迁回西京长安，皇上的车驾也要陪同来回，此议实在不是上等计策，而是聪明的人一时失算，但朝廷里却没听说有正直的谋划，大臣里大都是随声附和的议论，臣疑惑这是一种过失。臣私下自思，生

于圣明之世的今日，沐浴着皇恩浩荡的春风，从头至脚，无不是皇上抚养培育的，而不能经丹凤之阙，到濯龙之池，北向白玉砌的台阶，东向黄金盖的殿屋，向皇上高声进谏，提出自己的意见，确是圣明之主的负罪之人啊。所以今天不顾万死，乞求献上一言，希望能得皇上听到或者看到，能这样，就是下油锅烹，死也甘心，请陛下明察为感。

臣听说秦朝建都咸阳（故址在今陕西西安东北）的时候，汉朝建都长安（今陕西西安）的时候，山与河都固若金汤，天下之人都驯服了。然而还要向北取匈奴沙漠地区之利，向南取巴蜀西南地区之资。从渭河入黄河，转运幽关东边的米粟；越过沙漠塞北，去罗致华山之西的储藏。然后才能削平天下，征服诸侯，骑上战马，扬起长鞭，横行四海，制服宇宙。今天却不是这样，北方的燕国、代郡之地，匈奴南侵已逼到那里，巴、陇之地，也有吐蕃入侵之患，西蜀疲乏衰弱的老人，要到千里外去挑粮食，北国的丁壮男子，十五岁就要从征出塞，成年累月在外面疲于奔命，疲惫不堪。秦朝版图的头和尾，今均已缺而不存，所剩下的只有关中三辅之地而已。不久前，又遭饥荒，百姓遭灾，死亡甚多。自黄河以西，因久旱缺水致使赤地千里，颗粒无收；向陇山以北看去，几乎看不到青草。到处莫不是父母兄弟辗转迁徙，妻子儿女流离失所，失去家园，丢弃产业，肥润了荒原野莽，这种情况是朝内众所周知的。

有赖祖宗神灵保佑，皇天也后悔降祸于人间，所以去年的庄稼小获丰收，使那些还没因饥饿致死的灾民，有口饭吃，因而得以保全性命，真是天下有幸，可称厚福。然而流亡他

乡的灾民至今尚未返回家园，田野耕地仍然一片荒芜，到处是白骨纵横，田地阡陌没有主人。至于说到积荒，更是可怜，令人哀伤。陛下没想到这些困难，而重视先皇的主意，因而要长驱大驾，举着旌节旗帜，将灵柩运入西京长安，千辆车，万匹马，向哪里去征取粮草来喂养呢？何况高宗陵墓，其初定体制，要穿凿覆盖，工程浩大，土工木匠，都需要征集徭役人工。今天要率领疲惫不堪之众，发数千万兵之军，征调京畿民众，鞭打老弱百姓，凿山采石，运输建陵，春耕播种误了农时，秋天的收成也就绝望了，经过凋敝的残余之民，再受艰辛苦楚。如有不堪其苦者，定会逃亡，那么《诗经·大雅·灵台》所说的“庶民子来”，像子女急于父母之事，不召自来，效忠王室，这将怎么解释呢？这也是宗庙社稷兴衰成败的大关键，不可不慎重思考呀。况且，如果国家没有两年的钱粮储备，家庭没有三月的粮食储备，十日不下雨，尚且值得深深忧虑，倘若忽然加上水灾或旱灾，有谁能加以接济呢？陛下不深刻地考察前因后果，独自与众人持相反意见，臣深怕关中三辅之地的凋敝景象，将不止像前些时候那样，或许还要严重啊！

况且天子总以四海为家庭，圣人总包上下四方六合为屋宇。历观远古，及至如今，历代圣明的君王，何尝不以三王五帝为仁圣，虽如周公之制礼作乐，孔子之诚信显明，也都莫不远述唐尧虞舜，效法文王武王，为百王留下大功业，作千秋不朽的雄图。然而舜帝在巡视途中死去，就葬在苍梧之野而没运回来；夏禹约会列国诸侯，死于稽山而永终其地。舜和禹哪里是因爱南方蛮人夷人所居之乡而鄙弃中原之地呢？

实在是要显示圣人无所谓内外之别啊。所以他们能使史书典籍传为美谈，并且在让历代帝王引以为楷模。何况我们高宗皇帝是道德高尚完备的大圣，自登上帝位，便如同日月之高照，无不率从。何止限于秦京、汉丰之地可建寝陵，而黄河、洛河交汇之都反不能建陵园呀？陛下岂不明白，愚臣私下为陛下痛惜啊。而且景山高峻壮丽，秀出群山，北面对着嵩山和北邙山，西面遥望汝河一带，位在祝融的旧地，连接伏羲的遗墟，帝王的鸿图轨迹，左右纵横，陵寝墓园之美，实在无以复加了。陛下还不曾亲自去观察一下，就说那里不可建陵，愚臣的鄙陋见解，确实可以参考参考。况且漙水、涧水中间，乃天地交会之处，北有太行山之险峻，南有南阳、世县之富饶，东接长江、淮河，可以收湖海之利，西连崤山、渑池，可以拥关河之宝。但凡聪明仁圣的君主，都是修养纯朴之德的人，但求天下和平安定，端正严肃地束约自己，朝着南方称王而已。陛下不想想漙水、洛水的壮观，关中、陇西的荒芜，而想放弃像泰山那样的安稳，而去踩中间狭小旁临深渊的青泥弄那种危险之地，忘了社稷神器这大宝，而去效法曾参、闵子骞尽心奉事双亲的小节，愚臣愚昧不明，也以为甚不该如此啊。陛下为什么不阅读谏诤之臣的献议，采纳行路之人的歌谣，征求皇太后的谋略，让宰相评议评议，以求得妙计良策，使天下百姓的希望，能有所落实，天下岂不是真正大幸啊！

从前周平王迁都洛邑（今河南洛阳），汉光武帝建都洛阳，帝陵寝庙，都不在东京洛阳，宗社陵墓，都在西方之地，然而《春秋》这部史书却赞美平王为“始王”，《后汉书》也记

载光武帝为“代祖”，哪里是因为这二人不愿意保存孝道呢？为什么对于圣贤的褒贬如此之滥呢？实在是因为时势有不可为事，而事或有必当为的。大要说来，必当丢弃小节而保存大体，除去祸根而回归福地，这是圣人之所贵重的啊。小事不能忍，必然乱了大谋，这是先师孔子至诚的遗训，希望陛下明察。如果臣之愚见不被采纳，而朝中所议灵驾西行事竟付诸实现，臣恐怕关中、陇西的忧患，就没有休止的时候了。

臣还听说太原（今属山西）有贮藏钜万的仓库，洛口（今属河南）也有积蓄天下之粟的仓库，国家的资财，这两处就够大的了。而今却想舍弃而不顾，长驱转运，让天下有识之士惊叹，乃至失望。倘若鼠窃狗偷之辈，万一发生意想不到的叛乱，西入陕州（今河南三门峡）的郊野，东犯武牢关的重镇，抢劫像敖仓那样的粮仓之粟，陛下又如何遏制得住他们？这是天下至关重要的危险，不能不令人生畏啊。虽然在盗贼没有接踵而起的时候，就加以刑戮诛伐，灭他们的九族，烧死他们的妻室儿女，那时，虽哀泣罪人而生悔恨，也是来不及的了！所以说：“先谋划好，再办事，这样便可以安闲；先干起来，再筹划的，往往造成失误。”“国家的大权，不可以轻易地向人出示。”这些话哪里是白说的啊，所以希望陛下好好地加以回味。

皇太后武则天召见陈子昂，对他的对答，感到惊奇，于是授给他秘书省麟台正字的官职。

武则天打算发兵雅州（今四川雅安）去讨伐生羌，陈子昂上书说：

麟台正字臣陈子昂冒死上书直言：臣听道路之人说

过：“国家想开凿蜀中之山，打通道路，从雅州去讨伐生羌少数民族，并借以袭击吐蕃，那些把握权柄的人，不仔细考虑此举的利害得失，遂发梁州、凤州、巴蜒之兵以从其役。臣之愚见，认为西蜀从此种下祸根了。

臣听说，祸乱之生，必由于结怨。雅州边境的生羌，自从大唐建国初期以来，未曾有过一日为强盗对抗朝廷。今天无罪而受到诛戮，他们的怨恨一定很深；怨得很厉害又害怕被诛杀，那一定会像蜂一样因惧怕而拥集西山；西山寇盗乱起，那么巴蜀的边境，就不得不集兵连防守备；兵集既久而不能解，那么蜀中就兵连祸结了。以前东汉末年，西京长安之所以丧乱失败，就是由于诸羌的反叛。这是第一件事。

臣又听说，吐蕃是凶暴狡猾的强虏，君长互相信任，而奸谋特多。自从他们敢于对抗朝廷的讨伐诛戮，到最近，已经将近二十多年了，大战就大胜，小战就小胜，不曾有一队失败，一夫死亡。国家以前曾以薛仁贵、郭待封为九虎武猛将，十一万人之众被屠杀于大非之川，没有一个生还的。又曾以李敬玄、刘审礼为朝廷大臣，带十八万人，受辱于青海之泽，他们自己也被囚禁在虏府。那个时候，有精良盔甲武装的勇士，其气势如云屯雷鸣，然而却不能生擒一个人，斩杀一个头，至于今日，关陇之间为之一空。今日想以李处一为将，驱赶那些形容憔悴的兵卒，去袭击吐蕃，臣私下甚为担忧，而为此虏所取笑。这是第二件事。

而且事情有时想求利，反而受害。蜀地从前与中国

不相通，秦惠王想并兼诸侯各国，若不先取巴与蜀，则很难得势，于是用张仪的计谋，打扮美女，诈献金牛，乘机诱惑蜀侯。蜀侯果然贪秦之利，派五丁力士开凿通谷，架设褒斜（在今陕西终南山），开路通秦。自此以后，险阻山谷都不关闭，张仪于是借便紧追其后，派大军破蜀，蜀侯被杀戮，巴国也灭亡。至今蜀之成为中州之地，就是贪利而亡的。这是第三件事。

臣听说吐蕃强虏，最爱蜀中富饶的珍宝，想盗取它已经很久了。然而其形势不能使之成事，只是因为山川阻绝，道路阻塞难通，才使得虎狼停住嘴而不能侵夺吞食啊。今天国家却赶走边羌，开凿狭路。使吐蕃收纳奔亡的羌民，作为向导，引导他们进攻边境。这实在是借伐寇之兵为盗贼清除道路，拿金蜀奉送给吐蕃。过是第四件事。

臣看到，蜀国是西南的一个都会，是国家的宝库，天下的珍宝货物大都出于其中。又人口甚众，米粟出多。顺长江而下，可以接济中国各地。今日把握权柄的人，却想谋取侥幸之利，全都压在讨伐西羌这件事上。殊不知西羌其地不足以扩大中国的版图，徒然杀死众多的无辜之民，以伤害陛下的仁政；大量财物之费也随着征战花掉了，这也无益于圣上之德，何况侥幸之利，也不是那么容易谋取的啊！这是第五件事。

蜀国之所倚靠的，是因为有险关；人民之所以安居乐业，是因为没有徭役。今天国家却开其险关，劳役其人民；险关一开，则有利于寇盗，人民受劳役就会损费

财物。臣恐怕大军还没见到羌人，奸人盗贼已经混在其中了。前时益州（今四川成都）长吏李崇真曾想谋此奸人之利，传檄声称吐蕃要侵掠松州（今四川松潘），立即让国家派大军，大量转运粮草，加以防备。不到二三年，巴蜀二十多个州郡，骚动不安，社会凋敝，而竟没有见到吐蕃露面，而李崇真贪脏的钱财却计有钜万之数了。蜀中人之残破，几乎弄到人人活不了命。这种近时发生的事，还在人们的嘴里议论，也是陛下所亲自知道的。臣愚意以为如果没有奸臣想图取这种私利。哪里会再在生羌身上打主意呢！这是第六件事。

而且，蜀人瘦弱，不习惯于征战，一个敌人拿着长予，一百蜀人也不敢去抵挡。又山川旷远阻隔，离中原精兵甚远。今国家如果出击西羌，掩杀吐蕃，立即能破其军，灭其国，俘虏其人，使其君长首领就擒到阙下，这计策也可以行。但如果做不到这一点，臣却似乎看到边境守不住，而羌人在边境凶暴横行。古时辛有见有人披头散发，便在伊川设祭，因为他以前不用百年的时间，伊川便会成为戎人之地。臣担心不出百年，西蜀也会成为戎人之帮。这是第七件事。

况且国家近来废掉安北。拔取单于，废弃龟兹之主，流放疏勒之君，天下安然太平，可谓盛德昭著。为什么这样做呢？因为陛下以施仁政为务，不在扩充版图，而在于修行养德；不在于杀戮，而在于平息边庭，停止用兵，实行三皇五帝的善政啊。今日又顺从贪婪之臣的计议，谋划兴兵动戈，要诛杀无罪的羌戎，而给金蜀留下

祸患，这怎么能使天下听命呢？这是愚臣为什么不很明白的啊。何况今天崤山以东地区饥荒，关中、陇西地区凋弊，历年旱灾使禾苗枯槁，人民流亡。确实是圣人冷静思虑，以和天人的时候，不可以轻易发动战争，大兴徭役，以致自生祸乱。臣又传闻西军失守，北军不利，边境之民慌忙骚动，群情不安。今日又要再驱赶这些兵，去投向那不测之地。臣听说自古以来，破家亡国，未尝不是由于穷兵黩武，发动战争。今天朝中小人议论征伐夷狄之利，实在不是帝王之至德，何况这又必定使中原凋弊呢！

臣听说古来之善于治理天下的，谋划大的，而不计较小的，务在修德，而不务于用刑，谋求平安而思虑危局，谋取其利，而思避其害，然后才能长期享受福禄，希望陛下深思熟虑而后决定大计。

陈子昂转官右拾遗，职在谏臣，几次上书议论政事，文词都很典雅华丽。当时有同州下邳（今陕西渭南）人徐元庆，他父亲被县尉赵师韞所杀。后来赵师韞官至御史，徐元庆变易姓名，在一个驿站当苦力，等候赵师韞过驿站时，手拿匕首，将他杀死。议论的人认为徐元庆是个孝子，应赦免他的死罪。陈子昂建议说：“国法律规定，擅自杀人的，罪当死。所以徐元庆应按国法处以死刑，然后表旌他的坟墓和里门，赞美他的孝义之德。”当时议论的人都以为陈子昂的意见正确。不久，陈子昂又被授予麟台正字之职。

武攸宜统领大军讨伐北方的契丹，以陈子昂为管记之职，军中的一应公文，都由他起草。陈子昂的父亲在家乡，为县

令段简所侮辱。陈子昂得知消息后，急忙赶回家，段简便借故把他投进狱中。他忧愤而死，死时四十余岁。

陈子昂器量狭小而急躁，仪表也不威严，但是文词宏伟华丽，很为当时人们所重视，有文集十卷，他的朋友黄门侍郎卢藏用给他的文集写了一篇序文，都盛行于当时。

陈子昂死后，益州成都（今属四川）人闾丘均，也以文章著称。景龙中，为安乐公主所推荐，起于家而出仕，官拜太常博士。及至安乐公主被诛戮，闾丘均因受牵累被贬为循州（故治在今广东惠阳）司仓，死于住所。有文集十卷。

（刘林 译）

【原文】

陈子昂，梓州射洪人。家世富豪，子昂独苦节读书，尤善属文。初为《感遇诗》三十首，京兆司功王适见而惊曰：“此子必为天下文宗矣！”由是知名。举进士。会高宗崩，灵驾将还长安，子昂诣阙上书，盛陈东都形势胜，可以安置山陵，关中旱俭，灵驾西行不便。曰：

梓州射洪县草莽愚臣子昂，谨顿首冒死献书阙下。臣闻明王不恶切直之言以纳忠，烈士不惮死亡之诛以极谏。故有非常之策者，必待非常之时；得非常之时者，必待非常之主。然后危言正色，抗义直辞，赴汤镬而不回，至诛夷而无悔。岂徒欲诡世夸俗，厌生乐死者哉！实以为杀身之害小，存国之利大，故审计定议而甘心焉。况乎得非常之实，遇非常之主，言必获用，死亦何惊，千载之迹，将不朽于今日矣。

伏惟大行皇帝遗天下，弃群臣，万国震惊，百姓屠

裂。陛下以徇齐之圣，承宗庙之重，天下之望，喁喁如也，莫不冀蒙圣化，以保余年，太平之主，将复在于兹矣。况皇太后又以文母之贤，协轩宫之耀，军国大事，遗诏决之，唐、虞之际，于斯盛矣。臣伏见诏书，梓宫将迁西京，鸾舆亦欲陪幸，计非上策，智者失图，庙堂未闻有骨鲠之谏，朝廷多见有顺从之议，臣窃惑以为过矣。伏自思之，生圣日，沐皇风、摩顶至踵，莫非亭育，不能历丹凤，抵濯龙，北面玉阶，东望金屋，抗音而正谏者，圣王之罪人也。所以不顾万死，乞见一言，愿蒙听览，甘就鼎镬，伏惟陛下察之。

臣闻秦都咸阳之时，汉都长安之日，山河为固，天下服矣。然犹北取胡、宛之利，南资巴蜀之饶。自谓入河，转关东之粟；逾沙绝漠，致山西之储。然后能削平天下，惮压诸侯，长轡利策，横制宇宙。

今则不然。燕、代迫匈奴之侵，巴、陇婴吐蕃之患，西蜀疲老，千里羸粮，北国丁男，十五乘塞，岁月奔命，其弊不堪。秦之首尾，今为阙矣，即所余者，独三辅之间耳。顷遭荒馑，人被荐饥。自河已西，莫非赤地；循陇以北，罕逢青草。莫不父兄转徙，妻子流离，委家丧业，膏原润莽，此朝廷之所备知也。赖以宗庙神灵，皇天悔祸，去岁薄稔，前秋稍登，使羸饿之余，得保性命，天下幸甚，可谓厚矣。然而流人未返，田野尚芜，白骨纵横，阡陌无主。至于蓄积，尤可哀伤。陛下不料其难，贵从先意，遂欲长驱大驾，按节秦京，千乘万骑，何方取给？况山陵初制，穿复未央，土木工匠，必资徒役。今

欲率疲弊之众，兴数万之军，征发近畿，鞭扑羸老，凿山采石，驱以就功。春作无时，秋成绝望，凋瘵遗噍，再罗艰苦。倘不堪弊，必有逋逃，“子来”之颂，将何以述之？此亦宗庙之大机，不可不审图也。况国无兼岁之储，家鲜匝时之蓄，一旬不雨，犹可深忧，忽加水旱，人何以济？陛下不深察始终，独违群议，臣恐三辅之弊，不止如前日矣！

且天子以四海为家，圣人包六合为宇。历观邃古，以至于今，何尝不以三王为仁，五帝为圣。虽周公制作，夫子著明，莫不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为百王之鸿烈，作千载之雄图。然而舜死陟方，葬苍梧而不返；禹会群后，殁稽山而永终。岂其爱蛮夷之乡而鄙中国哉？实将欲示圣人无外也。故能使坟藉以为美谈，帝王以为高范。况我巍巍大圣，轹帝登皇，日月所照，莫不率俾。何独秦、丰之地，可置山陵，河、洛之都，不堪园寝？陛下岂不察之，愚臣窃为陛下惜也。且景山崇丽，秀冠群峰，北对嵩、邙，西望汝海，居祝融之故地，连太昊之遗墟，帝王图迹，纵横左右，园陵之美，复何加焉。陛下曾未察之，谓其不可，愚臣鄙见，良足尚矣。况瀍、涧之中，天地交会，北有太行之险，南有宛、叶之饶，东压江、淮，食湖海之利，西驰崤、澠、据关河之宝。以聪明之主，养纯粹之人，天下和平，恭己正南而已。陛下不思瀍、洛之壮观，关、陇之荒芜，乃欲弃太山之安，履焦原之险，忘神器之大宝，徇曾、闵之小节，愚臣暗昧，以为甚矣。陛下何不览争臣之策，采行路之谣，谘谟太后，平章宰

辅，使苍生之望，知有所安，天下岂不幸甚。

昔者平王迁都，先武都洛，山陵寝庙，不在东京，宗社坟塋，并居西土，然而春秋美为始王，汉书载为代祖，岂其不愿孝哉？何圣贤褒贬于斯滥矣？实以时有不可，事有必然。盖欲遗小存大，去祸归福，圣人所以贵也。夫小不忍乱大谋，仲尼之至诚，愿陛下察之，若以臣愚不用，朝议遂行，臣恐关、陇之忧，未时休也。

臣又闻太原蓄钜万之仓，洛口积天下之粟，国家之资，斯为大矣。今欲舍而不顾，背以长驱，使有识惊嗟，天下失望。倘鼠窃狗盗，万一不图，西入陕州之郊，东犯武牢之镇，盗敖仓一杯之粟，陛下何以遏之？此天下之至机，不可不深料也。虽则盗未旋踵，诛刑已及，灭其九族，焚其妻子，泣辜虽恨，将何及焉！故曰：“先谋后事者逸，先事后谋者失。”“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斯言岂徒设也，固愿陛下念之。

则天召见，奇其对，拜麟台正字。

则天将事雅州讨生羌，子昂上书曰：

麟台正字臣子昂昧死上言。臣闻道路云：国家欲开蜀山，自雅州道入讨生羌，因以袭击吐蕃。执事者不审图其利害，遂发梁、凤、巴蜒兵以徇之。臣愚以为西蜀之祸，自此结矣。

臣闻乱生必由于怨。雅州边羌，自国初已来，未尝一日为盗。今一旦无罪受戮，其怨必甚；怨甚惧诛，必蜂骇西山；西山盗起，则蜀之边邑，不得不连兵备守；兵久不解，则蜀之祸构矣。昔后汉末西京丧败，盖由此诸

羌。此一事也。

且臣闻吐蕃桀黠之虏，君长相信，而多奸谋。自敢抗天诛，迩来向二十余载，大战则大胜，小战则小胜，未尝败一队，亡一夫。国家往以薛仁贵、郭待封为虜武之将，屠十一万众于大非之川，一甲不返。又以李敬玄、刘审礼为廊庙之器，辱十八万乘于青海之泽，身囚虜廷。。是时精甲勇士，势如云雷，然竟不能擒一戎，馘一丑，至今而关、陇为空。今乃欲以李处一为将，驱憔悴之兵，将袭吐蕃，臣窃忧之，而为此虜所笑。此二事也。

且夫事有求利而得害者。则蜀昔时不通中国，秦惠王欲帝天下而并诸侯，以为不兼资，不取蜀，势未可举，乃用张仪计，饰美女，谲金牛，因间以啖蜀侯。蜀侯果贪其利，使五丁力士凿通谷，栈褒斜，置道于秦。自是险阻不关，山谷不闭，张仪蹶踵乘便，纵兵大破之，蜀侯诛，资邑灭。至今蜀为中州，是贪利而亡。此三事也。

且臣闻吐蕃羯虜，爱蜀之珍富，欲盗之久有日矣。然其势不能举者，徒以山川阻绝，障隘不通，此其所以顿饿狼之喙而不得侵食也。今国家乃乱边羌，开隘道，使其收奔亡之种，为向导以攻边。是乃借寇兵而为贼除道，举全蜀以遗之。此四事也。

臣窃观蜀之西南一都会，国家之宝库，天下珍货聚出其中。又人富粟多，顺江而下，可以兼济中国。今执事者乃图侥幸之利，悉以委事西羌。地不足以富国，徒杀无辜之众，以伤陛下之仁，靡费随之，无益圣德，又况侥幸之利，未可图哉！此五事也。

夫蜀之所宝，恃险者也；人之所安，无赅也。今国家乃开其险，役其人，险开则便寇，人役则伤财。臣恐未见羌戎，已有奸盗在其中矣。往年益州长史李崇真图此奸利，传檄称吐蕃欲寇松州，遂使国家盛军师、大转饷以背之。未二三年，巴蜀二十余州，骚然大弊，竟不见吐蕃之面，而崇真赃钱已计钜万矣。蜀人残破，几不堪命。此之近事，犹在人口，陛下所亲知。臣愚意者不有奸臣欲图此利，复以生羌为计者哉！此六事也。

且蜀人尪劣，不习兵战，一虏持矛，百人莫敢当。又山川阻旷，去中夏精兵处远。今国家若击西羌，掩吐蕃，遂能破灭其国，俘虏其人，使其君长系首北阙，计亦可矣。若不到如此，臣方见蜀之边陲不守，而为羌夷所横暴。昔辛有见被发而祭伊川者，以为不出百年，此其为戎。臣恐不及百年而蜀为戎。此七事也。

且国家近者有废安北，拔单于，弃龟兹，放疏勒，天下翕然，谓之盛德。所以者何？盖以陛下务在仁，不在广；务在养，不在杀，将以此息边鄙，休甲兵，行三皇、五帝之事者也。今又徇贪夫之义，谋动兵戈，将诛无罪之戎，而遗全蜀之患，将何以令天下乎？此愚臣所以不甚悟者也。况当今山东饥，关、陇弊，历岁枯旱，人有流亡。诚是圣人宁静思和天人之时，不可动甲兵，兴大役，以自生乱。臣又流闻西军失守，北军不利，边人忙动，情有不安。今者复驱此兵，投之不测。臣闻自古亡国破家，未尝不由黠兵。今小人议夷狄之利，非帝王之至德也，又况弊中夏哉！

臣闻古之善为天下者，计大而不计小，务德而不务刑，图

其安则思其危，谋其利则虑其害，然后能长享福祿，伏愿陛下熟计之。

再转右拾遗，数上书陈事，词皆典美。时有同州下邳人徐元庆，父为县尉赵师韞所杀，后师韞为御史，元庆变姓名于驿家傭力，候师韞，手刃杀之。议者以元庆孝烈，欲舍其罪。子昂建议以为“国法专杀者死，元庆宜正国法，然后旌其闾墓，以褒其孝义可也。”当时议者咸以子昂为是。俄授麟台正字。武攸宜统军北讨契丹，以子昂为管记，军中文翰皆委之。子昂父在乡，为县令段简所辱，子昂闻之，遽还乡里。简乃因事收系狱中，忧愤而卒，时年四十余。

子昂褊躁无威仪，然文词宏丽，甚为当时所重。有集十卷，友人黄门侍郎卢藏用为之序，盛行于代。

子昂卒后，益州成都人阎丘均，亦以文章著称。景龙中，为安乐公主所荐，起家拜太常博士。而公主被诛，均坐贬为循州司仓，卒。有集十卷。

孟浩然传

——《旧唐书》卷一九〇

【说明】孟浩然（689～740），襄州襄阳（今湖北襄樊）人，世称孟襄阳。早年隐居鹿门山，四十岁时，游长安，应进士举不第，遂终生不仕。曾遍游东南胜景。

孟浩然的诗多为五言短篇，以写山水田园，隐居的逸兴以及羁旅行役的心情为主。与王维齐名，时称“王孟”，同为盛唐山水田园诗派的代表作家。他的诗以清旷冲澹为基调，不事雕饰，比兴造思，富有超妙自得之趣，杜甫说他“清诗句句尽堪传”（《解闷》）。但是，由于孟浩然一生经历单纯，他的诗题材狭窄，境界不如王维的诗开阔。有《孟浩然集》。

孟浩然，字浩然，襄州襄阳（今湖北襄樊）人。少年时代就崇尚气节，讲究仁义，喜欢急人之难，乐于助人，隐居在鹿门山中。

他四十岁那一年，才旅游京师长安，曾经在太学中吟诗作赋，在座的人无不感叹佩服，没有人敢于同他相抗衡。张九龄、王维平常都称赞他。王维以私人名义邀请他进入内署官舍，一会儿唐玄宗也来了，孟浩然猝不及防，急忙躲到床

底下；王维见了唐玄宗，只好说实话，玄宗皇帝高兴地说：“朕只听说其人，却不曾亲见其面，为什么害怕竟至于躲藏起来呢？”下诏命孟浩然从床下出来。玄宗皇帝问起他的诗，孟浩然叩头再拜，然后朗诵自己所作的诗，念到“因为没有才能而为圣明的君主所抛弃”这句，玄宗皇帝说：“你自己不求仕进当官，朕也不曾抛弃你，为什么厚诬于我呢？”于是玄宗把他放回老家。

采访使韩朝宗曾约孟浩然一起到京师，想向朝廷推荐他。正巧有老朋友来拜访他，他就陪着友人痛饮甚欢，有人提醒他说：“您和采访使韩公相约赴京，可别忘了。”孟浩然呵斥他说：“既然已经喝开了，哪里还管什么别的事情！”终于不曾赴约。韩朝宗因他的失约而非常生气，相辞而去，但他并不因失去这个机会而后悔。张九龄出任荆州（今湖北江陵）刺史时，提调他到荆州府中，在府中未曾任职而作罢。开元末年，孟浩然背上生毒疮而死。

后来樊泽任节度使，那时孟浩然的墓已经毁坏，符载写信告诉樊泽说：“已故处士孟浩然，文质杰出俊美，死亡已久，他家后裔衰败，致使坟墓荒废。怀念他的人，经过他的墓地，无不感慨万端。以前您曾想别筑大墓，全州乡绅，听到这消息，大为震动。而今您外有军事要务的牵累，内有应酬宾客的劳顿，拖延耗费时日，现在还是顾不上。假如这事被好事者乘机而为之，岂不有负您原先的志愿！”樊泽于是另为孟浩然刻碑于凤林山南边，荣封他的坟墓。

初时，王维经过郢州（今湖北钟祥），画孟浩然像，挂于刺史亭中；这个刺史亭因而称为“浩然亭”。咸通中，刺史郑

诚说贤者的名不可随便提，于是改题为“孟亭”。

开元、天宝间，和孟浩然同样知名的王昌龄、崔颢，其政治地位都不显耀。
(刘林 译)

【原文】

孟浩然字浩然，襄州襄阳人。少好节义，喜振人患难，隐鹿门山。年四十，乃游京师。尝于太学赋诗，一座嗟伏，无敢抗。张九龄、王维雅称道之。维私邀入内署，俄而玄宗至，浩然匿于床下，维以实对，帝喜曰：“朕闻其人而未见也，何惧而匿？”诏浩然出。帝问其诗，浩然再拜，自诵所为，至“不才明主弃”之句，帝曰：“卿不求仕，而朕未尝弃卿，奈何诬我？”因放还。采访使韩朝宗约浩然偕至京师，欲荐诸朝。会故人至，剧饮欢甚，或曰：“君与韩公有期。”浩然叱曰：“业已饮，遑恤他！”卒不赴。朝宗怒，辞行，浩然不悔也。张九龄为荆州，辟置于府，府罢。开元末，病疽背卒。

后樊泽为节度使，时浩然墓庳坏，符载以戕叩泽曰：“故处士孟浩然，文质杰美，殒落岁久，门裔陵迟，丘陇颓没，永怀若人，行路慨然。前公欲更筑大墓，阖州乡绅，闻风竦动。而今外迫军旅，内劳宾客，牵耗岁时，或有未遑。诚令好事者乘而有之，负公夙志矣。”泽乃更为刻碑凤林山南，封宠其墓。

初，王维过郢州，画浩然像于刺史亭，因曰浩然亭。咸通中，刺史郑诚谓贤者名不可斥，更署曰孟亭。

开元、天宝间，同知名者王昌龄、崔颢，皆位不显。

贺知章传

——《旧唐书》卷一九〇

【说明】贺知章（659～744），字季真，自号“四明狂客”，越州永兴（今浙江萧山）人。曾任国子四门博士、太子宾客、秘书监等职。天宝初，上书请为道士，归乡里。

贺知章少以文词知名，性旷达，好饮酒，与李白友善。工书法，尤善草隶。存诗二十首，多祭神乐章和应制之作，其七言绝句清新婉曲，饶有韵致。

贺知章，会稽永兴（今浙江萧山）人，是太子洗马贺德仁的族孙，少年时代，他就以善于写文章出了名，参加科举考试中进士第。最初授予国子监四门博士之职，又升任太常博士。这两个职务，都是陆象先在中书省当官时所推荐的。

开元十年（722），兵部尚书张说为丽正殿修撰使，向皇上奏请让贺知章以及秘书员外监徐坚、监察御史赵冬曦三人都进入丽正书院，共同修撰《六典》和《文纂》等书，这些书最后没有完成。贺知章后来转官太常少卿。

开元十三年（725），贺知章被提升为礼部侍郎，加集贤殿学士，又充皇太子侍读。这一年，唐玄宗进封东岳泰山，下

诏叫所有随从官员都停留在泰山的谷口，只有皇帝和宰相以及祭坛行事的官员登上泰山顶上的斋宫。初时，玄宗认为灵山圣境，乃清洁之地，不让喧哗繁乱，就召贺知章讲解礼仪；贺知章便上奏说：“九天上帝居君位，五方诸帝居臣位，帝号虽然相同，而实际上却是君臣异位。陛下在山上祭奠居君位的上帝，群臣在山下祀居于臣位的五方诸帝，这确实足以为后世留下典范，这是变通礼制的大事啊。但是祭礼三献而成，亚献和终献宜合于一处。”玄宗说：“朕正想这样做，所以问你呀。”玄宗于是命令：“祭典三献在山上进行，五方帝以及诸神座的祭礼在山下祭坛进行。”

不久，遇上惠文太子死，朝廷下诏让礼部选出牵引灵柩唱挽歌的少年，贺知章选挽郎时取舍欠当，挽郎按旧例应在公卿至六品官员的子弟中挑选，所以有门荫的官宦子弟到贺知章公署去喧哗诉说。贺知章没有开门对话，而是爬上梯子，露出墙头，处决这件事。当时的人都笑话他。他也因此改任工部侍郎，兼秘书监同正员，依旧充集贤院学士；不久又官升太子宾客、银青光禄大夫兼正授秘书监。

贺知章性情奔放旷达，善于谈笑，当时贤达之士都很倾心羡慕他。工部尚书陆象先，也就是贺知章族姑的儿子，和贺知章关系十分亲密。陆象先常对人说：“贺兄言论卓越豪迈，真可以说是风流之士啊。我和兄弟姐妹们离别已久，都不怎么思念他们，惟独一日不见贺兄，就觉得自己又变得浅俗不堪了。”贺知章晚年更加放纵怪诞，更是不加以检点，自己取号叫“四明狂客”，又自称“秘书外监”，经常在里巷中遨游饮酒，他喝醉酒后写文章诗歌，一写就是成卷成轴，并且文

不加点，都甚为可观。他又善于书法，最擅长草书和隶书，好事者为他提供戕纸，让他写，每纸不过写几十个字，但都把它看成宝贝，争相流传。

当时有吴郡张旭，也和贺知章相友善。张旭善写草书，并且喜欢喝酒，每一次醉酒以后就狂走呼叫，索取笔墨挥洒作字。他的书法变化无穷，如有神助，当时的人称他为“张颠”。

天宝三载（744），贺知章患病，神情恍惚，于是上疏请度为道士，请求返回老家，仍旧捨本乡旧宅作为道观。唐玄宗批准他，任命他的儿子原典设郎贺曾为会稽郡司马，让他侍养老父亲，玄宗亲自写诗为他送行，自皇太子以下，都去同他握手告别。他回到乡里没多久，就告别人世了，终年八十六岁。

唐肃宗因旧时曾以贺知章为侍读，所以于乾元元年（758）十一月下诏说：“已故越州千秋观道士贺知章，很有度量见识，为人平淡，襟怀平和，精神澄清，志气飘逸，学富五车，才雄百代，如会稽之东箭美竹挺拔而出，如昆岗之温润良玉蕴藏于胸。前曾驰名于东宫，侍讲于龙楼，常常沉默无言，静以养悠闲之志，又常常谈些滑稽幽默的笑话，并寄托着讽谏规劝之意。他以年老辞去官职，再次表现出他的忠诚恳挚。他情愿追踪老子 and 老莱子这“二老”，真的成了四明狂客，隐于四明山中。实现了他的遂初之志，脱去了朝中的官服，像老子那样骑着青牛，一去不还，和那些白衣布衫的平民百姓相聚在一起，永远不回来。山水已非昔日景致，人琴都已亡去，惟念故旧之情怀，因追悼而加深。应加以繁文

缡礼，用以展示哀伤和荣耀。可以追赠贺知章为礼部尚书。”

此前，神龙年间，贺知章和越州贺朝、万齐融，扬州张若虚、邢巨，湖州包融，都以吴、越之文士，词采俊秀，名扬于京都长安。朝万官止于山阴县尉，齐融官止于昆山县令，若虚官止于袁州兵曹，邢巨官止于监察御史。包融遇上张九龄，被他引荐为怀州司户、集贤直学士。这几个人的文章往往在民间流传，惟独贺知章名最贵。（刘林 译）

【原文】

贺知章，会稽永兴人，太子洗马德仁之族孙也。少以文词知名，举进士。初授国子四门博士，又迁太常博士，皆陆象先在中书引荐也。开元十年，兵部尚书张说为丽正殿修书使，奏请知章及秘书员外监徐坚、监察御史赵冬曦皆入书院，同撰《六典》及《文纂》等，累年，书竟不就。后转太常少卿。

十三年，迁礼部侍郎，加集贤院学士，又充皇太子侍读。是岁，玄宗封东岳，有诏应行从群臣，并留于谷口，上独与宰臣及外坛行事官登于岳上斋宫之所。初，上以灵山清洁，不欲喧繁，召知章讲定仪注，因奏曰：“昊天上帝君位，五方诸帝臣位，帝号虽同，而君臣异位。陛下享君位于山上，群臣祀臣位于山下，诚足垂范来叶，为变礼之大者也。然礼成于三献，亚终合于一处。”上曰：“朕正欲如是，故问卿耳。”于是敕：“三献于山上行事，五方帝及诸神座于下坛行事。”俄属惠文太子薨，有诏礼部选挽郎，知章取舍非允，为门阴子弟喧诉盈庭。知章于是以梯登墙，首出决事，时咸嗤之，由是改授工部侍郎，兼秘书监同正员，依旧充集贤院学士。俄

迁太子宾客、银青光禄大夫兼正授秘书监。

知章性放旷，善谈笑，当时贤达皆倾慕之。工部尚书陆象先，即知章之族姑子也，与知章甚相亲善。象先常谓人曰：“贺兄言论倜傥，真可谓风流之士。吾与子弟离阔，都不思之，一日不见贺兄，则鄙吝生矣。”知章晚年尤加纵诞，无复规检，自号“四明狂客”，又称“秘书外监”，遨游里巷。醉后属词，动成卷轴，文不加点，咸有可观。又善草隶书，好事者供其牋翰，每纸不过数十字，共传宝之。

时有吴郡张旭，亦与知章相善。旭善草书，而好酒，每醉后号呼狂走，索笔挥洒，变化无穷，若有神助，时人号为“张颠”。

天宝三载，知章因病恍惚，乃上疏请度为道士，求还乡里，仍含本乡宅为观。上许之，仍拜其子典设郎曾为会稽郡司马，仍令侍养。御制诗以赠行，皇太子以下咸就执别，至乡，无几寿终，年八十六。

肃宗以侍读之旧，乾元元年十一月诏曰：“故越州千秋观道士贺知章，器识夷淡，襟怀和雅，神清志逸，学富才雄，挺会稽之美箭，蕴昆冈之良玉。故飞名仙省，侍讲龙楼，常静默以养闲，因谈谐而讽谏。以暮齿辞禄，再见款诚，愿追二老之踪，克遂四明之客。允叶初志，脱落朝衣，驾青牛而不还，狎白衣而长往。丹壑非昔，人琴两亡，惟旧之怀，有深追悼，宜加缛礼，式展哀荣。可赠礼部尚书。”

先是神龙中，知章与越州贺朝、万齐融，扬州张若虚、邢巨，湖州包融，俱以吴、越之士，文词俊秀，名扬于上京。朝万止山阴尉，齐融昆山令，若虚袁州兵曹，巨监察御史。融

遇张九龄，引为怀州司户、集贤直学士。数子人间往往传其文，独知章最贵。

杜甫传

——《旧唐书》卷一九〇

【说明】杜甫（712—770）唐代著名诗人。字子美，今河南巩义市人，年青时，曾漫游天下，举进士不第，献《三大礼赋》，唐玄宗奇之，进集贤院。安史之乱爆发，身陷贼中，后脱身赴行在，官拜右拾遗，因上书救房琯，遭贬。后或仕或隐，最终入川，居成都草堂寺，严武镇蜀，为工部员外郎。武卒，杜甫亦辞职出川，病卒于湘水扁舟之中。

杜甫是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人称诗史，他的作品，忧天下之忧，写天下之苦，震撼人心，流传历史，脍炙人口，多为典范之作，对中国文学史影响极大。

杜甫，字子美，祖籍襄阳（今湖北襄樊），后来迁徙河南巩县（今属河南）。曾祖父杜依艺，官位最终为巩县令。祖父杜审言，官终膳部员外郎。他在本书中自立传。父亲杜闲，官终奉天（今陕西乾县）县令。

杜甫天宝初年参加进士第考试，没考上。天宝末年，杜甫向朝廷献上《三大礼赋》，玄宗皇帝觉得这篇赋很新奇，便召他入朝考作文，授给他京兆府兵曹参军。

天宝十五年，安禄山叛军攻陷京师，肃宗在灵武征集兵力抗击叛军。杜甫夜里逃出京师长安，奔赴河西，在彭原郡拜谒肃宗，任右拾遗之职。房琯没当官以前和杜甫交朋友，这时房琯已官至宰相，请亲自为帅，率军讨伐叛军，肃宗皇帝准许他。当年十月，房琯的军队在陈涛斜战败；第二年春天，房琯被免去宰相职务。杜甫上疏说房琯有才华，不宜罢官。肃宗大怒，贬房琯为刺史，让杜甫离开京城到华州（今陕西华县）任司功参军。那时关中京畿遭到战乱，人民流离，粮食奇贵，杜甫西行，寓居成州同谷县（今甘肃成县），亲自到山中去背柴火，采橡栗，儿女被饿死的好几个。过了很久，朝廷召杜甫补京兆府功曹。

上元二年（761）冬天，黄门侍郎、郑国公严武出镇成都，上奏举荐杜甫为节度参谋、检校尚书工部员外郎，赐绯鱼袋。严武和杜甫其父辈就有交谊，是世交。所以给杜甫的待遇很优厚。杜甫的个性褊促躁急，器量狭小，依恃严武之恩，放浪恣肆，曾乘醉登上严武所坐的床，盯住严武看，说：“严挺之竟有这样的儿子！”严武虽然也褊急暴躁，但并不认为杜甫这样做是忤逆的举动。杜甫在成都浣花里种竹植树，在江边结庐而居，成天饮酒，长啸吟诗，和乡下野老农父相戏谑，毫无拘检。严武去看望他，他有时不戴冠就和严武相见，他就是这样倨傲怪诞。

永泰元年（765）夏天，严武死了，杜甫没有什么人可以依靠的。直到郭英义取代严武来镇成都，英义是位粗暴的武人，不受杜甫的干谒，杜甫只好游东蜀去依靠高适。待他到了东蜀，而高适也已经死了。这一年，崔宁杀死郭英义，杨

子琳攻打西川，蜀中军阀混战，乱成一团。杜甫携家出川，避乱到荆楚之地。所乘的船还没在三峡外的江陵靠岸，江陵也已动乱，于是溯流湘江，往游衡山，寓居耒阳。杜甫曾游南岳庙，被暴涨的江水所阻，十天吃不到食物。耒阳聂县令得知这个消息，便亲自驾船将杜甫迎接回来。永泰二年（公元766年），吃牛肉喝白酒，有一个晚上，死在耒阳，死时五十九岁。

杜甫的儿子杜宗武，流落湖湘之间，死在那里。元和（公元806-820年）中，宗武之子嗣业，将杜甫的灵柩自耒阳迁葬于偃师县（今属河南）西北首阳山之前。

天宝末年的诗人，杜甫与李白齐名，而李白自负其文风狂放旷达，讥诮杜甫诗局促，因而有《饭颖山》诗的嘲讽。元和中，诗人元稹论李白、杜甫的优劣，说：

我读诗读了杜子美的诗，才知道诗之小者大者都能集其精华。早先唐尧虞舜之时，君主和臣下以古歌互相唱和，此后诗人继起，历夏、商、周经过千余年，孔子辑集选取，录其有关教化的好诗三百篇，余者无所见闻。骚人作《离骚》而抒写怨恨愤怒的形态也就多了，然而离《国风》、《小雅》和《大雅》的旨意还比较近，尚可以相比并。自秦朝和汉朝以来，采诗的官署既已废掉，天下的妖谣民歌、赞美之颂讽谕之赋，以及配曲娱乐的词，也随时偶有所作。至汉武帝作《柏梁》体的诗，七言诗体才具备。苏武、李陵之辈，尤其善于作五言诗。虽然断句格律各不相同，雅歌和淫词之音也相互间杂，而词意简练深远，叙事抒情，假如不是有所为而为之，则诗

文不妄作。建安以后，天下的士人遭遇兵燹之祸，曹氏父子在战争鞍马间作文，常常横槊作诗，所以其诗风格劲健抑扬、哀冤伤离的作品，尤其近于古人所作。晋代诗文的风概，还稍存于世。南朝宋代、齐代之间，教化失其根本，士人以怠慢亲近舒缓相推崇，文章则以风貌色泽放旷清新为高等，吟咏抒写性灵、留连光景的诗文，意义骨力却无足取。衰落至梁朝、陈朝，淫靡艳丽雕刻藻饰小巧琐碎之词更厉害，比起宋代、齐代，更不可取。

唐朝兴起，官设之学大振，历代各种文体，能写的人不断涌现。而沈佺期、宋之问之流，研讨练习，既精又切，稳贴地顺着四声体势，所作诗称为“律诗”。从此以后，诗体的演变已到了极限了。然而时尚莫不是好尚古的而遗弃近的，务于华丽的丢掉质实的，仿效齐代、梁代的，不及于魏代、晋代，工于作乐府的，就极力压低五言诗，诗律切当则骨格难于保存，诗意闲暇则纤繁不能备举。至于杜甫，可以说上逼近《国风》、《离骚》，下包括沈佺期、宋之问，其词语可胜苏武、李陵，其气概可压倒曹植、刘桢，超颜延之、谢灵运之孤高，杂徐陵、庾信之流丽，括尽古今诗歌的体势，而兼取历代诗人们所擅长，倘若让孔子来考核推敲其诗的要旨，恐怕也不知贵其多呀。如果以为能其所不能，无可无不可，那么自有诗人以来，还没有像杜甫能做到这一点的。

其时有山东人李白，也以诗文奇巧著称，世人称为“李杜”。我看李白的诗，其壮浪纵恣，摆去拘束，描写物象，以及乐府歌诗，的确可与杜甫比肩并列。至于铺

陈排比，讲究声韵，长篇达千言，稍次也有数百言，词气豪迈，而风调清深，对仗工整，而脱弃凡俗，则李白尚且不能到达其藩篱，何况登堂入室！

我曾想分析杜甫的诗，按诗体分别归类，留给后人作为标准范式，只因有偷懒的毛病，所以没有完成。

自此以后，撰写诗文的人，都认定元稹所论是正确的。杜甫有文集六十卷。（刘林 译）

【原文】

杜甫字子美，本襄阳人，后徙河南巩县。曾祖依艺，位终巩令。祖审言，位终膳部员外郎，自传。父闲，终奉天令。

甫天宝初应进士不第。天宝末，献《三大礼赋》，玄宗奇之，召试文章，授京兆府兵曹参军。十五载，禄山陷京师，肃宗征兵灵武，甫自京师宵遁赴河西，谒肃宗于彭原郡，拜右拾遗。房琯布衣时与甫善，时琯为宰相，请自帅师讨贼，帝许之。其年十月，琯兵败于陈涛斜。明年春，琯罢相。甫上疏言琯有才，不宜罢免。肃宗怒，贬琯为刺史，出甫为华州司功参军。时关畿乱离，谷食踊贵，甫寓居成州同谷县，自负薪采梠，儿女饿殍者数人。久之，召补京兆府功曹。

上元二年冬，黄门侍郎、郑国公严武镇成都，奏为节度参谋、检校尚书工部员外郎，赐绯鱼袋。武与甫世旧，待遇甚隆。甫性褊躁，无器度，恃恩放恣，尝凭醉登武之床，瞪视武曰：“严挺之乃有此儿！”武虽急暴，不以为忤。甫于成都浣花里种竹植树，结庐枕江，纵酒啸咏，与田畯野老相狎荡，无拘检。严武过之，有时不冠，其傲诞如此。永泰元年夏，武卒，甫无所依。及郭英义代武镇成都，英义武人粗暴，

无能刺谒，乃游东蜀依高适。既至而适卒。是岁，崔宁杀英义，杨子琳攻西川，蜀中大乱。甫以其家避乱荆、楚，扁舟下峡，未维舟而江陵乱，乃诉沿湘流，游衡山，寓居耒阳。甫尝游岳庙，为暴雨所阻，旬日不得食。耒阳聂令知之，自棹舟迎甫而还。永泰二年，璠牛肉白酒，一夕而卒于耒阳，时年五十九。

子宗武，流落湖、湘而卒。元和中，宗武子嗣业，自来阳迁甫之柩，归葬于偃师县西北首阳山之前。

天宝末诗人，甫与李白齐名，而白自负文格放达，讥甫齷齪，而有饭颗山之嘲诮。无和中，词人元稹论李、杜优劣曰：

予读诗至杜子美而知小大之有所总萃焉。始尧、舜之时，君臣以賡歌相和。是后诗人继作，历夏、殷、周千余年，仲尼缉拾选拣，取其干预教化之尤者三百，余无所闻。骚人作而怨愤之态繁，然犹去《风》、《雅》日近，尚相比拟。秦、汉已还，采诗之官既废，天下妖谣民讴、歌颂讽赋、曲度嬉戏之辞，亦随时间作。至汉武帝赋《柏梁》而七言之体具。苏子卿、李少卿之徒，尤工为五言。虽句读文律各异，雅郑之音亦杂，而辞意简远，指事言情，自非有为而为，则文不妄作。建安之后，天下之士遭罹兵战，曹氏父子鞍马间为文，往往横槊赋诗，故其遒壮抑扬、冤哀悲离之作，尤极于古。晋世风概稍存。宋、齐之间，教失根本，士以简慢翦习舒徐相尚，文章以风容色泽，放旷精清为高，盖吟写性灵、留连光景之文也，意义格力无取焉。陵迟至于梁、陈，淫艳刻饰、

佻巧小碎之词剧，又宋、齐之所不取也。

唐兴，官学大振，历世之文，能者互出。而又沈、宋之流，研练精切，稳顺声势，谓之为律诗。由是之后，文体之变极焉。然而莫不好古者遗近，务华者去实，效齐、梁则不迫于魏、晋，工乐府则力屈于五言，律切则骨格不存，闲暇则纤秣莫备。至于子美，盖所谓上薄《风》、《骚》，下该沈、宋，言夺苏、李，气吞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矣。使仲尼考锻其旨要，尚不知贵其多乎哉！苟以为能所不能，无可无不可，则诗人以来未有如子美者。

是时山东人李白，亦以文奇取称，时人谓之李、杜。予观其壮浪纵恣，摆去拘束，模写物象，及乐府诗歌，诚亦差肩于子美矣。至若铺陈终始，排比声韵，大或千言，次犹数百，词气豪迈，而风调清深，属对律切，而脱弃凡近，则李尚不能历其藩翰，况堂奥乎！

予尝欲条析其文，体别相附，与来者为之准，特病懒未就尔。

自后属文者，以稊论为是。甫有文集六十卷。

王维传

——《旧唐书》卷一九〇

【说明】王维（？～761），唐朝诗人兼画家。字摩诘，祖籍太原祁（今山西祁县），其父迁居蒲州（今山西永济县），遂为蒲人。开元年间中进士，累官至给事中，安史乱后，因受伪官而被贬，过亦官亦隐的居士生活。官终尚书右丞，世称王右丞。

王维精通音律，工于丹青，精湛的艺术修养，对于自然的爱好和丰富的生活经历，使王维的诗歌取得了很高的成就。无论边塞、山水诗，无论律诗、绝句等都有佳篇传世。他的边塞诗以慷慨激昂的情调，抒发将士保家卫国的英雄气概，笔墨酣畅、形象鲜明。他的山水诗继承了谢灵运的传统，对陶渊明田园诗的清新自然也有所吸取，使山水田园诗的艺术达到一个高峰。他的山水田园诗使形式与内容完美地结合，略事渲染，便能传达出细致入微的感受，创造出悠远的意境。他善于表现自然界的光和色以及音响的变化，取景状物，极其画意。王维的五律和五、七言绝句成就最高，为人所称道。有《王右丞集》。

王维，字摩诘，太原祁（今山西祁县）人。他父亲王处谦，死于汾州司马任上，于是迁居于蒲永济，王维也就成了河东人了。

王维于开元九年（公元721年）进士考试及第。他奉事母亲崔氏，很守孝道，远近闻名。和弟弟王缙二人，都具有俊拔之才，而且博学多艺，并有声名，闺门的妇女，友悌的兄弟，以及众多的士子，都很推崇他们。历官右拾遗、监察御史、左补阙、库部郎中。母亲死了，王维守丧，哀毁骨立，瘦得像干柴，不胜悲哀。守丧期满，他又被任命为吏部郎中。天宝末年，官任给事中。

安禄山叛唐起兵，攻陷东都洛阳和西都长安，唐玄宗出奔成都，王维没来得及跟去，结果为叛军所擒。王维自己偷吃药，弄出个痢疾来，并且假装成哑巴。安禄山平素颇爱他，于是派人把他从长安迎接到洛阳安置，软禁在普施寺中，胁迫他在安禄山伪政权当中任职。安禄山大宴他的手下部将于凝碧宫，在那里演奏音乐的，都是从长安调来的唐朝梨园子弟和教坊中的乐工。王维听到这种音乐，不胜悲哀，偷偷写了一首诗，诗是这样说的：

千门万户的人们啊都十分伤心，因为见到荒野战尘和烽烟，大唐朝廷的群僚百官啊，不知何时才能再拜皇上而朝天？秋风无情地吹着那宫中的槐树，槐花纷纷落下满地堆积，可就在这令人肝肠寸断的时候，叛贼们却在凝碧池奏管弦！

安史之乱平定以后，凡是为叛军所俘并且在伪政权当中做过官的，分三个等级定罪。王维因为这首《凝碧诗》传到肃宗所住的地方，很为肃宗所赞美和嘉奖，又有他弟弟王缙

申请削去自己刑部侍郎的官职，来赎哥哥王维的罪责，所以特别赦免他的陷贼之罪，经批评后授予太子中允之职。乾元（公元758-760年）中，王维又被升为太子中庶子、中书舍人，再拜官给事中，升为尚书右丞。

王维的诗名盛传于开元天宝年间，他和王缙兄弟二人在洛阳、长安东西两都游宦做官，凡皇室诸王、驸马以及豪强权贵之门，无不扫径拂席欢迎他们，特别是宁王和薛王，更是待之如同老师和朋友。王维尤其擅长五言诗。书法和绘画，他也能极尽其妙，运笔构思，都能师法造化，而富于创造性的构图，即便有所欠缺，但如山水平远之境界，云峰石色之独到，可谓天然绝妙，非一般画师所能企及的。有人藏得一幅《奏乐图》，不知演奏的是什么曲名，王维看了看，说：“画的是演奏《霓裳羽衣曲》第三叠第一拍。”好事之徒召集乐工演奏这支曲子，按之三叠一拍，无一差错，都佩服王维对于音乐和绘画的精思。

王维、王缙兄弟都尊奉佛教，平素居家常吃素食，不吃荤腥，晚年更是长斋，不穿带文采的衣服。买得宋之问蓝田别墅，别墅就在辋川口，辋水环绕屋舍之下，另在辋水中浮出竹洲和花坞，经常和道友裴迪乘船往来于洲渚之间，弹琴咏诗，或终日长啸，曾经把他咏田园山水所作的诗集中起来编成诗集，名曰：“辋川集”。

王维在京师长安居住的时候，每日要请十几位和尚吃饭，而后谈玄说佛，以此为乐。他的斋中几乎没什么东西，只有煮茶的茶铛，捣药的药臼，诵经的经案，坐卧的绳床而已。他退朝下班之后，回到斋中，经常焚香独自一人坐着，以诵禅

念经为日常活动。他妻子死了，也不再娶，三十年孤身一人独居一室，隔绝世俗器尘的拖累。乾元二年（公元759年）七月死。他临死的时候，因弟弟王缙在凤翔（今属陕西），忽然索取毛笔，给王缙写诀别的书信，又写了几封和亲朋故旧诀别的书信。这些信大都劝勉朋友奉佛终心。写完信，放下笔，他就告别人世了。

唐代宗时，他弟弟王缙当了宰相。代宗喜爱文章，常常对王缙说：“你哥哥王维，在天宝年间，诗名冠于当代，朕曾经在诸王座中，听到他的歌词。今乃兄有多少文集，你可进献来。”王缙说：“臣之哥哥，在开元中有诗百千余篇，天宝安史之乱以后，十篇没留下一篇。最近在内外亲戚朋友中间，共同搜集编辑，共计收得四百多篇。”第二天，王缙将王维的诗献给代宗，代宗下诏书加以表扬。王缙自己有传记。

（刘林 译）

【原文】

王维字摩诘，太原祁人，父处廉，终汾州司马，徙家于蒲，遂为河东人。维开元九年进士擢第。事母崔氏以孝闻。与弟缙具有俊才，博学多艺亦齐名，闺门友悌，多士推之。历右拾遗、监察御史、左补阙、库部郎中。居母丧，柴毁骨立，殆不胜表。服阕，拜吏部郎中，未几，宝历，为给事中。

禄山陷两都，玄宗出幸，维扈从不及，为贼所得。维服药取痢，伪称瘕病。禄山素怜之，遣人迎置洛阳，拘于普施寺，迫以伪署。禄山宴其徒于凝碧宫，其乐工皆梨园弟子、教坊工人。维闻之悲恻，潜为诗曰：“万户伤心生野烟，百官何日再朝天？秋槐花落空宫里，凝碧池头奏管弦。”贼平，陷贼

官三等定罪。维以《凝碧诗》闻于行在，萧宗嘉之，会缙请削己刑部侍郎以赎兄罪，特宥之，责授太子中允。乾元中，迁太子中庶子、中书舍人，复拜给事中，转尚书右丞。

维以诗名盛于开元、天宝间，昆仲宦游两都，凡诸王附马豪右贵势之门，无不拂席迎之，宁王、薛王待之如师友。维尤长五言诗。书画特臻其妙，书馭措思，恭于造化，而创意经图，即有所缺，如山水平远，云峰石色，绝迹天机，非绘者之所及也。人有得《奏乐图》，不知其名，维视之曰：“《霓裳》第三叠第一拍也。”好事者集乐工按之，一无差，咸服其精思。

维弟兄俱奉佛，居常蔬食，不茹荤血，晚年长斋，不衣文采。得宋之问蓝田别墅，在辋口，辋水周于舍下，别涨竹洲花坞，与道友裴迪浮舟往来，弹琴赋诗，啸咏终日。尝聚其田园所为诗，号《辋川集》。在京日饭十数名僧，以玄谈为乐。斋中无所有，唯茶铛、药臼、经案、绳床而已。退朝之后，焚香独坐，以禅诵为事。妻亡不再娶，三十年孤居一室，屏绝尘累。乾元二年七月卒。临终之际，以缙在凤翔，忽索笔作别缙书，又与平生亲故作别书数幅，多敦厉朋友奉佛修心之旨，舍笔而绝。

代宗时，缙为宰相，代宗好文，常谓缙曰：“卿之伯氏，天宝中诗名冠代，朕尝于诸王座问其乐章。今有多少文集，卿可进来。”缙曰：“臣兄开元中诗百千余篇，天宝事后，十不存一。比于中外亲故间相与编缀，都得四百余篇。”翌日上之，帝优诏褒赏。缙自有传。

李商隐传

——《旧唐书》卷一九〇

【说明】李商隐（813～858），唐代诗人。字义山，号玉谷山，又号樊南生，怀州河内（今河南沁阳）人。开成年间进士，曾任县尉、秘书郎等职，因受牛李党争影响，受人排挤，潦倒终生。

李商隐是晚唐诗坛的重要作家，他能多方面学习前人的成功经验，所作诗篇富于文采，构思精密，情致婉曲，风格独具。由于用典过多，也有意旨隐晦的缺点。他的《无题》诗，历代解说不一。

诗歌之外，李商隐的骈文也相当出名，属对工整，用事精切，气韵自然，有别于晚唐骈文以饬饬华赡为能事的风气。有《李义山诗集》，后人辑有《樊南文集》、《樊南文集补编》。

李商隐，字义山，怀州河内（今河南沁阳）人。曾祖李叔恒，十九岁中进士第，官位终于安阳（今属河南）县令。祖父李甫，官位终于邢州（今河北邢台）事参军。父亲李嗣。

李商隐自幼便能写文章。令孤楚出镇河阳（今河南孟县），李商隐以所作文章投献他，当时十二岁还不到。令孤楚

因为他少年英俊，深加礼敬，让他和读书的诸生交友。令狐楚镇守天平（今山东东平）、汴州（今河南开封），李商隐跟随为巡官，每年给他衣食，让他随考核官吏到上都（今陕西西安）。开成二年（837），才中进士第，脱去布衣担任秘书省校书郎，补任弘农（今河南灵宝）县尉。会昌二年（842），他又以书判中拔萃科。王茂元镇守河阳，起用他掌书记，得侍御史。王茂元爱他的才华，把女儿嫁给他为妻。王茂元虽然读书为儒者，但本来是武将的后代，李德裕平时待他很好，那时李德裕掌权，起用他为河阳主帅。李德裕和李宗闵、杨嗣复、令狐楚相互间仇怨很深。李商隐既为王茂元干事，李宗闵之党很鄙薄他。当时令狐楚已经死了，他儿子令狐绹为员外郎，因为李商隐背恩负义，尤其嫌恶他无品行。不久，王茂元死了，李商隐来游京师，但朝廷久久不给安排职务。正碰上给事中郑亚任桂州（今广西桂林）廉察使，聘请他为观察判官、检校水部员外郎。大中（847—860）初年，白敏中掌执朝政，令狐绹在内署，共同排挤李德裕，并逐出京师。郑亚因为属李德裕之党，也被贬为循州（今广东惠阳）刺史。李商隐随郑亚在岭南多年。三年（849）入朝，京兆尹卢弘正奏请李商隐为掾曹，让他管草写钱奏，明年，令狐绹做宰相，李商隐几次上启陈说内心苦衷，令狐绹不予理睬。卢弘正出镇徐州（今属江苏），李商隐又跟随去任掌书记。后罢徐州府职又入朝，他以文章干谒令狐绹，于是补他为太学博士。正遇河南（今河南洛阳）府尹柳仲郢镇守东蜀，用他为节度判官、检验工部郎中。大中（847-860）末年，柳仲郢因为擅自杀人，被贬官，李商隐也随之罢废，回郑州（今属河南），没多久也

就病死了。

李商隐能写古文，不喜欢讲究对仗。在令狐楚幕中任职时，令狐楚能写奏章，遂即将他的写作经验传授给李商隐，从这时始他才写今体带对偶的奏章。李商隐博学强记，写文章时下笔不休，尤其擅长撰写诔和祭奠之辞。他和太原（今属山西）温庭筠、南郡段成式同时齐名，当时号为“三十六”。文思清丽，温庭筠超过他。但他们都不持操行，恃才怪异偏激，为当时宦途中人所鄙薄，所以不能进而为名宦，坎坷终身。他弟弟李义叟，也进士及第，累任宾佐。李商隐有表状集四十卷。

（刘林 译）

【原文】

李商隐字义山，怀州河内人。曾祖叔恒，年十九登进士第，位终安阳令。祖甫，位终邢州录事参军。父嗣。

商隐幼能为文。令狐楚镇河阳，以所业文干之，年才及弱冠，楚以其少俊，深礼之，令与诸子游。楚镇天平、汴州，从为巡官，岁给资装，令随计上都。开成二年，方登进士第，释褐秘书省校书郎，调补弘农尉。会昌二年，又以书判拔萃。王茂元镇河阳。辟为掌书记，得侍御史。茂元爱其才，以子妻之。茂元虽读书为儒，然本将家子，李德裕素遇之，时德裕秉政，用为河阳帅。德裕与李宗闵、杨嗣复、令狐楚大相雠怨。商隐既为茂元从事，宗闵党大薄之。时令狐楚已卒，子绹为员外郎，以商隐背恩，尤恶其无行。俄而茂元卒，来游京师，久之不调。会给事中郑亚廉察桂州，请为观察判官、检校水部员外郎。大中初，白敏中执政，令狐绹在内署，共排李德裕逐之。亚坐德裕党，亦贬循州刺史。商隐随亚在岭表

累载。三年八朝，京兆尹卢弘正奏署椽曹，令典戕奏。明年，令狐绹作相，商隐屡启陈情，绹不之省。弘政镇徐州，又从为掌书记。府罢入朝，复以文章干，乃补太学博士。会河南尹柳仲郢镇东蜀，辟为节度判官，检校工部郎中。大中末，仲郢坐专杀左迁，商隐废罢，还郑州，未几病卒。

商隐能为古文，不喜偶对。从事令狐楚幕，楚能章奏，遂以其道授商隐，自是始为今体章奏。博学强记，下笔不能自休，尤善为耒莫之辞。与太原温庭筠、南郡段成式齐名，时号“三十六”。文思清丽，庭筠过之。而俱无持操，恃才诡激，为当涂者所薄，名宦不进，坎壈终身。弟羲叟，亦以进士擢第，累为宾佐。商隐有表状集四十卷。

温庭筠传

——《旧唐书》卷一九〇

【说明】温庭筠（812～866），唐代诗人、词人。本名岐，字飞卿。太原祁（今山西祁县）人。仕途失意，官止国子助教。

温庭筠文思精敏，精于音律，每入试，八叉手而成八韵，时号“温八叉”。诗与李商隐齐名，其诗设色浓丽，辞藻繁密，内容较贫乏。他是文人中第一个大量写词的作家。是“花间派”词的先导。其词多写妇女生活，风格绵密，多用比兴，情韵悠远。有《温庭筠诗集》。《花间集》收温词六十多首。

温庭筠，太原（今属山西）人。他原名岐，字飞卿。大中（847-860）初年，参加进士考试。苦心经营于笔砚之间，尤其擅长诗赋。他初到京师，京师人士纷纷推崇他。然而他在士人品行方面杂染尘俗，不修边幅，不很检点，能按管絃之间，填写艳丽的歌词，公卿之家无赖子弟裴诚、令狐綯之徒，和他一起赌博饮酒，终日酣醉，因此多年考试却不能中第。徐商镇守襄阳（今湖北襄樊），温庭筠去投奔他，被录用为巡官。

咸通中，温庭筠失意到江东，路过广陵（今江苏扬州），内心怨恨令狐绹在担任要职时不让他成名。来到江东，他和新进少年狂游小街曲巷，很久不去投判干谒达官贵人。又乞求于杨子院，因醉酒而触犯夜禁，被禁卫官所击打，伤面又折了牙齿，才回扬州告状。令狐绹捉拿禁卫官问罪，禁卫官就硬说温庭筠在小街曲巷中的丑行之迹，于是把两边都放了。从此温庭筠汙迹丑行便在京师传闻。温庭筠自己到长安（今陕西西安），写信给公卿们申雪冤情。正当徐商任参知政事，颇为温庭筠辨说。不久，徐商罢免宰相之职，到地方当官，杨收对温庭筠很恼怒，把他贬为方城（今河北固安）县尉。又迁隋县县尉，死在那里。

温庭筠的儿子温宪，中进士。他弟弟温庭皓，咸通中任徐州从事，节度使崔彦鲁为庞勋所杀，庭皓也被杀害。温庭筠著述颇多，其诗赋格调风韵清新劲拔，文士都称赞他的诗赋。

（刘林 译）

【原文】

温庭筠者，太原人，本名岐，字飞卿。大中初，应进士。苦心砚席，尤长于诗赋。初至京师，人士翕然推重。然士行尘杂，不修边幅，能逐弦吹之音，为侧艳之词，公卿家无赖子弟裴诚、令狐绹之徒，相与绹饮，酣醉终日，由是累年不第。徐商镇襄阳，往依之，署为巡官。咸通中，失意归江东，路由广陵，心怨令狐绹在位时不为成名。既至，与新进少年狂游狭邪，久不刺谒。又乞索于杨子院，醉而犯夜，为虞候所击，败面折齿，方还扬州诉之。令狐绹捕虞候治之，极言庭筠狭邪丑迹，乃两释之。自是汙行闻于京师。庭筠自至长

安，致书公卿间雪冤。属徐商知政事，颇为言之。无何，商罢相出镇，杨收怒之，贬为方城尉。再迁隋县尉，卒。

子宪，以进士擢第。弟庭皓，咸通中为徐州从事，节度使崔彦鲁为庞勋所杀，庭皓亦被害。庭筠著述颇多，而诗赋韵格清拔，文士称之。

司空图传

——《旧唐书》卷一九〇

【说明】司空图（837～908），唐代诗论家、诗人。字表圣，自号耐辱居士、知非子，河中（今山西永济）人。咸通年间进士，官至知制诰，中书舍人，后归隐。

司空图论诗发展殷璠、皎然之说，注重含蓄蕴藉的韵味、清远的意境，提倡“味外之旨”、“韵外大致”。《二十四诗品》是其论诗专著，将诗歌的艺术风格和意境分为二十四品类，每品用十二句韵语来概括，也涉及作者的思想修养和写作手法。对后代严羽、王士禛等人的诗论有很大影响。其本人诗作多表现消极思想。有《司空表圣文集》行于世。后人辑有《司空表圣诗集》。

司空图，字表圣，原是临淮（今安徽泗县）人。曾祖司空遂，任密县（今属河南）县令。祖父司空象，任水部郎中。父亲司空舆，精吏术。大中初年，户部侍郎卢弘正管理盐铁，奏请司空舆为安邑（今山西运城）两盐池榷盐使、检校司封郎中。此前，盐法条例不精密，官更多违犯禁令；司空舆于是特定新法十条上奏朝廷，至今新法仍很适宜。司空舆入朝

为司门员外郎，迁户部郎中，死于任上。

司空图于咸通十年（870）中进士第，主考官王凝在进士中特别看中他的奇才。王凝降任商州（今陕西商县）刺史，司空图申请跟着到商州，王凝更加器重他，及至王凝察问宣歙（今安徽歙县）时，请他为上客。召入朝官拜殿中侍御史，因为司空图赴京迁延时日，受责斥，改授光禄寺主簿，分司东都（今河南洛阳）。乾符六年（879），宰相卢携罢免，以宾客分司东都，司空图和他交游，卢携赞美司空图的高风亮节，厚加礼遇。卢携曾访问他的住宅，亲手题其壁：“姓氏司空贵气，官作御史卑下。老夫我如在位，不用怪命运坏。”明年，卢携又入朝，路经陕虢（今河南陕县），对陕虢节度使卢渥说：“司空御史是一位高士，您要厚待他。”卢渥当日便奏请司空图为宾佐。那一年，卢携又任参知政事，召司空图为礼部员外郎，赐绯鱼袋，升本司郎中。这年冬天，黄巢进攻京师长安，皇帝离京出走，司空图来不及跟从，于是退回河中（今山西永济）。那时前宰相王徽也在蒲（今山西永济），也厚待司空图。过了几年，王徽受诏镇守潞（今山西长治），便表请司空图为副使，王徽没有赴镇就任因而作罢。唐僖宗从蜀中回到长安，路中停留凤翔（今属陕西），召司空图任知制诰，不久拜为中书舍人。那年僖宗出幸宝鸡（今属陕西），又没来得及随从，退回河中。

龙纪（公元889年）初时，又召授司空图为中书舍人，不久又因病辞官。河北动乱，于是客居华阴（今属陕西）。景福中，司空图又以谏议大夫被征召入朝。那时朝廷衰微，纪纲大坏，司空图深思出去做官不如退居林下，所以称病不赴京

当官。乾宁中，又以户部侍郎之职征召司空图，他到朝廷致谢，过几天便申请回山，皇帝允许他回去。唐昭宗在华州（今陕西华县），征召司空图，官拜兵部侍郎，推托脚有病，不能胜任趋拜，上奏章辞谢了。昭宗回洛阳，国家大权想归梁，柳璨假称叛贼之旨，陷害旧族，有诏命司空图入朝。司空图害怕被杀，带病来到洛阳，谒见皇帝那天，掉笏失去仪态，意思极粗野。柳璨知道司空图不会屈服，下诏说：“司空图学识造诣很深，登科及第，朱紫高官，既养其高风亮节以傲世，又像移居山林以钓名，他心里只想乐于漱清流，出仕并不专为俸禄。不是伯夷，也不是柳下惠，难以任职公正之朝；反复审思，当顺从他栖居衡门的志愿。可以放他回山林。”

司空图有祖先的别墅在中条山之王官谷，那里清泉白石，树林亭榭，颇有幽栖之趣。他自从隐居山林，高卧云泉，成日与名僧高士优游吟咏于王官谷中。晚年作文，尤其放达，曾模拟白居易的《醉吟先生传》，作《休休亭记》，说：

司空氏在祿貽溪的休休亭，原名濯缨亭，被陕军所焚毁。天复癸亥年（903），又从颓垣断壁中修葺起来，于是改名曰“休休”。休，是休息的意思，也是美好的意思，既休息而又美好，兼存其意。自量己才宣休，这是一；自思本分，也宜休，这是二；年老昏花，又宜休，这是三。又少年时懒惰，长大了而粗率，年老又迂腐，这三个缺点，都不是可以用于济世的，又是宜休。而且虑及时世多难不能自信，于是白天睡觉，碰上两个和尚，对我说：“我常为你之师。你以前高举于道，锐意而行却不坚决，为利欲所牵累，幸而悔悟，将再跟从我隐居在这条溪。而

且，你虽然已经退隐，也曾被匪人所嫉恨，自宜耐辱而自戒，大概才能保持终始，和陶渊明、白居易列于同一品级而垂名千秋以后，还有什么可求的呢！”因而作《耐辱居士歌》，题在东北亭柱上，歌云：“咄咄，休休休，莫莫莫，伎俩虽然很多而灵魂性情却险恶，因而长期教你闲居养。休休休，莫莫莫，一局棋，一炉药，皇天之意时世之情难揣度。白日偏偏催促着快活的人，黄金难买时光只堪骑白鹤。你说：‘你有什么能耐？’答道：‘耐辱莫。’”

他的诡异愤激长啸倨傲，多半像这样子。

司空图既摆脱了柳璨之祸回到山林，于是预先制好寿衣。有老朋友来了，他就带到预选的墓穴中，对酒吟诗，朋友有为难之色。他就规劝说：“旷达的人有洞达透彻的观察，阴间和阳间是一致的，不只是暂时来游此中呀。你的见识为何这样不广呢！”司空图穿着布衣，拿着杖头刻有鸠形的老人拐棍，出门就叫那个名叫鸾台的女家人相随。逢年过节，村中的春社秋社，祭祀祈祷，击鼓歌舞的集会，司空图一定去参加，和田夫野老同席而坐，从无倨傲之色。王重荣父子兄弟都很尊重他，夏伏冬腊馈赠物品，不绝于途中。唐朝的国运终结的第二年，听说辉王在济阴（今山东菏泽）被杀，司空图心情不好，因而得病，过几天便死了，享年七十二。有文集三十卷。

司空图无子嗣，以他的外甥司空荷为嗣。司空荷官做到永州（今湖南零陵）刺史。司空图以外甥继嗣，曾经被御史所弹劾，唐昭宗却没有责备他。

（刘林 译）

【原文】

司空图字表圣，本临淮人。曾祖遂，密令。祖彖，水部郎中。父舆，精吏术。大中初，户部侍郎卢弘正领盐铁，奏舆为安邑两池榷盐使、检校司封郎中。先是，盐法条例疏阔，吏多犯禁；舆乃特定新法十条奏之，至今以为便。入朝为司门员外郎，迁户部郎中，卒。

图咸通十年登进士第，主司王凝于进士中尤奇之。凝左授商州刺史，图请从之，凝加器重，泊谦问宣歙，辟为上客。召拜殿中侍御史，以赴阙迟留，责授光禄寺主簿，分司东都。乾符六年，宰相卢携罢免，以宾客公司，图与之游，携嘉其高节，厚礼之。尝过图舍，手题于壁曰：“姓氏司空贵，官班御史卑。老夫如且在，不用念屯奇。”明年，携复入朝，路由陕虢，谓陕帅卢渥曰：“司空御史，高士也，公其厚之。”渥即日奏为宾佐。其年，携复知政事，召图为礼部员外郎，赐绯鱼袋，迁本司郎中。其年冬，巢贼犯京师，天子出幸，图从之不及，乃退还河中。时故相王徽亦在蒲，待图颇厚。数年，徽受诏镇潞，乃表图为副使，徽不赴镇而止。僖宗自蜀还，次凤翔，召图知制诰，寻正拜中书舍人。其年僖宗出幸宝鸡，复从之不及，退还河中。

龙纪初，复召拜舍人，未几又以疾辞。河北乱，乃寓居华阴。景福中，又以谏议大夫征。时朝廷微弱，纪纲大坏，图自深惟出不如处，移疾不起。乾宁中，又以户部侍郎征，一至阙廷致谢，数日乞还山，许之。昭宗在华，征拜兵部侍郎，称足疾不任趋拜，致章谢之而已。昭宗迁洛，鼎欲归梁，柳璨希贼旨，陷害旧族，诏图入朝。图惧见诛，力疾至洛阳，谒

见之日，坠笏失仪，旨趣极野。璨知不可屈，诏曰：“司空图俊造登科，朱紫升籍，既养高以傲代，类移山以钓名，心惟乐于漱流，仕非专于禄食。匪夷匪惠，难居公正之朝；载省载思，当徇栖衡之志。可放还山。”

图有先人别墅在中条山之王官谷，泉石林亭，颇称幽栖之趣。自考盘高卧，日与名僧高士游咏其中。晚年为文，尤事放达，尝拟白居易《醉吟传》为《休休亭记》曰：

司空氏祜貽溪之休休亭，本名濯缨亭，为陕军所焚。天复癸亥岁，复葺于坏垣之中，乃更名曰休休。休，休也，美也，既休而具美存焉。盖量其才一宜休，揣其分二宜休，毫且聵三宜休。又少而惰，长而率，老而迂，是三者皆非济时之用，又宜休也。尚虑多难不能自信，既而昼寝，遇二僧谓予曰：“吾尝为汝师。汝昔矫于道，锐而不固，为利欲之所拘，幸悟而悔，将复从我于是溪耳。且汝虽退，亦尝为匪人之所嫉，宜耐辱自警，庶保其终始，与靖节、醉吟第其品级于千载之下，复何求哉！”因为《耐辱居士歌》，题于东北楹曰：“咄咄，休休休，莫莫莫，伎俩虽多性灵恶，赖是长教闲处着。休休休，莫莫莫，一局棋，一炉药，天意时情可料度。白日偏催快活人，黄金难买堪骑鹤。若曰：‘尔何能？’答云：‘耐辱莫。’”

其诡激啸傲，多此类也。

图既脱柳璨之祸还山，乃欲为寿藏终制。故人来者，引之圻中，赋诗对酌，人或难色，图规之曰：“达人大观，幽显一致，非止暂游此中，公何不广哉！”图布衣鸠杖，出则以女

家人鸾台自随。岁时村社雩祭祠祷，鼓舞会集，图必造之，与野老同席，曾无傲色。王重荣父子兄弟尤重之，伏腊馈遗，不绝于途。唐祚亡之明年，闻辉王遇弑于济阴，不恻而疾，数日卒，时年七十二。有文集三十卷。

图无子，以其甥荷为嗣。荷官至永州刺史。以甥为嗣，尝为御史所弹，昭宗不之责。

白居易传

——《新唐书》卷一一九

【说明】白居易（772～846），唐代诗人。字乐天，号香山居士、醉吟先生。下邳（今陕西渭南）人。曾任秘书省校书郎，江州司马，杭州、苏州刺史等职，官至刑部尚书。

白居易是中唐“新乐府运动”的倡导者，继承了中国古代以《诗经》为主旨的比兴美刺的传统，强调诗歌的现实内容和社会作用，主张“文章合为时而作，歌诗合为事而作”，《与天九书》是他的诗论纲领。他的诗内容深刻，风格平易。所作《秦中吟》讽喻《新乐府》等讽喻诗，揭露了当时社会的黑暗，反映出民生疾苦。其诗深入浅出，意到笔随，语言平易通俗，流传甚广。除讽喻诗外，《琵琶行》、《长恨歌》等长篇歌行也很有名。

白居易与元稹齐名，并称“元白”；晚年常与刘禹锡唱和，人称“刘白”。有《白氏长庆集》传世。

白居易，字乐天，其先祖是太原（今属山西）人。北齐五兵尚书白建，有功于当时，赐田在韩城（今属陕西），子孙就安家在那里。后来又迁徙下邳（今陕西渭南）。父亲白季庚，

当过彭城（今江苏徐州）县令，李正己叛变时，他说服刺史李洧归顺，因而提升为襄州（今湖北襄樊）别驾。

白居易聪敏颖悟超人，善于写文章。还没到成年，拜访顾况。顾况，吴（今江苏）人，自恃其才，很少被他摧许称可的。他见到白居易的文章，自失言说：“我以为斯文马上就要绝迹了，没想到今天又得到这个先生。”贞元中，白居易考进士和拔萃科，都考中了，补校书郎。元和元年（806），参加朝廷对制策考试，得乙等，调任盩厔（今陕西周至）县尉，为集贤院校理；月中，召入翰林院为学士，迁左拾遗。

元和四年（809），因为旱灾非常严重，天子下诏税赋有所减免，消除灾害。白居易见诏书事端未详述，遂即建议尽免江淮两地之赋，以救流亡贫病，并且多放出宫女。宪宗颇多采纳。那时，于頔入朝，尽将歌伎舞女收入宫禁之中，或说普宁公主取来献上的，其实都是于頔所喜爱的。白居易认为不如将这些女子放回去，不要让于頔将自己做的这种不正之事推到天子头上。李师道上私钱六百万，为魏征的孙子赎回旧宅，白居易说：“魏征任宰相，太宗用盖宫殿的材料建造他的正寝之室，他的子孙不能守业，陛下还应因他是贤者的子孙，赎其宅而赐之。李师道作为人臣，不能掠取此美事。”皇帝听从他的意见。河东王锬将加平章事，白居易认为：“宰相是天下人所瞩目的，非有威望很高功勋卓著的人是不可胜任的。而王锬这个人千方百计贪求财物，不体恤民间彫伤疾苦，所得的财物号称“羡馀”，借以献上。今天如果给予重任，四方之人闻之，都说陛下得到他所献的财物，所以给他当宰相。各节度使私下议论说：‘谁不如王锬呀？’于是都争着去

搜刮老百姓，以得到所想要的。如果都满足他们的要求，必国家纲纪大受破坏；如果不满足他们的要求，那就有厚彼薄此之嫌。事情一旦办得失当，就不可追回来了。”那时候，孙琬以禁卫的功劳，提升为凤翔（会属陕西）节度使，张奉国平定徐州，攻打叛臣李锜有功，升为金吾将军。白居易向皇帝进言：“宜罢掉孙琬的官，进张奉国，以震动天下忠臣之心。”度支有囚犯关在闾乡（今河南灵宝）狱中，已经历三次赦令却还不得赦免。白居易又上书奏言：“父亲死了，抓他的儿子；丈夫长久关在狱中，妻室嫁出去，债务无偿还之期，囚禁无到头的日子，请一切都宽免了。”奏章送上去十多次，白居易更加知名。

遇上王承宗反叛，皇帝下诏让吐突承璀率领大军去征讨，白居易进谏说：“唐朝的制度，每有征伐之事，专委任将帅带兵，责之成其功，近年才有以宦官为都监，督兵出征。韩全义讨淮西，以贾良国监督他；高崇文讨蜀，以刘贞亮监督他。而且发天下兵，从未以宦官专权统领的。神策军既不设置行营节度，就是以吐突承璀为制将，又充诸军招讨处置使，实是都统。恐怕四方之人闻之，必定看轻朝廷。后代会传说宦官为制将是从小下开始的，陛下难道忍心受此坏名声吗？而且刘济等人至诸将，都必然耻于受吐突承璀的节制指挥。心中不痛快，也就无法立功了。这实在是帮助王承宗的奸行，而挫败诸将的锐气。”皇帝不听。接着兵久不发，师老而未决，白居易又上书说：“陛下讨伐叛将，本来委托吐突承璀，外援则有卢从史、范希朝、张茂昭。今吐突承璀进兵而不决战，已丧了大将，范希朝、张茂昭经过数月才入叛贼之境，观看其

形势，像是暗中相勾结定计，空得一县之地，就壁立不进，定无成功之理。如果不迅速罢掉他，将有四害：以府库的钱币金帛和齐地民脂民血助河北诸侯，使之更加富强，这是一害；河北诸将听说吴少阳受朝廷之命，将要请求洗涤王承宗，奏章一上再上，无不许，则河北合从，各种势力联合，其势必定更加坚固。悬信的予之或夺之，都在下面而不出朝廷，这是二害；今正逢溽暑湿势，而师暴露野外，兵气像被熏被蒸似的，虽有不顾一死的勇气，谁能忍受这样的痛苦？又神策军募来市民杂入其中，不习惯于兵役，如有奔走逃亡相影响，诸军必动摇，这是三害；回鹘、吐蕃常有游骑侦察，听说讨伐王承宗，已历三个季节而无战功，那么我们军队的强弱，军费的多少，他们一旦知道，乘虚而入，进犯边境，那里能救头不救尾呢？兵连必生祸事，哪里没有卿呢？这是四害。事已至此而罢休，则损威望而且失权柄，只可提防，不能追悔。”正好碰到王承宗自己向朝廷请罪，遂罢兵。

后来白居易入殿中对答，持论强硬，皇帝还没说明白，白居易就进言：“陛下错了。”皇帝为之变色，遂罢对，对李绹说：“这个人是我自己提拔的，竟敢这样狂，我不可忍此，一定要罢斥他！”李绹说：“陛下开言者之路，所以群臣敢于直论政之得失是非。若罢黜白居易，是箝住言者之口，使其自谋，这不是发扬盛德的做法啊。”皇帝领悟，对待白居易和初时一样。官期已满，应当迁转，皇帝因白居易资历较浅，而且家境也很清贫，就听任他自己选择官职。白居易请求像姜公辅那样，以学士兼京兆户曹参军，以便于奉养双亲，下诏称可。明年，因母丧解官，直到服丧期满还朝，任左赞善大

夫。

这时，有强盗刺杀宰相武元衡，京都震恐骚扰。白居易首先上疏，请求从速追捕凶贼，以洗刷朝廷的耻辱，并限期必捕。宰相厌恶他越位上书，不高兴。不久，有人说“白居易母亲坠井而死，而他还写《新井篇》，他这个人说话浮华，无踏实作风，不可重用”。出为州刺史。中书舍人王涯上书说白居易不适宜治理州郡，于是追贬为江州（今江西九江）司马。白居易既已失意，却能顺其所遇，托佛教生死轮回之说，像忘了自身形骸似的。很久以后，他又转忠州（今四川忠县）刺史。后入朝为司门员外郎，以主客郎中知制诰。

唐穆宗爱好游猎，白居易献上《续虞人箴》加以讽劝，说：

唐朝受天命，已经有十二位皇帝，都兢兢业业，勤于执政。鸟禽生在深林里，野兽活在茂草之中。春天冬天两季打猎，猎取有一定的规律。这样鸟兽虫鱼，便会各遂其环境而生存。民在野外，君在朝廷，也都各安其位。以前玄祖的遗训是很明白的，说：“驰骋打猎，使心发狂。”谁来仿效，是后羿与康叔。曾经不以此为诫，终于覆亡。高祖刚要打猎，苏长进言：“不满一百日，不算大快乐。”高祖心里既已领悟，也就停止打猎，后来到了宋璟，也劝谏过玄宗。皇上温和的颜色，听取了臣下的劝谏，臣下也就从容以谏言进谏。宋璟趋走出宫，鹞鹰已死在手中。哎呀！追逐野兽于原野上，赶着马儿奔跑在路上，岂不痛快，但是车马驱驰，恐有颠覆之危惧呀。仔细审察打猎的安与危，是圣上所宜思虑的。

不久，白居易转中书舍人。田布拜官魏博节度使，命白

居易持节去宣布解说，田布送他五百匹布，朝廷有诏书让他接受，他推辞说：“田布的父仇和国耻都未昭雪，人们当以物资帮助他，却去取他的财物，于情谊来说，实在不忍心。正当朝廷派人慰问纷繁的时候，如果都有所赠送，必定贼人未灭而田布的资财已经枯竭了。”下诏听任他辞掉馈赠。

那时候，河朔（黄河以北地区）又乱，汇集诸道的兵力出征，迁延时日，没有战功。河朔贼取弓高（今河北东光），截断运粮之路，深州（今河北深县）之围更加危急。白居易上书说：“兵多了就难指挥使用，将多了则指挥不统一。宜下诏魏博、泽潞、定、沧四节度，命令他们各守本境，以省军费粮响。每道各派出精锐兵员三千，让李光颜统率。李光颜原有凤翔、徐州、滑州、河阳、陈许各处兵丁不下四万之众，可直接逼近叛贼，开弓高的粮道，联合下博，解除深州之围，和牛元翼会合。恢复裴度招讨使之任，让他以全部太原军从西边压迫其境，见有利时机乘隙夹攻之，有时下令招降，以动其军心，还没到诛杀夷灭之时，贼军必自生祸变。况且李光颜长期为将，很有威名，裴度为人忠直勇敢，可独当一面，没有像这两人的了。”于是时，天子荒淫放纵，宰相才能低下，赏罚又失当，因而坐视叛贼嚣张，而不能有所作为。白居易虽进了忠言，但是不被听取，于是乞外放。为杭州刺史，开始筑堤保护钱塘湖，集中泻水，灌溉良田千顷；又疏浚李泌所凿六井，民赖其汲。又过很久，以太子左庶子分司东都。又拜官苏州刺史，因患病而免去官职。

文宗即位，以秘书监召入朝廷，迁刑部侍郎，封晋阳县男。大和初年，二李党争事发，险与利皆乘之，互相剥夺推

移，进或退，诋毁或赞誉，有如日间与夜里互为更迭。杨虞卿与白居易是姻亲，而与李宗闵友善，白居易嫌恶因涉及党争而受人指斥，于是称病移居东都。升太子宾客分司东都。过了一年，即拜官河南（今河南洛阳）府尹，又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开成初年，起用为同州（今陕西大荔）刺史，不赴任，改为太子少傅，进冯翊县侯。会昌初年，白居易以刑部尚书退休。会昌六年（846），白居易死，享年七十五，追赠尚书右仆射，唐宣宗写诗吊唁他。白居易遗嘱说他死后要薄葬，不要请谥号。

白居易被唐宪宗厚待的时候，事无不言，洗除抉择，多被听纳，然而为当道掌权者所忌妒，遂被排斥，所蕴藏的才能不能施展，于是纵意作文饮酒。待到复用为官，所遇又皆幼君，偃蹇难伸，更加不合于时，虽居官却以病辞退，遂无立功扬名之意。和他的弟弟白行简、堂弟白敏中互相友爱。在东都洛阳他所居住的履道里，疏沼种树，筑石楼于香山，凿八节滩，自号为“醉吟先生”，并写了《醉吟先生传》。晚节迷惑于佛教尤其厉害，乃至成月不吃荤，称为“香山居士”。曾与胡杲、吉旼、郑据、刘真、卢真、张浑、狄兼谟、卢贞饮宴集会，都是年事已高不再干事的，人们羡慕他们，绘成《九老图》。

白居易于文章方面颇为精切，但最擅长的还是诗。初时，白居易颇能以诗来规劝讽谏政治的得或失，待写了很多，更是下合世俗所好，数量之多至数千篇，当时士民争相传诵。鸡林（古朝鲜）的商人拿了白居易的诗卖给他们国家的宰相，大概一篇可换得一金，甚至伪作，也能很容易辨别，其初，和

元稹唱酬吟咏，故号称“元白”；元稹死了，又同刘禹锡齐名，所以号称“刘白”。他才生下七个月，就能展书识字，其奶妈指“之”与“无”二字，能辨识，试百数次，都不差错；九岁就能暗辨声律。他对才章之厚实，是天性所禀。白敏中当宰相，为白居易请谥，上级官员说谥“文”。后来履道里白居易的第宅终于捐作佛寺。东都和江州人为白居易立祠祭祀。

（刘林 译）

【原文】

白居易字乐天，其先盖太原人。北齐五兵尚书建，有功于时，赐田韩城，子孙家焉。又徙下邳。父季庚，为彭城令，李正己之叛，说刺史李洧自归，累擢襄州别驾。

居易敏晤绝人，工文章。未冠，谒顾况。况，吴人，恃才少所推可，见其文，自失曰：“吾谓斯文遂绝，今复得子矣！”贞元中，擢进士、拔萃皆中，补校书郎。元和元年，对制策乙等，调整屋尉，为集贤校理，月中，召入翰林为学士。迁左拾遗。

四年，天子以旱甚，下诏有所蠲贷，振除灾沴。居易见诏节未详，即建言乞尽免江淮两赋，以救流瘠，且多出宫人。宪宗颇采纳。是时，于頔入朝，悉以歌舞人内禁中，或言普宁公主取以献，皆頔嬖爱。居易以为不如归之，无令頔得归曲天子。李师道工私钱六百万，为魏征孙赎故第，居易言：“征任宰相，太宗用殿材成其正寝，后嗣不能守，陛下犹宜以贤者子孙赎而赐之。师道人臣，不宜掠美。”帝从之。河东王锬将加平章事，居易以为：“宰相天下具瞻，非有重望显功不可任。按锬诛求百计，不恤彫瘵，所得财号为‘羨余’以献。

今若假以名器，四方闻之，皆谓陛下得所献，与宰相。诸节度私议曰：‘谁不如锬？’争哀割生人以求所欲。与之则纲纪大坏，不与则有厚薄，事一失不可复追。”是时，孙琬以禁卫劳，擢凤翔节度使。张奉国定徐州，平李锜有功，迁金吾将军。居易为帝言：“宜罢琬，进奉国，以竦天下忠臣心。”度支有囚系闾乡狱，更三赦不得原。又奏言：“父死，絜其子，夫久系，妻嫁，债无偿期，禁无休日，请一切免之。”奏凡十余上，益知名。

会王承宗叛，帝诏突吐承璀率师出讨，居易谏：“唐家制度，每征伐，专委将帅，责成功，比年始以中人为都监。韩全义讨淮西，贾良国监之；高崇文讨蜀，刘贞亮监之。且兴天下兵，未有以中人专统领者。神策既不置行营节度，即承璀为制将，又充诸军招讨处置使，是实都统。恐四方闻之，必轻朝廷。后世且传中人为制将自陛下始，陛下忍受此名哉？且刘济等洎诸将必耻受承璀节制，心有不乐，无以立功。此乃资承宗之奸，挫诸将立锐。”帝不听。既而兵老不决，居易上言：“陛下讨伐，本委承璀，外则卢从史、范希朝、张茂昭。今承璀进不决战，已丧大将，希朝、茂昭数月乃入贼境，观其势，似阴相为计，空得一县，即壁不进，理无成功。不亟罢之，且有四害。以府帑金帛、齐民膏血助河北诸侯，使益富强，一也。河北诸将闻吴少阳受命，将请洗涤承宗，章一再上，无不许，则河北合从，其势益固。与夺恩信，不出朝廷，二也。今暑湿暴露，兵气熏蒸，虽不顾死，孰堪其苦？又神策杂募市人，不耻于役，脱奔逃相动，诸军必摇，三也。回鹘、吐蕃常有游侦，闻讨承宗历三时无功，则兵之强弱，费

之多少，彼一知之，乘虚入寇，渠能救首尾哉？兵连事生，何故蔑有？四也。事至而罢，则损威失柄，祇可逆防，不可追悔。”亦会承宗请罪，兵遂罢。

后对殿中，论执强鲠，帝未谕，辄进曰：“陛下误矣。”帝变色，罢，谓李绛曰：“是子我自拔擢，乃敢尔，我叵堪此，必斥之！”绛曰：“陛下启言者路，故群臣敢论得失。若黜之，是箝其口，使自为谋，非所以发扬盛德也。”帝悟，待之如初。岁满当迁，帝以资浅，且家素贫，听自择官。居易请如姜公辅以学士兼京兆户曹参军，以便餐，诏可。明年，以母丧解，还，拜左赞善大夫。

是时，盗杀武元衡，京都震扰。居易首上疏，请亟捕贼，刷朝廷耻，以必得为期。宰相嫌其出位，不悦。俄有言：“居易母坠井死，而居易赋《新井篇》，言浮华，无实行，不可用。”出为州刺史。中书舍人王涯直言不宜治郡，追贬江州司马。既失志，能顺适所遇，托浮屠生死说，若忘形骸者。久之，徙忠州刺史。入为司门员外郎，以主客郎中知制诰。

穆宗好畋游，献《续虞人箴》以讽，曰：

唐受天命，十有二圣。兢兢业业，咸勤厥政。鸟生深林，兽在丰草。春搜冬狩，取之以道。鸟兽虫鱼，各遂其生。民野君朝，亦克用宁。在昔玄祖，厥训孔彰：“驰骋田畋猎猪，俾心发狂。”何以效之，曰羿与康。曾不是诫，终然覆亡。高祖方猎，苏长进言：“不满十旬，未足为欢。”上心既悟，为之辍畋。降及宋璟，亦谏玄宗。温颜听纳，献替从容。璟趋以出，鹞死握中。噫！逐兽于野，走马于路。岂不快哉，衔橛可惧。审其安危，惟

圣之虑。

俄转中书舍人。田布拜魏博节度使，命持节宣谕，布遗五百缣，诏使受之，辞曰：“布父讎国耻未雪，人当以物助之，乃取其财，谊不忍。方谕问旁午，若悉有所赠，则贼未殄，布赀竭矣。”诏听辞饷。

是时，河朔复乱，合诸道兵出讨，迁延无功。贼取弓高，绝粮道，深州围益急。居易上言：“兵多则难用，将众则不一。宜诏魏博、泽潞、定、沧四节度，令各守境，以省度之赀饷。每道各出锐兵三千，使李光颜将。光颜故有凤翔、徐、滑、河阳、陈许军无虑四万，可径薄贼，开弓高粮路，合下博，解深州之围，与牛元翼合。还裴度招讨使，使悉太原兵西压境，见利乘隙夹攻之，间令招谕以动其心，未及诛夷，必自生变。且光颜久将，有威名，度为人忠勇，可当一面，无若二人者。”于是，天子荒纵，宰相才下，赏罚失所宜，坐视贼，无能为。居易虽进忠，不见听，乃丐外迁。为杭州刺史，始筑堤捍钱塘湖，钟泄其水，溉田千顷；复浚李泌六井，民赖其汲。久之，以太子左庶子分司东都。复拜苏州刺史，病免。

文宗立，以秘书监召，迁刑部侍郎，封晋阳县男。大和初，二李党事兴，险利乘之，更相夺移，进退毁誉，若旦暮然。杨虞卿与居易姻家，而善李宗闵，居易恶缘党人斥，乃移病还东都。除太子宾客分司。逾年，即拜河南尹，复以宾客分司。开成初，起为同州刺史，不拜，改太子少傅，进冯翊县侯。会昌初，以刑部尚书致仕。六年，卒，年七十五，赠尚书右仆射，宣宗以诗吊之。遗命薄葬，毋请谥。

居易被遇宪宗时，事无不言，湔剔抉摩，多见听可，然

为当路所忌，遂摈斥，所蕴不能施，乃放意文酒。既复用，又皆幼君，偃蹇益不合，居官辄病去，遂无立功名意。与弟行简、从祖弟敏中友爱。东都所居履道里，疏沼种树，构石楼香山，凿八节滩，自号“醉吟先生”，为之传。暮节惑浮屠道尤甚，至经月不食荤，称“香山居士”。尝与胡杲、吉旼、郑据、刘真、卢真、张浑、狄兼谟、卢贞燕集，皆高年不事者，人慕之，绘为《九老图》。

居易于文章精切，然最工诗。初，颇以规讽得失，及其多，更下偶俗好，至数千篇，当时士人争传。鸡林行贾售其国相，率篇易一金，甚伪者，相辄能辩之。初，与元稹酬咏，故号“元白”；稹卒，又与刘禹锡齐名，号“刘白”。其始生七月能展书，姆指“之”、“无”两字，虽试百数不差；九岁暗识声律。其笃于才章，盖天稟然。敏中为相，请谥，有司曰“文”。后履道第卒为佛寺。东都、江州人为立祠焉。

元结传

——《新唐书》卷一四三

【说明】元结（719—772），唐代文学家。字次山，号漫叟、聾叟，河南鲁山（今属河南）人。安史之乱时，曾组织义军抗击叛军，后历任道州刺史、容州都督充本管经略守捉使，因遭权臣嫉妒，辞官隐居。

元结承继《诗经》、乐府传统，主张诗歌为政治教化服务，为诗注重反映政治现实和人民疾苦。散文亦多涉及时政，风格古朴，后人视其为韩柳古文运动的先驱。

曾编选《箠中集》行世。明人辑有《元次山集》。

元结，后魏常山王元遵十五代孙。曾祖仁基，字帷固，跟随唐太宗李世民征讨辽东，因立军功，赐宜君县田地二十顷，又赐辽东人口五十，以及公、母马五十，拜官宁塞县令，袭封常山公。祖父元亨，字利贞，仪表俊美。曾经说：“我继承王公的馀绪，所习是鹰犬游猎和声乐歌舞这一套，自当以儒家之学取代之。”霍王李元轨听到他的名声，起用他参军事。父亲元延祖，三岁便成了孤儿，元仁基告诉他母亲：“这个孩子将来为我祭祀。”于是为他起名取字。待他长大，不求仕进，

年纪过了四十，还不想当官，亲戚强劝他，才调春陵（今湖南道县）丞，不久便弃官而去，说：“人生穿衣吃饭，可解决饥饱冷暖问题，此外不宜再有什么要求的了。”每当灌溉田地，采拾樵薪，便认为“有生之年所事之役，除此以外，我不加以思考。”安禄山造反，召元结并告戒他：“你们遇到多事的时世，不能自安于山林，要勉力以树名节，不要近羞辱之事。”延祖卒年七十六，门人私下谥之曰“太先生”。

元结少年时代放荡不加束拘，直到十七岁才改变平日志向，努力学习，拜元德秀为师。天宝十二年（753）进士及第，礼部侍郎阳浚见到他的文章，说：“进士一第都是懒子而已，考官得到世人才是可倚靠的。”果然选为上第。又参加制科考试，正好碰到天下大乱，便沉浮于民间。国子司业苏源明晋见肃宗，肃宗问及天下士人，苏源明举荐元结，认为此人可用。当时史思明攻打河阳（今河南孟县），皇帝将到河东，召元结到京师，问元结有什么说的，元结自己因为才见皇上，拘束忌讳，惟恐说话不能完全表达自己的情怀，便献上《时议》三篇。第一篇说：

议者问：“往时叛逆之贼，东穷于海滨，南逼近淮河、汉水，西到达函关、秦中，北极于幽都，这帮丑恶之徒如虎狼跋扈于四方的有几百万人，当时的大祸真可说很厉害，而且人心也都自危了。皇上独以匹马赴灵武，合并力弱的军队，锄强寇，大军到渭河之西，曾经不越时而摧掉锐兵，攘除凶逆，收复东、西两京，以及河南各州县，多么不容易呀！而今河北之奸逆尚未除尽，山林和江湖逃亡者尚多，盗贼常常侵犯州县，百姓奔波转徙，

接踵不断，将领和士兵临敌而奔逃，贤人君子也逃亡不出来。陛下往日在灵武、凤翔时，没有像今日这样的精兵而能杀敌，没有今日这样的检束查禁而无逃亡的，没有今日这样的威令而盗贼不骚扰，没有今日这样的资财而百姓不流亡，没有今日这样的爵禄赏赐而士人不离散，没有今日这样的朝廷而贤人想出仕，这是为什么呢？是天子能以危为安，或者忍心于未安之时而忘危吗？”答曰：“这并非难以解释的，前日天子因陵庙被胡羯叛逆伤污而愧恨，为上皇南入巴蜀而愤慨，暗自伤悼宗亲在叛乱中被诛杀，躬身勤劳，不惜亲自安抚兵士，授予部下权力与地位，能信而不疑，希望听到忠直之言，如饥似渴，自己有过失，也不讳疾忌医。这都是能以弱胜强，于危中取安的原由啊。今日天子处于重重城墙内的深宫里，安乐而居；戴上皇冠等待黎明时刻，佩带簪缨而上朝；尚食房做好各种美味的菜肴，按时送食；掌管礼乐的太常寺准备好音乐，选好听的推荐上来；国家的机要和军事，要待众官参详筹划以后才敢提出来；老百姓的疾苦，有时听不到；马圈里的好马、宫中的美女、车驾服装和各种礼物以及好兆头的符瑞奏谍，日常都很充足齐备；朝廷里歌颂盛德大业的赞美声，百听不厌；四方缴上来的贡物和税赋，各地争先恐后地奉上最好的；善于诙谐滑稽和善于谈笑戏谑的从军，能使皇帝笑逐颜开；文武大臣以至于下层普通的官，所受的权力和赏赐，都超过其所希望的。这就是为什么不能以强制弱，且在未安之时而忘危。如果陛下看待今日的安定局面，能如在灵武的

时候那样，那些寇盗还有什么强弱可言呢！”

《时议》的第二篇说：

议者曰：“我听到士人自相谋议说：‘往日我奉天子抗拒凶逆叛贼，能打胜仗，家庭和国家就会两全；不能打胜仗，就会两亡，所以是生是死，都取决于战斗，是是非非，必向皇上极谏。现在我的名誉和地位都很突出，财产货物也很充足，爵禄赏赐也厚重，为国效劳已经到头了，外面没有仇敌害我，里面没有穷困贫贱威胁我，我何苦去冒锋刃杀戮的危险呢，何必去忤逆君主而取祸呢？’又听说：‘我们州中乡里有患病的父亲和垂老的母亲，还有孤独的哥哥和死了丈夫的寡妇，都当了乞丐，忍饥挨冻，比死去的还要难堪，有谁去哀怜他们呢？’又听说：‘天下已经残破凋弊，老百姓处于危险窘迫的境地，承受赋税与徭役的，都是鳏寡贫弱的人家，所以流亡迁徙，悲哀忧愁充满道路，实在也到了极点了。天下安定，我们这些人哪能没有点田地可以安排自己的生活？天下如果不安定，我不能再以忠义仁信方直自守而等死了！’老百姓已到了这地步，有什么办法呢？”答曰：“国家不是想让情况变得这样糟糕，只因为失之于过于明又过于信啊。过于明，就会显现它的内情，要隐瞒内情就会迷惑下民。能做到令必行，就要讲究信，信是必要的，而过于信，大奸尤其厌恶它。这样也就使得朝廷没有秉公持直的，天下失去忠信，百姓便含冤结恨。想要加以治理，哪能没有原由？我们在朝外议论，又有什么作用呢？”

《时议》的第三篇说：

议者曰：“陛下想安定百姓，消灭奸人逆贼，以求太平，劳尽心神和精力，至今已经四年了，而议论的人却有不同看法，为什么呢？”答曰：“像天子所想的和议论的人所持的异议，不是不知道啊。凡是有诏令交代要办的，事情都办不成，空话说了一遍又一遍，很像滑稽笑话。今日有关于仁爱抚恤下民的诏令，有关于忧愁劳苦国事的制议，人们都聚族结党而私语，加以议论指斥。天子不知情况是这样的，还以为言虽不能实行，还可以起劝戒的作用。他加以劝阻，在于明审切当而一定实行。天子能实行已经发布的政令，一定是将来之法，烦杂的徭役和腐败的体制，拘束禁忌，烦琐政令，一切都免除荡涤。任用天下的贤士，屏斥小人，然后推行仁信威令，谨其所行而不惑乱，这都是帝王通常所行之道，为什么做不到呢？”

皇帝读了《时议》三篇，心里很高兴，说：“你能解除朕的忧愁呀。”提升元结为右金吾兵曹参军，代理监察御史，为山南西道节度参谋。招募义勇之士于唐、邓、汝、蔡四州，与贼对抗，招降盗贼五千之众，埋战死者露尸于泌南，其坟堆称为“哀丘”。

史思明叛乱，皇帝将要亲征，元结建议说：“叛贼锐气未减，不可同他争锋，宜以谋折其锋。”皇帝以为其言甚善，因而下令发宛（今河南南阳）、叶（今河南叶县）之军，挫败贼军的锐气南向锋芒。元结屯军泌阳（今河南泌源），以守其险要，保全十五城。元结以讨伐叛逆有功，官升监察御史里行。荆南节度使吕湮请增加兵力以抗拒叛贼，皇帝进封元结为水

部员外郎，为吕湮军幕僚佐。又参山南东道来镇瑱府，当时有父母随儿子在军中的，元结同来瑱说：“孝而且仁的人，始可与言忠；信而且勇的人，始可以全义。岂有只要求他忠信义勇，而不去劝他对父母孝慈的呢？将士父母在军中的，应当发给衣食，这样义就有所存了。”来瑱采纳他的意见。来瑱受诛，元结代领府事。正当代宗即位，元结坚决辞去山南东道府事，乞求归樊上侍奉父母。授予著作郎之职。更着力于著书，作《自释》，说：

河南（今河南洛阳），元氏的祖籍。结，元先生的名啊；次山，元结的字啊。元氏世代功业，载于国史；元氏世系，见于家谱。少时居住商馀山，撰写《元子》十篇，所以称为元子。天下兵起，逃乱入猗玗洞，才称为“猗玗子”。后来家于灊水之滨，于是自称“浪士”。及至有了官职，人家以为浪者也能漫为官呀，呼为“漫郎”。已经客居樊上，漫就更突出了。樊上左右邻都以捕鱼为业，老人小孩都与元子相戏谑，于是改称“聱叟”。他们之所以讥诮为“聱”，是因为他和他们相处不相听从，不相勾结，带着装鱼的小竹篓而听任渔船漂流，自乖忤时俗而驱车独行。酒徒得此人，又说：“你之所谓漫，同聱差不多呀？您守职著作郎，不带装鱼的小竹篓？又在民间漫浪，不就是忤俗吗？你漫已久，可以漫为叟。”呜呼！我不听从时俗，不勾结当世，究竟谁是不听取意见的“聱者”，我倒想跟随他！那聱叟并不愧于带装鱼的小竹篓，我又怎能轻视这著作郎之职呢？那聱叟也不因忤于邻里而羞愧，我又怎能漫浪于民间而感到有愧呢？采取你们这些醉汉的建议，我应当以“漫叟”为称号。但放浪其情性，怪漫其作为，让人

知道他无所存无所有，也无所等待。于是编几句韵语说：“能带装鱼的簪簪，保全自己的独行又保生；能学不听话的聾牙，却能保全家族又能保全家，聾呀就是这样的，漫呢是是还是非呀！”

过了很久，元结又官拜道州刺史。上任之初，西原蛮掳掠居民数万人而去，剩下的户数才四千户，收赋税的使者发符牒二百函，元结认为居民困顿不堪，不忍心再加赋税，当即上书说：“臣所管之州为西原蛮贼所破毁，粮食储备、住屋第宅、男人女人、耕牛牧马，几乎殆尽。今百姓十不存一，老叟小孩骚动离散，不能安居。岭南各州，寇盗不尽，有边防守捉候望近四十馀屯，一有不宁，湖南将发生动乱。请免去百姓所负担税租以及租庸使和市杂物十三万缗钱。”皇帝准予。明年，租庸使索取上供之钱十万缗，元结又上奏章说：“每年除正常租庸之外，所遵循者宜按时有所增减。”皇帝下诏准许实行。元结为老百姓经营屋舍，给予田产，免去徭役，流亡在外返回乡里的有一万多人。进授容管经略使，亲自晓谕蛮豪首长，平定八个州。恰遇母死守丧，老百姓都到节度使府署挽留，又加给元结左金吾卫将军之职。百姓乐受他的教化，乃至立石勒字歌颂他的恩德。罢官后，元结回到京师长安，死于京城，享年五十岁，追赠礼部侍郎。

（刘林译）

【原文】

元结，后魏常山王遵十五代孙。曾祖仁基，字惟固，从太宗征辽东，以功赐宜君田二十顷，辽口并马牝牡各五十，拜宁塞令，袭常山公。祖亨，字利贞，美姿仪。尝曰：“我承王

公余烈，鹰犬声乐是习，吾当以儒学易之。”霍王元轨闻其名，辟参军事。父延祖，三岁而孤，仁基敕其母曰：“此儿且祀我。”因名而字之。逮长，不仕，年过四十，亲娅强劝之，再调春陵丞，辄弃官去，曰：“人生衣食，可适饥饱，不宜复有所须。”每灌畦掇薪，以为“有生之役，过此吾不思也。”安禄山反，召结戒曰：“而遭逢世多故，不得自安山林，勉树名节，无近羞辱”云。卒年七十六，门人私谥曰“太先生”。

结少不羁，十七乃折节向学，事元德秀。天宝十二载举进士，礼部侍郎阳浚见其文，曰：“一第懒子耳，有司得子是赖。”果擢上第。复举制科。会天下乱，沉浮人间。国子司业苏源明见肃宗，问天下士，荐结可用。时史思明攻河阳，帝将幸河东，召结诣京师，问所欲言，结自以始见轩陛，拘忌讳，恐言不悉情，乃上《时议》三篇。其一曰：

议者问：“往年逆贼，东穷海，南淮、汉，西抵函、秦，北彻幽都，丑徒狼戾在四方者几百万，当时之祸可谓剧，而人心危矣。天子独以匹马至灵武，合弱旅，钜强寇，师及渭西，曾不逾时，摧锐攘凶，复两京，收河南州县，何其易邪？乃今河北奸逆不尽，山林江湖亡命尚多，盗贼数犯州县，百姓转徙，踵系不绝，将士临敌而奔，贤人君子遁逃不出。陛下往在灵武、凤翔，无今日胜兵而能杀敌，无今日检禁而无亡命，无今日威令而盗贼不作，无今日财用而百姓不流，无今日爵赏而士不散，无今日朝廷而贤者思仕，何哉？将天子能以危为安，而忍以未安忘危邪？”对曰：“此非难言之。前日天子恨愧陵庙为羯逆伤污，愤怅上皇南幸巴、蜀，隐悼宗戚见

诛，侧身勤劳，不惮亲抚士卒，与人权位，信而不疑，渴闻忠直，过弗讳改。此以弱制强，以危取安之繇也。今天子重城深宫，燕和而居；凝冕大昕，纓佩而朝；太官具味，视时而献；太常备乐，和声以荐；国机军务，参筹乃敢进；百姓疾苦，时有不闻；厩刍良马、宫籍美女、舆服礼物、休符瑞谍，日月充备；朝廷歌颂盛德大业，听而不厌；四方贡赋，争上尤异；谐臣颀官，怡愉天颜；文武大臣至于庶官，皆权赏逾望。此所以不能以强制弱，以未安忘危。若陛下视今日之安，能如灵武时，何寇盗强弱可言哉！”

其二曰：

议者曰：“吾闻士人共自谋：‘昔我奉天子拒凶逆，胜则家国两全，不胜则两亡，故生死决于战，是非极于谏。今吾名位重，财货足，爵赏厚，勤劳已极，外无仇讎害我，内无穷贱迫我，何苦当锋刃以近死，忤人主以近祸乎？’又闻曰：‘吾州里有病父老母、孤兄寡妇，皆力役乞丐，冻馁不足，况于死者，人谁哀之？’又闻曰：‘天下残破，苍生危窘，受赋与役者，皆寡弱贫独，流亡死徙，悲忧道路，盖亦极矣。天下安，我等岂无畎亩自处？若不安，我不复以忠义仁信方直死矣！’人且如此，奈何？”对曰：“国家非欲其然，盖失于太明太信耳。夫太明则见其内情，将藏内情则罔惑生下。能令必信，信可必矣，而太信之中，至奸尤恶之。如此遂使朝廷亡公直，天下失忠信，苍生益冤结。将欲治之，能无端由？吾等议于野，又何所及？”

其三曰：

议者曰：“陛下思安苍生，灭奸逆，图太平，劳心悉精，于今四年，说者异之，何哉？”对曰：“如天子所思，说者所异，非不知之。凡有诏令丁宁，事皆不行，空言一再，颇类谐戏。今有仁恤之令，忧勤之诰，人皆族立党语，指而议之。天子不知其然，以为言虽不行，犹足以劝。彼沮劝，在乎明审均当而必行也。天子能行已言之令，必将来之法，杂徭弊制，拘忌烦令，一切蠲荡。任天下贤士，屏斥小人，然后推仁信威令，谨行不惑。此帝王常道，何为不及？”

帝悦曰：“卿能破朕忧。”擢右金吾兵曹参军，摄监察御史，为山南西道节度参谋。募义士于唐、邓、汝、蔡，降剧贼五千，瘞战死露尸于泌南，名曰“哀丘”。

史思明乱，帝将亲征，结建言：“贼锐不可与争，宜折以谋。”帝善之，因命发宛、叶军挫贼南锋，结屯泌阳守险，全十五城。以讨贼功迁监察御史里行。荆南节度史吕湮请益兵拒贼，帝进结水部员外郎，佐湮府。又参山南东道来瑱府，时有父母随子在军者，结说瑱曰：“孝而仁者，可与言忠；信而勇者，可以全义。渠有责其忠信义勇而不劝之孝慈邪？将士父母，宜给以衣食，则义有所存矣。”瑱纳之。瑱诛，结摄领府事。会代宗立，固辞，丐侍亲归樊上。授著作郎。益著书，作《自释》，曰：

河南，元氏望也。结，元子名也。次山，结字也。世业载国史，世系在家谍。少居商余山，著《元子》十篇，故以“元子”为称。天下兵兴，逃乱入猗玗洞，始称

“猗玗子”。后家襄滨，乃自称“浪士”。及有官，人以为浪者亦漫为官乎，呼为“漫郎”。既客樊上，漫遂显。樊左右皆渔者，少长相戏，更曰“聾叟”。彼谓以聾者，为其不相从听，不相钩加，带漫而尽船，独聾牙而挥车。酒徒得此，又曰：“公之漫其犹聾乎？公守著作，不带簪笏乎？又漫浪于人间，得非聾齟乎？公漫久矣，可以漫为叟。”于戏！吾不从听于时俗，不钩加于当世，谁是聾者，吾欲从之！彼聾叟不惭带乎簪笏，吾又安能薄乎著作？彼聾叟不羞聾齟于邻里，吾又安能惭漫浪于人间？取而醉人议，当以“漫叟”为称。直荒浪其情性，诞漫其所为，使人知无所存有，无所将待。乃为语曰：“能带簪笏，全独而保生；能学聾齟，保宗而全家。聾也如此，漫乎非邪！”

久之，拜道州刺史。初，西原蛮掠居人数万去，遗户裁四千，诸使调发符牒二百函，结以人困甚，不忍加赋，即上言：“臣州为贼焚破，粮储、屋宅、男女、牛马几尽。今百姓十不一在，耄儒骚离，未有所安。岭南诸州，寇盗不尽，得守捉候望四十余屯，一有不靖，湖南且乱。请免百姓所负租税及租庸使和市杂物十三万缗。”帝许之。明年，租庸使索上供十万缗，结又奏：“岁正租庸外，所率宜以时增减。”诏可。结为民营舍给田，免徭役，流亡归者万余。进授容管经略使，身谕蛮豪，绥定八州。会母丧，人皆诣节度府请留，加左金吾卫将军。民乐其教，至立石颂德。罢还京师，卒，年五十，赠礼部侍郎。

杜牧传

——《新唐书》卷一六六

【说明】杜牧（803～852），唐代诗人。字牧之，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唐文宗时中进士，曾为黄、池、睦、湖等州刺史，晚年任中书舍人，居长安城南樊川别墅，后世称为“杜樊川”。

杜牧在诗、赋、古文的创作上都有较高成就。其诗题材广阔，笔力雄健，在晚唐成就颇高，与李商隐并称“小李杜”。杜牧的文章也自成一家，“纵横奥衍，多切经世之务”（《四库全书总目》）。他将散文的笔法引入赋中，创作出《阿房宫赋》。那样融叙事、抒情、议论为一炉的新体“散赋”，对后来赋的发展有重要影响。有《樊川集》。

杜牧，字牧之，善于写文章。中进士第，又举贤良方正。沈传师表请为江西团练府巡官，又为牛僧孺淮南节度府掌书记。提升为监察御史，因病分司东都，又因弟弟杜颢患病而弃官。复任宣州团练判官，拜殿中侍御史内供奉。

这时候，刘从谏镇守泽潞，何进滔据守魏博，都颇为骄横不遵守法度。杜牧追溯归咎长庆以来朝廷的一些措施不得

法，所以又失去山东，大封藩镇，借以维系天下的轻重，不能听任继承袭职式轻意授予，这都是国家的大事，朝廷怪他不在其位而妄言，实责其罪，所以他写了《罪言》，其文曰：

老百姓常常受兵祸之害，兵祸始于山东，泛滥于天下。不拿下山东，兵祸不可止息。山东这地方，夏禹画定九州，称为冀州，舜帝因为觉得分得太大，析为幽州和并州。量其水与土，与河南相等，曾多十分之一二，所以其民生性深沈勇猛而多材力，重然诺，能吃苦。自魏、晋以来，工巧机诈相杂，意态百出，其俗更加卑下，其民更加脆弱，只有山东聚五种之男，以兵矢为本，他人不能涤除而自如。其地出产健马，下等的马也能一日跑二百里，所以其兵常能敌于天下。冀州，因为自恃其强而不循理，希望定能破弱者；既已破弱者，又希望再强大。并州，其力足以并兼天下。幽州，阴森森充满杀气，圣人所以取“幽”为名。

黄帝之时，蚩尤是战争的祸根，从那以后帝王多居于其地。周朝衰落而齐国称霸，不到一世（三十年），晋朝强大，常奴役诸侯。至秦时才聚精兵攻三晋，经过六代才克韩，遂挫折天下之脊梁；后来又攻克赵，因而兼并诸国。韩信联合齐国而得齐，所以蒯通知道汉与楚之轻或重全在韩信。后汉光武帝兴起于上谷（今河北易县），终成于鄴（今河北柏乡）。魏武帝的官渡之战，三分天下得其二。晋末大乱而五胡继起，至宋武帝时，号称英雄，攻蜀，又得关中，后尽占河南之地，十分天下得其八，但不能使一个人渡河去窥伺胡人。至高氏北齐，荒淫放荡，宇文氏攻取之，隋文帝因而灭掉南朝陈国，五百年后，天下才归于一统。隋文帝不是宋武帝的对手，因

为宋没取得山东，而隋取得山东，所以隋得以称王，而宋只能称霸。由此说来，山东这地方，王者不能取得便不能为王，霸者不能取得便不能称霸，狡猾的叛贼得之，便足以使天下不得安宁。

天宝末年，燕地叛贼兴起，出入成皋（今河南荥阳）、函谷、潼关之间，如入无人之境。郭子仪、李光弼之辈拥兵五十万，尚且不能打过邺（今河南临漳）。从此一百多个城，尽天下之力，不能收复尺寸之地，民之见叛贼如同回鹘、吐蕃，竟没人敢于窥视。国家因此挖河渠塞为屏障加以戍卫，堵其通路。齐、鲁、梁、蔡各地受其影响，因而也起而为寇，从内开拓外，以外支撑内，混杂回转，颠倒横斜，没有长达五年之久不发生战争。人民日益困顿，四夷日益嚣张，天子因此跑到陕州（今河南陕县），跑到汉中，疲惫不堪竟达七十多年之久。幸遇孝武皇帝，十日浣衣，十日一肉，不游猎，不听乐，从卑下的官员中提拔宰相和将领，历十三年，方才尽收河南、山西之地，洗削敝政，实行改革，没有不能适应的。只有山东不服，也一再攻打，但都不利。岂非老天让百姓们未能达到安泰地步吗？岂非人谋还没到达使天下太平的境地吗？何等的艰难啊？

今日天子圣明，超出前代，有志于平稳而治。如果想使老百姓无事，其首要之事是除去兵祸。不取得山东之地，就不能消除兵祸。今之上策，不如使其自治。为什么呢？当贞元（785—804年）之际，山东有燕、赵、魏反叛，河南有齐、蔡反叛，梁、徐、陈、汝、白马津、盟津、襄、邓、安、黄、寿春各地都拥有强兵，十馀所才足以自己保卫治所，实在不

能腾出一人派别的用场，遂使我势力松散瓦解，熟视不轨之徒而无可奈何。继此，蜀也反叛，吴也反叛，其他没有反叛的，也是看着时势或上或下，无可信任。自元和至今二十九年之间，收得蜀、吴、蔡、齐各地郡县约二百馀城，所未收复的只有山东一百城而已。土地户口，财物兵甲，和往年相比，岂不绰绰有馀？也足以自为平治了。法令制度，规格条例，果真能自治？贤才与奸恶，选拔和舍弃，果真能自治？屏障戍守，车马兵器，果真能自治？闾里田间，仓库财税，果真能自治？如果不能真正自治，便是助寇为寇。周围三千里，植根七十年，又有天下暗中为助，那么应如何取得？所以说上策莫如自治，中策莫如取魏。魏在山东各地中分量最重，在河南各地中也最重。魏在山东，之所以最重，以其能遮住赵，既不可越过魏去取得赵，又不可越过赵去取得燕。所以燕、赵常借重于魏，魏则常控制燕、赵的命脉。所以说魏在山东最重要。黎阳（今河南浚县）距白马津三十里，新乡（今属河南）距盟津一百五十里，屏障堡垒遥相对望，朝驾车而暮可战，这两个津口，如果敌人能击溃其一，那么要杀入成皋（今河南汜水），不需数日，便能到达，所以魏对于河南来说，也是最重要的。元和中，统天下大军以诛讨蔡州和齐州的叛贼，停了五年，山东之所以没有忧患，是因为取得了魏地。前者诛伐沧州（今河北沧县），停兵三年，没有山东的忧患，也是因为取得了魏地。长庆初年诛伐赵，一日五路诸侯四面出击尽皆溃散，因为失去魏地。昨日诛伐赵，疲惫如长庆之时，也是因为失去魏地。所以河南、山东的轻重关键在魏。不是因为魏之强大才显得重要，而是地理形势使之显得重要。所

以收取魏地为中策。最下策是轻率出战，不审察地理形势，不审察攻守战略。兵多粮多，驱赶人去作战，便于防守；兵少粮少，人不驱而能自奋而战，利于战。所以我方常失于战，而贼虏常困于守。山东叛变将近三五世，后生所见到的言语和举止，无不是叛变之态，长久为此，便以如事理正该为此，深刻入于骨髓，没有以为非的，甚至有围城危急，粮食用尽，吃尸体以维持生命继续战斗。以此为风俗，岂可同他决胜负？十馀年来，共三次收复赵地，赵粮食用尽，即将攻下，而郗士美兵败，赵又振作起来；杜叔良兵败，赵又振兴起来；李昕兵败，赵又兴起。所以说不审察攻守战略，轻率作战，是最下策。

杜牧历任左补阙、史馆修撰，又改膳部员外郎。宰相李德裕素来欣赏他的奇才。会昌（841—846）中，黠戛斯击破回鹘，回鹘部落溃败转入沙漠之南，杜牧劝李德裕乘势收取，认为：“两汉征伐北虏，常因秋冬之时，正当匈奴劲弓折胶，生马停乳，和他们相较量，所以败多胜少。今如果在仲夏之时，发幽州、并州之兵及酒泉之兵，出其不意，一举成功，则回鹘无馀类了。”李德裕认为这主意好。正巧刘稹抗拒朝廷之命，下诏让诸镇征讨他，杜牧又写信给李德裕，认为“河阳距西北天井关百里有馀，用一万人筑垒，堵塞其关口，深沟壁垒，不要与之作战。成德军世代与昭义军为敌，王元逵想一雪其耻而自奋起，然而不能长驱直捣上党，其必定可取的在西面。如今若以忠武军和武宁军两军加青州精兵五千、宣润弓弩手二千，取道绛州而入，不用数月工夫，必定倾覆贼巢。昭义军的粮食，都仰给于山东，日常节度使则留食于邢

州，山西兵少力单，可乘虚袭取。所以听说兵贵拙而速，未见兵之巧而久啊。”不久，泽潞平定，其经过大略如杜牧所献之策。他又历黄州（今湖北黄冈）、池州（今安徽贵池）、睦州（今浙江遂安）三州刺史，入朝为司勋员外郎，并常兼史职。后改任吏部，又乞请为湖州（今属浙江）刺史。越年，杜牧以考功郎中知制诰，迁为中书舍人。

杜牧刚直有奇节，不谨小慎微，敢纵论大事，指摘陈述各种利弊尤其切中肯綮。少时同李甘、李中敏、宋祁友善，他之博古通今，善于处理成败，李甘等人都不及他。杜牧也因为疏直，于时没有援助的。从兄杜悰历任将相，而杜牧困顿不能自振，常快快不乐。卒年五十。初时，杜牧梦有人告诉他说：“你应取名毕。”又梦见写“皎皎白驹”四字，有人说“这是过隙”。不久，炊器瓦甑被火烧裂，杜牧说：“这是不祥之兆！”于是自己写了一篇墓誌，并将平时所写的文章尽行焚烧。

杜牧在诗歌方面，情致豪迈，人们称他为“小杜”，以区别于杜甫。

（刘林 译）

【原文】

牧字牧之，善属文。第进士，复举贤良方正。沈传师表为江西团练府巡官，又为牛僧孺淮南节度府掌书记。擢监察御史，移疾分司东都，以弟颢病弃官。复为宣州团练判官，拜殿中待御史内供奉。

是时，刘从谏守泽潞，何进滔据魏博，颇骄蹇不循法度。牧追咎长庆以来朝廷措置亡术，复失山东，钜封剧镇，所以系天下轻重，不得承袭轻授，皆国家大事，嫌不当位而言，实

有罪，故作《罪言》。其辞曰：

生人常病兵，兵祖于山东，羨于天下。不得山东，兵不可死。山东之地，禹画九土曰“冀州”，舜以其分太大，离为幽州，为并州。程其水土。与河南等，常重十一二，故其人沉鸷多材力，重许可，能辛苦。魏、晋以下，工机纤杂，意态百出，俗益卑弊，人益脆弱，唯山东敦五种，本兵矢，他不能荡而自若也。产健马，下者日驰二百里，所以兵常当天下。冀州，以其恃强不循理，冀其必破弱；虽已破，冀其复强大也。并州，力足以并吞也。幽州，幽阴惨杀也。圣人因以为名。

黄帝时，蚩尤为兵阶，自后帝王多居其地。周劣齐霸，不一世，晋大，常佣役诸侯。至秦萃锐三晋，经六世乃能得韩，遂折天下脊；复得赵，因拾取诸国。韩信联齐有之，故蒯通知汉、楚轻重在信。光武始于上谷，成于鄴。魏武举官渡，三分天下有其二。晋乱胡作，至宋武号英雄，得蜀，得关中，尽有河南地，十分天下之八，然不能使一人度河以窥胡。至高齐荒荡，宇文取之，隋文因以灭陈，五百年间，天下乃一家。隋文非宋武敌也，是宋不得山东，隋得山东，故隋为王，宋为霸。由此言之，山东，王者不得不为王，霸者不得不为霸，猾贼得之，足以致天下不安。

天宝末，燕盗起，出入成皋、函、潼间，若涉无人地。郭、李辈兵五十万，不能过邺。自尔百余城，天下力尽，不得尺寸，人望之若回鹘、吐蕃，义无敢窥者。国家因之畦河修障戍，塞其街蹊。齐、鲁、梁、蔡被其风流，因亦为寇。以裹拓表，以表撑里，混濔回转，颠倒横邪，未常五年间不战。生

人日顿委，四夷日日炽，天子因之幸陕，幸汉中，焦焦然七十余年。运遭孝武，汗衣一肉，不畋不乐，自卑冗中拔取将相，凡十三年，乃能尽得河南、山西地，洗削更革，罔不能适。唯山东不服，亦再攻之，皆不利。岂天使生人未至于割泰邪？岂人谋未至邪？何其艰哉！

今日天子圣明，超出古昔，志于平治。若欲悉使生人无事，其要先去兵。不得山东，兵不可去。今者，上策莫如自治。何者？当贞元时，山东有燕、赵、魏叛，河南有齐、蔡叛，梁、徐、陈、汝、白马津、盟津、襄、邓、安、黄、寿春皆戍厚兵，十余所才足自护治所，实不辍一人以他使，遂使我力解势弛，熟视不轨者，无可奈何。阶此，蜀亦叛，吴亦叛，其他未叛者，迎时上下，不可保信。自元和初至今二十九年，得蜀，得吴，得蔡，得齐，收郡县二百余城，所未能得，唯山东百城耳。土地人户，财物甲兵，较之往年，岂不绰绰乎？亦足自以为治也。法令制度，品式条章，果自治乎？贤才奸恶，搜选置舍，果自治乎？障戍镇守，干戈车马，果自治乎？井闾阡陌，仓廩财赋，果自治乎？如不果自治，是助虏为虏。环土三千里，植根七十年，复有天下阴为之助，则安可以取？故曰上策莫如自治。中策莫如取魏。魏于山东最重，于河南亦最重。魏在山东，以其能遮赵也。既不可越魏以取赵，固不可越赵以取燕。是燕、赵常取重于魏，魏常操燕、赵之命。故魏在山东最重。黎阳距白马津三十里，新乡距盟津一百五十里，陴垒相望，朝驾暮战，是二津虏能溃一，则驰入成皋，不数日间。故魏于河南亦最重。元和中，举天下兵诛蔡，诛齐，顿之五年，无山东忧者，以能得魏也。昨

日诛沧，顿之三年，无山东忧，亦以能得魏也。长庆初诛赵，一日五诸侯兵四出溃解，以失魏也。昨日诛赵，罢如长庆时，亦以失魏也。故河南、山东之轻重在魏。非魏强大，地形使然也。故曰取魏为中策。最下策为浪战，不计地势，不审攻守是也。兵多粟多，驱人使战者，便于守；兵少粟少，人不驱自战者，便于战。故我常失于战，虜常困于守。山东叛且三五世，后生所见言语举止，无非叛也，以为事理正当如此，沈酣入骨髓，无以为非者，至有围急食尽，啖尸以战。以此为俗，岂可与决一胜一负哉？自十余年凡三收赵，食尽且下。郗士美败，赵复振；杜叔良败，赵复振；李昕败，赵复振。故曰不计地势，不审攻守，为浪战，最下策也。

累迁左补阙、史馆修撰，改膳部员外郎。宰相李德裕素奇其才。会昌中，黠戛斯破回鹘，回鹘种落溃入漠南，牧说德裕不如遂取之，以为：“两汉伐虜，常以秋冬，当匈奴劲弓折胶重马免乳，与之相校，故败多胜少。今若以仲夏发幽、并突骑及酒泉兵，出其意外，一举无类矣。”德裕善之。会刘稹拒命，诏诸镇兵讨之，牧复移书于德裕，以“河阳西北去天井关强百里，用万人为垒，窒其口，深壁勿与战。成德军世与昭义为敌，王元逵思一雪以自奋，然不能长驱径捣上党，其必取者在西面。今若以忠武、武宁两军益青州精甲五千、宣润弩手二千，道绛而入，不数月必覆贼巢。昭义之食，尽仰山东，常日节度使率留食邢州，山西兵单少，可乘虚袭取。故兵闻拙速，未睹巧之久也。”俄而泽潞平，略如牧策。历黄、池、睦三州刺史，入为司勋员外郎，常兼史职。改吏部，复乞为湖州刺史。逾年，以考功郎中知制诰，迁中书舍人。

牧刚直有奇节，不为齷齪小谨，敢论列大事，指陈病利尤切至。少与李甘、李中敏、宋祁善，其通古今，善处成败，甘等不及也。牧亦以疏直，时无右援者。从兄惊更历将相，而牧回蹢不自振，颇怏怏不平。卒，年五十。初，牧梦人告曰：“尔应名毕。”复梦书“皎皎白驹”字，或曰“过隙也。”俄而炊甑裂，牧曰：“不祥也。”乃自为墓誌，悉取所为文章焚之。

牧于诗，情致豪迈，人号为“小杜”，以别杜甫云。

王绩传

——《新唐书》卷一九六

【说明】王绩（585～644），隋唐时诗人。字无功，自号东皋子，太原祁（今山西省祁县）人，隋时官秘书省正字，六合县丞，入唐为太乐丞。

王绩仕途失意，弃官归隐。其文骈散兼长，诗多以田园山水为题材，描写隐居生活和饮酒的情趣。诗风清新朴素，在风行绮丽婉媚的六朝诗风的初唐诗坛上，独具特色。有《王无功集》。

王绩，字无功，绛州龙门（今山西河津）人。性情傲岸豪放，不喜欢打躬作揖，奉迎拍马。

他哥哥王通，是隋朝末年的一位著名学者，曾在黄河和汾水之间聚集门徒讲学；专心钻研儒家经典，模仿古经书，写了一部《六经》，又模仿《论语》，写了一部《中说》。这两部书因为没有儒家学者们的推崇，所以不很知名，其中只有《中说》留传下来。

王通知道弟弟王绩古怪放纵，所以没让家中杂事拖累他，诸如乡亲或族人的婚丧喜事等活动，都没让他参加。王绩和

李播、吕才两人最友好。

隋大业年间，王绩参加科举考试，中孝廉，即所谓孝悌廉洁之士，授予秘书省正字之职。他不乐意在朝中当官，请求到六合（今江苏南京长江北岸）当县丞，但却不管政事，因为他特别爱喝酒。当时天下已乱，有人告他一状，他也就乘机辞官而去，感叹说：“罗网张挂在天上，我还能到哪里去呢？”于是返回老家。他家在黄河岸边还有十六顷田呢。

有一位叫仲长子光的，也是个隐士，没有妻室和子女，在黄河北岸结庐而居，长达三十年，一直自食其力。王绩喜爱他有真情性，便迁移到他家近处，卜邻而居。仲长子光是个哑巴，王绩不曾同他交谈，但两人相对饮酒，却都很开心。

王绩有几个奴婢，耕种黄米子，每年春季和秋季用黄米子酿酒，又养了些水鸭，还种了些草药，自供自给。他爱读《周易》、《老子》、《庄子》这些道家的书，把它们放在床头，随时翻阅，别的书很少读。他想和兄弟见面，就乘船渡河到南岸家中。平时他常游北山东皋，著书署名就署东皋子。有时他乘牛外出，经过酒店，一留就是几天。

唐高祖武德初年，王绩按前官待诏门下省。依旧例，门下省的官，每日给酒三升。有人问：“你当待诏有什么可乐的呢？”王绩答道：“只有美酒值得依恋而已！”侍中陈叔达听说他爱酒，便每日拨给一斗酒，当时人们就称他“斗酒学士”。贞观（627—649）初年，因病辞官疗养。后来又调任官职。当时太乐署官吏焦革家很善于造酒，王绩就要求到太乐署去任职，管理安排官吏的吏部认为专业不对口，没同意。王绩坚持这个请求说：“我这个请求，用意很深。”终于提他到太乐

署任职。焦革死后，他的妻子还不断为王绩送酒；过了一年多，焦妻又死去，没人送酒了。王绩感慨地说：“老天不让我沉醉于美酒之中啊？”于是辞官而去。自从王绩任职而不务政事只管饮酒，太乐丞这个职务也就成了清闲之职。王绩追记焦革酿酒之法，撰写一本酒经，又采录杜康、仪狄以来善于酿酒的酒家，编成酒谱。李淳风说：“王绩君是酒家的南史、董狐啊，善记史实。”他家东南有一大块盘石，就在那里盖了一座祠庙，叫杜康祠，祭祀杜康，尊杜为师；以焦革配祠。作《醉乡记》，以续刘伶的《酒德颂》。王绩酒量很大，饮至五斗之量，也不会醉。有人邀请他喝酒，不管请他的是高贵的，还是下贱的，全都应邀去饮。作自传题为《五斗先生传》。

刺史崔喜欣赏他的为人，邀请相见。王绩答道：“为什么坐在官府里召见严君平呀？”怪崔喜没亲自登门拜访，终于没去见崔喜。老朋友杜之松，也官至刺史，聘请王绩去讲礼经，王绩答道：“我不能到刺史门下作揖推让，谈些糟粕，而舍弃醇酒啊！”杜之松逢年过节必定赠送他美酒和干肉。

初时，王绩的哥哥王凝担任隋朝著作郎，曾撰写《隋书》，没完稿；王绩继承兄业，接着写下去，也没能完成。他预知自己快要死了，叫家人一定要薄葬，不要讲排场。他自己撰写一篇墓志铭。

王绩当官的时候，因酒醉而失职，乡里有人嘲弄他，托名无心子，风趣地说：“无心子旅居越国，越王不知他是个大人物，勉强聘他做官，他面无喜色。按越国法律规定：‘行为不正的，不能当官。’不久，无心子以行为不正闻于远近，越王便罢掉他的官，他面无怒色。被罢退后，无心子就到茫荡

的原野，经过动城时见到机士。机士手拍大腿，感慨地说：‘哎呀！您是个贤人，却因罪而被废弃啊？’无心子不回答。机士说：“请指教指教。”无心子说：“您听说过蜚廉氏的马吗？他的马，有一匹颈上的毛是红的，身上的细毛是白的，骨骼像龙，胸臆像凤，奔跑起来像跳舞，成天不卸下马鞍，终因热而死；有一匹头沉重地向下垂，尾高高地向上扬，脖子像骆驼，膝盖像野貉，会踢会咬又会尥蹶子，被丢弃在野外，反而一年到头都是膘肥肉壮。那凤凰呀并不嫌恶栖宿在山里，那蛟龙呀也不因盘屈在泥中而感到羞愧，君子不拘泥于洁行而招来祸患，不回避污秽而善养精神呀。’”王绩他对待自己就是这样的。

（刘林译）

【原文】

王绩字无功，绛州龙门人。性简放，不喜拜揖。兄通，隋末大儒也，聚徒河、汾间，仿古作《六经》，又为《中说》以拟《论语》。不为诸儒称道，故书不显，惟《中说》独传。通知绩诞纵，不婴以家事，乡族庆吊冠昏，不与也。与李播、吕才善。

大业中，举孝悌廉洁，授秘书省正字。不乐在朝，求为六合丞，以嗜酒不任事，时天下亦乱，因劾，遂解去。叹曰：“网罗在天，吾且安之！”乃还乡里。有田十六顷在河渚间。仲长子光者，亦隐者也，无妻子，结庐北渚，凡三十年，非其力不食。绩爱其真，徙与相近。子光瘠，未尝交语，与对酌酒，甲甚。绩有奴婢数人，种黍，春秋酿酒，养鳧雁，蒔药草自供。以《周易》、《老子》、《庄子》置床头，佗书罕读也。欲见兄弟，辄渡河还家。游北山东皋，著书自号“东皋子”。乘

牛经酒肆，留或数日。

高祖武德初，以前官待诏门下省。故事，官给酒日三升，或问：“待诏何乐邪？”答曰：“良署可恋耳！”侍中陈叔达闻之，日给一斗，时称“斗酒学士”。贞观初，以疾罢。复调有司，时太乐署史焦革家善酿，绩求为丞，吏部以非流不许，绩固请曰：“有深意。”竟除之。革死，妻送酒不绝，岁余，又死。绩曰：“天不使我酣美酒邪？”弃官去。自是太乐丞为清职。追述革酒法为经，又采杜康、仪狄以来善酒者为谱。李淳风曰：“君，酒家南、董也。”所居东南有磐石，立杜康祠祭之，尊为师，以革配。著《醉乡记》以次刘伶《酒德颂》。其饮至五斗不乱，人有以酒邀者，无贵贱辄往，著《五斗先生传》。刺史崔喜悦之，请相见，答曰：“奈何坐诏严君平邪？”卒不诣。杜之松，故人也，为刺史，请绩讲礼，答曰：“吾不能揖让邦君门，谈糟粕，弃醇醪也。”之松岁时赠以酒脯。初，兄凝为隋著作郎，撰《隋书》未成死，绩续余功，亦不能成。豫知终日，命薄葬，自志其墓。

绩之仕，以醉失职，乡人靳之，托无心子以见趣曰：“无心子居越，越王不知其大人也，拘之仕，无喜色。越国法曰：‘秽行者不齿。’俄而无心子以秽行闻，王黜之，无愠色。退而适茫荡之野，过动之邑而见机士，机士抚髀曰：‘嘻！子贤者而以罪废邪？’无心子不应。机士曰：‘愿见教。’曰：‘子闻蜚廉氏马乎？一者朱鬣白毳，龙骧凤亿，骤驰如舞，终日不释轡而以热死；一者重头昂尾，驼颈貉膝，踠齿善蹶，弃诸野，终年而肥。夫凤不憎山栖，龙不羞泥蟠，君子不苟繫以罹患，不避秽而养精也。’”其自处如此。

王勃传

——《新唐书》卷二〇一

【说明】王勃（649 或 650～675 或 676），初唐诗人。字子安，绛州龙门（今山西河津）人。祖父王通是隋末著名学者，号文中子。王勃少有文名，仕途却屡屡失意，曾任沛王府，后任虢州参军，因罪革职。渡海赴交趾省之时，溺水而死。

王勃与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并称“初唐四杰”。他的文学主张崇尚实用，反对当时“争构纤微，竞为雕刻”的绮靡诗风。其创作体现了南朝余风向唐朝新声的过渡。他的诗清新质朴，以离别怀乡之作最为出色；赋和文多是骈体，《滕王阁序》堪称绝唱。此外，他还写作了大量学术著作，涉及天文、医学、哲学等许多方面。

作品大多散佚，今存《王子安集》。

王勃，字子安，绛州龙门（今山西河津）人。六岁时就很会写文章，九岁读颜师古注的《汉书》，并作《指瑕》一文，指出《汉书》中失误之处。麟德（664—665）初年，右相刘祥道巡视关内，王勃上书自荐；祥道上表报告朝廷，王勃于

是入朝面试，对答治国方略，果中高第。年纪不满二十岁，还未戴成人的帽子，王勃就被授予朝散郎之职，并且几次献上他自作的赋颂给朝廷。沛王听说他很有文名，就召他到府署担任写作，编著《平台秘略》。书编完了，沛王很重视疼爱他。那时候，诸王都爱斗鸡之戏。王勃为沛王写了一篇带开玩笑的檄文，声讨英王的鸡。高宗知道后，非常愤怒，说：“这是在诸王之间挑拨离间制造矛盾。”于是将他逐出沛王府。

王勃既已被废，便客游剑南。曾登上葛愤山遥望，感慨万端，油然思念起三国蜀汉诸葛亮的功劳，并写诗表达了这种感情。听说虢州（今河南灵宝南）有很多草药，便请求补为虢州参军。他自恃才高，凌驾于他人之上，所以甚为众同僚官吏所嫉恨。有官奴名叫曹达，犯罪当抵偿，躲藏在王勃的住所；王勃生怕事情败露，竟将他杀掉。王勃私杀官奴的事被发觉，论罪当斩。正好遇到大赦，没有处死，只是免掉他的官职。

王勃的父亲王福呢，官职是雍州（今陕西彬县）司功参军，因受王勃的牵累，被贬谪到交趾（在今越南）当县令。王勃到交趾省亲，中途渡海，沉溺于海水中，因惊恐而引起心悸，以至死亡。他死时才二十九岁。

其初，王勃曾途经锺陵（今江西南昌），正逢九月九日重阳节，都督阎公大宴宾客于滕王阁，他也赴宴。都督事先叫他女婿作篇序文，准备在宴会上向宾客夸耀。为了表示客气，在筵席上取出纸笔，一个个让过去，请客人写序，没有一个敢担当此任的；及至请到王勃，王勃却反而不推辞。都督有些生气了，站了起来，换了件衣服，又派一名小吏去偷看王

勃写序文，并让他及时回报。一报，再报，都督听了小吏报告，觉得王勃的序文愈往后写，文句愈是奇警精采，于是惊讶地说道：“真是天才呀！”便让王勃当即将文章写完，尽欢而罢。

王勃写文章，其初并不太用心精思，先磨墨几升，接着便痛痛快快地喝酒，然后拉被盖着脸，卧床而睡，等醒过来，拿起笔就写，下笔成文，不改动一个字。当时人们说王勃写文先打“腹稿”。他尤其喜欢著书。

原先，王勃的祖父王通，隋朝末年，居住在白牛溪，教授很多学生。曾著书一百二十篇，记汉魏至晋朝的事，用以续古《尚书》。后来书的序文丢失了，有目录而无正文的十篇，王勃补完缺佚的部分，并定著二十五篇。他曾说人子不可不通晓医术，当时长安曹元有秘方，王勃和他交游，学得他的全部要旨。他读《易》经，曾夜梦有人告诉他：“《易》有太极，你勤思之。”醒来就撰写《易发挥》几篇，写至《晋卦》，碰上染病，才中止写作。他又说：“为王者，因土德而王，五十世，尽千年之数；因金德而王，四十九世，有九百年之数；因水德而王，二十世，有六百年之数；因木德而王，三十世，有八百年之数；因火德而王，二十世，有七百年之数。这是天地之常规。自黄帝至汉朝，五德运转，正好一个周期。今天土德复归于唐朝，唐朝应继周朝和汉朝，不可承北周和隋朝之短命。”因此斥责魏、晋以来，不是真主君临天下，也不是承继先朝正统，都属于土、金、水、木、火五行之中的不祥之气。于是著《唐家千岁历》一书。

武则天当皇帝时，李嗣真建议以周朝、汉朝二代帝王的

后裔为“二王后”，而废除此前以北周、隋朝二代；及至唐中宗时，又恢复北周、隋朝二代后裔为“二王后”。天宝（742—756）中，太平日久，向皇帝进言的，多说些迷信的鬼话，有一个叫崔昌的，采用王勃的旧说，以五德终始推算王朝寿数，写成并献上《五行应运历》一书，请以唐朝直接继承周朝和汉朝，将北周和隋二朝作为“闰”，就像闰月那样。右丞相李林甫表示赞同并支持这种说法。于是召集公卿大臣讨论可行或不可行，集贤学士卫包、起居舍人阎伯劄上表说：“在都堂集中讨论《五行应运历》及以周、汉为‘二王后’时，这夜四星聚集在尾宿，天意昭昭然。”于是唐玄宗下诏书，声称以唐朝直接承接汉朝，而废隋以前各代帝王，废介公、酈公，而以周、汉为“二王后”，以周之前的商代后裔为“三恪”，在都城长安建造周武王、汉高祖的祀庙，授予崔昌以太子赞善大夫之职，授予卫包以司虞员外郎之职。后来，杨国忠当宰相，他自称是隋朝帝王杨氏的宗室之后，建议复用北魏后裔为“三恪”，而仍以北周、隋朝二代后裔为“二王后”，酈公、介公恢复旧封，贬崔昌为乌雷县尉，贬卫包为夜郎县尉，贬阎伯劄为涪川县尉。

（刘林 译）

【原文】

王勃字子安，绛州龙门人。六岁善文辞，九岁得颜师古注《汉书》读之，作《指瑕》以诋其失。麟德初，刘祥道巡行关内，勃上书自陈，祥道表于朝，对策高第。年未及冠，授朝散郎，数献颂阙下。沛王闻其名，召署府修撰，论次《平台秘略》。书成，王爱重之。是时，诸王斗鸡，勃戏为文檄英王鸡，高宗怒曰：“是且交构。”斥出府。

勃既废，客剑南。尝登葛愦山旷望，慨然思诸葛亮之功，赋诗见情。闻虢州多药草，求补参军。倚才陵藉，为僚吏共嫉。官奴曹达抵罪，匿勃所，惧事泄，辄杀之。事觉当诛，会赦除名。父福时，繇雍州司功参军坐勃故左迁交趾令。勃往省，度海溺水，疾而卒，年二十九。

初，道出鍾陵，九月九日都督大宴滕王阁，宿命其婿作序以夸客，因出纸笔遍请客，莫敢当，至勃，汎然不辞。都督怒，起更衣，遣吏伺其文辄报。一再报，语益奇，乃矍然曰：“天才也！”请遂成文，极欢罢。勃属文，初不精思，先磨墨数升，则酣饮，引被覆面卧，及寤，援笔成篇，不易一字，时人谓勃为腹稿。尤喜著书。

初，祖通，隋末居白牛溪，教授门人甚众。尝起汉、魏尽晋作书百二十篇，以续古《尚书》，后亡其序，有录无书者十篇，勃补完缺逸，定著二十五篇。尝谓人子不可不知医，时长安曹元有秘术，勃从之游，尽得其要。尝读《易》，夜梦若有告者曰：“《易》，有太极，子勉思之。”寤而作《易发挥》数篇，至《晋卦》，会病止。又谓：“王者乘土王，世五十，数尽千年；乘金王，世四十九，数九百年；乘水王，世二十，数六百年；乘木王，世三十，数八百年；乘火王，世二十，数七百年。天地之常也。自黄帝至汉，五运适周，土复归唐，唐应继周、汉，不可承周、隋短祚。”乃斥魏、晋以降非真主正统，皆五行沴气。遂作《唐家千岁历》。

武后时，李嗣真请以周、汉为二王后，而废周、隋，中宗复用周、隋。天宝中，太平久，上言者多以诡异进，有崔昌者采勃旧说，上《五行应运历》，请承周、汉，废周、隋为

闰，右相李林甫亦赞佑之。集公卿议可否，集贤学士卫包、起居舍人阎伯劄上表曰：“都堂集议之夕，四星聚于尾，天意昭然矣。”于是玄宗下诏以唐承汉，黜隋以前帝王，废介、酈公，尊周、汉为二王后，以商为三恪，京城起周武王、汉高祖庙。授崔昌太子赞善大夫，卫包司虞员外郎。杨国忠为右相，自称隋宗，建议复用魏为三恪，周、隋为二王后，酈、介二公复旧封，贬崔昌乌雷尉，卫包夜郎卫，阎伯劄涪川尉。

李白传

——《新唐书》卷二〇二

【说明】李白（701~762），唐代大诗人。字太白，号青莲居士。祖籍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出生于碎叶（今原苏联托克马克），后迁绵州昌隆（今四川江油）青莲乡。少年时即显露才华，博学广览，吟诗作赋。二十多岁出蜀，漫游长江、黄河流域。天宝元年，受玉真公主推荐，被唐玄宗召为翰林供奉。不久辞官，继续过漫游隐居生活。安史之乱时，曾从永王李璘起兵，为唐肃宗所败。李白因此获罪，长流夜郎，遇赦东归。晚年流落江南一带，病逝于当涂。

李白是中国诗歌史上一位伟大诗人，今存诗九百余首。在诗中，他表现出蔑视权贵的傲岸精神，对当时的黑暗政治作了深刻批判，抒发了建功立业、报效国家的理想。李白“一生好入名山游”，写下大量描绘自然风景的诗篇，表达出对祖国河山的热爱。李白还写了大量歌唱爱情和友谊的诗篇，感情真挚，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由于李白受儒、道及纵横家的思想影响很深，他的某些诗作宣扬人生若梦，表现及时行乐的虚无思想和宗教迷信思想。

李白在各种诗歌体裁的创作上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尤

擅形式比较自由的古诗和绝句。他的诗风雄奇豪放，想象丰富，语言朴素自然，善于运用夸张的手法、生动的比喻来表现他热烈奔放的思想感情。他善于从民歌、神话中吸取营养，构成其特有的瑰玮绚烂的色彩，是屈原以来积极浪漫主义诗歌的新高峰。

李白的诗歌影响深远，其散文和词的创作也留下若干佳作。有多种《李白文集》传世。

李白，字太白，兴圣皇帝第九代孙。他的祖先于隋朝末年因罪被流放到西域。神龙（705—707）初年，他的父辈从西域逃回来，客居于巴西（在今四川江油）。

李白诞生的时候，他母亲梦见太白星，因而取其字为太白。十岁时就通读诗书，及至长大成人，隐居于岷山。当时所在州郡以有道科举荐他，他没有应举。苏颋为益州（今四川成都）长史时，见到李白，感到惊异，说：“这个青年天才英特，如果再少加努力，增加点学问，便可以同汉代的司马相如相比。”然而李白喜欢纵横家的那一套术数，学击剑，想当个游侠之士，轻财好施。

后来，李白又客居任城（今山东济宁），和孔巢父、韩准、裴政、张叔明、陶沔居于徂来山，成日酣饮沉醉，当时号称“竹溪六逸”。

天宝初年，李白南游到会稽（今浙江绍兴），和吴筠友善。吴筠被召入京，所以李白也到了长安。

李白在长安，去拜见贺知章；贺知章见到他的诗文，感叹地说：“您，是个天上贬下人间的仙人啊。”并在玄宗面前

说起，玄宗于是在金銮殿召见李白，论当代的大事，献上一篇赋颂。玄宗皇帝赐李白吃的东西，并亲自为他调羹，下诏命他为翰林供奉。李白和酒徒还在街市中醉酒，玄宗皇帝坐在沉香子亭，忽然意有所感，想要听演奏歌唱李白的歌词，于是召李白入宫，而李白已经醉倒，左右侍从用水洗他的面，酒醉稍醒，拿笔给他，他提起笔一挥而就，下笔成文，词章婉转华丽，意精旨切，一气呵成，不留馀思。玄宗皇帝爱他的才华，几次召见宴请。李白曾经陪玄宗皇帝饮酒，醉了，让高力士为他脱鞋。高力士平素为朝中显贵，当替李白脱鞋，深以为耻，于是挑剔他诗中的毛病，并加以附会，以激怒杨贵妃。玄宗皇帝想让李白当官，杨贵妃总是从中作梗加以阻止。

李白自己知道不被玄宗的亲近所容忍，愈加桀骜不群，放荡不羁，和贺知章、李适之、汝阳王李璡、崔宗之、苏晋、张旭、焦遂并称为“酒中八仙人”。李白恳求引退还山，玄宗皇帝也就赐给他金帛，让他回去。

李白浮游漂泊于四方，曾经于夜间借着月色，和崔宗之乘船从采石矶至金陵（今江苏南京），身上穿着皇帝所赐宫锦袍，坐在船中，旁若无人。

安禄山起兵造反，天下大乱，李白辗转于宿松（今属安徽）和匡庐（今江西庐山）之间。永王李璘聘请他到幕下当僚佐，及至永王起兵，心怀不轨，他即逃回彭泽（今属江西）；永王失败了，李白论罪当斩。其初，李白游并州（今山西太原）曾见郭子仪，暗暗称奇。当时郭子仪曾犯法，应受处罚，李白救了他，他才免受处罚。及至李白论罪当诛的时候，郭子仪愿解除官职以赎李白之罪，于是他得免于死，朝

廷下诏，把他长期流放夜郎。正好碰上大赦，又回浔阳（今江西九江），因事获罪下狱。那时宋若思率领吴地之兵三千人将赴河南（今河南洛阳），道经浔阳，将李白释放了，并聘请他为行军参谋，没多久，又辞去参谋之职。李阳冰任当涂（今属安徽）县令，李白去投奔他。代宗即帝位后，召李白任左拾遗之职，而这时李白已经逝世了，终年六十余岁。

李白晚年颇好黄老之学，经牛渚矶来到姑孰（今安徽当涂），喜欢谢朓终老的青山，他也想在此地终老。等他死了，先葬在龙山东麓。元和末年，宣歙观察使范传正到姑孰祭奠他的墓，并下令禁止在李白坟墓周围采樵和放牧。范传正访问李白的后裔，只有嫁给平民为妻的两个孙女，行为举止仍然保持着斯文世家的风范。她们见了范传正，哭泣地说：“先祖志在青山，临时葬在龙山东麓，不是他的本意。”于是改葬于青山，并立了两通石碑。他还告诉李白的两位孙女，要将她们改嫁给士族为妻；两位孙女辞谢说孤独穷苦而失身于平民，是命该如此，不愿再嫁。范传正嘉奖感叹不已，免除其夫的徭役。

唐文宗时，下诏以李白的歌诗，斐旻的剑舞，张旭的草书，合称为“三绝”。（刘林译）

【原文】

李白字太白，兴圣皇帝九世孙。其先隋末以罪徙西域，神龙初，遁还，客巴西。白之生，母梦长庚星，因以命之。十岁通诗书，既长，隐岷山。州举有道，不应。苏颋为益州长史，见白异之，曰：“是子天才英特，少益以学，可比相如。”然喜纵横术，击剑，为任侠，轻财重施。更客任城，与孔巢

父、韩准、裴政、张叔明、陶沔居徂来山，日沉饮，号“竹溪六逸”。

天宝初，南入会稽，与吴筠善，筠被召，故白亦至长安。往见贺知章，知章见其文，叹曰：“子，谪仙人也！”言于玄宗，召见金銮殿，论当世事，奏颂一篇。帝赐食，亲为调羹，有诏供奉翰林。白犹与饮徒醉于市。帝坐沉香子亭，意有所感，欲得白为乐章，召入，而白已醉，左右以水颺面，稍解，授笔成文，婉丽精切，无留思。帝爱其才，数宴见。白尝侍帝，醉，使高力士脱靴。力士素贵，耻之，搥其诗以激杨贵妃，帝欲官白，妃辄沮止。白自知不为亲近所容，益骜放不自修，与知章、李适之、汝阳王璡、崔宗之、苏晋、张旭、焦遂为“酒八仙人”。恳求还山，帝赐金放还。白浮游四方，尝乘月与崔宗之自采石至金陵，著宫锦袍坐舟中，旁若无人。

安禄山反，转侧宿松、匡庐间，永王璘辟为府僚佐。璘起兵，逃还彭泽；璘败，当诛。初，白游并州，见郭子仪，奇之。子仪尝犯法，白为救免。至是子仪请解官以赎，有诏长流夜郎。会赦，还寻阳，坐事下狱。时宋若思将吴兵三千赴河南，道寻阳，释囚辟为参谋，未几辞职。李阳冰为当涂令，白依之。代宗立，以左拾遗召，而白已卒，年六十余。

白晚好黄老，度牛渚矶至姑孰，悦谢家青山，欲终焉。及卒，葬东麓。元和末，宣歙观察使范传正祭其冢，禁樵采。访后裔，惟二孙女嫁为民妻，进止仍有风范，因泣曰：“先祖志在青山，顷葬东麓，非本意。”传正为改葬，立二碑焉。告二女，将改妻士族，辞以孤穷失身，命也，不愿更嫁。传正嘉

叹，复其夫徭役。

文宗时，诏以白歌诗、裴旻剑舞、张旭草书为“三绝”。

李煜传

——《新五代史》卷六二

【说明】李煜（937—978），五代词人，南唐国君。字重光，初名从嘉。徐州（今属江苏）人，一说湖州（今属浙江）人。建隆二年（961）继位，史称李后主。后宋军攻克金陵，南唐灭亡，李煜被俘至汴京，后被毒死。

李煜工书法，善绘画，精通音律，诗文均有一定造诣，词的成就尤高。其前期作品多写宫廷生活，风格柔靡，后期作品写亡国之憾，带有浓重感伤情绪，形象鲜明，语言生动，在题材与意境上突破了唐五代词以艳情为主的窠臼。

后人将李煜词与其父中主李璟词合编为《南唐二主词》。

李煜，字重光，初名从嘉，是李璟的第六个儿子。李煜为人仁而且孝，善于作诗文，又善于写字作画。他额头很宽，前齿两个并成一个，有一只眼睛两个瞳仁。从太子李冀以上五个哥哥都早死，李煜按顺序被封为吴王。宋建隆二年（961），李璟迁于南都（今江苏南京），立李煜为太子，留京监国。李璟死，李煜继帝位于金陵。母亲钟氏，其父名泰章。李煜尊他母亲为“圣尊后”；立他的妃子周氏为皇后；封他的

弟弟李从善为韩王，李从益为郑王，李从谦为宜春王，李从度为昭平郡公，李从信为文阳郡公。大赦境内。派中书侍郎冯延鲁准备贡礼送给宋朝廷，令各司四品以下的官员没有任务的，每日二人奉陪于内殿。

建隆三年（962），泉州（今属福建）留从效死。李璟向周朝称臣的时候，留从效也奏表章贡品献到京师，宋世宗因为李璟的原故，不接受。留从效听说李璟迁到洪州（今江西南昌），怕李璟来袭击，于是派他儿子留绍基到金陵（今江苏南京）去纳贡，而留从效已病死，泉州人于是将他的族人一并送到金陵，另推立副使张汉思。张汉思年岁大了，不能胜任职务之事，泉州人陈洪进把他赶走，自己称“留后”，李煜便以陈洪进为节度使。乾德二年（964），开始使用铁钱，民间多私藏旧钱，旧钱更加少了，商人很多用十个铁钱换一个铜钱带出州境，官家无法禁止，李煜因此下令以一枚铜钱当十枚铁钱用。李煜任韩熙载为中书侍郎、勤政殿学士，封其长子韩仲遇为清源公，封其次子韩仲仪为宣城公。

建隆五年（964），李煜命令两省侍郎、给事中、中书舍人、集贤殿勤政殿学士，分批于光政殿值夜班，和他们谈论。李煜曾因韩熙载尽忠，能率直说真话，想起用为宰相，而韩熙载后房有妓女侍妾数十人，多到外舍私陪宾客，李煜因此觉得难以为相，于是降而授予韩熙载右庶子之职，分司南都。韩熙载将众妓女尽行斥逐，自己单车上路，李煜很高兴，把他留下来，恢复他的职位。不久，众妓女又渐渐回来了，李煜说：“我真是无可奈何啊！”这一年，韩熙载死了，李煜感叹地说：“吾始终不得让韩熙载为宰相啊。”他想以平章事追

赠，问前代可有这样的事例？群臣答道：“以前刘穆之曾追赠开府仪同三司。”遂追赠韩熙载为平章事。韩熙载，是北海（今山东益都）武将之家的孩子，初时和李谷相友善。后唐明宗时，韩熙载南奔吴地，李谷送他到正阳（今河南汝阳），酒酣话别，韩熙载对李谷说：“江左如果任用我为宰相，我一定长驱北上，以平定中原。”李谷说：“中原如果用我为宰相，我直取江南，就像探囊取物而已。”及至周朝之师南征淮河一带，任命李谷为将，率军以攻取淮南，而韩熙载却不能有所作为。

开宝四年（971），李煜派他弟弟韩王李从善入朝宋京，李从善被扣留不让回去。李煜亲手写信求宋朝让他弟弟从善回南唐，宋太祖还是不允许他回去。李煜因为国家日益困窘而快快不乐，满怀忧愁，成天和臣下饮酒，愁思悲歌，不能自己。

开宝五年（972），李煜下令贬损国家制度的规格，下书称为“教”，改中书、门下省为左、右内史府，尚书省为司会府，御史台为司宪府，翰林院为文馆，枢密院为光政院，诸王为国公，以尊于宋朝。李煜性骄矜奢侈，喜爱声色，又喜奉佛教，爱高谈阔论，不理政事。

开宝六年（974），内史舍人潘佑上书进谏，李煜把他抓起来，投入狱中。潘佑自缢身死。

开宝七年（973），宋太祖派使者持诏书宣李煜赴宋京，李煜推托有病，不肯入宋京。宋朝大军南征，李煜派徐铉、周惟简等人奉表向宋朝请求暂缓军事进攻，宋太祖不答复，开宝八年（975）十二月，宋师攻克金陵（今江苏南京）。开宝九年（976），李煜被俘至宋京，宋太祖赦免他，封他为“违

命侯”，官拜左千牛卫将军。他的后事均见于《宋史》。

（刘林 译）

【原文】

煜字重光，初名从嘉，璟第六子也。煜为人仁孝，善属文，工书画，而丰额、骀齿，一目重瞳子。自太子冀已上，五子皆早亡，煜以次封吴王。建隆二年，璟迁南都，立煜为太子，留监国。璟卒，煜嗣立于金陵。母鍾氏，父名泰章。煜尊母曰“圣尊后”；立妃周氏为国后；封弟从善韩王，从益郑王，从谦宜春王，从度昭平郡公，从信文阳郡公。大赦境内。遣中书侍郎冯延鲁修贡于朝廷，令诸司四品已下无职事者，日二员待制于内殿。

三年，泉州留从效卒。璟之称臣于周也，从效亦奉表贡献于京师，世宗以璟故，不纳。从效闻璟迁洪州，惧以为袭己，遣其子绍基纳贡于金陵，而从效病卒，泉人因并送其族于金陵，推立副使张汉思。汉思老不任事，州人陈洪进逐之，自称留后，煜即以洪进为节度使。乾德二年，始用铁钱，民问多藏匿旧钱，旧钱益少，商贾多以十铁钱易一铜钱出境，官不可禁，煜因下令以一当十。拜韩熙载中书侍郎、勤政殿学士。封长子仲遇清源公，次子仲仪宣城公。

五年，命两省侍郎、给事中、中书舍人、集贤勤政殿学士，分夕于光政殿宿直，煜引与谈论。煜尝以熙载尽忠，能直言，欲用为相，而熙载后房妓妾数十人，多出外舍私侍宾客，煜以此难之，左授熙载右庶子，分司南都。熙载尽斥诸妓，单车上道，煜喜留之，复其位。已而诸妓稍稍复还，煜曰：“吾无如之何矣！”是岁，熙载卒，煜叹曰：“吾终不得熙

载为相也。”欲以平章事赠之，问前世有此比否？群臣对曰：“昔刘穆之赠开府仪同三司。”遂赠熙载平章事。熙载，北海将家子也，初与李谷相善。明宗时，熙载南奔吴，谷送至正阳，酒酣临诀，熙载谓谷曰：“江左用吾为相，当长驱以定中原。”谷曰：“中国用吾为相，取江南如探囊中物尔。”及周师之征淮也，命谷为将，以取淮南，而熙载不能有所为也。

开宝四年，煜遣其弟韩王从善朝京师，遂留不遣。煜手疏求从善还国，太祖皇帝不许。煜尝快快以国蹙为忧，日与臣下酣宴，愁思悲歌不已。

五年，煜下令贬损制度。下书称教，改中书、门下省为左、右内史府，尚书省为司会府，御史台为司宪府，翰林为文馆，枢密院为光政院，诸王皆为国公，以尊朝廷。煜性骄侈，好声色，又喜浮图，为高谈，不恤政事。

六年，内史舍人潘佑上书极谏，煜收下狱，佑自缢死。

七年，太祖皇帝遣使诏煜赴阙，煜称疾不行，王师南征，煜遣徐铉、周惟简等奉表朝廷求缓师，不答。八年十二月，王师克金陵。九年，煜俘至京师，太祖赦之，封煜违命侯，拜左千牛卫将军。其后事具国史。

王禹偁传

——《宋史》卷二九三

【说明】王禹偁（954—1001），宋代诗人、散文家。字元之，济州巨野（今属山东）人。宋太宗时进士，曾任左拾遗、礼部员外郎、知州等职。为官清正，秉性刚直，主张改革，多次上书言事，屡遭贬谪。

王禹偁了消除宋初文坛颓靡纤丽的文风，以宗经复古为旗帜，提倡继承韩愈、柳宗元古文运动的精神，大力写作古文。其散文内容充实，感情充沛，其诗风格简雅古淡，语言平易。有《小畜集》。

王禹偁，字元之，济州钜野（今山东巨野）人。他的祖上世代都是种田人家，禹偁九岁解作文，毕士安听到以后很器重他。太平兴国八年（983）中进士，授成武（今山东成武）主簿，转任长洲（苏吴县）知县，又改大理评事。同科进士罗处约当时正好是吴县的知县，两人天天在一起吟诗作文，人们多爱传诵他们的作品。端拱（988—989）初年，宋太宗听到王禹偁的名声，召来面试，升为右拾遗、直史馆，赐大红袍。按照惯例，赐大红袍的人应该赐给涂金银带，但太

宗皇帝特别下令把文犀带赐给王禹偁以示尊宠。当天，王禹偁就向太宗献了《端拱箴》，进行规劝和讽谏。

当时北方边境不安宁，王禹偁访问群臣，了解他们对边防问题的看法，然后向太宗进献了《御戎士策》，大体上是借汉代的历史以说明这个问题：“汉代十二个皇帝，说到贤明的，是文章和景帝；论到昏庸混乱的，是哀帝和平帝。然而文帝、景帝的时代，军臣单于最为强盛，肆行侵掠，派出侦察的骑兵一直潜入到雍州（今陕西中部），烽火照亮了甘泉（今陕西甘泉）。哀帝和平帝的时候，呼韩邪单于每年都来朝见汉元子，归顺称臣，边境不举烽火报警。这是什么缘故呢？这是因为汉文帝当年臣属强盛的时候，敢做到对外任用贤人，对内修明政治，因此使匈奴对汉王朝不能构成重大的祸患，这就是由于德政的原因啊；哀帝、平帝在呼韩衰弱的时候，虽然外面没有良将，里面没有贤臣，却能够使匈奴来朝见和称臣，是由于时势的缘故也。现在我们国家的广大，不下于汉朝，陛下的圣哲贤明，难道不如文帝？契丹的强盛，也不及当年的军臣单于。至于象骚扰边境侵夺要塞虽然时有发生，但是哪里有敌人的侦察骑兵潜入过雍州，报警的烽火照到甘泉那样的祸患呢？究其原因，也是因为对外任用贤臣，对内施行德政的缘故呀！臣愚昧地认为，外面应该联合兵力，提高将领的权力，罢斥小臣对边塞军事的指挥，派遣间谍离间他们的朋党，派遣赵保忠、折御卿率领他们自己的部队形成犄角之势。圣上再下诏感动和激励边境的百姓，使他们懂得朝廷这样做的目的，只是为了收回燕蓟（今北京天津一带）旧疆土，而并不是贪图他们的土地；在内部则减少官员的人数以节省

经费，抑制文人以激励武将，信任和重用大臣让他们参预谋划，不要重视虚名，警惕徒劳无益事情的发生，严禁游荡、怠惰以增加民力。”太宗非常赞赏王禹偁的《御戎十策》。王禹偁又和夏侯嘉正、罗处约、杜镐请求一起校勘三史书，他们在校勘中作了很多的校正。

端拱二年（989），太宗皇帝亲试员士，召试王禹偁，王禹偁赋诗立就。太宗皇帝十分高兴地说：“这首诗不超过一月就会传遍天下了。”立即就任命王禹偁为左司谏、知制诰。那年冬天，京城大旱，王禹偁给皇帝上了一道奏章说：“一种谷物没有收成称为谨，五种谷物都没有收成称为饥。谨发生了，那末大夫以下，都应该减少俸禄；饥发生了，那末大夫以下就完全不给俸禄，仅给饭吃而已。现在，旱田没有沾水，隔年种的麦子还没有成长，既没有积蓄，老百姓的饥荒实在堪忧。希望圣上能下诏坦率地说：我们做国君和臣子的，在政治和教化上都有缺失，因此上自帝王，下到百官的俸禄和料钱，除皇帝的宿卫军士、边庭的将帅，全部应该按次第减少，这样，上可以回答上天的谴责和惩罚，下可以满足人心，等雨下足后再恢复原有俸禄和料钱。我在朝臣的行列中是家境最贫困、俸禄最低的人，但也愿意第一个减低俸禄，以赎我过去浪费的错误。对外则停止每年向全国例行的采购货物制度，对内则罢斥那些费时的工巧的匠作生活，在城市附近掘土，掘到了坟墓的应该重新埋葬好；发配到外州的囚徒，如果不是盗贼就该加以释放。然后用古代对付猛虎渡河，飞蝗越境的旧例，戒敕州县官吏认真对付这次旱灾。其它军民刑政中的弊端，不是我所能知道的，希望陛下责成各主管部门

的官员定出，颁布执行，不过要注意感化人心，使百姓和睦。”

不久，判大理寺，庐州妖尼道安诬告徐铉，道安应当反坐，但诏书却不让处理这个案件。王禹偁向皇帝上抗疏为徐铉昭雪，请给道安治罪，因此王禹偁被贬为商州（今陕西商县）团练副使，在商州一年多，后移置解州（今山东解县）。端拱四年（991）召拜左正言，太宗因为他个性刚直容不得不好的东西，因此命宰相告诫他。又直昭文馆，但王禹偁却要求外任，以便供养双亲，最后获准知单州（今山东单县），皇上赐了他三十万钱。到郡十五天，又召为礼部员外郎，又为知制诰。他多次向朝廷提出讨伐张继迁的可行意见，以为对张继迁不必费力征讨而可用智取。认为应该公开地历数张继迁的罪恶，晓谕少数民族和汉族，悬设重赏，给他们高的官职和俸禄，这样，张继迁不是被悬头示众，就是被擒拿了。以后潘罗支射死张继迁，西夏人归附，结果都像王禹偁计策中说的那样。

至道元年（995），召入翰林为学士，知审官院兼通进、银台、封驳司。诏命中有不合适的地方，王禹偁都上奏提出意见。孝章皇后去世，把灵柩放到燕国长公主的府第，群臣没有按丧礼的规定服丧礼。王禹偁对人说，皇后曾经为天下母亲的典范，应当按旧有的礼节料理这次丧事。因此就犯了毁谤之罪，罢为工部郎中、知滁州（今安徽滁县）。开始，王禹偁曾经写《李继迁制》，人家送他五十匹马作为润笔费，王禹偁谢绝了。等到出知滁州，福建人郑褒步行来求见，王禹偁爱他儒雅的风度，为他买了一匹马。有人说王禹偁买马没给人家钱，宋太宗说：“他能谢绝李继迁五十匹马，反而会短缺

一匹马的钱吗？”不久又移置扬州（今属江苏）宋。真宗即位，王禹偁升迁到刑部，不久，真宗下诏要求群臣上书直言，王禹偁上了一道奏疏，对五个问题发表了意见：

第一件说的是要管好边防，和四境的其他民族搞好关系，使拉车运输的百姓有休息的地方。当今北面有契丹，西面有李继迁。契丹虽然没有来侵扰边境，边防军又怎能削减！李继迁既然还没有归顺，运送军粮的事就不能停止，关辅的百姓，苦难更深。依臣愚愿，皇上应该命令边庭官吏，送信给辽臣，让他们转送给自己的君主，请求和他们恢复从前的友好关系。下诏赦免李继迁的罪行，重新给他夏台。他必然感恩来归附，而且可以使天下人民知道陛下委曲自己正是为了天下的老百姓。

第二件说的是裁减多余的军队，合并多余的官吏，使山川的富饶，能稍稍流一点到百姓那里去。当乾德（963—968）、开宝（968—976）那个时候，国土还不大，赋税还不多，然而进击河东（今山西），守备北方，国用虽不足，军威却很盛，道理在哪里呢？是因为所养的军队少而精，所用的将帅专一而上面不怀疑他们的缘故啊。自那以后，全部取下了东南的几个国家，又平定了河东，土地和财赋，可以说是广大而富足了吧，但是军威却没有强大，国家的财政开支却变得很困难，道理在哪里呢？是因为所养的年队多而不精锐，所用的将帅多而不专一的缘故啊。依臣愚见，皇上应该制定有关兵赋的规定，像开宝年间那样，这样就可以高枕无忧而天下大治了。而开宝年间设置的官员很少。我本来是山东人，籍贯是济

州，在我还没有中举时，一个州只有刺史一人，司户一人，当时并没有少办事情。此后，有团练推官一人，太平兴国（976—984）年间，增设通判、副使、判官、推官，而监酒、榷税算又增加了四员。曹官以外，又增加司理。问这时的租税数量，却少于过去；问这时的百姓数字，逃亡的多于从前。一个州是这样，天下的情况也就可想而知了。上面被冗官所耗损，下面被冗兵所耗损，因此，虽然取尽山川之利，还是不能满足。山川之利，应该与百姓共享。自汉代以来，取来为国家所用，当然不可放弃，然而也不可完全由国家尽取。就拿种茶来说，国家对种茶人自古不要求缴税，唐代元和年间，政府为了对齐（今山东胶东半岛）、蔡（今河南淮河以北）用兵，方才开始征收茶税。唐史说那年征得的茶税是四十万贯，现在茶税的征收数额已是几百万了，老百姓怎么忍受得了？我所以说裁减多余的士兵，合并多余的官吏，使山河的富饶，能够稍稍流到百姓那里去。

第三件说的是严格进行选举，使选入的官员人数不滥。古时候乡举里选，为官府选择合适的人员，士君子在家里进修学问德行，然没把他们推荐到朝廷，历代虽然有所沿革，但是没有远离这个选择官员的根本方法。隋、唐开始有科举考试，太祖的时候，每年的进士科考试不过选取三十名，经学科考试选取五十名。再规定诸侯不得征辟，士大夫中也很少有人因为祖先的功勋而推恩得到封赐官爵的，所以读书人里就有了那种在一生中没有登第，到老没有得到一官半职的人。太宗在做藩王

的时候，看到了这种状况，所以在他即位后，在科举考试中对人不求全责备，而是舍短取长，十人中就选拔五人。他在位二十多年，科举选取的将近一万人。其中虽有俊拔杰出的人才，也有很容易就被选中的。依臣的愚见，科举考试几百年来一直很严格，所以先帝用放宽选取的方法进行调济，二十年的恩泽，已经很深很深，现在陛下应该用旧章程来纠正它，希望把科举考试的大权还给有关部门，像从前的旧例。至于吏部选用官吏，也不是必须帝王亲自参加的事情，自古以来，五品以下，谓之旨授官，相当于今天的幕职和州县官而已，京官虽有选举的规定，但大多并不真正实行。依臣的愚见，应该把吏部的权力交给有关部门，吏部依照规定格式和皇帝敕命拟定官职的名单就可以了。

第四件是淘汰僧尼，使已经负担沉重的百姓减少损失。古代只有士、农、工、商四种人，兵不在这个范围。因为古代实行井田法，农民也就是士兵。自秦代以来，战士不种田，所以是四民之外，又生出一民，农民因此更加贫困。然而战士拿着武器保卫国家，按道理是不能去掉的。汉明帝以后，佛教传入中国，修建寺庙，剃度僧人，历代都有增加。不养蚕而要穿衣服，不种田而要吃饭，这样，是四民之外，又增加一民而成为六民了。假使全国有一万个僧尼，每一天每一个人吃米一升，一年用绢一匹，这已经算是很节约的了，但仍旧要每月耗费粮食三千斛，一年要用一万匹缣，何况全国的僧尼实际有五万至七万呢。不说老百姓受到蠹虫之害能做得吗？

依臣的愚见，国家剃度的僧尼太多了，建造的寺庙太多了，计算它的费用消耗，何止亿万！先朝对度人修寺等功德从不厌烦，对僧侣寺庙的施舍又多，佛若有灵验，我们怎么没有受到福佑呢，奉佛没有效果，完全可以清楚了。愿皇上以此为鉴并从根本上去解决这个问题，快快采取淘汰僧尼的措施。如果说因为皇上刚即位，不想去惊动这些人，那么可以在二十年内不度僧尼不修佛寺，使它自行消除，这也是补救这一弊病的一个办法啊！

第五件是亲近大臣，远离小人，使忠诚善良正直敢言的人，只知进取而没有顾虑，奸佞钻营之徒，知道惧怕而后退。国君是头，臣下是手足，说明他们是同属一个身体的。得到合适的人就不要怀疑，不合适的人就不要用。凡是谈论帝王的盛世的人，都要说到尧、舜那个时代，契管民政，咎繇管刑狱，伯夷做祭祀的礼官，后夔做乐官，禹管水利和土地，益掌管山林。委以重任，职责明确，而尧就有了知人善任的贤德。纵然这样，尧的事情太远了，我请求用近的事情来说明这个道理。唐元和（806—820）年间，宪宗曾命裴垍选拔和品评众官，裴垍说：“天子选择宰相，宰相选择各部门的长官，长官自己选择下属官吏，那么上下就不会互相猜疑，这样，政治就成了。”有识之士认为裴垍的话有道理。希望皇上远取法于帝尧，近则借鉴于唐代，既然已经选择了宰相，就大胆使用，不要猜疑。让宰相选择各部门的长官，长官自己去选择他的下属，这样，就可以垂衣拱手而平治天下了。古时候，受过肉刑，形体亏损的人不留在君王的

身边，《论语》说：“舍弃郑国的乐曲，斥退小人。”所以周文王身边，没有可以结袜的人，这是说文王左右都是贤人也。且说那些小人花言巧语，察言观色，揣摩别人的意图，他们所做的事情必定伤害正直的人，因为他们的心中只有忌贤的念头。这样，不是圣明的人就很难识透他们。按照旧制，南班三品，尚书才可以开殿；近来三班奉职，有人只是临时派遣，也让他们升殿，惑乱皇上的视听，没有比这更严重了。希望皇上振兴法度，尊严视听，就在这个时候了。

臣下的愚见又以为当务之急，首先在讨论军事问题，使多寡能适宜，措置能合于规律。然后是官吏选拔问题，要使清浊分开，品流不杂，然后严格选举以堵塞它的源头，禁止僧尼以去掉不必要的耗费，这样，自然就国用充足、王道大行了。

奏疏送上去，王禹偁被召还朝廷，又任命为知制诰。咸平（998—1003）初年，王禹偁参与编修《太祖实录》，他能直率地不加掩饰地把真实情况写进书中。当时宰相张齐贤、李沆意见不和，王禹偁在他们之间进行了适当的调节。出为董州（今湖北黄冈）知府，曾写了一篇《三黜赋》以表明自己的态度，赋的结尾处说：“对一个人来说身体可以经受委屈，但是对一个人崇奉的道来说，却不允许有丝毫的摧折，这样的话，虽然遭到数百次的贬谪又有什么亏损呢？”咸平三年（1000），濮州（今山东鄄城）盗匪夜间入城，抓走了知州王守信、监军王昭度，王禹偁听到这一消息后，向皇帝上了一道奏疏，大略的意思是：

为了国家去经略四方，是做君王的使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周易》说：“王公在险要处设置关隘正是为了守卫自己的国家。”自五代战乱以来，军阀们各自据守城堡，国家四分五裂，前后七十多年。太祖、太宗，削平了那些僭越而建立的伪政权，统一了天下。当时有人建议，命令江淮之间的各个州郡毁弃护城河，收甲兵，撤武备，已经二十多年了。让书生去管理州郡，大郡给二十人，小郡又减少五人，作为随从。名义上说是官吏，实际上等于在外作客的人；名义上说是州郡的城池，实际上荡然无存就象平地。虽然这是为了尊重中央而抑制地方，强固主干而削弱枝叶的措施，但是并没有真正抓住要害。我那时在滁州，恰巧碰到要派士兵去拉运粮的漕船，结果城池无人防守，只能用一般的差役去代替士兵管理城门的开闭，城墙护城河倒塌败落，铠甲兵器不齐全。后来调到扬州，扬州历来称为重镇，实际上和滁州没有两样。我曾经拿出三十副铠甲，发给巡警和使臣，弓弩之类的武器，已是十损四五，因为不敢擅自进行修理，这样上下沿袭，便弄到这种地步。现在黄州的城墙和武器，更不及滁州和扬州，万一发生水旱灾害，盗贼暗暗地作起乱来，虽然想防备，又拿什么去抵抗。因为太祖要削平诸侯跋扈的势力，太宗想杜绝人们产生割据独立等非分之想，才不得不这样做。他们这样做本来是为了救世，但是时间一久，弊病就产生了，解决这些弊病的办法，在于从实际出发。时势的变化其速度之快就像转圆，是不可以执着拘泥不知道变通的。现今江、淮之间

的各个州郡，大的隐患有三件：城池毁坏，是第一；武器不全，是第二；兵士没有完成自己职责的习惯，是第三。濮州盗贼的兴起，其防守的散漫也就可以看到了。希望皇上能够委屈一下高贵的身份，作出圣明的决断，允许江、淮的各个州郡，斟酌百姓户口的多少，城池的大小，安排守备的军队。士兵多者不超过五百人，操练弓箭剑术，然后逐渐修理城垣，整治铠甲和头盔，这样，州郡有了防御的准备，州官就可以免除被抢劫的危险了。奏疏送到朝廷，皇帝十分赞赏并接受了王禹偁的建议。

咸平四年（1001），黄州境内发生二虎相争，其中一只斗死了，被吃掉近一半。不少鸡在夜间啼叫，经过了一个月还不停止，冬天突然打响雷。王禹偁亲手写了奏疏，引用《洪范传》中的话相警戒，并作了自我检查；皇上派遣内侍乘了驿站的传车到董州来慰问，设醮祈祷，询问掌管天文的管员，说：“地方官当为承担这次灾祸。”皇上惋惜王禹偁的才华，那一天，命王禹偁徙蕲州（今属湖北），王禹偁上表章向皇上称谢，表中有“汉文帝在宣室垂问鬼神之事，贾谊不希望能生养回来；著汉武帝封禅泰山之文，司马谈寄希望于儿子”之类的话。皇上对这些话感到很奇怪，果然，王禹偁到蕲州不满一个月就去世了，终年四十八岁。皇帝听到噩耗，很痛惜，送了很多钱帮助王禹偁家人办丧事。并赐王禹偁的一个儿子为进士出身。

王禹偁语言敏捷，学识广博，碰到事情敢于说话，喜欢评论别人，把以身作则、力行大道作为自己的职责，他曾说：“我如果生在元和（806—820）年代，能和李绹、崔群他们一

道做官，就没有什么惭愧的了。”他写文章和著书，大都带有规劝讽谏的意味，因此常常不能被流俗相容，所以屡遭排斥。和王禹偁交游的人必然是博学 and 温文尔雅的学者，后进的青年人中凡是有文学才华的人，王禹偁都竭力赞扬和宣传他们，像孙和、丁谓这些人，都曾经往来于王禹偁的门下。王禹偁的著作有《小畜集》二十卷、《承明集》十卷、《集仪》十卷、诗三卷。

（姚汉荣译）

【原文】

王禹偁字元之，济州钜野人。世为农家，九岁能文，毕士安见而器之。太平兴国八年擢进士，授成武主簿。徙知长洲县，就改大理评事。同年生罗处约时宰吴县，日相与赋咏，人多传诵。端拱初，太宗闻其名，召试，擢右拾遣、直史馆，赐绯。故事，赐绯者给涂金银带，上特命以文犀带宠之。即日献《端拱箴》以寓规讽。

时北庭未宁，访群臣以边事。禹偁献《御戎十策》，大略假汉事以明之：“汉十二君，言贤明者，文、景也；言昏乱者，哀、平也。然而文、景之世，军臣单于最为强盛，肆行侵掠，候骑至雍，火照甘泉。哀、平之时，呼韩邪单于每岁来朝，委质称臣，边烽罢警。何邪？盖汉文当军臣强盛之时，而外任人、内修政，使不能为深患者，由乎德也。哀、平当呼韩衰弱之际，虽外无良将，内无贤臣，而致其来朝者系于时也。今国家之广大，不下汉朝，陛下之圣明，岂让文帝。契丹之强盛，不及军臣单于，至如挠边侵塞，岂有候骑至雍，而火照甘泉之患乎？亦在乎外任人、内修德耳。臣愚以为：外则合兵势而重将权，罢小臣 逻边事，行间谍离其党，遣赵保忠、

折御卿率所部以掎角。下诏感励边人，使知取燕蓟旧疆，非贪其土地；内则省官以宽经费，抑文士以激武夫，信用大臣以资其谋，又不贵虚名以戒无益，禁游惰以厚民力。”帝深喜之。又与夏侯嘉正、罗处约、杜镐表请同校《三史书》，多所厘正。

二年，亲试贡士，召禹偁，赋诗立就。上悦曰：“此不逾月遍天下矣。”即拜左司谏、知制诰。是冬，京城旱，禹偁疏云：“一谷不收谓之谨，五谷不收谓之饥。谨则大夫以下，皆损其禄；饥则尽无禄，廩食而已。今旱云未沾，宿麦未茁，既无积蓄，民饥可忧。望下诏直云：‘群臣之间，政教有阙，自乘舆服御，下至百官奉料，非宿卫军士、边庭将帅，悉第减之，上答天谴，下厌人心，俟雨足复故。’臣朝行中家最贫，奉最薄，亦愿首减奉，以赎耗蠹之咎。外则停岁市之物；内则罢工巧之伎。近城掘土，侵冢墓者瘞之；外州配隶之众，非赃盗者释之。然后以古者猛虎渡河、飞蝗越境之事，戒敕州县官吏。其余军民刑政之弊，非臣所知者，望委宰臣裁议颁行，但感人心，必召和气。”

未几，判大理寺，庐州妖尼道安诬讼徐铉，道安当反坐，有诰勿治。禹偁抗疏雪铉，请论道安罪，坐贬商州团练副使，岁余移解州。四年，召拜左正言，上以其性刚直不容物，命宰相戒之。直昭文馆，丐外任以便奉养，得知单州，赐钱三十万。至郡十五日，召为礼部员外郎，再知制诰。屡献讨李继迁便宜，以为继迁不必劳力而诛，自可用计而取。谓宜明数继迁罪恶，晓谕蕃汉，重立赏赐，高与官资，则继迁身首，不梟即擒矣。其后潘罗支射死继迁，夏人款附，卒如禹偁策。

至道元年，召入翰林为学士，知审官院兼通进、银台、封驳司。诏命有不便者，多所论奏。孝章皇后崩，迁梓宫于故燕国长公主第，群臣不成服。禹偁与客言，后尝母仪天下，当遵用旧礼。坐谤讪，罢为工部郎中、知滁州。初，禹偁尝草《李继迁制》，送马五十匹为润笔，禹偁却之。及出滁，闽人郑褒徒步来谒，禹偁爱其儒雅，为买一马。或言买马亏价者，太宗曰：“彼能却继迁五十马，顾肯亏一马价哉？”移知扬州。真宗即位，迁秩刑部，会诏求直言，禹偁疏上书言五事：

一曰谨边防，通盟好，使辇运之民有所休息。方今北有契丹，西有继迁。契丹虽不侵边，戍兵岂能减削？继迁既未归命，馈饷固难寝停。关辅之民，倒悬尤甚。臣愚以为宜敕封疆之吏，致书辽臣，俾达其主，请寻旧好。下诏赦继迁罪，复与夏台。彼必感恩内附，且使天下知陛下屈己而为民也。

二曰减冗兵，并冗吏，使山泽之饶，稍流于下。当乾德、开宝之时，土地未广且，财赋未丰，然而击河东，备北鄙，国用未足，兵威亦强，其义安在？由所蓄之兵锐而不众，所用之将专而不疑故也。自后尽取东南数国，又平河东，土地财赋，可谓广丰矣，而兵威不振，国用转急，其义安在？由所蓄之兵冗而不尽锐，所用之将众而不自专故也。臣愚以为宜经制兵赋，如开宝中，则可高枕而治矣。且开宝中设官至少。臣本鲁人，占籍济上，未及第时，一州止有刺史一人，司户一人，当时未尝阙事。自后有团练推官一人，太平兴国中，增置通判、副使、判官、推官，而监酒、榷税算又增四员。曹官之外，

更益司理。问其租税，减于曩日也；问其人民，逃于昔时也。一州既尔，天下可知。冗吏耗于上，冗兵耗于下，此所以尽取山泽之利，而不能足也。夫山泽之利，与民共之。自汉以来，取为国用，不可弃也；然亦不可尽也。只如茶法从古无税，唐元和中，以用兵齐、蔡，始税茶。唐史称是岁得钱四十万贯，今则数百万矣，民何以堪？臣故曰减冗兵，并冗吏，使山泽之饶，稍流于下者此也。

三曰艰难选举，使入官不滥。古者乡举里选，为官择人，士群子学行修于家，然后荐之朝廷，历代虽有沿革，未尝远去其道。隋、唐始有科试，太祖之世，每岁进士不过三十人，经学五十人。重以诸侯不得奏辟，士大夫罕有资荫，故有终身不获一第，没齿不获一官者。太宗毓德王藩，睹其如此。临御之后，不求备以取人，舍短用长，拔十得五。在位将逾二纪，登第殆近万人，虽有俊杰之才，亦有容易而得。臣愚以为数百年之艰难，故先帝济之以泛取，二十载之霈泽，陛下宜纠之以旧章，望以举场还有司，如故事。至于吏部铨官，亦非帝王躬亲之事，自来五品已下，谓之旨授官，今幕职、州县而已，京官虽有选限，多不施行。臣愚以为宜以吏部还有司，依格敕注拟可也。

四曰沙汰僧尼，使疲民无耗。夫古者惟有四民，兵不在其数。盖古者井田之法，农即兵也。自秦以来，战士不服农业，是四民之外，又生一民，故农益困。然执干戈卫社稷，理不可去。汉明之后，佛法流入中国，度人修寺，历代增加。不蚕而衣，不耕而食，是五民之外，

又益一而为六矣。假使天下有万僧，日食米一升，岁用绢一匹，是至俭也，犹月费三千斛，岁用万缗，何况五七万辈哉。不曰民蠹得乎？臣愚以为国家度人众矣，造寺多矣，计其费耗，何啻亿万。先朝不豫，舍施又多，佛若有灵，岂不蒙福？事佛无效，断可知矣。愿陛下深鉴治本，亟行沙汰，如以嗣位之初，未欲惊骇此辈，且可以二十载，不度人修寺，使自销铄，亦救弊之一端也。

五曰亲大臣，远小人，使忠良蹇谔之士，知进而不疑，奸佞倾巧之徒，知退而有惧。夫君为元首，臣为股肱，言同体也。得其人则勿疑，非其人则不用。凡议帝王之盛者，岂不曰尧、舜之时，契作司徒，咎繇作士，伯夷典礼，后夔典乐，禹平水土，益作虞官。委任责成，而尧有知人任贤之德。虽然，尧之道远矣，臣请以近事言之。唐元和中、宪宗尝命裴铤品庶官，垧曰：“天子择宰相，宰相择诸司长官，长官自择僚属，则上下不疑，而政成矣。”识者以垧为知言。愿陛下远取帝尧，近鉴唐室，既得宰相，用而不疑。使宰相择诸司长官，长官自取僚属，则垂拱而治矣。古者刑人不在君侧，《语》曰‘放郑声，远佞人。’是以周文王左右，无可结袜者，言皆贤也。夫小人巧言令色，先意希旨，事必害正，心惟忌贤，非圣明不能深察。旧制，南班三品，尚书方得升殿；比来三班奉职，或因遣使，亦许升殿，惑乱天听，无甚于此。愿陛下振举纪纲，尊严视听，在此时矣。

臣愚又以为今之所急，在先议兵，使众寡得其宜，措置得其道。然后议吏，使清浊殊涂，品流不杂，然后艰

选举以塞其源，禁僧尼以去其耗，自然国用足而王道行矣。

疏奏，召还，复知制诏。咸平初，预修《太祖实录》，直书其事。时宰相张齐贤、李沆不协意，禹偁议论轻重其间。出知黄州，尝作《三黜赋》以见志。其卒章云：“屈于身而不屈于道兮，虽百谪而何亏！”三年，濮州盗夜入城，略知州王守信、监军王昭度，禹偁闻而奏疏，略曰：

伏以体国经野，王者保邦之制也。《易》曰：“王公设险，以守其国”。自五季乱离，各据城垒，豆分瓜剖，七十余年。太祖、太宗，削平僭伪，天下一家。当时议者，乃令江淮诸郡毁城隍、收兵甲、彻武备者，二十余年。书生领州，大郡给二十人，小郡减五人，以充尝从。号曰长吏，实同旅人；名为郡城，荡若平地。虽则尊京师而抑郡县，为强干弱枝之术，亦匪得其中道也。臣比在滁州，值发兵挽漕，关城无人守御，止以白直代主开闭，城池颓圯，铠仗不完。及徙维扬，称为重镇，乃与滁州无异。常出铠甲三十副，与巡警使臣，彀弩张弓，十损四五，盖不敢擅有修治，上下因循，遂至于此。今黄州城雉器甲，复不及滁、扬。万一水旱为灾，盗贼窃发，虽思御备，何以枝梧。盖太祖削诸侯跋扈之势，太宗僭伪觊望之心，不得不尔。其如设法救世，久则弊生，救弊之道，在乎从宜。疾若转规，固不可胶柱而鼓瑟也。今江、淮诸州，大患有三：城池堕圯，一也；兵仗不完，二也；军不服习，三也。濮贼之兴，慢防可见。望陛下特紆宸断，许江、淮诸郡，酌民户众寡，城池大小，并置

守捉。军士多不过五百人，阅习弓箭，然后渐葺城壁，缮完甲冑，则郡国有御侮之备，长吏免剽略之虞矣。

疏奏，上嘉纳之。

四年，州境二虎斗，其一死，食之殆半。群鸡夜鸣，经月不止。冬雷暴作。禹偁手疏引《洪范传》陈戒，且自劾；上遣内侍乘驲劳问，醢襁之，询日官，云：“守土者当其咎。”上惜禹偁才，是日，命徙蕲州。禹偁上表谢，有“宣室鬼神之间，不望生还；茂陵封禅之书，止期身后”之语。上异之，果至郡未逾月而卒，年四十八。讣闻，甚悼之，厚赙其家。赐一子出身。

禹偁词学敏瞻，遇事敢言，喜臧否人物，以直躬行道为已任，尝云：“吾若生元和时，从事于李绹、崔群间，斯无愧矣。”其为文著书，多涉规讽，以是颇为流俗所不容，故屡见摈斥。所与游必儒雅，后进有词艺者，极意称扬之。如孙何、丁谓辈，多游其门。有《小畜集》二十卷、《承明集》十卷、《集议》十卷、诗三卷。

晏殊传

——《宋史》卷三一——

【说明】晏殊（991—1055），北宋政治家、文学家。字同叔，抚州临川（今属江西）人。仕途通达，官至集贤殿学士、同平章事兼枢密使。卒谥元献。

晏殊与其子晏几道均为北宋著名词人。晏殊的诗、文、词，承继晚唐五代的传统，多表现士大夫的诗酒生活，语言婉丽，情致闲远。其词多小令。今存有《珠玉词》和清人所辑《晏元献遗文》。

晏殊，字同叔，抚州临川（今属江西）人。七岁就能写文章，景德（1004—1007）初年，张知白做江南安抚使的时候，用神童的名义推荐了他。皇帝召晏殊和一千多个进士一同参加殿试，晏殊神态自若，毫无畏惧之色，提起笔来，立即写完了文章。皇帝非常赞赏，赐给他同进士出身。宰相寇准说：“晏殊是江外人。”皇帝顾视左右说：“张九龄不也是江外人吗？”过了二天，复试诗、赋和论，晏殊看了试题上奏说：“我过去曾经学写过这篇赋，希望换个题目考试。”皇帝很喜欢他的诚实，考试结束，皇帝几次说好。擢秘书省正字，秘

阁读书。还命令直史馆陈彭年了解他和那些人交往相处，常常称赞他。

第二年，召晏殊参加中书省的考试，考试结束后，迁晏殊为太常寺奉礼郎。东封恩，迁光禄寺丞，为集贤校理。因父亲去世，晏殊回到临川为父守丧。服丧的期限还没有满就被皇上召回朝廷，跟随皇上祭祀太清宫。皇上下诏命令晏殊修编宝训，同判太常礼院。不久，晏殊的母亲又去世了，晏殊要求为母亲守满三年丧，朝廷不同意。再迁太常寺丞，擢左正言、直史馆，担任升王府记室参军。在这一年里，迁尚书户部员外郎，为太子舍人，不久知制诰，判集贤院。很久以后，又担任翰林学士，迁左庶子。皇帝每次因事去询问晏殊，总是用一方寸大小的纸张写着细细的字，晏殊回答完后，总是把皇上的手稿密封后呈上，皇帝非常赞赏他处事的慎密。

仁宗即位，章献明肃太后奉真宗皇帝遗诏暂时听政。宰相丁谓、枢密使曹利用，都想请求太后能单独接见他们，听他们的汇报，朝中大臣没有一个敢对他们的提议作出决断的。晏殊就建议说：“凡是朝中有臣子向太后奏事的，太后都垂帘听取，一概不要面见。”于是意见就这样决定了。后来晏殊又被迁为右谏议大夫兼侍读学士，太后说晏殊是仁宗皇帝为太子时的东宫旧臣，他现在的职务和皇上该赐的恩惠不相称，于是又加封为给事中。参与编修《真宗实录》。不久又进封为礼部侍郎，拜枢密副使。晏殊上疏评论张耆不适合做枢密使，违逆了太后的旨意。后来因为跟从皇上驾临玉清昭应宫，有个从者持笏后到，晏殊大怒，用笏掸这个从者，把他的牙齿撞断了，御史因此弹劾他，结果被罢免枢密副使，外调到宣州

（今安徽宣城）做太守去了。

几个月以后，又改调应天府（今江苏南京），在应天府的时候，晏殊聘请了范仲淹教授学生。从五代以来，天下的学校都被废弃了，学校的复兴就是从晏殊开始的。仁宗又下召拜晏殊为御史中丞，改资政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兵部侍郎、兼秘书监、为三司使，再次担任枢密副使，还没有举行授官仪式，又改任为参知政事，加尚书左丞。太后要去拜谒太庙，有人上书说太后拜谒太庙应该服袞冕，太后以此问晏殊，晏殊就按照《周官》规定的太后应该穿的服饰回答了这个问题。太后去世后，晏殊就被免了参知政事等职，以礼部尚书的身份去主管亳州（今安徽亳县），后来又徙陈州（今河南淮阳），不久又迁刑部尚书，以本官兼御史中丞，再次担任三司使。

当时陕西正在用兵，晏殊要求罢去由太监去监督军队的旧例，建议不要用规定的阵图去教授束缚诸将，而要让他们能够按照敌我双方的具体情况决定攻守的策略；他又建议招募弓箭手教他们战技，以备战斗之需。又请求朝廷拿出宫中多余的东西来资助边防的军费，凡是其他部门管理财政的，统统归还度支司。结果是全部按照晏殊的意见实行了。康定（1040—1041）初年，晏殊主管枢密院事，担任了枢密使。进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庆历（1041—1048）中，拜集贤殿学士、同平章事，兼枢密使。

晏殊平时非常爱惜贤才，当代知名人士像范仲淹、孔道辅全都出自他的门下。等到他做了丞相，就更加认真地进用贤才，因而范仲淹和韩琦、富弼等都被进用，以至使当时的

台阁，集中了很多当代的贤才。仁宗皇帝也奋然有改革朝政的愿望，他希望靠这些贤才来改革朝政，而小人、权贵、幸臣就都感到不便。晏殊建议派欧阳修担任河北都转运使，而谏官上奏留在京师，仁宗不许。孙甫、蔡襄上书说：“宸妃生了圣上，圣上是国家的君主，而晏殊曾经奉诏为宸妃写墓志铭，却抹去了这层关系不加说明。”又奏论晏殊派兵员管理租凭的房舍以此图利。为此降为工部尚书，知颍州（今安徽阜阳）。然而晏殊是因为章献太后刚临朝听政，所以在写墓志铭时不敢把这层关系指出来的，而关于派兵员管理租凭房金的事，乃是宰相按例可以借用的，时人认为这些都不是晏殊的过错。

后来晏殊被徙陈州，又徙许州（今河南许昌），过了不久又恢复了礼部、刑部尚书。祭祀明堂，迁户部，以观文殿大学士的身份知永兴军节度使，徙河南府（治所在今河南洛阳），迁兵部。后来因为病，请求回京都医治。病愈以后又要求出为外官，仁宗特留他侍经筵，并诏命晏殊每过五天才侍候一次仁宗的起居，仪仗、侍从等方面的待遇和宰相同。过了一年，晏殊的病情更加严重了，仁宗打算亲自去探望他。晏殊立即派人驰马送上奏书说：“我不过是年老体衰而生病，病很快就好了，皇上不必为我担忧。”不久就去世了。仁宗虽然亲临祭奠，但始终为没有在晏殊生前亲自去探病而感到遗憾，特罢朝二天。赠司空兼侍中，谥“元献”，并在他的墓碑上部刻上“旧学之碑”四个大字。

晏殊生性刚直简约，自己的日常供养十分清俭。屡次主管州郡，官员和百姓很有点怕他的急躁。但他一生善于知人，

富弼、杨察，都是他的女婿。晏殊做宰相兼枢密使时，富弼担任枢密副使，因此晏殊要求辞去他所兼的枢密使职务，仁宗不同意，他受到的信任和重用到了这样的程度。晏殊的文章写得十分富赡华丽，应用不穷，尤其精于作诗，他的诗闲适典雅而有情思，晚年更是好学不倦。文集二百四十卷，并編集了梁、陈以后名臣的著作，名为《集选》，共一百卷。儿子晏知止，是朝请大夫。

（姚汉荣 译）

【原文】

晏殊字同叔，抚州临川人。七岁能属文，景德初，张知白安抚工南，以神童荐之。帝召殊与进士千余人并试廷中，殊神气不慑，援笔立成。帝嘉赏，赐同进士出身。宰相寇准曰：“殊江外人。”帝顾曰：“张九龄非江外人邪？”后二日，复试诗、赋、论，殊奏：“臣尝私习此赋，请试他题。”帝爱其不欺，既成，数称善，擢秘书省正字，秘阁读书。命直史馆陈彭年察其所与游处者，每称许之。

明年，召试中书，迁太常寺奉礼郎。东封恩，迁光禄寺丞，为集贤校理。丧父，归临川，夺服起之，从祀太清宫。诏修宝训，同判太常礼院。丧母，求终服，不许。再迁太常寺丞，擢左正言、直史馆，为升王府记室参军。岁中，迁尚书户部员外郎，为太子舍人，寻知制诰，判集贤院。久之，为翰林学士，迁左庶子。帝每访殊以事，率用方寸小纸细书，已答奏，辄并稿封上，帝重其慎密。

仁宗即位，章献明肃太后奉遗诏权听政。宰相丁谓、枢密使曹利用，各欲独见奏事，无敢决其议者。殊建言：“群臣奏事太后者，垂帘听之，皆毋得见。”议遂定。迁右谏议大夫

兼侍读学士，太后谓东宫归臣，恩不称，加给事中。预修《真宗实录》。进礼部侍郎，拜枢密副使。上疏论张耆不可为枢密使，忤太后旨。坐从幸玉清昭应宫从者持笏后至，殊怒，以笏撞之折齿，御史弹奏，罢知宣州。

数月，改应天府，延范仲淹以教生徒。自五代以来，天下学校废，兴学自殊始。召拜御史中丞，政资政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兵部侍郎、兼秘书监，为三司使，复为枢密副使，未拜，改参知政事，加尚书左丞。太后谒太庙，有请服袞冕者，太后以问，殊以《周官》后服对。太后崩，以礼部尚书罢知亳州，徙陈州，迁刑部尚书，以本官兼御史中丞，复为三司使。

陕西方用兵，殊请罢内臣监兵，不以阵图授诸将，使得应敌为攻守；及募弓箭手教之，以备战斗。又请出宫中长物助边费，凡他司之领财利者，悉罢还度支。悉为施行。康定初，知枢密院事，遂为枢密使。进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庆历中，拜集贤殿学士、同平章事，兼枢密使。

殊平居好贤，当世知名之士，如范仲淹、孔道辅皆出其门。及为相，益务进贤材，而仲淹与韩琦、富弼皆进用，至于台阁，多一时之贤。帝亦奋然有意，欲因群材以更治，而小人权幸皆不便。殊出欧阳修为河北都转运，谏官奏留，不许。孙甫、蔡襄上言。“宸妃生圣躬为天下主，而殊尝被诏志宸妃墓，没而不言。”已奏论殊役官兵治僦舍以规利。坐是，降工部尚书、知颍州。然殊以章献太后方临朝，故志不敢斥言；而所役兵，乃辅臣例宣借者，时以谓非殊罪。

徙陈州，又徙许州，稍复礼部、刑部尚书。祀明堂迁户

部，以观文殿大学士知永兴军，徙河南府，迁兵部。以疾，请归京师访医药。既平，复求出守，特留侍经筵，诏五日一与起居，仪从如宰相。逾年，病寢剧，乘輿将往视之。殊即驰奏曰：“臣老疾，行愈矣，不足为陛下忧也。”已而薨。帝虽临奠，以不视疾为恨，特罢朝二日，赠司空兼侍中，谥元献，篆其碑首曰：“旧学之碑”。

殊性刚简，奉养清俭。累典州，吏民颇畏其捐急。善知人，富弼、杨察，皆其婿也。殊为宰相兼枢密使，而弼为副使。辞所兼，诏不许，其信遇如此。文章赡丽，应用不穷，尤工诗，闲雅有情思，晚岁笃学不倦。文集二百四十卷，及删次梁、陈以后名臣述作，为《集选》一百卷。子知止，为朝请大夫。

范仲淹传

——《宋史》卷三一四

【说明】范仲淹（989～1052）是北宋著名的社会改革家，也是当时极优秀的统帅和文学家。他领导的“庆历革新”运动，成为后来“熙丰变法”的前奏；他对某些军事制度和战略设施的改善，使西线边防稳定了相当长的时期；他设置的“义庄”，实为复活古代农村公社的创举；他倡导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精神，开拓了弘扬华夏古典文明优秀传统文化的至高境界。

范仲淹以他凛然大义，在十一世纪的官场上树起了一座风范之碑。碑上铭刻着廉节俭约、克己奉公、直言尽职、利泽生民等格言。正因为他在致力于改革社会的同时，不断地提高自身品格的修养，他在当时和后世，都被奉为“天下第一流”的楷模人物。他的品格和思想，固然不可能不带着时代的烙印，但这并不妨碍他在民间享有极高的声誉。千载迄今，各地有关范仲淹的众多遗迹，始终受到人们的纪念和保护。

《宋史·范仲淹传》的有关记述，基本上是真实可信的，文字也比较简洁。然而，其中某些地方的用语和表述，也存

在明显的失误。如“依戚同文学”，应是戚同文的后人；首次上书“凡万余言”，实不足万字；“南面朝之”，系“北面”之误；安抚江淮前“请问曰”，“问”乃“问”之误；“岁余徙苏州”，实仅半岁即徙；“明年正月诏诸路入讨”，实系当年十二月颁诏；将元昊答书“对来使焚之”，其实暗留副，佯作尽焚；“与王兴、朱观为伍”，应是“居方荣、刘兴之下”；遂筑细腰、胡芦诸砦”，乃两年以后之事；“复置陕西路”三使，“路”前脱一“四”字；“汉以三公分部六卿”，“六卿”乃“九卿”之误。如此等等。这些史实讹误之处，在译文中皆在括号内加以订正。

范仲淹，字希文，是唐朝宰相范履冰的后代。他的祖先，原是陕西邠州人；后来迁往江南定居，就成了苏州吴县人。

仲淹刚两岁的时候，父亲便逝去了。母亲改嫁到淄州长山县朱家，他也就跟着姓了朱，名叫朱说。仲淹在少年时代就很有志气。当他渐渐长大起来，知道了自己家世的时候，深感悲苦，就流着眼泪，毅然辞别母亲，离开长山，独自前往应天府，投靠在戚同文（戚同文的后人）门下学习。他昼夜不停他苦读，冬天疲乏到了极点，竟用凉水浇脸，来驱除倦意。他的食物很不充裕，甚至不得不靠喝粥来度日。对于一般人来说是难以忍受的生活，范仲淹却从不叫苦。

他通过科举考试，成为进士，被任命为广德军的司理参军。这时，他把母亲接来，赡养事奉。调任集庆军节度推官后，便恢复了原来的范姓，改名仲淹。仲淹前往泰州西溪镇盐仓作监税官，晋升为大理寺丞，又调移楚州粮料院作监官。

这时，他的母亲去世，他便离职办理丧事。

应天府的知府晏殊，听说仲淹以好学闻名，便召请他到府学主持教务。他上书朝廷，提出一系列建议：选择贤明的人作州郡长官，举荐有成绩的人当县令，排除社会上的游散懒惰势力，裁汰冗员并取缔过度侈费，严密选举制度，培育将帅以加强边防等。这封上书长达一万余字（实际不足万字）。待他服丧三年之后，因为得到晏殊的推荐，荣任馆职秘阁校理。

仲淹通晓六经，特别以通晓《易》经为专长。很多学习儒经的人，都来向他请教、问业。他捧着经书为人们讲解，从来不知疲倦。他还曾经用自己的俸禄购买饭食，供给前来求学的各地游士，以至自己的孩子们衣履不整，出门时不得不轮流更换一件较好的衣衫。而仲淹对此，竟处之泰然。每当谈论起天下大事，他都慷慨激动，奋不顾身。当时士大夫间注意品格修养和讲究节操的风尚，正是在范仲淹的倡导下开始形成的。

天圣七年，刘太后预备在冬至这天接受朝拜大礼；届时，仁宗皇帝将亲率文武百官，为太后上寿。范仲淹认为这事不妥，上疏详细论述了自己的意见，并且说：“宫中事奉亲长，自当有家庭的礼法；但在朝廷上，皇帝与百官站在一起，面向南方（北方）去朝拜母后，却不可以开此例，让后世跟着这样办。”他还上疏请刘太后撤帘，将朝政大权交还仁宗皇帝。这奏疏没有得到答复。不久，他便受命离京，往河中府去做通判；后来又调到陈州做通判。那时，朝廷正从陕西征购木材，运往京师，建造太一宫和洪福院。仲淹上奏说：“不久以

前，昭应宫、宁寿观接连毁于火灾。上天的惩戒过去才不久，如今又大兴土木，破费民产。这可不是顺人心、合天意的事情。应该停止修建寺观，减少平常年景征购木材的数量，以及免除民间在这方面的上供积欠。”他又说：“受到宠幸的人，不经过有关部门的任命手续，纷纷由皇宫里直接降敕授官，不是太平之政。”这些意见虽然未被采纳实行，仁宗却认为范仲淹心地忠诚。

刘太后死后，他被召回京师，做了右司谏。上疏议论国事的臣僚们，这时大多揭露刘太后生前听政时的过失。仲淹说：“先帝去世以来，太后养育和照护陛下十余年；应该替她遮掩小错，以成全她作太后的德誉。”于是，仁宗皇帝向朝廷内外降下诏令，戒谕臣僚们，不要随便论斥太后垂帘时的事情。

当初太后临终时，曾立过遗诰，嘱咐让太妃杨氏接替她作皇太后，参预军国大事的决策。范仲淹上奏说：“太后，是皇帝母亲的专用称号，自古以来，没有因保育皇帝有功便被他人替皇帝立做母亲的。如今一个太后去世，又立一个太后，天下人怕要怀疑陛下一天也离不开母后的扶助呀！”

这年闹大蝗灾、大旱灾，江南路、淮南路、京东路的灾情特别严重。仲淹奏请朝廷，派遣使臣前往灾区巡视。没有得到答复，就请问道：“宫廷中的人如果半日不吃饭，会怎么样呢？”仁宗听了，脸上现出悲哀的神情，便派仲淹去慰问江南路、淮南路灾区。仲淹所到之处，开仓赈济饥民，并禁止灾民滥设祠庙祭祀天地鬼神；还奏请朝廷减免庐州、舒州这年应该上供的折役茶，减免江南东路这年应该缴纳的丁口盐

钱；而且呈上一篇《救弊十事》的奏札，逐条论述了朝政诸弊。

恰巧那时又发生郭皇后被废为妃的事，他率领谏官和御史，跪伏在垂拱殿门前，为反对废后而争谏。没有达到目的。第二天，他们准备在殿廷上留下百官，一同为此事与宰相辩论。可是，刚走到待漏院等候上朝，便已有诏旨传下，命他离开京师，去做睦州知州。过了一年多（半年），他被调到苏州做知州。苏州地区积水过大，许多民田不能耕种。仲淹募人开修五条河渠，疏导田间积水与太湖之水，将它们引入大海。他募人兴修的这些河渠还没能开通，忽然被调做明州知州；两浙路转运使奏请让仲淹暂留苏州任上，以便完成他业已开始的水利工程，朝廷又准许了转运使的奏请。

此后，他升阶为礼部员外郎、天章阁待制，被召回京师，判国子监；接着，又转官为吏部员外郎，任权知开封府事。

这时，宰相吕夷简执掌朝政。受到重用和提拔的官员，大都是走吕家门径或跟从过吕夷简的人。针对这种情况，仲淹向仁宗呈上一份《百官图》，指着上面开列的众官晋升顺序说：“象这样的晋升，是循序升迁；象那样的遽然晋升，是不合次序的提拔。如果说这些循序升迁是出于公道，那么，那些不合次序的遽然提拔，便是出于私意了。况且，大凡属于天子近臣的破格提拔和撤职贬降，也不该全都交付宰相去办。”夷简对此，很不高兴。另一天，朝中讨论迁建国都问题。仲淹说：“洛阳地势险要，城池坚固；而汴梁是四方战争必经之地。太平年月，天子适于居住汴梁；如有急难情事，必须西居洛阳。应当慢慢扩大洛阳的储备，修缮那里的官室。”皇帝询问

夷简关于迁都的意见，夷简说：“仲淹这种不切实际的说法，是迂腐的空论！”仲淹便又连写四篇论奏，献呈仁宗。这四篇论奏的内容，大都是指责当时的朝政状况。仲淹又说：“汉成帝由于过份相信了宰相张禹的话，不再怀疑母舅王氏家的政治野心，因而才招致舅家子王莽篡位的祸事。我恐怕今天也有张禹那样的人，破坏陛下的家法。”夷简大怒，向仁宗说：“仲淹这些话，是在有意破坏我们君臣之间的亲密关系。他所荐举和引用的人，都是他的一伙同党！”仲淹奏对争辩，辞语越发急切。由此，他被罢免天章阁待制之职，贬往江西路饶州做知州。

殿中侍御史韩渎，为迎合宰相的旨意，奏请把仲淹同党的人名写成一榜，在朝廷上张贴公布。于是，秘书丞余靖上奏说：“仲淹因一句话得罪了宰相，竟立即遭到贬斥和流放。况且前次他所议论的，是关于陛下母子、夫妇之间的事；陛下已然宽容了他，甚至还对他十分优遇。如今我请求陛下追回前诏，另加修改。”太子中允尹洙，上疏诉告自己与仲淹的关系，不仅是好友，平素以仲淹为师，而且仲淹还曾经称荐过自己；宁肯跟仲淹一起降职，受到贬黜。馆阁校勘欧阳修，鉴于谏官高若讷对范仲淹蒙冤被贬一事竟袖手旁观，身为言官而默默不言，便写信去责备他。因此，余、尹、欧三人，都共同为仲淹一案而被贬官。

第二年，夷简也被罢相。从此，围绕“朋党”的争论便兴起了。仲淹离京以后，士大夫们为他辨白、并荐举他回朝的奏疏，接连不断。仁宗对宰相张士逊说：“以前贬降仲淹，是因为他曾秘密地奏请要立一个皇太弟，做为皇位继承人。今

天他的同党这样赞扬并荐举他，怎么办？”于是再次下诏，惩戒百官结党。

仲淹在饶州做了一年多知州后，调往润州；后又调到越州做知州。元昊反叛宋朝后，他被召入朝，恢复了天章阁待制之职，出任陕西路永兴军的知军州事，接着又改任陕西都转运使。那时，夏竦做陕西经略、安抚、招讨使，朝廷又提升仲淹，以龙图阁直学士之职做夏竦的副手。夷简这时也再度出任宰相。仁宗皇帝劝告仲淹，让他解除当年与夷简的怨恶。仲淹叩头回答说：“我以前的论奏都属于国家公事，对夷简个人是没有怨恨的。”

地处宋夏边境的陕西延州附近各寨，当时在夏军围攻中纷纷失守。仲淹主动请求到那里去；于是被升户部郎中，兼知延州事。以前，皇帝诏旨规定，各级将领分别统率一定数量的边防军：“总管”带领一万人，“钤辖”带领五千人，“都监”带领三千人。敌人若来侵犯，地位低的军官要先行出阵抵御。仲淹说：“战将不选择适当的人，只以官阶高低作为出阵先后的标准，这是自取失败的办法。”于是，他认真检阅了本州的厢兵，得到一万八千名合格士兵；把他们分成六部，让每个将领统率三千人，分别予以训练。临战时根据敌军多寡，调遣他们轮流出阵抗敌。那时，延州所属的塞门、承平等各寨，已被弃。他采纳种世衡的计策，筑起一座青涧城；以此来阻挡夏军的锋芒。他组织大批民户耕种官田；并开放民间贸易，以便边民互通有无。又因为当地百姓边陲输纳赋课，过于劳苦，便奏请将鄜城县升建为军一级的行政单位；让河中府、同州、华州的中下等户，就近送缴课税。在春夏季节，则

调鄜延兵马来鄜城这里，就近购食军粮；可以节省十分之三的买粮开支，还不算别的减省。皇帝诏命该军为康定军。

第二年正月（当年十二月），仁宗诏命陕西各路出兵讨伐西夏。仲淹说：“正月间塞外最冷，我军露天受冻，不如等待春季出兵，深入敌境。那时敌方马瘦人饥，我军就容易控制形势了。况且，那时边防军备逐渐加强，部队行动纪律严明；敌军就算猖獗，在气势上必已被我军震服了。鄜州、延州，紧邻着西夏的灵、夏二州，是边界西羌族的必经之地。暂时只宜按兵不动，注意观察他们的破绽；让我慢慢用恩惠和信义招纳他们前来归附。不然，伤了感情，我恐怕将来要罢兵休战，也没有日期了。假若我的招纳策略无效，就发兵先夺取绥州和宥州，占据要害地区，屯兵营田，作长久打算。那么，茶山、横山一带的人，必将带着全族来归顺的。既开拓疆土，又抵御敌寇，这是上策呵！”逐渐招回流亡寨外的人，巩固堡垒屏障，灵通敌情侦察，把十二座旧寨改建为城。于是，羌族与汉族的流散百姓陆续归来，恢复了旧业。

许久以后，西夏皇帝元昊将被俘宋将高延德送回，借此表示愿与仲淹停战议和。仲淹写信劝元昊彻底罢兵，莫再反宋。恰巧宋将任福在好水川吃了败仗，元昊给仲淹复信，用语很不客气，仲淹便当着来使的面，烧了那封信。（其实暗留副本，佯作尽焚）朝中大臣认为仲淹不该擅自与西夏通信，更不该随意把西夏书信烧毁。宋庠甚至奏请斩杀仲淹。仁宗皇帝没有听从他的意见，只将仲淹由户部郎中降为本部员外郎、知耀州。后来又调到庆州做知州，升阶为左司郎中，做环庆路经略、安抚使和缘边招讨使。当初元昊称帝时，曾秘密引

诱归附宋朝的羌族人，协助他们侵宋。居住环庆路的六百多个羌族人头领，也答应作夏军的向导。这事不久就败露了。仲淹因为羌人对宋朝反复无常，在到达自己的防区时，就奏请赴边境巡察。他用宋朝皇帝诏命的名义，犒赏羌族各部，检阅他们的人马，还同他们约订了几项条规：“假若旧仇业已和解或了结，而又擅行报复并伤人，罚羊一百头，马两匹；其中已杀了人的，要斩首。因欠债而引起的争讼，听凭当事人报告官府来处理；随便扣押、捆缚无辜者，罚羊五十头，马一匹。西夏军马侵入边界时，不随本族集合并追击敌军的，每户罚羊两头，扣押他们的首领。遇有敌军大举入侵时，老少进入本寨自卫，官府供给食粮。届时不入城寨的人家，罚羊两头；全族不到寨自卫，便扣押他们的首领。”羌族各部都服从了这些条规。从此，他们开始为宋朝效力了。

被改授邠州观察使的武职时，仲淹上表说：“观察使在朝班中的位次，在待制之下。我守边数年，羌族人对我十分亲爱，称呼我为‘龙图老子’。今天降低到与部下王兴、朱观为同辈（居方荣、刘兴之下），只怕连敌军也会轻蔑的。”他没有接受这一新官。庆州西北的马铺寨，正当后桥川口，深处在西夏境内。仲淹想在那里筑城，料定敌军必来争夺，便秘密派儿子纯佑与将领赵明一起，先占据这一地区，自己引兵随后前往。出发时诸将并不知道行军的目的地，部队走到柔远寨，才发布筑城号令。版筑一类筑墙工具都已准备好，只用十天时间，就筑成一座新城。这就是大顺城。敌军发觉了，派三万骑兵来攻，并在战斗中假装败退；仲淹告诫部下，不去追杀他们。后来知道，敌军果然有埋伏。大顺城建成后，白

豹城、金汤寨一带的夏军都不敢再来侵犯，环庆路从此也很少敌踪。

宋、夏之间的明珠、灭臧两部族，拥有强兵数万。仲淹听说泾原路宋军想要袭击、讨伐这两族，便上奏朝廷说：“通往明珠、灭臧二族的道路很险恶，我军不可出击。前些时候，高继嵩的军队已经为此败亡。这二族平时尚且心怀二意，如今再讨伐他们，他们势必与敌军勾结，向南入侵我原州，向西骚扰我镇戎军，朝东入侵我环州，边患将难于止息了。若能在北部细腰、胡芦等处泉溪地带，建筑堡垒屏障，从而切断夏军与二族间的通路；那么，这两族既可安心归附，而环州与镇戎军之间被二族遮断的近路小道，也可以畅通无阻。这一带边防，就不用忧虑了。”此后，泾原路宋军便筑了细腰、胡芦等各寨（乃两年以后之事）。

葛怀敏在定川战败时，夏军大举侵掠，深入到渭州潘原县一带。整个关中都惊恐震动起来，百姓纷纷往山谷间逃窜。仲淹率领六千兵将，由邠州、泾州出发，去援救泾原路；听说敌军已撤出边寨，才率师返回。当初，定川战败等消息传到朝廷时，仁宗皇帝审视地图对身边大臣说：“假若仲淹出兵援救，我就不愁了。”仲淹出援的奏报一到，仁宗大喜说：“我原来就知道仲淹是可以信用的！”随即将仲淹晋升为枢密直学士、右谏议大夫。仲淹因为自己这次军出无功，上表辞让，不敢接受新的任命。但仁宗不听他辞让的意见，仍命他晋升新职。

那时，已经任命文彦博做泾原路经略、安抚、缘边招讨使。仁宗又认为泾原路在战火中伤残累累，想让仲淹、文彦

博对调辖区，彼此换防；并派王怀德做使臣去传告此事。仲淹辞谢说：“泾原路所处的地位很重要，只怕我承担不了这路的责任。请让我与韩琦共同负责泾原路的事务，并且一起驻扎在泾州。韩琦兼管秦凤路，我兼管环庆路，泾原路有警报，我与韩琦联合秦凤、环庆两路兵马，以犄角之势夹进应敌；若秦凤、环庆路有警报，我也可率领泾原路的兵马，去做援军。我一定与韩琦练兵选将，逐渐收复横山，从而斩断敌军之臂；用不了几年时间，就可以期望平定边患。希望皇上降诏，任命庞籍兼做环庆路统帅，以便造成头尾两端互相照应的形势。秦州，委派文彦博去做知州；庆州，用滕宗谅去总领其事；孙沔也可以完成这任务。至于渭州，有一员武臣负责就足够了。”仁宗皇帝采纳了他的建议，又重新设置了陕西路（“路”前脱一“四”字）安抚、经略、招讨使，让仲淹、韩琦、庞籍分别负责其职事。仲淹与韩琦在泾州开置帅府，而将彦博调做秦凤路的统帅，宗谅则做环庆路的统帅，张亢任渭州方面军队的统帅。

仲淹做将领时，军令严明，爱护士兵；对于前来归附的各部羌人，能诚恳接纳，信任不疑。所以，敌军便不敢轻易前来侵犯他统辖的地区。元昊请示停战议和以后，他被召回京师，升做枢密副使。王举正胆小而不敢直言，不能胜任副宰相的职事。谏官欧阳修等，奏称仲淹有宰相之才，请求朝廷罢免王举正而用仲淹代替他。于是，仲淹就被改任为参知政事。仲淹说：“执政的官职，是可以由谏官的话而得到的吗？”他坚辞不受，表示愿与韩琦一同出京，去巡视边防。他被派做陕西宣抚使；但尚未出发，又再度受任为参知政事。这时，

正好王伦起兵进袭淮南路，当地州县官中，有些不能坚守抵御的人，朝廷准备查明后处死他们。仲淹反对说：“朝廷平日不讲究武备，敌军到来时，却一味责令州官以死殉职，这能办到吗？”那些未能坚守的州县官，因而都没有被处死。

仁宗皇帝这时正急于想要稳固政局，实现太平，屡次向大臣询问当世要事。仲淹对人说：“皇上对待我，真够信用的了。不过，事情总有个先后缓急；以往长期安定局面中累积的弊病，决非一朝一夕所能革除呵！”仁宗却再度赐给他亲笔写的诏书；为了同样的目的，又打开天章阁，将二府大臣召入，让他们当场奏对，条列己见。仲淹很感惶恐，在退归私第后，便呈上了《答手诏条陈十事》的奏疏：

一是严明官吏升降制度。没有大功劳和明显政绩的人，不得升任二府官职。京师内外的官员，必须在职任满三年，才可以考虑升迁。没有通过选任和保举而在京师各个衙司任职的官员，必须累计任满五年，才能升迁。这样，差不多就算是考核政绩的制度了。

二是限制侥幸作官和升官的途径。取消乾元节这天照顾少卿、监以上官员子弟作官的恩泽；正郎以下官，包括路一级监司官、边远地区官员等，必须在职任满两年，方可享受恩荫任子的特权；大臣不得荐举自己的子弟充任三馆、秘阁的清要馆职。这样，任子之制就不至于太滥太繁了。

三是严格贡举制度。进士和诸科考试中，请取消试卷弥封法。除考核艺业外，也参考实际表现；将没有缺陷的考生姓名奏闻朝廷。进士科考试，先试策问和议论文，后考诗、赋诸科。要录取那些兼通经旨大义的人。“赐第”以上高等科名，

都经由皇帝裁决宣布；其余成绩较好的，也优待授官，免除吏部铨选手续，注册为现任官职；以下成绩较差的人，则由该本科发给凭据，到吏部等候铨选任命。这样，进士之法，便可以依其名而求其实了。

四是选择长官。首先，由中书和枢密院选派路一级长官——转运使、提点刑狱和大州郡的知州；其次，让两制、三司、御史台、开封府的官员和各路监司长官，荐举州一级的长官——知州、通判；知州和通判再荐举县一级长官——知县、县令。限制各级官员所荐举的人数，由中书宰执官在举主多的被荐人中选派官长。这样，刺史、县令等州县长官，便可以得到称职的人选了。

五是均衡公田。京师以外的官员廪食供给不均，怎能要求他们尽职办事呢？请朝廷均衡一下他们的职田收入；没有发给职田的，按等级发给他们，使他们有足够的衣食来养活自己。然后，便可以督责他们廉洁为政；对那些违法的人，也可予以惩办或撤职了。

六是重视农桑等生产事业。每年预先给各路转运司降下诏令，让他们劝谕所属各州军官民人等，讲究农田利害。对于堤堰、陂塘、河渠之类水利工程，由各州县选派官吏，定期治理。再制定一套奖励、考核制度，大兴农利，减省漕运之费。这样，江南路的圩田，浙西路的河塘，这些已被废毁的水利事业，便又可以兴复了。

七是整治军备。大略参照府兵制度，在京师附近地区招募强壮男丁，充作京畿卫士，用来辅助正规军。这些卫士，每年大约用三个季度的时光务农，一个季度的时光教练战斗；可

以节省给养之费。京师附近有了完备的制度，各地就都可以仿照施行了。

八是广泛落实朝廷的惠政和信义。主管部门有人拖延或违反赦令的施行，要依法从重处置。另外，还要向各路派遣使臣，巡察那些应当施行的各种惠政是否施行。这样，便处处都没有阻格皇恩的现象了。

九是要严肃对待和慎重发布朝廷命令。法度是要示信于民的，如今颁行不久便随即更改。请让执掌政事的大臣们，参与讨论那些可以长久推行的条令，删去繁杂冗赘的条款，裁定为皇帝制命和国家律令，颁布下去。这样，朝廷的命令便不至于经常变更了。

十是减轻徭役。如今户口已然减少，而民间对官府的供给，却更加繁重。应将户口少的县裁减为镇，将各州军的使院和州院衙署，并为一院；职官厅差人干的杂役，可派给一些州城兵士去承担；将那些本不该承担公役的人，全部放回农村。这样，民间便不再为繁重的困扰而忧愁了。

天子正专意信用仲淹，全部采用了这些奏议；其中适于写成诏令的，便都以诏书的形式统一颁布下去。只有府兵制一事，因众臣认为不能施行而作罢。

仲淹又建议说：“周代的制度，是三公分别兼任六官之职；汉代，由三公分别兼管六卿（九卿）职事；唐代，由宰相分别处理六曹事务。今日中书的职任，就是古代天官卿冢宰的职任；今日枢密院的职任，就是古代夏官卿司马的职任。其余四官负责的职事，如今分散于众官署去办理。这样，相当于三公兼掌的大权，如今都没有了。而实际上，今天二府的

职事，只不过是草拟些授官文书去进呈，按资历、级别去评论赏罚；大抵查阅条例、照章办事而已。既不象三公那样，承担着论列天下是非大理的重任；也不象六卿那样，各自专有其辅佐君王的具体职责。这不是治国的办法！我请求效仿前朝之制，将如今的三司、司农寺、审官院、流内铨、三班院、国子监、太常寺、刑部、审刑院、大理寺、群牧司、殿前马步军司的职事，分别派宰辅大臣来兼管。凡属官吏升降、刑法轻重、事有利害的，都听凭宰辅大臣全权处理。其中事体重大的，由二府大臣共同商议，奏请皇帝裁决。我本人请求负责军事和财赋方面的职事。如果事情毫无起色，就请皇上先将我革职贬降。”宰相章得象等人，都说范仲淹的建议不能实行。许久以后，才任命参知政事贾昌朝兼管农田方面的事务，仲淹兼管刑法方面的事务；然而，终于都没能实际去管。

当初，仲淹由于得罪了吕夷简，被逐出京师，外任多年；士大夫们根据他们两人的是非曲直，彼此指骂对方是朋党。及至陕西路一带战争爆发，天子因为看到士大夫们一致敬仰仲淹，便提升和重用他。待到夷简罢相，又将仲淹召回京师，依靠他来治理国事。这时，朝里朝外都期待他创立一番功业，而仲淹本人，也把治理天下视为自己的责任。他裁抑侥幸，削减冗滥，调查并审核各路的官吏，日夜思虑和策划着怎样实现一个太平的政治局面。然而，他的改革没能稳步进行，改革的规模又嫌过于浩大。有人评论，认为他的改革措施无法实行。等到按察使派出，各种罪状被大量地检举揭发出来，人们心里便很不高兴。从减少任子作官的恩荫，到严格按资历升官的磨勘条规，希图侥幸的人，都深感不便。于是，恶毒

的攻击慢慢散播开来，而指责改革者是“朋党”的议论，竟渐渐传到皇上的耳朵里去了。

恰巧这时边防地带有警报，仲淹便与富弼一起，请求去巡视边防。于是，派仲淹做河东路、陕西路宣抚使，赐给他一百两黄金。仲淹将这笔赏赐全部分赠与边防军将领。麟州因刚遭受过大规模的侵扰，一些向朝廷奏事的人，便大多都请求废弃该州的建置。仲淹为麟州修整了旧寨，招回了逃散流亡的三千余户居民，减免他们的课税，撤销了当地的榷酤政策，给予民户卖酒的自由，又奏请朝廷免除了府州的商税。黄河以外地区便安定下来。自从仲淹离京西去，朝中的反对派越发加紧攻击他。仲淹自己也奏请罢免他的参知政事职务。这样，他就被任命为资政殿学士、陕西四路安抚使、邠州知州。当初在中书时所推行的措施，也陆续被废止。

他因病请求到邓州去做知州，被晋升为给事中。调往荆南府时，邓州人拦住传旨使臣的路，要求让仲淹继续留任，仲淹也愿意留在邓州；朝廷便准许了他们的奏请。不久，他被调往杭州做知州；又升为户部侍郎，调任青州知州。适逢他病情加剧，奏请做颍州知州，但未能到达颍州便死去了，享年六十四岁。朝廷给他赠官为兵部尚书，谥称“文正”。

当初，仲淹患病期间，仁宗皇帝经常派使臣赐他药物，慰问他。他死后，仁宗悲伤了很久；又派使臣到他家中去慰问。安葬以后，仁宗皇帝亲笔为他的墓碑篆额，称为“褒贤之碑”。

仲淹内心刚强而外表却很温和，生性孝顺父母。因为母亲在世时他正贫困，后来虽然富贵起来，没有宾客在场时，一

餐仍不吃两份肉菜。妻子儿女的衣食，也只刚够吃用。然而，他喜欢将自己的钱财赠送给别人，在家乡还创置了“义庄”，用来赡养和救济本宗族的人。他待人十分亲热敦厚，并乐于替人家办好事。当时的贤士，很多是在他的指导和荐拔下成长起来的。即使是乡野和街巷的平民百姓，也都能叫出他的名字。他死的时候，各地听到噩耗的人，都深为叹息。他处理政事，最讲究忠厚二字；所到之处，多有惠民的德政。彫州和庆州的百姓，与归附宋朝的羌族人民，都画了他的肖像，给他立生祠，来纪念他。待到他逝世时，羌族首领数百人聚众举哀，象死去父亲一样痛哭，斋戒了三天才散去。他有四个儿子：纯佑、纯仁、纯礼、纯粹。（郭正忠 译）

【原文】

范仲淹，字希文，唐宰相履冰之后。其先，邠州人也；后徙家江南，遂为苏州吴县人。

仲淹二岁而孤，母更适长山朱氏，从其姓，名说。少有志操；既长，知其家世，乃感泣辞母，去之应天府，依戚同文学。昼夜不息，冬月惫甚，以水沃面；食不给，至以糜粥继之。人不能堪，仲淹不苦也。

举进士第，为广德军司理参军，迎其母归养。改集庆军节度推官，始还姓，更其名。监泰州西溪盐税，迁大理寺丞，徙监楚州粮料院，母丧去官。

晏殊知应天府，闻仲淹名，召置府学。上书请择郡守，举县令，斥游惰，去冗僭，慎选举，抚将帅，凡万余言。服除，以殊荐，为秘阁校理。

仲淹泛通六经，长于《易》，学者多从质问，为执经讲解，

亡所卷。尝推其奉以食四方游士，诸子至易衣而出，仲淹晏如也。每感激论天下事，奋不顾身，一时士大夫矫厉尚风节，自仲淹倡之。

天圣七年，章献太后将以冬至受朝，天子率百官上寿，仲淹极言之；且曰：、奉亲于内，自有家人礼，顾与有官同列，南面而朝之，不可为后世法。”且上书请太后还政，不报。寻通判河中府，徙陈州。时方建太一宫及洪福院，市材木陕西。仲淹言：“昭应，寿宁，天戒不远。今又侈土木，破民产，非所以顺人心，合天意也。宜罢修寺观，减常岁市木之数，以蠲除积负。”又言：“恩幸多以内降除官，非太平之政。”事虽不行，仁宗以为忠。

太后崩，召为右司谏。言事者多暴太后时事。仲淹曰：“太后受遗先帝，调护陛下者十余年；宜掩其小故，以全后德。”帝为诏中外，毋辄论太后时事。

初，太后遗诰：“以太妃杨氏为皇太后，参决军国事。”仲淹曰：“太后，母号也。自古无因保育而代立者。今一太后崩，又立一太后，天下疑陛下不可一日无母后之助矣！”

岁大蝗旱，江、淮、京东滋甚。仲淹请遣使前行。未报，乃请问曰：“宫掖中半日不食，当何如？”帝恻然，乃命仲淹安抚江、淮。所至开仓振之。且禁民淫祀，奏蠲庐、舒折役茶，江东丁口盐钱；且条上救敝十事。

会郭皇后废，率谏官、御史伏阁争之。不能得。明日，将留百官揖宰相廷争；方至待漏院，有诏出知睦州。岁余，徙苏州。州大水，民田不得耕，仲淹疏五河，导太湖注之海。募人兴作，未就，寻徙明州。转运使奏留仲淹，以毕其役。许

之。

拜尚书礼产员外郎，天章阁待制；召还，判国子监，迁吏产咒外郎、权知开封府。

时吕夷简执政，进用者多出其门。仲淹上《百官图》，指其次第曰：“如此为序迁，如此为不次；如此为公，如此则私。况进退近臣，凡超格者，不宜全委之中间相。”夷简不悦。他日，论建都之事。仲淹曰：“洛阳险大，而汴为上战之地。太平宜居汴，即有事必居洛阳。当广储，缮宫室。”帝问夷简，夷简曰：“此仲淹迂阔之论也。”仲淹乃为上论以献，大抵讥切时政。且曰：“汉成帝信张禹，不疑发家，故有新莽之祸。臣恐今日亦有张禹，坏陛下家法。”夷简怒诉曰：“仲淹离间陛下群臣，所引用，皆朋党也。”仲淹对益切，由是，罢知饶州。

殿中侍御史韩渎希宰相旨，请书仲淹朋党，揭之朝堂。於是，秘书丞余靖上言曰：“仲淹以一言忤宰相，遽加贬窜。况前所言者在陛下母子夫妇之间乎？陛下既优容之矣，臣请追改前命。”太子中允尹洙，自讼与仲淹师友，且尝荐己；愿从降黜。馆阁校勘欧阳修，以高若讷在谏官，坐视而不言，移书责之。由是，三人者偕坐贬。

明年，夷简亦罢。自是，朋党之论兴矣。仲淹既去，士大夫为论荐者不已。仁宗谓宰相张士逊曰：“向贬仲淹，为其密请建立皇太弟故也。今朋党称荐如此，奈何？”再下诏戒敕。

仲淹在饶州岁余，徙润州，又徙越州。元昊反，召为天章阁待制，知永兴军，改陕西都转运使。会夏竦为陕西经略安抚招讨使，进仲淹龙图阁直学士，以副之。夷简再入相，帝谕仲淹使释前憾。仲淹顿首谢曰：“臣乡论盖国家事，於夷简

无憾也。”

延州诸寨多失守，仲淹自请行，迁户部郎中兼知延州。先是，诏分边兵：总管领万人，钤辖领五千人，都监领三千人。寇至御之，则官卑者先出。仲淹曰：“将不择人，以官为先后，取败之首了。”于是，大阅州兵，得万八千人。分为六，各将三千人，分部教之。量贼众寡，使更出御贼。时塞门、承平诸寨既废，用种世衡策，城青涧以据贼冲；大兴营田，且听民得互市，以通有无。又以民远输劳苦，请建鄜城为军，以河中、同、华中下户税租就输之，春夏徙兵就食，可省余十之三，他所减不与。诏以为康定军。

明年正月，诏诸路入讨。仲淹曰：“正月塞外大寒，我师暴露，不如俟春深入，贼马瘦人饥，势易制也。况边备渐修，师出有纪；贼虽猖獗，固已慑其气矣。鄜、延、密迤灵、夏；西羌必由之地也。第按兵不动，以观其衅，许臣稍以恩信招来之。不然，情意阻绝，臣恐偃兵无期矣。若臣策不效，当举兵先取绥、宥，据要害，纯兵营田，为持久计。则茶山、横山之民，必挈族来归矣。拓疆御寇，策之上也。”帝皆用其议。仲淹又请修承平、永平等寨，稍招还流亡，定堡障，通斥候，城十二寨。於是，羌汉之民，相踵归业。

久之，元昊归陷将高延德，因与仲淹约和。仲淹为书戒喻之。会任福败于好水川，元昊答书语不逊，仲淹对来使焚之。大臣以为，不当辄通书，又不当辄焚之。宋庠请斩仲淹。帝不听。降本曹员外郎，知耀州。徙庆州，迁左司郎中，为环庆路经略安抚缘边招讨使。

初，元昊反，阴诱属羌为助，而环庆酋长六百余人，约

为乡道。事寻露。仲淹以其反复不常也，至部即奏行边，以诏书犒赏诸羌，阅其人马，为立条约：“若仇已和断，辄私报之及伤人者，罚羊百、马二；已杀者斩。负债争讼，听告官为理；辄质缚平人者，罚羊五十、马一。贼马入界，追集不赴随本族，每户罚羊二，质其首领。贼大入，老幼入保本寨，官为给食；即不入寨，本家罚羊二；全族不至，质其首领。”诸羌皆受命，自是始为汉用矣。

改邠州观察使，仲淹表言：“观察使，班待制下。臣守边数年，羌人颇亲爱臣，呼臣为‘龙图老子’。今退而与王兴、朱观为伍，第恐为贼轻矣。”辞不拜。庆之西北马铺寨，当后桥川口，在贼腹中。仲淹欲城之，度贼必争，密遣子纯佑与蕃将赵明先据其地，引兵随之。诸将不知所向。行至柔远，始号令之。版筑皆具，旬日而城成，即大顺城是也。贼觉，以骑三万来战。佯北，仲淹戒勿追，已而果有伏。大顺既城，而白豹、金汤皆不敢犯。环庆自此寇益少。

明珠、臧臧，劲兵数万。仲泾原欲袭讨之，上言曰：“二族道险，不可攻，前日高继嵩已丧师。平时且怀反侧，今讨之，必与贼表里，南入原州，西扰镇戎，东侵环州，边患未艾也。若北取细腰、葫芦众泉为堡障，以断贼路，则二族安，而环、镇戎径道通彻，可无忧矣。”其后，遂筑细腰、葫芦诸寨。

葛怀敏败於定川，贼大掠至潘原。关中震恐，民多窜山谷间。仲淹率众六千，由邠、泾援之。闻贼已出塞，乃还。始，定川事闻，帝按图谓左右曰：“若仲淹出援，吾无忧矣。”奏到，帝大喜曰：“吾固知仲淹可用也。”进枢密直学士，右谏

议大夫。仲淹以军出无功，辞不敢受命。诏不听。

时已命文彦博经略泾原。帝以泾原伤夷，欲对徙仲淹，遣五怀德喻之。仲淹谢曰：“泾原地重，第恐臣不足当此路。与韩琦同经略泾原，并驻泾州，琦兼秦凤，臣兼环庆。泾原有警，臣与韩琦合秦凤、环庆之兵，犄角而进；若秦凤、环庆有警，亦可率泾原之师为援。臣当与韩琦练兵选将，渐复横山，以断贼臂。不数年间，可期平定矣。愿诏庞籍兼领环庆，以成首尾之势。秦州委文彦博，庆州用滕宗谅总之。孙沔亦可办集。渭州，一武臣足矣。”帝采用其言，复置陕西路安抚、经略、招讨使，以仲淹、韩琦、庞籍分领之。仲淹与琦开府泾州，而徙彦博帅秦，宗谅帅庆，张亢帅渭。仲淹为将，号令明白，爱抚士卒；诸羌来者，推心接之而不疑。故贼亦不敢辄犯其境。元昊请和，召拜枢密副使。王举正懦默不任事，谏官欧阳修等言仲淹有相材，请罢举正用仲淹。遂改参知政事。仲淹曰：“执政可由谏官而得乎？”固辞不拜，愿与韩琦出行边。命为陕西宣抚使。未行，复除参知政事。会王伦寇淮南，州县官有不能守者，朝廷欲按诛之。仲淹曰：“平时讳言武备，寇至而专责守臣死事，可乎？”守令皆得不诛。

帝方锐意太平，数问当世事，仲淹语人曰：“上用我至矣，事有先后，久安之弊，非朝夕可革也。”帝再赐手诏，又为之开天章阁，召二府条对。仲淹惶恐，退而上十事：

一曰明黜陟。二府非有大功、大善者不迁，内外须在职满三年，在京百司非选举而授，须通满五年，乃得磨勘。庶几考绩之法矣。

二曰抑侥幸。罢少卿、监以上乾元节恩泽。正郎以下若

监司、边任，须在职满二年，始得荫子。大臣不得荐子弟任馆阁职。任子之法无冗滥矣。

三曰精贡举。进士、诸科请罢糊名法，参考履行无阙者，以名闻。进士先策论，后诗赋，诸科取兼通经义者。赐第以上，皆取诏裁。余优等免选注官，次第人守本科选。进士之法，可以循名而责实矣。

四曰择长官。委中书、枢密院先选转运使、提点刑狱、大藩知州。次委两制、三司、御史台、开封府官、诸路监司举知州、通判。知州、通判举知县、令。限其人数，以举主多者从中书选除。刺史、县令，可以得人矣。

五曰均公田。外官廩给不均，何以求其为善耶？请均其入，第给之，使有以自养，然后可以责廉节，而不法者可诛废矣。

六曰厚农桑。每岁预下诸路，风吏民言农田利害，堤堰渠塘，州县选官治之。定劝课之法以兴农利，减漕运。江南之圩田，浙西之河塘，堕废者可兴矣。

七曰修武备。约府兵法，募畿辅强壮为卫士，以助正兵。三时务农，一时教战，省给贍之费。畿辅有成法，则诸道皆可举行矣。

八曰推恩信。敕令有所施行，主司稽违者，重置於法。别遣使按视其所当行者。所在无废格上恩者矣。

九曰重命令。法度所以示信也，行之未几，旋即厘改。请政事之臣参议可以久行者，删去烦冗，裁为特敕行下。命令不至于数变更矣。

十曰减徭役。户口耗少而供亿滋多。省县邑户少者为镇，

并使、州两院为一，职官白直，给以州兵，其不应受役者，悉归之农。民无重困之忧矣。

天子方信向仲淹，悉采用之；宜著令者，皆以诏书画一颁下。独府兵法，众以为不可而止。

又建言：“周制，三公分兼六官之职，汉以三公分部六卿，唐以宰相分判六曹。今中书，古天官冢宰也。枢密院，古夏官司马也。四官散于群有司，无三公兼领之重。而二府惟进拟差除，循资级，议赏罚，检用条例而已。上非三公论道之任，下无六卿佐王之职。非治法也，臣请仿前代。以三司、司农、审官、流内铨、三班院、国子监、太常、刑部、审刑、大理、群牧、殿前马步军司，各委辅臣兼判其事。凡官吏黜陟、刑法重轻、事有利害者，并从辅臣予夺。其体大者，二府会议奏裁。臣请自领兵赋之职。如其无补，请先黜降。”章得象等皆曰不可。久之，乃命参知政事贾昌朝领农田，仲淹领刑法。然卒不果行。

初，仲淹以忤吕夷简，放逐者数年。士大夫持二人曲直，交指为朋党。及陕西用兵，天子以仲淹士望所属，拔用之。及夷简罢，召还，倚以为治。中外想望其功业。而仲淹以天下为己任，裁削幸滥，考覆官吏，日夜谋虑兴致太平。然更张无渐，规摹阔大。论者以为不可行。及按察使出，多所举劾，人心不悦。自任子恩薄，磨勘之法密，侥幸者不便。于是，谤毁稍行，而朋党之论浸闻上矣。

会边陲有警，因与枢密副使富弼请行边。于是，以仲淹为河东、陕西宣抚使，赐黄金百两，悉分遣边将。麟州新罹大寇，言者多请弃之，仲淹为修故寨，招还流亡三千余户；蠲

其税，罢榷酤予民。又奏免府州商税。河外遂安。比去，攻者益急。仲淹亦自请罢政事，乃以为资政殿学士，陕西四路安抚使，知邠州。其在中书所施为，亦稍稍沮罢。

以疾请邓州，进给事中。徙荆南，邓人遮使者请留。仲淹亦愿留邓，许之。寻徙杭州。再迁户部侍郎，徙青州。会病甚，请颍州。未至而卒，年六十四。赠兵部尚书，谥文正。

初，仲淹病，帝常遣使赐药存问。既卒，嗟悼久之，又遣使在其家。既葬，帝亲书其碑曰：“褒贤之碑”。

仲淹内刚外和，性至孝。以母在时方贫，其后虽贵，非宾客不重肉。妻子衣食，仅能自充。而好施予，置义庄里中，以赡族人。泛爱乐善，士多出其门下。虽里巷之人，皆能道其名字。死之日，四方闻者，皆为叹息。为政尚忠厚，所至有恩。彫、庆二州之民与属羌，皆画像立生祠事之。及其卒，也羌猷数百人，哭之如父，斋三日而去。四子：纯佑、纯仁、纯礼、纯粹。

欧阳修传

——《宋史》卷三一九

【说明】欧阳修（1007—1072），北宋文学家、史学家，“唐宋八大家”之一。字永叔，号醉翁，晚号六一居士。吉州永丰（今属江西）人。曾任枢密副使，参知政事。早年支持范仲淹的改良运动；王安石实行新法时，曾上疏陈青苗法立弊。晚年辞官闲居，卒谥文忠。

欧阳修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他主张文章应“明道”、致用，对宋初形式主义文风进行了批判。其文学成就以散文最高，诸体兼备，大都内容充实，气势雄健，风格平易自然，流畅婉转，在当时极有影响。其诗学习韩愈“以文为诗”，语言自然晓畅；部分诗作融叙事、议论、抒情于一体，写得沉郁顿挫，风格接近杜甫。欧阳修还善于论诗，《六一诗话》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诗话。其词婉丽，有南唐遗风，多写恋情相思、酣饮醉歌、惜春、赏花等。欧阳修的赋也很出色，《秋声赋》变唐代以来的“律体”为“散体”，对赋的发展有开拓意义。

欧阳修于经学、史学、金石学也有很高的成就。他参加《新唐书》的修撰，自著《新五代史》，收集、整理周代至隋

唐的金石碑刻，辑为《集古录》。有《欧阳文忠集》。

欧阳修，字永叔，庐陵（今江西吉安）人。四岁时父亲就去世了，母亲郑氏，立誓守节，亲自教导儿子读书，家境贫困，以至用芦管当笔在地上描画着学习写字。欧阳修自幼就聪敏颖悟，超过常人，书读过就能熟记背诵。一到成年，就有了很高的声望。

宋代立国将近百年，但文章的体裁，还是依然沿袭着五代的风气。文人们刻镂雕琢的都是骈偶之文，文坛污浊，文风不振，读书人因循陋习，墨守成规，评论卑下，气调柔弱。苏舜元苏舜钦兄弟、柳开、穆修等人，都有意振作张扬正气，但力量不足。欧阳修游历随州（今属湖北），在废书篓中得到了唐朝韩愈的遗稿，读后万分欣慕。于是就苦心孤诣地探幽索隐，以至废寝忘食，他决心要同韩愈并驾齐驱、比肩齐名。

中进士，得南宫殿试第一，被选拔为甲科，调西京推官。开始和尹洙交游，和尹洙一起写作古文，议论当朝时政，互相都把对方看成是自己的教师和朋友，又同梅尧臣交往，相互作诗唱和，就这样，欧阳修凭着他的文章名满天下。不久，选进朝廷，为馆阁校勘。

范仲淹因为议论政事被贬了官，朝廷中很多官员都议论相救，只有司谏高若讷一个人认为当贬。欧阳修就写了封信责备他，指责他不复知人间还有羞耻事。高若讷把欧阳修写给他的信送给了皇上，欧阳修因此获罪，被贬为夷陵（今湖北宜昌）县令，不久又迁为乾德（今湖北光化）县令、武成（今河南滑县）节度判官。范仲淹出使陕西，征辟欧阳修执掌

书记。欧阳修笑着推辞说：“从前我所以那样做，难道是为了自己的私利吗？还是同其退不同其进较好吧。”过了很久，朝廷又恢复了他的校勘职务，并被进举为集贤院校理。宋仁宗庆历三年（1043），主持谏院。

当时仁宗皇帝更换大臣，杜衍、富弼、韩琦、范仲淹都做了朝廷大臣，仁宗还决定增加谏官，起用天下名士，欧阳修第一个在被选之列。每次进见，仁宗都要征求每个大臣的意见，询问他们应该做些什么。因为朝中兴废的事多了，小人们的聚合趋附感到了很多的不便。欧阳修考虑到正直的好人必然不会得胜，多次向仁宗分别谈了自己的看法。

当初，范仲淹被贬饶州（治所在今江西波阳），欧阳修和尹洙、余靖都因为替范仲淹辩白伸冤而被逐，且被看成是“党人”。从此，朋党的争论就开始了，欧阳修写了《朋党论》进呈仁宗。其大略的意思说：“君子和君子因为志同道合结成朋党，小人和小人因为私利相投结成朋党，这是自然的道理。但我说小人是没有朋党的，只有君子才有朋党。因为小人所喜好的是名利和厚禄，所贪图的是金钱和财物，当他们利害一致的时候，就暂时互相勾结拉拢成为朋党，这是虚伪的。等到有利可图的时候就互相争先，或者无利可图的时候就反而相互残害，虽然是兄弟亲戚，也不能互相保护，所以说小人是没有朋党的。君子就不是这样，他们所恪守的是道义，所奉行的是忠信，所珍惜的是名节。用它们来修身，就不仅志同道合而且还互相裨益，用它们来效忠国家，就不仅同心协力而且同舟共济，始终如一，所以说：只有君子才有朋党。商纣有臣子亿万个，就有亿万颗心，可说是没有朋党

了吧，而商纣因此而亡国；周武王有臣子三千人，三千人只有一条心，可说是大的朋党了吧，而周王朝因此而兴。这是因为君子的朋党，虽然多也不会满足的缘故。所以做国君的人只该贬退小人的假朋党，起用君子的真朋党，那么天下就可大治了。”

欧阳修评议朝政严厉正直，小人们把他看成似仇人，而仁宗独夸奖他敢于说话，当面赐给他五品朝服，并且回看着侍臣们说：“像欧阳修这样的人，到哪里去找得来？”于是，提拔为同修起居注，又主管起草皇帝的诏令。按照先例，选拔主管起草皇帝诏令的官员一定要经过面试以后才能任命，因为仁宗了解欧阳修，下诏书特地任命欧阳修担任这个职务。

后来欧阳修奉命出使河东。自从朝廷对西方用兵以来，议论时政的人就想废除麟州（今陕西神木）以便节省军队的供给。欧阳修说：“麟州是天然的险要之地，不要废除，废除了麟州，那末河内这些郡县的百姓就不能安居了。不如分出麟州的军队，让他们进驻河内的各个要塞，遇到危急也可以互相得到接应和救援，而平时又可以省去转辗运输之劳，对于谋略来说，这样做比较有利。”由于欧阳修的这个建议，麟州得到了保存。他又说：“忻州（治所在今山西忻县）、代州（治所在今山西代县）、岢岚（今属山西）多的是禁地和废田，希望下命令让老百姓去开垦和种植，不然，就将被敌人占有了。”朝廷把欧阳修的提议交给有关部门讨论，直到很久以后才得以实行，结果是朝廷每年得到了几百万斛的粮食。凡是河东土地赋税过重，人民无法忍受的摊派，欧阳修上奏朝廷请求免除了十几项。

欧阳修出使回来，正值保州（今河北保定）屯兵作乱，欧阳修被授为龙图阁直学士、河北都转运使。他在向天子辞别的时候，仁宗对他说：“你不要做长久留在外面的打算，有什么想说的，说吧。”欧阳修回答说：“我在谏官任上就该评论朝政，现在我已经不做谏官了，再评议朝政就是越职了，这是有罪的。”仁宗说：“只管说，没关系，不要因为京官和外官而生出间隔来。”乱贼平定了，大将李昭亮、通判冯博文私藏妇女，欧阳修逮捕了冯博文把他囚禁在监狱里，李昭亮害怕了，马上放出了所有私藏的妇女。保州屯兵开始作乱的时候，官府曾经用投降不杀的诺言进行招安，等到叛乱平定后却统统把他们杀死了，另外尚有胁从的二千人，本来已经把他们分别编制、隶属到各个州郡里去了，当时富弼是宣抚使，担心这些被编的人以后会再生变故，所以又决定将他们在同一天里全部杀死。碰巧富弼和欧阳修在内黄（今属河南）这个地方相遇了，关夜里，富弼屏退左右，悄悄地把自己的这个打算告诉了欧阳修。欧阳修说：“灾祸没有比杀死已经投降的人更大的了，何况又是胁从的人呢？既然不是朝廷的命令，如果有哪个州郡不服从你的这个命令，变故起来可不是小事呀！”富弼恍然大悟，因此中止了这个计划。

当时，杜衍等大臣因为党议一个接一个被罢了官，欧阳修愤慨地向朝廷上奏疏说：“杜衍、韩琦、范仲淹、富弼，天下人都知道他们是可以被举用的贤才，而没有听说他们有什么应该被免职的罪过。自古以来小人谗害忠贤，他们的说法其实也并不复杂。想大批地陷害忠良，不过就是指责他们是朋党，想动摇大臣的地位，就必须用专权来诬陷他们，这是

什么原因呢？因为除去一个好人，其它很多的好人还在，这对小人并不能带来多大的利益；想把好人一网打尽，但好人却又很少有过失，很难一一找到他们的缺点，只有指责他们结为朋党，那么就可以在同一个时间内全部贬逐他们。至于自古以来那种已经被皇上了解、而且深得皇上信任的大臣，那么就难以用其它的事由来动摇他们了，只有专权是皇上最忌讳和憎恶的，所以，一定要用这种说法，方才可以打倒他们。正直的人士在朝廷，邪恶的小人就会有所避忌，谋臣不被举用，正是敌国的福气。现在这四个正直的大臣一旦罢免，一定会使邪恶的小人相互庆贺于内，四周的敌人相互称贺于外，我替朝廷可惜呀！”于是邪党更加憎恨欧阳修，就借他妹妹的孤女张化的案子罗致他的罪名，把他降为知制诰，出为滁州（今安徽滁县）知州。欧阳修在滁州住了二年，徙扬州（今属江苏）、颍州（今安徽阜阳）。不久，恢复了他龙图阁直学士的官衔，留守南京，因为母亲去世而去职。服丧期满，朝廷任命他为流内铨。当时，欧阳修在外已十一年了，仁宗看到他的头发都已发白，问候慰劳很是周到。小人们害怕欧阳修再次被重用，就有人假造欧阳修的奏章请求仁宗清洗内侍中挟持恩宠，为非作歹，用非法手段获取私利的奸徒。这样就激起了宦官们对欧阳修的深切怨怒，纷纷诬陷他，要把他外放同州（今陕西大荔），仁宗皇帝采纳了吴充的意见才得以中止。迁翰林学士，让他修纂《唐书》。欧阳修奉命出使契丹，契丹君主命令四个贵臣掌管宴会，并且对欧阳修说：“这种规格的接待并不是常规制度，只是因为你的名声大，所以才这样做的。”

嘉佑二年（1057），欧阳修主持贡举。当时应考的读书人喜欢写作险怪奇涩的文章，号为“太学体”，欧阳修极力排斥，贬抑这种文体，凡是写作这种文章的人一概黜落。这件事结束后，从前那些轻狂浅薄的人侦候得欧阳修出门，聚集在一起气势汹汹地拦住欧阳修的马头高声责骂，街上的巡逻队无法制止；然而科举考试的风气，却从此得到了改变。

欧阳修被封龙图阁学士，知开封府。他继承包拯威严治政之后，用简明便易、遵循法制的原则治政，不求显赫的名声，京师也治理得很好。十个月以后，改充群牧使。《唐书》修撰完毕，欧阳修被任命为礼部侍郎兼翰林侍读学士。欧阳修在翰林院八年，真正做到了知无不言。当时黄河在商胡决口，北京（今河北大名）留守贾昌朝想掘开横垆故道，回折河水使它向东流。有个叫李仲昌的人，却主张把河水引入六塔河。议论的人不知听谁的好。欧阳修认为：“黄河水流多泥沙，按理说来没有不淤塞的，下流既然已经淤塞了，上流就一定会决口。用近来发生的事情去考察，黄河的决口并不是不能努力塞住，故道也不是不能努力恢复，但是这种做法都不是治本之道，因而势必不能保持久长。开掘横垆故道工程很大，但难以成功，即使成功了，最终还是要再次决口。而六塔河河床狭窄，令黄河水悉数倾注，滨、棣、德、博各州一定会遭到它的灾害。不如依循河水的走向，增高河堤，疏通它的下游，让黄河之水无所阻拦地流入大海，这才是几十年的长久利益呀。”当时的宰相陈执中主张贾昌朝的意见，文彦博主张李仲昌的意见，终于造成了河北的大灾难。

谏院论述陈执中的过失，但陈执中仍然拖延着企图稳住

自己的官位。欧阳修上书皇帝，认为“皇上拒绝采纳忠告，庇护愚顽的宰相，给皇上带来了连累。”过了不久，陈执中被免去了宰相职位。狄青做了枢密使，很有威望，仁宗不高兴，谣言纷起，欧阳修请求出任外官，以保全自己得以善终。于是就免去了他的朝官而改任陈州（今河南淮阳）知州。欧阳修曾经因为水灾向仁宗上奏疏说：“皇上君临天下已经三纪了，但至今东宫太子之位未定。从前汉文帝刚即位，因为臣子们的建议，马上立了太子，因此享国很久长，为汉太宗。唐明宗讨厌臣下议论接班人的事，不肯早早立定太子，因此造成秦王之乱，宗庙社稷由此倾覆。皇上为何犹豫而久久不选定太子呢？”此后的建立英宗，推究其源，就在于欧阳修的这次上书。

嘉佑五年（1060），欧阳修升任为枢密副使。嘉佑六年（1061），为参知政事。欧阳修在兵府时，曾经和曾公亮考核全国的军队数和三路驻守兵员的多少，地理的远近，重新制造了地图和簿籍。凡是边防长久以来没有派兵驻守的，一定进行检阅和补充。他在任执政大臣时，和韩琦同心辅助仁宗。凡是兵民、官吏、财利等中书省应当知晓的重要大事，编集成一个总目，碰到事情就不必临时匆忙地向有关部门了解。当时东宫太子的人选还没有决定，欧阳修就和韩琦等人对这样一件大事协商出了一个意见。宋英宗因为得了病，无法亲自处理朝政。皇太后垂帘听政，左右的人互相猜忌，制造矛盾，皇帝和皇太后几乎因此成为怨仇。在韩琦奏事的时候，太后哭着向韩琦说了英宗和自己的种种矛盾。韩琦用英宗有病来进行劝解，太后听了不高兴，欧阳修就进一步劝说道：“太后

侍奉仁宗皇帝已经几十年了，您的仁德昭示于天下。以前温成专宠，太后您处置得从容自如；现在母子之间，反而不能宽容吗？”太后的情绪稍稍和缓了些，欧阳修又劝说道：“仁宗皇帝在位的时间很久，他德政的恩泽深深地留在人们心中，所以一旦驾崩，天下奉戴太子，没有一个人敢不赞成的。现在太后您只是一个妇人，而我们也只是五、六个书生罢了，如果不是仁宗皇帝的遗意，天下谁人肯听从呢？”太后不作声，过了很久，母子之间的矛盾才逐渐平息了。

欧阳修平素和人相处总是坦率地说出自己要说的话，从不掩饰和隐瞒。等到他执政以后，士大夫们对他有所请求，他总是当面说明可以还是不可以的理由，就是谏院的官员议论政事，他也一定用是非作为标准来责问他们，因此怨恨他、说他坏话的人就更多了。英宗将追封尊崇濮王，下命令让有关部门讨论，都说应当称皇伯，改封一个大国。欧阳修引述《礼记·丧服记》，认为：“身为人子的人，应该替他的父母实行“报祭”，降服丧三年为服丧一年，而不隐没父母的名字，可是丧服可以降等，但名字是决不可隐没的。如果出嗣的儿子把亲生的父亲改称为皇伯，这种例子就是遍考前代，都是没有根据的。进封为大国的王，但礼制规定又没有加爵的道理。所以中书省的意见，和大家的意见不同。”最后太后写出了手书，允许英宗称濮王为亲，推尊濮王为皇考，三夫人为后。英宗不敢承当。于是御史吕诲等人毁谤说欧阳修主张这种意见，争论不休，后来吕诲等人都被贬逐出了御史台。只有蒋之奇的意见附和欧阳修的主张，所以欧阳修推荐他为监察御史，但是被御史台的很多人看成是奸佞邪恶的小人，蒋

之奇为此十分害怕，就想使自己摆脱这种窘境。正好欧阳修的内弟薛宗孺和欧阳修有仇恨，他捏造了欧阳修家庭生活淫乱的谣言来诋毁欧阳修，这个谣言转辗相传，一直传到了御史中丞彭思永的耳中，彭思永又把这个谣言告诉了蒋子奇，蒋子奇就上奏章弹劾欧阳修。当时，神宗皇帝初即位，心里希望重重地谴责一下欧阳修，就去征求过去的宫臣孙思慕的意见，孙思慕替欧阳修辩白解释，欧阳修杜门不出，要求神宗对制造谣言的人治罪。神宗派人诘问彭思永、蒋之奇，追问谣言的出处，彭思永、蒋之奇回答不出来，结果都遭到了贬逐。欧阳修也坚决要离开朝廷，结果罢为观文殿学士、刑部尚书、亳州（今安徽亳县）知州。第二年，迁兵部尚书、青州（今山东益都）知州，后来又改为宣徽南院使、兼任太原（今属山西）知府。欧阳修辞不受命，后又改徙蔡州（今河南汝南）。

欧阳修总是以风骨气节自我制约，但却屡屡遭到污蔑，且年纪已六十了，就一再上表要求辞去官职，神宗帝总是宽慰他，没答应他的辞官。及至出守青州，又因为请求停止散发青苗钱，被王安石所诋毁，因此要求放归的愿望益发急切。熙宁四年（1071），欧阳修以太子少师的身份退休。熙宁五年（1072）死，赠太子太师，谥号“文忠”。

欧阳修始在滁州时，自号为“醉翁”，晚年改号“六一居士”。他天资刚劲，见义勇为，虽然机关陷阱就在前面，但也能置触发之险于不顾。虽然一而再、再而三地被放逐流放，却仍旧是志气自若。当他被贬夷陵时，没有什么可以自我排遣，就取出积年的陈旧案牘反复观看，看到其中冤屈谬误的地方

不可胜数，于是仰天长叹道：“一个荒远的山城，尚且如此，天下冤屈谬误事之多就可想而知了。”自此以后，碰到狱讼之类的事就不敢有丝毫的懈怠疏忽。学者求见，和他们谈话，从来不论及文章，只谈官事，他认为文章只能润及自身，而政事却可以推及它物。他前后历任数郡的长官，不炫耀政绩，不追求声誉，为政宽缓简要而不扰民，所以，凡是他所到的州郡，人民都感到安适。有人问他：“您老治政宽缓简要，而政事却并没有弛废，这是什么原因呢？”欧阳修说：“如果以放纵为宽，以怠慢为简，那么政事就一定会弛废，而人民也一定会受其弊害。我这里所说的宽，是指政令不苛刻急迫，我所说的简，是指政令不繁杂琐碎。”欧阳修从小失去了父亲，母亲曾经对他说：“你父亲做官的时候，常常秉烛夜读公文，屡屡停卷而叹。我问他，他就说：‘这是个死狱啊，我想设法让他能活，不能啊！’我说：‘生可求吗？’你父亲就说：‘做官的人想方设法寻求使死狱者获生的办法而不得，那未死的人和我就都无恨了。而做官的人虽然常常存有使死狱者变活的愿望，尚且会不小心使他死了，何况世上不少做官的常常希望的是治民以死呢！’他平时教育他的子弟，也常常用这样的话来说，我耳朵都听得熟了。”欧阳修听后终身遵循父亲的这个教导。

欧阳修写的文章，自然天成，或丰满或简约，都符合标准。他的文辞简要，旨意明朗，立论有据，内容通博，旁征博引，引类例举，分析事理至深至透，因此很能折服人心。他趋然脱俗，独自奔驰，众人不能相及，所以天下的人都聚集在他的周围尊称他为师。欧阳修鼓励提携后进，犹恐不及，凡

是被他赏识的人，大多成了有名望的人。曾巩、王安石、苏洵、苏洵的儿子苏轼、苏辙，当他们还是平民的时候，屏处乡里，不为人知，欧阳修就为他们游说，赞美他们的声誉，说他们一定会显名闻达于世。他对待朋友非常笃实，朋友在世的时候举拔扶持他们；朋友去世以后就調理保护他们的家族。

欧阳修喜好古文，爱好读书，凡是周、汉以来的金石遗文，断编残简，都要采集收拾起来，研究考核它们的异同，把自己的观点写在左边，明白、昭著可为表证，称之为《集古录》。奉诏修撰《唐书》纪、志、表，自撰《五代史记》，章法严谨，用词精约，多取《春秋》遗旨。苏轼论述欧阳修的文章时说：“论大道时像韩愈，议政事时像陆贽，记史事像司马迁，作诗赋像李白。”有识之人以为这是真正了解欧阳修的话。

.....

评论说：自从夏、商、周三代以来，一直到秦、汉，文章虽然跟着时代而有所盛衰，但它们的语言却都繁富滋润，它们的光泽都灿烂照人，它们的音节都清晰明亮，这是因为还都保留有先王遗留下来的功绩。经过晋、魏，文章就衰弊了，到唐代的韩愈手里，文章重新振兴起来。唐代的文章，经过五代又衰弊了，到宋代欧阳修手里，又再次振兴起来。挽回百川之颓波，平息千古的邪说，使这种文章的正气，可以辅佐大道，可以扶持人心，这都是韩愈、欧阳修两人所作的努力啊！韩愈在政治上没有得到重用，欧阳修得到了重用，但最终还是不能有所作为，这件事真应该被世道惋惜的啊！

（姚汉荣 译）

【原文】

欧阳修字永叔，庐陵人。四岁而孤，母郑守节自誓，亲诲之学，家贫，至以荻画地学书。幼敏悟过人，读书辄成诵。及冠，嶷然有声。宋兴且百年，而文章体裁，犹仍五季余习。鏤刻骈偶，澶涇弗振，士因陋守旧，论卑气弱。苏舜元舜钦、柳开、穆修辈，咸有意作而张之，而力不足。修游随，得唐韩愈遗稿于废书簏中，读而心慕焉。苦志探赜，至忘寝食，必欲并辔绝驰而追与之并。

举进士，试南宫第一，擢甲科，调西京推官。始从尹洙游，为古文，议论当世事，迭相师友，与梅尧臣游，为歌诗相倡和，遂以文章名冠天下。入朝，为馆阁校勘。

范仲淹以言事贬，在廷多论救，司谏高若讷独以为当黜。修贻书责之，谓其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若讷上其书，坐贬夷陵令，稍徙乾德令、武成节度判官。仲淹使陕西，辟掌书记。修笑而辞曰：“昔者之举，岂以为己利哉？同其退不同其进可也。”久之，复校勘，进集贤校理。庆历三年，知谏院。

时仁宗更用大臣，杜衍、富弼、韩琦、范仲淹皆在位，增谏官员，用天下名士，修首在选中。每进见，帝延问执政，咨所宜行。既多所张弛，小人翕翕不便。修虑善人必不胜，数为帝分别言之。

初，范仲淹之贬饶州也，修与尹洙、余靖皆以直仲淹见逐，目之曰“党人”。自是，朋党之论起，修乃为《朋党论》以进。其略曰：、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以同利为朋，此自然之理也。臣谓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小人所归者利禄，所贪者财货，当其同利之时，暂相党引以为朋者，伪也。及其

见利而争先，或利尽而反相贼害，虽兄弟亲戚，不能相保，故曰小人无朋。君子则不然，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终始如一，故曰：惟君子则有朋。纣有臣亿万，惟亿万心，可谓无朋矣，而纣用以亡。武王有臣三千，惟一心，可谓大朋矣，而周用以兴。盖君子之朋，虽多而不厌故也。故为君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

修论事切直，人视之如仇，帝独奖其敢言，面赐五品服。顾侍臣曰：“如欧阳修者，何处得来？”同修起居注，遂知制诰。故事，必试而后命，帝知修，诏特除之。

奉使河东。自西方用兵，议者欲废麟州以省馈饷。修曰：“麟州天险不可废，废之，则河内郡县，民皆不安居矣。不若分其兵，驻并河内诸堡，缓急得以应援，而平时可省转输，於策为便。”由是州得存。又言：“忻、代、岢岚多禁地废田，愿令民得耕之，不然，将为敌有。”朝廷下其议，久乃行，岁得粟数百万斛。凡河东赋敛过重民所不堪者，奏罢十数事。

使还，会保州兵乱。以为龙图阁直学士、河北都转运使。陛辞，帝曰：“勿为久留计，有所欲言，言之。”对曰：“臣在谏职得论事，今越职而言，罪也。”帝曰：“第言之，毋以中外为间。”贼平，大将李昭亮、通判冯博文私纳妇女，修捕博文系狱，昭亮惧，立出所纳妇。兵之始乱也，招以不死，既而皆杀之，胁从二千人，分禁诸郡。富弼为宣抚使，恐后生变，将使同日诛之，与修遇于内黄，夜半，屏人告之故。修曰：“祸莫大于杀已降，况胁从乎？既非朝命，脱一郡不从，为变不细。”弼悟而止。

方是时，杜衍等相继以党议罢去，修慨然上疏曰：“杜衍、韩琦、范仲淹、富弼，天下皆知其有可用之贤，而不闻其有可罢之罪。自古小人谗害忠贤，其说不远。欲广陷良善，不过指为朋党，欲动摇大臣，必须诬以颺权，其故何也？去一善人，而众善人尚在，则未为小人之利；欲尽去之，则善人少过，难为一一求瑕，唯指以为党，则可一时尽逐。至如自古大臣，已被主知而蒙信任，则难以他事动摇，唯有颺权是上之所恶，必须此说，方可倾之。正士在朝，群邪所忌，谋臣不用，敌国之福也。今此四人一旦罢去，而使群邪相贺于内，四夷相贺于外，臣为朝廷惜之。”于是邪党益忌修，因其孤甥张氏狱傅致以罪，左行知制诰、知滁州。居二年，徙扬州、颍州。复学士，留守南京，以母忧去。服除，召判流内铨，时在外十一年矣。帝见其发白，问劳甚至。小人畏修复用，有诈为修奏，乞澄汰内侍为奸利者。其群皆怨怒，譖之，出知同州，帝纳吴充言而止。迁翰林学士，俾修《唐书》。奉使契丹，其主命贵臣四人押宴，曰：“此非常制，以卿名重故尔。”知嘉佑二年贡举。时士子尚为险怪奇涩之文，号“太学体”，修痛排抑之，凡如是者辄黜。毕事，问之器薄者伺修出，聚噪于马首，街逻不能制；然场屋之习，从是遂变。

加龙图阁学士、知开封府，承包拯威严之后，简易循理，不求赫赫名，京师亦治。旬月，改群牧使。《唐书》成，拜礼部侍郎兼翰林侍读学士。修在翰林八年，知无不言。河决商胡，北京留守贾昌朝欲开横垆故道，四河使东流。有李仲昌者，欲导入六塔河，议者莫知所从。修以为：“河水重浊，理无不淤，下流既淤，上流必决。以近事验之，决河非不能力

塞，故道非不能力复，但势不能久耳。横垆功大难成，虽成将复决。六塔狭小，而以全河注之，滨、棣、德、博必被其害。不若因水所趋，增堤峻防，疏其下流，纵使入海，此数十年之利也。”宰相陈执中主昌朝，文彦博主仲昌，竟为河北患。台谏论执中过恶，而执中犹迁延固位。修上疏，以为“陛下拒忠言，庇愚相，为圣德之累”。未几，执中罢。狄青为枢密使，有威名，帝不豫，讹言籍籍，修请出之于外，以保其终，遂罢知陈州。修常因水灾上疏曰：“陛下临御三纪，而储宫未建。昔汉文帝初即位，以群臣之言，即立太子，而享国长久，为汉太宗。唐明宗恶人言储嗣事，不肯早定，致秦王之乱，宗社遂覆。陛下何疑而久不定乎？”其后建立英宗，盖原于此。

五年，拜枢密副使。六年，参知政事。修在兵府，与曾公亮考天下兵数及三路屯戍多少、地理远近，更为图籍。凡边防久缺屯戍者，必加搜补。其在政府，与韩琦同心辅政。凡兵民、官吏、财利之要。中书所当知者，集为总目，遇事不复求之有司。时东宫犹未定，与韩琦等协定大议。英宗以疾未亲政，皇太后垂帘，左右交构，几成嫌隙。韩琦奏事，太后泣语之故。琦以帝疾为解，太后意不释，修进曰：“太后事仁宗数十年，仁德著于天下。昔温成之宠，太后处之裕如；今母子之间，反不能容邪？”太后意稍和，修复曰：“仁宗在位久，德泽在人。故一曰晏驾，天下奉戴嗣君，无一人敢异同者。今太后至一妇人，臣等五六书生耳，非仁宗遗意，天下谁肯听从。”太后默然，久之而罢。

修平生与人尽言无所隐。及执政，士大夫有所干请，辄

面谕可否，虽台谏官论事，亦必以是非诘之，以是怨诽益众。帝将追崇濮王，命有司议，皆谓当称皇伯，改封大国。修引《丧服记》，以为：“‘为人后者，为其父母报。’降三年为期，而不没父母之名，以见服可降而名不可没也。若本生之亲，改称皇伯，历考前世，皆无典据。进封大国，则又礼无加爵之道。故中书之议，不与众同。”太后出手书，许帝称亲，尊王为皇，三夫人为后。帝不敢当。于是御史吕诲等诋修主此议，争论不已，皆被逐。惟蒋之奇之说合修意，修荐为御史，众目为奸邪。之奇患之，则思所以自解。修妇弟薛宗孺有憾于修，造帷薄不根之谤摧辱之，展转达于中丞彭思永，思永以告之奇，之奇即上章劾修。神宗初即位，欲深谴修。访故宫臣孙思恭，思恭为辨释，修杜门请推治。帝使诘思永、之奇，问所从来，辞穷，皆坐黜。修亦力求退，罢为观文殿学士、刑部尚书、知亳州。明年，迁兵部尚书、知青州，改宣徽南院使、判太原府。辞不拜，徙蔡州。

修以风节自持，既数被汙衊，年六十，即连乞谢事，帝辄优诏弗许。及守青州，又以请止散青苗钱，为安石所诋，故求归愈切。熙宁四年，以太子少师致仕。五年，卒，赠太子太师，谥曰文忠。

修始在滁州，号醉翁，晚更号六一居士。天资刚劲，见义勇为，虽机阱在前，触发之不顾。放逐流离，至于再三，志气自若也。方贬夷陵时，无以自遣，因取旧案反复观之，见其枉直乖错不可胜数，于是仰天叹曰：“以荒远小邑，且如此，天下固可知。”自尔，遇事不敢忽也。学者求见，所与言，未常及文章，惟谈吏事，谓文章止于润身，政事可以及物。凡

历数郡，不见治迹，不求声誉，宽简而不扰，故所至民便之。或问：“为政宽简，而事不弛废，何也？”曰：“以纵为宽，以略为简，则政事弛废，而民受其弊。吾所谓宽者，不为苛意；简者，不为繁碎耳。”修幼失父，母常谓曰：“汝父为吏，常夜烛治官书，屡废而叹。吾问之，则曰：‘死狱也，我求其生，不得尔。’吾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则死者与我皆无恨。夫常求其生，犹失之死，而世常求其死也。’其平居教他子弟，常用此语，吾耳熟焉。”修闻而服之终身。

为文天才自然，丰约中度。其言简而明，信而通，引物连类，折之于至理，以服人心。超然独惊，众莫能及，故一下翕然师尊之。奖引后进，如恐不及，赏识之下，率为闻人。曾巩、王安石、苏洵、荀子轼辙，布衣屏处，未为人知，修即游其声誉，谓必显于世。笃于朋友，生则振掖之，死则调护其家。

好古嗜学，凡周、汉以降金石遗文、断编残简，一切掇拾，研稽异同，立说于左，的的可表证，谓之《集古录》。奉诏修《唐书》纪、志、表，自撰《五代史记》，法严词约，多取《春秋》遗旨。苏轼叙其文曰：“论大道似韩愈，论事似陆贽，记事似司马迁，诗赋似李白。”识者以为知言。

……

论曰：三代而降，薄乎秦、汉，文章虽与时盛衰，而蔼如其言，晔如其光，噉如其音，盖均有先王之遗烈。涉晋、魏而弊，至唐韩愈氏振起之。唐之文，涉五季而弊，至宋欧阳修又振起之。挽百川之颓波，息千古之邪说，使斯文之正气，

可以羽翼大道，扶持人心，此两人之力也。愈不获用，修用矣，亦弗克究其所为，可为世道惜也哉！

曾巩传

——《宋史》卷三一九

【说明】曾巩（1019—1083），宋代散文家，唐宋八大家之一。字子固，建昌军南丰（今属江西）人，后居临川。嘉佑进士，曾奉诏编撰史馆书籍，官至中书舍人。

曾巩工散文，其文以议论见长，立论精策，说理曲折尽意，风格与欧阳修相近，历代享有盛誉。其诗质朴，略似其文。有《元丰类稿》。

曾巩，字子固，建昌南丰（今江西南丰）人。从小就机警聪敏，读几百字的文章，脱口就能背诵。十二岁那年，曾经试着写作《六论》，结果是提笔立成，文辞很有气魄。刚成年，名声就已传播四方。欧阳修看了他的文章，十分惊奇。

嘉佑二年（1057），曾巩中了进士。被调太平州（今安徽当涂）司法参军，后来，仁宗皇帝又召命编校史馆书籍，迁馆阁校勘、集贤校理，任实录检讨官。不久外出通判越州（今浙江绍兴）。越州官府本来向酒场收税钱给官府中管理税收的官吏，因为酒场钱赋不足，就向那些乡户征取，期约是七年；七年期满之后，管理赋税的人希望收入多一些，所以

仍旧按照旧约收税。曾巩了解了这个情况，立即禁止了这种做法。那一年是荒年，曾巩估计常平仓的储粮难以满足人民的需要，而乡下的百姓，又不能都到城里来购粮，就告示越州所属诸县，婉言劝说富人自己派人到外州县去采购粮食，总数共十五万石，然后可以比常平仓的粮价稍稍提高一些卖给人民。人民能够就近方便地买到粮食，这样就可以不离开自己的家乡，而做到饮食有余。曾巩又让官府贷给农民们种籽，让他们和秋赋一起归还，农事因此不受影响。

曾巩在主管齐州（今山东济南）工作的时候，把迅速严厉打击奸邪和盗贼作为治理齐州政务的根本方针。曲堤有个姓周的人家，凭着自己拥有的巨大资产在乡里称霸，他家的儿子周高骄横放纵，残害良民，奸淫妇女，穿着和器用都越出了礼制规定的等级，但是他的能量很大，可以直接影响地方上的权贵和豪绅，因此州县的官吏都不敢追问他，曾巩把他逮捕起来依法进行了处置。章丘地方有人在乡里聚众结党，号称“霸王社”，诸如杀人劫财，抢夺囚车，没有一桩不能如愿的。曾巩配备了三十一个捕快，又嘱咐百姓编制成保伍，命令他们侦察这些强盗的活动，有强盗就击鼓相互救援，所以每次发现强盗总能抓住他们。有个叫葛友的人，他的名字已列入被追捕者的名单里了，一天，这个人到官府自首，曾巩就招待他吃饭，并且送给他帽子和衣服，送给他车马和骑从，把买来的金银布帛装在车上跟着他到齐州的四境去夸耀。强盗们听说了，很多人都出来自首。从表面看来曾巩对他们很客气，骨子里实在是为了离间这些党徒，使他们不能再聚众结党。从此以后，齐州就做到了门户不闭。

河北征发百姓疏浚黄河，征调役夫的面涉及到其它路、府，按规定齐州应当出役夫二万名。开始各县按照原来的簿册应该是三个成年男子中出一个役夫，曾巩搜求隐瞒和遗漏的户口，结果是九个成年男子中出一个役夫，这样就节省了几倍的费用。又取消了无名渡的渡钱，造了桥以引渡两岸的百姓。又重新改置驿站，从长清（今属山东）到博州（今山东聊城），一直到魏（今河南开封），一共省设了六个驿站，百姓们都认为是件好事。

后来徙襄州（今湖北襄樊）、洪州（今江西南昌）。这时正值江西发生大瘟疫，曾巩命令各县镇亭传，都要储备药品以备急用。凡是士兵和百姓中有不能自养的就收容到官舍来吃住，官舍资助他们饮食、衣被等用具，并且派医生分别替他们检查和治疗，再把他们是否全部失去生活能力，和失去生活能力的多少记录下来，然后再决定对他们治疗的先后次序。当时朝廷正发大军征讨安南，凡是部队所经过的州府都要作好供给一万人食宿的准备。其它州府的官员因此横征暴敛，极力搜括，人民不堪忍受。曾巩则事先划出了一块供大军突然到来时吃和住的地方，因此部队开走了，城乡的老百姓还不知道。后来加直龙图阁，知福州（今属福建）。

南剑将乐地方的强盗廖恩，官府赦罪以后就投降了，他的余部本来已经散了，以后却又聚合起来，他们暗地里聚集在一起，牵连到好几个州。其中特别凶恶的匪徒连官府传呼也不去，百姓非常恐慌，曾巩用计策把他们抓了起来，此后陆续来归降的有二百多人。福州多佛寺，和尚们贪图它的富饶，争着想做寺庙的住持，就纷纷贿赂官府。曾巩让这些人

互相推举，然后把名字登记在簿册中，按照登记的先后次第递补。凡是选中的人就在公庭上当堂发给他任命书，这样既停止了私下送谢礼，又杜绝了手下人借此进行勒索的流弊。福州太守没有禄米田，每年靠出卖公家果园蔬圃的出产收钱，常常自己可以有三四十万的收入。曾巩说：“太守和百姓争利，可以吗？”于是就把这个惯例取消了。后任的官员也就不再收取这项钱财。

后来徙明州（今浙江宁波）、亳州（今安徽亳县）、沧州（今河北沧县）。曾巩享有才名，却长期做地方官，世上很有些人认为他命运不好，时运不佳。而且就在曾巩外任地方官的时候，朝廷里一批年轻的后生们却被安置在重要地位，曾巩对这些却看得非常淡泊。在路过京城的时候，神宗召见了，慰劳问候很是尊宠，就留任三班院。曾巩曾上书议论财政经济问题，神宗说：“曾巩把简省财政支出作为理财的根本方针，世上谈理财的人，却没有说到这一点。”神宗因为《三朝国史》、《两朝国史》都是独立的一书，就想把它们合而为一，加曾巩为史馆修撰，专门负责主持这项工作，不用大臣监忌，后来没有完成。正值神宗推行新官制，曾巩被任命为中书舍人。当时中书省、门下省、侍中省的百官都被选授一新，曾巩执笔起草的任命诏书，每天有几十封，每个人都被封了官，任命诏书中写到神宗皇帝教导的话都写得极其典雅精练深透。不久掌管延安郡王佑奏。按惯例本来是翰林学士做的事，现在却都由曾巩承担了。但是曾巩只做了几个月，因为母亲去世而去了官。又过了几个月，曾巩就去世了，终年六十五岁。

曾巩天性孝顺友爱，父亲死后，他侍奉继母益加周到，在门庭衰落的情况下独自一人挑起了抚养四个弟弟、九个妹妹的重任，凡是弟妹们的读书、求功名、出嫁婚娶都是他独力承当。曾巩写作的文章，上下驰骋气势很盛，而且是愈往下写愈是精工，推其本原得自《六经》，而又受司马迁、韩愈的深刻影响，同时代的长于写作文词的人，很少能超过他。曾巩年轻的时候同王安石交游，当时王安石的声誉还不大，曾巩就把他介绍给欧阳修。等到王安石得志后，曾巩就和他逐渐疏远了。神宗曾经问曾巩：“王安石是怎样的人？”他回答说：“王安石的文章学问德行道义，不比扬雄差，因为‘吝’，所以不如扬雄。”神宗又问：“王安石视富贵如粪土，怎么说他‘吝’呢？”曾巩回答道：“我所说的‘吝’，是他勇于作为，而‘吝’于改正过错呀！”神宗赞同这个看法。吕公著曾经告诉神宗，认为曾巩的为人行义不及他办理政务的能力，而办理政务又不及他写文章的才能，所以曾巩才不被大用。

（姚汉荣 译）

【原文】

曾巩字子固，建昌南丰人。生而警敏，读书数百言，脱口辄诵。年十二，试作《六论》，援笔而成，辞甚伟。甫冠，名闻四方。欧阳修见其文，奇之。

中嘉佑二年进士第。调太平州司法参军，召编校史馆书籍，迁馆阁校勘、集贤校理，为实录检讨官。出通判越州，州旧取酒场钱给募牙前，钱不足，赋诸乡户，期七年止；期尽，募者志于多入，犹责赋如初。巩访得其状，立罢之。岁饥，度常平不足贍，而田野之民，不能皆至城邑。谕告属县，讽富

人自实粟，总十五万石，视常平价稍增以予民。民得从便受粟，不出田里，而食有余。又贷之种粮，使随秋赋以偿，农事不乏。

知齐州，其治以疾奸急盗为本。曲堤周氏拥货雄里中，子高横纵，贼良民，污妇女，服器上僭，力能动权豪，州县吏莫敢洁，巩取寘于法。章丘民聚党村落间，号“霸王社”，椎剽夺囚，无不如志。巩配三十一人，又属民为保伍，使几察其出入，有盗则鸣鼓相援，每发辄得盗。有葛友者，名在捕中，一日，自出首。巩饮食寇裳之，假以骑从，辇所购金帛随之，夸徇四境。盗闻，多出自首。巩外视章显，实欲携贰其徒，使之不能复合也。自是外户不闭。

河北发民浚河，调及它路，齐当给夫二万。县初按籍三丁出夫一，巩括其隐漏，至于九而取一，省费数倍。又弛无名渡钱，为桥以济往来。徙传舍，自长清抵博州，以达于魏，凡省六驿，人皆以为利。

徙襄州、洪州。会江西岁大疫，巩命县镇亭传，悉储药待求。军民不能自养者，来食息官舍，资其食饮衣衾之具，分医视诊，书其全失、多寡为殿最。师征安南，所过州为万人备。他吏暴诛亟敛，民不堪。巩先期区处猝集，师去，市里不知。加直龙图阁、知福州。

南剑将乐盗廖恩既赦罪出降，余众溃复合，阴相结附，旁连数州，尤桀者呼之不至，居人惧恐。巩以计罗致之，继自归者二百辈。福多佛寺，僧刹其富饶，争欲为主守，赇请公行。巩俾其徒相推择，识诸籍，以次补之。授帖于府庭，却其私谢，以绝左右缴求之弊。福州无职田，岁鬻园蔬收其直，

自入常三四十万。巩曰：“太守与民争利，可乎？”罢之。后至者亦不复取也。

徙明、亳、沧三州。巩负才名，久外徙，世颇谓偃蹇不偶。一时后生辈锋出，巩视之泊如也。过阙，神宗召见，劳问甚宠，遂留判三班院。上疏议经费，帝曰：“巩以节用为理财之要，世之言理财者，未有及此。”帝以《三朝》、《两朝国史》各自为书，将合而为一，加巩史馆修撰，专典之，不以大臣监总，既而不克成。会官制行，拜中书舍人。时自三省百职事，选授一新，除书日至十数，人人举其职，于训辞典约而尽。寻掌延安郡王笺奏。故事命翰林学士，至是特属之。甫数月，丁母艰去。又数月而卒，年六十五。

巩性孝友，父亡，奉继母益至，抚四弟、九妹于委废单弱之中，宦学昏嫁，一出其力。为文章，上下驰骋，愈出而愈工，本原《六经》，斟酌于司马迁、韩愈，一时工作文词者，鲜能过也。少与王安石游，安石声誉未振，巩导之于欧阳修，及安石得志，遂与之异。神宗常问：“安石何如人？”对曰：“安石文学行义，不减扬雄，以吝故不及。”帝曰：“安石轻富贵，何吝也？”曰：“臣所谓吝者，谓其勇于有为，吝于改过耳。”帝然之。吕公著尝告神宗，以巩为人行义不如政事，政事不如文章，以是不大用云。

王安石传

——《宋史》卷三二七

【说明】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号半山。抚州临川（今江西抚州）人。仁宗庆历二年（1042）进士。初知鄞县，起堤堰，决陂塘，兴修水利；贷谷与民，出息还官，减轻高利贷剥削。历舒州通判、群牧判官、常州知州。嘉祐三年（1058），移提点江东刑狱，入为三司度支判官，向仁宗上万言书，主张培养人才，变法革新。神宗即位，起知江宁府，召为翰林学士兼侍讲，上书皇上，列举北宋建国以来各项制度的弊端，阐述改革的必要，与神宗意合。熙宁二年（1069），拜参知政事，设立制置三司条例司，主持变法，陆续颁行农田水利、青苗、均输、保甲、免役、市易、保马、方田等新法，以期富国强兵，史称“王安石变法”。次年，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由于保守派的反对，新法推行迭遭阻碍。七年，罢相，以观文殿大学士出知江宁府。第二年，复相。九年，再次罢相，出差宁府，退居江宁（今江苏南京）半山园。元丰二年（1079），复拜尚书左仆射、观文殿大学士，封荆国公。神宗死，太皇太后高氏听政，司马光为相，尽罢新法，王安石闭门不言政。哲宗元祐元年（1086）去世。赠太傅，谥

号“文”。王安石博学多才，执政时曾与其子王雱及吕惠卿等人重新注释《周官》、《尚书》、《诗经》，颁之学官，不用先儒传注，时称《三经新义》。退居江宁时，又作《字说》，文字训诂也多与前人不同。善长诗文，散文雄健峭拔，政论简洁有力，诗词亦清新高峻，为“唐宋八大家”之一。所著《字说》、《钟山日录》等多已失传，今有《王文公文集》、《临川先生文集》行世，后人并辑有《周官新义》、《诗义钩沉》等。

王安石，字介甫，抚州临川人。父亲王益，任都官员外郎。王安石小时候喜好读书，一过目终身不忘。他写起文章来下笔如飞，初看好象漫不经心，完成后，见到的人都佩服他的文章精采绝妙。朋友曾巩把他的文章带给欧阳修看，欧阳修为他扩大声誉。王安石考中进士，被选为上等，出任签书淮南判官、按照以前的制度，任职期满，允许进献文章要求考试馆阁职务，唯独王安石没有这样做。又调任鄞县的知县，修筑堤堰，疏治陂塘，兴修水利，方便水陆交通；将官谷借贷给农民，让他们秋后加些利息偿还，使官仓中的存谷能够以旧换新，鄞县的老百姓都觉得很方便。再任舒州通判。当时文彦博做宰相，向朝廷推荐王安石淡于名利，请求越级提拔，以此来遏止追逐名利的不良风气。不久，朝廷召王安石考试馆职，他没有参加。欧阳修推荐他做谏官，他又以祖母年事已高为理由而推辞。欧阳修对朝廷说王安石须要俸禄养家，于是朝廷任命他为群牧判官，他请求担任常州知州。调任提点江东刑狱，又进京担任度支判官，当时是宋仁宗嘉祐三年。

王安石的议论和主张高深新奇，善于用雄辩和旁征博引来维护自己的观点，敢于坚持按照自己的意见办事，慷慨激昂地立下了矫正世事、改变传统陋俗的志向。于是，他向仁宗皇帝上万言书，认为：“如今天下的财力一天比一天困乏，风俗一天比一天败坏，毛病就在于不知道规律，不遵循先王的政令。效法先王政令，在于效法先王政令的精神。只要效法先王政令的精神，那么我们所推行的改革变更就不至于惊扰天下人的视听，就不至于使天下舆论哗然、议论纷纷，也就必然符合先王的政令了。依靠天下的人力物力来生产天下的财富，征收天下的财富来供给天下的消费，自古以来的太平治世，不曾因为财富不足而造成国家的祸患，忧患是在于治理财政不得其法。居官任职的人才能既已不足，而城乡民间又缺少可以使用的人才，国家的重托，疆域的保持，陛下难道能够长久地依靠上天赐予的幸运作为常法，而不考虑万一出现忧患该怎么办吗？希望陛下能够明察朝政中因循苟且的弊端，明文诏令大臣，逐渐采取措施，革除这些弊端，以符合和适应当前世事的变化。我所讲的这些想法，那些沉溺在颓靡习俗中的人是不会谈论的，而且议论者还会认为这些都是迂腐疏阔、不切实际的老生常谈。”后来王安石执政，他所施行的各项政策措施，大体上都是以这份万言书为依据的。

随后不久，王安石任直集贤院。在此以前，朝廷多次委任他担任馆阁职务的命令，但王安石一再推辞。士大夫们都认为他不想显赫于世、对功名利禄十分淡漠，都恨不能跟他结识，朝廷多次想委派他担任名利优厚的养官，生怕他不肯接受。第二年，朝廷委任他同修起居注，王安石推辞了好几

天。阁门吏带着委任状到他府上交给他，他拒不接受；阁门吏随即下拜，他却溜到厕所里躲避起来；阁门吏干脆把委任状放在桌上离去，王安石又追上去将委任状还给他；他连续上章辞谢了八、九次，才接受了这项任命。于是任知制诰，纠察京城的刑事狱讼，从此他不再辞官了。

有位少年得到了一只善斗的鹌鹑，他的同伴向他求取，他不给，同伴仗着跟他关系亲密就把鹌鹑拿走了，这个少年追上去把同伴杀了。开封府判决这个少年当处死刑，王安石反驳道：“按照刑律，公开的夺取和偷偷的窃取都是盗贼行为。一方不给而另一方拿之以去，就是盗窃；追上去把他杀死，是追捕盗贼，虽然把人杀死了也不应当追究。”于是弹劾开封府审判机构将不该判刑的人反而判了重刑，犯了失入的错误。开封府的官员不服，皇帝将这件事交给审刑院和大理寺再次审理，审刑院和大理寺都认为开封府的判决是正确的。皇帝下诏免于追究王安石的弹劾错误，但他应当到合门前道歉。王安石说：“我没有罪！”不肯道歉。御史上章弹劾他，皇帝置之不问。

当时有诏令规定舍人院不得申请删改诏书文字，王安石争辩说：“假如真是这样，那么舍人院就不再能够履行自己的职责，而听任大臣为所欲为，假如不是大臣为了私利而侵夺舍人职权，那么国家立法就不应当这样。如今大臣中软弱的人不敢为陛下执法守纪，而强硬蛮横的人则假借皇帝的旨意来制造命令，谏官和御史们都不敢违背他们的意志，我实在感到害怕。”王安石的这些话都触犯了执政大臣，从此更加跟执政大臣相抵触。他因为母亲去世离任，直到英宗朝结束，朝

廷多次召他，他都不肯赴任。

王安石本是楚人，在朝廷中没什么名气，因为韩、吕二姓是世家大族，所以他想借助韩、吕二族来取得别人对自己的尊重。于是就和韩绛、韩绛的弟弟韩维以及吕公著深交，这三人对王安石交相称赞，王安石的声望才开始显著。

宋神宗在颍王府时，韩维任记室，每当他的讲解议论得到神宗称赞时，就说：“这不是我的说法，而是我的好友王安石的见解呀！”到他升任太子庶子时，韩维又推荐王安石代替自己。神宗于是很想见到王安石，刚即帝位，就任命他为江宁府知府。几个月后，又召王安石为翰林学士兼侍讲。熙宁元年四月，王安石才到朝廷。他进宫答对皇帝询问时，神宗问他治理国家首先应当做什么事，他回答说：“首先应当选择治国的方法。”神宗问道：“唐太宗怎么样？”王安石答道：“陛下应当效法尧、舜，何必要学唐太宗呢？尧、舜的治国之道，极为简明而不烦琐，极为扼要而不迂阔，极为简易而不繁难。但后世学者不能通晓，所以才认为高不可及。”神宗说：“你这可以说是让我勉为其难了，我自己认为跟尧、舜相比太过渺小，恐怕无法跟你的这番好意相称。你可以尽心尽意地辅佐我，希望共同实现这一目标。”

有一天讲学，大臣们都退朝了，神宗皇帝让王安石留坐，说：“我有事想跟你认真讨论。”于是说道“唐太宗必须得到魏征，刘备必须得到诸葛亮然后才能够有所作为，这两人确实不是每代都有的杰出人物啊。”王安石回答说：“陛下果真能为尧、舜，那么必然会有皋、夔、稷、禹这样的人物来辅佐；果真能为商高宗，那么必然会有傅说。诸葛亮和魏征那

两个人都是有识之士所羞于提及的，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呢？凭借我大宋幅员之大，人民之多，百年治平相承，有学问的人不可说不多。但经常忧虑没人可以帮助陛下治理国家，其原因在于陛下选拔人才的方法还不明确，诚意待人做得还不到家，即使有皋陶、后夔、后稷、禹和傅说这样的贤人，也会被小人遮蔽，藏身退隐而去。”神宗说：“哪个朝代没有小人？即使是尧、舜的时代，也不能没有‘四凶’。”王安石答道：“正因为能够辨别‘四凶’而加以惩处和铲除，尧、舜才能够成其为尧、舜。假如让‘四凶’肆无忌惮、谗害忠害、为非作歹，那么皋陶、后夔、后稷、禹还肯因循苟且、贪图俸禄而虚度一生吗？”

登州有个妇人嫌恶自己的丈夫相貌丑陋，夜里用刀砍杀丈夫，丈夫受了伤，但没有死。这个案子上报朝廷后，朝中讨论都认为这个妇人应判死刑，唯独王安石依据法律辩驳证明，此案符合谋杀致伤的律条，应当减死刑二等论处。神宗同意王安石的意见，并且把它定为法律。

熙宁二年二月，王安石被任命为参知政事。神宗对他说：“别人都不能了解你，以为你只懂经学，不明白现实事务。”王安石回答道：“经学正是用来治理现实事务的，但后世的所谓儒生，大都是些平庸之辈，所以世俗才认为经学不能施用于治理现实事务。”神宗又问：“既然如此，那么你首先要施行设置的是什么呢？”王安石回答说：“改变风俗，建立法度，最是今天的当务之急。”神宗认为很对。于是设立制置三司条例司，任命王安石跟知枢密院事陈升之共同掌管。王安石命令他的党徒吕惠卿承担条例司的具体事务。随后，农田水利、青

苗、均输、保甲、免役、市易、保马、方田等法相继问世，称为新法，朝廷派遣了四十多名提举官，到全国各地颁行新法。

青苗法，是把余买常平粮的本钱作为青苗钱，散借给百姓，让他们出二分的利息偿还，每年春天借出、秋天收回。均输法，是把发运的职能改为均输，朝廷给予钱币和实物，凡是上供朝廷的物品，都必须离开价钱高的地区而到价钱便宜的地区购买，并用路程近的地区代替路程远的地区，预先了解京城仓库需要购买的物品，以使用便宜的价钱购买贮存。保甲法，就是把乡村的人口编入户籍簿，两名男丁取一人，十家为一保，挑选出来的保丁都发给弓弩、教给他们战斗阵法，维护地方治安。免役法，就是根据百姓家庭财产的多少，分别让他们出钱雇人充役，下至单丁户、女户等本来不用服役的家庭，也一律出钱，称为助役钱。市易法，允许私人向官府赊购或借贷货物钱款，以自己的田地、住宅或者金帛作为抵押，出十分之二的利息还官，超过期限没有交纳的，利息之外每月另加百分之二的罚金。保马法，凡是五路义勇保甲愿意养马的，每户养一匹，将牧马监现有的马匹给他们喂养，或者由官府给予买马的钱款，让他们自行购买，每年检查一次马的肥瘦，死亡的和生病的由养马户负责赔偿。方田法，以东、西、南、北各一千步，相当于四十一顷六十六亩一百六十步的田地作为一方，每年九月，县令、县佐分地丈量计算，检验土地肥瘠，确定这些土地的成色，分为五个等级，按照土地的等级，均定赋税数额。还有免行钱，规定京师各行各业根据获利多少，都要交钱，官府则给予免除行户的当差义务。自从这些法令推行以后，全国各地争相谈论农田水利，古

代的陂塘和废弃的堤堰，都必须兴建修复。又下令平民百姓可以向官府投递密封状，增加价钱购买坊场，又增加茶、盐的税收数额，还设立了措置河北余便司，在临近河流的州县大量囤积粮食，以备粮饷运输。从此赋税聚敛越来越重，而天下也骚动不安了。

御史中丞吕诲论说王安石有十大过失，神宗为此将吕诲调离朝廷到地方任职，王安石推荐吕公著取代吕诲任御史中丞。韩琦规劝神宗停止实行青苗法的奏疏送到朝廷，神宗感动醒悟，打算同意韩琦的意见，王安石立即要求辞职离去。司马光为神宗起草批答诏书，其中有“士大夫沸腾，黎民百姓骚动不安”的话，王安石大怒，上章为自己辩护，神宗不得不谦逊地向他道歉，派吕惠卿传达劝慰的旨意，韩绛又劝神宗挽留他。王安石入朝谢恩，因而对神宗说了朝廷内外大臣、从官、台谏官、朝士互相依附勾结的情形，并且说：“陛下想要先王的正道战胜天下流于颓靡风俗的人，所以跟他较量轻重。流俗的势力大了，那么天下人就会归向流俗；陛下的力量强大了，那么天下人就会归依陛下。秤锤与物体较量轻重时，即使是重达千钧的物体，增加或减少一铢一两的重量就会使秤杆移动变化。如今奸邪的人们想要败坏先王的正道，以阻止和破坏陛下所进行的改革。现在正是陛下和流俗的秤锤较量轻重的时候，流俗增加铢两的重量，用力虽然极小，但天下这杆秤已向流俗这一方倾斜了，这就是天下议论纷纷的缘故啊！”神宗认为确实是这样。于是王安石重新任职治事，韩琦的意见没有得到采纳。

王安石与司马光一直很有交情，司马光依据朋友之间相

互督促行善的道理，三次写信给王安石反复进行规劝，王安石很不高兴。神宗起用司马光任枢密副使，司马光推辞不就而王安石已经出任执政，这项任命就停止执行了。吕公著虽然是王安石推荐的，也因为请求废除新法而被派出去担任颍州知州。御史刘述、刘琦、钱顗、孙昌龄、王子韶、程顥、张戢、陈襄、陈荐、谢景温、杨绘、刘摯，谏官范纯仁、李常、孙觉、胡宗愈都因为自己的意见不被采纳，相继离开朝廷。王安石很快提升秀州推官李定任御史，知制诰宋敏求、李大临、苏颂封还任命诏书，御史林旦、薛昌朝、范育弹劾李定不守孝道，都被罢免并逐出朝廷。翰林学士范镇三次上疏议论青苗法，被免除职务，迫令退休。吕惠卿因为父亲去世离开朝廷，王安石在不知道把他走后的空缺委任给谁时，得到了曾布，王安石对他很信任，程度仅次于吕惠卿。

熙宁三年十二月，王安石就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第二年春天，京东、河北两路发生了暴风的灾异现象，老百姓十分恐慌。神宗批示中书机构，命令小事安静、停止变法以应付天变，放还这两路应募的农夫，责罚不如实上报情况的监司和郡守。王安石扣下这道诏令，不予传达。

开封府的百姓为逃避保甲，有截掉自己的手指、砍断自己手腕的，知府韩维将这些情况报告朝廷，神宗问王安石，王安石回答说：“这些情况我固然还不太清楚，即使有的话，也不足为怪。如今士大夫们看到推行新政，尚且大惊小怪、吵吵嚷嚷；何况是二十万户百姓，必然会有由于愚蠢而受人煽动蛊惑的，怎能因为这种人而不敢有所作为呢？”神宗说：“听取百姓们符合实际的各种意见就能取得成功，百姓的意见

也不能不畏惧。”

东明县的老百姓有人拦住宰相的坐骑控诉助役钱的不合理，王安石对神宗说：“知县贾蕃是范仲淹的女婿，喜欢依附流俗，导致老百姓做出这样的事。”又说：“治理百姓应当知道他们的真假利弊，不可以向他们表示无原则的姑息宽容。如果放纵他们越轨闯过中书省、御史台，击鼓拦驾，凭借人多以图侥幸，这不是治理国家的办法。”王安石的强词夺理，大体上都是如此。

神宗皇帝起用韩维任御史中丞，王安石对韩维以前的言论怀恨在心，指斥他善于附和流俗来反对神宗所建立的新法，这次任命因韩维推辞而停止。欧阳修请求退休，冯京要求朝廷挽留他，王安石说：“欧阳修依附韩琦，把韩琦看作是关系到社稷安危的重臣。象他这样的人，在一郡就败坏一郡，在朝廷就败坏朝廷，留下他有什么用？”于是神宗同意欧阳修退休。富弼因为阻挠青苗法的实施而被消除了使相的称号，王安石说这还不足以制止奸邪小人，甚至把富弼比作共工和鲧。灵台郎尤瑛讲天气阴了很久，星辰失去了正常的支行，应该黜退王安石，随即被刺面发配到英州。唐垆本来是由王安石推荐而担任谏官的，只因他请求奏对时极力论说了王安石的罪过，结果被贬谪而死。文彦博说市易法是跟天下人争利，致使华山崩塌。王安石说：“华山的灾变，仅仅是天意为小人而发作的。推行市易法，原本就是因为平民长久空困，用来抑制兼并的，对官府有什么利益呢？”他压下文彦博的奏章，将文彦博逐出朝廷，去担任大名府留守。这样，吕公著、韩维，王安石凭借他们树立自己声誉的人；欧阳修、文彦博，推荐

自己的人；富弼、韩琦，用自己担任皇帝侍从的人；司马光、范镇，自己的好朋友；王安石对他们都不遗余力地加以排斥。

神官讨论确立太庙中太祖牌位东向的位置，王安石独自决定将僖祖的牌位奉还到祧庙里，参加讨论的官员们联合起来与王安石争论，没能改变他的决定。上元节的傍晚，王安石跟随神宗皇帝的圣驾，骑马进入宣德门，守门的卫士呵斥阻止，并鞭打王安石的坐骑。王安石大怒，上章要求逮捕惩罚这些卫士。御史蔡确说道：“在宫廷内值宿的卫士，其职责只是保卫皇帝，宰相下马下得不是地方，卫士理应回以呵叱阻止。”神宗终于还是为了王安石而杖打了卫士，并斥责了内侍，王安石还是愤愤不平。王韶开拓熙河路成功，向朝廷奏报，神宗因为这是王安石主持建议的，解下自己身佩的玉带赐给了王安石。

熙宁七年春，天下长久干旱，饥民们流离失所，皇帝忧容满面，上朝时叹息不已，想把不好的法令制度统统罢除。王安石说道：“水旱灾害是常有的事情，尧、汤的时候也不能避免，这不足以招致陛下的忧虑，但必须治理好人力所能及的事情来应付天灾。”神宗说：“这怎么是小事呢？我之所以感到害怕，正是因为没能做好人力能及的事情。现在官府征收免行钱负担太重，百姓怨叹，甚至有人说出对朝廷不敬的话来。从亲近大臣到皇后家族，没有不说免行钱的祸害的。两宫太后为此落泪，担心京城会发生骚乱，认为天旱使朝廷更加失去了人心。”王安石说：“亲近大臣不知道是谁，如果两宫太后有这样的话，那也是向经、曹佺所干的罢了。”冯京说：“我也听说了。”王安石道：“士大夫中不得志的人都归附你冯

京，所以唯独你冯京听到过这样的话，我可从来没听说过。”监安上门郑侠上呈奏疏，把所看到的流民扶老携幼、困苦不堪的情状，画成图进献给神宗，说：“旱灾是因为王安石变法而引起的。罢免王安石，上天必然会下雨。”郑侠又因为这件事被流放到岭南。慈圣、宣仁两位皇太后流着眼泪对神宗说：“王安石扰乱了天下。”神宗也怀疑王安石，于是罢免了他的宰相职务，任命他为观文殿大学士、江宁府知府，从礼部侍郎超九转而为吏部尚书。

吕惠卿服丧期满，王安石早晚不停地推荐他，这时，王安石奏请神宗让吕惠卿任参知政事，又请求召回韩绛代替自己。这两人都坚持遵循王安石的陈规旧模，没有丝毫改变，当时韩绛的绰号是“传法沙门”，吕惠卿的绰号是“护法善神”。然而吕惠卿实际上是想自己掌握执政大权，害怕王安石重新回来当政，于是假借郑侠一案来陷害王安石的弟弟王安国，又制造李士宁案件来排挤王安石。韩绛觉察到了吕惠卿的用意，秘密奏知皇帝，请求召回王安石。熙宁八年二月，神宗再次任命王安石为宰相，王安石受命后，立即兼程赶赴京城。《三经义》修成，王安石加官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任命他的儿子王雱为龙图阁直学士。王雱推辞不受，吕惠卿劝说神宗接受他的请求，从此王、吕之间的猜疑和隔阂更加明显。吕惠卿被蔡承禧攻击弹劾，在家里等待皇帝的处理诏令。王雱暗示御史中丞邓綰，再次弹劾吕惠卿和华亭县知县张若济相互勾结、犯法谋利的事情，立案审查他们，吕惠卿于是被派出去担任陈州知州。

十月，东方出现慧星，神宗下诏征求直言得失，并询问

政事中对百姓不利的地方。王安石带领同朝大臣们上疏说：“晋武帝五年，慧星出现在轸宿；十年，又出现了孛星。然而晋武帝在位二十八年，与《乙巳占》所预言的期限不相符合。这是因为天道遥远，先王虽然有官方占卜的预言，但所相信的依旧是人为之事。天文的变化无穷无尽，上下牵强附会，难道就没有偶然的巧合。周公、召公，怎么会欺骗周成王呢？他们说到商中宗在位的时间很长，就说‘中宗谨慎谦虚，兢兢业业，用天命约束自己，治理人民，不敢荒废政事’。谈到夏、商二朝维持了很长时间，也说是由于‘施行德政’而已。裨灶预言火灾能够灵验，想用祭祀求免灾祸，国侨不听他的意见，裨灶就说‘不采纳我的意见，郑国还将会发生火灾’。国侨最终还是没听他的意见，郑国也没有发生什么火灾。象裨灶这样的人，都难免荒诞，更何况今天的占卜星象的人呢？现在流传的占书，又是历代所禁止的，誉写讹误，尤其不知道有多少。陛下的品德至善至美，不仅比商中宗更加贤明，而且周公、召公所说的话也早已全部看过了，哪里用得着蠢人、盲人再有什么陈述呢？我听说两宫皇后因为这次天灾而担忧，希望陛下用我们所说的这些道理，尽力地开导劝慰。”神宗说：“听说民间吃足了新法的苦头。”王安石说：“冬天严寒，夏天暴雨，老百姓尚且怨恨，这用不着抚恤。”神宗说：“难道不能使冬寒夏雨的怨恨也没有吗？”王安石听后很不高兴，回家托病卧床，神宗忙安慰劝勉，王安石这才上朝治理政事。他的同党谋划道：“现在不要选取皇上历来不喜欢的人迅速提拔任用，这会使自己地位变轻，那时就将有窥伺和利用君臣间隙的人了。”王安石很赞同这个计策。神宗因为王安石出来执

政而感到欣慰和喜悦，完全听从他的所有意见。当时军队出征安南，密探得到安南的布告，说：“中国推行青苗、助役法，使老百姓非常穷困。我国现在出兵，是要帮助拯救那里的百姓。”王安石恼怒，亲自起草敕榜诋毁安南。

华亭一案拖了很久还不能成立，王雱把它交给门客吕嘉问、练亨甫共同商议，他们取来邓綰所列举的吕惠卿的罪状，夹杂在其它文书下达给皇帝批准审讯的制狱，王安石不知道这件事。省吏到陈州把此事告诉给吕惠卿，吕惠卿随即写了奏状上报神宗，并控告王安石说：“王安石完全抛弃了自己所学的先王教诲，崇尚纵横家的末流小技，违背君命假传圣旨，欺骗皇帝要挟君主。一年之中极力干尽这些坏事，即使是古代丧失理智、倒行逆施的人，恐怕都没有这样的。”又揭发王安石在私人书信中写有“不要让皇帝知道”的话。神宗把这些材料给王安石看，王安石推说没有这些事，回家问王雱，王雱把情况说了出来，王安石斥责了他。王雱恼怒怨恨，背上的痛疽发作而死。王安石公开宣布邓綰的罪过，说：“邓綰为我的子弟求取官职并举荐我的女婿蔡卞”，于是邓綰和亨甫都获罪。邓綰开始因为依附于王安石而做了谏官，等到王安石和吕惠卿互相倾轧时，邓綰极力帮助王安石攻击叶惠卿。神宗对王安石的所作所为感到厌烦，邓綰生怕失势，屡次在皇帝面前要求挽留王安石，说起话来无所顾忌；亨甫为人阴险刻薄，靠巴结王雱而得以进用，到现在两人都被贬斥了。

王安石再次担任宰相后，多次托病请求离职，到儿子王雱死后，更是悲戚忧伤得无法承受，极力请求解除他的枢要职务，任命他为镇南军节度使、平章声、判江宁府。第二年，

改任集禧观使，封为舒国公。王安石多次乞求把自己的将相印钦交还朝廷。元丰三年，王安石再次被任命左仆射、观文殿大学士。换为特进，改封荆国公。哲宗即位，加封他为司空。

元祐元年，王安石去世，终年六十六岁，追赠为太傅。绍圣年间，赐谥号为“文”，配享于神宗庙庭。徽宗崇宁三年，又配享于文宣王庙，牌位列在颜回和际子后面追封为舒王。钦宗时，杨时有议论，朝廷停止王安石在文宣王庙配享。高宗采纳赵鼎、吕颐当的意见，停止王安石在宗庙配享，并剥夺了他的王位封号。

当初，王安石训释《诗》、《书》、《周礼》，写成后，颁布到官学学舍，天下称之为《新义》。晚年定居金陵，又写作了《字说》一书，其中有不少穿凿附会的内容。观点则混合了佛经和老庄的思想。一时间，读书的士人没有敢不传授学习的，主考官只用王安石的学说为标准录取考生，士人不得自立一说，凡是先儒解释经书的著作，全都废除不用。又废黜《春秋》这部书，不把它列在学校教材里，甚至将它戏称为“断缺残陋的朝廷公报”。

王安石没有显贵时，名声震动京师，生性不喜好华丽的服饰和丰美的饮食，自己的日常生活极为俭朴，有时衣服脏了不洗，脸上脏了也不洗，当时人们都称赞他贤明有德。只有蜀人苏洵说：“这样子是不近人情的，这种人很少不成为大奸大恶的。”并写了《辩奸论》一文来讽刺王安石，说他是王衍、卢杞合为一身的人。

王安石性格坚强刚愎，遇到事情不管对错，都相信自己

的见解，固执己见不肯改变。到议论变法时，在朝百官都持不能变法的意见，王安石附会儒家经义，提出自己的主张，辩论起来动不动就是好几百字，大家都驳不倒他。他甚至说：“天灾不足以畏惧，祖宗不足以效法，人们的议论不足以忧虑。”朝廷内外老成持重的人几乎被王安石罢除殆尽，他多任用自己门下轻薄而有点小聪明的年轻人。当了很长时间的宰相后，因为天发旱灾而引退；到他第二次担任宰相，一年多后就被罢免了，直到神宗朝结束没有再召他回朝廷，前后共八年。儿子王雱。

（江小涛 译）

【原文】

王安石，字介甫，抚州临川人。文益，都官员外郎。安石少好读书，一过目终身不忘。其属文动笔如飞，初若不经意，既成，见者皆服其精妙。友生曾巩携以示欧阳修，修为之延誉。擢进士上第，签书淮南判官。旧制，秩满许献文求试馆职，安石独否。再调知鄞县，起堤堰，决陂塘，为水陆之利；贷谷与民，出息以偿，俾新陈相易，邑人便之。通判舒州。文彦博为相，荐安石恬退，乞不次进用，以激奔竞之风。寻召试馆职，不就。修荐为谏官，以祖母年高辞。修以其须禄养言于朝，用为群牧判官，请知常州。移提点江东刑狱，入为度支判官，时嘉祐三年也。

安石议论高奇，能以辩博济其说，果于自用，慨然有矫世变俗之志。于是上“万言书”，以为：“今天下之财力日以困穷，风俗日以衰坏，患在不知法度，不法先王之政故也。法光乏之政者，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则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于倾骇天下之耳目，嚣天下之口，而固已合先王之政矣。因

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收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自古治世，未曾以财不足为公患也，患在治财无其道耳。在位之人财既不足，而闾巷草野之间亦少可用之才，社稷之托，封疆之守，陛下能久以天幸为常，而无一旦之忧乎？愿监苟且因循之弊，明诏大臣，为之以渐，期合于当世之变。臣之所称，流俗之所不，则议者以为迂阔而熟烂者也。”后安石当国，其所注措，大抵皆祖此书。

俄直集贤院。先是，馆阁之命屡下，安石屡辞。士大夫谓其无意于世，恨不识其面，朝廷每欲畀以美官，惟患其不就也。明年，同修起居注，辞之累日。阁门吏赍勅就付之，拒不受。吏随而拜之，则避于厕。吏置敕于案而去，又追还之；上章至八、九，乃受。遂知制诰，纠察在京刑狱，自是不复辞官矣。

有少年得斗鹑，其侪求之不与，恃与之昵辄持去，少年追杀之。开封当此人死，安石驳曰：“按律，公取、窃取皆为盗。此不与而彼携以去，是盗也；追而杀之，是捕盗也，虽死，当勿论。”遂劾府司失入。府官不伏，事下审刑、大理，皆以府断为是。诏放安石罪，当诣合门谢。安石言：“我无罪。”不肯谢。御史举奏之，置不问。

时有诏舍人院无得申请除改文字，安石争之曰：“审如是，则舍人不得复行其职，而一听大臣所为，自非大臣欲倾侧而为私，则立法不当如此。今大臣之弱者不敢为陛下守法；而强者则挟上旨以造令，谏官、御史无敢逆其意者，臣实惧焉。”语皆侵执政，由是益与之忤。以母忧去，终英宗世，召不起。

安石本楚士，未知名于中朝，以韩、吕二族为巨室，欲

藉以取重。乃深与韩绛、绛弟维及吕公著交，三人更称扬之，名始盛。神宗在颖邸，维为记室，每讲说见称，辄曰：“此非维之说，维之友王安石之说也。”及为太子庶子，又荐自代。帝由是想见其人，甫即位，命知江宁府。数月，召为翰林学士兼侍讲。熙宁元年四月，始造朝。入对，帝问为治所先，对曰：“择术为先。”帝曰：“唐太宗何如？”曰：“陛下当法尧、舜，何以太宗为哉？尧、舜之道，至简而不烦，至要而不迂，至易而不难。但末世学者不能通知，以为高不可及耳。”帝曰：“卿可谓责难于君，朕自视眇躬，恐无以副卿此意。可悉意辅朕，庶同济此道。”

一日讲席，群臣退，帝留安石坐，曰：“有欲与卿从容议论者。”因言：“唐太宗必得魏征，刘备必得诸葛亮然后可以有为，二子诚不世书之人也。”安石曰：“陛下诚能为尧、舜，则必有皋、夔、稷、禹；诚能为高宗，则必有傅说。彼二子皆有道者所盖，何足道哉？以天下之大，人民之众，百年承平，学者不为不多。然常患无人可以助治者，以陛下择术未明，摧诚未至，虽有皋、夔、稷、禹、傅说这贤，亦将为小人所蔽，卷怀而去耳。”帝曰：“何世无小人，虽尧、舜之时，不能无四凶。”安石曰：“惟能辨四凶而诛之，此其所以为尧、舜也。若使四凶得肆其谗慝，则皋、夔、稷、禹亦安肯苟食其禄以终身乎？”

登州妇人恶其夫寝陋，夜以丸斫之，伤而不死。狱上，朝议皆当之死，安石独援律辨证之，为合从谋杀伤，减二等论。帝从安石说，且著为令。

二年二月，拜参知政事。上谓曰：“人皆不能知卿，以为

卿但知经术，不晓世务。”安石对曰：“经术正所以经世务，但后世所谓儒者，大抵皆庸人，故世俗皆以为经术可施于世务耳。”上问：“然则卿所施設以何先？”安石曰：“变风俗，立法度，最方今之所急也。”上以为然。于制置三司条例司，命与知枢密院事陈升之同领之。安石令其党吕惠卿任其事。而农田水利、青苗、均输、保甲、免役、市易，保马、方田诸役相继并兴，号为新法，遣提举官四十余辈，颁行天下。

青苗法者，以常平余本作青苗钱，散与人户，令出息二分，春散秋敛；均输法者，以发运之职改为均输，假以钱货，凡上供之物，皆得徙贵就贱，用近易远，预知在京仓库所当办者，得以便宜蓄买；保甲之法，籍乡村之民，二丁取一，十家为保，保丁皆授以弓弩，教之战阵；免役之法，据家财高下，各令出钱雇人充役，下至单丁、女户，本来无役者，亦一概输钱，谓之助役钱；市易之法，听人余贷县官财货，以田宅或金帛为抵当，出息十分之二，过期不输，息外每月更加罚钱百分之二；保马之法，凡五路义保愿养马者，户一匹，以监牧见马给之，或官与其值，使自市，岁一阅其肥瘠，死病者补偿；方田之法，以东、西、南、北各千米，当四十一顷六十六亩一百六十步为一方，岁以九月，令、佐分地计量，验地土肥瘠，定其色号，分为五等，以地之等，均定税数。又有免行钱者，约京师百物诸行利入厚薄，皆令纳钱，与免行户祇应。自是四方争言农田水利，古陂废堰，悉务兴复。又令民封状增价以买坊场，又增茶盐之额，又设措置河北余便司，广积粮谷于临流州县，以备馈运。由是赋敛愈重，而天下骚然矣。

御史中丞吕诲论安石过失十事，帝为出海，安石荐吕公著代之。韩琦谏疏至，帝感悟，欲从之，安石求去。司马光答诏，有“士夫沸腾，黎民骚动”之语，安石怒，抗章自辩，帝为巽辞谢，令吕惠卿谕旨，韩绛又劝帝留之。安石入谢，因为上言中外大臣、从官、台谏、朝士朋比之情，且曰：“陛下欲以先王之正道胜天下之流俗，故与天下流俗相为重轻。流俗权重，则天下之人归流俗；陛下之权重，则天下之人归陛下。权者与物相为重轻，虽千钧之物，所加损不过铢两而移。今奸人欲败先王之正道，以沮陛下之所为。于是陛下流俗之权适争轻重之时，加铢两之力，则用力至微，而天下之权，已归于流俗矣，此所以纷纷也。”上以为然。安石乃视事，琦说不得行。

安石与光素厚，光援朋友责善之义，三诏书反复劝之，安石不乐。帝用光副枢密，光辞未拜而安石出，命遂寝。公著虽为所引，亦以请罢新法出颍州。御史刘述、刘琦、钱颢、孙昌龄、王子韶、程颢、张戢、陈襄、陈荐、谢景温、杨绘、刘摯，谏官范纯仁、李常、孙觉、胡宗愈皆不得其言，相继去。骤用秀州推官李定为御史，知制诰宋敏求、李大临、苏颂封还词头，御史林旦、薛昌朝、范育论定不孝、皆罢逐。翰林学士范镇三疏言青苗，夺职致仕。惠卿遭丧去，安石未知所，得曾布，信任之，亚于惠卿。

三年十二月，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明年春，京东、河北有烈风之异，民大恐。帝批付中书，令省事安静以应天变，放遣两路募夫，责监司、郡守不以上闻者。安石执不下。

开封民避保甲，有截指断腕者，知府韩维言之，帝问安

石，安石曰：“此固未可知，就令有之，亦不足怪。今士大夫睹新政，尚或纷然惊异，况于二十万户百姓，固有蠢愚为人所感动者岂应为此遂不敢一有所为邪？”帝曰：“民言合而听之则胜，亦不可不畏也。”

东明民或遮宰相马诉助役钱，安石白帝曰：“知县贾蕃乃范仲淹之婿，好附流俗，致民如是。”又曰：“治民当知其情伪利病，不可示姑息。若纵之使妄经省台，鸣鼓邀驾，恃众侥幸，则非所以为政。”其强词背理率类此。

帝用韩维为中丞，安石憾曩言，指为善附流俗以非上所建立，因维辞而止。欧阳修乞致仕，冯京请留之，安石曰：“修附丽韩琦，以琦为社稷臣。如此人，在一郡则坏一郡，在朝廷则坏朝廷，留之安用？”乃听之。富弼以格青苗解使相，安石谓不足以阻奸，至比之共、鲧。灵台郎尤瑛言天久阴，星失度，宜退安石，即黥隶英州。唐垌本以安石引荐为谏官，因请对极论其罪，谪死。文彦博言市易与下争利，致华岳山崩。安石曰：“华山之变，殆天意为小人发。市易之起，自为细民久困，以抑兼并耳，于官何利焉？”阅其奏，出彦博守魏。于是吕公著、韩维，安石藉以立声誉者也；欧阳修、文彦博，荐已者也；富弼、韩琦，用为侍从者也；司马光、范镇，交友之善者也；悉排斥不遗力。

礼官义正太庙太祖东向之位，安石独定议还僖祖于祧庙，议者合争之，弗得。上元夕，从驾乘马入宣德门，卫士诃止之，策其马。安石怒，上章请逮治。御史蔡确言：“宿卫之士，拱扈至尊而已，宰相下马非其处，所应诃止。”帝卒为杖卫士，斥内侍，安石犹不平。王韶开熙河奏功，帝以安石主议，解

所服玉带赐之。

七年春，天下久旱，饥民流离，帝忧形于色，对朝嗟叹，欲尽罢法度之不善者。安石曰：“水旱常数，尧、舜所不免，此不足招圣虑，但当修人事以应之。”帝曰：“此岂细事，朕所以恐惧者，正为人事之未修耳。今取免行钱太重，人情咨怨，至出不逊语。自近臣以至后族，无不言其害。两宫泣下，忧京师乱起，以为天旱更失人心。”安石曰：“近臣不知为谁，若两宫有言，乃向经、曹俏所为耳。”冯京曰：“臣亦闻之。”安石曰：“士大夫不逞者以京为归，故京独闻此言，臣未之闻边。”监安上门郑侠上疏，绘所见流民扶老携幼困苦之状，为图以献，曰：“旱由安石所致，去安石，天必雨。”侠又坐窜岭南。慈圣、宣仁二太后流涕谓帝曰：“安石乱天下。”帝亦疑之，遂罢为观文殿大学士、知江宁府，自礼部侍郎超九转为吏部尚书。

吕惠卿服痊，安石朝夕汲引之，至是，白为参知政事，又乞召韩絳代己。二人守其成模，不少失，时号絳“传法沙门”、惠卿为“护法善神”。而惠卿实欲自得政，忌安石复来，因郑侠狱陷其弟安国，又起李士宁狱以倾安石。絳觉其意，密白帝请召之。八年二月，复拜相，安石承命，即倍道来。《三经义》成，加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以子雱为龙图阁直学士。雱辞，惠卿劝帝允其请，由是嫌隙愈著。惠卿为蔡承禧所击，居家俟命。雱风御史中丞邓綰复弹惠卿与知华亭县张若济为奸利事，置狱鞠之，惠卿出守陈。

十月，慧出东方，诏求直言，及询政事之未协于民者。安石率同列疏言：“晋武帝五年，慧出轸；十年，又有李。而其

在位二十八年，与《乙巳占》所期不合。盖天道远，先王虽有官占，而所信者人事而已。天文之变无穷，上下傅会，岂无偶合。周公、召公，岂欺成王哉？其言中宗享国日久，则曰‘严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不敢荒宁’。其言夏、商多历年所，亦曰‘德’而已。裨灶言火而验，欲襁之，国侨不听，则曰‘不用吾言，郑将又火’。侨终不听，郑亦不火。有如裨灶，未免妄诞，况今星工哉！所传占书，又世所禁，謄写伪误，尤不可知。陛下盛德至善，非特贤于中宗，周、召所言，则既阅而尽之矣，岂须愚瞽复有所陈。窃闻两宫以为忧，望以臣等所言，力行开慰。”帝曰：“闻民间殊苦新法。”安石曰：“祁寒暑雨，民犹怨咨，此无庸恤。”帝曰：“岂若并祁寒暑雨之怨亦无邪？”安石不悦，退而属疾卧，帝慰勉起云。其党谋曰：“今不取上素所不喜者暴进用之，则权轻，将有窥人间隙者。”安石是其策。帝喜其出，悉从之。时出师安南，谍得其露布，言：“另作青苗，助役之法，穷困生民。我今出兵，欲相拯济。”安石怒，自草敕榜诋之。

华亭狱久不成，雱以囑门下客吕嘉问、练亨甫共议，取邓綰所列惠卿事，杂他书下制狱，安石不知也。省吏告惠卿于陈，惠卿以状闻，且讼安石曰：“安石尽弃所学，隆尚纵横之末数，方命矫令，罔上要君。此数恶力行于年岁之间，虽古之矢志倒行而逆施者，殆不如此。”又发安石私书曰“无使上知”者。帝以示安石，安石谢无有，归以问雱，雱言其情，安石咎之。雱愤惠，疽发背死。安石暴綰罪，云“为臣子弟求官及荐臣婿蔡卞”，与亨甫皆得罪。綰始以附安石居言职，地石与吕惠卿相倾，綰极力助攻惠卿。上颇厌安石所为，綰

惧失势，屡留之于上，其言无所顾忌；亨甫险薄，谄事雱以进，至是皆斥。

安石之再相也，屡谢病求去。及子雱死，尤悲伤不堪，力请解几务。上益厌之，罢为镇南军节度使，同平章事，判江宁府。明年，改集禧观使，封舒国公。屡乞还将相印。元丰三年，复拜左仆射，观文殿大学士。换特进，改封荆。哲宗立，加司空。

元祐元年，卒，年六十六，赠太傅。绍圣中，谥曰“文”，配享神宗庙庭。崇宁三年，又配食文宣王庙，列于颜、孟之次，追封舒王。钦宗时，杨时以为言，诏停之。高宗用赵鼎、吕颐当问言，停宗庙配享，削其王封。

初，安石训释《诗》、《书》、《周礼》，既成，颁之学官，天下号曰“新义”。晚居金陵，又作《字说》，多穿凿附会，其流入于佛、老。一时学者，无敢不传习，主司纯用以取士，士莫得自名一说，先儒传注，一切废不用。黜《春秋》之书，不使列于学官，至戏目为“断烂朝报”。

安石未贵时，名震京师，性不好华腴，自奉至俭，或衣垢不浣，面垢不洗，世多称其贤。蜀人苏洵独曰：“是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慝。”作《辩奸论》以刺之，谓王衍、卢杞合为一人。

安石性强怯，遇事无可否，自信所见，执意不回。至议变法，而在廷交执不可，安石傅经义，出己意，辩论辄数百言，众不能离。其者谓“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罢黜中外老成人几尽，多用门下儇慧少年。久之，以旱引去。洎复相岁余罢，终神宗世不复召，凡八年。子雱。

苏轼传

——《宋史》卷三三八

【说明】苏轼（1037—1101），宋代文学家、书画家。字子瞻，一字和仲，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人。苏洵之子。神宗时曾任祠部员外郎，知密州、徐州、湖州。因反对王安石新法，被贬黄州。后曾任翰林学士，官至礼部尚书。又贬惠州，儋州。卒谥文忠，与父苏洵、弟苏辙并称“三苏”。

苏轼为一代文学大家，在诗、词、散文等方面成就很高。其诗清新豪健、想象丰富，善用夸张比喻，在艺术上独具风格，写景诗和理趣诗最为脍炙人口。其文明白畅达，汪洋恣肆，发展了欧阳修平易舒缓的文风，为“唐宋八大家”之一。其词气势豪迈、笔力劲拔，在题材、体制和风格上都突破了词必香软的樊篱，开豪放一派，为词体的长足发展开拓了道路。

苏轼于书画方面也颇有造诣，其书法肉丰骨劲，跌宕自然，为“宋四家”之一。论画卓有所见，主张“神似”、“传神”，提出“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观点，在画史上有一定地位。善画竹石，学文同而风格独具。诗文有《东坡七集》。

苏轼，字子瞻，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十岁的时候，父亲苏洵去四方游学，母程氏亲自教授苏轼读书，凡是听到古往今来成败兴衰的历史故事，苏轼总是能够概括地说出它们的要点。程氏读东汉《范滂传》，感慨叹息，苏轼就说：“我如果做范滂，母亲允许吗？”程氏说：“你能够做范滂，我反而不能做范滂母亲吗？”

等到成年，博通经史，一天能写几千字的文章。他喜欢贾谊、陆贽的书，不久读《庄子》，感叹说：“我从前虽然有这种看法，嘴巴里却说不出，今天看到了这本书，正适合我的心意呀！”嘉佑二年（1057），参加礼部考试。在当时科举应试的文章中，割裂文辞，追求怪异的流弊占了上风，主考官欧阳修正思考用怎样的方法来挽救文风，看到苏轼的《刑赏忠厚论》，十分惊喜，想把这位考生选拔为第一名，但怀疑文章是他的门客曾巩写的，所以只是取为第二等；后来苏轼又凭《春秋》对义得居第一等，殿试时中了乙科。考试完了，苏轼写了名帖去拜见欧阳修，欧阳修对梅圣俞说：“我当设法避开这个人，让他出一头地。”听到此话的人开始哗然不服，以后就信服了。

后来苏轼遭到母亲去世之痛，归家守丧。嘉佑五年（1060），调福昌（今河南宜阳）主簿。欧阳修认为苏轼才识兼茂，就推荐他到秘阁去。以前考试《六论》是不起草的，所以文章都写得不精致。苏轼开始起草，辞章义理都十分鲜明。又对制策，列入三等。从宋初以来，制策能列入三等的：只有吴育和苏轼而已。

除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今属陕西）判官。关中自从

元昊叛乱以后，百姓贫困，赋役繁重，岐下人民每年运输南山木筏，从渭水出发转入黄河，经过砥柱天险，衙吏们催逼役赋，一个紧接一个，几乎把老百姓的家都踏破了。苏轼了解了这件事的危害性，因此重新修定了衙规，让百姓自己去选择水工，按时进退，从此，役害减去了不少。

治平二年（1065），入判登闻鼓院。英宗当年在藩府的时候就听到了苏轼的名声，因此想模仿唐王朝的成例召他入翰林，知制诰。宰相韩琦说：“苏轼之才，是大器之才，以后自然被天下重用。重要的是朝廷要培养他，使天下的读书人没有一个不敬畏、羡慕、心服他，都希望朝廷进用他，然后才录取他、任用他，那么就人人不会有不同的意见了。如果现在骤然重用他，那么天下的读书人未必以为这是对的，皇上这样做的结果反而连累了他。”英宗说：“那么就给他一个修注怎么样？”韩琦说：“记注和制诰是相近的，不可贸然任命。不如在馆阁中选择一个能够接近皇上的帖职给他，而且请皇上先召他来面试一下。”英宗说：“如果面试，不知他行不行，假如苏轼也有不会的怎么办？”韩琦还是不同意，等到试他二论，又列入第三等，可以任职史馆。苏轼听到了韩琦的这些话后，说：“韩公真可说是用德来爱护人才了。”

恰巧苏洵去世，英宗赐给苏轼钱帛以帮助他办理丧事，苏轼辞谢了，但要求追赠父亲一个官职，于是英宗就追赠苏洵为光禄丞。苏洵临终时，把哥哥苏太白去世早，他的子孙还没有自立，妹妹嫁给姓杜的人家，去世后还没有下葬，都一一托付给苏轼。苏轼服丧期满，立即殡葬了姑母。后来苏轼的官做大了，可以荫及子孙了，他就把这个特权让给了苏太

白的曾孙苏彭。

熙宁二年（1069），苏轼回到朝廷。当时正是王安石做宰相，王安石平常就讨厌苏轼政见和自己不同，于是就让苏轼判官告院。熙宁四年（1071），王安石想改变科举、兴建学校，诏两制、三馆讨论。苏轼上书议论说：

求得人才的途径，在于了解人才；了解人才的办法，在于求其实。假如国君和宰相有知人之明，朝廷有求实之政，那么胥史皂隶中未常没有人才，何况在学校和贡举中呢？虽然沿袭目前的做法，我认为人才还会有余。假如国君和宰相不了解人，朝廷不去求实，那么即使在公卿侍从之中也常常会担心没有人才，何况在学校和贡举中呢？虽然恢复了古代的学校制度，我认为人才还是会不足的。时代有好或坏，事物有废和兴，当时代安定，虽然暴君也不能废毁它，等到它已是倾颓的时候，就是圣人也无法恢复它。所以风俗变化了，法律和制度也要跟着变。就像大江大河的改道，勉强要它恢复原来的样子，是很难为力的。

庆历年间本来曾经建立过学校，但是直到今天，只有空名还存在着。现在要改变今天的礼制，变更今天的风俗，又要征发民力来整修官室，聚敛百姓的财富来供养那些游士。百里之内设置官府建立军队，狱讼在那里治理，军务在那里谋划，又要精简那些不受统领的官员，把他们摒弃到远方，那不是人为地制造纷乱，给天下人民造成苦难吗？如果没有多大的改革而又希望对时代有益，那么和庆历年间的建立学校又有什么不同呢？所以

我认为今天的学校，尤其应该沿用过去的制度，让先王所创的旧业，不至于在我们这一代被废弃就够了。至于贡举这种办法，已经施行百年了，国家的治乱盛衰，原因并不是因为有了贡举。皇上看祖宗的时代，贡举这办法，和今天相比究竟是哪个好？言语和文章，和今天相比究竟谁个优？得到的人才，和今天相比究竟哪个多？天下的事情，和今天相比究竟谁会办？比较了这四件事情的长短，那么就可以对议论作出决定了。

现在想改变的不过是几桩小事：有人说乡举应该以德行为本而略去文词；有人说应该专取策论而免去诗赋；有人却希望兼采名誉声望而废除糊名弥封的考试办法；有人则希望经生不考帖经而考大义，这些都是知其一而不知其二的论调啊。希望皇上能注意长远的、大的事情，而小小的变法又何必去干预呢？我还有一个经常挂在心上的私忧，也许只是错误的想法，但还是想对皇上陈说：关于性命的学说，从子贡开始都没有听到过夫子的阐释，而今天的学者，却偏偏把不谈性命看成是耻事，读他们的文章，感到大而无当而难以穷尽；看他们的样子，似乎超然物外无所黏著而不可留取，这难道是真的有才能吗！原来是那些只有中人资质的人，却偏偏在那里安于放任，乐于荒诞罢了。皇上又为什么要用他们呢？

奏议呈上，神宗醒悟了，就说：“我原来就怀疑这个改革，读了苏轼的奏议，思想就完全清楚了。”当天就召见了苏轼，问道：“目前朝廷政事、法令的得和失在什么地方？即使是我的过失，你也只管说就是了。”苏轼回答道：“皇上有生而知

之的天性，文武天成。治国之道，不怕不明，不怕不勤，不怕不果断，就只怕求治心太急，听的意见太泛，进用的人才过快过多。希望皇上能用安静来镇急躁，静待物之自来。然后适应它。”神宗惊恐地说：“你这三句话，我应当牢牢记住，好好思量。你在馆阁，应该替我好好考虑治乱的措施，不要有什么隐藏。”苏轼退出后，就把神宗的话告诉了同僚们。王安石不高兴，就让苏轼任开封府推官，想用繁忙的政事来束缚他。怎知苏轼处理政务果断、精确、敏捷，结果是名声传播得更远。时逢上元佳节将到，朝廷下令开封府到浙江买灯，并且命令要压低收购价格。苏轼上书说：“皇上难道是把看灯作为快乐吗？这不过是用元宵放灯来侍奉两宫的欢心罢了！然而皇上的这份孝心，百姓却是不会知道的，因此他们都认为皇上是用耳目不急的玩物，去夺取他们口中和身上急需要用的资财。这件事本来很小很小，但它牵涉的事体却很大，请皇上追还以前的命令。”神宗就下诏取消了此事。

当时王安石创行新法，苏轼上书评论新法的不利。书中说：

我想说的话，只三句罢了：希望皇上能结人心，厚风俗，存法度。人君所依靠的就是人心，这就像树木有根，灯盏有油，鱼儿有水，农夫有田，做生意的人有钱财。失掉了人心，国家就灭亡，这是必然的道理。自古以来，没有人君平和、简易、随俗、同众而国家不安定，也没有人君刚愎自用而国家不危亡的。皇上一定也知道人心为什么会不高兴的道理了。

从祖宗以来，理财用的不过是三司。现在皇上不把

理财用的事交付给三司，无故又创设制置三司条例一司，让六、七个年轻人，日夜在里面空自议论，又让四十多个使者分别到全国各地推行。再说制置三司条例司这个司，不过是为求利而新设的名称罢了；六、七个年轻人和四十多个使者，不过是求利的工具罢了。开端的声势很宏大，百姓却实在惊疑；创立的法式很新奇，官吏们却个个惶惑。以万乘之尊的君主而谈利，以天子的宰相而理财，人们对此议论纷纷，意见不一，然而却没有人愿意回过头去看看这种情况，听听朝中大臣和天下百姓的反映，只是说：“我没有那种事，何必担心别人的议论。”把鱼网撒在江湖中，对人却说：“我不是为了捕鱼”，还不如扔掉鱼网而别人自然会相信。驱逐鹰犬奔赴丛林，对人却说：“我不是在打猎”，还不如遣散鹰犬而野兽自然会驯服。所以我认为要消除邪恶的谗言而招来和气，那末不如罢去条例司。

现在君臣勤于政务，几乎一年了，而富国的功效，却茫茫然犹如捕风，只听说内库拿出了数百万缗钱，祠部投入了五千多个人罢了。用这样的方法进行改革，有谁能？而所做的事，路上的行人都知道它很困难。汴水水流混浊，自有人民以来，都不用它种稻。今天却想用筑水库令汴水变法。万顷水稻，必需用千顷水库的水来灌溉，这些水库一年淤塞一次，三年就全部塞满了。皇上却相信了他们的说法，立即就派了人去观察地形，所在地区的人民就要替这些使者开通道路，使者们在这些地区寻访水利，但他们中不少人都是浅薄轻飘之徒，他

们不负责任轻率地争着发表自己的看法。官府虽然知道这些意见漏洞很多，但是却不敢立即贬退，而是召集了老老少少，让他们来观察研究，决定可否。如果不是明显的难以实行，就一定要征集民工兴建。官吏们得过且过，以轻率马虎的态度顺从着，不了解情况的人还真以为皇上有心要兴建这些工程，结果是上面浪费了钱粮，下面影响了农时。堤防一开掘，水流失去了它原来的故道，必然泛滥，这个时候，虽然让百姓吃这些提议的人的肉，对百姓又有何补益呢！我不了解朝廷何苦要这样做呢？

自古以来，凡使用役夫，一定是使用当地的百姓。现在听说要到江苏、浙江之间的几个郡去雇用役夫，而且想把这种办法推行到全国各地。只有一个成年男子的家庭，没有男子而只有妇女的家庭，是百姓中最困苦的，而皇上却第一个想役使他们！皇上富有天下，难道就忍心不加怜悯！自从杨炎实行两税法，租、调和庸已经合在一起了，为什么还想再取庸？万一后代不幸出现了喜欢聚敛的臣子，庸钱不去除，差役都照旧，追究这种做法是从哪里来的，就一定有承担这种罪责的人。青苗的时候向农民放债，自古以来都是禁止的。现在却由皇上开始创立成法规，每年执行。虽然说不允许强行摊派，但几世以后，暴君污吏，皇上能保证不出现这种现象吗？估计愿意请求贷青苗钱的人家，一定是些孤苦贫弱无人接济的人家，官吏鞭挞过急，那末一定接着逃亡，如果不回来，他们的拖欠就要均摊到邻保身上，这种情况必然会出现，到那时，天下百姓怨恨这件事，国史记载这件

事，说：“青苗钱是从皇上开始的。”这难道不可惜吗！再说建立常平仓的制度，应该说已经考虑得很周到了，现在却想改为青苗钱！破坏了常平仓制度，建立了青苗钱制度，丧失的只会更加多。亏损了官府，损害了人民，虽然后悔又如何来得及。

从前汉武帝因为财力枯竭，用商人桑弘羊的建议，买贱卖贵，称它为均输。在那个时候，商人们停业不干，盗贼益发猖狂，几乎要发生动乱。汉昭帝即位，霍光顺着百姓的愿望，百姓想要的，就给他们，百姓因此归心，国家于是无事。没想到今天这种论调又产生了。立法的初期，耗费已经很多了，即使稍有所获，而由国家征收的商业税的数额，损失一定很多。这就像有人为他的主人管理牲畜，用一条牛换了五只羊，一条牛失去了，就隐瞒着不说；五只羊换到了，就指为自己的功劳。现在破坏了常平仓而不谈青苗法的功劳，亏损了商业税而得到了均输法的利益，同上面所说的用一条牛换五只羊的例子又有什么两样？我私下认为它甚至比用一条牛换五只羊更蠢呀！倡议新法的人一定会说：“百姓可以和他们快乐地享受成功，而难以和他们谋虑开始。”所以皇上执意不顾一切，而规定必需推行。这个恰恰是战国时代那些贪功的人所推行的冒险和侥幸的政治主张。结果必然是还没有享受到成功的喜悦，而百姓的怨声却早已四起了。我之所以希望皇上结人心的道理，就在这里呀！

国家之所以存亡的原因，在于道德的浅深，不在国力的强弱；一个朝代享国时间所以有长有短，在于社会

风俗的淳厚和浅薄，不在社会的富和穷。做人主的知道了这个道理，就会知道孰轻孰重了。所以，我希望皇上务必推崇道德，看重风俗，不希望皇上急于事功，贪图富强。爱惜风俗，就像保护人的元气。圣人不是不知道严峻刻薄的方法可以齐聚众心，勇猛强悍的人士可以成就事业，忠厚的人近于迂阔，老成的人开始好像迟钝。然而圣人却始终不肯用那种人来替代这种人，是什么原因呢？这是因为圣人知道那样做的结果得到的小，失去的大啊！仁祖皇帝执法非常宽，能按照规定的等级次第和劳绩大小进用官员，专门替人掩盖过失，未曾轻易改变旧的规章。考察他事业的是否成功，应该说还没有达到最高的境界。如果说到用兵，那么十次出兵有九次必失；如果说到国家的财政，只是仅仅能够足用而没有积余。他只是把德政和恩泽施信人民，使社会风俗能知道遵守一定的道德标准，所以他去世的时候，天下终于返回到仁的局面了。评论的人看到在他晚年官吏都恪守成规而不知变更，对政事都不思奋发有为，有所创举，就想用苛察来矫正它，用智能来齐一它，他们招来了新进勇锐的人，企图使朝廷的一切措施都能很快收到功效。结果是还没有享受到它的成功，而浅薄之风气已经形成。他们又开了很多能骤然进身的门路，这样就使人们容易得到意外的侥幸收获，公卿侍从只要稍稍抬举半步就可得到好处，这样就使那些原来按照正常制度调升的人产生了非分之想，在这样的情况下，希望风俗淳厚，能做到吗？近年来朴拙的人愈来愈少，靠投机取巧而进身的读书人

愈益增多。惟请皇上可怜这种情况，挽救这种情况，把简易作为治政的法则，把清静作为立国的指导思想，这样人民的道德就可以归于淳厚。我之所以希望皇上重视社会风俗的道理，就在这里啊！

祖宗委任了谏院的官员以后，就没有开罪过一个言官。即使有轻微的责任，随即也就越级提升了他们，允许他们可以根据风闻就议论朝政，而不必顾及官长。在议论中涉及到帝王，那末天子就要改变神色；议论中涉及朝廷，那末宰相就要等候处分。做台谏的人本来未必都是贤人，他们讲的话也未必都正确，然而一定要培养我们的锐气，之所以要借给他们以重权，难道是白白地这样做的吗？是想用他们的权力不让奸臣萌生啊！现在法令严密，朝廷也很清明，说有奸臣，是万万没有这个道理的。然而养猫本来是为了灭鼠，不可以因为没有老鼠就养不捕捉老鼠的猫；养狗本来是为了防盗，不能因为没有盗贼就饲养不叫的狗。皇上你能够不上念祖宗创设谏官的原意，下为子孙万世设防吗？我听那些德高望重的长老们谈论，都说谏官们的言论，常常是根据天下人的公议而发的。公众的议论是赞美的，台谏也就赞美它；公众的议论是抨击的，台谏也就抨击它。现在公众的议论沸腾，怨言交互而来，公众的意见所在，也就可以知道了。我担心从此以后，习惯成风，都成了宰相的私人，以致君上孤立。朝廷的法度一旦废弛，什么事情不会发生呢？我之所以希望皇上保存法度的道理，也就在这里啊！

苏轼看到王安石用独断专任来赞美神宗，就借考试进士策问的机会，用“晋武帝靠独断平定东吴而取得胜利，后秦苻坚用独断讨伐东晋而失败，齐恒公专任管仲而成就了霸业，燕哱专任子之而败亡，事情相同而成效不同”为问。王安石大怒，让御史谢景温劾奏苏轼的过错，搞得很凶，却一无所获。苏轼就自请外放，通判杭州。高丽（今朝鲜）来向中国进贡，使者在官吏面前打开礼物时，官吏们发现礼单上面用了甲子纪年。苏轼拒绝接受，说：“高丽对我们大宋是称臣的国家，而礼单上却不写明中国的年号，我怎么敢接受！”使者改甲子为熙宁，苏轼才接受了。

当时新政日益推行，苏轼在这中间，常常用变通的办法以方便百姓，百姓依靠这种变通才得以安定。后来调任密州（今山东诸城）。当时司农推行手实法，不按时推行的人以违背制度论处。苏轼对提举官说：“违背制度的罪名，如果是从朝廷规定下来的，谁敢不听从？现在只是司农决定的，这是擅自制定法律啊！”提举官吃惊地说：“您老姑且慢慢看着办吧！”没有多久，朝廷知道这个手实法实在是在害民，就取消了。

有个强盗的盗窃案子暴露了，安抚司派三班使臣带领着强悍的差役下乡捕捉，这些差役凶恶残暴，肆意横行，甚至用禁物来诬陷百姓，他们随便冲进老百姓家打人杀人，后来就畏罪逃跑，快要造成乱子了。百姓们奔赴官府向苏轼告状，苏轼故意把他们的诉状放置一边，看也不看地说：“一定不至于这样。”那些溃逃中的差役听到了，稍稍安定了下来，苏轼慢慢地派人把他们引出来杀了。

后来调任徐州（今属江苏）。当时正值黄河在曹村决口，泛滥到梁山泊，溢满了南清河，汇聚到了徐州城下，水势还在暴涨，如果不及时排泄，徐州城就将坍倒，城里的富户纷纷争着出城避水。苏轼说：“富户一旦出城，城里的百姓就都会动摇，我和谁来共同守城？只要我在徐州，就一定不让洪水冲倒徐州城。”于是把那些富户又赶进了城内。苏轼亲自趟水到武卫营中，唤来了卒长说：“黄河水将要败坏徐州城了，事态急了，虽然你们是禁军，也要请你们尽力帮助我。”卒长说：“太守尚且不躲避大水，我辈是小人，当然更该效命。”就带领了他的士兵拿着畚箕和铁锤奔了出去，修筑了东南的长堤，从戏马开始，一直到徐州城为止。暴雨日夜不停，城墙不被淹没的只有三板了。苏轼住在城墙上临时搭的小屋里，就是经过自己家门也不进去，派官吏们分段堵塞洪水，保护徐州城，最后终于保全了徐州城。苏轼又请求朝廷同意征调一年中应该征发的役夫增筑徐州攻城，造木岸，以防止洪水的再次袭击。朝廷依从了他的请求。

后又徙知湖州（今属浙江），苏轼上表谢恩。又因为对朝廷那些不利于民的措施不敢大胆直言，于是用诗歌寄托讽谏，希望对国家有所补益。御史李定、舒亶、何正臣拾取苏轼表中的一些话，并且和他的诗歌联系起来，进行诬陷，说苏轼是在讪谤朝廷，把他逮捕押解到了台狱，想置他于死地，枉法诬陷，罗织罪名，拖了很长时间也无法断决。唯独宋神宗怜惜他，以团练副使的名义把他安置到了黄州。苏轼和田夫野老，一起玩于山水之间，苏轼还在东坡那里造了房子，自号为“东坡居士”。

熙宁三年（1071），宋神宗几次有意重新起用苏轼，总是被掌握大权的人阻挡了。神宗曾经对宰相王珪、蔡确说：“国朝的历史至关重要，可以任命苏轼把它写出来。”王珪面有难色。神宗说：“苏轼不行，姑且用曾巩。”曾巩进《太祖总论》，神宗感到不妥当，就写了亲笔信命令把苏轼移到汝州（今河南临汝）。其中有这样的话：“苏轼被贬黜后，闭门思过，经历的岁月很长了，人才实在难得，不忍心终身让他弃置在外。”苏轼没有去汝州，上书说自己处境饥寒，有田产在常州，希望能回常州定居。早上上的奏书，傍晚就被批准了。

路过金陵（今江苏南京），苏轼去见了王安石，他对王安石说：“大的兵灾、大的狱讼，是汉朝、唐朝灭亡的先兆。祖宗用仁厚治理天下，正是希望革除这种情况。现在对西方的用兵，连年不断，东南又屡次兴起大的狱讼，明公为什么不说一句挽救这种危局的话呢？”王安石说：“这两件事都是吕惠卿挑起的，我王安石身在外，怎敢随便说话？”苏轼说：“在朝廷就议政，在朝外就不说，这不过是侍奉君王的常礼罢了。现在皇上对待明公不用常礼，明公对待皇上悖难道可以用常礼吗？”王安石厉声地说：“王安石必需说。”又说：“话出在我王安石的嘴里，听在你苏子瞻的耳内。”又说：“一个人必需知道做一件不义的事，杀一个无罪的人，即使能得到天下也不去做，才可以同他相交。”苏轼开玩笑地说：“现在的君子，为了争着减少半年的磨勘年限，虽然叫他杀人也是肯干的。”王安石笑而不言。

苏轼回到常州，正值神宗驾崩，哲宗即位，又恢复苏轼为朝奉郎、知登州（今山东蓬莱），不久又召为礼部郎中。苏

轼过去和司马光、章惇相好。当时司马光是门下侍郎，章惇知枢密院，二人意见不合，章惇常常用开玩笑的方式轻慢留难司马光，司马光很苦恼。苏轼对章惇说：“司马君实现在在人们中的声望很高。从前许靖因为徒有虚名没有实际，被蜀先主瞧不起，法正说：‘许靖的声誉，传播天下，如果不给他礼遇，你一定会因为瞧不起贤才而受到麻烦。’先主采纳了他的意见，就加封许靖为司徒。许靖尚且不可轻慢，何况君实呢？”章惇认为很对，司马光赖此得以稍安。

迁为起居舍人。苏轼经历了一番忧患，不希望骤然踏进要地，就向宰相蔡确推辞。蔡确说：“明公徊翔久了，朝中人士没有一个能比得上你的。”苏轼说：“从前我和林希同在馆阁之中，而且他的年纪比我长。”蔡确说：“林希一定要先于明公吗？”终于不同意苏轼的推辞。元佑元年（1086），苏轼以七品服入侍延和，皇上即赐银绯，迁中书舍人。

当初，祖宗时，差役法实行长久后产生了流弊。编户充当役夫的人不习惯服役，役头又用暴虐的方法役使他们，造成编户大量破产，狭乡的百姓甚至有终年不得休息的。王安石做宰相后，改差役法为免役法，使编户按等级的高低出钱雇用役夫，执法的人常常超过标准索取，成为人民的祸害。司马光做了宰相，只知道免役法给人民带来的灾害，而不知道它也有有利的一面，就想恢复差役法，派遣官员去筹备设置机构，苏轼也被派参与了这个工作。苏轼说：“差役法、免役法，各有利弊。免役法的流弊，在于聚敛百姓的钱财，以至十室九空，上面聚敛了很多钱财，下面给人民带来了钱荒的灾难。差役法的流弊，在于人民常在官府服役，不得专力农

耕，而贪暴的官吏和奸猾的差役得以借此做坏事。这二种役法给人民带来灾难的轻重，大概是相等的。”司马光说：“那末，以你看这件事情应该怎么办呢？”苏轼说：“一切政策法令，前后应该互相衔接，这样事情就容易办成，做一件事情，一点一点地逐步进行，那末百姓就不会受到惊扰。夏、商、周三代的办法，是士兵和农夫合而为一，到秦王朝才开始一分为二，到了唐朝中叶，又把府兵制改成了募兵制，士兵一生都在军队里。自从那时以来，民不知道兵，兵不知晓农，农民拿出粮食和布帛来养兵，士兵拿出性命来保卫农，天下人民都感到方便。虽然圣人再出，也不能改变这个办法。今天的免役法，其实和上面所说的差不多。明公想骤然取消免役法实行差役法，就正像要取消长征的兵而恢复民兵，这是不容易的呀！”司马光不以为然。苏轼又把这些看法在政事堂上陈说，司马光很生气。苏轼说：“从前韩琦指责陕西义勇，您为谏官，争论得很厉害，韩公不高兴，您也不顾。我从前听您详细地讲过这个故事，难道今天您做了宰相，就不允许我把话讲完了吗？”司马光笑了，不久任命苏轼为翰林学士。

哲宗二年（1087），苏轼兼侍读。他每次进宫侍读，当读到治乱兴衰、邪正得失的时候，总是反复开导，希望皇上得到启发有所领悟。哲宗虽然恭默不语，但总是点头肯定了苏轼的看法。他们曾经拜读祖宗《宝训》，因而涉及时事，苏轼一个问题一个问题进行分析说：“现在是赏罚不明，善和恶没有人勉励和阻止；又黄河的水势正向北方流，却要强迫它向东流；西夏入侵镇戎（今宁夏固原），屠杀和掳掠了几万人，统兵的主帅却不把消息报告朝廷。如果每件事情都像这样，我

担心会逐渐地造成衰乱的加剧。”

苏轼经常闭门锁居禁中，有次被召入对便殿，宣仁皇后问他：“你以前是做什么官？”苏轼说：“臣是常州团练副使。”又问：“现在是什么官？”回答说：“臣现在是待罪翰林学士。”宣仁后又问：“你怎么会从团练副使这样迅速就做了翰林学士呢？”苏轼说：“因为受到了太皇太后和皇帝陛下的恩典啊！”宣仁后说：“不是的。”苏轼便反问道：“难道是大臣们的舆论推荐了我吗？”宣仁后说：“也不是的。”苏轼吃惊地说：“臣虽然没有规矩，但是也不敢从其它通途进身翰林。”宣仁后说：“这是先帝的旨意呀！先帝每次读到你的文章，总是感慨地说：‘奇才，奇才！’只是没有来得及晋用您就是了。”苏轼不禁失声痛哭，宣仁后和哲宗皇帝也哭了起来，左右的人也都个个感动得流出了眼泪。随后，宣仁后和哲宗命苏轼坐下并赐茶，最后让太监取下御前的金莲烛照送苏轼归院。

哲宗三年（1088），苏轼权知礼部贡举。恰巧大雪纷飞，天气奇冷，考生们端坐庭中，都冻得不能说话。苏轼放宽了原来那些严格的规定，让考生们能尽量发挥自己的才能。巡视考场的一些内侍们常常挑剔和侮慢考生们，还拿了意思比较暧昧的单词，以此诬蔑考生们有罪，苏轼把这种情况统统报告了宋哲宗，赶走了这些讨厌的巡场内侍们。

神宗四年（公元1089年），苏轼因为议论朝政多了，被执掌大权的大臣所忌恨。苏轼担心会不被见容，要求外拜龙图阁学士、知杭州。还没有起行，谏官告发前宰相蔡确知安州时写诗借郝处俊的事件讥刺太皇太后。大臣们在议罪中认为应该迁谪到岭南。苏轼给皇帝上了一道密疏说：“朝廷如果

从轻处理蔡确的罪行，那么对于皇帝来说，孝治就显得不够；如果从重处置蔡确的罪行，那么对于太皇太后的仁政就会带来小小的影响。我认为应该由皇帝下令设置专案，专门处理这个案件，而由太皇太后再写一道手诏赦免他，那么于仁于孝就可两全了。”宣仁看后心里赞赏苏轼的建议，但却没有用这个办法。苏轼车马出京郊，皇上用对待前执政大臣的恩例，派遣内侍赐给苏轼龙荣、银合，慰劳非常丰厚。

苏轼回到了杭州，恰巧碰上大旱、饥荒和瘟疫等几种大灾疫同时并作。苏轼向朝廷提出请求，免除本路上供大米三分之一，又得到了朝廷赐予的度僧牒，把它换了粮食以赈济灾民。第二年的春天，又减低价格出售常平仓的粮食还煮了很多粥和药剂，派人带着医生分别到各个街坊为灾民治病，被救活的人很多。苏轼说：“杭州，是水陆的交会处，因此遭疫病而死的也常常要比其它各处多。”苏轼还收集多余的钱款，一共得到了二千缗，又打开口袋取出五十两黄金，专门造了一个病房，稍稍蓄积了些钱粮，准备着给饥民治病之用。

杭州本来靠近海，地下水既咸又苦，居民很少。唐代刺史李泌才开始汲取西湖的水，开掘了六口井，人民的用水才丰足。白居易又疏通西湖，使湖水流入漕河，再从漕河引入农田，被灌溉的农田有千顷，人民因此富足。湖水中多茭白根，自唐朝到钱氏，每年都要疏浚整治，宋代开国以后，不再对它整治疏浚，因此杂草丛生，湖水干涸，形成为葑田，湖水没有多少了。漕河没有了湖水，就取浙江的潮水，漕船在杭州城市中心行驶，潮水中又多淤泥，每三年要淘掘一次漕河水道，成为人民的一大祸害。李泌造的六口大井，这时也

几乎成了废井。苏轼看到茅山有条河专门承受浙江的潮水，而盐桥的一条河却专门容纳西湖的湖水，于是就开通了这二条河道以通漕运。又建造了堰闸，作为蓄积和疏泄湖水的闸门，使浙江的潮水不再进入市中心。还用剩余的力量修复了那六口废井。又把积在湖中的葑田，前后贯通起来，修筑了南北直径长达三十里的堤岸，方便市民的通行。吴地人民种菱，春天总是统统除去，不留寸草。苏轼就招募人在西湖中种菱，这样茭白根就生长不起来了。种菱的收入用来准备修竣湖堤，采用救济灾荒的余钱万缗、粮食万石，以及请得百僧度牒，用来招募役夫。长堤修成后，在湖中种荷花，在堤上种杨柳，远远望去就像一幅美妙的图画，杭州人命名它为苏公堤。

杭州有个和尚叫净源，过去住在海滨，和外国海客交通，海船到了高丽，众口一辞地赞美他。元丰（1078~1085）末年，高丽国王的王子义天来朝见宋王朝，净源也去拜访过他。到现在，净源死了，他的徒弟窃 取了他的画像，乘了海船去高丽报告高丽王的儿子，义天也派了他的手下人来祭祀净源，并拿了他们国母的二座金塔，说是祝大宋皇帝两宫的寿辰。苏轼不收，并向哲宗上奏说：“高丽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向朝廷进贡了，失去了大宋朝廷恩赐给他们厚利的机会，现在又想来朝见，但是又摸不透我们对待他们态度的厚薄，所以借着祭死去的净源和尚的名义而向在宋朝廷行祝寿的礼。我们如果接受了他们的礼物而不回谢，他们一定会产生怨恨的心，如果接受了他们的礼物而又赐给他们厚礼，那么正中他们的计策。现在应该不让他们了解朝廷的态度，让州郡自己去处理这件事。那个愚蠢的和尚扰乱通高，替国家惹起事端，防微

杜渐，此风不可长，应当痛加惩处。”朝廷都依从了苏轼的奏议。没有多久，高丽的贡使果然到了，按旧例，高丽使者所到的吴越七州，应该支出二万四千余缗的接待费。苏轼命令这些州郡根据具体情况酌量裁减。这样一来，七州的百姓得到了物资交易的利益，而再没有侵扰的灾害。

浙江的潮水从海门东来，势如雷霆，而浮山矗立在江中，和渔浦的各个山头犬牙交错，水流盘旋、浪花激射，每年被撞坏的公家和私人的船只无法计算。苏轼建议在浙江上游的石门，沿着山势的走向往东凿一条漕河，引浙江潮水和溪谷诸水，长二十余里，再进入浙江。再连接诸山作为堤岸，这样不到十里便能到达龙门大慈浦，又从浦北曲折抵达小岭，在小岭中凿一条长六十五丈的通道，使水流经过通道到达岭东的古河，再疏浚开掘古河数里，便可到达龙山漕河，这样就可避开浮山险隘，人们以为有利。奏书上闻朝廷，那些憎恶苏轼的人竭力阻挠，这个工程因此没有成功。

苏轼又说：“三吴的水，汇聚而成太湖，太湖的水，充溢而成松江，然后流入东海。东海每天有二次潮水，潮水浊而松江清，潮水常常想淤塞松江的水道，而江水畅流，随即将潮淤清除，海口常通，因此吴中地区就少水患。从前苏州东面，公私船只都用竹篙点水而行，没有岸上拉纤的。自从庆历（1041～1048）以来，在淞江两岸大筑纤路，又修筑了长桥，因而扼塞了松江的水路，所以现在三吴多水，希望凿穿纤路，修千百座桥，以加速松江水势的畅通。”结果也没有被采用，人们都以此为憾事。苏轼二十年间二次到杭州，有恩德于人民，所以杭州人民家家有他的画像，吃饭的时候一定

为他祝愿。又造了苏轼的生祠，以此报答苏轼的恩德。

哲宗六年（1091），苏轼被召为吏部尚书，人还没有到达京师，又因为弟弟苏辙被任命为右丞，所以又改授苏轼为翰林承旨。苏辙不接受右丞的官职，希望同哥哥一起充当从官，不被允许。苏轼在翰林几月，再次因为遭谗而请求外放，结果以龙图阁学士的职位而出知颍州（今安徽阜阳）。起先，开封府的许多县多水灾，官吏不研究事情的本来，就决破圩岸，使水流注入惠民河，惠民河道无法承受，导致陈州（今济南淮阳）也多水灾。又打算凿开邓艾沟，使它和颍河相通，而且准备开凿黄堆，企图把水流注入淮河。苏轼刚到颍州，就派官使用水平器测量水位，发觉淮水涨水时的水位比将开的新沟几乎高出一丈，如果开凿黄堆，淮水倒流颍地必然造成灾患。苏轼把这情况奏闻朝廷，朝廷听从了他。

颍州郡有惯贼尹遇等，屡次抢劫杀人，又杀死了捕盗的官兵。朝廷派了有名的捕快去捕捉他们，也没有结果。被害的人家担心再次遭到贼人的毒害，就隐匿他们的行迹，不敢揭发。苏轼召来了汝阴县尉李直方，对他说：“您如果能擒获这批惯贼，我定当向朝廷尽力推荐，要求优赏；如果抓不住这批惯贼，我也用不尽职的理由禀奏朝廷，免除您的职务。”李直方有母亲且已老，就同母亲诀别，而后出发。不久，便侦缉到了这批盗贼的藏匿所在，分别捉拿了尹遇的党徒，而且同尹遇肉搏，刺伤了尹遇，抓住了这个惯贼。朝廷却因为李直方地位太低、官职太小，还不能由朝廷直接给他赏赐，所以在论功行赏时没有及于李直方。苏轼要求根据自己这几年的功劳，应当改封个朝散郎的官职，再把这个官职赏给李直

方，朝廷不依。后来吏部又认为苏轼应当升迁，以符合对他的考评，苏轼提出把授予自己的官职给予李直方，吏部又不肯向上报告。

哲宗七年（1092），徙扬州。过去的发运司主持东南漕运的方法，是随便驾船的人私载货物，稽查商船、征收商税的人不得留难。所以驾船的人总是很丰厚，他们以官船为家，以补他们的弊漏，而且周济船工经济上的困难，所以装载的货物都能迅速到达而不会出问题。近年来对这一切都统统禁止了，所以舟弊人困，操舟的人没有办法，就常常盗窃漕运的货物，来解救自己的饥寒，结果是给公家和私人都带来了损害。苏轼请求恢复以往的办法，朝廷依从了。不到一年，苏轼被授命为兵部尚书兼侍读。

这一年，哲宗皇帝亲自祭祀南郊，苏轼是卤簿使，引导皇驾进入太庙。当时有赭繖犊车和青盖犊车十余辆互相抢道，不回避皇帝仪仗。苏轼派御营巡检使查问，原来是皇后和大长公主。当时御史中丞李之纯是仪仗使，苏轼说：“中丞的职责是肃政，不能不把这件事报告皇上。”李之纯不敢说，苏轼就在车中奏报了皇上。哲宗派人抱了奏疏驰马奔告太皇太后，第二日，太皇太后下诏整齐仪卫，从皇后以下都不得迎接拜谒。不久，苏轼迁礼部，兼端明殿、翰林侍读两学士，为礼部尚书。高丽派使者来请求赐书，朝廷按旧例完全应允他们。苏轼说：“汉东平王请求诸子和《太史公书》，尚且不肯给他。现在高丽要求的，比当年东平王要求的高多了，难道可以给他们吗？”朝廷不听。

哲宗八年（1093），宣仁后驾崩，哲宗亲自执政。苏轼要

求外调，结果，带着两学士的职务出知定州（今河北定县）。当时国事将有变化，苏轼无法进宫面辞。出发以后，上书哲宗说：“天下的治和乱，都出于下情是否畅通或阻塞。政事治理得好到极点，小民们都能自通于朝廷；等到大乱的时候，虽然是近臣也不能自达。皇上临政已九年了，除宰相、台谏外，还没有和群臣有过接触。现在你亲自听政了，在开始的时候，应该把了解下情、除去下情上达的阻碍作为当务之急。臣过去每日在皇上的左右侍奉，现在我要去戍守边疆了，尚不能再见皇上一面就只能走了，何况那些平日和皇上疏远的小臣，希望自通皇上就更难了。然而我却不敢因为我现在不再和皇上对问就不再向皇上效忠。古代的圣人们，当他们将要有所作为的时候，一定让自己先处于晦暗之处而看明亮的地方，先处于静的地位来观察动的现象，那末万物的情状，也就统统呈现在你的眼前了。皇上智慧过人，年纪很轻。我希望皇上能虚心循理，开始执政的时候，一切事情都不要去追求什么作为，默默地观察众多事物的利和害，朝廷群臣的邪和正。以三年为期，等到了了解了它们的实情，然后适应事物的变化而有所动作。使事情做了以后，天下的人都无所憾恨，皇上自己也不懊悔。由此看来，皇上的有所作为只是担心太早，而不是害怕稍迟，也就可以明白了。我担心那些急进好利的人，总是劝皇上轻率地进行改变，所以才提出这个意见，希望皇上多留神，那就是社稷宗庙的大福，天下百姓就有幸了。”

定州的军事、政治都弛废败坏，许多卫兵骄横怠惰不受管束，军校像蚕一样吞食军粮，前太守不敢对他们怎么样。苏轼把那些贪污的人发配到条件十分恶劣的边远地区去做奴

隶，修补整治营房，禁止饮酒赌博，待军中的衣食稍稍丰足以后，就进行军事训练，军中的士兵无不畏服。然而那些当官的却心怀畏惧，惴惴不安，有个卒史告发他的长官贪脏，苏轼说：“这些事我自己治理就可以了，如果听从你的告发，那么军中就要乱了。”就立即决定发配了这个人，众人的情绪才安定下来。

适逢春天大阅兵，将吏中上下等级的分别已经废除很久了。苏轼命令按原来的规章制度办事，主帅应该穿着常服出现在军帐中，将吏们都要穿着戎装侍从于主帅左右，执行各种命令。副总管王光祖自以为是老将，耻于这样做，就假称有病不参加阅兵。苏轼叫来书吏命令他写奏章，王光祖害怕了，就出来参加阅兵，阅兵结束，没有一个人敢懈怠。定州人说：“自从韩琦走了以后，就再也没有看见这样的阅兵了。”当时宋朝同契丹议和已经很久了，边防战士长期不出战都已疲惫衰老，不能为朝廷所用了，只有紧靠边境的弓箭社，因为和敌寇比邻，常用战射自卫，仍旧号称精锐。旧宰相庞籍守定州的时候，根据民俗而制订了法规，但是年代久了，法规也就松弛了，又被保甲法所阻挠。苏轼奏请免除保甲法，把两税法折变为临时增加的租税，结果被有关部门扣压，没有上报。

绍圣（1094～1098）初年，御史弹劾苏轼在掌管内外制的时期内所写作的词命，是用来讥斥先朝的。就以原来的官职知英州（今广东英德），不久又降了一级，人还没有到达英州，又被贬为宁远军节度副使，在惠州（今广东惠阳）安置。苏轼在惠州住了三年，对这一切他都能淡然处之，毫不为意。

和他共处的人，无论贤愚，都能得到他的欢心。后来又被贬为琼州（今海南海口）别驾，住在昌化（今海南儋县）。昌化这个地方古代属儋耳国，这不是人能居住的地方，连药品和糕饼都没有。开始，苏轼租赁官舍居住，有关部门尚且不同意，苏轼就买了土地自己建造住室，儋耳地方的人民帮他运砖、畚土。苏轼就和小儿子苏过住在那里，以著书为乐，常常和那里的父老交游，似乎就将终老于此。

宋徽宗即位，苏轼被移到廉州（今广西合浦），又改为舒州团练副使，徙于永州（今湖南零陵）。历经三次大赦以后，遂为玉局观提举，恢复朝奉郎。苏轼从元佑以来，从来没有把每年的课考作为要求晋升的条件，所以一直到去世的时候，他的官职就是朝奉郎。建中靖国元年（1101），在常州去世，终年六十六岁。

苏轼和弟弟苏辙，从小以父亲苏洵为师，学习写文章，以后应该说是得之于自然了。他曾经说：“写文章就好比行云流水，开始的时候没有规定的目标，常常是当自己感到有话要说的时候，就应当不停顿地写下去，到了无话可说的时候，就应当立即停止。”虽然是嬉笑怒骂的文辞，他都可以写出来、背出来。苏轼文章的格局雄浑浩瀚、光芒四射、雄视百代，真是有文章以来，很少见到的啊！苏洵晚年读《易经》，作《易传》未完成，就命令苏轼完成他的遗愿。苏轼写成了《易传》，又写了《论语说》；后来住在海南，写了《书传》；又有《东坡集》四十卷、《后集》二十卷、《奏议》十五卷、《内制》十卷、《外制》三卷、《和陶诗》四卷。后来名闻一时的文人如黄庭坚、晁补之、秦观、张耒、陈师道，当他们还没

有被社会上的人们所了解的时候，苏轼对待他们却犹如朋辈，从来没有以师辈自居。

苏轼自从成了举人，一直到作为出入皇宫的侍从，一定把爱护君王作为为臣的根本，忠言规劝，正直敢言，挺挺大节，朝中群臣没有一个能出其上。但是被小人妒忌、中伤、排挤，使他不能安于朝廷之上。

宋高宗即位，追赠苏轼为资政殿学士，把他的孙子苏符封为礼部尚书；又把他的文章置放在御案左右，读着这些文章就整天忘记了疲倦，赞美他是文章的宗师，亲自写了集赞，赠给他的曾孙苏峤；又推崇追赠苏轼为太师谥为“文忠”。苏轼有三个儿子：苏迈、苏迨、苏过，都善于写文章。

苏迈，是驾部员外郎。苏迨是承务郎。

苏过，字叔党。在苏轼做杭州太守的时候，苏过十九岁，那年，他从两浙路发解参与诗赋考试，但经礼部考试却没被录取。等到苏轼做兵部尚书，苏过担任右承务郎。在苏轼统兵定武，贬谪英州，又贬惠州，迁儋耳，以后又不断徙移廉州、永州的这段长时间中，只有苏过独自一人侍奉苏轼。凡是白天夜晚冬天夏天生活中所需要的一切，苏过都一身百为，从不感到为难。初到海上，他写了一篇文章叫《志隐》，苏轼看了以后说：“我可以在这个海岛的夷人中安定下来了。”因此让苏过写作《孔子弟子别传》。苏轼在常州去世，苏过将父亲葬在汝州（今河南临汝）郟城小峨眉山，以后在颍昌（今河南许昌）住了下来，在湖的南面种了几亩竹子，名为小斜川，自号“斜川居士”。死的时候，五十二岁。

苏过一开始是太原府税监，后来为颍昌府鄆城县（今属

河南)县令,都是因为法令罢了官。晚年权通判中山府。有《斜川集》二十卷。他的《思子台赋》、《飓风赋》很早就在社会上流传。当时人们称苏过为“小坡”,因为时人把苏轼称为“大坡”的缘故啊!苏过的叔父苏辙经常称赞苏过能尽孝道,把他作为榜样去教导宗族中的子弟。苏辙还说:“我哥哥远住在海上,就培养了这个孩子是能写文章的。”苏过有七个儿子:苏籥、苏籀、苏节、苏筴、苏笈、苏笛、苏篴。

论道:当苏轼还是孩童的时候,有个读书人把石介的《庆历圣德诗》带到了四川,苏轼列举了诗中所提到的韩琦、富弼、杜衍、范仲淹等当代的贤哲问他的教师。教师感到很惊奇,问他是怎么回事,苏轼就说:“我正想认识这几个人呀!”原来就是从那时起,小小的苏轼就有同当代贤哲抗衡的愿望。刚成年,苏轼父子兄弟一同到京师,一天之内就声名显赫,轰动四方。不久苏轼就在科举考试中荣登上第,擢举词科,入宫为皇帝执掌书命,外出则主持一方政事。在器识的宏伟、议论的超绝、文辞的雄隽、政事的精明这四个方面,都能以他的卓立不群的思想为主导,而又能用勇往直前的气概辅助它。所以他意气所向,文辞足以表达他的谋略,行事足以成就他的事业。至于祸患到来的时候,则节义又足以使他能坚定地自守,这些都是高尚的志向和宏伟的气魄造成的啊!仁宗皇帝初读苏轼和苏辙两兄弟的制策,退朝后高兴地说:“我今天为子孙挑选到两个宰相了。”神宗喜欢苏轼的文章,当他在宫中读苏轼文章的时候,侍从人员送来了御膳而他却忘了进食,他赞美苏轼是天下的奇才。这两个国君都很了解苏轼,但苏轼却始终没有被大用。欧阳修第一个赏识苏轼,所以苏轼的

名声就和欧阳修并列，这难道不是证明了苏轼的所长是无法被遮盖和压制的吗？天下的舆论是绝对公正的啊！但是，做不做宰相是有命数的。唉！苏轼没有做到宰相，又怎可说不是他的幸运呢？有人说：“苏轼如果自己能稍稍韬晦和收敛一点，虽然不一定做宰相，但也当免去那些灾祸。”这些说法虽然也有一些道理，但假如让苏轼用这个态度来改变他的所作所为，那还能成为苏轼吗？（姚汉荣 译）

【原文】

苏轼字子瞻，眉州眉山人。生十年，父洵游学四方，母程氏亲授以书，闻古今成败，辄能语其要。程氏读东汉《范滂传》，慨然太息，轼请曰：“轼若为滂，母许之否乎？”程氏曰：“汝能为滂，吾顾不能为滂母耶？”

比冠，博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好贾谊、陆贽书。既而读《庄子》，叹曰：“吾昔有见，口未能言，今见是书，得吾心矣。”嘉祐二年，试礼部。方时文砾裂诡异之弊胜，主司欧阳修思有以救之，得轼《刑赏忠厚论》，惊喜，欲擢寇多士，犹疑其客曾巩所为，但置第二；复以《春秋》对义居第一，殿试中乙科。后以书见修，修语梅圣俞曰：“吾当避此人出一头地。”闻者始哗不厌，久乃信服。

丁母忧。五年，调福昌主簿。欧阳修以才识兼茂，荐之秘阁，试六论，旧不起草，以故文多不工。轼始具草，文义粲然。复对制策，入三等。自宋初以来，制策入三等，惟吴育与轼而已。

除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关中自元昊叛，民贫役重，岐下岁输南山木筏，自渭入河，经砥柱之险，衙吏踵破

家。轼访其利害，为修衙规，使自择水工以时进止，自是害减半。

治平二年，入判登闻鼓院。英宗自藩邸闻其名，欲以唐故事召入翰林，知制诰。宰相韩琦曰：“轼之才，远大器也，他日自当为天下用。要在朝廷培养之，使天下之士莫不畏慕降伏，皆欲朝廷进用，然后取而用之，则人人无复异辞矣。今骤用之，则天下之士未必以为然，适足以累之也。”英宗曰：“且与修注如何？”琦曰：“记注与制诰为邻，未可遽授。不若于馆阁中近上帖职与之，且请召试。”英宗曰：“试之未知其能否，如轼有不能邪？”琦犹不可，及试二论，复入三等，得直史馆。轼闻琦语，曰：“公可谓爱人以德矣。”

会洵卒，赙以金帛，辞之，求赠一官，于是赠光禄丞。洵将终，以兄太白早亡，子孙未立，妹嫁杜氏，卒未葬，属轼。轼既除丧，即葬姑。后官可荫，推与太白曾孙彭。

熙宁二年，还朝。王安石执政，素恶其议论异己，以判官告院。四年，安石欲变科举、兴学校，诏两制、三馆议。轼上议曰：

得人之道，在于知人；知人之法，在于责实。使君相有知人之明，朝廷有责实之政，则胥史皂禁未常无人，而况于学校贡举乎？虽因今之法，臣以为有余。使君相不知人，朝廷不责实，则公卿侍从常患无人，而况学校贡举乎？虽复古之制，臣以为不足。夫时有可否，物有废兴，方其所安，虽暴君不能废，及其既厌，虽圣人不能复。故风俗之衰，法制随之，譬如江河之徙移，强而复之，则难为力。

庆历固常立学矣，至于今日，惟有空名仅存。今将变今之礼，易今之俗，又当发民力以治官室，敛民财以食游士。百里之内，置官立师，狱讼听于是，军旅谋于是，又简不率教者屏之远方，则无乃徒为纷乱，以患苦天下邪？若乃无大更革，而望有益於时，则与庆历之际何异？故臣谓今之学校，特可因仍旧制，使先王之旧物，不废于吾世足矣。至于贡举之法，行之百年，治乱盛衰，初不由此。陛下视祖宗之世，贡举之法，与今为孰精？言语文章，与今为孰优？所得人才，与今为孰多？天下之事，与今为孰辨？较此四者之长短，其议决矣。

今所欲变改不过数端：或曰乡举德行而略文词，或曰专取策论而罢诗赋，或欲兼采誉望而罢封弥，或欲经生不帖墨而考大义，此皆知其一，不知其二者也。愿陛下留意于远者、大者，区区之法何预焉。臣又切有私忧过计者。夫性命之说，自子贡不得闻，而今之学者，耻不言性命，读其文，浩然无当而不可穷；观其貌，超然无著而不可挹，此岂真能然哉！盖中人之性，安于放而乐于诞耳。陛下亦安用之？

议上，神宗悟曰：“吾固疑此，得轼议，意释然矣。”即日召见，问：“方今政令得失安在？虽朕过失，指陈可也。”对曰：“陛下生知之性，天纵文武，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断，但患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入太锐。愿镇以安静，待物之来，然后应之。”神宗悚然曰：“卿三言，朕当熟思之。凡在馆阁，皆当为朕深思治乱，无有所隐。”轼退，言于同列。安石不悦，命权开封府推官，将困之以事。轼决断精敏，声

闻益远。会上元敕府市浙灯，且令损价。轼疏言：“陛下岂以灯为悦？此不过以奉二宫之欢耳。然百姓不可户晓，皆谓以耳目不急之玩，夺其口体必用之资。此事至小，体则甚大，愿追还前命。”即诏罢之。

时安石创行新法，轼上书论其不便，曰：

臣之所欲言者，三言而已。愿陛下结人心，厚风俗，存纪纲。人主之所恃者人心而已，如木之有根，灯之有膏，鱼之有水，农夫之有田，商贾之有财。失之则亡，此理之必然也。自古及今，未有和易同众而不安，刚果自用而不危者。陛下亦知人心之不悦矣。

祖宗以来，治财用者不过三司。今陛下不以财用付三司，无故又创制置三司条例一司，使六七少年，日夜讲求于内，使者四十余辈，分行营干于外。夫制置三司条例司，求利之名也；六七少年与使者四余辈，求利之器也。造端宏大，民实惊疑；创法新奇，吏皆惶惑。以万乘之主而言利，以天子之宰而治财，论说百端，喧传万口，然而莫之创者，徒曰：“我无其事，何恤于人言。”操罔罟而入江湖，语人曰“我非渔也”，不如捐罔罟而人自信。驱鹰犬而赴林薮，语人曰“我非猎也”，不如放鹰犬而兽自驯。故臣以为欲消谗慝而召和气，则莫若罢条例司。

今君臣宵旰，几一年矣，而富国之功，茫如捕风，徒闻内帑出数百万缗，祠部度五千余人耳。以此为术，其谁不能？而所行之事，道路皆知其难。汴水浊流，自生民以来，不以种稻。今欲陂而清之，万顷之稻，必用千

顷之陂，一岁一淤，三岁而满矣。陛下遂信其说，即使相视地形，所在凿空，访寻水利，妄庸轻剽，率意争言。官司虽知其疏，不敢便行抑退，追集老少，相视可否。苦非灼然难行，必须且为兴役。官吏苟且顺从，真谓陛下有意兴作，上糜帑廩，下夺农时。隄防一开，水失故道，虽食议者之肉，何补于民！臣不知朝廷何苦面为此哉？

自古役人，必用乡户。今者徒闻江、浙之间，数郡顾役，而欲措之天下。单丁、女户，盖天民之穷者也，而陛下首欲役之，富有四海，忍不加恤！自杨炎为两税，租调与庸既兼之矣，奈何复欲取庸？万一后世不幸有聚敛之臣，庸钱不除，差役仍旧，推所从来，则必有任其咎者矣。青苗放钱，自昔有禁。今陛下始立成法，每岁常行。虽云不许抑配，而数世之后，暴君污吏，陛下能保之与？计愿请之户，必皆孤贫不济之人，鞭撻已急，则继之逃亡，不还，则均及邻保，势有必至，异日天下恨之，国史记之，曰“青苗钱自陛下始”，岂不惜哉！且常平之法，可谓至矣。今欲变为青苗，坏彼成此，所丧逾多，亏官害民，虽悔何及！

昔汉武帝以财力匱竭，用贾人桑羊之说，买贱卖贵，谓之均输。于时商贾不行，盗贼滋炽，几至于乱。孝昭既立，霍光顺民所欲而予之，天下归心，遂以无事。不意今日此论复兴。立法之初，其费已厚，纵使薄有所获，而征商之额，所损必多。譬之有人为其主畜牧，以一牛易五羊。一牛之失，则隐而不言；五羊之获，则指为劳绩。今坏常平而言青苗之功，亏商税而取均输之利，何

以异此？臣窃以为过矣。议者必谓：“民可与乐成，难与虑始。”故陛下坚执不顾，期于必行。此乃战国贪功之人，行险侥幸之说，未及乐成，而怨已起矣。臣之所愿陛下结人心者，此也。

国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浅深，不在乎强与弱；历数之所以长短者，在风俗之薄厚，不在乎富与贫。人主知此，则知所轻重矣。故臣愿陛下务崇道德而厚风俗，不愿陛下急于有功而贪富强。爱惜风俗，如获元气。圣人非不知深刻之法可以齐众，勇悍之夫可以集事，忠厚近于迂阔，老成初若迟钝。然终不肯以彼易此者，知其所得小，而所丧大也。仁祖持法至宽，用人有叙，专务掩覆过失，未常轻改旧章。考其成功，则曰未至。以言乎用兵，则十出而九败；以言乎府库，则仅足而无余。徒以德泽在人，风俗知义，故升遐之日，天下归仁焉。议者见其末年吏多因循，事不振举，乃欲矫之以苛察，齐之以智能，招来新进勇锐之人，以图一切速成之效。未享其利，浇风已成。多开骤进之门，使有意外之得，公卿侍从跬步可图，俾常调之人举生非望，欲望风俗之厚，岂可得哉？近岁朴拙之人愈少，巧进之士益多。惟陛下哀之救之，以简易为法，以清净为心，而民德归厚。臣之所愿陛下厚风俗者，此也。

祖宗委任台谏，未常罪一言者。纵有薄责，旋即超升，许以风闻，而无官长。言及乘舆，则天子改容；事关廊庙，则宰相待罪。台谏固未必皆贤，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须养其锐气，而借之重权者，岂徒然哉？将以折

奸臣之萌也。今法令严密，朝廷清明，所谓奸臣，万无此理。然养猫以去鼠，不可以无鼠而养不捕之猫；畜狗以防盗，不可以无盗而畜不吠之狗。陛下得上念祖宗设此官之意，下为子孙万世之防？臣闻长老之谈，皆谓台谏所言，常随天下公议。公议所与，台谏亦与之；公议所击，台谏亦击之。今者物论沸腾，怨读交至，公议所在，亦知之矣。臣恐自兹以往，习惯成风，尽为执政私人，以致人主孤立，纪纲一废，何事不生！臣之所愿陛下存纪纲者，此也。

轼见安石赞神宗以独断专任，因试进士发策，以“晋武平吴以独断而克，苻坚伐晋以独断而亡，齐醒专任管仲而霸，燕哱专任子之而败，事同而功异”为问。安石滋怒，使御史谢景温论奏其过，穷治无所得，轼道请外，通判杭州。高丽入贡，使者发币于官吏，书称甲子。轼却之曰：“高丽于本朝称臣，而不禀正朔，吾安敢受！”使者易书称熙宁，然后受之。

时新政日下，轼于其间，每因法以便民，民赖以安。徙知密州。司农行手实法，不时施行者以违制论。轼谓提举官曰：“违制之坐，若自朝廷，谁敢不从？今出于司农，是擅造律也。”提举官惊曰：“公姑徐之。”未几，朝廷知法害民，罢之。

有盗窃发，安抚司遣三班使臣领悍卒来捕，卒凶暴恣行，至以禁物诬民，入其家争斗杀人，且畏罪惊溃，将为乱。民奔诉轼，轼投其书不视，曰：“必不至此。”散卒闻之，少安，徐使人招出戮之。

徙知徐州。河决曹村，泛于梁山泊，溢于南清河，汇于

城下，涨不时泄，城将败，富民争出避水。轼曰：“富民出，民皆动摇，吾谁与守？吾在是，水决不能败城。”驱使复入。轼诣武卫营，呼卒长曰：“河将害城，事急矣，虽禁军且为我尽力。”卒长曰：“太守犹不避涂潦，吾侪小人，当效命。”率其徒持畚鍤以出，筑东南长堤，首起戏马台，尾属于城。雨日夜不止，城不沈者三版。轼庐于其上，过家不入，使官吏分堵以守，卒全其城。复请调来岁夫增筑故城，为木岸，以虞水之再至。朝廷从之。

徙知湖州，上表以谢。又以事不便民者不敢言，以诗托讽，庶有补于国。御史李定、舒、何正言摭其表语，并媒孽所为诗以为讪谤，逮赴台狱，欲置之死，锻炼久之不决。神宗独怜之，以黄州团练副使安置。轼与田父野老，相从溪山间，筑室于东坡，自号“东坡居士”。

三年，神宗数有意复用，辄为当路者沮之。神宗常语宰相王珪、蔡确曰：“国史至重，可命苏轼成之。”珪有难色。神宗曰：“轼不可，姑用曾巩。”巩进《太祖总论》，神宗意不允，遂手札移轼汝州，有曰：“苏轼黜居思咎，阅岁滋深，人材实难，不忍终弃。”轼未至汝，上书自言饥寒，有田在常，愿得居之。朝奏，夕报可。

道过金陵，见王安石，曰：“大兵大狱，汉、唐灭亡之兆。祖宗以仁厚治天下，正欲革此。今西方用兵，连年不解，东南数起大狱，公独无一言以救之乎？”安石曰：“二事皆惠卿启之，安石在外，安敢言？”轼曰：“在朝则言，在外则不言，事君之常礼耳。上所以待公者非常礼，公所以待上者，岂可以常礼乎？”安石厉声曰：“安石须说。”又曰：“出在安石口，

入在子瞻耳。”又曰：“人须是知行一不义，杀一不幸，得天下弗为，乃可。”轼戏曰：“今之君子，争减半年磨勘，虽杀人亦为之。”安石笑而不言。

至常，神宗崩，哲宗立，复朝奉郎、知登州，召为礼部郎中。轼旧善司马光、章惇。时光为门下侍郎，惇知枢密院，二人不相合，惇每以谗侮困光，光苦之。轼谓惇曰：“司马君实时望甚重。昔许靖以虚名无实，见鄙于蜀先主，法正曰：‘靖之浮誉，播流四海，若不加礼，必以贱贤累。’先主纳之，乃以靖为司徒。许靖且不可慢，况君实乎？”惇以为然，光赖以少安。

迁起居舍人。轼起于忧患，不欲骤履要地，辞于宰相蔡确。确曰：“公徊翔久矣，朝中无出公右者。”轼曰：“昔林希同在馆中，年且长。”确曰：“希固当先公耶？”卒不许。元祐元年，轼以七品服入侍延和，即赐银绯，迁中书舍人。

初，祖宗时，差役行久生弊，编户充役者不习其役，又虐使之，多致破产，狭乡民至有终岁不得息者。王安石相神宗，改为免役，使户差高下出钱雇役，行法者过取，以为民病。司马光为相，知免役之害，不知其利，欲复差役，差官置局，轼与其选。轼曰：“差役、免役，各有利害。免役之害，掊敛民财，十室九空，敛聚于上而下有钱荒之患。差役之害，民常在官，不得专力于农，而贪吏猾胥得缘为奸。此二害轻重，盖略等矣。”光曰：“于君何如？”轼曰：“法相因则事易成，事有渐则民不惊。三代之法，兵农为一，至秦始分为二，及唐中叶，尽变府兵为长征之卒。自尔以来，民不知兵，兵不知农，农出谷帛以养兵，兵出性命以卫农，天下便之。虽

圣人复起，不能易也。今免役之法，实大类此。公欲骤罢免役而行差役，正如罢长征而复民兵，盖未易也。”光不以为然。轼又陈于政事堂，光忿然。轼曰：“昔韩魏公刺陕西义勇，公为谏官，争之甚力，韩公不乐，公亦不顾。轼昔闻公道其详，岂今日作相，不许轼尽言耶？”光笑之。寻除翰林学士。

二年，兼侍读。每进读至治乱兴衰、邪正得失之际，未常不反复开导，凯有所启悟。哲宗虽恭默不言，辄首肯之。常读祖宗《宝训》，因及时事，轼历言：“今赏罚不明，善恶无所劝沮；又黄河势方北流，而强之使东；夏人入镇戎，杀掠数万人，帅臣不以闻。每事如此，恐寢成衰乱之渐。”

轼常锁宿禁中，召入对便殿，宣仁后问曰：“卿前年为何官？”曰：“臣为常州团练副使。”曰：“今为何官？”曰：“臣今待罪翰林学士。”曰：“何以遽至此？”曰：“遭遇太皇太后、皇帝陛下。”曰：“非也。”曰：“岂大臣论荐乎？”曰：“亦非也。”轼惊曰：“臣虽无状，不敢自他途以进。”曰：“此先帝意也。先帝每诵卿文章，必叹曰：‘奇才，奇才！’但未及进用卿耳！”轼不觉哭失声，宣仁后与哲宗亦泣，左右皆感涕。已而命坐赐茶，彻御前金莲烛送归院。

三年，权知礼部贡举。会大雪苦寒，士坐庭中，噤未能言。轼宽其禁约，使得尽技。巡铺内侍每摧辱举子，且持暧昧单词，诬以为罪，轼尽奏逐之。

四年，积以论事，为当轴者所恨。轼恐不见容，请外拜龙图阁学士、知杭州。未行，谏官言前相蔡确知安州，作诗借郝处俊事以讥太皇太后。大臣议迁之岭南。轼密疏：“朝廷若薄确之罪，则于皇帝孝治为不足；若深罪确，则于太皇太

后仁政为小累。谓宜 皇帝敕置狱逮治，太皇太后出手诏赦之，则于仁孝两得矣。”宣仁后心善轼言而不能用。轼出郊，用前执政恩例，遣内侍赐龙茶、银合，慰劳甚厚。

既至杭，大旱，饥疫并作。轼请于朝，免本路上供米三之一，复得赐度僧牒，易米以救饥者。明年春，又减价余常平米，多作饘粥药剂，遣使挟医分坊治病，活者甚众。轼曰：“杭，水陆之会，疫死经他处常多。”乃哀羨缗得二千，复发中黄金五十两，以作病坊，稍畜钱粮待之。

杭本近海，地泉咸苦，居民稀少。唐刺史李泌始引西湖水作六井，民足於水。白居易又浚西湖水入漕河，自河入田，所溉至千顷，民以殷富。湖水多葑，自唐及钱氏，岁辄浚治，宋兴、废之，葑积为田，水无几矣。漕河失利，取给江潮，舟行市中，潮又多淤，三年一掏，为民大患，六井亦几于废。轼见茅山一河专受江潮，盐桥一河专受湖水，遂浚二河以通漕。复造堰闸，以为湖水畜泄之限，江潮不复入市。以余力复完六井，又取葑田积湖中，南北径三十里，为长堤以通行者。吴人种菱，春辄芟除，不遗寸草。且募人种菱湖中，葑不复生。收其利以备修湖，取救荒余钱万缗、粮万石，及请得百僧度牒以募役者。堤成，植芙蓉、杨柳其上，望之如画图，杭人名为苏公堤。

杭僧净源，旧居海滨，与舶客交通，舶至高丽，交誉之。元丰末，其王子义天来朝，因往拜焉。至是，净源死，其徒窃持其像，附舶往告。义天亦使其徒来祭，因持国母二金塔，云祝两宫寿。轼不纳，奏之曰：“高丽久不入贡，失赐予厚利，意欲求朝，未测吾所以待之厚薄，故因祭亡僧而行祝寿之礼。

若受而不答，将生怨心；受而厚赐之，正堕其计。今宜勿与知，从州郡自以理却之。彼庸僧猾商，为国生事，渐不可长，宜痛加惩创。”朝廷皆从之。未几，贡使果至，旧例使所至吴越七州，费二万四千余缗。轼乃令诸州量事裁损，民获交易之利，无复侵挠之害矣。

浙江潮自海门东来，势如雷霆，而浮山峙於江中，与渔浦诸山犬牙相错，洄激射，岁败公私船不可胜计。轼议自浙江上流地名石门，并山而东，凿为漕河，引浙江及谷诸水二十余里以达于江。又并山为岸，不能十里以达龙山大慈浦，自浦北折折小岭，凿岭六十五丈以达岭东古河，浚古河数里达于龙山漕河，以避浮山之险，人以为便。奏闻，有恶轼者，力沮之，功以故不成。

轼复言：“三吴之水，汲为太湖，太湖之水，溢为松江以入海。海日两潮，潮浊而江清，潮水常欲淤塞江路，而江水清驶，随辄涤去，海口常通，则吴中少水患。昔苏州以东，公私船皆以篙行，无陆挽者。自庆历以来，松江大筑挽路，建长桥以扼塞江路，故今三吴多水，欲凿挽路、为十桥，以迅江势。”亦不果用，人皆以为恨。轼二十年间再杭，有德于民，家有画像，饮食必祝。又作生祠以报。

六年，召为吏部尚书，未至。以弟辙除右丞，改翰林承旨。辙辞右丞，欲与兄同备从官，不听。轼在翰林数月，复以谗请外，乃以龙图阁学士出知颍州。先是，开封诸县多水患，吏不究本末，决其陂泽，注之惠民河，河不能胜，致陈亦多水，又将凿邓艾沟与颍河并，且凿黄堆欲注之于淮。轼始至颍，遣吏以水平之，淮之涨水高于新沟几一丈，若凿黄

堆，淮水顾流颍地为患。轼言于朝，从之。

郡有宿贼尹遇等，数劫杀人，又杀捕盗吏兵。朝廷以名捕不获，被杀家复惧其害，匿不敢言。轼召汝阴尉李直方曰：“君能禽此，当力言于朝，乞行优赏；不获，亦以不职奏免君矣。”直方有母老，与母决而后行。乃缉知盗所，分捕其党与，手刺遇，获之。朝廷以小不应格，推赏不及。轼请以己之年劳，当改朝散郎阶，为直方赏，不从。其后吏部为轼当迁，以符全其考，轼谓己许直方，又不报。

七年，徙扬州。旧发运司主东南漕法，听操舟者私载物货，征商不得留难。故操舟者辄富厚，以官舟为家，补其弊漏，且周船夫之乏，故所载率皆速达无虞。近岁一切禁而不许，故舟弊人困，多盗所载以济饥寒，公私皆病。轼请复旧，从之。未阅岁，以兵部尚书召兼侍读。

是岁，哲宗亲祀南郊，轼为卤簿使，导驾入太庙。有赤繖犊车并青盖犊车十余争道，不避仪仗。轼使御营巡检使问之，乃皇后及大长公主。时御史中丞李之纯为仪仗使，轼曰：“中丞职当肃政，不可不以闻之。”纯不敢言，轼于车中奏之。哲宗遣使齐疏驰白太皇太后，明日，诏整肃仪卫，自皇后而下皆毋得迎谒。寻迁礼部兼端明殿、翰林侍读两学士，为礼部尚书。高丽遣使请书，朝廷以故事尽许之。轼曰：“汉东平王请诸子及《太史公书》，犹不肯予。今高丽所请，有甚于此，甚可予乎？”不听。

八年，宣仁后崩，哲宗亲政。轼乞补外，以两学士出知定州。时国是将变，轼不得入辞。既行，上书言：“天下治乱，出于下情之通塞。至治之极，小民皆能自通；迨于大乱，虽

近臣不能自达。陛下临御九年，除执政、台谏外，未常与群臣接。今听政之初，当以通下情、除雍蔽为急务。臣日侍帷幄，方当戎边，顾不得一见而行，况远小臣欲求自通，难矣。然臣不敢以不得对之故，不效愚忠。古之圣人将有为也，必先处晦而观明，处静而观动，则万物之情，毕陈于前。陛下圣智绝人，春秋鼎盛。臣愿虚心循理，一切未有所为，默观庶事之利害，与群臣之邪正，以三年为期，俟得其实，然没应物而作。使既作之后，天下无恨，陛下亦无悔。由此观之，陛下之有为，惟忧太蚤，不患稍迟，亦已明矣。臣恐急进好利之臣，辄劝陛下轻有改变，故进此说，敢望陛下留神，社稷宗庙之福，天下幸甚。”

定州军政坏弛，诸卫卒骄惰不教，军校蚕食其廩赐，前守不敢谁何。轼取贪污者配隶远恶，缮修营房，禁止饮博，军中衣食稍足，乃部勒战法，众皆畏伏。然诸业业不安，有卒史以赃诉其长，轼命曰：“此事吾自治则可，听汝告，军中乱矣。”立决配之，众乃定。

会春大阅，将吏久废上下之分，轼举旧典，帅常服出帐中，将吏戎服执事。副总管王光祖自谓老将，耻之，称疾不至。轼召书吏使为奏，光祖惧而出，乞事，无一慢者。定人言：“自韩琦去后，不见此礼至今矣。”契丹久和，边兵不可用，惟沿边弓箭社与寇为邻，以战自卫，犹号精锐。故相庞籍守边，固俗立法。岁久法弛，又为保甲所挠。轼奏免保甲及两税折变科配，不报。

绍圣初，御史论轼掌内外制曰，所作词命，以为讥斥先朝。遂以本官知英州，寻降一官，未至，贬宁远军节度副使，

惠州安置。居三年，泊然无所蒂芥，人无贤愚，皆得其欢心。又贬琼州别驾，居昌化。昌化，故儋耳地，非人所居，药饵皆无有。初僦官屋以居，有司犹谓不可，轼遂买地筑室，僦人运甕畚土以助之。独与幼子过处，著书以为乐，时时从其父老游，若将终身。

徽宗立，移廉州，改舒州团练副使，徙永州。更大三赦，遂提举玉局观，复朝奉郎。轼自元以来，未常以岁课乞迁，故官止于此。建中靖国元年，卒于常州，年六十六。

轼与弟辙，师父洵为文，既而得之于天。常自谓：“作文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於所当行，止於所不可不止。”虽嬉笑怒骂之辞，皆可书而诵之。其体浑涵光芒，雄视百代，有文章以来，盖亦鲜矣。洵晚读《易》，作《易传》未究，命轼述其志。轼成《易传》，复作《论语说》；后居海南，作《书传》；又有《东坡集》四十卷、《后集》二十卷、《奏议》十五卷、《内制》十卷、《外制》三卷、《和陶诗》四卷。一时文人如黄庭坚、晁补之、秦观、张耒、陈师道，举世未之识，轼待之如朋俦，未常以师资自予也。

自为举子至出入侍从，必以爱君为本，忠规谏论，挺挺大节，群臣无出其右。但为小人忌恶挤排，不使安于朝廷之上。

高宗即位，赠资政殿学士，以其孙符为礼部尚书。又以其文左右，读之终日忘倦，谓为文章之宗，亲制集赞赐其曾孙峤。遂崇赠太师、谥文忠。轼三子：迈、迨、过，俱善为文。迈，驾部员外郎。迨，承务郎。

过字叔党。轼知杭州，过年十九，以诗赋解两浙路，礼

部试下。及轼为兵部尚书，任右承务郎。轼帅定武，谪知英州，贬惠州，迁儋耳，渐徙廉、永，独过侍之。凡生理书夜寒暑所须者，一身百为，不知其难。初至海上，为文曰《志隐》，轼览之曰：“吾可以安于岛夷矣。”因命作《孔子弟子别传》。轼卒于常州，过葬轼汝州郟城小峨眉山，遂家颍昌，营湖阴水竹数亩，名曰小斜川，自号斜川居士。卒，年五十二。

初监太原府税，次知颍昌府郎城县，皆以法令罢。晚权通判中山府。有《斜川集》二十卷。其《思子台赋》、《飓风赋》早行于世。时称“小坡”，盖以轼为“大坡”也。其叔辙每称过孝，以训宗族。且言：“吾兄远居海上，惟成就此儿能文也。”七子：籥、籍、节、笈、箏、笛、篴。

论曰：苏轼自为童子时，士有传石介《庆历圣德诗》至蜀中者，轼历举诗中所言韩、富、杜、范诸贤以问其师。师怪而语之，则曰：“正欲识是诸人耳。”盖已有颉颃光世贤哲之意。弱冠，父子兄弟至京师，一日而声名赫然，动于四方。既而登上第，擢词科，入掌书命，出典方州。器识之闳伟，议论之卓犖，文章之雄隽，政事之精明，四者皆能以特立之志为之主，而以迈往之气辅之。故意之所向，言足以达其有猷，行足以遂其有为。至于祸患之来，节义足以固有其守，皆志与气所为也。仁宗初读轼、辙制策，退而喜曰：“朕今日为子孙得两宰相矣。”神宗尤爱其文，宫中读之，膳进忘食，称为天下奇才。二君皆有以知轼，而轼卒不得大用。一欧阳修先识之，其名遂与之齐，岂非轼之所长不可掩抑者，天下之至公也，相不相有命焉，呜呼！轼不得相，又岂非幸欤？或谓：

“轼稍自韬戢，虽不获柄用，亦当免祸。”虽然，假令轼以是而易其所为，尚得为轼哉？

范成大传

——《宋史》卷三八六

【说明】范成大（1127—1194），南宋诗人。字延之，号遂初居士，无锡（今属江苏）人。绍兴进士，曾任吏部员外郎、起居舍人、礼部尚书等职。晚年隐居石湖达十年。

范成大是南宋重要诗人。其诗以反映农村社会生活图景的作品成就最高，被视为中国古代田园诗的集大成者。诗境开阔，风格多样，但不免染上南宋诗坛注重锻造、务气逞怪的习气。有《石湖居士诗集》。

范成大，字致能，吴郡（今江苏苏州市）人。绍兴二十四年（1154），在进士考试中得到选拔，任职户曹，监和济局。隆兴元年（1163），调任负责订正典籍讹误的正字。后来又先后调任著作佐郎、吏部郎官。言官议论、批评范成大超越礼仪。因此他被罢官，只任宫观使，拿取俸禄，却无职务。

后来，范成大被起用，治理处州（今浙江丽水、缙云、青田、遂昌、龙泉、云和等县地区）。在应答皇帝的“咨询”的时候，范成大论及国家有三种力量，一是日力（即时间），二是国力，三是民力。当时，这些力量被虚假的理由、形式主

义的手段白白地消耗掉。皇帝对他的言论十分赞赏并加以采纳。处州民众因承担力役经常发生争吵、诉讼。范成大为此创立了义役：不管民众家贫家富，都要出一定的金钱买田，以田产的收入资助服力役者。甲乙轮流次第，可不烦力役达二十年，民众觉得十分方便。范成大在给皇帝上奏时也谈到了这个方法。政府下诏向各路推广范成大的义役。处州多山田，梁天监中，詹、南二位司马筑通济堰，在松阳（今浙江遂昌）和遂昌之间。通济堰阻遏水势，使溪水奔流达四十里，可以灌溉二十万亩土地。堰造了几百年，已经损坏。范成大沿着通济渠的古道，调查研究，对损坏的地方叠石筑堤，设置闸门四十九所，控制水位的高、中、低，有次序地对农田灌溉。民众从中得到了很大的好处。

范成大升任礼部员外郎、兼任崇政殿侍讲。乾道时有诏令：“可以拿绢匹计算贪污受贿、盗窃所得的赃物。”当时估算绢匹的价低，因而论罪就重。范成大上奏：“太平的时候，绢匹不到千钱，而估价却超过一倍。绍兴初年（1131），递增百分之五十，绢匹价足三千钱。当今绢匹价倍于时价。”皇上闻奏，大吃一惊，并说：“法律条文苛细严峻，对民众不利。”遂增加绢匹为四千钱，因而刑罚就减轻了。

隆兴年间，南宋和金国再次议和，宋金在定约之时，规定金使至，捧国书上殿，北面立榻前跪进，帝降榻接受国书。这样的规定，丧失了国家的面子，皇上十分悔恨。于是，调范成大任起居郎、假资政殿大学士，担任去金国祈请国信使。国书专门提出宋王朝在河南的坟墓、寝庙的问题。这似乎是一般的使命。皇上在接见范成大的时候，还讲了要求改变接

受国书的礼节。范成大要求一并写在国书中，皇上没有同意。金国迎接范成大的使者羡慕成大的名气，到处求买包头发的布巾效法范成大。至燕山，范成大秘密起草要求改变受金国国书仪式的奏言，范成大藏在怀中而入，开始，进国书的时候，词气慷慨，金君臣都在认真倾听。成大忽然上奏说：“两朝既然是叔侄关系，而规定的受书的礼仪和叔侄关系不相称，我有奏疏。”插笏而出。金主大惊说：“这哪里是献国书的地方啊！”左右都把朝笏举起，成大屹立不动，一定要把国书送达。后来回归馆所，金主派伴使宣旨拿取奏言，成大没有起来，违抗金主之命。金朝廷哗然，太子准备杀掉成大，被越王阻止，尽管陵寝问题及改变接受国书礼仪两项使命都没完成，范成大竟得全大节而归。

任命范成大为中书舍人。起初，皇上亲笔书写崔寔的《政论》赐给重要的辅佐大臣。成大又上奏说：“皇上亲书《政论》，意在整顿纲纪，消除积敝。而近日大理议论刑律时，都罪加一等，此不是从严治政，而是酷刑。”皇上称赞成大之言有卓见。张说将被任命为签书枢密院事，正好碰到成大应草拟诏书，成大留皇上任命张说的便条七日不发，又上疏表示反对，任命张说之事遂不了了之。

范成大任职静江府（今广西桂林），广西物资匮乏，专门依靠食盐谋利，漕臣完全把它取去。于是所辖县邑有增盐价，抑制配给之弊端。中央政府诏令恢复行使盐钞。但漕臣只考虑钞钱均上交给中央有关部门，而自己不能按时得到钱。成大到广西时议论说：“还有比这更大的利害吗！”遂向中央上疏：“如能抑制漕臣强夺豪取之数，又能对郡县放宽经济，过

分的征税就可禁止。”皇上听从了他的意见。几年后，广州盐商上书，请求恢复客商贩盐。宰相赞成这个请求，出了很多钱帮助他们。不少人以为成大做法不当，皇上令有关部门议处，最终不能改变范成大的主张。按旧法，马以四尺三寸为界限，中央诏书令加到四寸以上。成大说，同边境贸易已四十年，不宜突然改变。

任范成大为敷文阁待制，四川制置使。成大上疏说：“吐蕃、青羌两者侵犯黎州（今属四川），而奴儿结、蕃列等特别狡猾、残暴，轻视中国，臣准备训练将官士卒，外修堡砦壁垒，并向将士讲明，在作战中团结之法，能人自为战，要做到这三件事，非钱财不可。”皇上下令，把出卖僧牒所获得的钱四十万缗发给四川。范成大又说：“在西南各边境，黎州最为重要，应增加战士五千人。”并上奏建议设置以路为划分的都监。吐蕃入侵之路有十八处，均筑栅栏分戍。如果奴儿结侵扰安静砦时，发飞山军千人赶往，估计他们三日之内必然逃遁。后来，果然如此。白水砦的将官王文才，私娶蛮女，经常引导他们侵扰边境。范成大发檄文赏赐群蛮，使他们相互猜疑，不久便擒获文才献到京师，随即斩掉。川北边境旧有义士三万，本是民兵，监司、群守随便把他们当杂役使用；都统司又使他们与大军替换戍边。成大力争，认为这样做不妥。中央政府下诏令恢复旧制。四川著名人士孙松寿年六十余，樊汉广刚五十九岁，皆辞职不仕，政府表彰他们的节气，下诏召他们为官，他们又不仕。四川人由此对中央政府归心。凡人材可以使用的，范成大完全把他们招致到幕下，使用他们的长处，不问他们的小节。其中杰出的人士，向中央政府推

荐，往往在朝廷显露才能，很显贵，有的位至枢密院或中书门下。

皇上召范成大回京城，向他提出各种问题，让成大应答。又任成大权吏部尚书，拜参知政事。两月后，为言官所非议，又罢免了成大的职务，只任宫观使，拿些俸禄。后来又被任用为明州（今浙江宁波）知府，成大奏言建议取消上献海产。中央任命他为端明殿学士。然后又调他统帅金陵（今江苏南京）。金陵这年正好大旱，范成大奏请把储存的二十万军粮赈救灾民，减租米五万。水贼徐五作乱，号“静江大将军”，范成大捕捉他并把他杀了。

后来，范成大以疾病请求休闲，皇上升任他为资政殿学士，再管理洞霄宫。绍熙三年（1192）加大学士。四年（1193）去世。

成大素来有文名，尤其擅长写诗。皇上曾命陈俊卿选择、推荐文士负责起草诏令，掌管内制。俊卿回答说，范成大及张震可以。范成大自号“石湖”，有《石湖集》、《揽辔录》、《桂海虞衡集》，都流行于世。（刘炳福 译）

【原文】

范成大字致能，吴郡人。绍兴二十四年擢进士第，授户曹，监和济局。隆兴元年，迁正字。累迁著作佐郎，除吏部郎官。言者论其起厓，罢，奉祀。

起知处州。陛对，论力之所及者三，曰日力，曰国力，曰人力。今尽以虚文耗之，上嘉纳。处民以争役嚣讼，成大为创义役，随家贫富输金买田，助当役者，甲乙轮第至二十年。民便之。其后入奏，言及此，诏颁其法于诸路。处多山田，梁

天监中，詹、南二司马作通济堰在松阳、遂昌之间，激溪水四十里，溉田二十万亩。堰岁久坏。成大访古迹，叠石筑防，置堤闸四十九所，立水则，上中下溉灌有序。民食其利。

除礼部员外郎兼崇政殿说书。乾道令以绢计赋。估价轻而论罪重。成大奏：“承平时绢匹不及千钱，而估价过倍。绍兴初年递增五分，为钱三千足。今绢实贵，当倍时值。”上惊曰：“是隘民深文。”遂增为四千而刑轻矣。

隆兴再讲和，失定受书之礼。上赏悔之。迁成大起居郎、假资政殿大学士，充金祈靖国信使。国书未求陵寝，盖泛使也。上面谕受书事，成大乞并戴书中，不从。金迎使者慕成大名，至求巾帻效之。至燕山，密草奏，具言受书式，怀之入。初进国书，词气慷慨。金君臣方倾听，成大忽奏曰：“两朝既为叔侄，而受书礼未称，臣有疏。”搢笏出之。金主大骇曰：“此岂献书处耶？”左右以笏标起之，成大屹不动，必欲以书达。既而归馆所，金主遣伴使宣旨取奏，成大之未起也。金庭纷然。太子欲杀成大，越王止之。竟得全节而归。

除中书舍人。初，上书崔寔《政论》赐辅臣。成大奏曰：“御书《政论》，意在饬纲纪、振积敝。而近日大理议刑，递加一等，此非以严致平，乃酷也。”上称为知言，张说除签书枢密院事。成大当制，留词头七日不下，又上疏言之，说命竟寝。

知静江府。广西窘匮，专藉盐利。漕臣尽取之，于是属邑有增价抑配之敝，诏复行钞盐。漕司构钞铍钱给所部，而钱下时至。成大入境，曰：“利害有大于此乎！”奏疏谓：“能裁抑漕司强取之数，以宽郡县，则科抑可禁。”上从之。数年，

广州盐商上书，乞复令客贩，宰相可其说，大出银钱助之。人多以为非，下有司议，卒不易成大说。旧法。马以四尺三寸为限，诏加至四寸以上。成大谓互市四十年，不宜骤改。

除敷文阁待制，四川制置使，疏言：“吐蕃，青羌两犯黎州，而奴儿结、蕃列等尤桀黠，轻视中国。臣当教阅将兵，外修堡砦，仍讲明教阅团结之法，使人自为战，三者非财不可。”上赐度牒钱四十万缗。成大谓西南诸边，黎为要地，增战兵五千。奏置路分都监。吐蕃入寇之路十有八，悉筑栅分戍。奴尔结扰安静砦，发飞山军千人赴之，称其三日必遁，已而果然。白水砦将王文才私娶蛮女，常导之寇边。成大重赏檄群蛮使相疑贰。俄擒文才以献，即斩之。蜀北边旧有义士三万，本民兵也，监司，群守杂役之，都统司又俾与大军更戍，成大力言其不可，诏遵旧法。蜀知名士孙松寿年六十余，樊汉广甫五十九，皆挂冠不仕，表其节，诏召之，皆不起，蜀士由是旧心。凡人才可用者，悉致幕下，用所长，不拘小节，其杰然者。露章荐之，往往显于朝，位至二府。

召对，除权吏部尚书，拜参知政事。两月，为言者所论，奉祠。起知明州，奏罢海物之献。除端明殿学士。寻帅金陵。会岁旱，奏移军储米二十万振饥民，减租米五万。水贼徐五窃发，号“静江大将军”。捕而戮之。以病请闲。进资政殿学士，再领洞霄宫。绍熙三年，加大学士。四年薨。

成大索有文名，尤工于诗。上尝命陈俊卿择文士掌内制，俊卿以成大及张震对。自号石湖，有《石湖集》、《揽轡录》、《桂海虞衡集》，行于世。

陆游传

——《宋史》卷三九五

【说明】陆游（1125—1210），南宋大诗人，字务观，号放翁，山阴（今浙江绍兴）人。生当北宋灭亡之际，少年时即受家庭爱国主义思想熏陶。曾任镇江、隆兴等地通判，官至宝章阁待制，还曾投身戎幕。政治上主张充实军备，坚决抗战。因此屡受投降集团压制。晚年退居家乡，抱恨而逝。

陆游今存诗九千三百余首，内容极为丰富，多抒发政治抱负，反映人民疾苦，批判当时统治集团的屈辱投降，表现出强烈爱国热情。其诗诸体兼长，风格雄放，思想和艺术上都有很高成就。为“南宋四大家”之一。词与散文也很出色。其词或清丽缠绵，或苍凉旷远，当时颇有影响。著有《剑南诗稿》、《渭南文集》。

陆游，字务观，越州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十二岁的时候，就能写诗作文，以先代官爵的原因补上了登仕郎。参加进士考试，被荐送为第一。秦桧的孙儿秦埙，恰巧排在他后面，秦桧大怒，并对主持进士试的考官处罪。第二年，进行礼部主事试，又是把陆游排在前列，秦桧贬黜了陆游，陆

游由此一直遭到秦桧的嫉妒。秦桧死后，陆游开始赴福建宁德任主簿。后来担任了敕令所的删定官。

当时，杨存中长久掌管戍守京城的正规军，陆游在疏中力陈其不当。皇上赞赏陆游的意见，遂罢免存中。京城中有些显贵人物购买珍宝玉器献给皇帝。陆游奏称：“陛下以‘损’作为斋名，自经籍及文房四宝之外，摒弃而不用；有些屑小，不能体察圣上之意，动辄就私买珍宝玉器以献，亏损圣上之德，请求严行禁绝。”

陆游在应答的时候还说：“非宗室及外祖父母家，虽确有功勋，不能随便封赏王爵。目前有因为师傅而任殿前都指挥使，还有以太尉而主管内阁之事，混乱朝廷体制，清加以改正。”任陆游为大理寺司直兼宗正簿。

孝宗即位，调任陆游为枢密院编修官，兼编类圣政所检讨官。史浩、黄祖舜推荐陆游善词章，熟悉典故。皇上因此召见陆游。皇上说：“陆游学问功底很深，很有才能，言论切实，合乎情理。”遂赐陆游进士出身。陆游进宫应对时说：“陛下新即位，深信诏令示人的时候是权威的，而那些官吏将帅玩忽职守，所以要对那些特别败坏规矩的，同大家一起抛弃他。”

南宋与金的和议将成之时，陆游又上书枢密院及中书门下，书上这样写：“长江以南自吴国以来，从来没有舍弃建康（今江苏南京）另立他都的。皇都今设在临安（今浙江杭州），乃是权宜之计。杭州形势、地势不稳固，运送馈饷不便，靠近海路，可能发生突然的忧患。和议之后，与金已立盟词。稍有变动，就会碰到障碍。所以，在和议的时候，应当与金约

定，建康、临安都是大宋的都城，金国使臣朝聘，或者到建康，或者到临安。这样，我们就能取得时间建都立国，金对我们也不会产生怀疑。”

那时龙大渊、曾觌当权。陆游对枢臣张焘说：“曾觌、龙大渊招权结党，培植势力，欺骗、迷惑圣上。您现在不揭穿他，将来就不可能除去他。”张焘就以此报告皇上，皇上询问这些话的由来，张焘回答是陆游说的。皇上十分愤怒，降陆游为建康府通判，后来又调任隆兴府（今江西南昌）。谏官议论和污蔑陆游交结台官，鼓吹是非，劝说张浚抗金，反对和议。由此，陆游被免职归家。很久以后，陆游才被任为夔州（今四川奉节）通判。

王炎任川陕宣抚使时，征召陆游入幕为干办公事。陆游为王炎陈述进取之策：“以为经略中原，必定要从长安（今陕西西安）开始，取长安必须从陇右开始。应该广积粮食，教军练兵，有战事则攻，无事则守。”吴玠的儿子吴玠代为掌管军队，吴玠十分骄傲任性，倾财结交士人，经常以过失误杀人，王炎也拿他没有办法。陆游请求王炎以吴玠之子吴玠代吴玠掌兵。王炎说：“吴玠十分懦弱而少谋略，遇敌作战必定要失败。”陆游则说：“假使吴玠碰到敌人，谁能保吴玠必胜不败。即令他得胜有功，愈加不可驾驭。”到了吴玠的儿子吴玠叛变，陆游的言论才得到验证。

范成大统帅四川，陆游是参议官，两人以文字相交。陆游不拘守官场的礼数，人们讥笑他颓放。陆游因自号“放翁”。后陆游调任江西常平提举。江西水灾，陆游奏请拨义仓粮赈灾，又给诸郡檄文要求发放粮食给灾民。陆游被召还京。

给事中赵汝愚驳斥陆游的奏议。陆游遂被免职，为宫观使，只拿些俸禄糊口。后来，又起用陆游，让他担任严州府知府（今浙江建德）。陆游上殿辞驾，皇上谕曰：“严陵山水风景十分优美，你公事办完，在余暇的时间里，可以游山、玩水、赋诗，自得其乐。”再召，陆游又入见皇上。皇上说：“卿笔力雄厚，回旋余地很大，甚好，其他人是不及你的。”任陆游为军器少监。

绍熙元年（1190），调任礼部郎中、兼实录院检讨官。嘉泰二年（1202），因为孝宗、光宗《两朝实录》及《三朝史》未修成，诏陆游权同修国史、实录院同修撰，并免去陆游上朝请安的礼节。后来，陆游又兼秘书监。三年书成以后，遂升陆游为宝章阁待制。陆游辞官回乡。

陆游才气超人、飘逸，尤善于诗。晚年再出时，为韩侂胄撰《南园阅古泉记》，为清淡派所讥笑。朱熹曾说过：“陆游的才能太高，业绩又不大，恐怕会为有权势的人所牵累，他的晚节不十分完善。”朱熹的话可以说是有先见之明啊！

嘉定二年（1209），陆游去世，享年八十五岁。

（刘炳福 译）

【原文】

陆游，字务观，越州山阴人。年十二，能诗文，荫补登仕郎。锁所荐送第一，秦桧孙埙适居其次，桧怒，至罪主司。明年，试礼部，主司复置游前列，桧显黜之，由是为所嫉。桧死，始赴福州宁德簿。以荐者除敕令所删定官。

时杨存中久掌禁旅，游力谏非便。上嘉其言，遂罢存中。中贵人有市北方珍玩以进者，游奏：“陛下以‘损’名斋，自

经籍翰墨外，屏而不御。小臣不体圣意，辄私买珍玩，亏损圣恩。乞严行禁绝。”

应诏言：“非宗室外家，虽实有勋劳，毋得辄加王爵。顷者有以师傅而领殿前都指挥使，复又以太尉而领阁门事，渎乱名器，令加订正。”迁大理寺司直兼宗正簿。

孝宗即位，迁枢密院编修官，兼编类圣政所检讨官。史浩，黄祖舜荐游善词章，谙典故，召见，上曰：“游力学有闻，言论剴切。”遂赐进士出身。入对，言：“陛下初即位，乃信诏令以示人之时，而官吏将帅一切玩习，宜取其尤沮格者，与众弃之。”

和议将成，游又以书白二府曰：“汉左自吴以来，未有舍建康他都者。驻骅临安出于权宜，形势不固，馈饷不便，海道逼近，凜然意外之忧。一和之后，盟誓已立，动有拘碍。今当与之约，建康、临安皆系驻骅之地。北使朝聘，或就建康，或就临安。如此，则我得以暇时建都立国，彼不我疑。”

时龙大渊、曾觌用事。游为枢密臣张焘言：“觌、大渊松权植党，荧惑圣听，公及今不言，异日将不可去。”焘遽以闻，上诘语所自来，焘以游对。上怒，出通判建康府。寻易隆兴府，言者论游交结台谏，鼓唱是非，力说张浚用兵，复归。久之，通判夔州。

王炎宣抚川、陕，辟为幹办公事。游为炎陈进取之策，以为经略中原。必自长安始，取长安必自陇右始。当积粟练兵，有衅则攻，无则守。吴玠子挺代掌兵，颇骄姿，倾财结士，屡以过误杀人，炎莫谁价？游请以玠子拱代挺。炎曰：“拱怯而寡谋，遇敌必败。”游曰：“使挺遇敌，安保其不败。就令有

功，愈不可驾驭。”及挺子曦僭叛，游言始验。

范成大帅蜀，游为参议官，以文字交。不拘礼法，人讥其颓放，因自号放翁。后累迁江西常平提举。江西水灾，奏：“拨义仓振济，檄诸郡发粟以予民。”召还，给事中赵汝愚驳之，遂与祀。起知严州，过阙，陛辞，上谕曰：“严陵山水胜处，职事之暇，可以赋咏自适。”再召入见，上曰：“卿笔力回斡，甚善，非他人可及。”除军器少监。

绍熙元年，迁礼部郎中兼实录院检讨官。嘉泰二年，以孝宗、光宗《两朝实录》及《三朝史》未就，诏游权同修国史，实录院同修撰，免奉朝请。寻兼秘书监。三年，书成，遂升宝章阁待制，致仕。

游才气超逸，尤长于诗。晚年再出，为韩侂胄撰《南园阅古泉记》，见讥清议。朱熹尝言“其能太高，迹太近，恐为有力者所牵挽，不得全其晚节。”盖有先见之明焉。嘉定二年卒，年八十五。

辛弃疾传

——《宋史》卷四〇一

【说明】辛弃疾（1140—1207），南宋词人，原字坦夫，改字幼安，别号稼轩居士。历城（今山东济南）人。生逢中原沦丧，金军屡屡南侵。辛弃疾一生以抗击入侵，恢复失地为理想，曾参加抗金义军，不久南归。南归四十余年，他或赋闲家居，或沉沦下僚，始终没有施展才能、实现抱负的机会，终于抱恨而死。

辛弃疾是南宋最杰出的词人。其词多抒写恢复失地的宏图，倾诉壮志难酬的悲愤，也有不少歌咏祖国河山的作品，笔力雄健，慷慨悲壮。艺术上，善于驾驭词调，常以赋、诗体入词，在语言的运用，用典、用事等方面，也颇有造诣。其词风格多样，而以豪放为主，与苏轼同为宋词豪放派代表作家，并称“苏辛”。部分作品也流露出消极情绪。有《稼轩长短句》。

辛弃疾，字幼安，齐地历城（今山东济南）人。少年时代，辛弃疾拜蔡伯坚为师，与党怀英是同学，号称“辛党”。开始时，他们用筮法来卜算他们的仕途，决定用蓍草作八卦。

党怀英得到一个“坎”卦，因此就决定留在山东，出仕金人；辛弃疾卜得一个“离”卦，因此决意南归。

金主亮死去后，中原豪杰纷纷起事反金。耿京聚兵山东，自称天平节度使，节制山东、河北反金的忠义军马。辛弃疾为耿京掌管书记，并劝耿京决策向南，归顺宋朝。和尚义端这个人，喜欢谈兵，弃疾有时也和他商讨学问。弃疾到了耿京军中，义端也聚集千余人抗金。弃疾劝说义端和尚当耿京部下，属耿京指挥。有一个晚上，义端和尚偷窃大印逃跑。耿京大怒，欲杀弃疾。弃疾说：“给我三天时间，不抓获和尚义端，杀我还不迟。”弃疾估计义端和尚必定要将耿京军队的情报奔告金帅，他很快去追袭，捕获了义端和尚。义端对辛弃疾说：“我认识了你的真相，你乃是年青有力的犀牛，你的力量很大、能杀人，希望你能不杀我。”辛弃疾斩其首而回去报告耿京，耿京更加看重弃疾。

绍兴三十二年（1162），耿京令辛弃疾回到南宋。高宗在建康（今江苏南京）慰劳犒赏军队，召见了辛弃疾，很高兴地接纳了他们归宋，授辛弃疾承平郎官职，为天平节度使掌管文书，并以节度使印及封诰召耿京。不巧这时张安国、邵进已杀掉耿京投降金人，弃疾还至海州（今江苏连云港），与大家商量，辛弃疾说：“我因主帅投归宋朝，没想到发生事变，怎样向朝廷复命呢？”于是便约统制王世隆及抗金忠义人马全福等悄悄地直扑金营，张安国正好与金将官庆功饮酒，即在众人中将张安国捕获捆绑而回，金将追来，没有赶上。辛弃疾献俘京城，斩张安国于市。朝廷仍任命辛弃疾担任原来的职务，又改派辛弃疾任江阴佾判。辛弃疾那一年才二十三岁。

乾道四年（1168），弃疾任建康府通判，六年（1170），宋孝宗召辛弃疾在延和殿应对。那时，正好虞允文掌握大权，宋孝宗又决心恢复大宋天下，辛弃疾在应对时，对孝宗论说长江南北形势以及三国晋汉人材，持论直爽坚决，不迎合其他人的观点。辛弃疾作《九议》并《应问》三篇、《美芹十论》，献于朝廷。这些著作谈到了逆顺的道理、宋金消长之形势、敌我技能之长短，地理之要害，十分完备。因为宋、金议和刚确定，朝廷没有采纳辛弃疾的建议。辛弃疾被调任司农寺主簿。后又出任滁州府（今安徽滁县）。滁州遭兵灾，城乡房屋被损，残败不堪。辛弃疾宽征薄赋，招集流散民众，训练民兵，实行屯田，于是创建奠枕楼，繁雄馆。成绩卓然。辛弃疾被征召为江东安抚司参议官。留守叶衡十分看重弃疾。叶衡入京为宰相，大力推荐辛弃疾慷慨有大志。弃疾被召见，调任仓部郎官、提点江西刑狱，平定剧盗赖文政有功，加封秘阁修撰，调任京西转运判官，被派遣知江陵府（今属湖北）、兼湖北安抚。

朝廷又调辛弃疾任职隆兴府（今江西南昌）、兼江西安抚。又以大理寺少卿召，出为湖北转运副使，又改湖南，旋即主持潭州（今湖南长沙）政务，兼湖南安抚。当时，盗贼不断在湖南湖北爆发叛乱，辛弃疾完全把他们平定了。辛弃疾为此上奏朝廷说：“当今朝廷政治清明，但连年来李金、赖文政、陈子明、陈峒相继造反，都能一人呼唤，千百人响应聚集，杀掠官吏民众，连死都不怕，导致麻烦，政府派大兵征剿，这是由于州官以横征暴敛，聚敛财赋为要务，因而差役遂有残民害物的状况，而州府不加以过问；县府也像州府一样，以

征收税务为急事，对差役残民害物的状况，县府也不加以过问。田野的民众，郡以聚敛财物害他们，县以征收税赋害他们，差役以讨取财物害他们，盗贼以掠夺害他们，在这样的情况下，民众不做强盗，又有什么办法，又将去哪里呢？民众是国家的根本，而贪官污吏迫使民众为盗。今年剿除，明年反而更加动荡。譬如木材，天天去刻，月月去削，不损坏就会折断。恳求陛下深思盗贼形成的根本原因，讲求消除盗贼的根本办法。无须依靠平定盗贼的士兵，只要申饬州县，以恩惠养育老百姓为要义。有违法贪冒之辈，使诸司都执行他们的职权，惩处违法之人，不要仅仅按察检举处理那些差役，以敷衍了事，自己却文过饰非。”诏书勉励并奖励辛弃疾。

皇上又提出，因湖南连接影响广东、广西，与溪洞蛮獠接连，不断发生反叛，难道因为是他们风俗顽强骠悍，抑或是武备空虚所造成的。辛弃疾于是又上奏疏说：“军政之弊端，主要是领导不统一，士兵占了名额被派遣出去，无时休止；而军人则坐在家里做些轻松的事。差役奔走公门，仅仅是为了衣食有所着落。所以教化废弛，逃亡者无人追捕，冒名顶替者无人检举，什么事也不管，则奸民无所忌惮，有所缓急则士卒不堪征发，至于调动大军，千里讨捕，胜负还未决定，威望损失惨重，为害不小，请求按照广东摧锋军，荆南神劲军，福建左翼军之例，另创一军，以湖南飞虎军为名。军队只属三牙、密院管辖，专听帅臣节制调度。这样就可使夷獠知道有军威，望风慑服。”

下诏，委任辛弃疾规划创建飞虎军。辛弃疾于是度量马殷营垒原来的地基，盖起栅栏、砦岩，招步军二千人，马军

五百人，侍从在外办事，战马铁甲皆完备，先以缗钱五万于广西买马五百匹。中央又下诏广西安抚司每年带买马三千匹。当时枢府有些官员对此不甚赞成，多次阻挠。而弃疾越是认真实行；结果不能取消辛弃疾的计划。经估计费用钜万计，弃疾善于斡旋，每件事都立刻办妥。谏官以经费开支浩大攻击辛弃疾，政府并发下御前金字牌，召弃疾回京，使此事马上停办。弃疾接到金牌，把它藏了起来，并责令监办者限定一月之内建成飞虎军营栅，否则按违反军规处理。结果如期落成。辛弃疾把事件的本末、经费的开支详细开列，绘图送到京城，皇上终于消除了对辛弃疾的不满。当时，秋雨绵绵，下了几个月，有关官员说造瓦不易，弃疾问：“需瓦多少？”回答：“要二十万。”弃疾说：“不要担心。”弃疾令厢宫在官舍、神祠以外，在每个居民家取沟甃瓦二，不几日，二十万瓦皆备，僚属对辛弃疾行事十分叹服。飞虎军成，雄镇一方，为江上诸军之首。

政府加封辛弃疾右文殿修撰，并派遣他知隆兴府（今江西南昌）兼江西安抚。当时，江北大饥，下诏，令弃疾任责荒政。弃疾刚到任，就在交通要道张贴榜文，榜文说：“不出卖粮食者发配充军，强买者斩首。”其次，令尽出公家官钱、银器，又召官吏儒生商贾市民，各举有财物者，适当向他们借些钱物，他们的责任是领运买入的粮食，不取利息。限期一个月，到城下出售粮食。于是一艘艘的运粮船不断驶来，粮价自然下降，民众靠它得以生存。当时，信守令谢源明乞求粮食救灾，幕僚不允。弃疾说：“均为赤子，皆王民也。”即以米船十分之三给予信守谢源明。帝嘉奖弃疾。职务进一级。

因为谏官攻击而落职。好久，才主管冲佑观。

绍熙二年（1192），起用弃疾，任福建提点刑狱。帝召见，调任大理少卿，加集英殿修撰，任福州知府兼福建安抚使。弃疾为官时，曾统帅军队。每次叹息说：“福州前靠大海，是造成海盗的渊源；上四郡民顽劣凶悍，容易作乱。帅臣空竭，出了事情怎么办？”碰到这种情况，务必镇静。”还未到岁末，就积钱串五十万缗，匾称“备安库”。弃疾说闽中土地狭小，民众稠密，歉收年则从广东买米。目前幸亏连年丰收，宗室及军人入仓请米，就命出来卖。等到秋天粮价便宜，以备安钱糴米二万石，则有备无患了。”弃疾又准备造战士铁甲一万，招强壮民众补军额，严训练，就不怕盗贼了。此事还未实行，台臣王蔺弹劾他用钱如泥沙，杀人如草芥，早晚端坐在“阎王殿”上，于是辛弃疾要求一个宫观使的职务而回归田里。

庆元元年（1195），辛弃疾落职。四年，恢复辛弃疾主管冲佑观。很久又复起用，任绍兴府知府兼浙东安抚使。四年，宁宗召见辛弃疾，议论盐法，加弃疾宝谟阁特制，提举佑神观。奉朝请。又调任镇江知府，赐金带。因牵连到犯错误的案子被举发，降为朝散大夫，提举冲佑观。后又令辛弃疾任绍兴府知府、两浙东路安抚使，由于弃疾推辞而免掉职务。政府又升他任宝文阁待制，又进龙图阁，任江陵府（今属湖北）知府，令赴京都奏事，试兵部侍郎，弃疾又辞去职务。进枢密院都承旨，未受命而去世。赐对衣、金带，守龙图阁待制，为弃疾办理退休手续，待赠四级。

辛弃疾豪爽，气节高尚，知道并提拔英雄俊杰，所交都是海内著名人士。弃疾曾为绍兴年间的诏文写过跋。他写到：

“假使这些诏书出于绍兴之前，可以没有奉事仇人的大耻；假使这些诏书行于隆兴之后，可以完成万世之大业。而今这些诏书与仇敌都同时存在，实在可悲！”人们都很佩服弃疾机警切实。弃疾治理长沙时，士人对主考官滥取第十七名《春秋》卷都很不满，弃疾取来察看，完全相信士子的议论。又索取亚榜《春秋》卷，两次加以更改。打开卷子一看，考生名赵鼎，弃疾怒曰：“佐国元勋，只有思简一人，何来又一赵鼎！？”把卷子掷在地上。接着又阅《礼记》卷。弃疾曰：“看其议论，一定是豪杰之士，一定不可失去。”开启观之，乃赵方也。辛弃疾曾说过人的一生在于勤，当以努力耕种为先，北方人养生之器具不求人，所以没有甚富甚贫之家；南方多经商，所以伤农，因此兼并之患就容易产生，贫富相差十分之大。弃疾因此以“稼轩”为名。弃疾任大理寺卿时，同僚吴交如死后无棺材埋葬。弃疾叹曰：“身为列卿而贫穷到如此情形，吴生确是清廉俭朴的人！”弃疾出钱厚葬之，并把此事告诉当朝执政，皇帝下诏赐给银绢。

辛弃疾曾经同朱熹一起游武夷山，赋《九曲棹歌》。朱熹写“克己复礼”、“夙兴夜寐”作为其二书斋之名。朱熹去世，禁伪学十分严厉。朱熹的门生故旧都没有去送葬。弃疾写了祭文，并往哭之曰：“所谓不朽者，名可垂万世，谁谓公已死，你凛凛如生。”弃疾喜爱和擅长长短句，其词悲壮激烈。有《稼轩集》行于世。绍定六年（1233），皇上追赠弃疾光禄大夫。咸淳年间，史馆校勘谢枋得经过弃疾墓旁的僧舍，听到堂上有疾声大呼，好像为弃疾鸣不平，自黄昏直到深夜三更，还没有停止呼声。谢枋独在烛光下作文，准备明晨祭奠辛弃

疾。祭文写成，呼声方才停止。德佑（1275）初，谢枋得向朝廷请求，因此给弃疾加赠少师，并按他生前的事迹给以“忠敏”的谥号”。
（刘炳福 译）

【原文】

辛弃疾，字幼安，齐之历城人。少师蔡伯坚，与党怀英同学，号“辛党”。始筮仕，决以蓍，怀英遇“坎”，因留事金；弃疾得“离”，遂决意南归。

金主亮死，中原豪杰并起。耿京聚兵山东，称“天平节度使”，节制山东、河北忠义军马。弃疾为掌书记，即劝京决策南向。僧义端者，喜谈兵，弃疾间与之游。及在京军中，义端亦聚众千余，说下之，使隶京。义端一夕窃印以逃。京大怒，欲杀弃疾。弃疾曰：“丐我三日期，不获，就死不难。”揣僧必以虚实奔告金帅，急追获之。义端曰：“我识君真相，乃青兕也，力能杀人，幸勿杀我。”弃疾斩其首归报，京益壮之。

绍兴三十二年，京令弃疾奉表归宋。高宗劳师建康。召见，嘉纳之。授承务郎天平节度掌书记，并以节使印告召京。会张安国、邵进已杀京降金。弃疾还至海州，与众谋曰：“我缘主帅来旧朝，不期事变，何以复命？”乃约统制王世隆及忠义人马全福等，径趋金营。安国方与金将酣饮，即众中缚之以归。金将追之不及，献俘行在，斩安国于市。仍授前官，改差江阴佾判。弃疾时年二十三。

乾道四年，通判建康府。六年，孝宗召对延和殿。时虞允文当国，帝锐意恢复。弃疾因论南北形势及三国晋汉人才，持论劲直，不为迎合。作《九议》并《应问》三篇、《美芹十论》，献于朝。言逆顺之理、消长之势、技之长短，地之要害，

甚备。以讲和方定，议不行。迁司农寺主簿，出知滁州。州罹兵烬，井邑凋残。弃疾宽政薄赋，招流散，教民兵，议屯田，乃创奠枕楼、繁雄馆。辟江东安抚司参议官，留守叶衡雅重之，衡入相，力荐弃疾慷慨有大略。召见。迁仓部郎官、提点江西刑狱，平剧盗赖文政有功，加秘图修撰。调京西转运判官，差知江陵府、兼湖北安抚。

迁知隆兴府，兼江西安抚。以大理寺少卿召。出为湖北转运副使。改湖南，知潭州、兼湖南安抚。盗连起湖湘，弃疾悉讨平之。遂奏疏曰：“今朝廷清明，比年李金、赖文政、陈子明、李峒相继窃发，皆能一呼啸聚千百，杀掠吏民，死且不顾。至烦大兵翦灭，良由州以趣办财赋为急，吏有残民害物之政，而州不敢问，县以并缘科敛为急，吏有残民害物之状，而县不敢问。田野之民郡以聚敛害之，县以科率害之，吏以乞取害之，豪民以兼并害之，盗贼以剽夺害之，民不为盗，去将安之？夫民为国本，而贪吏迫使为盗。今年剿除，明年戡荡。譬之木焉，日刻月削，不损则折。欲望陛下深思致盗之由，讲求弭盗之术，无徒恃平盗之兵，申饬州县，以惠养元元为意，有违法贪冒者，使诸司各杨其职，无徒按举小吏以应故事，自为文过之地。”诏奖谕之。

又以湖南控带二广，与溪洞蛮獠接连，草窃间作。岂惟风俗顽悍；抑武备空虚所致？乃复奏疏曰：“军政之敝，统率不一。差出占破，略无已时；军人则利于优闲窠坐，奔走公门，苟图衣食，以故教阅废弛，逃亡者不追，冒名者不举。平居则奸尼无所忌惮，缓急则卒伍不堪征行。至调大军，千里讨辅，胜负未决，伤威损重，为害非细。乞依广东摧锋、荆

南神劲、福建左翼例，别创一军，以湖南飞虎为名，止拨属三牙、密院，专听帅臣节制调度，庶使夷獠知有军威，望风慑服。”

诏委以规画，乃度马殷营垒故基，起尽砦栅，招步军二千人，马军五百人，僦人在外，战马铁甲皆备。先以缗领五万于广西买马五百匹，诏广西安抚司岁带买三千匹。时枢府有不乐之者，数沮挠之，弃疾行愈力，卒不能夺。经度费钜万计，弃疾善斡旋，事皆立办，议者以聚敛闻，降御前金字牌，俾日下住罢。弃疾受而藏之，出责监办者，期一月飞虎营栅成，违坐军制。如期落成，开陈本末，绘图缴进。上遂释然。时秋霖几月，所司言造瓦不易。问：“须瓦几何？”曰：“二十万。”弃疾曰：“勿忧！”令楔官自官舍，神祠外，应居民家取沟匭瓦二，不二日，皆具，僚属叹伏。军成，雄镇一方，为江上诸军之冠。

加右文殿修撰，差知隆兴府。兼江西安抚。时江右大饥，诏任责荒政。始至，榜通衢曰：“闭粜者配，强粜者斩。”次令尽出公家官钱，银器，召官吏、儒生、商贾、市民。各举有干实者，量借钱物，逮其责领运粜，不取子钱，期终月至城下发粜。于是连樯而至，其值自减。民赖以济。时信守谢源明乞米救助，幕属不从，弃疾曰：“均为赤子，皆王民也！”即以米舟十之三予信。帝嘉之，进一秩。以言者落职，久之，主管冲佑观。

绍熙二年，起福建提点刑狱。召见，迁大理少卿、加集英殿修撰，知福州兼福建安抚使。弃疾为宪时，尝摄帅，每叹曰：“福州前枕大海，为贼之渊，上四郡民顽犷易乱，帅臣

空竭，急缓奈何？”至是务为镇静，末期岁，子税镪至五十万缗，榜曰：“备安库”。谓闽中土狭民稠，岁俭则糴于广。今幸连稔，宗室及军人入仓请米，出即糴之。候秋贾贱，以备安钱糴二万石，则有备无事矣。又欲造万铠，招强壮补军额，严训练，则盗贼可以无虞。事未行，台臣王藺劾其用钱如泥沙，杀人如草芥，旦夕望端坐“阎王殿”，遂丐祠归。

庆元元年落职。四年，复主管冲佑观。久之，起知绍兴府兼浙东安抚使。四年，宁宗召见，言盐法，加宝谟阁待制，提举佑神观。奉朝请。寻差知镇江府，赐金带。坐缪举，降朝散大夫、提举冲佑观，差知绍兴府、两浙东路安抚使，辞免。进宝文阁待制，又进龙图阁、知汉陵府。今赴行在奏事，试兵部侍郎，辞免。进枢密都承旨，未受命而卒。赐对衣、金带、守龙图阁待制致仕。特赠四官。

弃疾豪爽尚气节，识拔英俊，所交多海内知名士。尝跋绍兴间诏书曰：“使此诏出于绍兴之前，可以无事仇之大耻；使此诏行于隆兴之后，可以卒不世之大功。今此诏与仇敌俱存也，悲夫！”人服其警切。帅长沙时，士人或珪考试官滥取第十七名《春秋》卷，弃疾察之，信然。索亚榜《春秋》卷两易之，启名则赵鼎也。弃疾怒曰：“佐国元勋，忠简一人，胡为又一赵鼎！”掷之地。次阅《礼记》卷，弃疾曰：“观其议论，必豪杰士也，此不可失。”启之，乃赵方也。尝谓：“人生在勤，当以力田为先。北方之人，养生之具不求于人，是以无甚贫甚富之家。南方多末作。以病农，而兼并之患兴，贫富斯不侔矣。”故以“稼”名轩。为大理卿时，同僚吴交如死，无棺敛。弃疾曰：“身为列卿，而贫若此，是廉介之士也。”

既厚赙之，复言于执政，诏赐银绢。

弃疾尝同朱熹游武夷山，赋《九曲棹歌》。熹书“克己复礼”、“夙兴夜寐”，题其二斋室。熹歿，伪学禁方严，门生故旧至无送葬者。弃疾为文往哭之。曰：“所不朽者！垂万世名。孰谓公死，凛凛犹生。”弃疾雅善长短句，悲壮激烈。有《稼轩集》行世。绍定六年，赠光禄大夫。咸淳间，史馆校勘谢枋得过弃疾墓旁僧舍，有疾声大呼于堂上，若鸣其不平，自昏暮至三鼓不绝声。枋得秉烛作文，旦且祭之，文成而声始息。德佑初，枋得请于朝，加赠少师，谥忠敏。

杨万里传

——《宋史》卷四三三

【说明】杨万里（1127—1206），南宋诗人。字廷秀，吉州吉水（今属江西）人。绍兴进士，曾任秘书监。任永州零陵（今属湖南）县丞时，南宋名将张浚勉励杨万里以“正心诚意”立学，因此取室名为“诚斋”，世称诚斋先生。

其诗与陆游、范成大、尤袤齐名，称“南宋四家”。初学江西诗派，后转变风格，以王安石和晚唐诗为借鉴，自成一派，世称“诚斋体”。其诗幽默诙谐，善于写景，语言平易浅近，常熔炼俗谚口语入诗。能辞赋。有《诚斋集》。

杨万里，字廷秀，吉州吉水（今江西吉水）人。绍兴二十四年（1154）中进士，为赣州（今江西赣州）司户，后又调永州零陵（今湖南零陵）丞。当时张浚被贬谪在永州，闭门谢客，杨万里去了三次都无法见到他，后来写信竭力请求才被接见了。张浚勉励他要认真进行内心道德修养，研究正心诚意的学问，杨万里一生都按照张浚的这个教导去做，还把自己的书房命名为“诚斋”。

后来张浚入朝做了宰相，把杨万里推荐给朝廷。任临安

府（今浙江杭州）教授，还没有赴任，父亲去世了。后来改知隆兴府奉新县（今江西奉新），在主持奉新县政事的时候，杨万里作了这样的规定：禁止差役到百姓家里去催逼赋税，老百姓偷逃赋税的就把名字张榜公布在市中心，因此百姓们闹闹嚷嚷地赶着来缴赋税，这样一来，不扰民但赋税却收足了，奉新县以此得到大治。当时正值陈俊卿、虞允文做宰相，他们都推荐了杨万里，杨万里就被召为国子博士。侍讲张栻因为评论张说而出守袁州（今江西宜春），杨万里上书直言要求留下张栻，又写信给宰相虞允文，用《论语》中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的道理相规劝，结果张栻虽然并没有留下来，而舆论都赞美杨万里的了不起。迁太常博士，不久升丞兼吏部侍右郎官，转将作少监，出知漳州（今属福建），改常州（今属江苏），不久又提举广东常平茶监。盗贼沈师进犯南粤，杨万里率领军队把他们剿平了。孝宗皇帝称赞杨万里有“仁者之勇”，因此有重用杨万里的意思，就任命他为提点刑狱。杨万里要求在潮（今广东潮州）惠（今广东惠州）二州筑外寨，驻扎军队，潮州的军队用来镇压盗贼的老巢，惠州的军队用来切断贼军的去路和归路。不久，杨万里因为有亲丧而去职。服丧期满，召为尚左郎官。

淳熙十二年（1185）五月，由于地震而应皇帝的命令给朝廷上书说：

臣听说在事情还没有发生的时候就议论将会发生一些什么事情，这并不影响他的一片忠心；而如果在事情已经发生，还在粉饰太平说是没有发生什么事情，那末他可以说是一个大大的奸臣。南北相安无事已经二十年

了，一旦断绝使者的往来，对敌方的情况就一点也不了解。而有人却说他们有五个领袖争位的祸乱，有人又说他们有匈奴被困于东胡的灾祸，不久事实证明都不是那样。现在小道传闻很多，有人说敌方在修理汴京（今河南开封）的城墙和护城河，在开掘海州（今江苏连云港）的漕河，又在河南、河北签发人民当兵，增加驿骑，制造马槽，登记井泉，而我们的情报人员又进不到这些地方去，怎么会弄到这步田地呢？这就是我所说的事情还没有正式发生而先进行议论的第一件事情。

有人说金人的头领回到北面去了，这对中国来说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事情。我认为中国的忧患，正是在这里。金人头领所以回到北面去，正是记取了当年完颜亮倾巢南侵因而造成后方空虚这个教训啊！侵略南方，就必须巩固北方；或者自己亲自镇守北方，而让他的儿子和女婿领兵侵略南方。这就是我所说的事情还没有正式发生而先进行议论的第二件事情。

我私下听到那些议论政事的人们中有人说，在紧急的时候淮河是无法固守的，因此打算放弃淮河而退守长江，这完全是一个错误的主意啊！从三国时吴和魏竭力进行争夺，终于得到了合肥（今属安徽），然后东吴才得以稳定；李煜失掉了滁州（今安徽滁县）、扬州（今属江苏）两个州，从此以后，南唐就开始局促不安。现在有人却说放弃淮河保持长江，既然已经没有淮河了，长江还可以保吗？这就是我所说的事情还没有正式发生而先进行议论的第三件事情。

现在淮河以东、淮河以西一共十五个州郡，这些州郡的守军负责人，不知道皇上是命令宰相去挑选的呢？还是命令枢密院去挑选的？如果命令宰相去挑选，宰相未必为枢密院考虑；如果由枢密院去选择，那末任命这些官员的手续不是自己部门办的。一边是不为对方考虑，一边是任命官员的手续不出于自己部门，等到事情紧急、发生了问题的时候，便都说责任不在我这方面，皇上准备去责备谁呢？这就是我所说的在事情还没有发生的时候而先进行议论的第四件事情。

而且南方和北方都有自己特别的本领，比如骑马射箭，是北方的特别本领，比如操船、步兵战，是南方的特别本领。现在替北方打算的人，每天在修理整治他们的海船，而南方的海船却没有听说在修理整治。有人说我们的船是一直准备在那里的，有的又说我们的船虽然还没有准备这只是因为害怕打扰百姓啊！绍兴辛巳（1161）的那场战争，山东、采石地区的胜利，不是靠的骑兵，不是靠的弓箭，不是靠的步兵，而恰恰是靠战船的功劳。但是当时的战船，现在还能够再使用吗？再说对百姓一日的打扰和国家长期的安危相比较，又是谁轻谁重呢？可见万事中本来就有着比打扰百姓更重要的事情啊！这就是我所说的事情还没有真的发生而先进行议论的第五件事情。

圣上认为现在是什么时候啊！现在是金人一天一天进逼，边境一天一天受到骚扰，但是却没有听到对防备金人有什么对策，对保卫边疆有什么办法；而耳中听到

的只是哪一天研究学习哪一条礼法条文，哪一天进呈哪一种书册史籍，这是用乡饮的礼节去治理军务，用跳干羽的舞蹈去解救敌人的包围啊。这就是我听说的事情还没有真的发生而先进行议论的第六件事情。

我听说古代的国君，百姓不能使他醒悟，那末天地能使他醒悟。今天国家所发生的情况又怎么样呢？敌情是如此的不可捉摸，而君臣上下都处之泰然，就像太平无事的时候一样，这说明百姓是无法使国君醒悟的了。所以上天就显示灾变，前些时候荧惑星侵犯南斗星，近日镇星又侵犯端门，荧惑守着羽林。我只是个书生，不通晓天文，不敢以为我的观察就一定是对的。至于今春正月太阳颜色发青而无光，好像有两个太阳在互相摩擦，这不是一件极大的怪事吗？然而上天还恐怕皇上不相信，所以在开始暖和的时候，又下了雨雪来杀害农作物，这不是一件极大的怪事吗？然而上天还是怕皇上不相信，所以在五月庚寅那一天，又发生了地震，这不又是一件大怪事吗？再说，上天显示的灾异发生在远方的，臣子不敢上奏，不信也就算了；地震发生在外州的，州郡长官不敢上达，不信也就算了，现在是灾变不断地发生，地震竟震到京师来了，而仍旧听不到君臣中有什么惊恐，也听不到朝廷中有人征询、查问。百姓不能使国君醒悟，那末天地能醒悟人君。我不知道皇上经过天地的这些警告，是醒悟了呢，还是没有醒悟呢？这就是我所说的在事情还没有真的发生之时而先进行议论的第七件事情。

自近年以来，两浙最先发生旱灾，接下来江淮又发

生旱灾，以后湖广又是旱灾，逃荒的人接连不断，道路上饿死的人相枕藉。而常平仓中备荒的粮食，有名而无实；上面下了储备粮食的命令，下面却并不立即执行。在太平年代没有事情的时候，不知道有救灾这样的事情；当发生灾荒有事的时候，将如何仰仗它救济灾民的粮源呢？这就是我所说的事情还没有真的发生而先进行议论的第八件事情。

古时候，要使国家充足，百姓富裕，只有粮食和货币。现在所谓钱这东西，富商、大贾、太监、权贵藏得满屋都是，至于百姓，军队士兵所用的，只是破纸币而已。万一像唐代泾原（今甘肃泾川）的军队那样，因为不满意吃粗粮，就把它一脚踢翻，嘴里还说了很多难听的话，于是引起了朱泚的叛乱，这能不令人寒心吗？这就是我所说的在事情还没有真的发生而先进行议论的第九件事情。

古时候，一个国家建立，必然有可以敬畏的地方，不是敬畏它的国家，而是敬畏他的人啊。所以苻坚想图取东晋，而王猛认为不可，认为谢安、桓冲是江左有威望的人，可见能保存东晋王朝的，就是这两个人啊。前些时候有名望的宰相比如赵鼎、张浚，著名的将军像岳飞、韩世忠，这些人都是金人所害怕的啊！近来刘珙是可用的人，可惜早死了，张栻也是可用的人，但是他给小人们中伤诋毁而死了，万一发生了急事，不知可以率领各路军队打仗的是哪个人，可以担当一个方面的又是哪个人，而金人一向所害怕的又是哪个人？或许有人会说，一

个人是否有才能，要在用了以后方能看到。我听说《礼记》上面有这样的话：“如果有车就一定能看到它车前的轼，如果一个人说话就一定能听到他的声音。”现在却说有这样的人才，但是却没有听说他能否做将军、做宰相，这是有车而没有轼，有言而没有声啊！而且所谓只有使用后才能看到他的才能，这就是说不是用大的安危、大的胜负考验他，就无法了解他是可用还是不可用。平时一点也不了解这个人，一定要等到国家碰上大的安危、大的胜负的时候才能看到他的才能，这样，事情成功了固然是万幸，万一事情失败了呢，岂不是悔之莫及？从前谢玄打败北方的苻坚，郗超是早就知道他必胜无疑的；桓温西伐李势，刘惔也是早就知道他必然会取得胜利的。这是因为谢玄在做木屐这样的小事上也是非常认真对待的；桓温在赌博时如果不能得手他就不干，这两个人在平素没有发生大事的日常生活里，观察他们对待小事情的态度上就可以相信他们在大事情上必然能获得成功，何必一定要到在大用的时候才能看到他们的表现呢？这就是我所说的在事情还没有真的发生就先进行议论的第十件事情。

希望圣上能站得高一点，这样就能看得远一点，对问题也就会看得明朗一点，领悟得深刻一点。不要骄矜自负，以为自己有崇高的圣德，结果恰恰是增加了自己的无能；不要自以为中国人口多、积蓄的物资丰富，而应该严肃地看到我们还有很多没有具备的东西。不要把天地发生的灾变看成是偶然的現象，而应该效法宣王在

灾变面前深表恐惧；不要对我的这些苦口婆心的忠告感到刺耳，而应该善于体会唐太宗对待谏诤的正确态度；不要以为女人、宦官之类左右小人的影响政事只是小事，而应该把汉、唐末世造成祸乱的那些根由作为借鉴；不要以为仇敌所包藏的祸心没有什么了不起，而应该把宣、政晚年所受的严重灾害作为警戒。要督责大臣们像富弼那样把边境的军事情况互相通报，不要让东西二府相互之间产生异心；要责成大臣们像萧何那样向朝廷推荐有奇才的谋臣良将，不要以为文和武是两条道路而车辙就不一样。不要让唐代大历那样某些人因为贿赂了宦官就可以成为镇守一方的军政长官的弊端重新发生，也不要像后梁段凝那样因为某些人买通了他的宠幸小人而得到招讨要职以致造成惨败的事情重新发生。要用重视四川那样的态度去重视荆州、襄州，这样可以使东、西两州的形势相接，连成一片；要用保卫长江的决心去保卫两淮，使长江和两淮就像衣服的表里，嘴巴的唇齿那样互为依靠。不要以为海路没有问题，不要以为长江就一定可以依靠，增加仓库积聚粮食，修造战舰扼守险要。君臣之间的答问，早晚之间的讨论，暂时把那些不是当务之急的事情搁置起来，专门讨论如何防备敌人的对策。这样，才上可消除皇天的灾变，下不致落入敌人所设的奸计。

然而天下的事情有主要的有次要的，就像树木的有本根，有枝叶一样。我前面所说的那些道理，不过是一棵树木的枝叶而已，什么是本根呢？就是国君不可以自以为是，把一切事情都包揽在自己身上。国君把一切事

情都包揽在自己身上，那末百官就没有事情可做，就不会主动承担什么责任了，然而这样还不至于危害到国家的根本。如果在军事方面，还是这样说：“谁当承担这份忧患呢？我应当自己来承担这样的忧患。”今天的情况难道就没有类似这样的情形吗？《左传》中说：“树木和水都有本原。”皇上的学问是十分渊博和高明的，希望能够认真思考什么才是皇上真正的本原。

东宫讲官缺职，皇帝亲自提升杨万里为侍读，宫中的官吏们因为得到一个正人而相庆贺。过了些日子，在读到《陆宣公奏议》等书的时候，杨万里都根据原意加以发挥，进行规劝，提出警戒，太子深深地敬重他。王淮做宰相，一天问杨万里：“宰相首先应该做的是什么事情？”杨万里回答说：“人才。”又问：“谁是人才？”杨万里立即开列出朱熹、袁枢等六十人的一份名单送给王淮，王淮先后提升任用了这些人。杨万里历任枢密院检详，守右司郎中，迁左司郎中。

淳熙十四年（1187）夏，发生了大旱灾，杨万里又应皇帝的命令上书朝廷，书中说：“大旱已经两个月了，然后再要求大家发表意见，不是太迟了吗？可是又只要求上自侍从，下到馆职这阶层的人员发表意见，范围不是太小了吗？这次之所以会发生旱灾，是因为上面的恩泽没有流到下面去，下面的情况没有通达到上面来，所以天地之气相隔绝而不通。”因此他分条罗列了四件大事献给皇帝，言词都非常恳切。后来迁秘书少监。这时正值高宗驾崩，孝宗想守三年丧，因此创立了一个议事堂，命令皇太子参预管理政务。杨万里上书孝宗，竭力规谏，而且又上书皇太子，说：“天无二日，民无二

王。一踏上危险的境地，懊悔还来得及吗？与其连懊悔都来不及，还不如推辞而不让自己处于这个境地。希望殿下三番五次地推辞，而一定不要答应去管理政务。”太子听了，毛骨悚然。高宗还未下葬，翰林学士洪迈不等集体商议，就独自决定把吕颐浩等人列入配飧的名单送给孝宗。杨万里上疏批评反对，竭力主张让张浚参预，而且指责洪迈这样做无异是指鹿为马。孝宗看了杨万里的奏疏很不高兴，说：“杨万里把我看成怎样的皇帝了！”因此把杨万里以直秘阁的身份外放为筠州（今江西高安）知州。

光宗即位后，召杨万里为秘书监，杨万里进宫回答皇帝的问话时说：“天下有看不见的祸害，僭越的人并非权臣，而比权臣的僭越还厉害，扰乱国家的并不是盗贼，可是比盗贼的扰乱还厉害，这不就是说的朋党吗！因为希望激怒人主的没有比朋党更逼切了，想把天下人才搞光的也没有比朋党更厉害了。朋党争论的产生，其始发生于士大夫中，而它的祸害却遍及于天下。前面发生的事情已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希望皇上能在您圣明的心中树立一个君主的统治标准，客观地、公正地听取多方面的意见，并且能多看看周围的实际情况，不让他们培植私党，一旦发现，就打散他们，是君子，就任用；是小人，就放废，都不要去过问他是属于哪一个党哪一个派。”又说：“古代的帝王，固然也有人知道把大权独揽在自己手里，但是却不知道臣下在窃夺他的权柄。大臣窃取了权柄，那末权力就落到大臣手中去了；大将窃取了权柄，那末权力就落到大将手里去了；外戚窃取了权柄，那末权力就落到了外戚手里；近臣窃取了权柄，那末权力就落到了近臣手里。窃权

这件事，最难防犯的，不就是近臣吗？！因为他们并不是公开盗窃的，而是在私下偷偷地干的，开始是私下偷偷地窃取，到最后必至于公然窃夺才肯罢休。这样的事不是很可惧吗！”

绍熙元年（1190），杨万里借为焕章阁学士去接待陪同金国贺正旦的使者并兼任实录院检讨官。当时正值《孝宗日历》编成，参知政事王蔭依旧例请杨万里为此书作序，而宰相却去请礼部郎傅伯寿作序。杨万里以失职为由竭力要求去职，皇帝派官向杨万里进行解释，勉励他继续留任，恰巧要把《孝宗圣政》这本书送进宫去，杨万里就担当了这个责任，他恭敬地捧着这本书进献给皇帝，但是皇帝还是不高兴，于是外放杨万里为江东转运副使，权总领淮西、江东军马钱粮。朝中议论打算在江南各郡使用铁钱，杨万里上疏陈述使用铁钱的不方便，又不按诏书的命令执行，违背了宰相的意见，因此改调为赣州（今属江西）知州，杨万里不赴任。后来他要求去礼部，结果授秘阁修撰，提举万寿宫，从此以后就不再出来了。

宁宗即位，召杨万里去临安行宫，杨万里辞谢不去。不久升为焕章阁待制，提举兴国宫。杨万里以年老为理由要求告退，结果是进杨万里为宝文阁待制后退休了。嘉泰三年（1203），诏进宝谟阁直学士，并赐给他衣带。开禧元年（1205）又下召，杨万里又辞谢不去。第二年，升宝谟阁学士。去世的时候八十三岁，赐光禄大夫。

杨万里为人刚直而急躁褊狭。孝宗开始时爱他的才，以此问周必大，周必大没有说杨万里的好话，因此没有得到重用。韩侂胄掌权，想网罗天下知名人士作为他的羽翼，曾建

立了一个南园，请杨万里为这个南园写一篇记，许诺让他到中书省、门下省去做官。杨万里说：“官我可以不做，文章是不写的。”韩侂胄很恼火，改命别人写了文章。杨万里在家里赋闲了十五年，都是韩侂胄掌握国家大权的时候。韩侂胄专权僭越日甚一日，杨万里十分忧愤，快快成疾。家里的人知道他是忧虑国家的原因，所以凡是从京中来的邸报中关于政局的信息都不告诉他。忽然有一个族中的子侄从外面来，讲到韩侂胄用兵的事情，杨万里痛哭失声，大呼拿纸来，他在纸上写道：“韩侂胄是奸臣，专权误国，目无君上，玩弄兵权残害人民，阴谋危害社稷，我空有这颗脑袋，却是报国无门，惟有一腔孤愤！”又写了十四个字和妻室、子女告别，放下笔就去世了。

杨万里精于诗歌，曾著《易传》流行于世，光宗皇帝曾为杨万里写过“诚斋”二字，因此学者称杨万里为“诚斋先生”，谥号“文节”。儿子名长孺。（姚汉荣 译）

【原文】

杨万里字廷秀，吉州吉水人。中绍兴二十四年进士第，为赣州司户，调永州零陵丞。时张浚谪永，杜门谢客，万里三往不得见，以书力请始见之。浚勉以正心诚意之学，万里服其教终身，乃名读书之室曰诚斋。

浚入相，荐之朝。除临安府教授，未赴，丁父忧。改知隆兴府奉新县，戢追胥不入乡，民逋赋者揭其名市中，民谯趋之，赋不扰而足，县以大治。会陈俊卿、虞允文为相，交荐之，召为国子博士。侍讲张栻以论张说出守袁，万里抗疏留栻，又遗允文书，以和同之说规之，栻虽不果留，而公论

伟之，迁太常博士，寻升丞兼吏部侍右郎官，转将作少监，出知漳州，改常州，寻提举广东常平茶盐。盗沈师犯南粤，帅师往平之。孝宗称之曰“仁者之勇”，遂有大用意，就除提点刑狱。请于潮、惠二州筑外砦，潮以镇贼之巢，惠以扼贼之路。俄以忧去。免丧，召为尚左郎官。

淳熙十二年五月，以地震应诏上书曰：

臣闻言有可于无事之时，不害其为忠；言无事于有事之时，其为奸也大矣。南北和好逾二十年，一旦绝使，敌情不测。而或者曰彼有五单于争立之祸，又曰彼有匈奴困于东胡之祸，既而皆不验。道涂相传，缮汴京城池，开海州漕渠，又于河南、北签民兵，增驿骑，制马枥，籍井泉，而吾之间谍不得以入，此何为者耶？臣所谓言有事于无事之时者一也。

或谓金主北归，可为中国之贺。臣以中国之忧，正在乎此。此人北归，盖惩创于逆亮之空国击南侵也。将欲南之，必固北之；或者以身填抚其北，而以其子与胥经营其南也。臣所谓言有事于无事之时者二也。

臣窃闻论者或谓缓急淮不可守，则弃淮而守江，是大不然。昔者吴与魏力争而得合肥，然后吴始安；李煜失滁、扬二州，自此南唐始蹙。今日弃淮而保江，既无淮矣，江可得而保乎？臣所谓言有事于无事之时者三也。

今淮东、西凡十五郡，所谓守帅，不知陛下使宰相择之乎，使枢廷择之乎？使宰相择之，宰相未必为枢廷虑也。使枢廷择之，则除授不自己出也。一则不为之虑，一则不自己出，缓急败事，则皆曰非我也。陛下将责之

谁乎？臣所谓言有事于无事之时者四也。

且南北各有长技，若骑若射，北之长技也；若舟若步，南之长技也。今为北之计者，日缮治其海舟，而南之海舟则不闻缮治焉。或曰吾舟素具也，或曰舟虽未具而惮于扰也。绍兴辛巳之战，山东、采石之功，不以骑也，不以射也，不以步也，舟焉而已。当时之舟，今可复用乎？且夫斯民一日之扰，与社稷百世之安危，孰轻孰重？事固有大于扰者也。臣所谓言有事于无事之时者五也。

陛下以今日为何等时耶？金人日逼，疆场日扰，而未闻防金人者何策，保疆场者何道；但闻某日修某礼文也，某日进某书史也，是以乡饮理军，以干羽解围也。臣所谓言有事于无事之时者六也。

臣闻古者人君，人不能悟之，则天地能悟之。今也国家之事，敌情不测如此，而君臣上下处之如太平无事之时，是人不能悟之矣。故上天见灾异，异时荧惑犯南斗，迺日镇星犯端门，荧惑守羽林。臣书生，不晓天文，未敢以为必然也。至于春正月日青无光，若有两日相摩者，兹不曰大异乎？然天犹恐陛下不信也，至于春日载阳，复有雨雪杀物，兹不曰大异乎？然天犹恐陛下又不信也，乃五月庚寅，又有地震，兹又不曰大异乎？且夫天变在远，臣子不敢奏也，不信可也；地震在外，州郡不敢闻也，不信可也。今也天变频仍，地震輶轂，而君臣不闻警惧，朝廷不闻咨访，人不能悟之，则天地能悟之，臣不知陛下于此悟乎，否乎？臣所谓言有事于无事

之时者七也。

自频年以来，两浙最近则先旱，江淮则又旱，湖广则又旱，流徙者相续，道殣相枕。而常平之积，名存而实亡；入粟之令，上行而下慢。静而无事，未知所以振救之；动而有事，将何以仰以为资耶？臣所谓言有事于无事之时者八也。

古者足国裕民，惟食与货。今之所谓钱者，富商、巨贾、阍臣、权贵皆盈室以藏之，至于百姓三军之用，惟破楮券尔。万一如唐泾原之师，因怒粝食，蹴而覆之，出不逊语，遂起朱泚之乱，可不为寒心哉！臣所谓言有事于无事之时者九也。

古者立国必有可畏，非畏其国也，畏其人也。故苻坚欲图晋，而王猛以为不可，谓谢安、桓冲江左之望，是存晋在二人而已。异时名相如赵鼎、张浚，名将如岳飞、韩世忠，此金人所惮也。近时刘珙可用则早死，张栻可用则沮死，万一有缓急，不知可以督诸军者何人，可以当一面者何人，而金人之所素惮者又何人？而或者谓人之有才，用而后见。臣闻之《记》曰：“苟有车必见其式，苟有言必闻其声。”今曰有其人而未闻其可将可相，是有车而无式，有言而无声也。且夫用而后见，非临之以大安危，试之以大胜负，则莫见其用也。平居无以知其人，必待大安危、大胜负而后见焉。成事幸矣，万一败事，悔何及耶？昔者谢玄之北御苻坚，而郗超知其必胜；桓温之西伐李势，而刘惔知其必取。盖玄于履屐之间无不当其任，温于博不必得则不为，二子于平居无事之日，盖

必有以察其小而后信其大也，岂必大用而后见哉？臣所谓言有事于无事之时者十也。

愿陛下超然远览，昭然远寤。勿矜圣德之崇高，而增其所未能；勿恃中国之生聚，而严其所未备。勿以天地之变异为适然，而法宣王之惧灾；勿以臣下之苦言为逆耳，而体太宗之导谏。勿以女谒近习之害政为细故，而监汉、唐季世致乱之由；勿以仇讎之包藏为无他，而惩宣、政晚年受祸之酷。责大臣以通知边事军务如富弼之请，勿以东西二府异其心；委大臣以荐进谋臣良将如有何所奇，勿以文武两途而殊其辙。勿使赂宦者而得旄节如唐大历之弊，勿使货近幸而得招讨如梁段凝之败。以重蜀之心而重荆、襄，使东西形势之相接；以保江之心而保两淮，使表里唇齿之相依。勿以海道为无虞，勿以大江为可恃。增屯聚粮，治舰扼险。君臣之所咨访，朝夕之所讲求，姑置不急之务，精专备敌之策。庶几上可消于天变，下不堕于敌奸。

然天下之事有本根，有枝叶。臣前所陈，枝叶而已。所谓本根，则人主不可以自用。人主自用，则人臣不任责，然犹未害也。至于军事，而犹曰“谁当忧此，吾当自忧”。今日之事，将无类此？《传》曰：“木水有本原。”圣学高明，愿益思其所以本原者。

东宫讲官阙，帝亲擢万里为侍读，宫僚以得端人相贺。他日读《陆宣公奏议》等书，皆随事规警，太子深敬之。王淮为相，一日问曰：“宰相先务者何事？”曰：“人才。”又问：“孰为才？”即疏朱熹、袁枢以下六十人为献，淮次第擢用之。

历枢密院检详，守右司郎中，迁左司郎中。

十四年夏旱，万里复应诏，言：“旱及两月，然后求言，不曰迟乎？上自侍从，下止馆职，不曰隘乎？今之所以旱者，以上泽不下流，下情不上达，故天地之气隔绝而不通。”因疏四事以献，言皆恳切。迁秘书少监。会高宗崩，孝宗欲行三年丧，创议事堂，命皇太子参决庶务。万里上疏力谏，且上太子书，言：“天无二日，民无二王。一履危机，悔之何及？与其悔之而无及，孰若辞之而不居。愿殿下三辞五辞，而必不居也。”太子悚然。高宗未葬，翰林学士洪迈不俟集议，配飧独以吕颐浩等姓名上。万里上疏诋之，力言张浚当预，且谓迈无异指鹿为马。孝宗览疏不悦，曰：“万里以朕为何如主！”由是以直秘阁出知筠州。

光宗即位，召为秘书监。入对，言：“天下有无形之祸，僭非权臣而僭于权臣，扰非盗贼而扰于盗贼，其惟朋党之论乎！盖欲激人主之怒莫如朋党，空天下人才莫如朋党。党论一兴，其端发于士大夫，其祸及于天下。前事已然，愿陛下建皇极于圣心，公听并观，坏植散群，曰君子从而用之，曰小人从而废之，皆勿问其某党某党也。”又论：“古之帝王，固有以知一己揽其权，不知臣下窃其权。大臣窃之则权在大臣，大将窃之则权在大将，外戚窃之则权在外戚，近习窃之则权在近习。窃权之最难防者，其惟近习乎！非敢公窃也，私窃之也。始于私窃，其终必至于公窃而后已。可不惧哉！”

绍熙元年，借焕章阁学士为接伴全国贺正旦使兼实录院检讨官。会《孝宗日历》成，参知政事王藺以故事俾万里序之，而宰臣属之礼部郎官傅伯寿。万里以失职力丐去，帝宣

谕勉留。会进《孝宗圣政》，万里当奉进，孝宗犹不悦，遂出为江东转运副使，权总领淮西、江东军马钱粮。朝议欲行铁钱于江南诸郡，万里疏其不便，不奉诏，忤宰相意，改知赣州，不赴。乞祠，除秘阁修撰、提举万寿宫，自是不复出矣。

宁宗嗣位，召赴行在，辞。升焕章阁待制、提举兴国宫。引年乞休致，进宝文阁待制，致仕。嘉泰三年，诏进宝谟阁直学士，给赐衣带。开禧元年召，复辞。明年，升宝谟阁学士。卒，年八十三。赠光禄大夫。

万里为人赐面褊。孝宗始爱其才，以问周必大，必大无善语，由此不见用。韩侂胄用事，欲网罗四方知名士相羽翼，尝筑南园，属万里为之记，许以掖垣。万里曰：“官可弃，记不可作也。”侂胄恚，改命他人。卧家十五年，皆其柄国之日也。侂胄专僭日益甚，万里忧愤，怏怏成疾。家人知其忧国也，凡邸吏之报时政者皆不以告。忽族子自外至，遽言侂胄用兵事。万里恸哭失声，亟呼纸书曰：“韩侂胄奸臣，专权无上，动兵贱民，谋危社稷。吾头颅如许，报国无路，惟有孤愤！”又书十四言别妻子，笔落而逝。

万里精于诗，尝著《易传》行于世。光宗尝为书“诚斋”二字，学者称诚斋先生，赐谥文节。子长孺。

柳开传

——《宋史》卷四四〇

【说明】柳开（947—1000），宋代散文家，原名肩愈，字绍先（一作绍元）；后改名开，字仲涂，意为“将开古圣贤之道于时也”（《补亡先生传》）。大名（今属河北）人。开宝进士，宫殿中侍御史，又知全州、桂州等地。

柳开是宋代古文运动的先驱，提倡复古，反对五代颓靡的文风。他曾学习韩愈文章，后来以“六经”为榜样，倡导古文，主张文章应有助于教化。其理论开欧阳修诗文革新运动的先声。但其创作成就不高，大多不免辞涩言苦之弊。有《河东先生集》。

柳开，字仲涂，大名（今属河北）人。父亲柳承翰，在乾德初年任监察御史。柳开小时候异常聪敏，有胆气，又勇敢。后周显德末年，柳开的父亲到南乐（今属河南）去做官，柳开跟随父亲到任上。有一天晚上，柳开和家里的人一起闲立庭中，突然有强盗冲进来，其他人都吓得不敢动，这时的柳开，仅仅十三岁，但却智勇过人，他急忙拔剑追逐盗贼，盗贼跳墙逃去，柳开紧追不舍，挥剑斩断了盗贼的两个脚趾。

柳开开始读书以后，就喜欢研讨经书的精义。五代时候，文风浮靡，格调卑弱，柳开仰慕韩愈和柳宗元的文章，因此把自己的名改成肩愈，字改为绍先。柳开既把自己的名和字作了这样的改动。就认为自己能沿着先圣指引的方向，开出一条宽阔的坦途来。著书时自号“东郊野夫”，又号“补土先生”，他还写了两篇文章来说明为什么要给自己起这两个号。柳开以崇尚气节自任，不拘小节，他所交往的都是当时的一些豪放不羁、才能出众的人物。范杲爱好古学，所以他尤其推崇柳开的文章，社会上称之为“柳、范”。王佐是大名这个地方的长官，柳开把自己的文章送给他，受到王佐极大的赞赏。杨昭俭、卢多逊也是大名这个地方的名人，他们都接待和称赞柳开。宋太祖开宝六年（973），柳开中了进士，补宋州（今河南商丘）司寇参军，因为案件办得好，所以被提升为本州的录事参军。太平兴国年间，柳开被提升为右赞善大夫，适逢进征太原（今属山西），柳开被派去监督楚、泗八州的运粮事宜。后被选派去管理常州政事，又提升为殿中丞，以后又迁移到润州（今江苏镇江），任命为监察御史。后被皇帝召回，让他去管理贝州（今河北南宫）政务，以后又转调为殿中御史。雍熙二年（185），因为与监军忿怒相争，贬谪为上蔡（今属河南）县令。

恰巧又碰到朝廷大举北征契丹，柳开押送军粮，将到涿州（今河北涿县），正好遇上契丹酋长率领了一万骑兵与米信交战，双方打得难分难解，不久，契丹忽然派了使者来向米信谎言求降，柳开对米信说：“兵法上说：‘没有相约而来要求讲和，是一种阴谋。’契丹人一定有阴谋，你马上向他们进

攻，必然全取得胜利。”米信却迟疑不决，按兵不动。过了两天，契丹又率领军队向米信挑战，后来经过侦察，知道契丹军队果然是箭已用完，正等待从幽州（今北京）把箭运来。当北征军队回到首都时，柳开上书太宗，表示自己愿意在边疆为报效祖国而死的决心，宋太宗很爱惜柳开，所以又任命柳开为殿中侍御史。

雍熙年间，柳开被派遣出使河北，因此他向太宗皇帝上书直言说：“臣下受到皇上的非常之恩，还没有来得及报答，臣下年才四十，胆力方壮，正是可以效力国家的时候。现在契丹尚未消灭，愿皇上能给臣下几千名步兵和骑兵，让我在河北有一个用兵之地，臣下一定会出生入死，为皇上收复蓟州（今天津蓟县），虽然战死沙场，也是臣下的愿望。”太宗以为，自五代以来，战争连绵，因此从节度使到刺史，都由武将担任，他们大都不懂政事，因此弊端很大，所以想兼用一些文人来担任这些职务，于是就让侍御使郑宣、户部员外郎赵载、司门员外郎刘墀皆任如京使，左拾遗刘庆任西京作坊使，柳开任崇仪使，管理宁边军事。

后来柳开被徙到全州（今属广西）。全州西面的溪洞中住着粟氏族人，他们聚族而居，有五百余人，这些人经常侵扰附近的百姓，掠夺人口、粮食和牲畜，柳开在衙役中挑选了三个勇敢而且善辩的人，为他们制作了衣带巾帽，让他们入溪洞去晓谕粟氏人：“你们如果能够归附我们，即有重赏。给你们土地种，为你们造房屋住。不然，就派兵打进溪洞，把你们彻底消灭掉。”粟氏很害怕，他们留下两个衙役为人质，带着四个酋长和一个衙役一起来见柳开。柳开给了他们丰厚的

犒劳和赏赐，当地的官吏和百姓们都争相请粟氏人到家中作客，一面饮酒，一面奏乐。柳开让这些粟氏人住了几天，然后把他们又送回溪洞，到了约定的日期，粟氏人扶老携幼，全部来到柳开这里。柳开立即给他们房屋和土地，并写了一篇题为《时鉴》的文章，把它刻在石上作为鉴戒。柳开又派遣粟氏的首领入朝，朝廷授任他为全州的上佐，并赏赐柳开钱三十万。

淳化初年，柳开调到桂州（今广西桂林）主管政务。起初，柳开在全州的时候，有一个士兵和柳开争论起来，柳开立即对他用了杖刑和墨刑，并且把他送到朝廷。有关方面认为这个士兵所犯的罪行不够判徒刑，于是就把柳开传到京师，关进御史狱进行审问，结果是官阶削了二级，降为复州（今湖北沔阳）团练副使，移置滁州（今安徽滁县）。后来又恢复了柳开原来的官阶，让他去管理环州（今甘肃环县），柳开在环州三年，后调到邠州（今陕西彬县）。当时，邠州转运使正调集百姓拉着车辆把粮草急送到环（今甘肃环县）、庆（今甘肃庆阳），百姓连续送了几次，都已经倾家荡产了，而转运使还催逼百姓要再送，于是，几千个百姓到州府呼叫申诉。柳开给转运使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我最近才离开环州，知道环州的粮草即使不再增加，军队也可以吃四年。现在农村正是蚕忙季节，如果再要征调一半的人力去运粮草，那么，百姓们无论老的小的都一定会贫病交加，牲畜和车辆也会破败不堪，您又何必一定要让他们遭受这样的痛苦呢？如果您再不停止督运，我就立即赶到京城去，向皇上申诉。”督运粮草的事终于停止了。后来，柳开又先后被任命管理曹（今山东

曹县)、邢(今河北邢台)二州的政务。

真宗即位，给柳开加了一个如京使的官职，回到朝廷，真宗任命柳开去管理代州(今山西代县)政务。柳开上书真宗说：

国家创业将近四十年了，陛下继承两位圣明天子的皇位，应该精细地研究最佳的治理方法。如果是遵守旧的一套规章制度，还没有达到完善的地步，那末改用新法，就可以得到神奇的效果。

臣以为益州(今四川成都)已稍稍安定，希望陛下能够选择一位贤明能干的大臣去镇守，这个人必须既有很高的名望又有很高的威信，能够让那班小人畏服。另外，西部边境那些民族现在虽然已归附了我们大宋王朝，以后未必能保证一直这样，如果有反复，必须选择能干的人去制服和统治他们，假如拿契丹来作比较，西部边境的后患更加严重，为什么呢？契丹是君臣关系早就定下来了，外族和汉族也早有分别，即使又产生向南面侵略的野心，他们自己也必须考虑考虑。而西部边境那些少数民族对汉族人所积的仇恨还没有消灭，贪婪之心没有改变，他们下面的那些人都是桀骜不驯，爱出坏主意的人，侵占到我们那么一点好处未必能满足，我们对他们的姑息也未能使他们感恩，希望对他们能经常防备着点。用优秀的将领镇守要害之地，用丰厚的赏赐满足他们的贪婪之心，用抚慰的办法培养他们的归顺之心，用宽容的态度消除他们的邪念。多派遣使者深入甘州(今甘肃张掖)、凉州(今甘肃武威)一带，厚结他们的心，

为我们作声援，如果西部边境的少数民族对我们有侵略活动，就让他们从背后对这些侵略者突然袭击，使西部边境的那些民族有后顾之忧，这样，就可以控制他们的轻举妄动。现在我们的军队虽然数量很多，但是不及太祖时候人人练武，谋臣猛将也远不及太祖时候多，所以这些年来西北地区不断受到侵扰，养兵的军费每月开支很大，打起仗来却没有听到他们有胜利的消息。我诚恳希望军队能经常训练，禁止怠惰懒散，使他们能够像从前一样，军队必须要求将士勇敢，在指挥作战的时候，一指一瞥之间都不允许放纵不受先后次序的拘束，违反纪律者都要杀，建立功劳的一定要赏，除去偏将、裨将、主将中那些没有威严的人，皇上应该在听朝的空余时间，亲自到殿庭中去，召集勇猛的将士，让他们练习击刺、骑马、奔驰，以显扬我们大宋王朝武力的强盛。

臣又以为，宰相、枢密、朝廷大臣，既然委任了他们，就一定不能猜疑他们，使用他们的时候一定要很得当，让他们总的负责官吏的选拔、品评，对内主管各个部门；对外分别管理全国。现在，京朝官却又另外设置了审官，供奉、殿值又另外立了三班，刑部不让他们断狱，而另设审刑，宣徽司更是若存若亡，就像没有这个机构一样。大臣得不到信任，小臣又被认为特别的公正。至于像银台这一个司，原来是属于枢密院的，近年经过制度改革以后，名义上主管的事务很多，人员由此加倍，但实际上它所管的事情还是和从前一样，既然没有利害之别，那么这样的变更就是徒有虚名。臣希望撤消审官、

三班这些机构，仍旧委派中书、枢密、宣徽院接管这些机构的职务，银台司仍归枢密院，审刑院仍归刑部，去掉这些繁琐苛细的设施，省掉它们的头目。

再有，京城是首府，是全国的榜样，希望能够按照旧制，选择委派可信任的贤明官员去担任长官。现在皇族的宗子大多已经长大成人，只是让他们过着优裕的生活而没有考核他们的才能，应该委派他们到外地去做藩王，在文武百官中选择那些忠诚坦直的人，在他们左右担负起引导、辅佐的责任。

还有，现在全国的州、县、官吏的配置很不均匀，或者是过多，或者是成年累月长期缺任。希望四千户以上的县由朝廷选择朝官去管理政事，三千户以上的县由朝廷选择京官去管理政事。省去县主簿的职务，让县尉兼管主簿的工作。其它自通判、监军、巡检、监临使臣这一类职官，臣以为可以酌情缩减，以免白白浪费俸禄，而把这笔经费分摊给在职的官员。

还有，人心贪婪，相互竞争，世风浇薄，虽然是骨肉至亲，但一旦发生利害冲突，情况就会发生很多的变化。同一个部门的官员，多有不和睦的，有隙可乘的时候就落井下石，发生患难的时候完全没有相互救济，古人那种仁义之风已是荡然无存。希望能够明白地颁发告谕，使大家都能改变这种风气，这样才可以使社会风化重新淳厚起来，这是使我们国家得以长治久安的根本。

我们的太祖皇帝在武功方面威名赫赫，我们的太宗皇帝在文治方面大有成就，他们的光辉被盖百王，他们

的威望遍及万国，没有一个贤才不被重用，没有一件事情他们不知道。伏望皇上开阔胸怀，让心胸像青天、大海那样宽阔开朗，可以作决断的立即作出决断，能够做的事情立即就做，爱护那些忠诚正直的臣下，辨察那些奸邪误国阿谀奉迎的党人，臣长期处在重要的地位，受到皇上深厚的恩宠，但我的这个奏疏却是言辞狂勃情理粗劣，唯望圣明的天子能宽恕我。

柳开到了代州，修理城墙，积聚武器，准备打仗，但将官们却大多破坏他的主张，不同他合作。柳开对自己的侄儿说：“我最近观看天象，发现昴宿很亮，而且云气也从北方来侵犯我们代州，这些，都说明了敌寇将要来侵犯我们了。我听说军队要打胜仗，重要的是内部要团结，现在将官们都怨我，一旦敌寇来犯，必然会危害于我。”于是立即要求调换一个州郡，结果调去做忻州（今山西忻县）刺史。及至契丹侵犯边境的时候，柳开向真宗上书，请求真宗亲临河朔（泛指黄河以北）检阅军队以显示军威。真宗四年（1001），柳开被迁徙到沧州（今河北沧县），在去沧州的路上，因为头上生疮而死了，终年五十四岁。朝廷任用柳开的儿子柳涉为三班奉职。

柳开善于射箭，喜欢弈棋，有文集十五卷。他写了一千多字的《家戒》，刻在碑上以教训儿子们。柳开的性格豪爽重义气。他在大名的时候，有一次在酒店饮酒，旁边有一个读书人，柳开发现这个读书人说话的神态和别人不同，于是就询问他的姓名，才知这个读书人是从京城里来的，亲人死了，因家贫而无法殡葬，听说大名地方的王佑非常讲义气，所以

特地来大名求王佑帮助。柳开问读书人所需费用要多少，读书人说：“二十万足够了。”柳开倾其所有，得到白金百余两，再加上钱几万，都送给了这个读书人，打发他回去了。

（姚汉英 译）

【原文】

柳开字仲涂，大名人。父承翰，乾德初监察御史。开幼颖异，有胆勇。周显德末，侍父任南乐，夜与家人立庭中，有盗入室，众恐不敢动，开裁十三，亟取剑逐之，盗逾垣出，开挥刃断二足指。

既而学，喜讨论经义。五代文格浅弱，慕韩愈、柳宗元为文，因名肩愈，字绍光。既而改名字，以为能开圣道之涂也。著书自号东效野夫，又号补亡先生，作二传以见意。尚气自任，不顾小节，所交皆一时豪俊。范杲好古学，尤重开文，世称为“柳、范”。王佑知大名，开以文贄，大蒙赏激。杨昭俭、卢多逊并加延奖。开宝六年举进士，补宋州司寇参军，以治狱称职，迁本州录事参军。太平兴国中，擢右赞善大夫。会征太原，督楚、泗八州运粮。选知常州、迁殿中丞，徙润州，拜监察御史。召还，知贝州，转殿中侍御史。雍熙二年，坐与监军忿争，贬上蔡令。

会大举北征，开部送军粮，将至涿州，有契丹酋长领万骑与米信战，相持不解，俄遣使给言求降，开谓信曰：“兵法云：‘无约而请和，谋也。’彼将有谋，急攻之必胜。”信迟疑不决。逾二日，贼复引兵挑战，后侦知果以矢尽，俟取于幽州也。师还，诣阙上书，愿从边军效死，太宗怜之，复授殿中侍御史。

雍熙中，使河北，因抗疏曰：“臣受非常恩，未有以报，年裁四十，胆力方壮。今契丹未灭，愿陛下赐臣步骑数千，任以河北用兵之地，必能出生入死，为陛下复幽蓟，虽身没战场，臣之愿也。”上以五代战争以来，自节镇至刺史皆用武臣，多不晓政事，人受其弊。欲兼用文士，乃以侍御史郑宣、户部员外郎赵载，司门员外郎刘墀并为如京使，左拾遗刘庆为西京作坊使，开为崇仪使、知宁边军。

徙全州。全西溪洞有粟氏，聚族五百余人，常钞劫民口粮畜，开为作衣带巾帽，选牙吏勇辩者得三辈，使入谕之曰：“尔能归我，即有厚赏，给田为屋处之；不然，发兵深入，灭尔类矣。”粟氏惧，留二吏为质，率其酋四人与一吏皆来。开厚其犒赐，吏民争以鼓吹饮之。居数日遣还，如期携老幼悉至。开即赋其居业，作《时鉴》一篇，刻石戒之。遣其酋入朝，援本州上佐。赐开德三十万。

淳化初，移知桂州。初，开在全州，有卒讼开，开即杖背黥面送阙下。有司言卒罪不及徒，召开下御史狱劾系，削二官，黜为复州团练副使，移滁州。复旧官，知环州。三年，移邠州。时调民犂送趣环、庆，已再运，民皆荡折产业，转运使复督没运，民数千人入州署号诉。开贻书转运使曰：“开近离环州，知刍粮之数不增，大兵可支四年。今蚕农方作，再运半发，老幼疲弊，畜乘困竭，奈何又苦之？不罢，开即驰诣阙下，白于上前矣。”卒罢之。又知曹、邢二州。

真宗即位，加如京使，归朝，命知代州。上言曰：

国家创业将四十年，陛下绍二圣之祚，精求至治。若守旧规，斯未尽善；能立新法，乃显神机。

臣以益州稍静，望陛下选贤能以镇之，必须望重有威，即群小畏服。又西鄙今虽归明，他日未可必保，苟有翻复，须得人制御，若以契丹比议，为患更深。何者？契丹则君臣久定，蕃汉久分，纵萌南顾之心，亦须自有思虑。西鄙积恨未泯，贪心不悛，其下猖狂，谋凶恶，侵渔未必知足，姑息未能感恩，望常预备之。以良将守其要害，以厚赐足其贪婪，以抚慰来其情，以宽假息其念。多命人使西入甘、凉，厚结其心，为我声援，如有动静，使其掩袭，令彼有后顾之忧，乃可制其轻动。今甲虽众，不及太祖之时人人练习，谋臣猛将则又悬殊，是以比年西北屡遭侵扰，养育则月费甚广，征战则军捷未闻。诚愿训练禁戢，使如往日，行伍必求于勇敢，指顾无纵于后先，失律者悉诛，获功者必赏，偏裨主将不威严者去之。听断之暇，亲临殿庭，更召貔虎，使其击刺驰骤，以彰神武之盛。

臣又以宰相、枢密、朝廷大臣，委之必无疑，用之必至当。铨总僚属，评品职官，内则主管百司，外则分治四海。今京朝官则别置审官，供奉、殿直则别立三班，刑部不令详断，别立审刑，宣徽一司全同散地。大臣不获亲信，小臣乃谓至公。至如银台一司，旧属枢密，近年改制，职掌甚多，加倍置人，事则依旧，别无利害，虚有变更。臣欲望停审官、三班，复委中书、枢密、宣徽院，银台司复归枢密，审刑院复归刑部，去其繁细，省其头目。

又京府大都，万方轨则，望仍旧贯，选委亲贤。今

皇族宗子悉多成长，但令优逸，无以试材，宜委之外藩，择文武忠直之士，为左右赞弼之任。

又天下州县官吏不均，或冗长至多，或岁年久阙。欲望县少千户已上选朝官知，三千户已上选京官知。省去主簿，令县尉兼领其事。自余通判、监军、巡检，监临使臣并酌量省减，免虚费于利禄，仍均济于职官。

又人情贪竞，时态轻浮，虽骨肉之至亲，临势利而多变。同僚之内，多或不和，伺隙则致于倾危，患难则全无相救，仁义之风荡然不复。欲望明颁告谕，各使改更，庶厚化原，永敦政本。

恭惟太祖神武，太宗圣文，光掩百王，威加万国，无贤不用，无事不知。望陛下开豁圣怀，如天如海，可断即断，合行则行，爱惜忠直之臣，体察奸谀之党。臣久尘著位，寝荷恩宠，辞狂理拙，唯圣明恕之。

开至州，葺城垒战具，诸将多沮议不协。开谓其从子曰：“吾观昴宿有光，云多从北来犯境上，寇将至矣。吾闻师克在和，今诸将怨我，一旦寇至，必危我矣。”即求换郡，徙忻州刺史。及契丹犯边，开上书，又请车驾观兵河朔。四年，徙沧州，道病首疡卒，年五十四。录其子涉为三班奉职。

开善射，喜奕棋。有集十五卷。作《家戒》千余言，刻石以训诸子。性倜傥重义。在大名，尝过酒肆饮，有士人在旁，辞貌稍异，开询其名，则至自京师，以贫不克葬其亲，闻王佑笃义，将丐之。问所费，曰：“二十万足矣。”开即罄所有，得白金百余两，益钱数万遣之。

苏舜钦传

——《宋史》卷四四二

【说明】苏舜钦（1008—1048），北宋诗人。字子美，祖籍梓州铜山（今四川中江），迁居开封。曾任大理评事、集贤殿校理，监进奏院。后退隐苏州，建沧浪亭。

苏舜钦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重要作家，工散文，多政论之作，文笔犀利。其诗热情奔放，笔力豪隽超迈，与梅尧臣齐名，深受欧阳修推许。有《苏学士文集》。

苏舜钦，字子美，参知政事苏易简的孙儿。父亲苏耆，有才名，曾为工部郎中，当值集贤院。苏舜钦少年时代就慷慨任气，具有远大的志向，他的外貌奇特壮伟，很不平常。在天圣年间，文人们写文章多有喜欢偶对的毛病，唯独苏舜钦和河南（今河南洛阳）的穆修喜欢古文和诗歌，一时之间，那些豪放不羁，才能出众的人们都喜欢和他们交游。

开始，苏舜钦因为父亲的关系而补授为太庙斋郎，调荥阳县（今河南荥阳）尉。玉清昭应宫发生火灾，当时二十一岁的苏舜钦就到登闻鼓院向皇帝上了一道奏疏，奏疏中说：

坚贞不屈的刚强之士不躲开铁钺之刑而进谏，英明

的君主不隐讳过失而接纳忠言，所以怀抱谋略的人一定能在君主面前倾吐，积怨的人也不至于会达到嘴巴中虽然不说但心内却十分怨诽的程度。然而忠言直谏之难不如容纳意见难，容纳意见之难又不如付之实行难，如果能做到凡是直谏的话一定接受，而且一定付诸实施的话，那就是三代的英主了啊，希望皇上能留心听取这些话。

臣观察今年从春天到夏天，一直是阴雨连绵从未间断，农田受灾的面积几乎达到十分之九。臣以为这是由于皇上用人不当，政策法规中的失误太多，以及赏罚失当而招来的灾祸。上天之所以要降下这场灾祸，是想借此让皇上醒悟，而大臣们却把天降灾祸的责任归到刑罚的失实和过度，皇上就相信了这种说法，所以用大赦天下的办法祈禳消灾。这样，就是杀人的人可以不死，伤人的人可以不用抵罪，希望用这种办法去迎合天意。古时候用从速处理历年积案的办法以平息水灾和旱灾，而没有听说用赦免囚犯的办法，所以自从皇上实行大赦以后，天空仍旧是黄尘弥漫、昏暗不明，一直到现在。

以前有记载说：“阴积得多了就生阳，阳产生以后就要发生火灾。”大火趁着夏天炎热之气肆虐于玉清昭应宫，雷雨大作，烈焰四起，玉清昭应宫原来那些重重叠叠难以数清的楼台亭榭，倾刻之间就化为灰烬，不是人们对火灾没有防备，而是上天要以此来警诫皇上啊！所以皇上应该穿素服，减御膳，避正寝，作自我批评加罪于自己，并且发一道哀痛的诏书，停止不急之事，拯救失业之民，考察宰相以及左右侍从，把那些无益于国体

的人加以罢免，革除那些喜欢玩弄权柄的人；反思在政治和刑狱方面的失误，听取割草打柴的普通百姓的意见，这样，也许可以变灾祸为福佑。

十天以来，没有听说皇上为消灾而做过什么重要事情。而现在却在计算工役准备修复玉清宫了。京都的百姓听到这件事后都感到惊骇和困惑，所以都聚在一起纷纷议论，都说这样做法是不对的。人们都说章圣皇帝勤俭治国十多年，天下富足，国库中的钱都堆不了，然后才建造这座玉清昭应宫，但是等到工程结束，国内的财政已经空虚衰竭。皇上即位还不到十年，而且多次遭受水旱灾害，虽然所征赋税都进了国库，而百姓却已经弄得非常困难和疲乏了。如果还要大兴土木，则费用不知要消耗多少，财力消耗在里面，百姓疲劳在下面，里面消耗，下面疲劳，何以为国！况且上天降灾给我们，是因为我们自己违背了天意，现在这种做法，是想去和上天竞争，没有丝毫反省责备自己的意思。违背天意是不祥的，要想使自己安定是很难的，想祈求上天赐给我们厚福，能得到吗！现在为皇上考虑，还不如进用一批贤人，去掉那些奸佞之徒，勤于修德而达到最好的治理境界，使百姓富足而又能减少他们的赋税，这样，就可以上谢天意下安民情了。

贤明的君主看到天地的灾变，便修明治道去消除凶象。乱世看不到灾变现象，因为上天不来警告你。现在幸而上天现出灾变，这正是皇上修明自己的好机会，怎么可以忽视它呢！从前汉元帝三年（前46）茂陵白鹤观

发生火灾，元帝就下了一道诏书，其中说：“这次火灾发生在孝武帝的园陵馆舍，我感到战栗恐惧，这次所以没有点火而发生了火灾，是由于我的过错我的罪孽，各个部门又不肯认真指出我的过错，以至于发展到这样严重的地步，将怎样才能使我醒悟呢？”茂陵比不上我们现在的京都，白鹤观也大不及我们的玉清宫，汉元帝尚且把罪己诏下到全国，以求大家能指出自己的过失，从这里就可以知道，做帝王的忧虑国家的患难和关心国家的治理，其心情的急切竟到了如此的地步！

臣又研究《五行志》，其中说：“贤臣和佞臣应该加以区别，官吏的进用和升迁应该有次序，做一切事情都应该按照原有的章程，一切礼法、礼仪都应该体现对功勋的推重，这样，火就得其性。如果对大道的相信不真诚，或者夸耀虚伪，谗佞之徒得势，邪气胜过正气，那末，火就会失去它的本性，从天上来到地下。及至火灾乱起，焚宗庙，烧宫室，虽然动用了军队也不能相救。鲁成公三年，新造的宫殿发生火灾，刘向说这是因为鲁成公相信三桓子孙的谗言，而驱逐父亲所选用的大臣所得到的报应。襄公九年春天，宋国发生大火，刘向说这是因为宋公听信谗言、驱逐他的大夫华弱让他流浪鲁国的报应。今天玉清宫发生火灾，难道不也是这样的原因吗？愿皇上拱手沉默深刻反省以后改变原来的决定，停止重建玉清宫这种劳民伤财的做法，推行前世的成法，这就是天下的大幸了。

接着苏舜钦又向皇帝上书，其中说：

我历观前代神圣贤明的君王，都喜欢正直的言论，这是因为国家很大，四境极远，老百姓中也有藏匿着的隐情，而我们却无法都看到都知道，所以不论是愚笨和卑贱人的话也都应该选择和采用。这样就可以做到国家没有遗弃的政事，百姓中不再有藏匿着的隐情，即使朝中还有专事拍马逢迎的奸刁小人，但他们的阴谋诡计也难以实现。

臣看到乙亥（1035）那年皇上下的诏书，里面有禁止朝臣越职议论政事的规定，诏书传到全国，无不感到震惊和惶惑，很多人在私下议论，猜测这样的规定恐怕不是皇上的圣意。因为皇上即位以来，一次又一次地下诏书殷切地希望群臣直率地议论政事，使百官能轮流地依次奏事，议论朝政的缺失，设置了意见箱，还设立了直言极谏科这样的专门机构。现在的诏书突然和从前的规定完全相反，这难道不是有大臣在蒙蔽圣上的视听，企图堵住忠良的嘴巴吗？这样做不仅使朝政受到损失，实在也是一条自取灭亡的道路啊！因为采纳正确的意见，进用贤明的官吏，本是宰相应该做的事情，如果不好好去做这些事情，而把蒙蔽圣上作为自己的专务，就没有不败亡的。现在的谏官、御史，都出于他的门下，只盼望听他的话，就可以得到好的官职，现在官员多得充满朝廷，但都吓得不敢说话。皇上如果拱手沉默。怎能全部听到天下的事情呢？

以前孔道辅、范仲淹刚直不屈，极尽监察和谏诤的职责，后来虽然改任了其他官职，但还是不忘向圣上进

谏。这二位贤臣并不是不知道闭口几年，可以稳稳地得到宰相的职位，但是他们不敢辜负皇上委托关注的一番心意。因而都受到中伤，被贬谪而远离朝廷，使正直的贤臣泄气，鲠直的人士惊讶、害怕、说不出话来，眼睁睁地看着朝政中的种种弊端，嘴里却再也不敢发表议论。

从前晋侯问叔向道：“国家的祸害什么是最厉害？”叔向回答说：“大臣拿了国家的俸禄而不向君上极力进谏，小臣畏罪而不敢说话，下情不得上达，这是国家最大的祸患。”所以汉文帝听了女孩子缇萦的陈说而废除了肉刑，汉武帝听了三老的意见而江充就此受到了族刑。肉刑是古旧的刑法，江充是皇帝身边的宠臣，女子、三老，愚昧昏花疏远间隔到了极点。只因为他们的陈说中都关系到“义”这样的大问题，所以他们的地位虽然卑贱，但却不可忽视，二位国君听从了他们的意见，被后世称为圣明。况且国家规定设置爵位的等级，表彰英雄事迹，其目的就在于引导和责成官吏们为国家尽忠，怎么可以教导他们因循和沉默不语？国家赏赐他们鼓励他们进谏，犹恐他们不肯进谏，现在却规定谁如果要进谏就要给谁办罪，那末还有谁肯来进谏呢？下面群众的情况闭塞而无法上达，朝廷就孤立而危险，每当悲痛地想到这些，实在是感到惊恐！伏望皇上发出仁德的声音，而停止实行前面诏书的规定，勤于采纳群臣的忠言，一直到听取割草打柴人的意见，这样可以保持国家兴隆、天下太平，保全您皇上左右的辅政大臣们。

不久，苏舜钦中了进士，改任光禄寺主簿，知长垣县

(今属河南)，迁大理评事，督察在京都的店宅事务。康定年间，河东（今山西）发生地震，苏舜钦给朝廷写了一道奏疏，投到朝廷专设的意见箱中去，疏中说：

臣听说河东发生了大地震，大水冲坏了房屋和城墙，百姓和牲畜死亡的有几十万，十天中地震都没有停止。我开始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感到惶恐惊骇和疑惑。我私下想自从有历史记载以来，即使是衰微丧乱之世，也没有发生这样的大灾变。大宋王朝建立以来，四个圣明天子接连继位，内外平定安宁，四周的戎夷也和我们和睦相处，没有战争，这些，都和那衰微丧乱之世完全不同，为什么灾变却比那乱世更为严重呢？况且凶兆和吉兆的发生，实际上是由神明在主宰着，各以类别相示告，从来就没有发生过错误啊！这些天人的感应，古今的借鉴，确实是很可怕的。是不是因为皇上安于逸乐，过于宠信近臣而不省察政事的结果呢？是不是在朝廷之中，有无才而享受着高俸，甚至作威作福而僭越犯上的人呢？或者是在现行政策中有不利于百姓的地方？在后妃之中，有没有人在暗中教唆圣上不懂于国事而用她的美貌媚惑圣上的人呢？或者是西北的姜夷有违背盟约犯上作乱的心思呢？臣刚从外地到京城，不了解最近的情况，心中有怀疑而嘴里不敢说啊，我感到奇怪的是，朝廷看到这样的大灾变，不认真改正政事中的过失，以满足上天的警诫，以安定百姓的恐惧之心，而是默不作声，也不对灾区百姓表示同情，进行救济，就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一样；谏官、御史没有听到他们为此上疏分析发生这次

灾变的原因，以开启圣上之心。然而百姓们的心情却是极不稳定，他们聚集在一起议论纷纷，都有忧虑恐惧的神色。

臣因为世代受到国君的俸禄，我自身又受命于朝廷，这无比的恩泽养育了我，才有我今天的生命，今天发生的事情我看在眼里想在心里，感到心惊胆战，汗流浹背，想彻底地一吐我的肺腑之言，以感谢陛下的知遇之恩。可是看到范仲淹因刚毅正直触犯了奸臣，他的忠言不仅不被采纳，朝廷反而把他流放到外地，还向全国下达诏书，不许人们超越自己的职权议论政事。臣这样不避权臣，恐怕一定要横遭中伤，这样，对国家没有什么补益，因此暗自悲伤嗟叹，不知该怎么办。

不久又在正月开初，忽然雷电交加，臣以为这是因为国家政事中有很多缺点和失误，朝中群臣都不敢向皇上说明，只有上天一再嘱咐陛下。陛下果然发布了一个圣明的诏书，允许群众都可以向陛下进谏，臣开始听到这个信息真是欢欣鼓舞。十多天中，群臣中不少人上书言事，其中不会没有切中时弊的议论，但却没有听到朝廷提出来加以实行，这也是徒有虚言而不追求实效啊。臣听说只有用诚可以感动上天，只有靠实可以安定百姓，现在对上天不用诚，安民不靠实，徒然发布一纸空文，这只能增加人们的叹息而已，拿什么去感谢神灵和补救社会的弊乱呢？是不是有大臣在蒙蔽圣上的视听，不肯为陛下推行正确的措施？是不是群臣的进言都是不着边际无法实行的空论？臣私下看到现在朝廷的纲纪败坏，政

事和教化方面有很多缺点和失误，这方面的例子很多，我不一一例举，仅从大的方面提出两件事情以奏闻皇上：

第一件是正人心。治理一个国家就像治理一个家庭，要治家的人首先要修养自己，要修养自己首先得正心，心正以后精神就集中，因而能有条理地处理好各种事务。现在百姓中传说陛下近年来稍近俳优和贱人，娱乐超过了节制，给人们的赏赐也过度了。娱乐超过节制就是放荡，赏赐过度就是奢侈。放荡就不会专心于政事，奢侈就会财用不足。臣私下看过本朝国史，看到祖宗上朝，太阳已往西斜，已是傍晚时分，还仍旧坐在后苑，门外有人要进见奏事的，立即召见问对，而且委婉地询问人家，即使是一条小小的意见也都认真采纳。真宗晚年身体不安适，才两天上朝一次，现在陛下正是年富力盛，实在是应该在天不亮就穿衣服，天晚了才吃饭，励精图治，而居然也是两天才上一次朝，这是对政事不认真啊。另外是国库空虚，百姓没有积蓄，苛捐杂税，诛求无已，几乎是有一天不向百姓抽捐。国家开支的经费，比开国时增加了二十倍，这就是国家财用不足的原因啊。处理政事不尽心，国家财用不足，实在是国家的大忧患啊。臣伏望陛下能加强自我修养，正确使用群臣，端正思想，正确鉴定事物，勤于听政，不图安逸，远离俳优和身边的小人，亲近那些刚毅鲠直的忠良之士，借着这次灾变，以考虑长远的大计，这样，就是天下的大幸了。

第二件是说选择贤才的事情。英明的君主把主要的努力放在求取贤才方面而不太注意派遣、命令一类事情，

满朝那么多官员，不必全由国君去选择，需要国君亲自选择的，只是一两个宰相和御史谏官而已。现在看来，陛下的用人还没有经过慎重的选择。前些日子，王随从吏部侍郎一下子提升到门下侍郎平章事，跳越了十级，做了宰相。这是特殊的恩泽，必须给有特殊才能的人，而王随没有真才实学，庸庸碌碌，而且还喜欢谄媚逢迎，并不是一个可做宰相的人才，在宣布了对他的任命以后，人们议论纷纷。所以疾病缠上了王随的身体，灾祸降到了我们的国家，这亦是无意在爱惜我们的国家，皇上要引以为戒啊！还有石中立突然出现在朝中百官的行列中，石中立是说话诙谐自任的人，因此官员们或有宴请集会，总是让他参加，听他插科打诨，作为笑料。现在忽然成了皇上的重臣，但是听不到他出了什么好主意，所以在人们中威望很低，大家都不重视他，因此灾变连续发生而朝廷也不被尊重，这是因为皇上左右的人都不是有才能之人。陛下的左右尚且如此，天下官吏的情况也就可想而知了。实在是为了担心外人看不起而笑话我们中国，所以皇上应该立即罢免这些不称职的人，而另选贤才。另外，张观作为御史中丞，高若讷作为司谏，这两个人都在科举考试中得到了好成绩，他们都是以擅长文词而得到进身的，而他们的性情却温和软弱，没有刚正鲠直敢说话的气概。都是因为宰相看中了他们才被选拔到现在的位置上去的，目的是想让他们谨慎而沉默不语，不敢去揭发他们的隐私，有时他们也发些议论，那末一定在暗中相互打招呼，被旁边的人看见了，真是非常可笑啊。

所以，御史、谏官这样重要的官员，臣希望陛下能亲自选择，不让他们出自于宰相的门下。台谏官既找到了合适的人选，那末皇上左右的近臣也就不敢为所欲为了，这是皇上控制下面的策略啊。

臣以为皇上如果自身很勤俭了，宰相、御史、谏官又都选到了贤才，那末天下怎么还担忧治理不好，灾变还怎么会发生呢？望陛下留意这些事情啊！

范仲淹向朝廷推荐苏舜钦的才能，经过皇帝面试，任命为集贤院校理，监进奏院。苏舜钦娶宰相杜衍的女儿为妻，杜衍和范仲淹、富弼都是当时的执政大臣，他们在朝廷中起用很多社会上的著名人物，准备改革各种事务。御史中丞王拱辰等人不满意他们的所作所为。恰巧碰到进奏院举行祀神典礼，苏舜钦和右班殿值刘巽动用了卖废纸的公款请乐队，隔了一天又用这笔钱招待宾客。王拱辰了解了这些情况后，暗示他的下属鱼周询等人向上劾奏此事，企图由此打击杜衍。此事发往开封府处理，因此，苏舜钦和刘巽都由于监守自盗的罪名而被撤职。那天参加集会的宾客都是社会名流，因牵连而获罪被放逐到全国各地的有十多人。社会舆论认为是太过分了。而王拱辰他们却沾沾自喜地说：“这一下，被我一网打尽了。”

苏舜钦被撤职后，寄寓于吴中（今江苏苏州），他的朋友韩维责备他过去世代居住帝都现在为什么要远离京师与亲友隔绝？苏舜钦为此写了一封回信，信中说：

听说您责备我把兄弟丢在京师，不顾兄弟情义，自己独自羁旅在几千里外，自取愁闷和苦恼。我岂会没有

亲戚情谊，怎么会不懂得兄弟手足生活在一起的欢乐！怎么会抛开安逸而甘心愁苦呢？

我从前在京师，不敢冒犯人家的脸色，不敢议论国家的政事，随波逐流，心情抑郁不展，可以说到了极点，更不幸的是我恰巧又处于一个容易引起是非的地位，但我却没有下决心早一点自动离开，以致给自己招来了不测之祸，揪着我的头发把我交给法官审问，没有人为我说一句话，朋友仇敌一个样，一起来诽谤我。我被撤职以后，喧闹没有结束，更想把我置之死地而后快。到我家里来的人往往是为了搜集我的言论，加以传播，好心同情我的人几乎没有了。所以我紧闭门户不敢和这些人相见，就像逃避乱兵和强盗一样。我逃避世俗到了这样的地步，怎么还可以长久居住在那样的地方呢？于是我就离世脱俗，高举远游，飘泊在江湖之上，这样做，不仅是为了解决吃饭穿衣的困难，实在也是为了稍稍避开机关和陷阱啊！

况且我的兄弟亲属很多，而经济收入却很少，持国您是看到的。兄弟亲属经常相互团聚，可以缺少衣食吗？不可以啊！可以经常关起大门不和别人接触吗？不可以啊！和人家接触必须和人家说话，和人家说话必须要和人家往来，假如人人都像您持国那样就好了，不如持国的人必然会加油添醋地制造流言，传布四方，使我不能为自己辩白，那末从前发生的事情可能还会重新发生的啊！

即使不发生那样的事情，也是终日劳苦，应接不暇，

冬天夏天一年四季都要奔走在风尘泥淖之中，没完没了的人事交往，瘦马、饿仆，每天在都城忙忙碌碌地看人家面孔，让人家指着自己的背讥笑或者说些可怜之类的话，这样，我在别人面前还有什么面孔，怎么能不愁苦呢？

我在这里虽然和兄弟亲属离得很远，但一年到头生活还比较丰足，住的房子也比较宽敞，没有一天到晚应接奔走的辛劳，耳目清静，不设机关以待人，心情安闲而身体舒展，漏壶到三刻的时候才睡觉，傍晚时分才起床，在安静的院落明净的窗子下面，摆开图画、史书、古琴、酒杯自娱自乐，有兴趣就驾起小船到盘门、阊门外而去泛舟，在秀美的江山之间吟诗、长啸、眺览、怀古。河洲上产的茶，民间酿的酒，足以消除万古的忧愁，莼菜、鲈鱼、稻米、河蟹，完全可以适合口味，这里又有很多高僧和隐士，寺庙的景色美到极点，我家里还造了一个园林，中间有奇花怪石，曲池回廊，亭台楼阁，鱼鸟在这里流连，不知不觉已经红日西沉暮色降临。

从前孔子作《春秋》而把吴国称为夷，又说：“我想住在九夷。”看现今吴地的风俗，可以说是十分纯朴，人们都乐善好施，他们知道我这个人守正道好读书，都高高兴兴地愿意和我往来，不把我看成是一个犯罪的人，虽然孔子再生，我想他也一定想住在这里的。拿京师和这里相比较，哪个好呢？一个人的生活中，如果内心能够自得其乐，外部的条件也很舒适，那就应该说是很快乐了，何必一定要高官厚禄，役使别人以供养自己然后才

算是快乐。我虽然侨居在这里，也好像在外地做官一样，怎么可以和亲属常常相守在一起呢？我所处的形势对我很不利，所以不能像持国所希望的那样，何必一定要让我尸填沟壑，内饲豺虎，才算尽了兄弟的情义呢？怎么能残忍到这样呢！《诗经》中说：“凡今之人，莫如兄弟。”说的是兄弟以恩亲相处，在紧急患难的时候必定会互相拯救，后面一章说：“丧乱平定以后，既平安又宁静。这个时候虽然有兄弟，还不如朋友呢！”它说的是朋友尚义，在安宁的时候，用礼义相互琢磨。我和持国，是表兄弟，在我急难的时候，持国并没有来相救，又在我还没有安定的时候，想用义来相琢磨、砥砺，即使是古人恐怕也是不能接受的，我本来不想写回信了，考虑到如果不回信就有点亏待我的持国了。

二年，苏舜钦得到湖州（今属浙江）长史的官职，便去世了。苏舜钦人曾多次给朝廷上书议论国家大事，在苏州买太湖石建造了沧浪亭，就更加发愤读书，常常将愤懑的感情表现在诗歌中，他的诗风格豪放，常常有惊人之语。苏舜钦又善于写草书，每酒酣，便落笔，世人争相传观，及至迁谪而死，世人感到特别痛惜。妻子杜氏有贤行。

苏舜钦的哥哥苏舜元，字才翁，为人精明强悍而且讲气节，所写的诗歌也很豪放劲健，特别工于草书，苏舜钦比不上他。官做到尚书度支员外郎、三司度支判官。

（姚汉荣 译）

【原文】

苏舜钦字子美，参知政事易简之孙。父耆，有才名，尝

为工部郎中，直集贤院。舜钦少慷慨有大志，状貌怪伟。当天圣中，学者为文多病偶对，独舜钦与河南穆修好为古文、歌诗，一时豪俊多从之游。

初以父任补太庙斋郎，调荥阳县尉。玉清昭应宫灾，舜钦年二十一，诣登闻鼓院上疏曰：

烈士不避铍钺而进谏，明君不讳过失而纳忠，是以怀策者必吐上前，蓄冤者无至腹腴。然言之难不如容之难，容之难不如行之难，有言之必容之行之，则三代之主也，幸陛下留听焉。

臣观今岁自春徂夏，霖雨阴晦未尝少止，农田被灾者几于十九。臣以谓任用失人、政令多过、赏罚弗中之所召也。天之降灾，欲悟陛下，而大臣归咎于刑狱之滥，陛下听之，故肆赦天下以为禳救。如此则是杀人者不死，伤人者不抵罪，而欲以合天意也。古者断决滞讼以平水旱，不闻用赦，故赦下之后，阴霾及今。

前志曰：“积阴生阳，阳生则火灾见焉。”乘夏之气发泄于玉清宫，震雨杂下，烈焰四起，楼观万叠，数刻而尽，非慢于火备，乃天之垂戒也。陛下当降服、减膳、避正寝，责躬罪已，下哀痛之诏，罢非业之作，拯失职之民，察辅弼及左右无裨国体者罢之，窃弄权威者去之；念政刑之失，收刍菢之论，庶几所以变灾为佑。

浹日之间，未闻为此，而将计工役以图修复，都下之人闻者骇惑，聚首横议，咸谓非宜。皆曰章圣皇帝勤俭十余年，天下富庶，帑府流衍，乃作斯宫，及其毕功，海内虚竭。陛下即位未及十年，数遭水旱，虽征赋咸入，

而百姓困乏。若大兴土木，则费用不知纪极，财力耗于内，百姓劳于下，内耗下劳，何以为国！况天灾之，已违之，“是欲竟天，无省己之意。逆天不祥，安己难任，欲祈厚赐，其可得乎！今为陛下计，莫若来吉士，去佞人，修德以勤至治，使百姓足给而征税宽减，则可以谢天意而安民情矣。

夫贤君见变，修道除凶，乱世无象，天不谴告。今幸天见之变，是陛下修己之日，岂可忽哉！昔汉元帝三年，茂陵白鹤馆灾，诏曰：“乃者火灾降于孝武园馆，朕战慄恐惧，不烛变异，罪在朕躬。群有司又不肯极言朕过，以至于斯，将何寤焉！”夫茂陵不及上都，白鹤馆大不及此宫，彼尚降诏四方，以求己过，是知帝王忧危念治，汲汲如此。

臣又按《五行志》：贤佞分别，官人有叙，率由旧章，礼重功勋，则火得其性。若信道不笃，或耀虚伪，谗夫昌，邪胜正，则火失其性，自上而降。及滥灾妄起，燔宗庙，烧宫室，虽兴师徒而不能救。鲁成公三年，新宫灾，刘向谓成公信三桓子孙之谗、逐父臣之应。襄公九年春，宋火，刘向谓宋公听谗、逐其大夫华弱奔鲁之应。今宫灾岂亦有是乎？愿陛下拱默内省而追革之，罢再造之劳，述前世之法，天下之幸也。

又上书曰：

历观前代圣神之君，将闻谏议，盖以四海至远，民有隐匿，不可以遍照，故无间愚贱之言而择用之。然后朝无遗政，物无遁情，虽有佞臣，邪谋莫得而进也。

臣睹乙亥诏书，戒越职言事，播告四方，无不惊惑，往往窃议，恐非出陛下之意。盖陛下即位以来，屡诏群下勤求直言，使百僚转对，置匭函，设直言极谏科。今诏书顿异前事，岂非大臣壅蔽陛下聪明，杜塞忠良之口，不惟亏损朝政，实亦自取覆亡之道。夫纳善进贤，宰相之事，蔽君自任，未或不亡。今谏管、御史悉出其门，但希旨意，即获美官，多士盈庭，噤不得语。陛下拱默，何由尽闻天下之事乎？

前孔道辅、范仲淹刚直不挠，致位台谏，后虽改他官，不忘献纳。二臣者非不知缄口数年，坐得卿辅，盖不敢负陛下委注之意。而皆罹中伤，窜谪而去，使正臣夺气，鲠士咋舌，目见时弊，口不敢论。

昔晋侯问叔向曰：“国家之患孰为大？”对曰：“大臣持禄而不极谏，小臣畏罪而不敢言，下情不得上通，此患之大者。”故汉文感女子之说而肉刑是除，武帝听三老之议而江充以族。肉刑古法，江充近臣，女子三老，愚耄疏隔之至也。盖以义之所在，贱不可忽，二君从之，后世称圣。况国家班设爵位，列陈豪英，故当责其公忠，安可教之循默？赏之使谏，尚恐不言；罪其敢言，孰肯献纳？物情闭塞，上位孤危，軫念于兹，可为惊怛！岂望陛下发德音，寝前诏，勤于采纳，下及刍尧，可以常守隆平，保全近辅。

寻举进士，改光禄寺主簿，知长垣县，迁大理评事，监在京店宅务。康定中，河东地震，舜钦诣匭通疏曰：

臣闻河东地大震裂，涌水坏屋庐城堞，杀民畜几十

万，历旬不止。始闻惶骇疑惑。窃思自编策所纪前代衰微丧乱之世，亦未曾有此大变。今四圣接统，内外平宁，戎夷交欢，兵革偃息，固与夫衰微丧乱之世异，何灾变之作反过之耶？且妖祥之兴，神实尸之，各以类告，未尝妄也。天人之应，古今之鉴，大可恐惧。岂王者安于逸豫、信任近臣而不省政事乎？庙堂之上，有非才冒禄、窃弄威福而侵上事者乎？又岂施設之政有不便民者乎？深宫之中，有阴教不谨以媚道进者乎？西北羌夷有背盟犯顺之心乎？臣从远方来，不知近可，心疑而口不敢道也。所怪者，朝廷见此大异，不修阙政，以厌天戒、安民心，默然不恤，如无事之时；谏官、御史不闻进牒铺白灾害之端，以开上心。然民情汹汹，聚首横议，咸有忧悸之色。

臣以世受君禄，身齿国命，涵濡惠泽，以长此躯，目睹心思，惊恒流汗，欲尽吐肝胆，以拜封奏。又见范仲淹以刚直忤奸臣，言不用而身窜谪，降诏天下，不许越职言事。臣不避权右，必恐横罹中伤，无补于国，因自悲嗟，不知所措。

既而孟春之初，雷震暴作，臣以谓国家阙失，众臣莫敢为陛下言者，唯天丁宁以告陛下。陛下果能沛发明诏，许群臣皆得献言，臣初闻之踊跃欣抃。旬日间颇有言事者，其间岂无切中时病，而未闻朝廷举而行之，是亦收虚言而不根实效也。臣闻唯诚可以应天，唯实可以安民，今应天不以诚，安民不以实，徒有空文，增人太息耳。将何以谢神灵而救弊乱也！岂大臣蒙塞天听，不

为陛下行之？岂言事迂阔无所取，不足行也？臣窃见纲纪隳败，政化阙失，其事甚众，不可概举，谨条大者二事以闻：

一曰正心。夫治国如治家，治家者先修己，修己者先正心，心正则神明集而万务理。今民间传陛下比年稍迓俳優贱人，燕乐逾节，赐予过度。燕乐逾节则荡，赐予过度则侈。荡则政事不亲，侈则用度不足。臣窃观国史，见祖宗日视朝，旰食方罢，犹坐于后苑，门有白事者，立得召对，委曲询访，小善必纳。真宗末年不豫，始间日视事。今陛下春秋鼎盛，实宵衣旰食求治之秋，而乃隔日御殿，此政事不亲也。又府库匱竭，民鲜盖藏，诛敛科率，殆无虚日。计度经费，二十倍于祖宗时，此用度不足也。政事不亲，用度不足，诚国大忧。臣望陛下修己以御人，洗心以鉴物，勤听断，舍燕安，放弃优谐近习之纤人，亲近刚明鲠直之良士。因此灾变，以思永图，则天下幸甚。

其二曰择贤。夫明主劳于求贤而逸于任使，然盈庭之士不须尽择，在择一二辅臣及御史、谏官而已。陛下用人尚未慎择。昨王随自吏部侍郎迁门下侍郎平章事，超越十资，复为上相。此乃非常之恩，必待非常之才，而随虚庸邪谄，非辅相之器，降麻之后，物论沸腾。故疾缠其身，灾仍于国，此亦天意爱惜我朝，陛下鉴之哉！且石中立顷在朝行，以诙谐自任，士人或有宴集，必置席间，听其语言，以资笑噱。今处之近辅，不闻嘉谋，物望甚轻，人情所忽，使灾害屡降而朝廷不尊，盖近臣多

非才者。陛下左右尚如此，天下官吏可知也。实恐远人轻笑中国，宜即行罢免，别选贤才。又张观为御史中丞，高若讷为司谏，二人者皆登高第，颇以文词进，而温和软懦，无刚鲠敢言之气。斯皆执政引拔建置，欲其慎默，不敢举扬其私，时有所言，则必暗相关说，旁人窥之，甚可笑也。故御史、谏官之任，臣欲陛下亲择之。不令出执政门下。台谏官既得其人，则近臣不敢为过，乃馭下之策也。

臣以谓陛下身既勤俭，辅弼、台谏又皆得人，则天下何忧不治，灾异何由而生，惟陛下少留意焉。

范仲淹荐其才，召试，为集贤校理，监进奏院。舜钦娶宰相杜衍女，衍时与仲淹、富弼在政府，多引用一时闻人，欲更张庶事。御史中丞王拱辰等不便其所为。会进奏院祠神，舜钦与右班殿直刘巽辄用鬻故纸公钱召妓乐，间夕会宾客。拱辰廉得之，讽其属鱼周询等劾奏，因欲摇动衍。事下开封府劾治，于是舜钦与巽俱坐自盗除名，同时会者皆知名士，因缘得罪逐出四方者十余人。世以为过薄，而拱辰等方自喜曰：“吾一举网尽矣。”

舜钦既放废，寓于吴中，其友人韩维责以世居京师而去离都下，隔绝亲交。舜钦报书曰：

蒙闻责以兄弟在京师，不以为相就，独羁外数千里，自取愁苦。予岂无亲戚之情，岂不知会合之乐也？安肯舍安逸而甘愁苦哉！

昨在京师，不敢犯人颜色，不敢议论时事，随众上下，心志蟠屈不开，固亦极矣。不幸适在疑嫌之地，不

解决然早自引去，致不测之祸，摔去下吏，人无敢言，友仇一波，共起谤议。被废之后，喧然未已，更欲置之死地然后为快。来者往往钩赜言语，欲以传播，好意相恤者几希矣。故闭户不敢与相见，如避兵寇。偷俗如此，安可久居其间！遂超然远举，羁泊于江湖之上，不唯衣食之累，实亦少避机罕也。

况血属之多，资入之薄，持国见之矣。常相团聚，可乏衣食乎？不可也。可闭关常不与人接乎？不可也。与人接必与之言，与之言必与之还往，使人人皆如持国则可，不迨持国者必加酿恶言，喧布上下，使仆不能自明，则前日之事未为重也。

都无此事，亦终日劳苦，应接之不暇，寒暑奔走尘土泥淖中，不能了人事，羸马饿仆，日栖栖取辱于都城，使人指背讥笑哀闵，亦何颜面，安得不谓之愁苦哉！

此虽与兄弟亲戚相远，而伏腊稍足，居室稍宽，无终日应接奔走之劳，耳目清旷，不设机关以待人，心安闲而体舒放。三商而眠，高春而起，静院明窗之下，罗列图史琴樽以自愉悦，有兴则泛小舟出盘、閤二门，吟啸览古于江山之间。渚茶、野酿足以销忧，莼鲈、私蟹足以适口。又多高僧隐君子，佛庙胜绝，家有园林，珍花奇石，曲池高台，鱼鸟留连，不觉日暮。

昔孔子作《春秋》而夷吴，又曰：“吾欲居九夷。”观今之风俗，乐善好事，知予守道好学，皆欣然愿来过从，不以罪人相遇，虽孔子复生，是亦必欲居此也。以彼此较之，孰为然哉！人生内有自得，外有所适，固亦乐矣，

何必高位厚禄，役人以自奉养，然后为乐。今虽侨此，亦如仕宦南北，安可与亲戚常相守耶！予窘迫，势不得如持国意，必使我尸转沟洫，肉餒豺虎，而后以为安所义，何其忍耶！《诗》曰：“凡今之人，莫如兄弟。”谓兄弟以恩，急难必相拯救。后章曰：“丧乱既平，既安且宁。虽有兄弟，不如友生。”谓友朋尚义，安宁之时，以礼义相琢磨。予于持国，外兄弟也。急难不相救，又于未安宁之际，欲以义相琢磨，虽古人所不能受，予欲不报，虑浅吾持国也。

二年，得湖州长史，卒。舜钦数上书论朝廷事，在苏州买水石作沧浪亭，益读书，时发愤懣于歌诗，其体豪放，往往惊人。善草书，每酣酒落笔，争为人所传。及谪死，世尤惜之。妻杜氏有贤行。

兄舜元字才翁，为人精悍任气节，为歌诗亦豪健，尤善草书，舜钦不能及。官至尚书度支员外郎、三司度支判官。

梅尧臣传

——《宋史》卷四四三

【说明】梅尧臣（1002—1060），北宋诗人。字圣俞，宣州宣城（今属安徽）人。宣城古名宛陵，世称宛陵先生。少时进士不第，历任州县官属，后授国子监直讲，官至尚书都官员外郎。

在北宋诗文革新运动中，梅尧臣与欧阳修、苏舜钦齐名，并称“梅欧”或“苏梅”。论诗注重政治内容，对宋初靡丽文风进行了批判，其诗富于现实内容，风格平淡，意境含蓄，对北宋诗风转变有很大影响。有《宛陵先生集》。

梅尧臣，字圣俞，宣州宣城（今属安徽）人，侍读学士梅询的侄儿。梅尧臣的诗写得很好，意境深远古淡，有时候也表现得很奇巧，但开始并没有被人们所了解。因为伯父梅询的恩荫，梅尧臣出任河南（今河南洛阳）主簿。当时钱惟演为西京（今河南洛阳）留守，他特别赞赏梅尧臣的诗歌，于是两人成了忘年之交，他们互相唱和，一府的人尽皆倾慕。欧阳修也和梅尧臣成了诗友，认为自己的诗都不如梅尧臣。梅尧臣受了欧阳修的赞誉，愈加刻苦自励，精思苦学，由此诗

名骤增，成了当时文坛的知名人物。宋代开国以来，像梅尧臣那样以诗歌创作成名并为社会所传颂的人，是非常少的。梅尧臣曾对人说：“凡写诗，意境要新，语言要工，要写出前人没有说过的话，这样才算得上是好诗。必须把难以表现的景物描绘得就像在你的眼前，在诗的语言之外蕴藏着无穷的意境，这才是最上等的诗。”世人认为这是深刻精辟的意见。梅尧臣历任德兴（今属江西）县令，主管过建德（今属浙江）、襄城县（今属河南）政务，又监湖州（今属浙江）税务，签书忠开、镇安判官，监永丰仓。朝廷中不少大臣多次推荐梅尧臣，认为他适宜在馆阁供职，因此皇帝召他进行面试，赏赐了他一个进士出身，任命为国子监直讲，以后一直升迁到尚书都官员外郎。参预编撰《唐书》，书写完以后，还没有来得及上奏朝廷，梅尧臣就去世了，朝廷录用了他的一个儿子。

宝元、嘉佑之间，仁宗皇帝举行郊庙典礼，梅尧臣参预了祭典，在祭典过程中总是献诗，又曾经向皇帝上书议论军事，还为《孙子十三篇》作注，又撰了《唐载记》二十六卷、《毛诗小传》二十卷、《宛陵集》四十卷。

梅尧臣家境贫困，喜欢饮酒，当时一些品德贤良的官员们都喜欢和他交游，他们经常带着酒到梅尧臣家里来。梅尧臣性格诙谐，善于谈笑，不触犯人，他对社会的嘲讽讥刺都寄托在诗歌中，到了晚年，他的诗写得更有功力。有人得到从西南夷带来的一件布弓衣，它上面的织纹是梅尧臣的诗歌，可见梅尧臣在当时文坛上的名声竟大到何等地步。

（姚汉荣 译）

【原文】

梅尧臣字圣俞，宣州宣城人，侍读学士询从子也。工为诗，以深远古淡为意，间出奇巧，初未为人所知。用询荫为河南主簿，钱惟演留守西京，特嗟赏之，为忘年交，引与酬倡，一府尽倾。欧阳修与为诗友，自以为不及。尧臣益刻厉，精思苦学，由是知名于时。宋兴，以诗名家为世所传如尧臣者，盖少也。尝语人曰：“凡诗，意新语工，得前人所未道者，斯为善矣；必能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然后为至也。”也以为知言。历德兴县令，知建德、襄城县，监湖州税，签书忠武、镇安判官，监永丰仓。大臣屡荐宜在馆阁，召试，赐进士出身，为国子监直讲，累迁尚书都官员外郎。预修《唐书》，成，未奏而卒，录其子一人。

宝元、嘉祐中，仁宗有事郊庙，尧臣预祭，辄献歌诗，又尝上书言兵。注《孙子十三篇》，撰《唐载记》二十六卷、《毛诗小传》二十卷、《宛陵集》四十卷。

尧臣家贫，喜饮酒，贤士大夫多从之游，时载酒过门。善谈笑，与物无忤，诙嘲刺讥托于诗，晚益工。有人得西南夷布弓衣，其织文乃尧臣诗也，名重于时如此。

贺铸传

——《宋史》卷四四三

【说明】贺铸（1052—1125），北宋词人。字方回，号庆湖遗老，卫州（今河南汲县）人，任侠好武，博学强记，曾任泗州、太平州通判。晚年退居苏州，以校讎书籍终老。

贺铸诗、词、文皆善，词名最著。其词刚柔兼济，风格多样。好以旧谱填新词而改易其调名，善锤炼字句，常用古乐府及唐人诗句入词。有《东山寓声乐府》。

贺铸，字方回，卫州（今河南汲县）人，孝卫皇后的族孙。身長七尺，面色青黑，眉毛直竖。喜欢议论当代国家大事，批评不留情面，虽然是权倾一时的豪门权贵，只要贺铸少不中意，他便会毫无保留地进行辱骂，人们认为他的行为很像侠客。贺铸学识广博，记忆力特强，善于言辞，他的语言精深、婉丽、细致、严密，就像是按次序排比编织而成的五彩俱备的图画。贺铸尤其擅长作曲，常常把别人丢掉的曲子搜集起来，稍加剪裁、组织，便都成了新奇的曲子。他曾经说：“我在笔光底下驱使着李商隐、温庭筠，常常使他们不停地奔命。”一些达官贵人都想请贺铸到家中作客，贺铸或者

去或者不去，他所不愿意见的人，也始终没有说他们的坏话。

起初，贺铸娶了同一个宗族的女子为妻。贺铸隶属右选，监太原工作。有一个贵族子弟和贺铸是同事，这个人骄纵傲慢，目中无人，贺铸经过察访，了解他偷盗公物，于是把仆役和公务员们打发开，把这个贵族子弟关在密室里，贺铸手里拿着刑杖对贵族子弟说：“走过来，你在某时盗窃了某物去作某用，某时又盗窃某物拿到你自己家里去，是这样吗？”贵族子弟十分惊恐地叩头说：“有这些事。”贺铸说：“宁可让我来处理你，免得我公开告发。”于是立即站起来，亲自把贵族子弟的衣服脱去露出身体，在他屁股上打了几棍子，贵族子弟叩头祈求哀告，贺铸便大笑着释放了贵族子弟。从此以后，那些凭着权势而傲慢的人，都只能斜着眼睛而不敢抬起头来看人。这时，江、淮之间有一个名叫米芾的人，他以身材魁梧和思想怪异而闻名于时，贺铸则以见义勇为的义侠行为和豪爽的性格同米芾不相上下，两人每次见面，就两眼圆睁，拍着手掌，激烈地争辩起来，甚至争辩了一整天，也是谁都无法把对方辩输，文人中争相把他们辩论的情况作为谈话的资料。

元佑年间，李清臣做宰相，上奏更换通直郎，让贺铸通判泗州（今江苏泗洪），又去做太平州的副职。贺铸每次都因为喜欢喝酒和意气用事而得不到理想的官职，所以郁郁不得志，吃的是宫祠的俸禄，他退居到吴下（今江苏苏州），稍稍离开一点那个纷扰的社会现实，所以心情倒也平静，不像从前那样起伏不平。家中藏书一万多卷，贺铸手里拿着书进行校对，没有一个字会发生错误，他想用闭门读书的办法度过

自己的晚年。贺铸家境贫困，经常靠借高利贷维持生活，有亏欠人家的，便拿地契房券等给人家抵押，丝毫不向别人乞讨。

贺铸所写的诗文，有不少传播在人们的口头上，建中靖国（1101）那一年，黄庭坚从贵州回来，看到贺铸“江南梅子”的诗句，说他的诗风像谢朓。在与贺铸交往的人们中，关系始终很亲密的，只有信安（今河北灞县）的程俱。贺铸把自己的词编成集子，名为《东山乐府》，程俱为这个词集写了序。贺铸曾经说 he 自己是唐代谏议大夫贺知章的后代，而且推算到最远的始祖是出于王子庆忌，用庆作为姓，在越地有一个湖泊叫镜湖的，本来的名字叫庆湖，为了避汉安帝父亲清河王的讳，改为贺氏，庆湖亦改为镜湖。贺铸当时的这些说法，不知是从哪里来的根据。所以贺铸自号“庆湖遗老”，有《庆湖遗老集》二十卷。（姚汉荣 译）

【原文】

贺铸字方回，卫州人，孝卫皇后之族孙。长七尺，面铁色，眉目耸拔。喜谈当世事，可否不少假借，虽贵族权倾一时，小不中意，极口诋之无遗辞，人以为近侠。博学强记，工语言，深婉丽密，如次组绣。尤长于度曲，掇拾人所遗弃，少加隐括，皆出新奇。尝言：“吾笔端驱使李商隐、温庭筠常奔命不暇。”诸公贵人多客致之，铸或从或不从，其所不欲见，终不贬也。

初，娶宗女，隶籍右选，监太原工作，有贵人子同事，骄傲不相下。铸廉得盗工作物，屏侍吏，闭之密室，以杖数曰：“来，若某时盗某物为某用，某时盗某物入于家，然乎？”贵

人子惶骇谢“有之。”铸曰：“能从吾治，免白发。”即起自袒其肤，杖之数下，贵人子叩头祈哀，即大笑释去。自是诸挟气力颀顽者，皆侧目不敢仰视。是时，江、淮间有米芾以魁岸奇谲知名，铸以气侠雄爽适相先后，二人每相遇，瞋目抵掌，论辩锋起，终日各不能屈，谈者争传为口实。

元祐中，李清臣执政，奏换通直郎，通判泗州，又倅太平州。竟以尚酒使气，不得美官，悒悒不得志，食宫祠禄，退居吴下，稍务引远世故，亦无复轩輊如平日。家藏书万余卷，手自校讎，无一字误，以是杜门将遂其老。家贫，贷子钱自给，有负者，辄折卷与之，秋毫不以丐人。

铸所为词章，往往传播在人口。建中靖国时，黄庭坚自黔中还，得其“江南梅子”之句，以为似谢玄晖。其所与交，终始厚者，惟信安程俱。铸自哀歌词，名《东山乐府》，俱为序之，尝自言唐谏议大夫知章之后，且推本其初，出王子庆忌，以庆为姓，居越之湖泽所谓镜湖者，本庆湖也。避汉安帝父清河王讳，改为贺氏，庆湖亦转为镜。当时不知何所据。故铸自号庆湖遗老，有《庆湖遗老集》二十卷。

黄庭坚传

——《宋史》卷四四四

【说明】黄庭坚（1045—1105），北宋诗人、书法家。字鲁直，号山谷道人、涪翁，洪州分宁（今江西修水）人。治平四年进士，曾编修《神宗实录》，迁起居舍人。后以修实录不实的罪名，遭到贬谪。

黄庭坚为“苏门四学士”之一，诗与苏轼齐名，并称“苏黄”。其诗立意深曲，章法细密，讲究句法，注重字词的锤炼，风格上追求奇拗硬涩。论诗标榜杜甫，提倡“无一字无来处”和“夺胎换骨，点铁成金”之说，开创“江西诗派”，影响整个宋代诗坛。又能词，部分作品受苏轼影响，以流宕洒脱见长，时有豪迈气象。

黄庭坚工书法，兼善行、草，以侧险取势。纵横奇崛，自成风格。为“宋四家”之一。有《山谷集》。

黄庭坚，字鲁直，洪州分宁（今江西修水）人。小时候就十分机警聪敏，读书只几遍就能背诵。舅父李常经过他家，取下书架上的书问他，无不通晓，李常非常吃惊，认为他读书能一日千里。中进士，调叶县（今属河南）尉。熙宁初年，

举四京学官，科举考试中文章等第为优，教授北京（今河北大名）国子监，北京留守文彦博非常赏识黄庭坚的才华，留他在国子监继续任职。苏轼曾见到过黄庭坚的诗文，认为这些作品已达到了超越寻常，造诣卓特，飘然脱俗的境界，世上已经很久没有见到这样的作品了。由于苏轼的赞誉，黄庭坚的名声开始大了起来。知太和县（今属安徽），黄庭坚以平和简易作为他的治理方针。当时正颁布征收盐税的法令，各县都争着要多收盐税，唯独太和县不这样，为此，县里那些办事人员很不高兴，而百姓却因此得到了平安。

哲宗即位，召黄庭坚为校书郎、《仁宗实录》检讨官。过了一年，迁著作佐郎，加集贤院校理。《仁宗实录》完成后，黄庭坚被提升为起居舍人。因母亲去世，回家守丧。黄庭坚对父母特别孝顺，母亲生病经年，黄庭坚昼夜都观察母亲的神色，衣不解带，及至母亲亡故，黄庭坚庐墓守孝，由于过度悲哀，因而瘦弱成疾，几乎丧命。守丧期满，黄庭坚被任命为秘书丞，提点明道宫，兼国史编修官。绍圣初年，黄庭坚出知宣州（今安徽宣城）、改鄂州（今湖北武昌）。章惇、蔡卞和他们的同党说《仁宗实录》多诬蔑不实之词，便把原来参加编修《仁宗实录》的史官们分别集中于京邑以待查问，章惇他们在《仁宗实录》中摘出了一千多条拿出来给人们看，说这些都是没有证据的东西。后经院吏作了考核，认为大部分还是有根据的，没有依据的只留下三十二条。其中一条是黄庭坚编写的：“用铁龙爪治河，有同儿戏。”因此首先就查问到黄庭坚。黄庭坚回答说：“我当时在北京大名府做官，曾经亲自看到过这种事情，真是一桩儿戏。”凡有所问，黄庭坚都

直截了当地按事实作了回答，听的人都中伤他。因此黄庭坚被贬为涪州（今四川涪陵）别驾，发往黔州（今四川彭水）安置，谏官们还以为安置黄庭坚的地方太好而没有严格执法。为了回避亲嫌，黄庭坚被移置去戎州（今四川宜宾），对于所发生的这一切，黄庭坚都淡然处之，而不以迁谪事耿耿于怀。蜀中的文人学者们因倾慕黄庭坚而和他交往向他学习，黄庭坚讲学不倦，凡经过黄庭坚亲自指点过的读书人，文章都写得很好。

徽宗即位后，又起用黄庭坚监鄂州（今湖北武昌）税务，签书宁国军判官，知舒州（今安徽潜山），以吏部员外郎召，黄庭坚都推辞不去，而要求到州郡去做官，得到一个太平州（今安徽当涂）知州的职务，但赴任只九天，就被罢官了，而让他去主管玉隆观。黄庭坚在河北时和赵挺之稍有不和，赵挺之做了执政大臣后，转运判官陈举根据赵挺之的暗示，把黄庭坚写的一篇文章《荆南承天院记》送给朝廷，指责黄庭坚在文章中幸灾乐祸，于是黄庭坚又被除名，发往宜州（今湖北宜昌）拘管。三年，徙永州（今湖南零陵），还没有听到这个命令，黄庭坚就去世了。终年六十一岁。

黄庭坚在学问文章方面，可以说是个天才，陈师道说他的诗深得杜甫的三昧，学杜诗而又不为杜诗所拘。黄庭坚又善于行书和草书，楷书也自成一家。黄庭坚和张耒、晁补之、秦观都游学于苏轼的门下，天下人称他们为“苏门四学士”，而黄庭坚的文章比他的诗歌写得更好，四川、江西的学者文人把黄庭坚和苏轼比配，称之为“苏、黄”。苏轼当侍从的时候，推举黄庭坚代替自己，在荐文中有“奇伟卓异的文章，妙

绝尘寰，举世无双；孝顺父母友爱兄弟的行为，可与古人媲美”这样的话，可见他对黄庭坚的推重到了多么高的地步！起初，黄庭坚游潜皖（今安徽潜山）山谷寺、石牛洞，因爱好这些山水胜景，所以自号山谷道人。

（姚汉荣 译）

【原文】

黄庭坚字鲁直，洪州分宁人。幼警悟，读书数过辄成诵。舅李常过其家，取架上书问之，无不通，常惊，以为一日千里。举进士，调叶县尉。熙宁初，举四京学官，第文为优，教授北京国子监，留守文彦博才之，留再任。苏轼尝见其诗文，以为超轶绝尘，独立万物之表，世久无此作，由是声名始震。知太和县，以平易为治。时课颁盐策，诸县争占多数，太和独否，吏不悦，而民安之。

哲宗立，召为校书郎。《神宗实录》检讨官。逾年，迁著作佐郎，加集贤校理。《实录》成，擢起居舍人。丁母艰。庭坚性笃孝，母病弥年，昼夜视颜色，衣不解带，及亡，庐墓下，哀毁得疾几殆。服除，为秘书丞，提点明道宫，兼国史编修官。绍圣初，出知宣州，改鄂州。章惇、蔡卞与其党论《实录》多诬，俾前史官分居畿邑以待问，摘千余条示之，谓为无验证。既而院吏考阅，悉有依据，所余才三十二事。庭坚书“用铁龙爪治河，有同儿戏”。至是首问焉。对曰：“庭坚时官北都，尝亲见之，真儿戏耳。”凡有问，皆直辞以对，闻者壮之。贬涪州别驾，黔州安置，言者犹以处善地为骹法。以亲嫌，遂移戎州。庭坚泊然，不以迁谪介意。蜀士慕之从游，讲学不倦，凡经指授，下笔皆可观。

徽宗即位，起监鄂州税，签书宁国军判官，知舒州，以吏部员外郎召，皆辞不行。丐郡，得知太平州，至之九日罢，主管玉隆观。庭坚在河北与赵挺之有微隙，挺之执政，转运判官陈举承风旨，上其所作《荆南承天院记》，指为幸灾，复除名，羁管宜州。三年，徙永州，未闻命而卒，年六十一。

庭坚学问文章，天成性得，陈师道谓其诗得法杜甫，学甫而不为者。善行、草书，楷法亦自成一家。与张来、晁补之、秦观俱游苏轼门，天下称为四学士，而庭坚于文章尤长于诗，蜀、江西君子以庭坚配轼，故称“苏、黄”，轼为侍从时，举以自代，其词有“瑰伟之文，妙绝当世，孝友之行，追配古人”之语，其重之也如此。初，游潜皖山谷寺、石牛洞，乐其林泉之胜，因自号山谷道人云。

秦观传

——《宋史》卷四四四

【说明】秦观（1049—1100），北宋词人。字少游、太虚，号淮海居士，高邮（今属江苏）人。元丰进士，曾任秘书省正字，兼国史院编修官等职。因政治上倾向旧党，后累遭贬谪。

秦观为“苏门四学士”之一，颇为苏轼所重，诗、文、词皆工，而以词著称。其词属婉约一派，语言淡雅、手法含蓄，情韵兼胜，回味无穷，在当时负有盛名。其诗风略似其词，秀丽有余，气魄较弱。有《淮海集》。

秦观，字少游，又字太虚，扬州高邮（今江苏高邮）人。年轻时性格豪放，人才出众，慷慨之气溢于言表，参加进士考试没有考中。秦观志高气盛，一心想创立一番大功业，他的表现常常出人意外，读兵书，感到能与自己的意见相合。在徐州（今属江苏）见到了苏轼，写了一篇《黄楼赋》，苏轼以为秦观有屈原、宋玉之才。苏轼又把秦观的诗介绍给王安石，王安石也说秦观的诗非常清新，很像鲍明远和谢朓。苏轼勉励秦观通过科举考试以赡养父母。秦观刚中举就选调为定海

主簿、蔡州教授。元佑初年，苏轼以贤良方正的名义把秦观荐举到了朝廷，因此秦观被任命为太学博士，校正秘书省书籍。后又迁正字，而复为兼国史院编修官，皇上经常有砚、墨、器、币之类赏赐给秦观。

绍圣初年，因为秦观是旧党，所以外放为杭州通判。又因为御史刘拯说他擅自增减《仁宗实录》，所以贬为监处州（今浙江丽水）酒税。当地的官员们根据政治风向对秦观进行监视，等待他的过失，但是却什么也没有得到，于是只能用告发秦观写佛书的罪名，削减了他的俸禄，并徙郴州（今属湖南），继而编管横州（今广西横县），再徙雷州（今属广东）。徽宗即位后，秦观复为宣德郎，他从雷州回来的路上，经过藤州（今广西藤县），去游玩华光亭，对游客讲述自己在梦中所写的词，向左右的人讨水喝，等到左右的人将水取来时，他看着水含笑地死去了。在这之前，他曾经先为自己写过一首挽词，词语十分哀痛，读过这些挽词的人，都很为他悲伤，秦观终年五十三岁，有文集四十卷。

秦观擅长议论，文词秀丽而思想深刻。及秦观死，苏轼听到这个消息后悲叹道：“少游不幸死在旅途，可哀痛啊！世界上难道还能再有少游这样的人吗？”秦观有两个弟弟，一个名觐，字少章；一个名觊，字少仪，都能写文章。

（姚汉荣 译）

【原文】

秦观字少游，一字太虚，扬州高邮人。少豪雋，慷慨溢于文词，举进士不中。强志盛气，好大而见奇，读兵家书与己意合。见苏轼于徐，为赋《黄楼》，轼以为有屈、宋才。又

介其诗于王安石，安石亦谓清新似鲍、谢，轼勉以应举为亲养，始登第，调定海主簿、蔡州教授。元佑初，轼以贤良方正荐于朝，除太学博士，校正秘书省书籍。迁正字，而复为兼国史院编修官，上日有砚墨器币之赐。

绍圣初，坐党籍，出通判杭州。以御史刘拯论其增损《实录》，贬监处州酒税。使者承风望指，候伺过失，既而无所所得，则以谒告写佛书为罪，削秩徙郴州，继编管横州，又徙雷州。徽宗立，复宣德郎，放还，至藤州，出游华光亭，为客道梦中长短句，索水欲饮，水至，笑视之而卒。先自作挽词，其语哀甚，读者悲伤之，年五十三，有文集四十卷。

观长于议论，文丽而思深。及死，轼闻之叹曰：“少游不幸死道路，哀哉！世岂复有斯人乎！”弟觐字少章，觐字少仪，皆能文。

林逋传

——《宋史》卷四五七

【说明】林逋（967—1028），北宋诗人。字君复，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布衣终生，四十岁后隐居杭州西湖小孤山。喜欢梅、鹤，自称“以梅为妻，以鹤为子”。卒谥和靖先生。

林逋的诗多写西湖美景，表现隐居的情趣，风格清冷幽静。咏梅的诗如“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山园小梅》）等，是为人传颂的名句。有《林和靖诗集》四卷，《补遗》一卷。

林逋，字君复，杭州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年少丧父，学习勤奋，不搞章句之学。性情恬淡，喜尚古风，不求功名利禄，家境贫困，衣食不足，却表现得十分安然。早年，在江、淮之间漫游，很久以后，才回到杭州，在西湖边的孤山上搭了一间茅屋，二十年中足迹不到城市。真宗听到他的名声、赏赐给他粮食和布匹，命令地方长官逢年过节的时候去慰问他。薛映、李及在杭州，每次去林逋的茅庐，总是要清谈终日才离去。他曾经在庐舍旁边替自己造了一个坟墓，临死的时候写了一首诗，其中有这样的句意：“来日如果像求取

司马相如的遗稿，那样值得高兴的是我不像相如那样留下《封禅书》。”死后，州里把林逋的情况报告了朝廷，仁宗为他感叹和哀悼，给林逋赐了一个“和靖先生”的谥号，同时还赠送了粮食和布匹，帮助办理丧事。

林逋善写行书，喜欢作诗，他的文词清澈峭拔，多奇文。写好以后，又总是随手把它们抛掉。有人问他说：“为什么不把它们誊录下来，传到后世去呢？”林逋说：“我正隐迹山林，尚且不领意用诗赢得一时的名声，何况是后世呢！”然而那些爱管闲事的人们常常把它们偷偷地记下来，今天传下来的尚有三百多篇。

林逋曾客游临江（今江西清江），当时李谿刚刚中进士，还没有人知道他，林逋对人说：“此公是宰相的材料啊！”等到林逋去世，李谿恰巧被罢斥相位而出为州官，李谿为林逋穿了白衣服，和他的弟子们一起守了七天丧，然后才为林逋下葬，他又把林逋的遗诗刻在石碑上放入墓中。

林逋没有娶妻，没有儿子，教育哥哥的儿子林宥，登上了进士甲科。林宥的儿子林大年，为人相当高洁自喜，英宗时，为侍御史，接连被御史台派出去治理刑狱，林大年总是拒绝不肯出发，被中丞唐介所劾奏，降为蕲州知州，死在任所。

（姚汉荣 译）

【原文】

林逋字君复，杭州钱塘人。少孤，力学，不为章句。性恬淡好古，弗趋荣利，家贫衣食不足，晏如也。初放游江、淮间，久之归杭州，结庐西湖之孤山，二十年足不及城市。真宗闻其名，赐粟帛，诏长吏岁时劳问。薛映、李及在杭州，每

造其庐，清谈终日而去。尝自为墓于其庐侧。临终为诗，有“茂陵他日求遗稿，犹喜曾无《封禅书》”之句。既卒，州为上闻，仁宗嗟悼，赐谥和靖先生，赙粟帛。

逋善行书，喜为诗，其词澄浹峭特，多奇句。既就稿，随辄弃之。或谓：“何不录以示后世？”逋曰：“吾方晦迹林壑，且不欲以诗名一时，况后世乎！”然好事者往往窃记之，今所传尚三百余篇。

逋尝客临江，时李谿方举进士，未有知者，逋谓人曰：“此公辅器也。”及逋卒，谿适罢三司使为州守，为素服，与其门人临七日，葬之，刻遗句内圻中。

逋不娶，无子，教兄子宥，登进士甲科。宥子大年，颇介洁自喜，英宗时，为侍御史，连被台移出治狱，拒不肯行，为中丞唐介所奏，降知蕲州，卒于官。

元好问传

——《金史》卷一二六

【说明】元好问（1190—1257），金代作家、史学家。字裕之，号遗山。太原秀容（今山西省忻县）人。兴定进士，曾任行尚书省左司员外郎等职。金亡不仕。

元好问论诗受传统诗教影响，强调内容，同时重视艺术成就和作家品德，《论诗绝句三十首》是其诗论代表。其诗词在金元之际颇负盛名。其诗题材广泛，兴象深邃，风格遒上。词以苏、辛为典范，兼有婉约、豪放诸种风格。曾编金诗、词总集《中州集》和《中州乐府》。有《元遗山先生全集》

元好问，字裕之。七岁便能作诗。十四岁那年，跟随陵川（今属山西）郝晋卿学习，他不学如何参加科举考试求取功名的那一套，而是深入研究经传和诸子百家，他刻苦学习了六年，成为博洽而通达的饱学之士。接着，他下太行，过黄河，外出游学，他写了《箕山》、《琴台》等诗，礼部赵秉文看到了这些诗，认为在近代没有这样优秀的作品。于是元好问的名声就震动了京师。

兴定五年（1221）中进士，任内乡（今属河南）县令。正

大年间，担任南阳（今属河南）县令。天兴（1232—1234）初年，提升为尚书省的属官，接着，又授为左司都事，转行尚书省左司员外郎。金朝灭亡后，元好问就没有再做官。

元好问写文章有明确的标准。各种体裁的文章他都写得很好。他的诗构思奇特，风格劲健而绝不雕琢镂刻，巧缛新丽而绝去浮靡绮丽。五言诗高洁古雅，沉郁悲壮，七言乐府不用古题，特别有新意。歌谣慷慨悲凉，带着幽州、并州人的一种豪侠之气。他所作的词曲，发扬新声，大都是针对国家多难，人民不幸，以抒发他的悲壮胸怀，一共有几百篇。战乱以后，一些故旧相继去世，元好问成了文坛的一代领袖，各地的碑文、墓志铭之类的文字都来求他写作。他所写的文章、诗歌有若干卷、《杜诗学》一卷、《东坡诗雅》三卷、《锦机》一卷、《诗文自警》十卷。

到了晚年，更加把著作作为自己的任务，他认为金立国以后，它的典章制度几乎可以和汉代、唐代相比，现在金国已经灭亡，赶快要把它的历史写下来，而这著史的任务，自己是当仁不让的。当时，金国的那些实录都在顺天（今北京）张万户家里，元好问就对张万户作了说明，表示自己愿意撰写《金史》，后来被乐夔所阻止而中止了。但是元好问说：“不能让一个朝代的事迹泯灭而不传下去。”因此就在自己家里建造了一座亭子，自己就在里面撰写金代的历史，因为不是政府交给他的写作任务，所以他把自己写的东西称为《野史》。凡是金代君臣们留下来的言论、事迹，元好问都认真进行采集，他把听到的一点一滴都用小的纸条、小的字体记录下来，一直到一百多万字。今天他所传下来的著作有《中州

集》以及《壬辰杂编》若干卷，六十八岁那年去世。后来别人纂修的《金史》，大多是参照元好问的著作编写的。

（姚汉荣 译）

【原文】

好问字裕之。七岁能诗。年十有四，从陵川郝晋卿学，不事举业，淹贯经传百家，六年而业成。下太行，渡大河，为《箕山》、《琴台》等诗，礼部赵秉文见之，以为近代无此作也。于是名震京师。

中兴定五年第，历内乡令。正大中，为南阳令。天兴初，擢尚书省掾，顷之，除左司都事，转行尚书省左司员外郎。金亡，不仕。

为文有绳尺，备众体。其诗奇崛而绝雕剝，巧缛而谢绮丽。五言高古沈郁。七言乐府不用古题，特出新意。歌谣慷慨挟幽、并之气。其长短句，揄扬新声，以写恩怨者又数百篇。兵后，故老皆尽，好问蔚为一代宗工，四方碑板铭志尽趋其门。其所著文章诗若干卷、《杜诗学》一卷、《东坡诗雅》三卷、《锦机》一卷、《诗文自警》十卷。

晚年尤以著作自任，以金源氏有天下，典章法度几及汉、唐，国亡史作，己所当任。时金国实录在顺天张万户家，乃言于张，愿为撰述，既而为乐夔所沮而止。好问曰：“不可令一代之迹泯而不传。”乃构亭于家，著述其上，因名曰“野史”。凡金源君臣遗言往行，采摭所闻，有所得辄以寸纸细字为记录，至百余万言。今所传有《中州集》及《壬辰杂编》若干卷。年六十八卒。纂修《金史》，多本其所云。

张养浩传

——《元史》卷一七五

【说明】张养浩（1270～1329），元代散曲作家。字希孟，号云庄，济南（今属山东）人。曾任监察御史、礼部尚书等职。天历二年，赴关中赈灾，积劳而卒。其散曲多写田园隐逸生活，有的流露出对官场的不满，文字显白流畅，感情真挚，格调高远。有《云庄休居自适小乐府》、《云庄类稿》传世。

张养浩，字希孟，济南（今属山东）人。年幼的时候就有侠义行为。有一次他出门，碰到一个人，那人不小心把钞票遗失在路上，当张养浩发现的时候，那个丢失钞票的人已走了，张养浩就追上去把钞票送还给了人家。年纪只有十岁，就一天到晚不停地读书，父亲母亲担心他过于用功而制止他，于是他白天就默默地背诵书卷上的诗文，到了夜晚，就把门户紧紧关闭起来，点上灯，偷偷地读书。山东按察使焦遂听到这个情况，就推荐张养浩做东平（今属山东）地方的学正。后来，张养浩游学京师，把自己写的文章献给宰相不忽木，不忽木大为称奇，因此征拓张养浩为礼部令史，并且还推荐他

进入御史台。一天，张养浩忽然生病了，不忽木亲自到他家里探问，当他看到张养浩的家里四壁空空，什么也没有时，慨然叹息说：“张养浩这种人才是真正的监察御史的好材料啊！”及至做了宰相属官，就被选授为堂邑（今属山东）县尹。人们都传说堂邑县县官住的房子不吉利，住进去的人没有一个能得到幸免的，但是张养浩还是住了进去。张养浩带头捣毁了滥设的神祠三十多所，免除了有强盗前科的人每月初一、十五例行到官府接受审讯检查的规定，张养浩说：“他们都是善良的百姓，因为生活困难，被饥寒所迫，不得已而去做了强盗；既然已经处分过了，现在仍旧把他们看成强盗，这是断绝他们走自新之路的做法啊！”强盗们感动得流了眼泪，他们相互劝戒说：“不能辜负张公。”有一个叫李虎的人，曾经杀过人，他的同党也都是暴虐残忍，为害百姓，百姓不堪忍受，从前有县尹不敢过问这件事情。张养浩到这里以后，按照国法严厉地惩处了他们，百姓们十分高兴。张养浩离开了堂邑十年，百姓们仍旧为他立了碑，歌颂他的功德。

仁宗还在东宫做太子的时候，就召张养浩为司经，还没有上任，又改为文学，授予监察御史的官职。当初，开始讨论成立尚书省时，张养浩发表意见说成立尚书省不妥当；尚书省成立以后，张养浩又说这是改变成法扰乱国政，将给天下带来灾难。御史台的大臣将张养浩的意见压制下来不报上去，因此张养浩就把这件事张扬出去，他说：“从前桑哥掌权，御史台的官员不敢说话，后来几乎不能改变，现在御史说话了，又不报上去，这样的御史台有什么作用呢！”当时武宗打算亲自去南郊祭祀，后来没有亲自参加，而是派了大臣代他

祭祀，在祭祀时，忽然狂风大作，参加祭祀活动中不少人被冻死了。张养浩在祭祀地方扬言说：“代替仁宗参加祭祀的人选得不妥当，所以上天用灾变来表示不满。”张养浩的这些议论大大地违背了当时宰相的心意。

当时尚书省的大臣向皇帝启奏起用御史台大臣的人选，对于这件事情，张养浩极为不满，他慨叹道：“尉官是专管捕捉盗贼的，即使是不称职，难道可以让盗贼自己选择谁去担任尉官吗？”于是给仁宗皇帝上了一道一万多字长的议论当时政治的奏疏：第一件事情是议论当时的赏赐太过分；第二件事情是议论当时的刑禁漏洞太多；第三件事情是说功名爵位太轻；第四件事情说朝廷的纲纪太弱；第五件事情说朝廷兴建的工程太多；第六件事情说国家各个部分所发的号令太滥；第七件事情说宠幸太多；第八件事情说社会风俗太奢侈；第九件事情说社会上的异端思想太厉害；第十件事情说挑选宰相的标准太宽。他的议论直率，切中时弊，但是当权的人却不能容忍。于是，给了张养浩一个翰林待制的官职，不久又对他捏造了一套罪名把他罢免了，并且警告尚书省、御史台不能再用张养浩。张养浩担心给自己招来祸殃，因此改变了姓名逃走了。

后来尚书省的机构被罢除了，张养浩才被召回担任右司都事。张养浩在做堂邑县尹时，那个县里的达鲁花赤和张养浩感情上曾有过裂痕，当时这个达鲁花赤正在要求选拔官职，张养浩为此向宰相作了推荐，结果给达鲁花赤授了一个好的官职。不久，张养浩自己升任为翰林学士，改秘书少监。延祐（1314—1320）初年，朝廷开进士科考试，张养浩以礼部

侍郎的身份主持这次进士科考试，当进士们去拜见这位主考大人时，张养浩一概不接见，只是派了人去告戒那些新进士们说：“各位应该认真考虑的是如何报效国家，何劳诸位来谢我呢！”不久，张养浩被提升为陕西行台治书侍御史，后来又改为右司郎中，拜礼部尚书。

英宗即位，命令张养浩参议中书省事，恰巧碰到元宵佳节，皇帝想在宫中搭一座鳌山灯，为此张养浩立即上疏给左丞相拜住，拜住把张养浩的奏疏放在袖管中便入宫进谏，张养浩奏疏的大概意思是说：“元世祖在位三十多年，每到元宵佳节，连里巷之间都禁止点灯；何况宫廷本是禁地，而宫中的旁舍又是那么深远，尤其应该谨慎地警戒。现在却要搭造一座灯山，臣以为供观赏玩乐本是小事，但是它所涉及的事体却极大；灯山给人带来的欢乐时间很短，但是给朝廷带来的祸患却很大。伏望圣上以崇尚节俭和考虑朝廷的长远利益为目标，以喜欢奢侈和只图眼前短暂的欢乐为警戒。”英宗听奏后非常恼怒，但是，当他读了奏疏以后，忽然又高兴起来，说：“不是张养浩不敢说这些话。”立即停止建造鳌山灯，而且赏赐给张养浩宫廷中服用的金线织造的帛一匹，丝帛一匹，以表彰他的忠直。后来因为父亲年老，张养浩便不做官，回家赡养老父，朝廷召他为吏部尚书，不接受。父亲去世，张养浩为父服丧，丧期还没有满，朝廷又召张养浩做吏部尚书，张养浩坚辞不出。泰定六年（1324），朝廷又召张养浩担任太子詹事丞兼经筵说书的官职，张养浩又坚辞；后改授淮东廉访使，进翰林学士，他都没有赴任。

天历二年（1329），关中（今陕西）大旱，饥民相食，朝

廷特拜张养浩为陕西行台中丞。张养浩接到这个命令后，立即把自己家里的一切资财都分送给周围邻里中的困难户，自己便登上车子向陕西进发，碰到饥饿的灾民就赈济他们，看到饿死的灾民就埋葬他们。路过华山，就到西岳庙去求雨，哭拜在地上都爬不起来，天空忽然阴云密布，一连下了两天雨。及至到了官府，又到社坛去求雨，结果是大雨如注，下了三尺方才停止，庄稼由此得到了生长，秦地的百姓十分高兴。当时一斗米的价钱要十三缗，百姓拿着钞票出去买米，钞票稍有糊涂或破损就不能用，拿到府库中去调换，那些奸刁之徒营私舞弊，百姓来调换十只给五，而且往往排队等了一整天还是换不到，百姓被陷入非常困难的处境。于是张养浩发检府库中那些还没有被损毁而且图纹还可以看得清的钞票，得到一千八百五十万多缗，全部在它的背面盖上印记，又刻十贯和五贯的新券，散发给贫民百姓，命令米商看钞票上的印记把米卖给他们，凡是百姓拿着钞票到府库调换的，完全按数目进行交换，于是那些奸刁之徒再也不敢营私舞弊。张养浩又率领富裕人家出卖粮食，为此又向朝廷上奏章请求实行纳粮补官的法令。张养浩听到民间有人杀了自己的儿子以奉养母亲的事，为此大哭了一场，并拿出自己的钱救济了这户人家。

张养浩到陕西做官四个月，从来没有回到自己家里去住过，一直住在官府，夜里则向上天祈祷，白天就到外面去救济灾民，一天到晚不敢有丝毫的懈怠。每想到一件难受的事，就拍着胸脯大哭，因此得病不起，去世的时候才六十岁。关中的百姓，听到张养浩去世的消息，悲哀痛哭像失去了自己

的父母。至顺二年（1331）追赠张养浩摠领宣惠功臣、荣禄大夫、陕西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政事、柱国、追封滨国公，谥号“文忠”。他有两个儿子：张疆、张引，张疆先去世。

【原文】

（姚汉荣 译）

张养浩字希孟，济南人。幼有行义，尝出，遇人有遗楮币于途者，其人已去，追而还之。年方十岁，读书不辍，父母忧其过勤而止之，养浩昼则默诵，夜则闭户，张灯窃读。山东按察使焦遂闻之，荐为东平学正。游京师，献书于平章不忽木，大奇之，辟为礼部令史，仍荐入御史台。一日病，不忽木亲至其家问疾，四顾壁立，叹曰：“此真台掾也。”及为丞相掾，选授堂邑县尹。人言官舍不利，居无免者，竟居之。首毁淫祠三十余所，罢旧盗之朔望参者，曰：“彼皆良民，饥寒所迫，不得已而为盗耳；既加之以刑，犹以盗目之，是绝其自新之路也。”众盗感泣，互相戒曰：“毋负张公。”有李虎者，尝杀人，其党暴戾为害，民不堪命，旧尹莫敢诘问。养浩至，尽置诸法，民甚快之。去官十年，犹为立碑颂德。

仁宗在东宫，召为司经，未至，改文学，拜监察御史。初，议立尚书省，养浩言其不便；既立，又言变法乱政，将祸天下。台臣抑而不闻，乃扬言曰：“昔桑哥用事，台臣不言，后几不免。今御史既言，又不以闻，台将安用！”时武宗将亲祀南郊，不豫，遣大臣代祀，风忽大起，人多冻死。养浩于祀所扬言曰：“代祀非人，故天示之变。”大违时相意。

时省臣奏用台臣，养浩叹曰：“尉专捕盗，纵不称职，使盗自选可乎？”遂疏时政万余言：一曰赏赐太多，二曰刑禁太疏，三曰名爵太轻，四曰台纲太弱，五曰土木太盛，六曰号

令太浮，七曰幸门太多，八曰风俗太靡，九曰异端太谨，十曰取相之术太宽。言皆切直，当同者不能容。遂除翰林待制，复构以罪罢之，戒省台勿复用。养浩恐及祸，乃变姓名遁去。

尚书省罢，始召为右司都事。在堂邑时，其县达鲁花赤尝与之有隙，时方求选，养浩为白宰相，授以美职。迁翰林直学士，改秘书少监。延祐初，设进士科，遂以礼部侍郎知贡举，进士诣谒，皆不纳，但使人戒之曰：“诸君子但思报效，奚劳谢为！”擢陕西行台治书侍御史，改右司郎中，拜礼部尚书。

英宗即位，命参议中书省事，会元夕，帝欲于内庭张灯为鳌山，即上疏于左丞相拜住。拜住袖其疏入谏，其略曰：“世祖临御三十余年，每值元夕，闾阎之间，灯火亦禁；况阙庭之严，宫掖之邃，尤当戒慎。今灯山之构，臣以为所玩者小，所系者大；所乐者浅，所患者深。伏愿以崇俭虑远为法，以喜奢乐近为戒。”帝大怒，既览而喜曰：“非张希孟不敢言。”即罢之，仍赐尚服金织币一、帛一，以旌其直。后以父老，弃官归养，召为吏部尚书，不拜。丁父忧，未终丧，复以吏部尚书召，力辞不起。泰定元年，以太子詹事丞兼经筵说书召，又辞；改淮东廉访使，进翰林学士，皆不赴。

天历二年，关中大旱，饥民相食，特拜陕西行台中丞。既闻命，即散其家之所有与乡里贫乏者，登车就道，遇饿者则赈之，死者则葬之。道经华山，祷雨于岳祠，泣拜不能起，天忽阴翳，一雨二日。及到官，复祷于社坛，大雨如注，水三尺乃止，禾黍自生，秦人大喜。时斗米直十三缗，民持钞出余，稍昏即不用，诣库换易，则豪猾党蔽，易十与五，累日

不可得，民大困。乃检库中未毁昏钞文可验者，得一千八十五万五千余缗，悉以印记其背，又刻十贯、伍贯为券，给散贫乏，命米商视印记出粟，诣库验数以易之，于是吏弊不敢行。又率富民出粟，因上章请行纳粟补官之令。闻民间有杀子以奉母者，为之大恻，出私钱以济之。

到官四月，未尝家居，止宿公署，夜则祷于天，昼则出赈饥民，终日无少怠。每一念至，即抚膺痛哭，遂得疾不起，卒年六十。关中之人，哀之如失父母。至顺二年，赠摠领宣惠功臣、荣禄大夫、陕西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政事、柱国，近封滨国公，谥文忠。

陈子龙传

——《明史》卷二七七

【说明】陈子龙（1608～1647），明代文学家。字卧子，号轶符，晚年又号大樽。松江华亭（今上海松江县）人。崇祯进士，曾组织“几社”。清军破南京后，在松江起兵，连结太湖兵抗清。事泄，投水而死。

陈子龙主张诗文应有感而发，有复古倾向，承明后七子传统。其诗长于状物，妙于托意。清兵南下后所作，感伤时事，悲愤苍凉，风格一变。前人誉为明诗殿军。又能词，风格婉约浓逸。有《陈忠裕公全集》。

陈子龙，字卧子，松江华亭（今上海淞江）人。生下来就有非凡的才能，擅长应试的时文，又兼写诗赋古文，取法魏晋，骈文尤其精妙。崇祯十年（1637）考取进士，选拔为绍兴（今属浙江）推官。

东阳儒生许都，是副使达道的孙子，家境富裕。他抑强扶弱，乐善好施，暗中按兵法训练家中门客和子弟，希望能有机会施展一下自己的才能。子龙向上司推荐他，没有接受。东阳县令因为私事对他怀恨在心。正好义乌有坏人假借中贵

人的名义招募士兵的事被揭发，许都在山中葬母，前来聚会的有万余人。有人报告监司王雄说：“许都反了。”王雄马上派人去逮捕，许都才真的造反了。十来天中间聚集了几万人，接连攻下了东阳、义乌、浦江，进逼郡城，不久，又退去。巡捕董象恒因事犯法，被逮捕，而替代他的人没有到达，巡按御史左光先因此总管军事，命令子龙作监军前去讨伐他，俘获不多。而游击蒋若来打败了来进犯郡城的部队，许都于是率领余下的三千人，退保南寨。

王雄想招安他们，对子龙说：“贼寇聚集粮草，占据险地，官军不能仰攻，时间不久长，攻不下来。我们的军队有一万人，只有五天粮草，怎么办？”子龙说：“许都原本是老相识，请让我前去探看一下。”于是一个人骑着马进入许都军营，指责数落他犯罪的行为，命令他归降，赦他不死。接着逼迫他一起去见王雄，又逼着他同到山中，遣散他的部下，只带了二百人归降。光先和东阳县令交好，竟然把许都等六十多人在江边杀掉了，子龙力争不能这样做，没有成功。

由于平定叛乱有功，子龙被提升为兵科给事中。命令刚下达，京都就陷落了，于是在南京辅助福王。那年六月，向福王上疏，提出江防之策，没有比训练水军更重要的，认为建造海船刻不容缓，请专门委托兵部主事何刚训练处理。得到采纳。太仆少卿马绍愉出使清廷回来，见到福王，说到陈新甲主和通好而被处死的事，福王说：“这样，新甲应当给予抚恤。”朝廷大臣们没有说话，只有少詹事陈盟说：“可以。”因此下诏给予抚恤，并且追究曾经弹劾陈新甲的人的罪责。朝廷大臣被刘孔昭殿上相争一事所苦，不敢说话。子龙和同官

李清交互上奏，竭力进谏，事情才平息下去。

不久，又分条上奏防守要策，请召回老尚书郑三俊，都御史易应昌、房可壮、孙晋，都被采纳。又上奏：“中使四出搜查街巷，凡有好女的人家，把黄纸贴在女孩额上，把她带走。百姓住处，一片骚乱。应下旨讲明，没有经过主管部门同意，太监私自搜查选取女子，属于非法。”于是福王下令查禁假传圣旨欺骗百姓的活动。子龙又奏：“中兴的君主没有不身先士卒的，所以能光复旧业。现在大王入朝为君已经二十来天了，人们情绪松松垮垮，得过且过，和太平时期没有什么区别。就像在漏船中听唱动听的歌声，在大火焚烧的屋子里痛饮美酒一样。我不知道会有怎样的结果。祸事开始都出在姑息一二个武臣上，以至于上百个政令都因循守旧，没有变通，我很为这感到寒心。”这些话也没有使福王在意。第二年二月子龙就告第回乡了。

陈子龙和同乡夏允彝都有很高名望，允彝死后，子龙想到祖母年已九十，不忍心自杀，于是遁入空门做了和尚。不久，又接受了鲁王部院的官衔，连结太湖一带武装力量，想组织大规模抗清斗争，事情败露，被抓获。后乘人不备，投水而死。

（邱文龙 译）

【原文】

陈子龙，字卧子，松江华亭人。生有异才，工举子业，兼治诗赋古文，取法魏、晋，骈体尤精妙，崇祯十年进士。选绍兴推官。

东阳诸生许都者，副使达道孙也。家富，任侠好施，阴以兵法部勒宾客子弟，思得一当。子龙尝荐诸上官，不用，东

阳令以私憾之。适义乌奸人假中贵名招兵事发，都葬母山中，会者万人。或告监司王雄曰：“都反矣。”雄遽遣使收捕，都遂反。旬日间聚众数万，连陷东阳、义乌、浦江，遂逼郡城，既而引去。巡抚董象恒坐事逮，代者未至，巡按御史左光先以抚标兵，命子龙为监军讨之，稍有俘获。而游击蒋若来破其犯郡之兵，都乃率余卒三千保南砦。

雄欲抚贼，语子龙曰：“贼聚粮据险，官军不能仰攻，非旷日不克。我兵万人，止五日粮，奈何？”子龙曰：“都，旧识也，请往察之。”乃单骑入都营，责数其罪，谕令归降，待以不死。遂挟都见雄。复挟都走山中，散遣其众，而以二百人降。光先与东阳令善，竟斩都等六十余人于江浒。子龙争，不能得。

以定乱功，擢兵科给事中。命甫下而京师陷，乃事福王于南京。其年六月，言防江之策莫过水师，海舟议不可缓，请专委兵部主事何刚训练，从之。太仆少卿马绍愉奉使陛见，语及陈新甲主款事。王曰：“如此，新甲当恤。”廷臣无应者，独少詹事陈盟曰可。因命予恤，且追罪尝劾新甲者。廷臣惩刘孔昭殿上相争事，不敢言。子龙与同官李清交章力谏，事获已。

未几，列上防守要策，请召还故尚书郑三俊，都御史易应昌、房可壮、孙晋，并可之。又言：“中使四出搜巷。凡有女之家，黄纸贴额，持之而去，闾井骚然。明旨未经有司，中使私自搜采，甚非法纪。”乃命禁讹传诳惑者。子龙又言：“中兴之主，莫不身先士卒，故能光复旧物。今入国门再旬矣，人情泄沓，无异升平。清歌漏舟之中，痛饮焚屋之内，臣不

知其所终。其始毕起于姑息一二武臣，以至凡百政令皆因循遵养，臣甚为之寒心也。”亦不听。明年二月乞终养去。

子龙与同邑夏允彝皆负重名，允彝死，子龙念祖母年九十，不忍割，遁为僧。寻以受鲁王部院职衔，结太湖兵，欲举事。事露被获，乘间投水死。

杨维桢传

——《明史》卷二八五

【说明】杨维桢（1269—1370）字廉夫，号铁崖。浙江会稽（今浙江绍兴）人。官至建德路总管府推官。晚年居松江。明太祖召他纂修礼、乐书志，推辞不赴。

其创作以诗歌为主，以拟古乐府见称于时。所作乐府或以史事、传说为题材，或取材元末时事，多宣扬伦理道德。诗风奇诡，文字过于藻饰，时号“铁崖体”。有《东维子文集》、《铁崖先生古乐府》等传世。

杨维桢，字廉夫，山阴（今浙江绍兴）人。母亲姓李，梦见月亮上金钱坠落怀中而生维桢。维桢小时，一天读书能记几千字。父亲杨宏，在铁崖山中造了一座楼，绕楼种上了百来株梅树，楼内集中了几万卷图书，撤去梯子，让他在楼上读了五年书，因此自号为“铁崖”。元泰定四年（1327）考取进士，授官天台尹，改任钱清场盐司令。他生性耿直，得罪于人，十年没有升迁。正值辽、金、宋三史编撰完稿，维桢写了千余字的《正统辩》，总裁官欧阳元功边读边叹说：“百年之后，公论已在此文中写定了。”要推荐他而没有办成。后

维桢转任建德路总管府推官，提拔为江西儒学提举，尚未上任，碰上兵乱，避居富春山，迁居钱塘（今浙江杭州）。张士诚多次召见他，他不去。于是张士诚就派了他弟弟士信来向他请教，他因此写了五论，写信回复士诚，反复告诉他顺逆成败的道理，张士诚却不能采用。他又冒犯了丞相达识，搬迁到松江（即今吴淞江）边上，四方官员和东南一带才子们无日不来登门拜访。酒一喝得痛快，就笔墨横飞。有时头戴华阳巾，披着鸟羽制作的衣服坐在船上，吹铁笛，演奏《梅花弄》。有时呼唤侍儿歌唱《白雪》之辞，自己弹奏琵琶来相和。宾客们都翩翩起舞，仿佛是神仙一般。

洪武二年（1369），明太祖召集许多儒生编纂礼乐一类书籍，因为维桢是前朝老资格的文学之士，派了翰林詹同拿了礼物，登门拜访。维桢辞谢说：“哪有老太太快进棺材了，却再去出嫁的呀？”第二年，皇上又派了官员去催促。维桢写了一篇《老客妇谣》，呈给皇上，说：“皇帝能答应尽我所能的去干，不强迫我做我所不能的事就行，否则就只有跳海而死了。”皇上答应了，特赐一辆安车迎他到宫。住了一百一十天，编纂的体例大略定下以后，就请求回去。皇上满足了他的愿望，仍给安车送他回乡。史馆里留下来继续编纂的人在西门外设帐饯行，宋濂赠他诗一首说：“不受君王五色诏，白衣宣之白衣还。”这是对他的推崇啊。回到家，就病故了，享年七十五岁。

杨维桢诗名独霸一时，称之为“铁崖体”，和永嘉李孝光、茅山张羽、锡山倪瓒、昆山顾瑛是诗文上的朋友，和碧桃老人释臻、知归老人释现、清容老人释信作为佛门之友。张雨

称他的古乐府在杜少陵和二李之间，有世所未有的金石之声。宋濂称他的文章好像让人看到了商鼎周彝，云雷文饰而寒气横逸。诗则震荡昂扬，仿佛鬼设神施，尤其堪称名家。

维桢迁居松江时，和华亭陆居仁及侨居那里的钱惟善相唱和。惟善，字思复，钱塘人，至正元年（1341），省里考试《罗刹江赋》，当时所有参试的三千人，只有惟善依据枚乘《七发》考辨钱塘江就是曲江，因此得名，别号“曲江居士”。他曾任副提举的官职。张士诚占据吴地（江、浙一带），才辞去官职。居仁，字宅之，泰定三年（1326）中举，隐居教书，自称“云松野衲”。两人死后，和维桢同葬于干山，人称三高士墓。

（邱文龙 译）

【原文】

杨维桢，字廉夫，山阴人。母李，梦月中金钱坠怀，而生维桢。少时，日记书数千言。父宏，筑楼铁崖山中，绕楼植梅百株，聚书数万卷，去其梯，俾诵读楼上者五年，因自号“铁崖”。元泰定四年成进士，署天台尹，改钱清场盐司令。狷直忤物，十年不调。会修辽、金、宋三史成，维桢著《正统辩》千余言，总裁官欧阳元功读且叹曰：“百年后，公论定于此矣。”荐之而不果，转建德路总管府推官。擢江西儒学提举，未上，会兵乱，避地富春山，徙铁塘。张士诚累招之，不赴，遣其弟士信咨访之，因撰五论，具书复士诚，反复告以顺逆成败之说，士诚不能用也。又忤达识丞相，徙居松江之上，海内缙绅大夫与东南才俊之士，造门纳履无虚日。酒酣以往，笔墨横飞。或戴华阳巾，披羽衣坐船屋上，吹铁笛，作《梅花弄》。或呼侍儿歌《白雪》之辞，自倚琵琶和之。宾客

皆蹁跹起舞，以为神仙中人。

洪武二年，太祖召诸儒纂礼乐书，以维桢前朝老文学，遣翰林詹同奉币诣门。维桢谢曰：“岂有老妇将就木，而再理嫁者邪？”明年，复遣有司敦促，赋《老客妇谣》一章进御，曰：“皇帝竭吾之能，不强吾所不能则可，否则有蹈海死耳。”帝许之，赐安车诣阙廷。留百有一十日，所纂叙例略定，即乞骸骨。帝成其志，仍给安车还山。史馆胄监之士祖帐西门外，宋濂赠之诗曰：“不受君王五色诏，白衣宣至白衣还”，盖高之也。抵家卒，年七十五。

维桢诗名擅一时，号“铁崖体”，与永嘉李孝光、茅山张羽、锡山倪瓒、昆山顾瑛为诗文友，碧桃叟释臻、知归叟释现、清容叟释信为方外友。张雨称其古乐府出入少陵、二李间，有旷世金石声。宋濂称其论撰，如睹商敦、周彝，云雷成文，而寒芒横逸。诗震荡凌厉，鬼没神施，尤号名家云。

维桢徙松江时，与华亭陆居仁及侨居钱惟善相倡和。惟善，字思复，钱塘人。至正元年，省试《罗刹江赋》，时锁院三千人，独惟善据枚乘《七发》辨钱塘江为曲江，由是得名，号曲江居士。官副提举。张士诚据吴，遂不仕。居仁，字宅之，中泰定三年乡试，隐居教授，自号云松野衲。两人既歿，与维桢同葬干山，人目为三高士墓。

高启传

——《明史》卷二八五

【说明】高启（1336—1374），明代诗人。字季迪，长洲（今江苏苏州）人。元末隐居吴淞青丘，自号青丘子。明太祖时，应诏入朝，后因事被诛。

高启早有诗名，与杨基、张羽、徐贲合称“吴中四杰”。其诗师法汉魏晋唐，笔法细腻、文字晓畅、韵味深长，对明代诗歌影响较广。诗有《高太史大全集》，词有《扣舷集》，文有《凫藻集》。

高启，字迪，长洲（今江苏苏州）人。学问渊博，擅长诗歌。张士诚占据吴地，高启寄居外祖母家，住在吴淞江的青丘。洪武初年，被举荐，一起和同县的谢徽受召编纂元史，皇上授予他翰林院国史编修官职，又让他教授自己的那些儿子。洪武三年（1370）秋天，皇上来到阙楼，高启和谢徽都被召入宫内应对太祖的问话，皇上提升高启为户部右侍郎，谢徽为吏部郎中。高启自己陈述年轻，不敢担当重任，谢徽也坚决推辞，才被允准。不久，一起赐银放回故里。高启曾赋诗，对皇上有所讽刺，皇上心里怀恨而没有发作。等到高启

回家，住在青丘，教书自给。知府魏观替他搬家到郡城，早晚约他叙谈，彼此都很快乐。后魏观因为改修知府衙门，受到谴责，皇上见到高启所写的上梁文，于是大怒，把他腰斩在市上，时年三十九岁。

明代初年，吴下（今江苏苏州）出了很多诗人，高启和杨基、张羽、徐贲被称为“四杰”，可与唐代王、杨、卢、骆相匹配。
(邱文龙译)

【原文】

高启，字季迪，长洲人。博学工诗。张士诚据吴，启依外家，居吴淞江之青丘。洪武初，被荐，偕同县谢徽召修《元史》，授翰林院国史编修官，复命教授诸王。三年秋，帝御阙楼，启，徽俱入对，擢启户部右侍郎，徽吏部郎中。启自陈年少不敢当重任，徽亦固辞，乃见许。已，并赐白金放还。启尝赋诗，有所讽刺，帝嫌之未发也。及归，居青丘，授书自给。知府魏观为移其家郡中，旦夕延见，甚欢。观以改修府治，获谴。帝见启所作上梁文，因发怒，腰斩于市，年三十有九。

明初，吴下多诗人，启与杨基、张羽、徐贲称四杰，以配唐王、杨、卢、骆云。

李梦阳传

——《明史》卷二八六

【说明】李梦阳（1473—1530），明代文学家。字献吉，号空同子，庆阳（今属甘肃）人。弘治进士，曾任户部郎中，因反对宦官刘瑾下狱。刘瑾败，迁江西提学副使。

李梦阳与何景明等互相呼应，号称“前七子”。其文学主张，倡言“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力主复古，反对当时台阁体诗文的弊端。其诗虽有抚时感事之作，由于偏重摹拟，流于肤廓。其复古主线，影响极大，有《空同集》。

李梦阳，字献吉，庆阳（今属甘肃）人。父李正，做过周王府教授，后迁居开封（今属河南）。李母梦见太阳掉入怀里而生子，所以取名为梦阳。弘治六年（1493），应陕西乡试，考取第一名，第二年，又中了进士，授官户部主事。后升为郎中，专管钱粮税收，与权贵作斗争，以致下狱，最后终于得到释放。

弘治十八年（1503），应皇帝诏书之命，上书论述二病、三害、六渐，共五千多字，透彻地阐明了治理上的得失，最后说：“寿宁侯张鹤龄招纳无赖，谋利害民，那凶势就像老虎

长了翅膀一样。”鹤龄上奏分辩，摘录李疏中“陛下厚张氏”的话语，诬陷梦阳讥讪母后，叫她“张氏”，并且提出按罪应当斩首。当时皇后获宠于皇上，皇后之母金夫人哭着向皇帝控诉梦阳，皇上不得已，把梦阳关在锦衣卫监狱之中。不久，对他实行宽大政策，放他出狱，取消了他的俸禄。金夫人不停地上疏皇帝，皇上不听，把鹤龄领到无人之处，严词责备他，直到鹤龄脱了帽，磕了头方才罢休。左右侍从知道皇帝护着梦阳，请不要判重刑，而用打板子来发泄金夫人的愤懑之情。皇上不许可，对尚书刘大夏说：“你们这些人想用棍棒打死梦阳罢了。我难道愿意杀死正直之臣来使左右感到痛快吗！”有一天，梦阳在路上遇到寿宁侯，骂他，用马鞭子打他，打掉了两颗牙齿，寿宁侯也不敢计较。

孝宗死后，武宗登基，刘瑾等“八虎”专权。尚书韩文和他的同僚谈到此事，哭了起来。梦阳上前问：“明公是大臣，为什么哭啊？”韩文说：“那怎么办呢？”梦阳说：“近来谏官弹劾阉党，阁臣很支持他们的奏章。明公如果率领各位大臣跪在殿下抗争，阁臣一定会响应的，除掉那帮人就容易了。”韩文说：“好。”就让李梦阳起草奏章。不巧走漏了风声，韩文等都被赶走。刘瑾很恨梦阳，假传圣旨，把他贬为山西布政司经历，勒令他交出官印。不久，刘瑾又拿别的事作借口，把梦阳打入监狱，要把他杀了。康海替他在刘瑾面前说情，才免于死。

后来，刘瑾被杀，原先被罢官的重又得到起用。梦阳作了江西提学副使。按令，副使受总督管辖，梦阳却与他分庭抗礼，因此总督陈金很讨厌他。另外有一次，监司官在当月

五日集会去拜揖巡按御史，梦阳又不去，并且命令在学诸生也不要去看上官，即使去了，也要站着行礼，不能下跪，因此御史江万实也很不喜欢梦阳。后来淮王府校官与学府诸生争吵，梦阳打了校官几十大板，淮王恼怒了，上奏皇上，皇上把案子送交御史查究治罪。梦阳恐江万实偏向淮王，就揭发万实的隐私。皇上又降旨让总督陈金进行查问，陈金又下令布政司郑岳勘查此案。梦阳伪造了万实弹劾陈金的奏疏来激怒陈金，并且罗织罪名，指控郑岳之子郑沄犯了通贿罪。宁王宸濠，仰慕梦阳之名，曾请他撰写《阳春书院记》，也讨厌郑岳，于是帮助梦阳弹劾郑岳。万实又上奏揭发梦阳短处以及伪造奏章的事。而参政吴廷举也跟梦阳有仇，上疏说他侵官，不听命令，径自离去。皇上下旨派大理卿燕忠前往审理，传讯梦阳，把他关在广信监狱。诸生一万多人替他鸣冤，燕忠不予理睬，弹劾梦阳欺压同僚，挟制上级，于是剥夺了他的职务，只给他保留一个官籍的空名，回家闲居。同时也剥夺了郑岳的职务，把郑沄发配边远地区，罢了吴廷举的官。

梦阳在家闲居以后，更加负气放纵，造园池，招宾客，每天带领一批好事的年轻人，在繁台、晋丘之间射箭打猎，自称“空同子”，名震四海。宸濠因叛逆被杀，御史周宣弹劾李梦阳是他的同党余逆，于是被逮捕。大学士杨廷和、尚书林俊竭力营救他，但牵涉到他曾为宸濠作过《阳春书院记》，被削去官籍，不久，病故。子名枝，考取进士。

李梦阳才思奔放，气度不凡，以复古为己任。弘治（1488—1505）年间，宰相李东阳为文坛领袖，天下文人全都拜倒在他脚下，独独梦阳讥笑他的作品柔弱而缺乏生气。他提倡

文章一定要取法秦汉，诗歌一定要取法盛唐，不属于上述范围，闭口不提。他和何景明、徐祯卿、边贡、朱应登、顾璘、陈沂、郑善夫、康海、王九思号称“十才子”，又和何景明、徐祯卿、边贡、康海、王九思、王廷相号称“七才子”。他们都是鄙视一世的人物，而李梦阳尤其厉害。吴地人黄省曾、越地人周祚，千里迢迢，寄来书信，愿作门下弟子。到了嘉靖年间，出了李攀龙、王世贞，这两人又把他们奉为宗师。天下人推崇李梦阳、何景明、王世贞、李攀龙为“四大家”，没有不相模仿他们的作品的。华州（今陕西华县）王维桢认为七言律诗从杜甫以后，善用顿挫倒插之法的，只有梦阳一人。而后来有人讥评李梦阳诗文，则是说他模拟剽窃古人作品，学到的只是司马迁、杜少陵的一点皮毛，而丢掉了最根本的东西，等等。

（邱文龙 译）

【原文】

李梦阳，字献吉，庆阳人。父正，官周王府教授，徙居开封。母梦日堕怀而生，故名梦阳。弘治六年举陕西乡试第一，明年成进士，授户部主事。迁郎中，榷关，格势要，构下狱，得释。

十八年应诏上书，陈二病、三害、六渐，凡五千余言，极论得失。末言：“寿宁侯张鹤龄招纳无赖，罔利贼民，势如翼虎。”鹤龄奏辨，摘疏中“陛下厚张氏”语，诬梦阳讪母后为张氏，罪当斩。时皇后有宠，后母金夫人泣诉帝，帝不得已，系梦阳锦衣狱。寻宥出，夺俸。金夫人诉不已，帝弗听，召鹤龄闲处，切责之，鹤龄免冠叩头乃已。左右知帝护梦阳，请毋重罪，而予杖以泄金夫人愤。帝又弗许，谓尚书刘大夏曰：

“若辈欲以杖毙梦阳耳，吾宁杀直臣快左右心乎！”他日，梦阳途遇寿宁侯，詈之，击以马槊，堕二齿，寿宁侯不敢校也。

孝宗崩，武宗立，刘瑾等八虎用事，尚书韩文与其僚语及而泣。梦阳进曰：“公大臣，何泣也？”文曰：“奈何？”曰：“比言官劾群奄，阁臣持其章甚力，公诚率诸大臣伏阙争，阁臣必应之，去若辈易耳。”文曰“善”，属梦阳属草。会语泄，文等皆逐去。瑾深憾之，矫旨谪山西布政司经历，勒致仕。既而瑾复摭他事下梦阳狱，将杀之，康海为说瑾，乃免。

瑾诛，起故官，迁江西提学副使。令甲，副使属总督，梦阳与相抗，总督陈金恶之。监司五日会揖巡按御史，梦阳又不往揖，且敕诸生毋谒上官，即谒，长揖毋跪。御史江万实亦恶梦阳。淮王府校与诸生争，梦阳笞校。王怒，奏之，下御史按治。梦阳恐万实右王，讦万实。诏下总督金行勘，金檄布政使郑岳勘之。梦阳伪撰万实劾金疏以激怒金，并构岳子沅通贿事。宁王宸濠者浮慕梦阳，尝请撰《阳春书院记》，又恶岳，乃助梦阳劾岳。万实复奏梦阳短，及伪为奏章事。参政吴廷举亦与梦阳有隙，上疏论其侵官，不俟命径去。诏遣大理卿燕忠往鞫，召梦阳，羁广信狱。诸生万余为讼冤，不听。劾梦阳陵轹同列，挟制上官，遂以冠带闲住去。亦褫岳职，谪戍沅，夺廷举俸。治园池，招宾客，日纵侠少射猎繁台、晋丘间，自号空同子，名震四海。宸濠反诛，御史周宣劾梦阳党逆，被逮。大学士杨廷如、尚书林俊力救之，坐前作《书院记》，削籍。顷之卒。子枝，进士。

梦阳才思雄鸷，卓然以复古自命。弘治时，宰相李东阳主文柄，天下翕然宗之，梦阳独讥其萎弱。倡言文必秦、汉，

诗必盛唐，非是者弗道。与何景明、徐祯卿、边贡、朱应登、顾玲、陈沂、郑善夫、康海、王九思等号十才子，又与景明、祯卿、贡、海、九思、王廷相号七才子。皆鄙视一世，而梦阳尤甚。吴人黄省曾、越人周祚，千里致书，愿为弟子。迨嘉靖朝，李攀龙、王世贞出，复奉以为宗。天下推李、何、王、李为四大家，无不争效其体。华州王维祯以为七言律自杜甫以后，善用顿挫倒插之法，惟梦阳一人。而后有讥梦阳诗文者，则谓其模拟剽窃，得史迁、少陵之拟，而失其真云。

茅坤传

——《明史》卷二八七

【说明】茅坤（1512—1601），明代散文家。字顺甫，号鹿门。归安（今浙江吴兴）人。嘉靖进士，官至大名兵备副使。后为人中伤，归家隐居五十余年。

茅坤为“唐宋派”代表作家，反对前后七子“文必秦汉”的主张，提倡学习唐宋古文，作品内容应能阐发“六经”之旨。所评选《唐八大家文钞》在当时和后世有很大影响。其文好摹拟，佳作不多。有《白华楼藏稿》、《玉芝山房稿》，行世有《茅鹿门集》。

茅坤，字顺甫，归安（今浙江吴兴）人。嘉靖十七年（1538）进士，历任青阳、丹徒两县知县。母死，服丧期满，升礼部主事，改任吏部稽勋司，因亏欠犯罪，被贬为广平（今河北永年）通判。又逐渐升为广西备佥事，管辖府江道。

茅坤平素喜好谈兵。瑶贼占据了鬼子各处山寨，杀了阳朔县令。朝廷商讨大规模出征之事，总督应檟向茅坤征求意见。茅坤说：“大规模出征，没有十万兵马是不行的，粮饷要足够。现在仓促之间，不能筹集，而贼人早已占据险地，作

了准备。不如用鹬薮之计，突然疾速杀入，消灭他们的首领，其他各部必定会惊恐万状，只好图谋保全自己，这就好办了。”应橧认为他的计策好，把进剿之事全交给茅坤去办。结果，连破十七寨，官升二级，那里的百姓立了祠堂来纪念他。

后茅坤升为大名（今属河北）兵备副使。总督杨博惊叹他是一个奇才，特别向朝廷推荐，由于被妒忌他的人所攻击，追究他先前贪污的事，结果落职而归。而当时倭寇来犯，形势紧急，胡宗宪把他请到军营中，和他商讨打仗之事，并奏请皇上任命他作福建副使。吏部坚持己见，才作罢了。他家人在乡里横行不法，被巡抚庞尚鹏所弹劾，于是剥夺了他的官籍。茅坤被贬为庶民后，把心用在经商上，家业大发。他在万历二十九年（1601）病故，享年九十。

茅坤擅长古文，最佩服唐顺之。顺之喜好唐、宋各大家的文章，他所编纂的文集，唐宋人从韩、柳、欧、三苏、曾、王八家外，没有什么选取的，所以茅坤选编了《八大家文钞》。此书风行海内，连乡里小孩子，也没有不知道茅鹿门的。鹿门，是茅坤的别号。

【原文】

（邱文龙 译）

茅坤，字顺甫，归安人。嘉靖十七年进士。历知青阳、丹徒二县。母忧，服阙，迁礼部主事，移吏部稽勋司，坐累，谪广平通判。屡迁广西兵备僉事，辖府江道。

坤雅好谈兵。瑶贼据鬼子诸砦，杀阳朔令。朝议大征，总督应橧以问坤。坤曰：“大征非兵十万不可，饷称之，今猝不能集，而贼已据险为备。计莫若鹬薮。倏入歼其魁，他部必薈，谋自全，此便计也。”橧善之，悉以兵事委坤。连破十七

砦，晋秩二等。民立祠祀之。

迁大名兵备副使，总督杨博叹为奇才，特荐于朝。为忌者所中，追论其先任贪污状，落职归。时倭事方急，胡宗宪延之幕中，与筹兵事，奏请为福建副使。吏部持之，乃已。家人横于里，为巡按庞尚鹏所劾，遂褫寇带。坤既废，用心计治生，家大起。年九十，卒于万历二十九年。

坤善古文，最心折唐顺之。顺之喜唐、宋诸大家文，所著文编，唐、宋人自韩、柳、欧、三苏、曾、王八家外，无所取，故坤选《八大家文钞》。其书盛行海内，乡里小生无不知茅鹿门者。鹿门，坤别号也。

李攀龙传

——《明史》卷二八七

【说明】李攀龙（1514—1570），明代文学家。字于鳞，号沧溟。历城（今山东济南）人。嘉靖进士，官至河南按察使。

李攀龙与王世贞等人同为明代“后七子”首领。认为文自秦汉，诗自盛唐以下都不足观，倡导模拟、复古。所作诗文多模仿古人。少数作品有现实内容，有一定艺术感染力。有《沧溟集》。

李攀龙，字于鳞，历城（今山东济南）人。九岁丧父，家境清贫，主动奋发学习。稍大一些，就成了太学诸生，和朋友许邦才、殷士儋一起学习写诗。不久更喜欢上了训诂之学，每天研读古书，邻里们都把他看成“狂生”。嘉靖二十三年（1544）考取进士，授予刑部主事的官职。历任员外郎、郎中，逐步升到顺德知府，有好的政绩。上级官员交相荐举，提升为陕西提学副使。同乡人殷学作了巡抚大人，用榜文命他作文。李攀龙不高兴地说：“文章是可以下命令写得的吗？”拒不答应。正好那里发生了几次地震，攀龙心里吃惊，思念母亲，想回故乡，于是托病辞官。按过去的老例，地方官有病

辞退，就不再起用。但吏部看重李攀龙的才能，援用何景明的先例，特别准许他告假而归。准予告假，按例还要起用。

李攀龙归家后，造了白雪楼，名声越来越高。宾客前来登门拜访，都一概谢绝不见，大官来了，也这样。因此有了简慢高傲的名声。独有姓殷和姓李一辈老朋友来往亲密无间。当时徐中行也闲居在家，客人总是满座。两人彼此了解以后，成了知己朋友。归居田园近十年光景，隆庆元年（1567），被荐起用作浙江副使，后改任参政，又提升为河南按察使。攀龙到这时才放下高傲的姿态，变得平易近人了，宾客也渐渐多了起来。不久，母死奔丧，归家后悲痛过度而得病。后来，病稍见起色，一天，突然心痛而死。

攀龙起初在刑部作官时，和濮州李先芳、临清谢榛、孝丰吴维岳等创立诗社。王世贞刚脱去布衣，换上官服，先芳就介绍他入社，于是和攀龙作了朋友。第二年，先芳出京作地方官。又过了二年，宗臣、梁有誉加入诗社，称为“五子”。不久，徐中行、吴国伦也来加入，才改称“七子”。他们大多是年轻后生，才高气壮，互相标榜，把当代人看得无人可与他们相比。七才子有名声远播于天下。他们把先芳、维岳排除在外，后来，其中的谢榛也被排除，李攀龙就成了魁首。他的理论是文章从西汉以后，诗歌从天宝以后都不值得阅读，在当代只推崇李梦阳。其余的人也都一律附和他的主张，不这样说就诋毁为“宋学”。攀龙才思横溢，名声最大，心中独独推崇王世贞，天下人也并称他们为王、李。又和李梦阳、何景明并称为何、李、王、李。李攀龙作诗，一定要以声调取胜，所模仿的乐府诗，有的只更改几个字就作为自

己的作品，文章则写得佶倔聱牙，让人难以读完。爱好他文章的人推他为一代宗匠，可也多方面地受到世人的挑剔、批评。攀龙自取号“沧溟”。（邱文龙 译）

【原文】

李攀龙，字于鳞，历城人。九岁而孤，家贫，自奋于学。稍长为诸生，与友人许邦才、殷士儋学为诗歌。已，益厌训诂学，日读古书，里人共目为狂生。举嘉靖二十三年进士，授刑部主事。历员外郎、郎中，稍迁顺德知府，有善政。上官交荐，擢陕西提学副使。乡人殷学为巡抚，檄冷属文，攀龙怫然曰：“文可檄致邪？”拒不应。会其地数震，攀龙心悸，念母思归，遂谢病。故事，外官谢病不再起，吏部重其才，用何景明例，特予告归。予告者，例得再起。

攀龙既归，构白雪楼，名日益高。宾客造门，率谢不见。大吏至，亦然。以是得简傲声。独故交殷、许辈过从靡间。时徐中行亦家居，坐客恒满，二人闻之，交相得也。归田将十年，隆庆改元，荐起浙江副使，改参政，擢河南按察使。攀龙至是摧亢为和，宾客亦稍稍进。无何，奔母丧归，哀毁得疾，疾少间，一日心痛卒。

攀龙之始官刑曹也，与濮州李先芳、临清谢榛、孝丰吴维岳辈倡诗社。王世贞初释褐，先芳引入社，遂与攀龙定交。明年，先芳出为外吏。又二年，宗臣、梁有誉入，是为五子。未几，徐中行、吴国伦亦至，乃改称七子。诸人多少年，才高气锐，互相标榜，视当世无人。七才子之名播天下，摈先芳、维岳不与，已而榛亦被摈，攀龙遂为之魁。其持论谓文自西京，诗自天宝而下，俱无足观，于本朝独推李梦阳。诸

子翕然和之，非是，则诋为宋学。攀龙才思劲鸷，名最高，独心重世贞，天下亦并称王、李。又与李梦阳、何景明并称何、李、王、李。其为诗，务以声调胜，所拟乐府，或更古数字为己作，文则聱牙戟口，读者至不能终篇。好之者推为一代宗匠，亦多受世挾摘云。自号沧溟。

王世贞传

——《明史》卷二八七

【说明】王世贞（1526—1590），明代文学家。字元美，号凤州，忬州山人。太仓（今属江苏）人。嘉靖进士，官至南京刑部尚书。

王世贞与李攀龙同为明代“后七子”首领，主张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强调诗的格调，倡导复古模拟。晚年文学思想有较大变化，觉察到复古的流弊。《艺苑卮言》是其早期论著。

其诗取材宏博，颇具匠心。词受传统束缚较大，题材狭窄。对戏曲也颇有研究。有《弇州山人四部稿》等书传世。

王世贞，字元美，太仓（今属江苏）人，是右都御史王忬的儿子。生下来就有特殊的天赋，书一过目，终身不忘。十九岁时，考取嘉靖二十六年（1547）进士，授官刑部主事。王世贞喜欢作诗写古文，在京都做官，加入王宗沐、李先芳、吴维岳等人的诗社，又和李攀龙、宗臣、梁有誉、徐中行、吴国伦等人相倡和，继承何景明、李梦阳的主张，名声越来越大。在官职上接连升为员外郎、郎中。

坏人闫某犯了法，藏在锦衣都督陆炳家里，王世贞搜查逮捕了他。陆炳通过严嵩请求释放闫某，世贞没有答应。杨继盛入狱受审，世贞经常送去汤药。继盛妻子为夫告状伸冤，世贞代为起草状子；继盛死后，又用棺装殓了他。严嵩对此咬牙切齿。吏部两次打算任命世贞作提学，都未被批准，而让他去作青州（今山东潍坊）兵备副使。世贞父亲在滦河出了事故，严嵩罗织罪名，判他死刑，关进狱中。世贞辞官奔赴京城，和弟弟世懋每天俯伏在严嵩府门前，哭着请求宽大处理。严嵩暗里坚持对王忬的原判，却表面上时时说些欺骗的话来宽慰他们。他们又每天穿囚服跪在路旁，挡住那些达官贵人的车子，磕着头乞求救他父亲。那些达官贵人害怕严嵩，不敢说话。王忬终于被斩首示众。兄弟号啕大哭，悲痛欲绝，护送父亲灵柩归家，守丧吃素三年，三年中不入内室就寝。守丧期满，仍不着官服，穿草鞋，戴葛巾，不赴宴会。

隆庆元年（1567）八月，世贞兄弟俩向皇上申诉父冤，说被严嵩所害。大学士徐阶处理此事，恢复了王忬的官位。世贞本不想再出山做官，正值皇上传下诏书，让臣下直言进谏，于是世贞上疏，陈述法祖宗、正殿名、广恩义、宽禁例、修典章、推德意、昭爵赏、练兵实八条建议，来响应皇上的诏告。不久，由言官推荐，吏部任命他作副使，去大名（今属河北）上任。接着升为浙江右参政，山西按察使。因母亲亡故，回家守丧。守丧期满，调往湖广做官，接着改任广西右布政使，入京任太仆卿。

万历二年（1574）九月，以右副都御史的头衔安抚治理郧阳（今湖北郧县），几次向皇上分条陈述武器、戍守、兵实

等事宜，都是切实可行的重大建议。当时有一个坏和尚，冒充是乐平王的二儿子，带了高皇帝的遗像和世系家谱，行游天下。王世贞说：“受分封的宗室不能随便出城，而他却这样胡来，一定是假的。”把他抓来审讯，承认犯了欺骗之罪。

张居正主持国政，因为世贞是他同期进士，有意提拔他，世贞却对他不很亲近。世贞所管辖的荆州发生地震，请京房占卜，说臣下势力太甚，地的四角就不得安宁，用来委婉地规劝居正。居正的内弟欺辱江陵县令，世贞向皇上告发，一点也不宽容。张居正忍不下去了，正好世贞升任南京大理卿，被给事中杨广所弹劾，就以皇上的旨意，把他罢了官。后起用为应天府尹，又被弹劾罢官。张居正死后，起用王世贞为南京刑部右侍郎，告病不去赴任。过了好久，与世贞交好的王锡爵主持国政，起用他为南京兵部右侍郎。在这之前，王世贞作过副都御史和大理寺卿、应天尹和侍郎，官品都是正三品。世贞计算全部任职时间，够规定可以封子。等提升为南京刑部尚书，御史黄仁荣说世贞早先被弹劾，罢官期间不应计算官龄，依据惯例，和世贞力争。世贞三次上疏后告病归家。万历二十一年（1593），寿终正寝。

王世贞开始时和李攀龙交互主持文坛，攀龙死后，独主文坛二十年。他文才最高，地位、威望最突出，誉满海内，气势逼人。一时间士大夫和隐士、词人、和尚、道士等，无不奔走于世贞的门下，只要世贞一句褒奖的话，声价骤然提高了。他的理论主张是：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大历（766—779）以后的作品不要去读。可是他的诗文，过分离琢词藻。晚年，攻击他的人渐渐多起来，而王世贞诗文的风格也渐趋

平淡。他病得很厉害时，刘凤前去看望，见他手里拿着《苏子瞻集》，讽咏玩味个不停呢。

世贞自号“凤洲”，又号“弇州山人”。那些跟他交往的人，大都在他集中可以见到，并且各自作为标目。集中说的前五子是李攀龙、徐中行、梁有誉、吴国伦、宗臣，后五子则是南昌的余曰德、蒲圻的魏裳、歙县汪道昆、铜梁张佳胤、新蔡张九一。广五子又是昆山俞允文、浚县卢柟、濮州李先芳、孝丰吴维岳、顾德欧大任。续五子则是曲阳王道行、东明石星、从化黎民表、南昌宋多燧、常熟赵用贤。末五子是京山李维桢、鄞县屠隆、南乐魏允中、兰溪胡应麟，还有后来参加的用贤。他所肯定和否定的，颇有些以个人好恶来衡量高下的味道。

（邱文龙 译）

【原文】

王世贞，字元美，太仓人，右都御史忬子也。生有异稟，书过目，终身不忘。年十九，举嘉靖二十六年进士。授刑部主事，世贞好为诗古文，官京师，入王宗沐、李先芳、吴维岳等诗社，又与李攀龙、宗臣、梁有誉、徐中行、吴国伦辈相倡和，绍述何、李，名日益盛。屡迁员外郎、郎中。

奸人阎姓者犯法，匿锦衣都督陆炳家，世贞搜得之。炳介严嵩以请，不许。杨继盛下吏，时进汤药。其妻讼夫冤，为代草；既死，复棺殓之。嵩大恨。吏部两拟提学皆不用，用为青州兵备副使。父忬以滦河失事，嵩构之，论死系狱。世贞解官奔赴，与弟世懋日蒲伏嵩门，涕泣求贷。嵩阴持忬狱，而时为谩语以宽之。两人又日囚服跽道旁，遮诸贵人舆，搏颡乞救。诸贵人畏嵩不敢言，忬竟死西市。兄弟哀号欲绝，持

丧归，蔬食三年，不入内寝。既除服，犹却冠带，苴履葛巾，不赴宴会。

隆庆元年八月，兄弟伏阙讼父冤，言为嵩所害。大学士徐阶左右之，复忤官。世贞意不欲出，会诏求直言，疏陈法祖宗、正殿名、广恩义、宽禁例、修典章、推德意、昭爵赏、练兵实八事，以应诏。无何，吏部用言官荐，令以副使涖大名。迁浙江右参政，山西按察使。母忧归，服除，补湖广，旋改广西右布政使，入为太仆卿。

万历二年九月以右副都御史抚治郧阳，数条奏屯田、戍守、兵食事宜，咸切大计。有奸僧伪称乐平王次子，奉高皇帝御容、金牒，行游天下。世贞曰：“宗藩不得出城，而涛张如此，必伪也。”捕讯之，服辜。

张居正枋国，以世贞同年生，有意引之，世贞不甚亲附。所部荆州地震，引京房占，谓臣道太盛，坤维不宁，用以讽居正。居正妇弟辱江陵令，世贞论奏不少贷。居正积不能堪，会迁南京大理卿，为给事中杨节所劾，即取旨罢之。后起应天府尹，复被劾罢。居正歿，起南京刑部右侍郎，辞疾不赴。久之，所善王锡爵秉政，起南京兵部右侍郎。

先是，世贞为副都御史及大理卿、应天尹与侍郎，品皆正三。世贞通理前俸，得考满荫子。比擢南京刑部尚书，御史黄仁荣言世贞先被劾，不当计俸，据故事力争。世贞乃三疏移疾归。二十一年卒于家。

世贞始与李攀龙狎主文盟，攀龙歿，独操柄二十年。才最高，地望最显，声华意气笼盖海内。一时士大夫及山人、词客、衲子、羽流，莫不奔走门下。片言褒赏，声价骤起。其

持论，文必西汉，词必盛唐，大历以后书勿读，而藻饰太甚，晚年，攻者渐起。世贞顾渐造平淡。病亟时，刘凤往视，见其手书《苏子瞻集》，讽习不置也。

世贞自号凤洲，又号弇州山人。其所与游者，大抵见其集中，各为标目。曰前五子者，攀龙、中行、有誉、国伦、臣也。后五子则南南昌余曰德、蒲圻魏裳、歙汪道昆、铜梁张佳胤、新蔡张九一也。广五子则昆山俞允文、浚卢柟、濮州李先芳、孝丰吴维岳、顺德欧大任也。续五子则阳曲王道行、东明石星、从化黎民表、南昌朱多炏、常熟赵用贤也。末五子则京山李维桢、鄞屠隆、南乐魏允中、兰溪胡应麟，而用贤复与焉。其所去取，颇以好恶为高下。

归有光传

——《明史》卷二八七

【说明】归有光（1507—1571），明代散文家。字熙甫，昆山（今属江苏）人。人称震川先生。嘉靖进士，官南京太仆寺丞。

归有光反对前、后七子“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复古运动，认为唐宋元的文章“其力足以追数千载之上而与之颉颃”，对拘泥古人的创作方法进行了批判。与王慎中等人被称为“唐宋派”。其文即事抒情，结构精巧，言简意赅，影响极大。有《震川先生集》。

归有光，字熙甫，昆山（今属江苏）人。九岁就能写文章，到二十岁，“五经”、“三史”等书全已通晓，拜本地魏校作老师。嘉靖十九年（1540）考取举人，以后考了八次进士都没有中。迁居嘉定安亭江边，读书谈道。学生常常有几百人，称他震川先生。嘉靖四十四年（1565），才考取进士，授官长兴（今浙江湖州）知县。他用古代的一套政教理论和做法来进行治理。每次审理案件，把妇女儿童领到案前，说着尖细的吴语，断完案，把人打发走，不写判决书。上级的命

令不切实际，就束之高阁，不去执行。与上司有所争执，就径自照自己的意思办。大官们大多不喜欢他，调作顺德（今属广东）通判，专管马政。明代，进士作县令没有晋升副职的。因此，调任通判名为提升，实际上是很重的贬谪。隆庆四年（1570），大学士高拱、赵贞吉平素与有光交好，引荐他作南京太仆丞，掌管内阁制敕房，编撰《世宗实录》，死在任上。

归有光作古文，以经术为本，喜欢太史公的《史记》，参透其中的神理。当时王世贞为文坛盟主，有光尽力和他分庭抗礼，把他看作狂妄而平庸的大人物。世贞心里很不痛快，但以后也对有光佩服得五体投地，给他写赞语说：“千年才出了你这样的人才，来继承韩愈、欧阳修的古文传统，我哪里是走的另一条路，只是自伤长久以来没有什么成就啊！”他就是这样推崇归有光。

有光的小儿子子慕，字季思。万历十九年（1591），考取举人，第二年未中进士就隐居江村，和无锡高攀龙最好。他死时巡按御史祁彪佳向朝廷请示，赐他翰林待诏。

归有光在特种经学研究上有很深的造诣，卓然成为经学大师，后来的德清县胡友信和他齐名，世人并称他们为“归、胡”。

【原文】

（邱文龙 译）

归有光，字熙甫，昆山人。九岁能属文，弱冠尽通《五经》、《三史》诸书，师事同邑魏校。嘉靖十九年举乡试，八上春官不第。徙居嘉定安亭江上，读书谈道。学徒常数百人，称为震川先生。

四十四年始成进士，授长兴知县。用古教化为治。每听讼，引妇女儿童案前，刺刺作吴语，断讞遣去，不具狱。大吏令不便，辄寝阁不行。有所击断，直行己意。大吏多恶之，调顺德通判，专辖马政。明世，进士为令无迂悴者，名为迂，实重抑之也。隆庆四年，大学士高拱、赵贞吉雅知有光，引为南京大仆丞，留掌内阁制敕房，修《世宗实录》，卒官。

有光为古文，原本经术，好《太史公书》，得其神理。时王世贞主盟文坛，有光力相抵排，目为妄庸巨子。世贞大憾，其后亦心折有光，为之赞曰：“千载有公，继韩、欧阳。余岂异趋，久而自伤。”其推重如此。

有光少子子慕，字季思。举万历十九年乡试，再被放，即屏居江村，与无锡高攀龙最善。其歿也，巡按御史祁彪佳请于朝，赠翰林待诏。

有光制举义，湛深经术，卓然成大家。后德清胡友信与齐名，世并称“归、胡”。

徐渭传

——《明史》卷二八八

【说明】徐渭（1521—1593），字文长，号天池生，晚年号青藤道士，山阴县（今浙江省绍兴市）人。一生科场不利，秀才出身，多次乡试不第，故一生没做过官。中年做浙闽总督胡宗宪的幕僚，颇得赏识。胡宗宪下狱，徐渭惧祸而发狂，杀死妻子，被判死刑，乡人张元忭营救，得以免死。后游历此边诸边塞，郁郁而终。

徐渭是明代中期的博学多才的艺术家。工书法，以行草见长，运笔超逸圆浑，纵逸飞动，源于苏轼、米芾，而形成自己的书风。善绘画，以花鸟著称，用笔放纵，水墨酣畅，重写意神似，不规囿于笔画之间，对后世大写意画有较大影响。同时他还是戏曲作家和戏曲理论家，著有《南词叙录》和《四声猿》杂剧。诗文亦称一时之妙，诗有李贺之奇，文有苏轼之辩，著有《徐文长全集》、《徐文长佚稿》等。

徐渭，字文长，是山阴县人。十多岁时即摹仿扬雄的《解嘲》，作《释毁》一文，长大以后，拜同乡季本为师。在做秀才时，即很有名气。总督胡宗宪聘请他为幕僚，他和歙

县人余寅、鄞县人沈明臣共同掌管文书。胡宗宪得到一头白鹿，将要献给朝廷，让徐渭起草进献表文，胡宗宪将他作的表文和其他幕僚所作的表文一起寄给和胡宗宪关系很好的一位学士，请他选择其中最好的一篇进呈。这位学士选中了徐渭的表文进上，明世宗看了以后很满意，于是更加宠信胡宗宪，胡宗宪因此也更加敬重徐渭。胡宗宪曾在烂柯山宴请部下的将领，酒席进入高潮，乐队奏起乐曲，沈明臣当场作了《铙歌》十首，其中有两句说：“狭巷短兵相接处，杀人如草不闻声。”胡宗宪听罢，站起来走到沈明臣身侧，将着他的胡子说：“沈先生真有你的，诗句这样雄壮痛快！”当场命令将此《铙歌》刻碑上石，胡宗宪对沈明臣和徐渭一样爱重。总督官高位显，威风凛凛，气氛严肃，将吏在胡宗宪面前，不敢抬头正眼相看，徐渭却以平民的装束，和胡宗宪彼此彬彬有礼，纵情畅谈。总督府如有紧急事情要徐渭办理，即使在深夜里也会大开府门，等待徐渭。有时因徐渭喝醉酒，不能前来，胡宗宪还去看望他。余寅、沈明臣二人也自视甚高，以耿直受到礼遇。

徐渭懂得军事，好出奇计，胡宗宪捕获海盗徐海，诱捕王直，徐渭都参预谋画。徐渭依仗胡宗宪的势力，专横无礼。后来胡宗宪因事被捕入狱，徐渭担心大祸临头，因害怕而发狂，用大锥刺自己的耳部，刺进好几寸深，又用锤子砸碎阴囊，但都没有致命。不久又把续娶的妻子杀死，被判为死罪，监禁等待处决，他的同乡张元忭极力营救，徐渭才没被处死。后来徐渭游历金陵，又北至宣府、辽州，考察边塞的形势，在考察边塞时，结交了李成梁的几个儿子。又进京，住在张元

忤家。张元忬引导他遵循礼法，徐渭听不进去，过了很久，怒气冲冲地离去。后来张元忬逝世，徐渭身穿孝服去吊唁，手扶尸棺，大声痛哭，没向丧家说出自己的姓名走开了。

徐渭的天赋很高，诗文的成就超出同时代的文人。他又擅长草书，兼工绘画，善画花草竹石。他曾自我评价说：“我的书法是第一，诗词第二，文章第三，绘画第四。”他生当嘉靖年间，当时王世贞、李攀龙倡导成立“七子社”，诗人谢榛因是平头百姓被排斥。徐渭气愤他们以官势压百姓，发誓不加入他们一派。过了二十年，公安人袁宏道游历浙江，得到徐渭著作的残篇，拿给国子监祭酒陶望龄看，二人非常欣赏，于是把他的文章刊刻传世。

（魏连科 译）

【原文】

徐渭，字文长，山阴人。十馀岁仿扬雄《解嘲》和《释毁》，长师同里季本。为诸生，有盛名。总督胡宗宪招致幕府，与歙余寅、鄞沈明臣同管书记。宗宪得白鹿，将献诸朝，令渭草表，并他客草寄所善学士，择其尤上之。学士以谓表进，世宗大悦，益宠异宗宪，宗宪以是益重渭。宗宪尝宴将吏于烂柯山，酒酣乐作，明臣作《铙歌》十章，中有云“狭苍短兵相接处，杀人如草不闻声。”宗宪起，将其须曰：“何物沈生，雄快乃尔！”即令刻于石，宠礼与谓埒。督府势严重，将吏莫敢仰视。谓角巾布衣，长揖纵谈。幕中有急需，夜深开戟门以待。谓或醉不至，宗宪顾善之。寅、明臣亦颇负崖岸，以侃直见礼。

谓知兵，好奇什，宗宪禽徐海，诱王直，皆预其谋。籍

宗宪势，颇横。及宗宪下狱，谓惧祸，遂发狂，引巨锥刺耳，深数寸，又以椎碎肾囊，皆不死。已，又击杀继妻，论死系狱，里人张元忭力救得免。乃游金陵，抵宣、辽，纵观诸边阨塞，善李成梁诸子。入京师，主元忭。元忭导以礼法，谓不能从，久之怒而去。后元忭卒，白衣往吊，抚棺恸哭，不告姓名去。

谓天才超轶，诗文绝出伦辈。善草书，工写花草竹石。尝自言：“吾书第一，诗次之，文次之，画又次之。”当嘉靖时，王、李倡七子社，谢榛以布衣被摈。谓愤其以轩冤压韦布，誓不入二入党。后二十年，公安袁宏道游越中，得谓残帙以示祭酒陶望龄，相与激赏，刻其集行世。

袁宏道传

——《明史》卷二八八

【说明】袁宏道（1568—1610），明代文学家。字中郎，号石公，湖广公安（今属湖北）人。万历进士，官吏部郎中。

袁宏道与兄宗道、弟中道，号“公安三袁”，在明代文坛占有重要地位，称为“公安派”。其中宏道成就最高，其思想受李贽影响较深，重视戏曲小说和民歌的地位；于诗文反对摹拟、复古主张，强调抒写“性灵”。“性灵说”在当时极具影响。其文真率自然，清新流畅，卓然成家。有《袁中郎全集》。

袁宏道，字中郎，公安（今属湖北）人。与哥哥宗道、弟弟中道，在文才上都很有名，当时人称为“三袁”。宗道，字伯修，万历十四年（1586），会试第一，授官庶吉士，后提升为编修，死在作右庶子官的任上。泰昌年间，追认他为光宗讲官，赠予礼部右侍郎的称号。

宏道年十六时成为太学诸生，就在城南组织文社，当了领袖，不时写些诗词歌赋和古文，在本地很有名声。万历二十年（1592），中进士。回到家乡，闭门读书。诗文主张妙悟。

被选拔为吴县（今江苏）知县，断敏捷，公堂事少。和士大夫谈说诗文，以风流儒雅自居。不久，辞官而去。后又起用为顺天（今北京）教授，历任国子助教，礼部主事，因病辞职归家。好久以后，又起用作原官。接着凭清高的声望，提拔为吏部验封主事，改任文选官。不久担任考功员外郎，制定年终考察群吏法，说：“外官三年一察，京官六年一察，武官五年一察，这班渎职之人还怎么能独独免于考察？”奏疏送上去，获得批准，于是成为固定的制度。升为稽勋郎中后，病辞回家，几月后就去世了。

袁中道，字小修，十多岁时写了《黄山》和《雪》两篇赋，五千多字。长大以后，更加豪放不羁，跟着两个哥哥，游历京都，多多结交四方名士，足迹遍及半个天下。万历三十一年（1603）才考取举人，又过四年才中了进士。历任徽州教授、国子博士、南京礼部主事。天启四年（1624）晋升南京吏部郎中，死在任上。

先前，王世贞、李攀龙的学术理论盛行一时，袁氏兄弟独独反对他们的主张。宗道在学馆中，和同馆黄辉，竭力否定他们的理论。他们在唐代诗人中喜好白居易，宋代喜好苏轼，把他的斋命名为“白苏”。到了宏道，更用诗文的清新轻俊来纠正李、王的偏颇。读书人中有好多舍弃王、李之说而站在袁氏兄弟一边，称他们的作品为“公安体”。可是文章戏谑嘲笑，还夹杂俚语，给不学无术之辈提供了方便。其后，王、李的影响渐渐消失，而钟、谭的主张又大大时行起来。钟、谭就是钟惺和谭元春。

（邱文龙 译）

【原文】

袁宏道，字中郎，公安人。与兄宗道、弟中道并有才名，时称“三袁”。宗道，字伯修。万历十四年会试第一。授庶吉士，进编修，卒官右庶子。泰昌时，追录光宗讲官，赠礼部右侍郎。

宏道年十六为诸生，即结社城南，为之长。间为诗歌古文，有声里中。举万历二十年进士。归家，下帷读书。诗文主妙语。选吴县知县，听断敏决，公庭鲜事。与士大夫谈说诗文，以风雅自命。已而解官去。起授顺天教，历国子助教、礼部主事，谢病归。久之，起故官。寻以请望抉吏部验封主事，改文选。寻移考功员外郎，立岁终考察群吏法，言：“外官三岁一察，京官六岁，武官五岁，此曹安得独免？”疏上，报可，遂为定制。迁稽勋郎中，后谢病归，数月卒。

中道，字小修。十余岁，作《黄山》、《雪》二赋，五千余言，长益豪迈，从两兄宦游京师，多交四方名士，足迹半天下。万历三十一年始举于乡。又十四年乃成进士。由徽州教授，历国子博士、南京礼部主事。天启四年进南京吏部郎中，卒于官。

先是，王、李之学盛行，袁氏兄弟独心非之。宗道在馆中，与同馆黄辉力排其说。于唐好白乐天，于宋好苏轼，名其斋曰“白苏”。至宏道，益矫以请新轻俊，学者多舍王、李而从之，目为“公安体”。然戏谑嘲笑，间杂俚语，空疏者便之。其后，王、李风渐息，而钟、谭之说大炽。钟、谭者，钟性、谭元春也。

钟惺传

——《明史》卷二八八

【说明】钟惺（1574—1624），明代文学家。字伯敬，号退谷，湖广竟陵（今湖北天门）人。万历进士，官至福建提学佥事。又辞官归家，晚年入寺院。

钟惺与同乡谭元春共选《唐诗归》和《古诗归》，名扬一时，形成“竟陵派”。于诗文反对拟古，主张抒写“性灵”，又以公安派的作品为轻率，倡导、幽深孤峭的风格。其作品追求形式上的险辟，流于冷涩。有《隐秀轩集》等。

钟惺，字伯敬，竟陵（今湖北天门）人。万历三十八年（1610）考取进士。授官行人，小升为工部主事，不久又改在礼部任职，晋升为郎中。后又提拔为福建提学佥事，因为父病故，归家守丧，后在家去世。

钟惺其貌不扬，弱不胜衣，为人严肃，对人冷漠，不喜接待一般俗客，因此能够摆脱纷杂的人事。在南京做官时，租赁了秦淮水阁来读史，常常到半夜。有了心得体会就写下来，叫作《史怀》。晚年皈依佛门而死。

自从袁宏道纠正王、李诗作的弊病，提倡“清真”以来，

钟惺又纠正公安诗派的弊病，诗风一变而幽深孤峭。他和同乡谭元春评选唐人之诗，编了《唐诗归》。钟惺、谭元春名满天下，他们的作品称之为“竟陵体”。可是这两人学识不很丰富，见解多有偏颇，大为学识渊博的人所讥笑。

元春，字友夏，名辈在钟惺之后，因为编选《诗归》的缘故，和钟惺刘名。到天启七年（1627），才考取乡试第一名。这时钟惺早已死了。

（邱文龙 译）

【原文】

钟惺，字伯敬，竟陵人。万历三十八年进士。授行人，稍迁工部主事，寻改南京礼部，进郎中，擢福建提学佥事，以父忧归，卒于家。

惺貌寝，羸不胜衣，为人不严冷，不喜按俗客，由此得谢人事。官南都，僦秦淮水阁读史，恒至丙夜，有所见即笔之，名曰《史怀》。晚逃于禅以卒。

自宏道矫王、李诗之弊，倡以“清真”，惺复矫其弊，变而为幽深孤峭。与同里谭元春评选唐人之诗为《唐诗归》，又评选隋以前诗为《古诗归》。钟、谭之名满天下，谓之“竟陵体”。然两人学不甚富，其识解多僻，大为通人所识。

元春，字友夏，名辈后于惺，以《诗归》故，与齐名。至天启七年始举乡试第一，惺已前卒矣。

王士禛传

——《清史稿》卷二六六

【说明】王士禛（1634—1711），清代诗人。字贻上，号阮亭，又号渔洋山人。新城（今山东桓台）人。顺至进士，官至刑部尚书。后罢官归里。

王士禛论诗创：“神韵说”，主张诗境以清远为尚，要求笔调清幽淡雅，富有情趣、风韵和含蓄性。其诗偏于技巧和境界的追求，多模山花水、吟咏风月之作，生前负有盛名。亦能词，有《带经堂集》等。

王士禛，字贻上，山东新城（今山东桓台县）人。从小聪明，就会写诗。在乡试中考取举人，年纪只有十八岁。顺治十二年（1655年），考中进士，任江南扬州推官。侍郎叶成格受命驻居江南，查究处理私通海盗的案子，株连的人很多。王士禛用同样的罪名严厉地惩办诬告人，对无辜者宽大处理，所保全救活的人很多。扬州盐商逃税好几万，长久关押也不能补交，王士禛募集税款代为上缴，事情才了结。康熙三年（1664年），总督郎廷佐、巡捕张尚贤、河督朱之锡交互写奏章向皇上荐举士禛，皇上提升他为礼部主事，接着晋升为户

部郎中。康熙十一年（1672），去四川主持乡试。母死回家守丧，守丧期满，起用为原官。

皇上关心文学，曾从容询问大学士李蔚：“当代博学多才，擅长诗文的人，谁是魁首？”李蔚回答是王士禛。又问冯溥、陈廷敬、张英，都像李蔚说的那样。皇上把王士禛召入懋勤殿面试，当场赋诗，皇上很满意。于是改任他为翰林院侍讲，接着又调迁为侍读，入宫在南书房值班。汉族臣子从部曹改作词臣，从王士禛开始。皇上要他的诗，抄录呈上三百篇，叫作《御览集》。

不久，王士禛调迁为国子监祭酒，整顿条规，拒绝送礼，奖励提拔的都是知名人士。他和司业刘芳吉一起上疏说：“汉唐以来，用牛羊猪三牲齐全的太牢礼祭祀孔子，加封王号，用天子的八佾舞和十二筮豆祭器来尊崇他。到了明代嘉靖年间，嘉靖帝采用张璁的建议，改为中祀，失去了尊崇孔圣的本意。按礼：祭祀应该由主祭者的地位来定其规模。天子祭祀他的老师，应当用天子的礼乐。”又上疏说：“自从明代去掉十位哲人的封爵以来，称冉子的有三人，分不清谁是谁了。宋周敦颐等六子，改称为先贤，位在汉、唐那些儒家之上，辈份次序有不妥之处，应该给予改正。田何在商瞿那里学习《周易》，为孔学的发扬光大立下功劳，应该增补为祭祀的对象。郑康成注释经书写了百余万字，史家称他为纯儒，应该恢复祭祀。”又在疏上说：“明代儒家曹端、章懋、蔡清、吕楠、罗洪先，都应跟着祭祀。绛州贡生辛全，生逢明代末年，把整顿学风作为己任，著作又很丰富，请下命令征集遗著。”又请皇上下令修监藏经史旧版。奏疏一起被发下部议，决定：筮

豆、乐舞、名号、位次，等候会典颁发遵循；增补祭祀明儒及征进遗书的事，等《明史》写成后核定；修补南北监经史版，准予像请求的那样去做。

康熙二十三年（1684），调迁为少詹事。皇上下旨命他祭告南海。父病故，回家守丧。康熙二十九年（1690），起用作原官，再调迁为兵部督捕侍郎。康熙三十一年（1692）调到户部，皇上命他祭祀西狱西镇江渎诸神。康熙三十七年（1698）调作左都御史。正碰上朝庭讨论削减御史名额的事，王士禛说：“开国之初设置御史六十人，后来改为四十，接着又改为二十四。御史是天子的耳目官，只可增加，不可减少。”皇上终于听从了士禛的意见。

接着，又升迁为刑部尚书。按过去的老例，断案交由九卿评议判决。王士禛任副都御史时，对杨成一案，力争结果，获得减等判决。任户部侍郎时，对太平的王训、聊城的于相元、齐河的房得亮的案子都经过力争，获得减等。而衡阳的左道旁门萧儒英，却又力争而对他进行了依法惩治。徐起龙被曹氏所诬陷，就释放起龙而判曹有罪，并查纠那些跟他相勾结的人，都一一服罪。等到做了刑部尚书，遇到了河南严焕山、山西郭振羽、广西窦子章都因救父杀人而被判重刑的案子，士禛说：“这应当分析判定他是否为了救父，不应当以杀人来定轻重。”改为暂缓判决，入奏皇上，得到许可。

王士禛凭着擅长写诗受到圣祖康熙的赏识，给予很高的礼遇。康熙四十年（1701），请假迁坟，皇上命令给假五月，事毕还朝。康熙四十三年（1704）因受王五、吴谦一案的牵连而罢官。王五是原工部的役匠，出钱捐了个通判；吴谦是

太医院的医官，犯了讨债打死欠债者之罪，案子下到刑部，准备判王五流放，吴谦免罪。士禎说案子判得轻重太悬殊，只改判王五剥夺他的官职就行了。案子又下到三法司从严审讯，王五和吴谦一起被判处死刑，又揭发了吴谦嘱托刑部主事马世泰的事，王士禎因明知不究而罢官。康熙四十九年（1710），皇上思念那些老大臣，下旨恢复了王士禎的官职。康熙五十年（1711）年，士禎去世。

明末文学凋敝，那些论诗写诗的人，学习袁宗道兄弟那一套，就犯粗俗的毛病；以钟惺、谭友夏的主张为指导，就犯浮泛纤巧的毛病；学习陈子龙，李雯的诗作，路子正了，却又犯了肤浅的毛病。王士禎的天分高，学问又极渊博，和兄长士禄、士祐都致力于诗歌创作，提倡以“神韵”作为诗歌创作的最高宗旨。他选取司空图所说的“味在酸咸外”、严羽所说的“羚羊挂角，无迹可寻”来形象地说明“神韵”的旨趣。他自号“渔洋山人”，主持诗坛几十年。和王士禎同时的赵执信，才提出不同的见解，说诗中应当有人在。士禎死后，有人诋毁他才气不足，然而士禎终究不失为诗坛之正宗。

士禎最初名士禎，死后为了避世宗胤禎的名讳，追改为士正。乾隆三十年（1765），高宗和沈德潜论诗，说到士正，皇上说：“士正学有成就，擅长写诗，在本朝诸家中，流派较正，应该进行表彰，作为对研究古代的学者的一种勉励。”于是追加谥号为“文简”。乾隆三十九年（1774），又下令说：“士正的原名因为避庙讳才导致更改，现在的字和原名意思不相近，流传日子一长，后代差不多不再知道到底是什么人了。现在改为士禎，才能和弟兄辈行中的人不致于混淆不清。各

个库馆中的书籍记载，一律照改。”（邱文龙译）

【原文】

王士禛，字贻上，山东新城人。幼慧，即能诗，举于乡，年十八。顺治十二年，成进士。授江南扬州推官。侍郎叶成格被命驻江南，按治通海寇狱，株连众。士禛严反坐，宽无辜，所全活甚多。扬州鹺贾逋课数万，逮系久不能偿，士禛募款代输之，事乃解。康熙三年，总督郎廷佐、巡抚张尚贤、河督朱之锡交章论荐，内擢礼部主事，累迁户部郎中。十一年，典四川试。母忧归，服阕，起故官。

上留意文学，尝从容问大学士李蔚：“今世博学善诗文者孰最？”蔚以士禛对。复问冯溥、陈廷敬、张英，皆如蔚言。召士禛入对懋勤殿，赋诗称旨。改翰林院侍讲，迁侍读，入直南书房。汉臣自部曹改词臣，自士禛始。上征其诗，录上三百篇，曰《御览集》。

寻迁国子监祭酒，整条教，屏馈遗，奖拔皆知名士。与司业刘芳喆疏言：“汉唐以来，以太牢祀孔子，加王号，尊以八佾、十二筩豆。至明嘉靖间，用张璁议，改为中祀，失尊崇之意。礼：祭从生者。天子祀其师，当用天子之礼乐。”又疏言：“自明去十哲封爵，称冉子者凡三，未有辨别。宋周敦颐等六子，改称先贤，位汉、唐诸儒之上，世次殊有未安，宜予厘定。又疏田何受《易》商瞿，有功圣学，宜增祀。郑康成注经百余万言，史称纯儒，宜复祀。”又疏言：“明儒曹端、章懋、蔡清、吕楠、罗洪先，并宜从祀。絳州贡生辛全，生、际明末，以正学为己任，著述甚富，乞敕进遗书。”又请修监藏经史旧版。疏并下部议；以筩豆、乐舞、名号、位次，俟

会典颁发遵循；增祀明儒及征进遗书，俟《明史》告成核定；修补南北监经史版，如所请行。

二十三年，迁少詹事。命祭告南海。父忧，归。二十九年，起原官，再迁兵部督捕侍郎。三十一年，调户部，命祭告西岳西镇江渎。三十七年迁左都御史。会廷议省御史员额，士禎曰：“国初设御史六十，后减为四十，又减为二十四。天子耳目官，可增不可减。”卒从士禎议。

迁刑部尚书。故事，断狱下九卿平议。士禎官副都御史，争杨成狱得减等。官户部侍郎，争太平王训，聊城于相元、齐河房得亮皆得减等，而衡阳左道萧儒英，则又争而置之法。徐起龙为曹氏所诬，则释起龙而罪曹，案其所与私者，皆服罪。及长刑部，河南阎焕山、山西郭振羽、广西窦子章皆以救父杀人论重辟，士禎曰：“此当论其救父与否，不当以挺刃定轻重。”改缓决，入奏，报可。

士禎以诗受知圣祖，被眷遇甚隆。四十年乞假迁墓，上命予假五月，事毕还朝。四十三年，坐王五、吴谦狱罢。王五故工部匠役，捐纳通判；谦太医院官，坐索债殴毙负债者。下刑部，拟王五流徙，谦免议。士禎谓轻重悬殊，改王五但夺官。复下三法司严鞫，王五及谦并论死，又发谦嘱托刑部主事马世泰状，士禎以瞻徇夺官。四十九年，上眷念诸旧臣，诏复职。五十年，卒。

明季文敝，诸言诗者，习袁宗道兄弟，则失之俚俗；宗钟惺，谭友夏，则失之纤仄；学陈子龙、李雯，轨辙正矣，则又失之肤廓。士禎姿稟既高，学问极博，与兄士禄、士祐并致力于诗，独以“神韵”为宗。取司空图所谓“味在酸咸

外”、严羽所谓“羚羊挂角，无迹可寻”，标示指趣。自号渔洋山人，主持风雅数十年。同时，赵执信始与立异，言诗中当有人在。既没，或诋其才弱，然终不失为正宗也。

士禛初名士禛，卒后以避世宗讳，追改士正。乾隆三十年，高宗与沈德潜论诗，及士正，谕曰：“士正绩学工诗，在本朝诸家中，流派较正，宜示褒，为稽古者劝。”因追谥“文简”。三十九年，复谕曰：“士正名以避庙讳致改，字与原名不相近，流传日久，后世几不复知为何人。今改为士禛，庶与弟兄行派不致淆乱。各馆书籍记载，一体照改。”

钱谦益传

——《清史稿》卷四八四

【说明】钱谦益（1582—1664），明末清初诗人、散文家。字受之，号牧斋，晚号蒙叟、东涧遗老。常熟（今属江苏）人。明万历进士，曾任礼部侍郎、尚书。清兵南下，率先迎降，以礼部侍郎管秘书院事。后因事狱，遇赦，居家著述至终。

钱谦益学问渊博，泛览子、史文籍与佛藏。论诗文倡“情真”以反对模拟；倡学问以反对空疏。其文融学问于抒发思想性情中，规模阔大，其诗也颇有特色。有《初学集》、《有学集》、《投笔集》等。

钱谦益，字受之，常熟（今属江苏）人。明代万历年间考中进士，授编修官。他学问渊博，擅长词章，是东林党人。天启（1621—1627）年间，受到御史陈以瑞的弹劾而罢官。崇祯元年（1628）又被起用作官，不到几个月，就升为礼部侍郎。正好碰上推举阁臣，谦益考虑尚书温体仁、侍郎周延儒会同时被推举，而他们的名声在己之上，因此图谋败坏其声誉。而温体仁则追究钱谦益在浙江主持乡试时受钱千秋贿赂的事，判处杖责，准予赎罪。体仁又贿赂常熟人张汉儒揭发

钱谦益贪赃枉法。钱谦益向司礼太监曹化淳求救，把汉儒用酷刑打死。体仁称病辞官，钱谦益也被削职为民。

流寇攻陷北京，明朝大臣商议在江宁（今江苏南京）另立新君。钱谦益私下拥戴潞王，和马士英意见不合。不久，福王立为新君，钱谦益怕被降罪，上书对马士英歌功颂德，马士英推荐他做了礼部尚书。马又极力推荐阉党阮大铖等人，大铖于是做了兵部侍郎。顺治三年（1646）豫亲王多铎平定江南，钱谦益归降清廷，被授予礼部侍郎的官衔，兼管秘书院事。冯铨任明史馆正总裁，钱谦益是副手。不久，请假回归故里。顺治五年（1648），凤阳巡抚陈之龙逮住了黄毓祺，钱谦益犯了和他私通的罪，皇上下旨让马国柱逮捕审讯。谦益作了辩诉。马国柱于是判谦益一向和毓祺并不相识定了案。谦益获释回乡，以写作自娱，过了十年才去世。

钱谦益写作思路开阔，内容丰富，熟悉历朝典章制度，诗尤其擅长。明末王世贞李攀龙号称复古，文风江河日下，谦益挺身而出，极力加以振兴。他家里藏书丰富，晚年绛云楼起火，只有一尊佛像没有烧掉，于是皈依佛教，写了《楞严经蒙钞》。他自己创作的诗文，叫《牧斋集》，叫《初学集》、《有学集》。乾隆十三年（1748），皇上下诏烧毁印板，可是，流传下来的集子至今仍能见到。

【原文】

（邱文龙 译）

钱谦益，字受之，常熟人。明万历中进士，授编修。博学工词章，名隶东林党。天启中，御史陈以瑞劾罢之。崇祯元年，起官，不数月至礼部侍郎。会推阁臣，谦益虑尚书温体仁、侍郎周延儒并推，则名出己上，谋沮之。体仁追论谦

益典试浙江取钱千秋关节事，予杖论赎。体仁复贿常熟人张汉儒讐谦益贪肆不法。谦益求救于司礼太监曹化淳，刑毙汉儒。体仁引疾去，谦益亦削籍归。

流贼陷京师，明臣议立君江宁。谦益阴推戴潞王，与马士英议不合。已而福王立，惧得罪，上书诵士英功，士英引为礼部尚书。复力荐阉党阮大铖等，大铖遂为兵部侍郎。顺治三年，豫亲王多铎定江南，谦益迎降，命以礼部侍郎管秘书院事。冯铨充明史馆正总裁，而谦益副之。俄乞归。五年，凤阳巡抚陈之龙获黄毓祺，谦益坐与交通，诏总督马国柱逮讯。谦益诉辨，国柱遂以谦益、毓祺素非相识定谳。得放还，以箸述自娱，越十年卒。谦益为文博赡，谙悉朝典，诗尤擅其胜。明季王、李号称复古，文体日下，谦益起而力振之。家富藏书，晚岁绛云楼火，惟一佛像不烬，遂归心释教，著《楞严经蒙钞》。其自为诗文，曰《牧斋集》，曰《初学集》、《有学集》。乾隆三十四年，诏毁板，然传本至今不绝。

吴伟业传

——《清史稿》卷四八四

【说明】吴伟业（1609—1672），明末清初诗人。字骏公，号梅村。先世居司业等职。明亡后，被迫出仕，后归隐故里。

今存诗一千多首，与钱谦益、龚鼎孳并称“江左三大家”。其词清丽哀婉，感人至深，广为传诵。有《梅村家藏稿》、《梅村诗余》等。

吴伟业，字骏公，太仓（今属江苏）人。明崇祯四年（1631）考取进士，授官编修，充任东宫讲读官，再升为左庶子。弘光年间（1645）任少詹事，后请假回归故里。清顺治九年（1652），因为两江总督马国柱的推荐，被召进京。侍郎孙承泽、大学士冯铨又相继举荐，授官秘书院讲读，担任《太祖太宗圣训》的纂修官。顺治十三年（1656），升为祭酒。因母病故，还家守丧。康熙十年（1671）去世。

吴伟业学问渊博，有人向他请教经史疑义和国家典章文物方面的问题，对事情原委，无不了解得一清二楚。诗文工巧清丽，蔚然成为一时文坛领袖，却并不自我标榜。他生性极孝，遇上江山易主的变故，有父母在，不能不顾恋亲人而

为新朝之臣，想起自己身世，常常独自感伤。临终之时，看着周围的人说：“我一生遭遇，事事都有忧虑和危险，无一时无一处没有经历过艰苦。我死后用僧衣装殓，葬我在邓尉和灵岩两山的旁边。坟前立一块圆石，题上‘诗人吴梅村之墓’。不要造祠堂，不要请人作铭。”听到他说的人，都心里很难受。他的著作有《春秋地理志》、《氏族志》、《绥寇纪略》和《梅村集》。

（邱文龙 译）

【原文】

吴伟业，字骏公，太仓人。明崇祯四年进士，授编修，充东宫讲读官，再迁左庶子。弘光时，授少詹事，乞假归。顺治九年，用两江总督马国柱荐，诏至京。侍郎孙承泽、大学士冯铨相继论荐，授秘书院侍讲，充修《太祖、太宗圣训》纂修官。十三年，迁祭酒。丁母忧归。康熙十年，卒。

传业学问博赡，或从质经史疑义及朝章国故，无不洞悉原委。诗文工丽，蔚为一时之冠，不自标榜。性至孝，生际鼎革，有亲在，不能不依违顾恋，俯仰身世，每自伤也。临歿，顾言：“吾一生遭际，万事忧危，无一时一境不历艰苦。死后敛以僧装，葬我邓尉、灵岩之侧。坟前立一圆石，题曰‘诗人吴梅村之墓’。勿起祠堂，勿乞铭。”闻其言者皆悲之。著有《春秋地理志》、《氏族志》、《绥寇纪略》及《梅村集》。

施闰章传

——《清史稿》卷四八四

【说明】施闰章（1618—1683），清代诗人。字尚白，一字屺云，号愚山，又号蠖斋，宣城（今属安徽）人。顺治进士，官至侍读。

施闰章以诗名噪清初，所著《蠖斋诗话》主张“诗有本”、“言有物”，反对入议论，推尊唐人。其诗空灵凝炼，意境幽深，与宋琬合称“南施北宋”。有《学余堂文集诗集》。

施闰章，字尚白，号愚山，宣城（今属安徽）人。祖父鸿猷，是著名儒学家。子孙在江南讲授儒学，成为世代衣钵相传的施家学派。

闰章少年丧父，把叔父当父亲看待。他与沈寿民交往，博览群书，擅长写诗和古文。顺治六年（1649）考中进士，授官刑部主事，考升一级为员外郎。后擢升作山东学政，崇尚高雅，排斥浮靡，有“冰鉴”的美誉。任期届满，升为江西参议，分管湖西道。所属州郡残破多盗，闰章走遍了所有山谷，抚慰那里的百姓，人们称他为“施佛子”。他曾写过《弹子岭》、《大坑叹》等作品来告诫官吏们，读过的人都说：“他

可是今天的元道州（元结）啊！”闰章特别崇尚奖励教育，每到一处，就修建书院，讲学时听众常有好几百人。新淦（今江西新干）百姓中，有一对弟兄反目成仇，一天，听讲礼让和孝敬父母尊敬兄长的话后，就互相抱头哭泣，跑到闰章住处台阶下认错悔过。峡江一带闹虎灾，闰章写文章为百姓祝祷，不久，有老虎掉入深沟而死，虎患就平息了。干旱之年，祈祷甘霖，总是有求必应。康熙初年（1662），因裁减官员而回归故里。老百姓挽留不成，为了感激他，就集资造了龙冈书院来纪念他。

当初闰章住临江（今属江西）时，有清江在城下围绕，经过那儿的百姓都说：“这江就像使君。”因此，改名为“使君江”。到了这时候，全城百姓送他到江边，又送到鄱阳湖边。因为官船轻，百姓们争着买石膏放在上面，船才破浪而去。

康熙十八年（1679），被召应试博学鸿儒，授官翰林院侍讲，编纂明史，主持河南乡试。康熙二十二年（1683），调任侍读，不久，病故。

闰章的学术理论，以仁爱为本，置办义田，周济同族和好友中的穷苦人，培养扶植年轻后生。所写文章，内容朴实，文气纾徐；诗和宋琬齐名。王士禛爱喜他的五言诗，为它写了《摘句图》。王士禛的门人向闰章请教诗法，闰章说他：“王士禛诗像仙家楼阁，弹指之间，就显现出来。我却不是如此，好像造房子，砖瓦木石，一点点从平地筑起。”评论的人都说话说得中肯。他的著作有《学余堂集》、《矩斋杂记》、《螭斋诗话》，共八十多卷。

闰章和同乡高咏交好，都擅长写诗，几十年来成为东南

文坛盟主。他们的诗，当时被称之为“宣城体”。

（邱文龙 译）

【原文】

施闰章，字尚白，号愚山，宣城人。祖鸿猷，以儒学著。子姓传业江南，吾家法者推施氏。

闰章少孤，事叔父如父。从沈寿民游，博综群籍，善诗古文辞。顺治六年进士，授刑部主事，以员外郎试高等。擢山东学政，崇雅黜浮，有冰鉴之誉。秩满，迁江西参议，分守湖西道。属郡残破多盗，遍历山谷抚循之，人呼为“施佛子”。尝作《弹子岭》、《大坑叹》等篇告长吏，读者皆曰：“今之元道州也”尤崇奖风教，所至辄葺书院，会讲常数百人。新淦民兄弟忿戾不睦，一日闻讲礼让孝弟之言，遂相持哭，诣阶下服罪。峡江患虎，制文祝之，俄有虎堕深堑，患遂绝。岁旱，祷雨辄应。康熙初，裁缺归。民留之不得，乃醵金创龙冈书院祀之。

初，闰章驻临江，有清江环城下，民过者咸曰：“是江似使君。”因改名“使君江”。及是倾城送江上，又送至湖。以官舫轻，民争买石膏，载之，乃得渡。

十八年，召试鸿博，授翰林院侍讲，纂修明史，典试河南。二十二年，转侍读，寻病卒。

闰章之学，以体仁为本，置义田，赡族好，扶掖后进。为文意朴而气静，诗与宋琬齐名。王士禛爱其五言诗，为作《摘句图》。士禛门人问诗法于闰章，闰章曰：“阮亭如华严楼阁，弹指即见。予则不然，如作室者，瓴甃木石，一一就平地筑起。”论者皆谓其允。著有《学余堂集》、《矩斋杂记》、

《蠖斋诗话》，都八十余卷。

闰章与同邑高咏友善，皆工诗，主东南坛坫数十年，时号“宣城体”。

朱彝尊传

——《清史稿》卷四八四

【说明】朱彝尊（1629—1709），清代词人，学者。字锡鬯，号竹垞，浙江秀水（今嘉兴）人。康熙时举博学宏词科，授检讨，曾参加纂修明史。

朱彝尊通经史，能诗词古文。于词推崇姜夔，为浙西词派的创始者。其词追求技巧、讲究声理和词字的琢磨，风格清雅疏宕。编有《词综》、《明诗综》等书。有《经义考》、《日下旧闻》、《曝书亭集》。

朱彝尊，字锡鬯，秀水（今浙江嘉兴县）人，明朝大学士朱国祚的曾孙。他生下来就有特殊的天赋，读书能过目不忘。家境贫寒，客游他乡，往南越过五岭，往北远出云朔（今山西祁县西），往东泛舟海上，登上之罘岛，经历瓯越（今浙南温州一带）。所到荒祠野坟之处，对残破的香炉和墓碑上的铭文、碑文，无不一一搜罗、整理、考证，和史传上的记载比较、核对同异。回归故里后，邀请了李良年、周筼、缪泳等人组织诗社，创作诗歌，文名越来越大。

康熙十八年（1679），参加博学鸿词科考试，授官检讨。

当时富平李因笃、吴江潘耒、无锡严绳孙和朱彝尊都以平民的资格被入选，一起撰写《明史》。朱彝尊等人建议寻访遗失的典籍，放宽撰史期限，不要像写《元史》那样匆匆忙忙，限定时日。并从方孝孺的朋友宋仲珩、王孟鼐、郑叔度，林公辅那些人没有被杀的事实，辨析《从亡》、《致身录》所说的诛灭九族，而一起杀死他的弟子朋友算作一族是不足为据的。所谓九族，实际上是本家一族罢了。朱彝尊又说过东林党不全是君子，不是东林党的也不全是小人。写史的人不可有门户之见，用党同伐异的态度来区分邪恶与正义。康熙二十年（1681），担任日讲起居注官。又主持江南的乡试，被称赞为能选拔人才的人。后又进入南书房值勤，御赐紫金城骑马的特权。几次参加内廷的宴会，对赏赐披挂彩绸和新鲜时果的事，都用诗记实。不久，因为私自挟带小吏入内写书而被弹劾，官降一级，以后又官复原职。康熙三十一年（1692），请假回归老家。康熙皇帝巡察江南时，在无锡迎驾，皇上赐给他亲笔题写“研经博物”的扁额。

当时王士禛诗写得好，汪琬文章写得出色，毛奇龄则擅长考据，唯独朱彝尊兼有众人之长。著作有《经义考》、《日下旧闻》、《曝书亭集》。又曾选编《明诗综》，或因人录诗，或因诗存人，编次极为恰当。死时，年八十一。子昆田，也擅长写诗，早逝。孙稻孙，乾隆丙辰年（1736），考取博学鸿儒，能继承祖业，世代相传。

（邱文龙 译）

【原文】

朱彝尊，字锡鬯，秀水人，明大学士国祚曾孙。生有异

秉，书经目不遗。家贫客游，南逾岭，北出云朔，东泛沧海，登之罘，经瓯越。所至丛祠荒冢、破炉残碣之文，莫不搜剔考证，与史传参较同异。归里，约李良年、周筼、缪泳辈为诗课，文名益噪。

康熙十八年，试鸿博，除检讨。时富平李因笃，吴江潘耒、无锡严绳孙及彝尊皆以布衣入选，同修《明史》。建议访遗书，宽期限，毋效《元史》之迫时日。辨方孝孺之友宋仲珩、王孟鼐、郑叔度、林公辅诸人咸不及于难，则知《从亡》、《致身录》谓诛九族，并戮其弟子朋友为一族不足据。所谓九族者，本宗一族也。又言东林不皆君子，异乎东林者，亦不皆小人。作史者未可存门户之见，以同异分邪正。二十年，充日讲起居注官，典试江南，称得士。入值南书房，赐紫禁城骑马。数与内廷宴，被文绮、时果之费，皆纪以诗。旋坐私挟小胥入内写书被劾，降一级，后复原官。三十一年，假归，圣祖南巡，迎驾无锡，御书“研经博物”额赐之。

当时王士禛工诗，汪琬工文，毛奇龄工考据，独彝尊兼有众长。著《经义考》、《日下旧闻》、《曝书亭集》。又尝选《明诗综》，或因人录诗，或因诗存人，铨次为最当。卒，年八十一。子昆田，亦工诗文，早卒。孙稻孙，举乾隆丙辰鸿博，能世其家。

纳兰性德传

——《清史稿》卷四八四

【说明】纳兰性德（1655—1685），清代满族词人。原名成德，字容若，号楞伽山人。自幼勤于修文习武。康熙进士，官一等侍卫。

其词以小令见长，多感伤情调，间有雄浑之作，风格清新。其《侧帽集》、《饮水词》在当时广为流传。工书法，精于书画鉴赏。有《通志堂集》。

性德，姓纳喇（纳兰），初名成德，因避东宫太子允礽嫌名，改称性德，字容若，满洲正黄旗人，太傅明珠之子。

性德孝敬父母，双亲有病，衣不解带，昼夜服侍，脸色黄黑，直到病愈才恢复原样。

性德只有几岁时，就学会了骑马和射箭，再大一些就会写诗作文了。康熙十四年（1675）成为进士，当时，只有十六岁。圣祖因为他是世家子弟，授三等卫官职，不久，又升至一等。皇上命他写乾清门应制诗和翻译御作《松赋》，都合乎心意。不久，得了病，皇上将要出塞避暑，派了太监带了太医给他看病，并命令向他报告纳兰性德的病情。可是性

德很快就病故了，年纪只有三十一岁。他曾经奉命出使塞外，对那里的部落进行安抚工作，死后受安抚的各部款塞通好，归顺朝廷。皇上从他行幸所在地派人往性德灵前祭告此事。皇上对他就这样眷恋青睐。

性德乡试，主考老师是徐乾学，以后跟着老师一起研讨学术，曾集中刻印了宋元人说经的各种书籍，为书写了序，把自己撰写的《礼记陈氏集说补正》附在后面，合为《通志堂经解》。性德善于写诗，尤其擅长填词。遍读南唐、北宋诸家词作，参透其中奥妙。所作《饮水》、《侧帽》二集，清新秀隽，自然超逸。曾读赵松雪自写照诗有感，立即按照诗中描述的穿戴画了小像。座客对他称赞过了头，就不理不睬。乾学对他说：“你多么像王逸少！”就非常高兴。他好礼敬士大夫，跟严绳孙、顾贞观、陈维崧、姜宸英那些人交好。贞观的朋友吴江吴兆骞犯科场违律案被贬戍守宁古塔（今吉林宁安），写了两首《金缕曲》寄给他。性德读后叹息说：“向子期的《思旧赋》、李都尉的《河梁诗》和这，是三篇同调之作啊！”贞观于是请他为兆骞想想办法，终于获释而还。士大夫们更加称诵他。

（邱文龙 译）

【原文】

性德，纳喇氏，初名成德，以避皇太子允礽嫌名改。字容若，满洲正黄旗人，明珠子也。

性德事亲孝，侍疾衣不解带，颜色黧黑，疾愈乃复，数岁即习骑射，稍长，工文翰。康熙十四年成进士，年十六。圣祖以其世家子，授三等侍卫，再迁至一等。令赋乾清门应制诗、译御制《松赋》，皆称旨。俄疾作，上将出塞避暑，遣中

官将御医视疾，命以疾增减告。遽卒，年止三十一。尝奉使塞外有所宣抚，卒后，受抚诸部款塞。上自行在遣中官祭告，其眷睐如是。

性德乡试出徐乾学门。与从研讨学术，尝裒刻宋、元人说经诸书，书为之序，以自撰《礼记陈氏集说补正》附焉，合为《通志堂经解》。

性德善诗，尤长倚声。遍涉南唐、北宋诸家，穷极要眇。所著《饮水》、《侧帽》二集，清新秀隽，自然超逸。尝读赵松雪自写照诗有感，即绘小像，仿其衣冠。坐客期许过当，弗应也。乾学谓之曰：“尔何似王逸少！”则大喜。好宾礼士大夫，与严绳孙、顾贞观、陈维崧、姜宸英诸人游。贞观友吴江吴兆骞坐科场狱戍宁古塔，赋《金缕曲》二篇寄焉，性德读之叹：“山阳《思旧》，都尉《河梁》，并此而三矣！”贞观因力请为兆骞谋，得释还，士尤称之。

查慎行传

——《清史稿》卷四八四

【说明】查慎行（1650～1727），清代诗人。初名嗣连，后改慎行，字悔余，号初白。海宁（今属浙江）人。康熙时举人，赐进士出身，官编修。

查慎行诗法唐宋，声名早著。其诗多纪行旅，以空灵创新为尚，工于刻画锻炼，多采用白描手法。对诗坛影响颇大。也能词。有《敬业堂诗集》。

查慎行，字悔余，海宁（今属浙江）人。小时候，投师在黄宗羲门下。在经术方面，对《周易》的研究有很深的造诣。生性喜欢写诗，游览所到之处，就要吟诗抒怀，名声传于宫中。康熙三十二年（1683），考取举人。后来圣祖皇帝东巡沿海一带，由于大学士陈廷敬的推荐，下旨让他到皇上临时住处赋诗，又命他随驾入京，在南书房值班。不久，赐他进士出身，被选为庶吉士，授编修官。当时，他的族子查昇以谕德的官衔在内廷值班，宫中太监叫慎行为“老查”，以便和查昇相区别。皇上去南苑，捕鱼赐给近臣，命赋诗，查慎行有诗句说：“笠簷簑袂平生梦，臣本烟波一钓徒。”一会儿，

宫中太监便叫开了”烟波钓徒查翰林”。当时人们把他比作写“春城寒食”的唐代诗人韩翃。他充任武英殿书局的校勘，后请病假回乡。因受弟嗣庭犯罪的牵连，全家被逮捕。世宗雍正皇帝知道他正直谨慎，特别开恩，放他回乡。而弟弟嗣溧，被贬遣发关西，死在那里。

查嗣璫，字德尹，是康熙三十九年（1700）进士，官位最高到侍讲。他生性机敏，几岁时就懂得切韵谐声。诗歌名声和查慎行不相上下。查慎行的著作有《敬业堂集》、《周易玩辞集解》，还补注了《苏诗》，流传于世。嗣璫著作有《查浦诗钞》、《音类通考》。

（邱文龙译）

【原文】

查慎行，字悔余，海宁人。少受学黄宗羲。于经邃于《易》。性喜作诗，游览所至，辄有吟咏，名闻禁中。康熙三十二年，举乡试。其后圣祖东巡，以大学士陈廷敬荐，诏诣行在赋诗。又诏随入都，直南书房。寻赐进士出身，选庶吉士，授编修。时族子昇以谕德直内廷，宫监呼慎行为“老查”以别之。帝幸南苑，捕鱼赐近臣，命赋诗。慎行有句云：“笠簷蓑袂平生梦，臣本烟波一钓徒。”俄宫监传呼“烟波钓徒查翰林”。时以比“春城寒食”之韩翃云。充武英殿书局校勘，乞病还。坐弟嗣庭得罪，阖门就逮。世宗识其端谨，特许放归田里，而弟嗣璫谪遣关西，卒于戍所。

嗣璫，字德尹。康熙三十九进士，官至侍讲。性警敏，数岁即解切韵谐声。诗名与慎行相埒。慎行著《敬业堂集》、

《周易玩辞集解》，又补注《苏诗》，行于世。嗣堧著《查浦诗钞》、《音类通考》。

厉鹗传

——《清史稿》卷四八五

【说明】厉鹗（1692～1752），清代文学家。字太鸿，号樊榭，浙江钱塘（今杭州）人。康熙举人。无意仕进，以歌咏自娱，著述以终。

厉鹗曾漫游名山大川，其诗多游览之作，宗南朝大、小谢和唐代王、孟、韦、柳一派，以取法宋人为主。是清代雍正、乾隆时“宋诗派”代表作家。又是“浙派”词巨子，风格清秀、恬淡，推崇周邦彦、姜夔。

精熟辽、宋史实，著《宋诗纪事》。有《樊榭山房集》、《南宋院画录》等书。

厉鹗，字太鸿，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家境清贫，性格孤傲，不随便交友。刚作诗，就有好句。在学问上无所不通，诗中均有所体现。康熙五十九年（1720），李绂在浙江主持乡试，得到了厉鹗的试卷，看了他的谢恩表，说：“这一定是个诗人。”急忙把他录取了，决定带他进京。他在写诗上尤其被汤右曾所赏识。可是两次参加礼部主持的考试都未考中。乾隆元年（1736），考取了博学鸿儒，但因误把论写在诗前，

又告作罢。以后赴京侯选，行经天津，留在朋友查为仁的水西庄上，饮酒吟诗好几个月，不去听选，后来就回家了。死时六十一岁。

厉鹗喜欢搜集奇闻趣事，广泛阅读各种书籍。扬州马曰琯的小玲珑山馆藏书丰富，厉鹗长久客居在那里，见到了许多宋代人的集子，写了《宋诗记事》一百卷，还有《南宋画院录》、《辽史拾遗》、《东城杂记》等书，内容都是既广博，又详细。诗深刻精炼，尤其擅长五言诗，有悠悠自得之趣。词也熔南宋各家之长于一炉。他祖上本是慈溪（今属浙江）人，后移居杭州，所以仍以四明山樊榭来为他的集子命名。厉鹗曾经跟赵信、符曾等人各自编选了《南宋杂事诗》一百首，亲自从各种书籍中搜集材料，给它作注，所征引资料极为广泛丰富，被考核史实的专家所看重。

（邱文龙 译）

【原文】

厉鹗，字太鸿，钱塘人。家贫，性孤峭，不苟合。始为诗即得佳句。于学无所不窥，一发之于诗。康熙五十九年，李绂典试浙江，得鹗卷，阅其谢表，曰：“此必诗人也！”亟录之。计偕入都，尤以诗见赏汤右曾。再试礼部不第。乾隆元年，举鸿博，误写论置诗前，又报罢。其后赴都铨，行次天津，留友人查为仁水西庄，觞咏数月，不就选，归。卒，年六十一。

鹗搜奇嗜博。扬州马曰琯小玲珑山馆富藏书，鹗久客其所，多见宋人集，为《宋诗记事》一百卷。又《南宋画院录》、《辽史拾遗》、《东城杂记》诸书，皆博洽详赡。诗刻鍊，

尤工五言，有自得之趣。诗余亦擅南宋诸家之长。先世本慈溪，徙居钱塘，故仍以四明山樊榭名其集云。鶚尝与赵信、符曾等人各为《南宋杂事诗》一百首，自采诸书为之注，征引浩博，考史事者重之。

袁枚传

——《清史稿》卷四八五

【说明】袁枚（1716～1797），清代诗人、诗论家。字子才，号简斋。钱塘（今浙江杭州）人。乾隆进士，曾任江宁等地知县。辞官后居江宁，筑园于小仓山，号随园主人。

袁枚是清乾嘉时期代表诗人之一，与赵翼、蒋士铨并称“乾隆三大家”。论诗鼓吹“性灵”，创性灵说，《随园诗话》为其主要论诗著作。其诗多纪游、咏史之作，真率自然，风格清灵。有《小仓山房集》、《随园诗话》、《子不语》等传世。

袁枚，字子才，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小时就有特殊的天赋。十二岁时，就破例增补为县学生。二十岁时到广西抚幕探望叔父。巡抚金鉷见到他就觉得很不一样，命他写《铜鼓赋》来试一试他的才能，结果一挥而就，很有文采。正好碰上博学鸿词科的考试，于是写了奏疏推荐他。当时四方前来应试的二百多人，袁枚年纪最小，结果没有取上。乾隆四年（1739），考取进士，被选为庶吉士。后到江南改任知县，做过溧水、江浦、沐阳的父母官，最后在江宁（今江苏南京）任职。当时尹继善作总督，了解袁枚是个人才，而袁枚

遇事也极力发挥他的才能。以至于市上的人把他断案之事写成歌曲刻印下来，传遍了四面八方。袁枚不因自己有做官才能而沾沾自喜，不久就告病回家闲居。后来被再次起用到陕西做官，因父病故，回家守丧，于是写了呈文，请求朝廷准他养母送终。他又在江宁小仓山卜卦选地，造起一座园林，称为随园，园内建筑壮丽，景观都经着意雕饰，从此就在其中优游自得地生活了五十年。他还经常外出游历好山好水，终生不再做官。他把他的才能全用在写诗作文上。四方名流没有一日不来拜访请教，彼此插科打诨，谈天说地，人人心里都很痛快。年轻后生一句话说得妙，赞不绝口。袁枚很重友情，编修程晋芳死了，拿出五千两银子的借券焚烧了，并主动抚恤他留下的孤儿。

袁枚是个超凡拔俗的天才，论诗主张抒写“性灵”。别人想要表达却表达不出来的意思，他都能表达出来。文人墨客很多效仿他的作品。他的著作有《随园集》，共三十多种。上至朝廷公卿，下至市井商贩都知道他的名字。海外琉球也有来要他的书法的。可是袁枚喜欢声色，他的作品也颇因油滑、浮浅受到世人的讥讽。他去世时，年八十二岁。

（邱文龙 译）

【原文】

袁枚，字子才，钱塘人。幼有异禀。年十二，补县学生。弱冠，省叔父广西抚幕，巡抚金鉷见而异之，试以《铜鼓赋》，立就，甚瑰丽。会开博学鸿词科，遂疏荐之。时海内举者二百余人，枚年最少，试报罢。乾隆四年，成进士，选庶吉士。改知县江南，历溧水、江浦、沭阳，调剧江宁。时尹

继善为总督，知枚才，枚亦遇事尽其能。市人至以所判事作歌曲刻行四方。枚不以吏能自喜，既而引疾家居。再起发陕西，丁父忧归，遂牒请养母。卜筑江宁小仓山，号随园，崇饰池馆，自是优游其中者五十年。时出游佳出水，终不复仕。尽其才以为文辞诗歌，名流造请无虚日，诙谐诤荡，人人意满。后生少年一言之美，称之不容口。笃于友谊，编修程晋芳死，举借券五千金焚之，且恤其孤焉。

天才颖异。论诗主抒写“性灵”。他人意所欲出，不达者悉为达之。士多效其体。著《随园集》，凡三十余种。上自公卿下至市井负贩，皆知其名。海外琉球有来求其书者。然枚喜声色，其所作亦颇以滑易获世讥云。卒，年八十二。

姚鼐传

——《清史稿》卷四八五

【说明】姚鼐（1732～1815），清代散文家。字姬传，室名惜抱轩，旧称惜苞先生，安徽桐城人。乾隆重进士，官刑部郎中。历主江宁、扬州等地书院达四十年。

姚鼐为“桐城派”散文的集大成者。主张文章必须以“考据”、“词章”为手段，阐扬儒家的“义理”；分文章风格为阳刚、阴柔，同时发展了刘大槐的拟古主张。其作品多为书序、碑传之属。选有《古文辞类纂》、《五七言今体诗钞》。有《惜抱轩全集》。

姚鼐，字姬传，桐城（今属安徽）人，是刑部尚书文然的玄孙。乾隆二十八年（1763）考取进士，被选拔为庶吉士，改任礼部主事。历任山东、湖南乡试考官、会试同考官。选拔了许多知名人士。成立四库馆时，充任纂修官。书编成后，以御史的头衔署名，并请求回家养老。

姚鼐擅长写古文。康熙年间，侍郎方苞在古文创作上一时很有名气，同乡的刘大櫟继承了方苞的衣钵。姚鼐的伯父姚范和刘大櫟交好，姚鼐对从父辈的朋友，也是自己的教师

那里所听到的最重要的知识，更能融会贯通，运用自如。他所写的文章，格调高雅，文字简洁，内容深刻，颇有古风，尤其接近欧阳修和曾巩。他的文学主张植根于道德，溯源于经传，至于那深刻的程度，古人不曾发现和说过的东西，姚鼐能独自把它内藏的精妙之处发掘出来。评论家说他的辞章超过方苞，道理比刘大槐讲得透彻。三人籍贯都是桐城，因此，世代以“桐城派”称呼他们。

姚鼐清廉寡欲，严于律己，待人接物极为和蔼，无论地位贵贱，都乐于和他们交好。而道义上所不许可的事，决不改变自己的操守去做。世人说到品学兼备的人，公推姚鼐，没有二话。他曾经仿照王士禛《五七言古体诗选》，编了《今体诗选》，评论者认为选得很精当。自从告退后，在江南紫阳书院、钟山书院讲学四十多年，把教诲启迪后生作为自己本职工作。嘉庆十五年（1810），重新登上政坛，加封为四品官衔。嘉庆二十年（1815）去世，享年八十五。著作有《九经说》十七卷，《老子庄子章义》，《惜抱轩文集》二十卷，《诗集》二十卷，《三传补注》三卷，《法帖题跋》二卷，《笔记》四卷。

（邱文龙 译）

【原文】

姚鼐，字姬传，桐城人，刑部尚书文然玄孙。乾隆二十八年进士，选庶吉士，改礼部主事。历充山东、湖南乡试考官，会试同考官，所得多知名士。四库馆开，充纂修官。书成，以御史记名，乞养归。

鼐工为古文。康熙间，侍郎方苞名重一时，同邑刘大櫟继之。鼐世父范与大櫟善，鼐本所闻于家庭师友间者，益以

自得，所为文高简深古，尤近欧阳修、曾巩。其论文根极于道德，而探原于经训。至其浅深之际，有古人所未尝言，鼐独抉其微，发其蕴。论者以为辞迈于方，理深于刘。三人皆籍桐城，世传以为桐城派。鼐清约寡欲，接人极和蔼，无贵贱皆乐与尽欢；而义所不可，则确乎不易其所守。世言学品兼备，推鼐无异词。尝仿王士禛《五七言古体诗选》为《今体诗选》，论者以为精当云自告归后，主讲江南紫阳、钟山书院四十余年，以诲迪后进为务。嘉庆十五年，重赴鹿鸣，加四品衔。二十年，卒，年八十有五。所著有《九经说》十七卷，《老子、庄子章义》，《惜抱轩文集》二十卷，《诗集》二十卷，《三传补注》三卷，《法帖题跋》二卷，《笔记》四卷。

龚自珍传

——《清史稿》卷四八六

【说明】龚自珍（1792—1841），清代思想家、文学家。一名巩祚，字璦人，号定庵，浙江仁和（今杭州）人。道光进士，官礼部主事。

龚自珍学务博览，在哲学与经学上颇有成就，其文学创作开近代文学新篇章。他主张文学必须有用，所作诗文，极力提倡“改图”、“更法”，揭露了社会的黑暗，洋溢着爱国热情。其散文奥博纵横，自成一家；诗歌形式，风格多样，想象丰富，语言清奇多采，有“龚派”之称。也工词。有《龚自珍全集》。

龚巩祚，原名自珍，字璦人，仁和（今浙江杭州）人。父丽正，进士曾任苏松兵备道，是段玉裁的女婿，能继承他岳父的学术事业。巩祚十二岁时段玉裁就教他《说文》部目的知识。巩祚才气横溢，他的举动不守常规，经常给人近于奇特古怪的感觉，而解说经书却必定要推究并依据字的本义，这是听从外祖父最初对他教导的结果。他初由举人引用成例做了内阁中书。道光年间，考取进士，继续担任旧职。后被推

荐提升为宗人府主事，改任礼部主事。后请求辞归故里，于是不再从政作官。在作中书官的任上，曾向总裁上书，论述西北塞外部落的源流以及山川形势，订正《一统志》的疏漏，共五千字。后又上书论述礼部四司政体应加改革的道理，也长达三千字。文字桀骜锋利，取法诸子百家而自成一家。所到之处，总是让人吃惊，名声很大，只是仕途坎坷罢了。五十岁时在丹阳书院病故。著作有《尚书序大义》、《大誓问答》、《尚书马氏家法》、《左氏春秋服杜补义》、《左氏决疣》、《春秋决事比》、《定庵诗文集》。（邱文龙 译）

【原文】

龚玘祚，原名自珍，字璚人，仁和人。父丽正，进士，官苏松兵备道，为段玉裁婿，能传其学。玘祚十二岁，玉裁授以《说文》部目。玘祚才气横越，其举动不依恒格，时近倜傥，而说经必原本字训，由始教也。初由举人援例为中书。道光时成进士，归本班。洊擢宗人府主事，改礼部。谒告归，遂不出。

官中书时，上书总裁论西北塞外部落源流、山川形势，订《一统志》之疏漏，凡五千言。后复上书论礼部四司政体宜沿革者，亦三千言。其文字桀骜，出入诸子百家，自成学派。所至必惊众，名声藉藉，顾仕宦不达。年五十，卒于丹阳书院。著有《尚书序大义》、《大誓答问》、《尚书马氏家法》、《左氏春秋服杜补义》、《左氏决疣》、《春秋决事比》、《定庵诗文集》。

林纾传

——《清史稿》卷四八六

【说明】林纾（1852～1924），近代文学家，翻译家。原名群玉，字琴南，号畏庐，别署冷红生，福建闽县（今福州）人。光绪举人，任教于京师大学堂。曾参加改良主义政治运动。

林纾主要成就在小说翻译，曾依靠他人口述，以古文翻译一百七十多种欧美小说，译笔流畅，颇有影响。能诗画。有《畏庐文集》、《畏庐诗存》及传奇、小说等多种。

林纾，字琴南，号畏庐，闽县（今福建福州）人。光绪八年（1882）考取举人。幼年丧父，侍奉母亲极为孝顺。很小就酷爱读书，但家境清寒，买不起书籍。一次，弄到了《史记》和《汉书》的残缺本，从早到晚，豁出所有的时间来读它。于是领悟了古文之法，后来就因文笔之妙而成名。壮年时渡过海峡去游历台湾，归后客居在杭州，执教于东城讲舍。后入京，接受五城学堂的聘请，主讲国学。礼部侍郎郭曾举荐他去应经济特科的考试，他推辞不去。林纾生平以抑强扶弱为己任，崇尚气节，嫉恶如仇。见到或听到有不平之

事。激愤之情油然而生。这种为别人尽心竭力的真诚，出于他的纯厚本性。他想到光绪皇帝作为一个英明的君主却被压制，每每说到此事，常常不胜哀痛。他十次谒拜崇陵，趴在陵前痛哭流涕。逢到一年一度的祭奠，即使风雪载途，也阻挡不住他的祭奠的行动。他曾受赐皇上御笔书写“贞不绝俗”的扁额，感到无比的荣幸，誓死一定要在墓碑上刻上“清处士”的字样。他感时伤事之情，全都通过诗文来加以抒发。

他写文章以韩柳为师，少年时代博览群书，中年以后，案头只有《诗经》、《礼记》二书的注疏，《左传》、《史记》、《庄子》和韩愈、柳宗元的文章，此外，就是《说文》和《广雅》，其他书就没有了。他读书就是这样的由博览到精约。

他的文学理论是主张意境、识度、气势和神韵，忌讳草率、因袭、平庸和怪诞，文章一定要有自己的特色。他曾说过：“古文只有具有充实的内容，与正确的道理不相悖谬，才能使人百读不厌，回味无穷。如果把古文按照秦、汉、唐、宋来分派分系，是这派，是那派，把读者弄得晕晕乎乎，不知如何是好，那么就妨碍了走上研究和创作古文的正确途径，而与古文的旨趣相违背。经学家的文章朴实无华，往往流于枯燥平淡；史学家的文章则又奔突放纵，不再有什么规范和约束，两者均不能充分地阐明道理。只有积理养气，偶而写成一篇，像不能不一吐为快似的文章，一定是写前胸有成竹，写时字斟句酌，无懈可击，外表质朴，内容丰腴，不装腔作势，却又意味深长，那么差不多就近似是能明道的佳作了。”林纾的作品，着意于深沉含蓄，故而能藏其锋芒，而他的真实思

想感情却始终隐藏不了。他特别善于叙抒悲情，吐字凄切哽咽，让人不忍心读完。评论家说他是用血性来写文章，跟学问没有关系。

他翻译的西欧小说达到一百几十种。可是他以前没有学过欧洲各国语言，都要先口译再进行笔译。他纵任意气，生性好辩。自从新文学运动兴起以来，有提倡否定孝道的，就奋笔写文章与他争论。即使受到威胁，也年复一年的决不屈服。他尤其善于画画，山水画一派浑厚之气，融南北两派不同风格于一炉。当时人都把他的作品视为珍宝。林纾讲学没有门户之见，曾说清代学术的兴盛，超过了现在和以往，不仅义理、考据合而为一，而且在博和精两方面也都超过了前人，确实称得上是在汉学、宋学以外，另创了清学一派。当时有人提出成立清学会的建议，林纾鼓掌称好，并竭力帮助其得到实现。甲子年（1924）秋，病故，享年七十有三。他的门生尊他叫“贞文先生”。他的作品有《畏庐文集》、《诗集》、《论文》、《论画》等。（邱文龙 译）

【原文】

林纾，字琴南，号畏庐，闽县人，光绪八年举人。少孤，事母至孝。幼嗜读，家贫，不能藏书。尝得《史》、《汉》残本，穷日夕读之。因悟文法，后遂以文名。壮渡海游台湾，归客杭州，主东城讲舍。入京，就五城学堂聘，复主国学。礼部侍郎郭曾炘以经济特科荐，辞不应。

生平任侠尚气节，嫉恶严。见闻有不平，辄愤起，忠恳之诚发于至性。念德宗以英主被扼，每述及，常不胜哀痛。十谒崇陵，匍伏流涕。逢岁祭，虽风雪勿为阻。尝蒙赐御书

“贞不绝俗”额，感幸无极，誓死必表于墓，曰“清处士”。忧时伤事，一发之于诗文。

为文宗韩、柳。少时务博览，中年后案头唯有《诗》、《礼》二疏，《左》、《史》、《南华》及韩、欧之文，此外则《说文》、《广雅》，无他书矣。其由博反约也如此。其论文主意境，识度、气势、神韵，而忌率袭庸怪。文必己出。尝曰：“古文唯其理之获，与道无悖者，则味之弥臻于无穷。若分画秦、汉、唐、宋，加以统系派别，为此为彼，使读者炫惑，莫知所从，则已格其途而左其趣。经生之文朴，往往流入于枯淡；史家之文则又隳突恣肆，无复规检。二者均不足以明道。唯积理养气，偶成一篇，类若不得已者，必意在言先，修其辞而峻其防，外质而中膏，声希而趣永，则庶乎其近矣。”纾所作务抑遏掩蔽，能伏其光气，而其真终不可自闷。尤善叙悲，音吐凄梗；令人不忍卒读，论者谓以血性为文章，不关学问也。

所传译欧西说部至百数十种。然纾故不习欧文，皆待人口达而笔述之。任气好辩，自新文学兴，有倡非孝之说者，奋笔与争。虽胁以威，累岁不为屈。尤善画，山水浑厚，冶南北于一炉。时皆宝之。纾讲学不分门户，尝谓清代学术之盛，超越今古，义理、考据，合而为一，而精博过之。实于汉学、宋学以外别创清学一派。时有请立清学会者。纾抚掌称善，力赞其成。甲子秋，卒，年七十有三，门人私谥贞文先生。有《畏庐文集》、《诗集》、《论文》、《论画》等。

严复传

——《清史稿》卷四八六

【说明】严复（1853—1921），近代思想家、文学家、翻译家。初名传初，字又陵，后又改名复，字几道；晚年号愈野老人等。福建侯关（今福州）人。曾留学英国海军学校。甲午战争后，提倡新学，主张向西方学习，反对顽固保守。

严复翻译大量西方作品，较有系统地介绍和传播了西方文化。文字质朴，首次提出“信、达、雅”的翻译标准。其诗文往复顿挫，感情充沛，颇有影响。有《严几道诗文钞》、《严译名著丛刊》等。

严复，初名宗光，字又陵，一字几道，侯官（今福建福州）人。小时就极聪慧，酷爱写文章。福建总督沈葆贞当初创建船政学堂，招试英俊之才入学，以培养储备海军将才，看到严复的文章，认为是个奇才，因此，把他列为第一名，这时他年纪却只有十四岁。毕业以后，在军舰上实习，遍历南洋黄海一带。日本觊觎我宝岛台湾，沈葆贞奉命筹划防务，带他东渡，侦察敌情，勘测各海口情况。光绪二年（1876），被派遣到英国海军学校，学习战术和炮台建筑等专业，每次考

试，总是名列榜首。侍郎郭嵩焘出使英国，激赏他的才华，经常请他跟自己一块儿研讨中西学术的异同。学成归国，北洋大臣李鸿章正大规模地训练海军，于是就任命严复作北洋水师学堂的总教习。光绪二十四年（1898），皇上下诏，求取人才，严复被举荐，召京面试，符合皇上心意。命缮写好草拟的万言书后再上奏。还未来得采用，政局却起了突然的变化。过了两年，因躲避义和团之乱，回归南方。

这时，人们渐渐倾向信仰西方的学说。严复认为自由、平等、权利等学说，把它们作为借鉴不是没有好处，如果无所折衷，做过了头，人们就会放荡无忌，危害将说不尽数不清了。他常在大庭广众之下陈述这些见解。

严复长久以来凭着在海军中的劳绩，只得到副将的官衔，于是他干脆放弃了，用一笔钱捐了一个同知，晋升为道员，才做了北洋水师学堂的校长。宣统元年（1909），海军部成立，皇上特别授予协都统的官职，不久，又赐文科进士，充任学部名词馆总纂。又凭着硕学通儒的名望被征召为资政院议员。宣统三年（1911），授海军一等参谋官。

严复尽心著书写作，在学问上无所不通，所有中外种种学术理论，无不追根问底，弄清利弊得失，并加以证明而达到融会贯通的地步。严复还精通西欧文字，他所翻译的书，用瑰丽的文字表达了深奥的内容。他在《天演论自序》一文中说：“孔仲尼对六艺的整理、编纂，《周易》和《春秋》，态度最为严谨。司马迁说：‘《易》本隐而之显，《春秋》推见至隐。’这是世上的至理名言。起初，我以为‘本隐之显’，就是观察卦象，联系卦辞爻词，来预卜事情的凶吉罢了；‘推见

至隐’就是把褒贬寄托在字里行间罢了。等到学了西方人的逻辑学，才知他们推究事物的规律来获取知识的方法既有归纳推理，又有演绎推理。归纳推理就是考察事物的局部而推知其全体，举一反三，融会贯通。演绎推理就是援引公理来判断许多具体的事，从已知的规律来推知未知的结果。这本来是《周易》和《春秋》的学问。司马迁所说的‘本隐之显’就是演绎推理，所说的‘推见至隐’就是归纳推理，二者是研究事物，彻底弄清规律的要术。西方学术中最为切实，可以以简驭繁的，无非是名、数、质、力四者的学问罢了。而我国的《周易》则以名、数为经，以质、力为纬，合起来称之为《易》。宇宙之内，物质和力相互作用，没有物质就显不出力来，没有力，就产生不出物质。所有的力，在《周易》中都称为乾，所有的物质都称为‘坤’。牛顿的运动定律有三条，其中一条说：静的自己不会变动，动的自己不会停止，运动的路线必定是笔直的，运动的速度必定是均匀的。’而《周易》里也说：‘乾，它静时恒静，它动时笔直’。有个叫斯宾塞尔的，用天演自然的观点阐述事物的变化规律，他提出的天演界说中有这样的话：“聚则合成物质，散则产生动力，开始时简单，最终时复杂。’而《周易》中说：‘坤，它静时聚合，它运动时分散。’至于总力不增不减的理论，那么在这之前，我们已有自强不息的说法；而周而复始的运动理论，我们有自然界盛衰更迭的创见出现在它之前；至于‘见不到事物的变化，宇宙的生命或许就要毁灭’的主旨，尤其是和热力平均，天地就要毁灭的说法互相印证的。大凡古书难读，中国最为严重。二千年来，读书人追求功名利禄，抱残守阙，没

有独创的思想，因此生在今天的人才转而从西学中懂得了中国古书中的学问。”所有严复所翻译的著作，他独自领悟到的精深奥妙之处，与此相类。

世人说林纾用中文沟通了西文，严复则用西文沟通了中文，把他们合称为“林严”。辛酉年（1921）秋天，严复病故，享年六十九岁，著作有《文集》和译著《天演论》、《原富》、《群学肄言》、《穆勒名学》、《法意》、《群己权界论》、《社会通论》等。

（邱文龙 译）

【原文】

严复，初名宗光，字又陵，一字几道，侯官人。早慧，嗜为文。闽督沈葆楨初创船政，招试英俊，储海军将才，得复文，奇之，用冠其曹，则年十四也。既卒业，从军舰练习，周历南洋，黄海。日本窥台湾，葆楨奉命筹防，挈之东渡调敌，勘测各海口。光绪二年，派赴英国海军学校肄战术及炮台建筑诸学，每试辄最。侍郎郭嵩焘使英，赏其才，时引与论析中西学术同异。学成归，北洋大臣李鸿章方大治海军，以复总学堂。二十四年，诏求人才，复被荐，召对称旨。谕缮所拟万言书以进，未及用，而政局猝变。越二年，避拳乱南归。

是时人士渐倾向西人学说。复以为自由、平等、权利诸说，由之未尝无利，脱靡所折衷，则流荡放佚，害且不可胜言。常于广众中陈之。

复久以海军积劳叙副将，尽弃去，入赘为同知，累保道员。宣统元年，海军部立，特授协都统，寻赐文科进士，充学部名词馆总纂，以硕学通儒征为资政院议员。三年，授海

军一等参谋官。

复殚心著述，于学无所不窥，举中外治术学理，靡不究极原委，抉其失得，证明而会通之。精欧西文字，所译书以瑰辞达奥旨。

其《天演论自序》有曰：“仲尼之于六艺也，《易》、《春秋》最严。司马迁曰：‘《易》本隐而之显，《春秋》推见至隐。’此天下至精之言也。始吾以为‘本隐之显’者，观象系辞，以定吉凶而已，推见至隐者，诛意褒贬而已。及观西人名学，则见其格物致知之事，有内籀之术焉，有外籀之术焉。内籀云者，察其曲而知其全者也，执其微以会其通者也；外籀云者，援公理以断众事者也，设定数以逆未然者也。是固吾《易》、《春秋》之学也。迁所谓‘本隐之显’者外籀也，所谓‘推见至隐’者内籀也，二者即物穷理之要术也。夫西学之最为切实，而执其例可以御蕃变者，名、数、质、力四者之学而已。而吾《易》则名、数以为经，质、力以为律，而合而名之曰：《易》。大宇之内，质、力相推，非质无以见力，非力无以呈质。凡力皆‘乾’也，凡质皆‘坤’也。奈端动之例三，其一曰：‘静者不自动，动者不自止，动路必直，速率必均。’而《易》则曰：‘乾，其静也专，其动也直。’有斯宾塞尔者，以天演自然言化，其为天演界说曰：‘翕以合质，辟以出力，始简易而终杂糅。’而《易》则曰：‘坤，其静也翕，其动也辟。’至于全力不增减之说，则有自强不息为在先；凡动必复之说，则有消息之义居其始。而‘易不可见，乾坤或几乎息’之旨，尤与热力平均、天地乃毁之言相发明也。大抵古书难读，中国为尤。二千年来，士徇利禄，守阙残，无

独辟之虑，是以生今日者，乃转于西学得识古之用焉。”凡复所译著，独得精微皆类此。

世谓纾以中文沟通西文，复以西文沟通中文，并称“林严”。辛酉秋，卒，年六十有九。著有《文集》及译《天演论》、《原富》、《群学肄言》、《穆勒名学》、《法意》、《群己权界论》、《社会通论》等。